

叶戈尔·列托夫如是说

第三辑 零零年代



棺材编年史| Svistoplyas No. 2 – 叶戈尔·莱托夫的机枪寿命

叶戈尔·列托夫的机枪寿命

大约在1986-87年，在库尔恰特尼克举办的一场摇滚实验室音乐会上，谢尔盖·列托夫给我和娜塔莉亚·“科梅塔”·科马罗娃（她曾在她的杂志《僵尸》上提携过我的年轻才俊）看了一张苍白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些浓妆艳抹、留着莫霍克发型等等，看起来很疯狂的人。“那是我弟弟叶戈尔，”谢尔盖指着其中一个人说，“他们玩朋克，一支非常狂野的乐队，在鄂木斯克被所有人欺负——当局、‘办公室’……”科梅塔叹了口气：“真希望他们能在莫斯科演出，是吧，列沙？”“是啊，”我说，也重重地叹了口气，看着库尔恰特尼克舞台上正在播放的节目。“但他们会害了他们自己和我们，”科梅塔又叹了口气。“他们肯定会害了所有人，”我和谢尔盖一致同意。我们分道扬镳，心中仍为这不可能的事叹息不已。

关于叶戈尔·列托夫和民防组织的文章已有数千篇，他也接受过数百次采访。

但不知为何，我立刻想起一位西方记者在春季欧洲峰会上向俄罗斯代表团提出的一个问题：“普京先生是谁？”台上和台下顿时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我们的政商领袖们也很快巧妙地加入了笑声。但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我想问的是：叶戈尔·列托夫究竟是谁？诗人、音乐家、永不言败的激情者、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者、床上飞机爱好者、反抗天国耶路撒冷的斗士、艺术家，一个至今仍生活在苏联，却在鄂木斯克公寓（也就是著名的“戈尔布工作室”）里24小时同时观看两台电视的人，一个足球迷，同时也是一名狂热的足球运动员，许多人爱他，许多人恨他，一个喜欢重复和拼贴的人。欢迎补充。

“创造力是生命体对压迫之物的自然抵抗。那是一种致命的攻击……创造力与死亡密不可分。死亡是灵感的源泉，也是追逐者……”这是一句严肃的论断。莱托夫最近指控他将灵魂出卖给了“尘世之王”，其严肃性丝毫不亚于此。然而，我真心怀疑缔约双方是否会就此事接受采访，甚至公开承认此事。几个世纪的实践表明，此类协议的见证人通常会永远保持沉默。

真正无可否认的是，那把挥舞镰刀的镰刀始终萦绕在叶戈尔和他的伙伴们的一生及其创作历程中。大约16岁时，他失去了母亲，这让他第一次经历了一种近乎崩溃的状态，一种顿悟，仿佛化身为梅什金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始于他的少年时期。1983年，他加入了谢尔盖·库廖欣早期的流行机械乐队（POP-MECHANICS），并由另一位谢尔盖——老列托夫——介绍。之后，他加入了半传奇的波塞夫乐队（POSEV），该乐队留下了大量即兴创作的音乐，以数米长的卷轴磁带的形式保存下来。随后，在1984年11月8日，列托夫和库兹亚·乌奥（康斯坦丁·“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创立了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在1985年几乎整个一年里，他们嬉戏玩闹，创造出一些惊世骇俗、前所未见的事物。他们有点像哈姆斯-弗维登斯基二人组：一个是严肃睿智的叶戈尔，另一个是爱笑滑稽的库兹马。一白一红。很快，他们就闹翻了：库兹马在当局的帮助下，不顾自身安危，被判入狱，并被派往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守卫两年。独自一人的叶戈尔自然不会就此罢休，在利申科兄弟（鄂木斯克乐队PIK I KLAkson）的帮助下，录制了三张专辑，并在1987年春天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义（原文如此！）在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上演出。列托夫早

已是内务部和克格勃的常客，还在鄂木斯克精神病院登记在册，屡次被指控为寄生虫，如今他冒着极大的风险。

从尼科斯（顺便一提，他在那里结识了扬卡·迪亚吉列娃、瓦季姆·“黑卢基奇”·库兹明以及许多其他未来的朋友和同事）返回后，叶戈尔在五月到六月间以最快的速度，用苏联奥林匹姆-003型卷盘式录音机录制了五张半小时的电子专辑。这五张专辑分别是：《红色专辑》、《捕鼠器》、《好！》、《极权主义》和《恋尸癖》。所有乐器都由他一人演奏。只有《恋尸癖》收录了扬卡的歌曲《我的悲伤是光明的》。

扬卡帮助叶戈尔迅速逃离了精神病院，他被召到那里，名义上是去看医生。直到冬天来临，他们搭便车横穿全国，在各大城市留下G.O.乐队的录音，就像埋下了定时炸弹。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举办即兴的民谣音乐会。

夏末，一批相当不错的录音带（就当时的国防条件而言）出现在莫斯科。这些录音带以成百上千份的形式流传开来，无人能够阻止这一进程。

到了1988年新年，回家的机会出现了：对“反苏分子和人民公敌”的搜捕已经结束，精神科医生和护工们也不再对他热情拥抱。列托夫回到鄂木斯克，并于1988年1月再次独自录制了三张专辑：《一切按计划进行》、《塔克·扎卡利亚拉斯·斯塔尔》和《男孩的刺激》。库兹马从拜科努尔回来后，两人共同完成了“战争”乐队的前两张专辑：《肮脏的青年》和《乐观主义》。大约在同一时期，叶戈尔录制了扬卡的第一张原声专辑《不允许》。之后，他又参与了瓦迪姆·库兹明的“精神之脊”和“黑色卢基奇”乐队以及“边防部队”乐队的录音工作。

自1988年1月起，不安分的列托夫与库兹亚·乌奥和经理一起创立了共产主义概念项目。所用素材包罗万象，从苏莱曼·斯塔尔斯基1937年的诗歌，到军队复员民俗（库兹马和1988年加入G.O.的伊戈尔·“杰夫”·热夫顿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到巴赫、保罗·莫里亚和弗朗西斯·戈雅的音乐，一首小熊维尼的歌，葬礼录音，性手枪乐队和大门乐队的节选，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及其演讲的广播剧，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联流行歌曲，20世纪70年代初的民间庭院歌曲，以及谢尔盖·米哈尔科夫、列夫·奥沙宁、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丹尼尔·哈尔姆斯、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罗扎诺夫、列别捷夫·库马奇、叶夫图申科、石川拓卜、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歌词——名单不胜枚举。就这样，经纪人再也无法忍受，在第五张专辑后离开了。而叶戈尔和库兹马则英勇地高举概念艺术的大旗，直到他们在乐队的最后一张也是至关重要的专辑《俯冲轰炸机编年史》中达到巅峰。这张专辑既悲伤又庄严，它浓缩了整个时代，而到了1990年，这个时代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终结。在这张专辑中，扬卡与安娜·“纽里奇”·沃尔科娃合唱，演唱了他自己的歌曲和民歌。已故的迪马·塞利瓦诺夫——早期卡利诺夫之桥乐队、普蒂乐队和G.O.乐队的现场吉他手，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乐队“工业建筑”的领队——在这里演唱了哀婉的英文民谣《天堂鸟》。在这里，库兹马和叶戈尔亲自演唱了一些后来成为他们个人独唱曲目的歌曲，包括科尔克·雷若夫的《雾》（Fog）的首演，这首歌出自同名电影，专辑也因此得名。当然，还有那首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如何在肉铺里死去》（How the Soul Died in a Meat Hut），这首歌直接为叶戈尔即将推出的《普里格-斯科克》（Pryg-Skok）奠定了基础。

《共产主义》纯粹是个录音室项目，而《民防》却接连占领了各个城市。这一切始于1988年春天的新西伯利亚，在一个当地的节日上。正是在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口号第一次从舞台上响起。观众们并没有当真，他们也确实不应该当真。

但稍后再谈。就目前而言，莫斯科领先。

娜塔莉亚·“彗星”·科马罗娃的梦想终于成真——她邀请到了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担任她“Syrok”音乐节闭幕音乐会的压轴嘉宾。而且竟然没有人被捕。但她当时肯定紧张得要命，伊兹迈洛夫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她十二月那声绝望的呐喊：“我居然要花300卢布去看这种垃圾？！”而那场音乐会也确实精彩绝伦……之后，他们又在莫斯科的各个文化宫演出，尤其是莫斯科文化宫，在那里，他们与Nick Rock 'n' Roll、LOLITA、民防乐队和Yanka等乐队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演出，最后还来了一场狂野的即兴演奏。接着是圣彼得堡，在时间文化宫，他们与Yanka合作，激情演绎了《家！》。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进入了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在十月音乐厅举行的巴什拉乔夫隆重追悼会上，叶戈尔和Yanka的现场不插电演出更加令人费解，也更让人不安。主办方对G.O.的粉丝感到震惊。莱托夫在台上粗暴地指责音乐界贪婪。但这已经是1990年2月的事了。

1989年8月1日，G.O.在圣彼得堡的AUKTSYON排练室录制了他的第一张现场专辑《欢乐与幸福之歌》。现场没有观众，他们即兴演奏，没有录音或停顿。“观众的欢呼声”是后期从唱片中后期添加的。听起来就像现场录音一样。他们还录制了一些空白版本，用于在GrOb录音室进行下一次录音。之后，他们启程前往鄂木斯克。

这次的录制是另一个话题。同样，一系列专辑也是一次性录制完成的，但这次并非莱托夫一人之力，而是由一个在无休止的巡演中磨练出扎实基础的乐队共同完成。这些专辑包括《Voina》、《Zdorovo i Vneshno》、《Armageddon-Pops》和《Russkoe Pole Eksperimentov》。扬卡的专辑《Anhedonia》和《Domoi!》也同时录制完成。毫无疑问，这些是莱托夫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成就。

在发行了最后几张专辑之后，OBORONA 于 1990 年 4 月在塔林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乐队正式解散。

在阿尔泰山脉神秘漫步之后——根据未经证实的传说，他曾在秃山上被脑炎蜱叮咬——叶戈尔隐居到了鄂木斯克。起初，他打算录制一张个人专辑，收录他最喜欢的歌曲——他自己的作品、IPV乐队的作品以及苏联时期的歌曲。但在录制过程中（你可能还记得，对他来说，独自录制专辑并非新鲜事），新的歌曲开始涌现。最终，这些歌曲汇集成专辑《Pryg-Skok. 儿童歌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他的首张个人迷幻专辑。阳光明媚，充满活力，如梦似幻。一个全新的项目，一个全新的名字——EGOR AND THE PISSED OFF。

《普里格-斯科克》献给“英俊潇洒的叶夫根尼·利申科”——他就是《尖笛与喇叭》和《阿道夫·希特勒》中的叶夫根尼，于1990年夏天在圣彼得堡一家医院因重病去世。这首诗也纪念了喀麦隆国家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的表现。《夜》这首诗献给诗人兼同志亚历山大·弗韦登斯基。《关于傻瓜》改编自一首古老的斯拉夫死亡咒语：“死人绕着圈子走/寻找比他更死的死人。”

在诗歌和绘画领域，列托夫首先是一位拼贴艺术家。这一点在他的画作中显而易见——他使用勃拉姆斯的作品、苏联杂志的剪报，或者像1997年的专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与米兰·昆德拉的优秀著作同名）那样，直接插入一幅博斯的画作。歌曲创作则更为复杂，尤其对于那些缺乏文化修养的朋克来说。但即便如此，引用也比比皆是。叶戈尔本人曾多次承认，他的作品只有一个作者，或许是两三个，他感觉自己像是一个中继站，一个巨大的漏斗状管道，在某些时刻，某些能量以惊人的力量从中涌出——这些碎片或拼贴画，对他而言，构成了普通人所谓的“创造力”的过程。他还反复将这个过程称为“狩猎”，猎人同时也是猎物。最终，胜负取决于谁能胜出。

在这场追寻中，叶戈尔的永恒伙伴，精神上的同志，在统一的形而上学战线上并肩作战的同道中

人，毫不犹豫地列举了众多杰出人物，例如：阿瑟·李、塔可夫斯基、基拉·穆拉托娃、米兰·昆德拉、米洛拉德·帕维奇、瓦迪姆·西杜尔、菲洛诺夫、弗韦登斯基、沃纳·赫尔佐格、普罗米修斯、石川拓卜、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维索茨基、舒克申、薇拉·马特维耶娃、克鲁切尼赫、马尔克斯、亨利·米勒、布鲁诺·舒尔茨、果戈理、别尔嘉耶夫、伯格曼、什帕利科夫、格吕内瓦尔德、梵高、诺尔斯坦、博斯、克里斯特、安部公房、君特·格拉斯、捷连季耶夫等等。怎么样，你觉得这份名单如何？我向你保证，它远非完整。

如果《普里格-斯科克》能传遍四方，那将是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艺术巅峰之作。但对于叶戈尔·列托夫而言，并非如此。他继续创作诗歌和歌曲，远离公众视线，也不再举办音乐会。

然后，1991年5月来了。扬卡去世了。葬礼和守灵仪式上，叶戈尔一行人陷入疯狂，令在场的人感到震惊，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也完全可以理解。你能想象叶戈尔、纽里奇、杰夫，他们所有人——或者我们所有人——在那几天里的感受吗？那个分水岭早已过去——无论对我们而言还是对其他人而言——而这并非莱托夫一手策划的。顺便一提，在守灵仪式上伴着奇想乐队的歌跳舞——这件事已经被人们谈论和写了很多。我也一样。最近我仔细听了歌词：“罗西，你为什么不上家？妈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扬卡也早年失去了母亲。所以，我无可奉告，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话会引向何方。

1991年6月，叶戈尔、杰夫和泽伦斯基收集整理了扬基乐队的遗作——那些未能收录进官方专辑的作品。最终成果是专辑《耻辱与耻辱》，这张专辑气势磅礴，能量惊人，反复聆听几乎让我的意识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与此同时，EGOR I PIZDENEVSHIE悄然从一个个人项目转型为一支完整的录音室乐队。乐队成员包括——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他们现在也开始使用全名而非昵称——Egor Letov、Konstantin Ryabinov、Anna Volkova和Igor Zhevtun，Alexander Rozhkov也参与其中。1991年1月至1992年6月间，这支乐队与PIZDENEVSHIE合作录制了一张名为《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的双专辑。《百年孤独》是一张纯粹的车库迷幻摇滚专辑，其诞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乐队的组建、漫长而高强度的工作（这与Letov一贯的快嘴风格截然不同），以及他们大量服用的毒品和兴奋剂，包括LSD。是的，在90年代初，叶戈尔终于弄到了迷幻药（他之前曾公开抱怨说自己搞不到。好吧，现在他如愿以偿了）。所以，用他自己的话说，《百年孤独》是一张明显受到迷幻药影响的专辑。

我还要补充一点——这张专辑真的很棒。专辑名出自马尔克斯，引文来自基督教和佛教的经典和伪经，而这次的封面则是里亚比诺夫和列托夫创作的圣像画《圣徒离开人世荣耀，遁入沙漠》的复制品。

从1992年到1995年，叶戈尔和库兹马沉浸在诗歌中；列托夫的诗集（共两卷）即将出版，其中收录了700多首诗！

1993年9月，叶戈尔出现在白宫保卫者队伍中并不令人意外——这不仅是因为《登报》刊登了关于他和他所在组织的文章。有识之士本可以从《反文化》杂志第三期及其后续声明中看出端倪。叶戈尔公开支持保卫者，甚至宣布他和罗曼·纽莫耶夫正在创立“俄罗斯突破”运动，该运动立即被贴上了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标签。“俄罗斯突破”运动包括复兴的民防组织、“生存指南”组织以及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领导的“祖国”组织。该运动的首次行动于1993年12月19日在圣彼得堡文化中心举行，名为“行动指南”。高尔基广场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人群与防暴警察之间的冲突，导致文化中心前的广场上出现大范围骚乱。然而，组织者对此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原本想从爱国者身上

捞一笔，但显然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参加，于是惊恐地逃离了现场，还不忘抢走收银机里的所有现金。

后来，到了1994年，事情进展得更加顺利：在秋明（2月）、基辅、卢甘斯克和顿河畔罗斯托夫（4月）举办了一系列摇滚音乐会，5月27日在莫斯科克雷利亚苏维埃体育中心举办了音乐会，6月2日至3日在圣彼得堡LDM举办了音乐会。5月28日，叶戈尔·列托夫在“A节目”的争议性直播中公开宣称了他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观点，并发表了一系列纲领性的政治声明。

G.O.和列托夫如今组成了一支原声乐队，他们不再以“俄罗斯突破”的名义进行巡演，而是积极地在全国各地进行独立巡演。但无论走到哪里，叶戈尔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现有政治秩序的看法。1994年12月，在莫斯科装甲兵学院军官俱乐部，“国防”乐队举办了十周年庆典，现场座无虚席。1995年5月至10月，他们录制了新专辑《至日》（Solstice）；1996年1月至10月，他们又录制了另一张专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评论家和老歌迷对新专辑的反应都很平静，有些人甚至有些冷淡。我个人倒是挺喜欢的，至于公众的反应，我总是忍不住要引用鲍里斯·西蒙诺夫的那句话（懂的人自然知道我说的是谁）：“好事需要时间沉淀。”所以，一切自有其时。

1997年7月4日，OBORONA乐队在莫斯科举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唱会，这是他们大型巡演的一部分，并使用专业设备进行了录制。同年，G.O.乐队成员娜塔莉娅·尤里耶夫娜·丘马科娃（Natalya Yuryevna Chumakova）加入OBORONA乐队担任贝斯手。作为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新闻系，曾是朋克乐队的成员，如今成为了OBORONA的贝斯手，同时也是叶戈尔（Yegor）的妻子。

1998年，G.O.开始了无休止的巡演，同时开始与他的哥哥谢尔盖一起录制新专辑。乐队成立15周年悄然过去，演出寥寥无几，莫斯科的演出几乎被“俄罗斯劳动党”取消——在议会选举白热化之际，该党根本无法履行其义务。G.O.的“反美反战巡演”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场巡演正值北约轰炸科索沃期间——原计划的六场演出最终只举行了一场。尽管列托夫渴望支持他的塞尔维亚兄弟，但俄罗斯反对派议员们却根本没有邀请他前往贝尔格莱德。列托夫以不插电的形式前往以色列演出，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他们又开始向他发出邀请了。

叶戈尔和娜塔莎目前正在完成一张新专辑的制作。谢尔盖·列托夫已经录制完了他的所有部分，现在他们正在等待G.O.乐队的现场鼓手萨沙·安德留什金和库兹马的加入。没有人知道这张专辑何时才能完成，就连乐手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专辑会收录哪些曲目，或者叫什么名字。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将是一张全新的CIVIL DEFENSE专辑.....

叶戈尔·列托夫是谁？我认识他12年了。我根本不认识他。

阿列克谢·科布洛夫

棺材编年史 | 此类音乐第13期——叶戈尔·列托夫：“我不知道该唱些什么”

埃戈尔·莱托夫：“我不知道该唱些什么”

民防领导人准备逃离粉丝，逃往世界尽头

两张名为“民防”（CIVIL DEFENSE）的奇怪唱片出现在唱片店里。第一张是致敬专辑，收录了叶戈尔·列托夫的歌曲，由KIRPICH、VOPLI VIDOPLYASOVA、MYSLOVYE HALLUCINATSII和LYAPIS TRUBETSKOY演唱。第二张是名为《星陨》（Starfall）的专辑，列托夫在其中演唱了一些老电影的歌曲。

这份致敬显得粗糙而做作。《星陨》唤起了一种疲惫感和对上个世纪的怀念。为了了解这些西伯利亚朋克传奇人物的近况，我们采访了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妻子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她是民防乐队的贝斯手。

— CIVIL DEFENSE乐队的上一张录音室专辑《Solstice》和《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发行于1997年，而且你们通常不在演唱会上表演新歌。你们现在有任何新歌吗？

埃戈尔·列托夫：“是的，但我们不演奏它们。我们录制了一张名为《星陨》的专辑——收录了我们最喜欢的歌曲。”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这些苏联歌曲非常奇怪，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它们和现在像‘老歌颂正事’这样的项目翻唱的歌曲完全不同。”

那你自己的歌呢？

E.L.: “问题是，当一个人的写作、创作，或者任何他做的事情——音乐、歌词——达到一定水平后，就会遇到瓶颈，之后形式就会停滞不前。我在1989-90年就说过同样的话。

不可能突破某个瓶颈。在我们录制了《Pryg-Skok》和《Russkoe Pole Eksperimentov》之后，我们才得以继续创作。我仍然可以写出很多类似的歌曲，但这会变得索然无味，甚至有些毫无意义。

我更感兴趣的是改编别人的作品，这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写不出自己的歌。但每一张新专辑，每一次公开露面，都不应该只是为了博人眼球，而应该反映出你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说实话，我现在甚至不知道该唱些什么。关于车臣，关于纽约世贸双塔。”

— 你听过向民防致敬的那段音乐吗？你喜欢吗？

E.L.: “算是吧。（像父亲看着孩子调皮捣蛋那样微笑。）这很有趣。说实话，我喜欢它的一切。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概念性的行动，就连谢尔盖·扎里科夫（DK小组）也无法匹敌。我把它看作是‘共产主义第16号’*。”

N.Ch.: “你能想象吗，比如，LYAPIS TRUBETSKOY 用他那稚嫩的嗓音和铜管乐器演唱《国家》，而且所有乐器都演奏得非常出色。”

E.L.: “想象一下，所有这些流行音乐人，这些幻觉般的音乐人，都在演奏我们的歌。结果发现我们招募了一大批流行音乐人。唯一一个非流行音乐人是Mashnin，其余的基本上都是非常现代的风格。这真的很有趣。我以前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演唱我的歌。”

— 过去一两年里，你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E.L.: “现在到处都是GO狂热，生活也变得艰难起来。有人闯入我们家，从窗户爬进来。我们住在底楼，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现在又有几个职业学校的学生，光头，不知道为什么自认为是我们的粉丝，把整个入口都涂满了污言秽语。因为这些事，我们和邻居的关系越来越差，真是令人难过又恶心。我父亲基本上是个病人，勉强能走动。日子过得很艰难。他们跑来要签名，真是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需要签名。不知怎么的，过去五年里，每个人都不断地向我索要这索要那。我想，总的来说，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我甚至想过要不要搬到国外某个不知名的地方去。”

——如果你想移居他国，你会选择哪个国家？

E.L.: “是的，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更好的选择是墨西哥，[马科斯](#)副司令就住在那里。”

— 你想见面吗？

E.L.: “是的，这是我唯一完全认同的政治力量。而且我完全认同——我是马科斯军队的一员；为他们的事业献出生命我毫不羞愧。

一个理想的小国已经在这里诞生。马科斯认为全球一体化正在进行，这将导致全球主义^{***}与国际异议势力之间的一场大规模内战。

我认为这些理念需要推广，因为目前没有任何相关信息。我觉得自己现在老了，恐怕看不到这场全球战争了。”

——你希望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什么角色？

E.L.: “说实话，任何人都行。任何泥瓦匠，只要能亲手砌一块砖就行。我觉得我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了。”

Tatyana KHRIPKINA，非常感谢Dmitry ELKIN
协助组织这次采访。

你知道？

* [△](#) COMMUNISM #16 是叶戈尔·列托夫的项目之一，其中最著名的专辑是《俯冲轰炸机编年史》。最初，这些专辑并不打算命名，而只是编号。

** [△](#) 副司令马科斯是墨西哥恰波斯州反对全球化的土著游击队领导人。马科斯向“开发”土著土地、石油和咖啡的跨国公司宣战。马科斯总是戴着黑色面罩（像特种部队士兵一样）。

*** [△](#) 全球主义是一场社会和政治运动，它宣扬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向一个平均的“共同的全球世界”——一个世界——过渡的必然性。

棺材编年史 | 反文化特刊 第5期 (13) —— 愚人陷阱

愚人陷阱

与叶戈尔·列托夫的对话

“我非常喜欢上次在Tochka举办的Civil Defense演唱会。说实话，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 为什么？

— 因为能量不对劲，所以一切都不对劲.....

——我们什么时候拥有过比“那样”更少的东西呢？

例如，去年在乌兰巴托，一切似乎都很正常，但即使在那里.....

我觉得这是一场很棒的音乐会。

“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个家伙出版了一本名为《漫长的冬天》的杂志。他写道：‘我当然很高兴，但舞台上已经没有一点古老的萨满教的影子了。’”

“所以他就是个白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进步，越来越好。如果有人不明白这一点，那他就是个白痴。”

——.....说完我的想法。即使在他们过去的“黄金时代”，也没有哪一场GO的演唱会能带给我如此多的快乐。当然，这可以归功于安德留什金和克利姆金的组合，因为安德留什金是一位杰出的鼓手，但这并非重点。你觉得呢？是你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还是某种氛围发生了变化？

“空气在变化，我的内心也在变化，但本质不变。我不知道问题背后隐藏着什么。有些问题现在很难回答，因为它们，我们不妨说，很愚蠢。我认为有些事情显而易见——至少对我而言——评论它们、谈论它们完全没有意义。空气中正在发生很多变化。一场革命正在我们眼前展开——它正沿着一条完全疯狂的轨迹发展，席卷越来越广阔的空间。我想，这一点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打开电视，看几条新闻报道，一切都会变得清晰明了。”

嗯，这个过程一直在进行.....

不，并非一直如此——只是过去十年。

— 所以，你感觉不到今年春天发生了什么特别的爆炸事件吗？

——我从未感觉有什么事情突然爆发了。我还是和孩提时代一样。我一点都没变——除了我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我是说真的极其丰富——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写作困难，不如说是让某些东西鲜活起来有点愚蠢。很多事情对我来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我可以每年发行十张大作，也可以一张都不发行——我根本不在乎。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像我一样的人，这和为自己而做没什么区别。而现在的情况是，做与不做——都无关紧要。我现在更喜欢观察，而不是亲自参与任何过程。我变得对自己来说索然无味，因为我太了解自己了——彻头彻尾的了解。我现在

对凌驾于我之上的事物更感兴趣。

你今天最担心的是什么？

——很多。存在、发展、演化。

— 你觉得历史上的哪些关键事件最有趣？

语言的起源，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正是我研究的内容。

《Zvezdopad》收录了维拉·马特维耶娃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所谓的“原创歌曲”，摇滚乐手们曾对其进行抨击，声称他们正在做一些更具革命性和激进性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歌。她唱的时候是她的歌，我唱的时候就是我的歌。塞梅利亚克在《阿菲沙》里写得很清楚：我们演奏的所有其他人的歌都是我们自己的歌，神奇地转移到了我们身上；否则，我们就不会演奏它们了。如果不是我的歌，我就不会唱。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唱别人的歌。”

— 但实际上，维拉·马特维耶娃的《黑色水粉》比《温柔的雨》更符合你的口味？

“我也想唱《温柔的雨》。但我不会那样唱——就是这样。而且，我创作歌曲的时候，根本不在乎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我可以引用任何人的话，也可以选择不引用。我的所有素材都像橡皮泥——一片语言和文化的橡皮泥海洋。音乐、宗教——都是一回事。你可以用所有这些素材创造出美好而独特的东西——包括你自己的东西。”

— 所以，“原创歌曲”的概念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

——一切都关乎风格，关乎流派。我不在乎这些。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任何东西，取决于它与当下有多接近。“作者之歌”，或者“非作者之歌”——一切都取决于名称。为什么是“作者之歌”？它只是一首歌而已。谁写的、为什么写、她当时在想什么，这有什么区别？这有趣吗？我并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诗人可以自己创作歌词并亲自演唱，或者，也可以用别人的声音，配上别人的曲子来演唱.....

“那是每个人的私事。大多数都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内心，所以他们才会在那里徘徊，试图弄明白些什么。但我不在乎他们——就像没人关心我灵魂深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一样。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一生都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我打算继续关注下去。”

——你将《Jump-Jump》这首歌献给了喀麦隆国家队在1990年世界杯上的表现.....

我把《Pryg-skok》这首歌献给喀麦隆，因为他们展现了如何在特定情况下行动。这正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形势在变——你必须采取行动与之对抗。有一首歌叫《我永远反对》，但我也可以唱《我永远支持》。每当形势发生变化，对傻瓜来说就是陷阱。对聪明人来说，这是通往更高层次的跳板。这就是我们所有音乐的主题——参与政治、退出政治、行动或以不作为来表明立场。有时，不作为比行动更有力量。这就是我们成年后一直在做的事情——有意识地，因为在时代初期，我们有时是凭直觉行事。而现在——有意识地、精准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总之，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他以为我们应该吐口水、跳到天花板、放声大哭，但我们却像钢铁般的人一样，演奏得非常有力。

但在《要点》中，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我们从不重复自己；我们现在的阵容都不一样了。一切都和我们五年前，更别说十年前的任何演出截然不同。我们从不重复我们的演唱会。从托奇卡到彼得罗扎沃茨克，那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演唱会。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一段即兴演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演奏《一切按计划进行》，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永远演奏它。还有苏联歌曲，我想……”

我们计划今年夏天创作一张新专辑。它非常狂野、惊悚、狂野，而且旋律性并不强。或许恰恰相反。但这并不改变即兴创作的范围——抒情、人声、能量。我们目前正朝着先锋派、原始音乐的方向发展，就像 Troggs 那样。车库朋克与先锋派的融合。

除了自己的演唱会之外，你还会参加其他演唱会吗？

“很遗憾，我现在负担不起；这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我的‘人气’，尤其是在《致敬》之后。我上次去看马什宁的演出是在O.G.I.，那是一次很棒的体验。我们甚至还想过组建一个乐队，叫‘马什宁和奥皮兹迪涅夫希’，我们一起演奏，他负责喊歌词。有点像‘精选集’。他同意了。也许我们今年夏天会录歌。”

— 你对致敬有什么看法？

“我对此真的没什么好回应的；感觉有点尴尬。首先，我的一些朋友参与其中，其次，这张唱片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有人把一些乐手凑到一起，让他们唱——唱别人唱的我的歌。如果我唱别人的歌，那——我们之前讨论过。而且我挺喜欢Lyapis Trubetskoy在致敬演出上的表演。至于其他的，我就不太明白了——我只是随便听听，既没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也没留下什么坏印象。”

除了车库朋克和足球之外，你现在还喜欢什么？

——很多东西。车库朋克——我不会说它启发了我，但挺有意思的，差不多吧。我喜欢怪异的东西。我喜欢各种形式的媚俗，尤其喜欢那种天真丑陋的媚俗。

至于我生活中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想谈论这个。当然，我可以讲很多神话传说，但我不知道那样是否有意义。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我一生都在创造这些形象，但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无人知晓——而且我想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但是冰山也有一部分露出水面吗？

当然。这正是我们通过音乐会和活动所体现的。但最近，我越来越不享受参与这些活动了。不是因为老了，而是因为我开始意识到形式的某种局限性……形式终究会耗尽：它不是无限的。万物皆有始有终。如果我在某个框架内创作出了真正优秀的作品——比如《俄罗斯实验场》——那么我可以再创作二三十首类似的歌曲，发行同样的专辑，让某些群体乐于聆听，但何必呢？我想要创作一些不常做但精准的作品——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会以新的方式演奏老歌——现在它更像是一种戏剧表演。接下来的作品也会有所不同——也许根本就不是音乐。

——抛开车库朋克不谈，是否存在一些现象……

“我听了很多东西。我的房间里堆满了CD、书和录像带，我都走不动路了——我得跨过它们，爬过它们。我听各种现代前卫音乐、反叛摇滚、世界音乐，以及各种各样的珍稀唱片。它们就像黏

土，是一个起点，你可以把它塑造成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 西方流行音乐可以被视为橡皮泥吗？

我一直很喜欢听流行音乐，但最近的流行音乐真的越来越糟糕了。

- 从什么时候开始？

——大概就是过去十年吧。情况越来越糟。以前流行音乐都很有艺术性——短小精悍、生动鲜活——但现在它正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一个功能性音乐的新领域。我注意到这种趋势的走向，挺有意思的。

— 功能的不断增强是否迫使你做出任何反应？

“你必须与时俱进——你必须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你才不会显得愚蠢，也不会做蠢事。而且由于一切变化如此之快，你必须反应迅速。这是计算机时代。”

— 你认为我们处于信息社会还是后信息社会？

“很难说，我不知道。但信息的性质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人们认为，后信息社会是指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许多问题更容易通过直觉解决的社会。

— 你的语气好像直觉和理性之间有一条明确的界限。

- 你可以拿个计算器，或者你可以看看这条河。

“实现某些目标的工具和辅助手段变得更加有效。它们改变了局面、现实、人的心态，甚至人的本质.....”

——那么，人们的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觉得这种恶化的趋势已经到了某种程度的终结吗？

“我不想谈论这个话题。否则，我听起来就像个坐在山上的老顽固，对这事那事大放厥词——我不仅没有做好准备，也不想扮演这样的角色。我对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完全了解。”

但你确实有感情吗？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受，并不影响任何人。这些感受很奇怪。文明终将终结，新的文明也终将出现.....进化本身无所谓好坏——它只是自然选择。至于会是什么样的文明——我又怎能知道？我又不是上帝。总而言之，这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是闲言碎语。你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但仍然难以想象，因为它超越了任何理解，更遑论个人观点。”

但个人意见只是一种投射。

“我没兴趣。我知道这是无稽之谈。”

但你的歌曲也是一种投射。

“这不是投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物体。它们会遭遇什么，之后会如何行动——有的自杀，有的顿悟——都与我无关。我必须这样做，而且我正在这样做。这是我对共同事业的致敬。我就像一

个管道。某种东西通过我，于是我把它传递出去。”

但你确实能感受到文明的变迁。

“某种存在之流流经我身，但我代表着什么——无人知晓。这不该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这只是无谓的好奇。例如，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或其思想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作品，但我绝不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打电话或拜访他。”

— 你对帕斯卡数作为真正的无穷大概念感兴趣吗？

——不，绝对不是。他在这里，然后死了——既不悲伤，也不滑稽。顺便说一句，我们有很多歌都是关于他的。“Pryg-skok”等等。人们总是误解我们：如果他们赞扬我们，那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如果他们批评我们，那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我们所做的事情而言。我曾经说过博伊斯抱着一只死兔子——这都是同样的道理。现在我们做这些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且由于世界上像我们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这甚至不再是地下活动，而是一种宗派主义，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们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不为人知。很快，就不会再有像我们这样的人了，这一切都会被遗忘——到那时，一切都将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 但你不得不注意到，由于你的所作所为，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改变。

“我只能从我自己的角度看待这件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不是我的工作，如果这是我的工作，我生来就会是这样了。但既然事实并非如此，我就必须做好我的工作。”

也就是说，你并不在意它。

“并非我不关注，而是我怎么知道什么影响了谁，又是如何影响的呢？就像布拉德伯里说的：你踩死一只蝴蝶，几百万年后，一切都变了。你往池塘里扔一颗石子，它会泛起涟漪。会发生什么？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你看到的只是涟漪。所以，是好是坏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促使我这么做的力量的问题。”

— 但随后你生活在一个你已经改变的现实中，并为此做些什么。

如果我觉得不应该做，我就不会做。

所以你不在乎在哪里做——是在现实中本来的样子，还是在你已经改变过的理想现实中？

“要让这件事发生，鹅卵石必须扔到某个地方，湖泊也必须具体，而且我必须知道自己要扔到哪儿，所以我当然会留意所有发生的事情——至少我会尽力。但我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因为这其中的道理远比语言宽泛得多。鸟儿生来就该飞翔，鱼儿生来就该游泳。我喜欢我做的事。它注定要被做，而我做了。我对所有这些自慰行为都变得非常哲学化了。”

——你是说你对你采取的行动之后的空间现状感到满意吗？

“我不知道它是如何改变的。它的变化并非源于我的行为，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爆炸、战争、世界局势。”

但是，它离你越近，就越会因为你而改变。

“不。我一直都置身事外——现在我也尽量如此。我躲在自己的洞穴里——我有很多地方可以藏

身，观察这一切。直到最后，我都会一直这样。”

总之，离你越近，变化就越大。

——不，那才是最有趣的地方。在远处，它发生了变化。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叶戈尔·列托夫在顿涅茨克的访谈（Tochka电台，2002年5月13日）

[录音并非从头开始]

还有其他的吗？

（打断，显然是在继续之前的回答）从美的角度来看，是的。

具体从美的角度来看呢？

是的。

仅仅是吗？仅仅是从在场观众的角度来看吗？

很难说。在我看来，我们的观众群体在世界各地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在纽约、以色列、俄罗斯还是基辅。

你对“顿涅茨克”这个词有什么直接的联想吗？

是的，你们拥有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

那是？

“顿涅茨克矿工”。

足球队？

是的。

与音乐有任何关联吗？

很遗憾，不行。

我希望万事皆有其时，终有一天都会实现。比如，为了庆祝乐队成立二十周年，举办一场乌克兰巡演.....

嗯，我还没到二十岁。我大概十八岁左右吧。

所以，这不是一个整数日期？

不，不。不，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旅行，没有特别的主题，就是一次普通的旅行。

俄罗斯是否以任何方式参与了此次巡回赛？

嗯.....我们在坦波夫演出过。嗯，很快还有一系列音乐会要开。在那之前也演出过——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基本上，我想我们已经连续演出五年了。

所以，乌克兰之旅是前苏联之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吗？

那前任呢？他算是虚拟的——我想他仍然存在吧。

我明白了。你问的是关于音响效果的问题。据媒体报道，你偏爱的那种粗糙、嘈杂的音响效果，至少在1995-1996年之前是这样——我不知道，也许现在也是——现在依然存在，尤其是在今天的演唱会上。坦白说，你现在还对专业的音响工程和商业制作感到反感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所说的“制作”到底是什么意思？

哎呀.....这个问题很复杂，涉及很多方面。最好你把每个方面分开问——我会逐一回答。

好的。您对专业音响工程有什么看法？

“专业”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高质量的录音，歌曲的排练版本也要精良.....

“好”到底是什么意思？好的录音质量又是什么意思？比如，我觉得Zemfira的录音质量很差，简直糟糕透了。Oasis也是一样。

好吧，这么说吧：这就是大多数音乐专业人士认为的专业品质。

哦.....大多数专业人士眼中的专业音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无关紧要，也丝毫不影响我，以至于我根本不想评论。因为大多数人关心的，与我们无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创作无关。它只是一种商品，某种关系，仅此而已。它不是艺术，也不是音乐。它，说到底，就是流行音乐。

你仍然更注重音乐的内容而非形式吗？

所以对我来说，严格来说，内容始终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挺过来了。还有一个问题：在你看来，西伯利亚朋克现象是什么？你认为它与该地区的具体情况有什么联系吗？嗯，严寒的气候固然重要，但同时，西伯利亚人传奇般的性格也功不可没。

首先，其实西伯利亚并不算很冷，因为夏天通常不会低于30摄氏度。冬天的话，大概在零下10摄氏度左右，最多也就零下15摄氏度。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比如新年那天，气温只有零上1摄氏度。所以说西伯利亚很冷，纯属无稽之谈。其次，另一个无稽之谈是存在某种西伯利亚朋克现象。根本不存在所谓的西伯利亚朋克。也就是说，以前有过“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还有一些零散的乐队。我曾经制作过一些音乐人的作品，他们聚集在一个叫GrOb-Records的厂牌周围。仅此而已。他们各自发展，各自走自己的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好的，那么传说中的西伯利亚人物的具体特征真的存在吗？

哦，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个很笼统的问题。我觉得所有值得讨论的都在于具体细节。因为任何涉及概括的事物都非常复杂，而且只能在某种高于我们人类的存在层面上才能理解。或许是原型吧。

但人们认为，卑鄙和恶毒之类的性格特征根本不是西伯利亚人的特征。

不，到处都有肮脏的人。

嗯哼。好的，我们把这一点考虑进去。你觉得过去二十年里最好和最差的专辑是什么？好吧，其实十八年也行。

很难说哪张专辑最差，因为每张专辑都有它独特的优点。我无法指出哪张最差，因为我喜欢自己做的所有东西，毕竟我做这些主要是为了自己，我很难从自身之外的角度去评判任何事物。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说我倾注了全部心血，那么这张专辑可能是我最后一张了。从《Prig-skok》到最新的《Zvezdad》（Starfall）——这些都是我最棒的专辑。从美学角度来看，《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或许是最出色的。

顺便问一下，你们的一些专辑叫什么名字，比如《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吧？

是的，我平时就喜欢引用别人的话。“永恒散发着油腻的气味”就是一句出自伯特兰·罗素的短篇小说。

让我们来听首歌吧，时机已到。

请。

这首歌名为《我会在遥远的车站下车》，出自叶戈尔·列托夫的专辑《星陨》。播放期间，欢迎致电录音室；通讯设备正在使用中。

我会在下一站下车。

我们继续今天的对话。现在有一位名叫.....珍妮娅的新听众连线，对吧？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好吗？

没关系，一切都好。

你觉得我们顿涅茨克这座城市怎么样？

非常漂亮。光线很好。

这是一个问题：你们最初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当时你们不害怕演奏这种类型的音乐吗？

那你当时有多害怕？当然，那是个挑战。之后，我们和当局有很多麻烦。事实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好几年。我们甚至一度不得不逃亡。嗯，如果你肩负着使命，就不能说自己不够坚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后来发展得怎么样？

嗯，这很难说。我是说，我最初在莫斯科，给库廖欣乐队弹贝斯。我和我哥哥谢尔盖有个前卫的乐队叫“难懂音乐乐团”，我负责低音提琴和鼓。后来，在莫斯科待下去又遇到了些困难，所以我

不得不回到鄂木斯克。我组建了我的第一支乐队“波塞夫”（Posev）——在当时这名字可真是够挑衅的。我们组建了一支典型的车库乐队，基本上就是演奏一些“反主流”的音乐，唱一些老掉牙的歌。大约在1984年，我遇到了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他来自一个叫“伊万·莫格与死者”（Ivan Morg and the Dead）的乐队。他们可能是俄罗斯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因为他们从1978年就开始玩朋克了。所以，不知怎么的，我们走到了一起，决定组建一支新乐队，一支非常特别的朋克乐队，有点像硬核朋克。1984年，我们开始一起玩音乐，基本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包揽了所有乐器的演奏，包括鼓、贝斯、吉他等等。1986年，我们开始遭受范围很广、强度很大的迫害，尤其是在1987年。库兹马被征召入伍，我不得不迅速学会演奏所有乐器。我们早期的所有专辑——《恋尸癖》（Necrophilia）、《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捕鼠器》（Mousetrap）等等——都是我自己创作并演奏的。特别是《普里格斯科克》（Pryg-skok）这张专辑，更是所有乐器都是我一个人演奏的。

是的，这很明显，很明显——当你查看你的磁带播放机时，上面写着你演奏……几乎所有的乐器都摆在你面前。

是的，很遗憾，我们基本上一直都是这样，直到1992年左右，因为我们有两种乐队。一种是现场乐队——成员包括“Survival Instructions”乐队的Jeff Zhevtun、Arkady Klimkin和Kuzma。另一种是录音室乐队，主要只有我和Kuzma。Kuzma主要弹吉他，偶尔也弹贝斯，其他乐器都由我来演奏。但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合适的阵容，五个人都能演奏。

“民防”和“共产主义”这两个团体之间有什么区别？

“共产主义”最初是我们三人合作的项目，所以我甚至算不上真正的主导者。我们决定组建一支与莫斯科传奇乐队“DK”截然相反的乐队。这完全是一个概念性的项目。成员包括我、经理和库兹马。经理在第四张专辑之后离开了——他决定单干，组建自己的乐队等等。但我和库兹马继续合作了下去。

珍妮娅，你都带齐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

非常感谢你的来电，再见。伊戈尔，你是不是说过“我相信一切，因为我觉得不相信任何事毫无意义”？这话真说过吗？

嗯，基本上是这样，我曾经说过。

15年前，你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句话，当时你指的是相信外星人，对吧？

倒不是说我完全相信，但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即使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现实远比任何人能够想象或理解的都要广阔得多。

那么，你现在是否相信一些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似乎不可能的事情？比如基督再临，或者……

我不会说我相信，但我也并不否认。一切皆有可能。我们的现实每天都在向我们展示着那些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我相信一场革命正在进行，一场彻底的全球性革命。一场质的、人类自身的革命。人类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境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对了，关于新品质——从各方面来看，你也相信轮回吗？

嗯，我也承认这一点。也许就是这样。

但如果.....

这么说吧：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广泛的选择，各种各样的道路、信仰，以及——不管它到底不是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每个人，由于某些环境和个人特质，要么是应得的，要么是自觉选择的。

如果轮回转世真的存在，那么你希望来世转世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哦，当然不是人。很可能是棵树或其他动物。因为我最近和人类社会格格不入，感觉太压抑了，唯一让我感到自在的地方就是树林里。如果可以的话，我真想和人类彻底断绝关系。

好，想象一下这样一种情况：在你死前的某个时刻——每个人都会死，将来也一定会死，谁也无法阻止——在你临死前，一个身穿白袍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或者反过来——比如说，一个长着角的魔鬼——对你说：“叶戈尔，在你死之前，想想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那是什么呢？

嗯，首先，我觉得那不会发生，因为.....我经历过很多次类似的情况，也就是说，我死过很多次，但没有人出现，什么事都没发生。但即便真的发生了，比如说，我也不会去想今生任何重要的事情，而是会去想那些超越我、更宏大的事物。

为何如此？

而现实究竟是什么？因为现实比任何关于它的概念——尤其是人类的概念——都要宏大、有趣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最近没有接受任何人的采访.....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没有文章，也没有接受任何采访。因为.....现实如此，任何有用的信息都无法用言语表达。因为任何关于它的答案，任何关于它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有限的。如此一来，便成了致命的。

所以，你的第一份职业是艺术家。据我所知，是一位平面设计师。

嗯，这并非我的第一份职业。我大概做过二十份吧。我什么都做过——当过电话接线员，甚至还卖过肉。但我同时也是一名艺术家。我还当过一段时间的程序员。

哇！如果纯粹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你会为哪本书绘制插图呢？

哦.....说实话，这很难说。我喜欢的书太多了，根本没法选。尤其是作为一名艺术家，我可能更偏爱非具象绘画。表现主义对我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德国的表现主义。它不是插画式的，更像是一种自我表达。我不会自己画插图，因为在我看来，一本书不需要插图，除非作者自己创作了。

你有没有想过做些什么事情，比如拍电影或写小说？

是的，我之前一直想拍这部电影，但遇到了巨大的资金困难，实在是不切实际。我想把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拍成电影，而且要以一种完全严肃、写实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才没钱，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对吧？

是的，因为那需要非常大规模的拍摄。那将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费用。所以我们只能想想而已。

如果这件事能成真就好了——例如，如果这件事成真，有人愿意捐钱.....

但我现在不会开枪，不过如果以后我想开枪，我当然会开枪。

那你会自己创作电影配乐吗？

不，我不会写任何东西；那里不会有任何音乐。或者更确切地说，如果有的话，那也只会是书里播放的那种音乐。爵士乐，他们听的就是那种音乐，等等。

有一句名言：“人生就是在孤独和庸俗之间不断做出选择。”那么结果如何呢？2002年，周年纪念巡演。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你从这两点中得到了什么？

哦.....我什么也没得到，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依赖过任何东西。就是这样。我相信，原则上，全人类可以分为两类：自给自足、独自生活的人.....当然，这可以称之为孤独，但这不是被迫的孤独；这是我的自然状态。实际上，当我被剥夺了这种状态，被迫去做某事、与人交流、回应某些事情等等时，我会感到非常压抑。也就是说，我本质上是个人——有点像草原狼，字面意义上的，不是黑森意义上的那种，而是严格意义上像动物一样生活。正因如此，这二十年的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粉丝追捧，尤其是年轻的粉丝，他们不断地向我索取，比如打电话.....等等等等，这真的非常难熬。

他们想要什么？

不清楚的是.....我理解的是，大多数人想要，该怎么说呢.....嗯，我其实称他们为寄生虫。他们想要靠别人的思想、别人的意识形态、别人的观念等等来维持生计。总之，他们想要的是别人的价值观。

有没有女生请你在你的左胸上签名？这种情况发生过吗？

不，嗯，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发生过。我觉得，基本上，我整个成年生活只做了一件事：教人们如何独立生活。就像维索茨基在《异形轨道》里唱的那样：“嘿，后面那边的，学我！意思是，别跟着我！”当他们开始模仿我，复制我的风格、我的声音.....一大堆乐队都在演奏，试图模仿我们，或者故意演奏一些不雅的曲子。这简直是胡闹。因为我最大的愿望始终是创建一群富有创造力的团体、团队——任何人，艺术家——让他们做自己的事情，与众不同。因为我们团队成立之初的主要宗旨就是打造一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团队，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团队，因为它独一无二。

是的。对了，我有个关于音乐剧的问题.....或许不是模仿者，但应该算是后继者吧。听说“Bi-2”乐队是个传奇.....你听说过这个乐队吧？

是的，我听说了。

所以，据说“Bi-2”乐队曾申请参加您在鄂木斯克组织的某个音乐节，但被您拒绝了，这是真的吗？

不，那完全是胡说八道。我知道他们寄了一份非常搞笑的申请，申请的是我朋友科列索夫在切列波韦茨组织的一个原声摇滚音乐节。那是第一个，而且我想也是唯一一个.....我不知道，也许不是唯一一个，但无论如何，它绝对是俄罗斯第一个原声摇滚音乐节，我记得是1990年。他们寄来的是一个demo，一个非常搞笑的匪帮风格的东西，可惜没能成功。因为我有个想法——我正在收集各种本土乐队的demo，等我老了，我想出版一套丛书，就像西方现在做的“60年代车库朋克精选

集”那样——我会出版一套叫做“俄罗斯摇滚巨匠”之类的丛书。我会立刻把他们的demo收录进去。

在一次采访中——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你暗示了德米特里·列维亚金在卡利诺夫桥小组的职业生涯可能就此结束。

哦，不。其实，我一直都在聊天。因为我.....该怎么说呢.....我觉得，只有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十年，一起埋葬过很多人，等等等等，你才能和他们进行真正深入的交流。只有经历过前线、战争，经历过生死攸关的时刻，你才能真正理解他们。其他的一切，严格来说，都只是编造神话，是闲聊而已。所以，我当然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脱口而出些什么。还有，你说的雷维亚金是什么意思？

嗯，我的意思是，他现在活得好好的，甚至还在电台播放他的歌曲。

不，求求你，感谢上帝，他是个好人。

顺便提一下，还有另一个传说，据说你曾专门走遍全国，寻找扬卡曾经喜欢的一幅不知名画家的画作，以便在迪亚吉列娃去世后得到它。

不，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实话，我感到很震惊。

时间紧迫，就是这样。让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听到？

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哦...

这是一次周年纪念巡演，也是对过去一些成果的总结，但未来呢？

嗯，我们已经持续演出五年了。现在，看来我们即将推出过去几年活动的巅峰之作。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现场演出和以前完全不同。可惜的是，这次我们阵容不全——我的兄弟谢尔盖·列托夫缺席了。所以，我们的演唱会主要融合了朋克、前卫和自由爵士。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演唱会的意义所在.....我们演奏同样的曲目，比如说二十遍，但每次都不一样，这就是关键。接下来会有两场现场演出。我计划夏天发行一张新专辑。一本书也要出版。之后，我们将前往德国、法国和挪威——显然，是一系列的演唱会。基本上，我真的很想暂时告别现场演出，这样我才能真正专注于创作——我甚至可以录六七张专辑，但过去几年，时间总是捉襟见肘，简直糟透了。当你坐在行李箱旁，知道一个月后就要出发时，根本没法写任何东西。你需要至少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安心地知道不会有人打扰你。

你是否有梦想？

梦想？是的，我有一个梦想。

来自蓝色和无法实现的系列。

我的梦想是去某个地方，一个远离文明的地方。像个农民一样生活。也许是新西兰的某个地方。

嗯，为了实现梦想。

谢谢。

非常感谢叶戈尔，也非常感谢所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很遗憾我们不能多聊一会儿，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会和叶戈尔·列托夫聊上三四个小时。我们现在正在听一首歌，同样来自名为《星落》（Starfall）的专辑——一首名为《太阳终将升起》（The Sun Will Rise）的歌。这首歌也是一首关于往昔岁月的经典之作。好了，就此告别吧。

再见。

太阳终将升起

评论

我们转录完录音后，在一个论坛上找到了采访的文字稿，但内容经过大幅删减和编辑。文字稿显示，最初的讨论是关于基辅的。根据引言判断，这篇采访发表在一家当地纸媒上，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刊物。如果您有任何相关信息，请发送邮件至grobhron@gmail.com，我们将不胜感激。

文章全文如下。

Yegor Letov — 采访 Nata Potemkina（Radio Tochka，顿涅茨克，2002 年 5 月 13 日）

来自鄂木斯克的另类乐队“卫士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是一个几乎无法用任何框架来定义的现象，无论从音乐还是社会政治层面来看皆是如此。他们目前正在乌克兰进行周年纪念巡演。乐队已经成立20年，期间发行了数量惊人的专辑（专家们也无法确定确切数字），并在前苏联各地组织了无数次引发争议的抗议活动，而参与这些活动的往往是执法人员而非乐队成员。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活跃在乐坛，而且从他们的演唱会来看，他们仍然备受喜爱。乐队主唱叶戈尔·

列托夫（Yegor Letov，也被称为“西伯利亚朋克之王”）同样是一个独特的人物。在乐队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他拒绝任何形式的宣传，同时又保持着自己作为活着的传奇的地位。他真可谓是一位独立音乐人。

NP 据我所知，你最喜欢的城市是基辅。**EL**

是的，就风景而言。**NP**那就观众而言呢？

EL 观众在哪儿都一样，纽约、以色列、俄罗斯、基辅。**NP**

你和顿涅茨克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吗？

EL 你有一支很棒的球队，顿涅茨克矿工队。**NP** 俄罗斯以任何方式参与了这次巡演吗？**EL**是的。我们在坦波夫演出过，

接下来会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NP**所以，乌克兰巡演是前苏联巡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EL**我想说，在虚拟的苏联，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未消失。**NP**你一直以来偏爱的那种粗犷风格还在吗？你仍然对专业的录音工程感到厌恶吗？**EL**什么是专业的录音工程？我不知道。高质量的录音？比如，我不认为Zemfira的任何一张专辑质量好；我觉得它们很糟糕。**NP**这么说吧。大多数音乐专业人士认为的好品质。**EL**：专业人士的看法我一点也不在意，也从来都不在意。总的来说，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也与现场创作本身无关。录音棚、录音和宣传都是商品与金钱关系的一部分。这不是艺术，也不是音乐——它本质上是流行音乐。**NP**：你现在仍然把音乐的内

容看得比形式更重要吗？**EL**：我脑子里一直只有内容。**NP**：在你看来，西伯利亚朋克现象是什么？你认为它与该地区的特殊环境——严寒的气候——有关吗？**EL**：这算不上什么现象；基本上只有一些零星的乐队，比如Civil Defense，还有一些音乐人聚集在GrOb唱片公司周围，仅此而已。根本不存在什么现象；这都是神话。实际上，我们的气候并不算特别冷，因为夏天气温从来不会低于30华氏度（约零下1摄氏度）。比如，新年那天，气温甚至还高于1华氏度（约零上1摄氏度）。无论如何，所有这些关于西伯利亚朋克和现象的概念都只是概括。而所有关于概括的东西，都不是在人层面运作的，而是在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某些存在层面运作的。**NP**那么关于传说中的西伯利亚人性格呢？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卑鄙和恶毒之类的特质根本不是西伯利亚人与生俱来的？**EL**不，哪里都有恶毒的人。**NP**过去 20年里最好和最差的专辑。**EL**

我热爱我所做的一切，因为我做这些主要是为了我自己。我无法从任何角度去评判它们，只能从内心去感受。我倾注了全部心血，从《Jumps of a Dash》到我的最新专辑《Starfall》。从美学角度来说，《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是最好的。**NP**：顺便问一下，你有一张专辑叫《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也收录其中。**EL**

：是的，我喜欢引用。有些歌里引用了很多伯特兰·罗素等人的名言。**NP**

：你有没有害怕过自己所做的事情？

EL：如果你承担了一项任务，就不要说你不够坚强。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有时你不得不逃亡。**NP**

：当你查看你的磁带录音机时，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乐器的所有声部都是你演奏的。

当我们的贝斯手库兹亚被征召入伍时，我不得不紧急学习演奏所有

乐器。虽然这并非第一次。在民防组织成立之前，我住在莫斯科，和库廖欣一起演奏贝斯，我们还组建了一个三重奏乐队——“不安音乐乐团”（Orchestra of Uneasy

Music）——这是我和哥哥谢尔盖（谢尔盖·列托夫，一位世界知名的萨克斯管演奏家——注）的先锋音乐项目。我在那里演奏低音提琴和鼓。后来，莫斯科的生活变得艰难，我不得不回到鄂木斯克，在那里组建了我的第一支乐队“波塞夫”（Posev），演奏

反叛主义（ANTITO）音乐，这在当时是唯一一种可以演奏和演唱的音乐。之后我遇到了库兹马，他有一个乐队叫“伊万·莫格和死人”（Ivan Morg and the Dead Men）

——他们是俄罗斯最早的朋克乐队，从1978年就开始演奏朋克。从1984年开始，我们就一直一起演奏所有乐器。直到1992年，我们一直沿用这种做法，当时我们有两个阵

容：一个现场演出阵容和一个录音室阵容。“Survival Instructions”乐队的成员会和我们一起在演唱会上演出，但现在，谢天谢地，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阵容，五个人一起演奏。NP

：显然，是你说过“我相信一切”，因为我觉得不相信什么也没什么意义。EL

：是的，我说过。NP

：你当时真的相信外星人。你现在还相信一些非普通人会相信的事情吗？比如基督再临？

EL：与其说我相信，不如说我认为一切皆有可能，即使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实远比一个人能够想象或理解的要广阔得多。我不会说我相信，但我也不否认。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在当今的现实中，一些看似根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我相信，一场人类的质变正在世界范围内发生。人类正从根本上迈向一个全新的维度。这一切最终将如何收场，只有上帝知道

。说到轮回，你相信吗？

EL：我并不否认。每个人都有很多道路和信仰可以选择——无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一个人要么天生适合某条道路，要么会根据自身的特质有意识地选择它。NP

：你希望来世投胎成什么？

EL：当然不是人。要么是树，要么是动物。最近我对人类越来越反感；人类太沉闷无聊了。我唯一感到自在的地方是森林。如果可以，我希望永远不再与人类有任何瓜葛。NP

：在临终之际，一个身穿白袍的人，或者一个长着角的恶魔——都无所谓——出现在你面前，说：“想想最重要的事。”想想什么？

EL：首先，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我死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出现过，总的来说，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去想什么重要的事情，而是会开始思考一些超越我自身的东西.....

比如：

现实，它究竟是什么。现实比任何关于它的想法都更伟大、更有趣，尤其是人类的想法。我最近甚至没有写过任何文章，也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因为：我还能说什么有价值的话呢？现实本身就如此，以至于任何有价值的话都无法说出口。任何对它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是有限的，因此也是致命的。你的第一份职业是艺术家吗？

是
的

，我做过大约20种职业。我什么都做过，电话接线员、程序员，甚至还卖过一次肉。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你会自愿为哪本书配图？

没有。首先，我喜欢的书太多了；其次，我认为一本书根本不需要插图，除非是作者自己想画的插图。此外，作为一名艺术家，我更倾向于非具象绘画；表现主义，尤其是德国的表现主义，是我最喜欢的。它不是写实的，更像是自我表达。NP

：你想拍电影或者写小说吗？

EL：我想，但是遇到了巨大的资金困难，变得不切实际了。我想认真、写实地把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拍成电影。NP

：问题仅仅是因为没钱吗？

EL：是的，如果我要拍，我会拍成一部规模非常大的电影，需要巨额的物力投入。所以只能想想而已。NP

：如果现在有人给我钱呢？

EL：我现在不会拍；但如果是在构思的时候，我会拍。NP

：你会写电影配乐吗？

EL 不，我不会写任何音乐。根本不会有任何音乐。即便有，也只是书里他们听的那种爵士乐。**NP**

人生就是在孤独和庸俗之间不断抉择.....

经过20年的创作，你最终得出了哪一点？

EL我什么也没得出，因为我从未依赖过任何东西。我相信人类可以分为两类：自给自足、独立生活的人。这当然可以称之为孤独，但这不是被迫的孤独，而是我的自然状态。一旦失去这种状态，被迫去做某事、回应某事等等，我就会感到无比压抑。从本质上讲，我有点像荒原狼，这里指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荒原狼，而不是黑森主义意义上的荒原狼。我像野兽一样生活。二十年的音乐生涯给我带来的只有巨大的压力，因为我总是被一些粉丝骚扰，家里还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真的很难熬。**NP**

：他们到底想要什么？

EL：我不明白。我觉得他们是寄生虫。他们想靠别人的创造力、别人的想法、别人的价值观活着。**NP**

：有没有女孩让你在她左胸上签名？

EL：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觉得我成年后只做了一件事：向人们展示你需要独立生活。当他们开始模仿我，模仿我的声音、我的风格——顺便说一句，有很多乐队就是这么玩的，他们故意玩得很脏——这一切都太荒谬了，因为我一直都希望看到一些有创造力的人，但他们要与众不同。我们当初组建GO战队的时候，就立志要打造一支举世无双的队伍，因此，它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它的确独一无二。**NP**

：听说BI乐队两年前申请参加你在鄂木斯克举办的音乐节，结果被你拒绝了，这是真的吗？

EL：不，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没来我的音乐节，但我知道我的朋友叶夫根尼·科列索夫在1990年组织过一个类似的民谣摇滚音乐节。他们居然把Bi2的demo寄过来，真是一群小团体，太可笑了；可惜的是，那张demo已经找不到了。我有个想法，想把这些执着的乐队聚集起来，等我老了，就做个类似“60年代车库朋克合辑”的系列，我打算叫它“俄罗斯摇滚巨匠”系列。我会立刻把他们收录进去。

NP 大约十五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你曾暗示卡利诺夫·莫斯特乐队的德米特里·列维亚金的职业生涯甚至生命可能即将结束。但如今他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身体健康，甚至在电台也颇有名气

。我刚才一直在胡言乱语。一般来说，你只能对那些曾并肩作战、一起埋葬过共同朋友，或者认识了十年的人表达正常的想法。否则，一切都只是闲聊和编造神话。当然，我本来也可以脱口而出些什么。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身体健康，我真的很高兴；他是个好人。**NP** 有个传说，说你曾横跨全国去寻找扬卡生前喜欢的一幅不知名画家的画作，目的是在迪亚吉列娃去世后得到它。**EL** 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说实话，我很惊讶。**NP** 你

接下来有

什么计划？**EL** 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和五年前完全不同的事情。很遗憾，我们这次没能带着完整的乐队一起来，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正在创作全新的音乐。我

的兄弟

也参与其中，他是一位萨克斯管演奏家；它融合了朋克、前卫和自由爵士。我们把同一首歌演奏20遍，每次都不一样。我们计划今年夏天创作一张新专辑，很快就要去德国、法国和挪威，我的书也快出版了。基本上，我想退出巡演，去做一些类似的事情——也许能出六七张专辑，但我一直没时间。坐在行李箱上写作，知道三个月后又要

出发，这根本不可能；你至少需要六个月不受干扰的时间。NP：

这 只是个白日梦。EL

： 找到一个远离尘嚣的地方，像个农民一样在那里生活。

Chronicles | 活动。莫斯科娱乐资讯。第 7 期 (102 期)

——问答。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

答案：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

叶戈尔·列托夫是西伯利亚朋克音乐的创始人，也是“民防”乐队的主唱，堪称西伯利亚朋克音乐的先驱。上世纪80年代末，GO乐队的唱片改变了成千上万人对音乐的理解。去年发行的专辑《星落》(Starfall)收录了苏联60、70年代的歌曲，再次证明GO乐队依然是俄罗斯最具活力的摇滚乐队。4月26日，GO乐队将在戈尔布什卡举办演唱会，而就在一个月前，列托夫的500页诗集在莫斯科出版。

“民防”乐队将首次在莫斯科主要的摇滚乐演出场地演出。您在这场演唱会有什么期待？

“戈尔布什卡只是个普通的场地，我不明白大家都在大惊小怪什么。它只不过是个以前没办过演出的场地而已。我只希望音响效果好。”

— 你对莫斯科的整体感觉如何？

“要评价莫斯科真的很难.....OSP-Studio 的节目里，有个叫‘Namedni. The Future’之类的环节，里面展示了一张 2015 年的俄罗斯地图，地图上俄罗斯只是一个红色的小点，莫斯科就在那里，周围是广袤的车臣和其他鞑靼斯坦共和国。”

— 你最近一直在巡演，累吗？

— 不断地进行演唱会演出是我们存在的体现，是我们吃饭、呼吸、睡觉、阅读 VV 留言簿的方式，是我们存在的形态，是我们 15 年来一直过的生活方式，这既艰难又令人愉快。

——请问这是谁的留言簿？“沃普利·维多普里亚索夫的”吗？

— VV 是莫斯科斯巴达克球迷的非官方网站；没有它，我们的早晨就无法开始。

——那么音乐方面呢？在其他俄罗斯摇滚乐的语境中，“GO”又代表什么？

我不会评论其他艺术家——职业道德不允许我这样做。此外，我对俄罗斯所谓的摇滚乐手的作品毫无兴趣，在我看来，他们从未存在过，也永远不会存在。我们乐队的成立并非为了替代任何事物，而是为了创作出令人愉悦的演奏和聆听体验。因此，评判我们作品的正确性、品味和整体价值的唯一标准是我们自己。不是乐评人，不是其他音乐家，尤其不是听众。

那么，为什么要将音乐公开展示呢？

“我相信这是对那些和我一样，作为独立生命体，行动、呼吸、创造，并将宇宙中最美好的事物投射到宇宙空间的人们的感激之情的体现。我们收集、聆听、阅读和消费各种各样的意识——或无意识——罕见的、非凡的、由人类创造的、超越任何框架的事物，一种行星上的局外人艺术，涵盖其所有表现形式——音乐的、文本的、哲学的、宗教的.....”

- 你是什么意思?

“无需指名道姓；就让人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吧。至于桀骜不驯，也无需刻意营造。世界本就如此，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战争，一场超越界限的战争，才是它的自然状态，也是真正艺术家——也就是局外人——的真实状态。”

——你们的战争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是的，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在这个世界已经失败了，但艺术家却依然不屈不挠。事实上，任何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正如基拉·穆拉托娃所说，生命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可怕的东西。总的来说，考虑到我们最新文明的历史，更不用说进化本身，人们会对人类及其前景抱有一种略带讽刺意味的看法。”

— 听说您正在录制新专辑，这是真的吗?

——现在我可以确定至少会有两张专辑。虽然严格来说，这是一张专辑的两部分，或者说两种不同的面貌，其中一部分是各种各样的梦境，另一部分则是战争的呈现。两者都包含战争的各种表现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都是战争期间发生的梦境。这些专辑本质上是概念性的；它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歌曲的合集。问题在于，歌曲越来越多，而由于持续不断的巡演，我们没有时间录制它们。要好好录制一张专辑，你需要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如果你一直坐在行李箱旁，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Starfall》的发行时间如此漫长——我必须分段创作，每段之间间隔很长一段时间。

——1990年，您曾说过音乐精神已死，是时候彻底退出乐坛了。现在您又有什么动力继续下去呢?

“如果一个人还活着，他永远都活着；但如果他死了，你就无法让他复活。再说，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呢！现在没人做任何有价值的事，也没人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已经休息过两三年了，结果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但它依然存在。一旦你沉默下来，沉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挥之不去。所以你只能躺下，抽根烟，然后‘让自己再次笑出来’。”

问题：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

Chronicles | Bravo — 叶戈尔·列托夫和他妹妹的才华

叶戈尔·列托夫和他妹妹的才华

“这只是他们与记者沟通的方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们不想与记者沟通的方式。尤其考虑到《Oborona》专辑目前正在录音棚录制，所以我们无法期待更深入的讨论，”GO乐队的演唱会总监谢尔盖在评论叶戈尔·列托夫对BRAVO杂志提问的回答时说道。这些回答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的。不久之后，这位沉默寡言的朋克教父将与大家见面。民防乐队将于4月26日在莫斯科戈尔布诺夫社区中心演出。

BRAVO: 请讲述一段你童年时期发生的事——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故事。

莱托夫: 童年是一个非常私密的话题。总的来说，我的童年是美好而快乐的。

BRAVO: 你喜欢足球吗？

莱托夫: 是的，我喜欢它。

BRAVO: 你支持哪支球队？

莱托夫: 为俄罗斯国家队效力。

BRAVO: 您还喜欢其他运动吗？您对运动的整体态度如何？您现在从事任何运动吗？或者您曾经从事过任何运动吗？

莱托夫: 我对体育的态度很正常。我从未从事过任何职业体育运动。

BRAVO: 你看电视吗？

莱托夫: 是的，经常。

BRAVO: 你最喜欢哪些节目？

莱托夫: 足球转播。

BRAVO: 你最近在听什么音乐？

莱托夫: 种类繁多，从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音乐，到现代音乐，比如《迪斯科风暴》。音乐种类繁多。

BRAVO: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性？

莱托夫: 与众不同。通常很聪明。

BRAVO: 你对性有什么看法？

莱托夫: 肯定地。

BRAVO: 您如何看待电影和文学作品中的色情内容?

莱托夫: 你问错问题了, 这是执法部门的问题。

布拉沃: 有些人认为莱托夫是个邪恶的恶魔, 有些青少年听了你的演讲后情绪低落, 甚至割伤了自己的手。对此你有什么评论?

莱托夫: 没必要割伤你的手。最好还是来参加GO演唱会吧。

BRAVO: 幻觉有害吗?

莱托夫: 幻觉是生活的一部分, 很正常。

BRAVO: 你如何看待围绕你名字的种种传言? 很多人甚至不把你当人看, 把你当成某种怪物。你希望有人来澄清这些传言吗?

莱托夫: 神话的产生, 意味着有人需要它们。我不想揭穿任何神话。

BRAVO: 有篇文章说, “三大最强摇滚诗人: BG、马卡列维奇和叶戈尔·列托夫”。你认为自己是诗人吗? 如果是, 诗人的使命是什么? 如果不是, 为什么?

列托夫: 是的, 我也这么认为。剩下的就看贝尔格莱德·高尔基和马卡列维奇的决定了。

BRAVO: 你可以被视为年轻人的年长偶像。
对此你有什么感想?

莱托夫: 我觉得自己像38岁一样。

BRAVO: 你是否后悔你的人生最终变成了现在这样?

列托夫: 不, 我不后悔。而且我的生命将会很长。

艾丽莎·库玛娜耶娃、
格列布·米哈伊洛夫

事实

- 叶戈尔·列托夫 (根据他的护照, 姓名为伊戈尔·费多罗维奇) 出生于 1964 年 9 月 10 日。
- 1985 年, 克格勃突袭了 GrOB, 列托夫被送进精神病院 3 个月, 然后又“逃亡”了 6 个月。
- 他确实经常看电视, 有时甚至同时看两台电视。
- 叶戈尔将两张专辑分别命名为他最喜欢的小说: 《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 和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米兰·昆德拉)。
- 1990 年的一天, 列托夫在乌拉尔山脉进行了一次莫名其妙的徒步旅行后, 患上了“脑炎热”。一个月来, 他一直高烧超过 40 度, 神志不清, 濒临死亡——结果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跳跃”。

闪电 #7 (286) — “我们将永远反对.....”

“我们将永远反对.....”

莱托夫兄弟论音乐和文化现代性

叶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列托夫不仅是一个音乐上的“家族”，更是俄罗斯另类音乐文化的一股强大力量。如今，人们普遍认为，除了叶戈尔·列托夫的“民防乐队”之外，我们的摇滚乐中已经不存在任何真正纯粹、不加修饰、不落俗套、不沾染商业“香水味”的东西了。叶戈尔的音乐启蒙老师是他的哥哥谢尔盖，如今他们以全新的阵容重聚，组建了“民防乐队”。

叶戈尔团队的信条始终如一：“民防”，没有任何其他附加词。抵御精神分裂。以下是叶戈尔和谢尔盖·列托夫在G.O.乐队最后几场莫斯科演唱会之一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的节选，这场演唱会由AKM组织：

记者：像你们这样水平的乐队经常在莫斯科演出，至少每两个月一次，比如卡利诺夫桥乐队。为什么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这么少来首都演出呢？

叶戈尔·列托夫：这并非我们一时兴起。只要有人邀请，我们会带着乐队全员或以不插电形式巡演：去列宁格勒、基辅、沃罗涅日、秋明、以色列、美国、德国。只是在莫斯科，出于某种看似政治的原因，他们害怕让我们进入演出场地，声称来看演唱会的人会砸碎窗户，破坏一切。但这只是借口。我们仍然被认为是90年代中期——“俄罗斯突破”时期——最激进、最不妥协的乐队。

记者：但是，为什么“G.O.”乐队，一个在80年代歌曲内容中有着明显异议和反极权主义背景的乐队，如今却被民主建制派视为激进左翼分子，视为新一代极端分子呢？

埃戈尔·列托夫：我也不明白这一点。大家都说我们是极左乐队，说我们演奏的音乐极度年轻、极度激进——总之就是极度极度极度。我们是谁？我们这些胡子拉碴、挺着啤酒肚的人？我们这些快40岁、秃顶的老家伙，难道是在引领激进的青年浪潮？这世界肯定出了问题。难道就没有新一代的摇滚乐手，像我们当年那样，对社会里那些他们明显不适应的旗帜和壁垒毫不在意吗？但我怀疑这或许只是摇滚乐的通病。事实证明，西方的电子音乐人也不年轻；最年轻的也36岁了，而他们才是真正做着各种刺激事情的人。

记者：但或许我们的音乐界将不再出现像G.O.这样的非主流人物，因为除了社会现状，还有什么能滋生抗议呢？而且据说国家正在“趋于稳定”。难道是时候舒舒服服地窝在高级餐厅的厨房里，坐在电视机前，一边嚼着酸奶，一边喝着奶茶了吗？

埃戈尔·列托夫：90年代末期涌现出不少很有潜力的乐队，我相信现在依然存在，只是缺乏腾飞的动力。其中最有趣的乐队，我主要指的是“门罗与肯尼迪之女”（Daughter of Monroe and Kennedy），在我看来，他们是90年代最棒的乐队。当时也有一些乐队，他们的音乐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都非常强烈，可以说是真正的红色金属，比如“RAF”、“28 Panfilovtsev”和“Echelon”。90年代初期，一些才华横溢的乐队尝试崭露头角，但有些很快就变得懒散，后劲不足，有些则像所有乐队一样解散了。但关键是，现在没有惊世骇俗的专辑了。所有新作品都按照娱乐圈的规则包装得恰到好处——平淡无奇，毫无新意。这根本不是摇滚，而是糟糕的后现代主义——不断重复和

采样。事实证明，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七八十年代开始的那一代人——之后的一切都变成了折衷主义、后现代主义，甚至是后后现代主义。这当然可以理解。但我认为，恕我直言，这简直是垃圾。它.....什么都不是。它不是鲜活的，它没有生命。它已经被消化了。换句话说，就是垃圾。

谢尔盖·列托夫：回想起来，我还能继续说下去。80年代，我跟很多乐队合作过：Alisa、Aquarium、DDT，还跟DK一起录过音。我还参与过很多其他有趣的项目，比如来自里加的Atonal Syndrome。但到了89年，我突然停止跟所有摇滚乐队合作——他们经不起“公开性”和“改革”的考验，变成了庸俗的流行乐。我决定退出流行乐：每个人的水平或许都不错，但我禁止自己跟那些受流行乐影响的乐队一起演出。在经济停滞的年代，我们不会被收买，所以如果现在出卖灵魂，那就太丢人了。90年代，我涉猎自由爵士，在艺术展览上进行独奏，偶尔也会帮一些比较体面的摇滚乐队录制唱片。但我之后再也没有登台演出过，只在2000年和DDT一起参加了一场晚上8点的音乐会。我们这代人对此都心知肚明；谢夫丘克在那场音乐会上对我说：“告诉叶戈尔，我只听他和巴什拉切夫的歌，其他的都是垃圾。”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大多都失去了创造力。他们乐于听别人的音乐，乐于在音乐会上吐口水，但他们自己却不想创作。对我这个自由爵士、激进前卫音乐的代表来说，这真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的年轻朋克都去哪儿了？”他们去了哪里？为什么他们不在了？我愿意给那些演奏我这种前卫、新潮、激进音乐的人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发展、录音、演出.....但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不过是些“流行乐手”，只想“做出酷炫的音乐”，挤过所有竞争对手，买一把芬达吉他，然后让自己的音乐录影带出现在MTV上。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全部。

叶戈尔·列托夫：不只是这样。即使是像亚历山大·涅波姆尼亚什奇这样“非流行”音乐人的最佳作品，也仍然是次要的、三流的、五流的，而且，我认为，简直是可耻的。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反主流文化已经不复存在；一切都在被同化。也许在这种情况下以我为例不太合适？但当我组建我的第一支乐队Posev时，我招募的成员对Kiss、Led Zeppelin、Deep Purple等等这些“明星”乐队没有任何自卑情结。我希望我们能在创作上走在最前沿。人们都觉得我疯了，但我仍然认为，所有这些Pink Floyd和King Crimson都只是支点，仅此而已。你需要从他们身上汲取精华，把其余的连同他们的光环一起扔进垃圾桶。我至今仍然坚持我的观点。我收藏了很多音乐，很多我都喜欢，仅此而已。至于我们现在做的——我认为我们是世界第一的乐队。我们在德国演出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我根本不在乎那些势利的德国人，因为我在那里像个国王一样演奏，他们也跟着我的节奏起舞。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真实的。当然，你可以去弄清楚这究竟是我们的方式还是他们的方式.....你可以尊重不同的文化，这根本不是沙文主义。而我们的真理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快乐，快乐至上。

由切·格瓦拉同志撰写。

MK 在圣彼得堡 #19 — 塑料世界并没有赢！

塑料世界并没有赢！

在圣彼得堡，我们参加了一场“卫国联盟”（Grazhdanskaya Oborona）的演唱会。现场气氛热烈，活力四射。后台门口，热情的歌迷们欢呼雀跃，甚至还有人送来鲜花。得知我们要去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的化妆间时，这群“感激的观众”围了上来，向我们抛出一连串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并非是问我们的。我们忍不住也问了列托夫。一个来自维堡的歌迷捐赠的棺材形状的皮质麦克风套被他拒绝了。“我为什么要用这种吓人的符号？我还想多活一段时间呢！”



——叶戈尔·列托夫的新专辑。感觉如何？

“一张大制作，很可能是双专辑。主打歌已经写好了，整张专辑一个月内就能完成。至于什么时候发行，那就不好说了。这不由我们决定，而是由我目前还不认识的发行商决定。不过这些歌在网上已经到处都能听到了。”

— 这张专辑会像《Starfall》那样收录重新录制的苏联歌曲吗？

——其中一首没能收录进《Starfall》专辑。其余的都是我的作品。还有一首是安德烈·马什宁的《自助》（Help Yourself）。

— 根据 Radio Rox 的最新调查，Civil Defense 被评为 100 年后人们仍会铭记的三大乐队之一。那么，100 年后人们会听哪首 GO 的歌呢？

谁知道呢！我现在真的很享受制作新专辑的过程。我觉得它会是我目前为止最好的一张。比《百年孤独》更好，更狂野，更明亮。

— 如果叶戈尔·列托夫有机会做任何事，他会做什么？

“我已经做了所有我需要做的事情。五年来，我们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录制任何作品，因为我们一

直在工作、开演唱会、巡演，努力生活、思考，并最终完善我们的想法.....时机成熟时，我们迅速聚在一起，开始行动。我们在莫斯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次真正的冲击。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也非常正确且成功。”

叶戈尔·列托夫认为自己是哪个音乐（文化）流派的代表？

“在我们国家，涌现出一群积极主动的人，他们听着非常奇特、独特的音乐。他们也创作着同样的音乐.....我人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如此。如果我有机会，我会创立自己的厂牌，让各种风格的奢华、非传统的音乐席卷全国：迷幻摇滚、另类音乐、民谣摇滚——简而言之，非常奇特的世界艺术。它有一种独特的内核和色彩。”

——叶戈尔·列托夫最新的音乐发现是什么？

——我经常这么做。现在我正从莫斯科带回一大堆CD。我非常开心，也很满足。其中一张唱片让我震撼不已——一张1976-77年加拿大儿童合唱团的录音。一个真正的儿童合唱团，六十个人演唱大卫·鲍伊和保罗·麦卡特尼的歌曲。真是太棒了！他们唱得奔放，有时甚至不太标准，但却倾尽全力。声音穿透人心。这是我近十年来听过的最震撼的唱片，如果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我的生命才有意义。而这些孩子，他们的生命也同样有意义。

— 叶戈尔·列托夫经常在人方面犯错吗？

——绝不可能。如果你是一只猫，你不会和猪、狗，甚至鹅交流。那是潜意识层面的交流，不需要任何分析。

— “GO”领导者的内部成熟过程是否仍在继续，还是已经停止了？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问题：我到底是成年人还是年轻人.....一方面，我年纪大了，另一方面，我又很年轻。我人生中曾有过一段不愿提及的经历，但那天，我成熟了很多。”

— GO 是一个内部能够自给自足的组织吗？

不。基本上，我们创作是为了自己，也为了和我们一样的人。特别是那些和我们观点相同、思维方式一致的小众群体。不过，这些都只是说说而已.....就意象而言，我们的歌曲更加连贯、更加优美。

塑料世界最终还是赢了吗？

不，我希望它永远不会赢。

棺材编年史 | 文章：为了我们的真理.....真理。 为了我们的信仰.....信仰。

来源：<http://www.gr-oborona.ru/pub/pub/1074862237.html>

日期：2003-xx-x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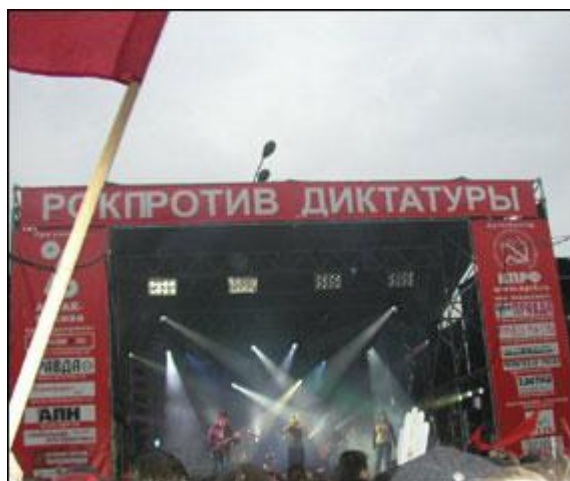
版：

文本：

照片：

参见：

为了我们的真理.....真理。为了我们的信仰.....信仰。



一切都没变。这倒让人松了口气。叶戈尔再次“被突如其来的怀疑所困扰”，一如既往，他自己的人民认为他是外人，而外人则厌倦了怀疑，他们确信列托夫遭遇了多少可怕的不幸。

两周以来，进步的俄语互联网用户从未停歇，他们徒劳地试图从这位人人爱戴/憎恨的叶尔费季奇/贾/已故列托夫身上挖掘出一些原创的东西。他曾连续三场音乐会让首都人心欢喜（如果你还没搞清楚：分别在戈尔布什卡、波多利斯克和卢比扬卡）。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那些“朋克”（这些所谓的“朋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整天泡在网上？）不断地兴奋不已，反复反思着这个引人入胜的过程，就像精神分析师们在记录他们那些滑稽的梦境一样，遵循着弗洛伊德爷爷的建议，比如：他在演唱会上看了我一眼，现在我知道了真相，叶戈尔就是上帝/他在我的护照上写了“祝你好运”，现在我永生了（这论证水平简直爆表）。而来自半法西斯主义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反对派领导人”们则沾沾自喜，妄想着重现他们毫无关联的“俄罗斯突破”这一历史性事件。国家布尔什维克显然正在密谋进行邪恶的报复（就在列托夫一世演出的同时，一些本土的光头党乐队在列宁大街的某个地方，在国家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下表演）；列托夫很可能要遭受一场用烂西红柿和不健康蛋糕进行的仪式性袭击。左翼和左倾知识分子皱着眉头表示不满（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愤怒地谴责列托夫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联盟”——他所谓的“联盟”不过是在“他们的”音乐会上唱了七首歌——同时，他们也在暗自窃喜，幻想着如果能再次在偶像面前丢掉性命该有多好，然后兴高采烈地数着别人口袋里的钱（已经有人透露，叶戈尔只演奏了25分钟就赚了

3000美元)。毕竟，将自己称为“地下传奇”的人，他本人可能非常随性，反体制，与他相比，《Ja》就像是米哈尔科夫的赞歌。

在这种怪诞的氛围下（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珍奇柜里），看到一个安静腼腆的男人穿着从鄂木斯克某个偏僻跳蚤市场淘来的150卢布的运动鞋，显得既怪异又有点滑稽。他痴迷地收集并聆听自己每一场演唱会的录音，常常徒劳地试图在震耳欲聋的观众声中听清自己的声音。然后，他会用一种含糊不清、含糊不清、有些喃喃自语，而且完全不像列托夫风格的声音，与最亲密的朋友们讨论这些录音。然而，尽管这一切看起来多么荒谬，他的名字却是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就是这样.....如果你和他同乘一节地铁车厢，你肯定认不出他，而这或许是最好的。毕竟，对他来说，在台上对着一群彻底疯狂的观众唱《一切按计划进行》，还是用略微不同的措辞或“略微”不同的语言对他的猫说同样的话（后者或许更好——猫的反应显然更热烈），其实都一样。

没人知道他还能表演多久。不，他不会自杀；自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过去的13年里，对叶戈尔来说，这样的决定简直庸俗不堪，荒谬至极，令人难以置信。只是总有一天，他会选择他的猫而不是我们，这也可以理解：猫的眼睛像天堂的光芒一样闪耀，而我们不过是一堆垃圾。最近，一个女孩告诉我，她害怕叶戈尔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说得很真诚，显然，这足以让列托夫继续唱歌，哪怕只是为了她，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面前。作为一个稍微自私一点的人，我更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没有他我们会怎么办（他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足球）。过去无法抹去：即便没有新歌，他创作的也足以让十个像样的诗人写出诗来；即便新歌不如以前（虽然谁又有资格评判呢？），过去的一切早已成为过去，叶戈尔本人也无力改变什么。他无法掌控自己留给我们的一切，他也不需要这种荒谬的权力。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竟然还能听到他的新歌——他曾多次声明，他不会创作任何低于他过去所有作品水准的作品，彻底、果断地抹去它们。他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像《俄罗斯田野》这样超凡脱俗的歌曲，就没有必要再创作十首。过去六年里，我们已经对这种残酷的想法习以为常，以至于当我们最终意识到自己正在听到叶戈尔的新歌时，并非一蹴而就。我们也无法立刻理解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再一次，我们每个人听到的都是不同的声音，是与作者本人截然不同、完全陌生的声音。有人在列托夫身上找到了自己臆造出来的东西，于是便为了“理想”的叶戈尔展开了一场血腥却注定失败的内心斗争：一方面，时髦的左派人士谴责列托夫的系统性方法，将自己激进的非主流野心和梦想归于他；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购买一张打折的共产主义天堂门票来“赎罪”（这种行为荒谬到近乎一种魔幻仪式：首先，要让所有人相信叶戈尔想要以反对派的身份出现；然后，又愤怒地谴责他背叛了自己）。在公众意识中，列托夫不再仅仅是一个偶像（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十年），而是每个人内心冲突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无论这种冲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它都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我们不断地与他进行着真挚的对话，这些对话最终会变成近乎家庭剧的冲突，或是无休止的堑壕战。

因此，才会出现那些荒谬的说法，说新歌重复老歌，说《狗》这首歌的核心思想就是“狗统治世界”这句歌词，说它们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几百万个警察”以及“其他人都是敌人，都是些混蛋”之类的歌词相比毫无新意。莱托夫作品的认知中显然存在着深刻而自然的危机：即使在他最忠实的粉丝中（例如，在非官方网站的论坛上），新歌可能并非重复老歌，而是引领潮流的想法，也显得奇怪，甚至有些离经叛道。那些没听过新歌的人最常问的问题是这样的：“所以，《狗》是某种激进的流行歌曲还是某种概念作品？《长寿幸福》是像《永恒的春天》那样的慢歌吗？”不！这些歌不应该听起来像任何一种风格！为什么我们都如此轻视叶戈尔？为什么我们剥夺了他表达新想法的权利？谁允许我们侵占他的未来？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们早就完全错过了列托夫的这个新方向，而且欣喜若狂。六年前，当我们第一次听到那张充满活力、极具战斗精神的专辑《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张专辑的重点并非《歌唱吧，革命》（实际上，这首歌并不能被解读为对社会抗议和政治斗争的号召），而是《如此》和同名主打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些革命性的言辞和喧嚣，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大胆的挑衅，其对象并非那些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的当局，而是他的歌迷——他们因为一次成功的实验而迅速左倾。六年后的今天，当切·格瓦拉的形象出现在手机广告牌上，百事可乐推出“穿着苏联T恤迎接五一节”的广告语时，这种“左翼”的庸俗无疑会让像列托夫这样对虚伪极其敏感的人感到反感。

这个问题很自然：“叶戈尔难道不是共产主义者吗？！！！”他当然是，而且比你更像。但他的苏联只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在那里，不可思议的“跳跳乐”成为可能，在那里，摇晃一只“死”兔子也合情合理，在那里，售票处总有一张通往童年的预留座位票。为了它——为了童年——叶戈尔·列托夫将满怀喜悦、毫不留情、勇敢无畏、拼死奋斗。毕竟，“没有罪恶，没有神明，没有命运，没有希望，只有一条路，在这世上，只有一条路为你而设，通往你广阔的世界，你广阔的世界.....”只是别去想这条路通向何方；我太累了，没力气向每个人解释，并非所有事都必须在此时此地有理由或意义。如果你年纪够大，你当然会和我一样感同身受.....听听这些歌吧.....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叶卡捷琳堡事件中 叶夫根尼·列托夫和国家国防委员会的官方声明

叶卡捷琳堡事件中，叶卡捷琳堡市总理埃·列托夫和国防委员会发表官方声明

针对 2004 年 2 月 8 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文化中心举行的音乐会期间发生的悲剧事件，我们发表以下声明。

我们与任何天王星民族主义运动都没有积极或决定性的联系。我们是爱国者，但不是纳粹分子。

必须承认，今天，我们目睹的不仅是法西斯主义的诞生，更是它全面而咄咄逼人的扩张——不是那种色彩斑斓、抽象虚幻、英雄主义式的法西斯，而是我们早已在自己身上亲身体验过的、最自然、最卑劣、最卑鄙的法西斯。任何不愿与任何人同流合污的人，任何像你一样的人，任何活着的人——在为时已晚之前，无论身在何处，都要竭尽全力地与之抗争。不要傻傻地站在那里，袖手旁观，垂头丧气。所有极权主义者——无论左翼、右翼，无论什么阵营——都去死吧！

我们恳请您不要再将您的臭味与我们的活动联系起来。

叶戈尔·列托夫与民防，
2004年2月9日

奇怪的是，朋克摇滚在西伯利亚的出现时间与在列宁格勒的出现时间大致相同。1979 年，在鄂木斯克，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Konstantin Ryabinov，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库兹亚·乌奥 Kuzya Uo）与他的同学一起创建了乐队 APOLLONICS IN THE GRIM PUNKS TEOS。

Kuzya Uo（前民防乐队成员）：“有个女孩给我看了一篇关于朋克的文章，刊登在某本杂志上——我记得好像是《环游世界》之类的。文章里说，这些怪胎突然出现在西方。文章里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戴着面具、穿着白袍的色彩鲜艳的人物，手里拿着一块生肉。我和一个同学趁着这股风潮组了个乐队。我们大概四年后才真正听到朋克摇滚，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觉得自己在玩朋克。事实上，我们玩的就是朋克。我们甚至还录了点东西，可惜的是，录音带都没保存下来……”

棺材纪事 | 报纸 — 做神很难。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不要尝试。

成为神很难。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就不要尝试。

“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于9月10日迎来40岁生日。乐队本身也将在2004年10月至11月庆祝成立20周年，届时将举办大型巡回演唱会。此外，新专辑《G.O.: 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将于9月15日发行。本次采访将围绕以上种种展开，延续记者阿列克谢·科布洛夫自初识叶戈尔和“民防”乐队以来近16年来的访谈和对话。

关于新专辑，我想简单说几句。

实际上，录制了两张专辑。它们是迷你歌剧的两部分，一种循环，类似于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墙》或创世纪乐队的《百老汇的羔羊》。它是一部完整的作品。第一部分名为《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第二部分名为《重生》。共28首曲目，每张专辑14首，28个不同的视角，探讨同一情境。28个视角，同一个人出生并行走，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摇摆，在天堂与某种未知的污秽之间徘徊。他无法回头，就像不可能重生一样，前进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着进化、存在等等的法则。也就是说，这是对这种情境的超越。这是一种战争状态。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状态，一种感官的、能量的、精神的、心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噩梦。一种超越存在的战争。一种绝对极端的状态。但这只是解读这张专辑的一种方式；它还有第二套方案、第三套方案，以此类推。有些部分是独立的，就像单曲一样，所以我们会在现场演奏它们，比如《狗》（Dogs）、《没有我》

（Without Me）等等。实际上，最初，所有作品都像《普里格-斯科克》（Pryg-Skok）或《俄罗斯实验场》（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s）那样，是一首漫长而无尽的歌曲，就像我花了一整年时间创作的《没有我》（Bez Menya）一样。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合体。然后，它开始瓦解成许多碎片，每个碎片都是一首歌中的一首歌，节奏各不相同。之后又出现了另一首歌，《乌比特·奥里亚·卡塔斯特罗菲亚》（Ubit. Oriya Katastrofiya），这是28首歌中最长的一首，它围绕着一个短语展开：“理解那些让你不想活下去的事情。”生活中有些事情，一旦你理解了它们，一旦你遇到了它们，你就会意识到，之后，继续活下去，保持——或者成为——人，是非常困难的。这种状态显然涵盖了大多数活跃人士，例如“雇佣兵”、登山者、吸毒者以及所有富有创造力的人。第四种也是最后一种状态是炽热的状态，即死亡，或者神圣。

— 你能解释一下你在做什么吗？

“我无法解释自己的作品。有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网站上，他解释了自己所有的作品，包括创作过程中的种种考量，比如他是如何写出《寻羊冒险记》的。坦白说，当我读完之后，我非常失望。真的非常失望，我意识到我不想再重读村上的作品了。至少，不想再读他用自己方式解释的那些书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解释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们往往要过五到七年我才能真正理解。而有些作品，至今我仍然不清楚自己究竟创作了什么。

——你们专辑的名称都是有原因的；有些名称是借鉴自其他人的。这次的情况如何？

“最近一次采访中，我突然想起了什帕利科夫的电影《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事实上，这首歌和这张专辑与它毫无关系，创作的初衷也完全不同。《复活》——无论是歌曲还是专辑——都是在我又一次探望重症监护室之后，或者说就在医院里创作的。”我时不时地需要拔掉输液管，走到走廊里，那里堆满了裹着床单的尸体。这并非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一种平凡的例行公事：他们被担架抬走，新的伤员被送进来.....那里有个士兵，临死前，他说了些近乎伟大诗篇的话：关于受伤的狗，关于指挥官，关于绒毛飘向地平线的闪耀白杨，关于骏马.....我坐下来，尽我所能地记下他的话，就像马雅可夫斯基在睡梦中写下一首诗，我想是《穿裤子的云》，然后却无法解读。感觉自己身处某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在哪里。于是，这组歌曲中最令人恐惧的两首，恰好是同名主题曲：《复苏》和《漫长而幸福的人生》。

— 多年来，许多人常常认为你在采访中的说法自相矛盾。

我很久没接受采访的原因是，对于任何问题.....嗯，举个例子，禅宗里有个公案：“马是白色的吗？”如果回答错误，就会挨打。而且打得很狠。所有这些话，都是在需要说的时候说出来的。比如，有时候我甚至认不出自己以前接受的采访。就是这样。这些都是我人生经历的产物，实际上，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沉重的、明亮的、各种滋味的、苦涩的等等。嗯，我内心涌现出了许多不同的自我。它们在我内心非常协调。对别人来说，这似乎有点矛盾：我今天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实际上，我说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对于每个问题，我都有15到20个答案，有些答案甚至相互矛盾。但在我的内心深处，它们都是相互融合的。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能立刻想到各种各样的答案。我不是个非黑即白的人。

——你工作中不运用你的梦境吗？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所有梦境，我甚至可以控制它们。但这与创造力关系不大。当我清醒、觉醒、专注当下时，我比在睡梦中更能做我自己。甚至我的歌曲《Kill》也是针对整个世界都存在于梦境状态的。对我而言，创造力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现实。”

——大量的信息流涌入你的脑海：音乐、书籍、电影等等。

“我家里大概有八千张唱片。明天我再去买五十张，准备听一个星期。我也读很多书。但可惜的是，我发现真正值得一读的好书我几乎都读完了。如今，能真正打动我的书真是少之又少。”

— 拼贴风格仍然是你作品的主要风格吗？

——我不会说它占据主导地位。拼贴只是我使用的技巧之一。但它也可以是一种独白。技巧越多越好。我现在不画画，但我能画。你知道自己能做到，所以何必呢？除此之外，我还会不断引用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电视节目到各种音乐。事实上，这两张专辑里充满了大量的引用，来自车库摇滚、冲浪音乐、奇想乐队，以及我们自己的很多话。你必须明白，这不是自我重复，而是自我引用。

——这些年来，你有什么变化吗？

——我还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只是一开始，我比较单纯，什么都想尝试，想把所有领域都占为己有，想做点什么。结果一切都如我所愿，一切都如我所愿。那时候，创作比现在要多得多。然后就出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我能继续以“雷蒙斯乐队”或者“现状乐队”（他们的名字都挺有暗示性的）的名义活动吗？继续在同样的水平上做同样的事情。但我做不到。我不会重复做同样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是变得更加宽容，视野也更开阔了。

我人生的悲剧就在于，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却一直渴望成为焦点，像斯梅尔廷那样的中场球员，做好自己的工作，身边围绕着美好的人。比起生产者、创造者，我更喜欢做消费者，这样生活起来更舒服。但我的一生都是如此：我必须进球，冲锋陷阵，做点什么，搅动风云，发明创造，构建新的神话，新的价值体系。因为没人愿意做任何事，只能独自承受一切。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国家，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这完全是历史使然。我们的人民——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待遇，因为他们懒惰无能，毫无天赋。一旦出现一些有才华的小人物，他们立刻就被当作富农、吸血鬼一样对待；他们立刻被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然后他们悲痛欲绝，忏悔不已，捶胸顿足。这一切永无止境地重复着。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指引行动：新的追随者必将涌现，有人不应只是模仿我，而应在我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或许是在新兴的计算机技术领域，或许是全新的领域。就让这些成为我一无所知的新因素、新的艺术领域吧。但愿如此！我并非守旧派。

— 新专辑已经制作完成，即将陆续发行。你现在在忙什么呢？

我们目前正在重新制作和混音我们90年代的专辑。《百年孤独》将以双碟形式完整发行，分别名为《至日》和《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并分别命名为《月球革命》和《生命中可承受之重》。它将拥有非常强劲、厚重的音效；我们甚至重写了部分器乐部分。歌曲本身基本保持不变，但音效会有所不同。我们还会加入一些之前从未收录的元素。此外，我还会创作一张新专辑.....

简要背景：叶戈尔·列托夫（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生于1964年9月10日。1982年，他创立了录音室乐队“POSEV”。1984年秋，他与康斯坦丁·“库兹亚·乌奥”·里亚比诺夫组建了乐队“民防”。他的专辑数量，包括个人专辑和合作专辑，已无法精确统计，仅正式发行的专辑就超过50张。他是俄罗斯真正独立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位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取得成就的音乐家，没有接受任何投资或宣传：无论是原声独奏还是电声演出，他的音乐都场场爆满，从一位“小众”艺术家悄然蜕变为全国知名的巨星。他常年居住在鄂木斯克，多年来一直在那里的自家录音室“GrOb-Records”进行录音。在笔者看来，他是俄罗斯乃至前苏联地区最具影响力的音乐家。

Chronicles | www.gr-oborona.ru — 像滚石一样

像滚石乐队一样

民防二十周年。叶戈尔·列托夫四十周年。

作者为《滚石》杂志撰写的文章版本。

2004年秋季，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乐队“民防”的历史、生活和工作中发生了三件大事：9月10日，叶戈尔迎来40岁生日；9月15日，G.O.的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即将发行；不久之后，在9月下旬或10月初，乐队将开始一场大型巡回演唱会，以庆祝其成立20周年。

事实上，1984年10月至11月间，在鄂木斯克，叶戈尔·列托夫和康斯坦丁·“库兹亚·乌奥”·里亚比诺夫开始以“民防”为名组建乐队。他们是否知道两年前在英国已经有一支同名乐队，也叫“民防”，后来更名为“凝固汽油弹死亡”（Napalm Death），至今仍在活跃，我们不得而知。

在此之前，叶戈尔和库兹马以“波塞夫”（Posev，取自著名的异议人士杂志）为人所知，这是一个纯粹的录音室项目，留下了丰富的档案资料，至今仍未出版。叶戈尔受其兄长——著名爵士音乐家谢尔盖·列托夫的影响，很小的时候就参与了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Pop Mechanics）乐队的首场演出。然而，他并不喜欢首都的生活，于是回到家乡鄂木斯克，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继续追求自己的创作梦想。

“对我来说，摇滚乐是一场运动，它代表着性、毒品、庆祝、欢乐，它是一场摇滚革命。我们以前没有这样的环境。我尝试过，而且是独自一人。结果，我发起了一场属于我自己的自主革命。这并非全球现象；事实证明，我在这里捍卫的价值观，与我60年代在旧金山、70年代在纽约前线的兄弟们如出一辙。他们曾并肩作战，而我在这里代表着整个摇滚阵线的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他们中的一员，而不是周围这些小人物中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显然没有人理解。我和库兹马所创造的，与MC 5、地下丝绒、大门乐队、纽约娃娃等等乐队所创造的相似。但结果却是，这里没有人对此在意。“甚至没有人理解或倾听它。”

我们这个圈子的问题就在于，我们的人什么都不读、不了解、不听、也不看。而且他们也不觉得有任何需要。”

叶戈尔·列托夫，鄂木斯克，2004年9月。

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朋克摇滚和车库迷幻音乐的启发，列托夫和里亚比诺夫于1984年和1985年使用苏联时代的设备创作并录制了几张专辑和大量其他作品。他们开创了当时闻所未闻的“DIY”音乐流派；事实上，当时苏联没有人演奏过类似的音乐。但这种滑稽的尝试无法逃过有关当局的注意——克格勃、内务部，以及一些精神科医生和征兵人员。尽管身体状况不佳，库兹马还是被安排穿上军靴，派往著名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守卫两年，只留下列托夫一人。他幸运地躲过了兵役，避开了秘密警察和精神病院的追捕。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展现了惊人的意志力，独自一人录制了五张（！）未完成的G.O.专辑。1987年，他还惊世骇俗地闯入了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与来自鄂木斯克的同志们一起举办了一场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音乐会。在那里，他结识了西伯利亚地下摇滚圈里所有或多或少举足轻重的人物。大约在同一时期，他遇到了扬卡·迪亚吉列娃，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战友，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他并肩作战。扬卡帮助他逃离了西伯利亚，与他搭便车穿越全国，等待丑闻平息，搜捕和迫害停止。在每个主要城市，他们都

留下了专辑和录音的拷贝，就像具有破坏力的定时炸弹，这些拷贝立即大量售罄，并促成了不插电音乐会。

不久，消息传来，他们可以返回，不必担心被监禁或送进精神病院。1988年春天，同样在诺沃西比尔斯克，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以原名进行了电声演出。这是当时最精彩的音乐会之一，吉他手德米特里·谢利瓦诺夫（Dmitry Selivanov）也参与其中，可惜他在1989年春天不幸自杀。由于演出曲目未经授权，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再次陷入困境，但时代已经改变，历史的车轮已经无法阻挡。

1987年9月，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在波多利斯克传奇摇滚音乐节上的演出尝试失败后，他们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并在1988年12月的“Syrok”音乐节上举办了音乐会。名声如潮水般涌来，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哪个城市，他都受到爆满的狂热歌迷和无助（却又暗自愤怒）的共青团员及便衣警察的热烈欢迎。扬卡组建了自己的乐队，成员几乎囊括了“G.O.”乐队的所有成员，并经常陪伴叶戈尔进行无休止的巡演，既有原声演出，也有电声演出。列托夫也为她所有如今已成为经典的录音室专辑的录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与此同时，“防御者”乐队已组建完毕，并在列托夫位于鄂木斯克的家庭录音室以完整乐队的形式进行录音，他们不断尝试家庭录音，令人印象深刻。叶戈尔是如何将苏联时代的设备发挥到极致的，至今仍是谜，而且至今无人能够在不牺牲风格和音质的前提下复制类似的成果。他只允许自己的乐手进入他的录音室——这间神圣的录音室。他至今仍然如此，尽管专业设备早已到位，但正如他的“乐迷”们尊敬地称呼他的那样，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仍然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继续“制作库利宾”。

多年来，少数见证过他创作过程的人，至今仍对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无限的创造力感到惊叹。在与“G.O.”乐队并行发展的同时，叶戈尔和他的乐队成员在1988年至1990年间，为迷幻录音室项目“共产主义”（COMMUNISM）录制了15张专辑。这些专辑涵盖了士兵复员的民间传说、街头歌曲、列宁的演讲和关于革命的广播剧、莱托夫、扬卡、库兹马、谢利瓦诺夫等人的原创作品，以及正如节目单中所宣称的“打开看看——里面蕴含着概念主义！”。此外，还有如同时光流逝的史诗般的悲壮专辑《俯冲轰炸机编年史》。似乎一切都已尽如人意。然而.....

“伊戈尔和迟到的混蛋们”

1990年4月，正值乐队人气巅峰之际，叶戈尔宣布乐队解散，并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当时塔林只有一个“n”）与当时的阵容举行了最后一场演唱会。歌迷们悲痛欲绝，而莱托夫几乎再次孤身一人，为他的新项目“叶戈尔与奥皮兹德涅夫什乐队”（Egor and the Opizdenevshie）录制了专辑《Pryg-Skok》（跳跃）。很明显，这个名字与1990年的时代格格不入——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公开发行，都显得不合时宜。但“永不重复自己”始终是他创作的指导原则，并将一直延续至今。《Pryg-Skok》充满了惊人的力量和能量，是在一种狂热的谵妄状态、酒精和毒品带来的昏沉状态下创作和录制的，这是莱托夫对可能性领域的最新探索，又一次破纪录的成就，又一次百分之百的投入。

叶戈尔是一位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一刻也闲不住。他与为数不多的朋友谈论着文明的终结，谈论着这个不值得拯救的整个世界。“是时候结束了，”他说，“反正也没人再需要这一切了。如果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应该体面地离开，就像战败的士兵离开战场一样。”正如一位武士在切腹自尽前所喊的那样：“自杀吧，毁灭整个世界！”

然而，叶戈尔仍然继续创作诗歌和歌曲。当时，关于他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但他只是把自己封

闭起来。他不再举办音乐会，不再发行专辑，也很少离开西伯利亚。

1991年春天，晴天霹雳。人们早就知道扬卡患有严重的抑郁症。5月9日，胜利日当晚，她失踪了。此前，她也曾长时间离家，独自漫步在树林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风景。但这一次，一种清晰而强烈的预感油然而生：肯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对她的搜寻持续了很长时间。持续不断的焦虑、铺天盖地的电话、带着她的照片去拜访灵媒——总之，焦虑近乎疯狂。1991年，悲剧的一年，最终以绝望告终。在《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尤里·谢科奇欣（现已去世）致电新西伯利亚州内务局局长后，警方开始全力展开调查。5月17日，当地渔民在鄂毕河支流伊纳河中发现了扬卡的遗体。一个怪异——或许甚至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游戏：伊尼亚——亚娜……究竟发生了什么——恐怕永远无人知晓。叶戈尔和他的战友们在守灵仪式上陷入了疯狂，一遍又一遍地循环播放着奇想乐队的《罗西，请你回家吧，妈妈不知道你去了哪里……》（亚娜和叶戈尔一样，都早年失去了母亲）——胜利日那天，神秘主义与死亡交织在一起。

列托夫从扬卡位于新西伯利亚的小屋里带走了她所有的档案。不久之后，在鄂木斯克著名的格罗布唱片录音棚（也是叶戈尔的家），专辑《耻辱与耻辱》录制并混音完成。这张专辑收录了扬卡生前未能打磨的所有作品。这是一部气势恢宏、意义非凡的作品，至今聆听仍令人激动不已。

所有这些以及随后的事件——1991年8月莫斯科事件、12月苏联解体等等——促使列托夫组建了一支乐队，乐队名为“叶戈尔与奥皮兹德涅夫什”（Egor i Opizdenevshie），并在1991-1992年间录制了另一张里程碑式的专辑《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黑胶唱片很快开始发行，随后是收录了G.O.、扬卡和“叶戈尔与奥皮兹德涅夫什”专辑的CD。一个全新的故事就此展开。

俄罗斯的突破

在与《日报》（后更名为《Zavtra》）合作后，继1993年10月莫斯科臭名昭著的坦克演习（包括炮击苏维埃大厦）之后，叶戈尔·列托夫和罗曼·纽莫耶夫（秋明组织“生存指南”的幕后推手）创立了“俄罗斯突破”运动。随后，刚刚创立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德华·利莫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也加入了他们。1993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行了首次行动，名为“行动指南”。其他一些名誉扫地的人物，如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等人也出席了此次活动。然而，这场活动最终并没有以音乐会的形式结束，而是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斗殴。事实上，活动原本宣布的是“民防”乐队的重组和演出。狡猾的组织者们瞒着所有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广告，在仅有800个座位的文化宫里售出了近万张门票。随后，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成功地清空了售票处，卷走了所有钱。临近演唱会预定开始时间，成千上万愤怒的歌迷，渴望见到他们的偶像，开始冲击这座不幸的文化宫。窗户被砸碎，脱轨的电车撞向墙壁，很快，英勇的防暴警察赶来增援。枪声和混乱爆发了；如果少了坦克，这里简直就是迷你版的苏维埃大厦。当烟雾和催泪瓦斯散去，双方都逃离了战场，文化宫前的广场一片狼藉。音乐家和支持者们，包括我本人在内，在警卫的护送下被疏散到“花园”中。

吸取了所有错误教训并得出必要的结论后，1994年初，“俄罗斯突破”乐队终于开始了其横跨全国的凯旋之旅：西伯利亚、乌克兰、莫斯科、圣彼得堡……5月底，一场丑闻缠身的全国直播节目在“A”频道播出：叶戈尔·列托夫发表了政策声明，国家电视台历史上首次播放了G.O.乐队在莫斯科演唱会上的歌曲。

与声名狼藉的政客和《柠檬报》的短暂合作最终让列托夫确信自己被人利用了，“民防”乐队应该独立运作。在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并创作了一本诗集后，叶戈尔继续创作歌曲，并带着新的阵容

和设备重返录音室。专辑《冬至》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录制完成。经过精心打磨，这两张专辑于1997年春季发行。而这，已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民防”乐队。产品质量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受众群体的质和量的变化。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全新的存在，一个完整的世界。我对现在的自己并不感兴趣。我非常了解自己，了解得非常透彻：我有多糟糕，多天才，多像神，又有多卑鄙、多人渣、多混蛋。

只有当我成为某种媒介、某种渠道时，我才变得有趣。当然，主要是在写作的时候。因为演唱会是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演唱会非常狂野，连The Stooges乐队都望尘莫及。（虽然我一直很尊重Iggy Pop。他总体来说演奏得很好，他近几年的作品和最新专辑都非常出色。）早期OBORONA演唱会的美学在Iggy Pop的歌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惜这首歌不是我的，而是他的——《我需要更多》（I NEED MORE）。我永远不会满足。我总是需要更多。但我发现，人们并不喜欢那种演唱会。他们想要一切。”演奏和演唱都要尽善尽美。所以我们演奏、演唱，倾注所有热情。但我更想举办那种完全没有音乐的音乐会，那种一切都非同寻常的音乐会。虽然我们确实举办过不止一次这样的音乐会，但我必须说，人们根本不需要那种音乐。”

叶戈尔·列托夫，鄂木斯克，2004年9月。

新时代

“1997年的专辑发行之后，到1999年之前，我发现自己陷入了彻底的创作瓶颈，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停滞不前；我无法再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后来我把我的弟弟谢尔盖拉进了乐队，我们改变了乐队的形象和音乐风格，录制了一张非常棒的专辑《星陨》（Starfall）。”

叶戈尔·列托夫，鄂木斯克，2004年9月。

《星落》（Starfall）完全由他最爱的苏联时期歌曲组成：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安恰罗夫的作品，苏联战争电影中的歌曲，甚至还有电影《不来梅城音乐家》中的《太阳升起》（Solntse Vozdeyst）。一如既往，即使演唱的歌曲并非叶戈尔本人创作，G.O.乐队也始终保持着自我：他们的激情、活力和演绎如此淋漓尽致，以至于叶戈尔毫不谦虚地强调，他演唱和演奏这些歌曲时，如同在演唱自己的作品。在他的歌曲、诗歌和绘画中，他经常运用拼贴手法，从浩瀚的阅读、聆听和观看的书籍、音乐和电影中，编织出一个自足而连贯的整体，并将所有这些创作形式都视为最恰当的斗争形式，一场对抗大众意识惰性的战争。

足球

“我彻底放弃了足球；我以前是个没出息的孩子。我这辈子除了踢球什么都没干过。我以前踢中场，组织核心，进过很多球。当然，我现在不踢了；我有其他事情要做。

对我来说，足球不是一项运动；它是摇滚乐，朋克摇滚，一种极端的艺术、哲学和政治形式。它是某些国家、群体和人类居住地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一场小型战争。

职业足球迷有个词叫‘库兹米奇’。他指的是那种无论支持哪支球队，都只支持精彩足球的人。我甚至不支持任何球队，我支持的是足球的整体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在1990年支持喀麦隆，后来又支持塞内加尔。我真的很高兴希腊今年赢了。如果决赛是希腊对阵拉脱维亚，那就更好了。”

叶戈尔·列托夫，鄂木斯克，2004年9月。

当下。鄂木斯克，2004年9月

目前，“Grazhdanskaya Oborona”（简称G.O.）乐队拥有或许是史上最强大、最专业、最默契的

阵容。成员包括：Egor Letov（主唱、吉他）、Alexander Chesnakov（吉他）、Natalia Chumakova（贝斯）和Alexander Andryushkin（鼓手）（均来自秋明）。有时，Igor “Jeff” Zhevtun（秋明-莫斯科）也会加入他们的演出，担任吉他手。Jeff Zhevtun曾是G.O.乐队经典阵容的成员，并与Yanka、Instructions for Survival等知名乐队合作过。录音作品中还运用了键盘和其他多种辅助乐器、效果器、音效等等。Egor继续担任制作人，他的妻子Natalia Chumakova则参与混音工作。

新专辑：埃戈尔·莱托夫讲述

“我们实际上录制了两张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和《重生》。它们实际上是一部迷你歌剧的两个部分，共28首曲目，每张唱片14首。但它们就像左右声道扬声器或大脑的左右半球一样截然不同。它们甚至在精神层面也应该有所区别。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展现了一种极端状态，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的说法，这是四种出生状态中的第三种。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了这些素材。一种战争状态，一种战胜存在的状态。介于地狱与天堂、天堂与可怕的污秽之间的动荡。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状态，一种感官的、能量的、精神的、心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噩梦。对同一事物的28种视角，同一个人的28种状态。但这张专辑还有第二个计划，第三个计划，等等。“理解某些让你不想活下去的东西。”在创作某些曲目时，我必须达到极端的精神状态，甚至体验到死后和濒死体验。歌曲《复活》（Reanimation）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创作的，当时我正在那里。他们把自杀者抬进来，把尸体抬出去，有人临死前说了些什么，然后你一看——他们已经死了。他们用床单把尸体包起来，放在入口处，你走到走廊，看到尸体堆积在那里，躺在那里。有个士兵临死前说了类似的话，舒克辛只是安息了——那真是伟大的诗篇，我从未听过。我坐下来，尽可能地把所有事情都写了下来。最近，我对一个人经历的一切，他们的生与死，都形成了一种医学专业的角度。

然后还有那首歌《人格的倍增》（Multiplication of Personality）。“我们人数众多”：我还没死透到可以永远活着。也没穷到可以永远做我自己。到处都有无数个“我”，数不胜数。这首歌最准确地表达了我现在的状态。

我突然想起什帕利科夫有一部电影叫《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但这首歌的创作缘由却截然不同。我设想，总有一天，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我根本无法继续饮酒、吸毒等等，因为这会直接导致我、我的朋友和爱人的死亡。我设想，如果这一切都消失了，会发生什么。于是我写下了一首极其可怕、如同噩梦般的歌：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就是没有节日，每一天都没有节日，那才是漫长而幸福的人生。

这太可怕了。——

叶戈尔·列托夫，鄂木斯克，2004年9月

鄂木斯克，桦树林，火灾

经过漫长的跋涉，我们穿过崎岖的地形，来到叶戈尔最爱的白桦林空地。我们捡起柴火，点燃篝火。期盼已久的太阳终于露面，阳光洒在叶戈尔身上，透过烟雾和火焰，他看着我们，露出微笑。他早已放弃了巫术，对他而言，火就是火。一件印有“耶路撒冷2000”字样的T恤上挂着一个东正教十字架，那是他从圣地之旅带回来的。但无需多问，所有的问题都已问尽，剩下的只是凝视着篝火，明白多年前正是在这片森林里，这个人开启了造就他今日的篇章——叶戈尔·列托夫，乐队“民防”的领军人物。一个平凡人，却拥有非凡的命运。

阿列克谢·科布洛夫，2004年9月，鄂木斯克-莫斯科

活动。莫斯科娱乐周刊 #17 (136) — 生命如奇迹

生命是一个奇迹

9月10日，民防乐队的新专辑将发行。

俄罗斯顶尖朋克乐队“卫士”（Grazhdanskaya Oborona，简称GO）已经整整八年没有发行专辑了（除了收录苏联歌曲的致敬专辑《星落》（Starfall））。9月10日，GO打破沉默：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Dolgaya schastlivaya zhizn）——全新专辑的第一部分——即将发售。马克西姆·谢梅利亚克（Maxim Semelyak）在莫斯科一家小咖啡馆采访了GO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并向他探讨了“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的意义。与此同时，谢尔盖·斯努尔尼克（Sergey Snurnik）、谢尔盖·马克西莫夫（Sergey Maksimov）和马克西姆·巴拉宾（Maxim Balabin）分别为这支俄罗斯顶尖朋克乐队设计了海报。



你知道“长寿幸福”是什么意思吗？

- 不。

——那是什帕利科夫的最后一个剧本的名字，之后他便上吊自杀了。

哇哦。哦.....甚至可能是.....没错，它就是一部电影！库兹马（前GO乐队吉他手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编者注）在一次采访中说过，我们所有的作品都充满了电影感，所以这一定是某种潜意识里的想法.....

—《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只是整张专辑的第一部分吗？

本质上，这是一张由两部分组成的专辑。它们就像是关于战争的特定梦境，一个生活在持续战争状态中的人的梦境。后来，随着专辑的扩展，大约在第十四或十五首曲目左右，概念有所改变。最终，专辑开始呈现出一首由许多小片段组成的长歌的形式。这些片段描绘了一个人的28种状态，根据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的理论，这个人已经跳跃但尚未落地。他处于出生的第三阶段。他已经出生，但尚未真正融入现实。然后他出现了。接着，他开始无数次的尝试，试图逃离，试图回归，试图继续前进，坚忍地克服困难，假装一切都很好，假装我们已经胜利。就像专辑《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我们最悲怆的专辑。我相信，我一生所做的一切都在《DSZh》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这一点也体现在音乐部分。其中包含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元素——一些对披头士乐队的引用，冲浪，各种有趣的东西，诗歌，实际上还有大量的自我引用。

——究竟什么是长寿幸福的生活？这种印象源自何处？

“这首歌，以及整个意象，都是在我又一次探望重症监护室之后产生的。在某个时刻，我设想有一天，我会因为身体上的、根本无法再服用那些能够改变和扩展意识的药物——而我认为，这正是真正摇滚乐的精髓所在。那么，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接下来会怎样？当不再有假期的时候。那末——我们将迎来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为了我们每个人。直到永远。”

哇，我做梦都想不到。

“这首歌是我最黑暗的作品之一，不算《Reanimation》——或许是我们最恐怖的作品，它诞生于我躺在同名机构里输液的那段经历。当时，我身边的人时不时地死去，死得轻而易举——自杀、吸毒过量等等。我匆匆地把他们临终前的呓语片段记在笔记本上——那是我此生听过最怪诞、最疯狂、最不可思议的诗句。有些人被抬出去，有些人被抬进来——我把它们都记了下来。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病房里。实际上，专辑的第二部分就叫《Reanimation》，这是真的，因为那段时间我经常待在重症监护室——我从未经历过那么多。甚至到了灵魂出窍的地步。也就是说，我们做到了极致。把人逼到了生死边缘。甚至不是自杀，而是到了中阴，也就是死亡的开始。人们在这种状态下的行为截然不同。”状态。事实上，这些歌大部分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的。恐怕这可能是在我这个领域的最后一部作品了。因为我的身体可能再也无法承受了。我从未在录音过程中，尤其是在作曲过程中，承受过如此巨大的身体压力。我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才完成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一种叫做“跳跃式”的创作。弗维登斯基（Vvedensky）有一个关于“opupoda”的概念——下降和上升……顺便说一句，所有关于我对真正创造力、真正存在的理解，都详尽地包含在麦克尼尔（McNeil）和麦凯恩（McCain）的著作《请杀了我（朋克摇滚参与者讲述的真实历史）》中。这是关于摇滚乐最好的书，也是我过去15年来读过的所有书籍中最棒的。在我看来，所有纳什（Nashi）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 你为什么称《Solstice》是最悲惨的专辑？

“冬至”当然很特别。它本质上是我们存在的终点，但却是意义非凡的终点。任何极限都是终点，你必须找到出路，因为如果你停留在那里，你的人生就会不断重复。

如何避免这种情况？

“嗯，我想我只是比较有幽默感，所以总是能以一种比较迂回的方式继续前进。我觉得人们仍然不太理解，比如说，歌曲《祖国》的创作缘由，它代表着什么。”

然后呢？



“这是我写过的最悲怆的歌之一。它讲述的是一个从崩溃边缘崛起的祖国，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甚至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一个不仅从崩溃边缘崛起，而且还在不断下沉，越来越深，越来越绝望地坠入一个难以想象的深渊的国家。然而，歌颂祖国的崛起却拥有无比强大的力量。这些专辑——《至日》（Solstice）、《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创作于1993年10月事件之后，严格来说，那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不仅仅是胜利，我相信，那也是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俄罗斯存在主义的真谛。当少数人奋起反抗，遭到坦克炮火轰击时，所有人都认为我们会赢。这些专辑本质上讲述的就是这件事：当一个人彻底失败后，他歌颂自己如何胜利，如何最终胜利。在我看来，人们似乎仍然一无所知。这些专辑的录制采用了一种独特的音效。”这跟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它本来就不应该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我们创造了一种无人能完全理解的音墙。坦白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乐队的声音跟我们一样。我通常更喜欢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我们听各种各样的日本乐队，非常另类的乐队，秘鲁乐队、希腊乐队、捷克乐队，总之，任何独特或者力求独特的音乐我们都听。

— 例如谁？

— Acid Mothers Temple、Mainliner、Les Reines Prochaines、Reynols、Green Milk from the Planet Orange、Marshmallow Overcoat、Baal、Toro Sara。Много。

— 回到《Rodina》这首歌，有趣的是，《民防》中最具体的一首歌最终却成了最神秘的一首。

——是的。而且，它创作于一个人们相信可以施加某种特定影响的时代，这才是关键所在。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不这么认为了。因为进化是有规律可循的——我最近几张专辑里的很多歌都是关于这个的。比如《天空，像咖啡一样》。

我没听到。

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解释我们痛苦绝望的光芒——那意味着邪恶的泡沫和咖啡色的天空。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为我们丑陋的、咧嘴的羞耻辩解——那意味着糟糕的拐杖和咖啡色的天空。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平息我们根深蒂固的、充满疑问的恐惧——剩下的只有橡子和咖啡色的天空。这就是那首歌。我活得越久，环顾四周，就越明白人类的个性——我现在说的都是些老生常谈——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我认为它甚至不值得思考。某些进化过程正在发生。进化与人类无关。总的来说，发生的一切都如此难以理解和模糊，以至于只有——我不知道——一个人经历过非常深刻而强烈的死亡，或者在迷幻药的某种特定阶段，才能讨论它。否则.....事实上，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再接受采访，也不再与人交流，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毫无意义。要谈论某些事情，你必须身临其境。或者，你也可以同时观察大量不同的事件，然后从中得出结论。但我认为这很愚蠢。当你在网上看到一些动态图像时，你无法从中得出任何结论。因为图像本身就是一个结论。

——你究竟是如何成为现在的你？你是如何成为叶戈尔·列托夫的？

“我的人生经历就是一连串非理性的爆发。例如，我不能说我是自己的缔造者。我唯一做的就是让我发生在我身上的所有非理性的事情变得井然有序。”

我们为什么需要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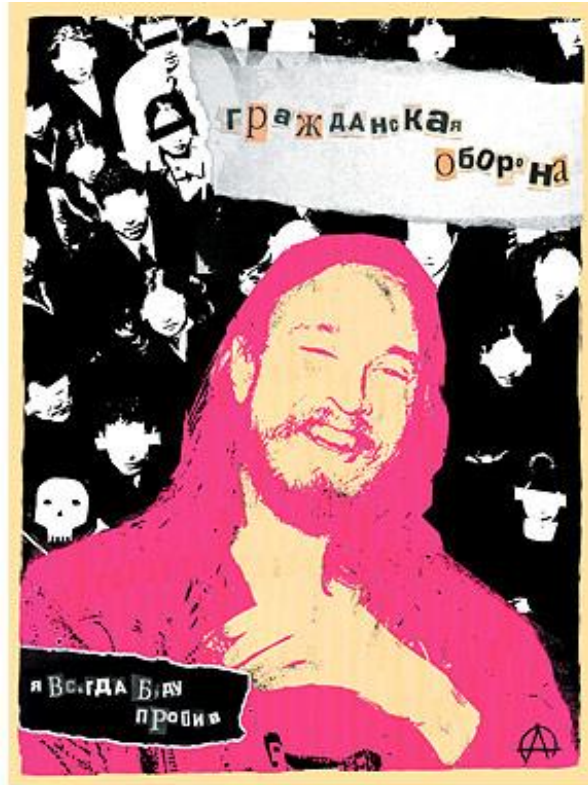
——为了让别人能理解。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不是在编造什么，而只是在反复咀嚼我内心的经历，然后继续走我自己的道路。

大约十六岁的时候，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称之为顿悟。我不断地经历着抑郁和喜悦的交替。我仿佛置身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就像在一个巨大的镜屋里，只能看到自己的倒影。这种状态时不时地伴随着精神的急剧低落，以及想要摧毁一切、回到过去：自杀或者干脆遗忘——简而言之，回到某种原始状态。而当我真正达到这种状态时，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有一天，我从外部审视自己。我意识到，我其实是由无数个关于万物本质的非常具体、非常私人的想法组成的。它们看起来像一堆脏兮兮的破布，一些衣服，一些餐巾纸，五彩斑斓的破布，五彩斑斓的玻璃.....

— 这首新歌《Multitude》是关于这件事的吗？

——是的。我把这一切都吞噬在心底，拾起它们，走到厨房，望向——我的桌子蓝得像天空——然后我把脑子里所有这些思绪都抛向了那片蓝色之中。就在那一刻，我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我当时完全清醒，从未喝过酒，也从未吸食过任何东西。一股令人心碎的全球性暗流在我体内涌动。那种感觉如此强烈，仿佛我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整个世界。通过我，通过我所想象的那个活生生的人——那只是一根细小管道的一小段——整个世界正试图突破这道可怕的张力，你能想象吗？一股巨大的暗流，而我却在竭力阻挡它。我被撕裂了，我走到外面，在那里放声痛哭。我看到一片叶子从树上飘落了很久，蚂蚁爬行，孩子们奔跑，秋千吱呀作响，爷爷骑着自行车经过。我一下子看到了这一切。我从这一切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全球性的图景。一切都清晰地表明，这才是事物应有的样子。不仅仅是应有的样子，而是这种运动，某种全球性的宇宙.....甚至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种棋局。我不知道，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时间仿佛静止了，这让我想起了迷幻药或死亡的状态。它收缩，收缩，在某个时刻几乎停止了。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它既是可怕的折磨，又是全球性的狂喜。我理解了一切。我行走着——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同时，我又成为我所关注的每一个部分。然后它停止了，但它在我心中停留了

很久。这种状态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越来越少。在那之后，我明白了该往哪个方向走。以及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本质上来说。从那时起，我一直在做这一切。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表现？

我认为，在我们国家边境地带，只有“守卫者”（Grazhdanskaya Oborona）这支乐队真正玩转迷幻车库朋克。毫无疑问，我们是全国最好的乐队。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人能和我们相提并论。人们都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才会来看我们的演唱会。我们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我既高兴又难过——然后我们就不得不继续前行了。这（笑）确实令人难过。因为，嗯，已经过去四十年了，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既艰难又难以承受。但另一方面，一切都在继续。格列宾希科夫（Grebenshchikov）那句粗俗的比喻：“那些年轻的朋克都去哪儿了？”他们已经走了。而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愿上帝保佑她？

——愿上帝保佑她，但说实话，这仍然令人难过。这意味着我们肩负着进化的重担，肩负着先锋的重担。我们这些四十岁的人，从一开始就背负着这一切。没有人能超越我们。我很伤心这一切在我们眼前分崩离析，就此结束。但这背后有具体而客观的原因。我们无法承受。你必须独自前行。作为一名先锋球员，这种感觉并不好受。我感觉更自在——就像在足球场上一样——不是作为前锋，而是作为防守型中场，在那里没人指望我进球。但现在我必须在进攻端努力拼搏。每个人都在要求：进球，进球，进球。好吧，这就是你们的目标。

— 在欧洲杯上，你支持哪支球队？

“对于职业球迷来说，我天生就是个库兹米奇。”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是我会在任何情况下支持的。对我而言，足球是一种极致的艺术，就像摇滚乐一样。它根本就不是一项运动。此外，我必须说，生活中所有吸引我的事物都是无法解释的、难以想象的。是超越一切的事物。是以最肆无忌惮、最具侵略性的方式，打破规则、基础、仪式、体系、准则、法律，以及所有惯性

——死亡的显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支持那些能够，并且确实为“现实生活”带来这种馈赠的球队。就此而言，我为希腊感到高兴。总的来说，我认为希腊的胜利是一次非常成功的策略，它出人意料地捍卫了“诗歌的失败事业”，而且是以一种真正德国式的、理性而务实的方式做到的。当然，如果拉脱维亚站在希腊的位置上，那就更好了。

——比如说，你给人的印象是不太热情好客。总的来说，你不觉得和人相处很困难吗？

——当我开始写作，或者更确切地说，开始真正生活的时候，我听的是Shocking Blue和Led Zeppelin的歌。我哥哥从新西伯利亚带回来的。当然，还有披头士。我也读书。后来，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你要么随波逐流，也就是生活在这套人际交往的模式中，本质上做一个普通人；要么就挣脱束缚——然后你就能取得这样那样的成就。这就是规则。但你要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某种.....孤独。大约十年。对我来说，这毫无疑问。不是说我没有选择，而是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对我来说，有些东西从孩提时代起就更加重要。例如，对我来说，我生来如此，或者我是否是某种非人类，都比什么更重要——泥土的气息总是能唤起我内心深处的许多感受.....或者日落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森林里的时候。对我来说，这始终比任何形式的人际交往都重要得多，比我周围城市的喧嚣都重要得多。我不害怕它，它也不会让我感到疲惫。只是我对它不太感兴趣。嗯，它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没有它，我也能过得很舒服，感觉很棒。嗯，它对我来说并非现实。只是些琐事，或者别的什么。胡说八道。生活并非发生在这里。正因如此，我立刻投入某种东西.....就像向某种力量发出呼吁.....上帝.....我不知道是谁.....我最近一直在谈文明和进化。正是这种进化的力量，我同意为一切付出代价。我同意为一切付出代价。绝对的一切。这是我的歌《我爱，兄弟们，我爱》，是关于一辆坦克的。（我们说的是《我爱，兄弟们，我爱》的一个罕见版本，它将出现在专辑《复活》中——编者注。）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显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周围的人都死去了，而我们却被指责不会死。但我们不会死。我们永远不会死。我其实觉得我已经配得上这份永生了。我感觉自己如此.....永恒。我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不朽之人。但这一切需要付出代价。而且将来还会有更多。只是现在我无法想象还能用什么方式来偿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压力越来越大。然而，这段旅程却变得越来越有趣。爱丽丝身上那是什么？越来越可怕？

越来越陌生了。

——没错。我不知道，我挺喜欢的。唯一的问题是，我害怕变老——害怕精力什么的衰退。因为体力.....如果我现在还拥有年轻时的体力，我肯定能做更多的事情！但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各种小毛病已经开始出现了。但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游戏规则。我们继续玩，而且玩得很好，我很开心。最令人难过的是，一路上没有人陪伴，就是这样。在某个时期，大概是87年左右，90年代之前，还有一大批音乐家和音乐人。不知怎么的——也许是因为他们年轻——他们在经济能力上很接近，比如说，他们有能力支付自己所得到的东西。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退出了。他们因为家庭关系拒绝支付，嗯，诸如此类的原因，我也不知道.....而且现在也没有新人出现了。现在更是如此。现在这一代人，不仅仅是消费主义一代，他们简直就是.....某种寄生虫。我没看到任何有魄力、有才华的人。不知为何，这种人在日本，或者在美国却存在。

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这很难说。或许，要想做出独立而真诚的创作，你需要一个前所未有的独裁政权，而且还是外部的独裁政权，一个你不得不对其做出反应的独裁政权。天知道。我的确从中得到了外部的推动力。但内在的推动力却并非如此。我不能说自己是什么政治音乐家。总的来说，我一直以来都

对一切漠不关心，对所有这些政治现实，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它们只不过体现了一种，该怎么说呢，极权主义——不是针对人类的，而是普遍的、如同生活一般的极权主义。因为生活本身所代表的，实际上是最可怕的东西。

GrOb-Chronicles | 滚石杂志 #4 - 我知道你过去做了什么，莱托夫

莱托夫，我知道你过去做过什么。

今年秋天是“边境防御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成立20周年，也是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40岁生日。乐队发行了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A Long, Happy Life）来庆祝成立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一时刻，《滚石》杂志的一位记者飞往鄂木斯克，在列托夫最喜欢的林间空地上与他共饮啤酒。

鄂木斯克郊区。几栋破旧的赫鲁晓夫时代四五层楼的公寓楼。列托夫和妻子娜塔莉亚以及年迈的父亲住在其中一栋楼的一楼，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多年前，两间房被改造成了“民防”乐队的录音棚。录音棚里堆满了各种设备，还有近万张黑胶唱片、CD和数千本书籍。他们也睡在这里。叶戈尔以前巡演回来时，总是带回满满几箱唱片和书籍。“我几乎把所有的版税都花在了这上面。现在我觉得我已经读完了人类创造的最优秀的作品。不过，有时候我也会在网上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娜塔莉亚负责所有和电脑有关的事情。她就是那个在网上寻找“有趣东西”的人。比如最近发现的：《请杀了我》这本书讲述了朋克摇滚的历史，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是有史以来关于摇滚乐最精彩的著作。我相信它的影响会在录制下一张专辑时显现出来.....在小说方面，我喜欢奥布莱恩的《第三个警察》和奥努兰的《歌唱的拉撒路》。乔伊斯简直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工作室里常年开着两台电视，但都静音了。它们播放着两个不同的节目。如果莱托夫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他就会关掉音乐，打开其中一台电视。他主要看新闻和所谓的“非大众化”电影。他说他不喜欢《杀死比尔：最后的绝地武士》：“我对昆汀·塔伦蒂诺的期望更高。”在90年代的电影中，他特别提到了《天生杀人狂》。

列托夫很少出门。或许除了去几步之遥的森林。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就是那里——吃烤肉串，喝啤酒，聊聊民防乐队的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在森林入口附近，我们遇到了列托夫的父亲。我们打了个招呼，叶戈尔似乎浑然不觉，径直走了过去。我问他那是不是他父亲。“是的，就是他。从花园里过来的。”叶戈尔说着，便快步走向森林。这个话题就此结束。我们前往列托夫最喜欢的林间空地，它位于森林深处。步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

2004年秋季，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迎来了三件大事：9月10日，叶戈尔40岁生日；9月15日，乐队发行了新专辑；10月初，为庆祝乐队成立20周年，一场大型巡回演唱会拉开帷幕。事实上，早在1984年10月至11月，叶戈尔·列托夫和康斯坦丁·“库兹亚·乌奥”·里亚比诺夫在鄂木斯克就开始使用“民防”这个名字。至于他们是否知道两年前英国已经存在一支同名乐队——“民防”（Civil Defence），后来更名为“凝固汽油弹死亡”（Napalm Death），至今仍然活跃在乐坛，我们不得而知。

在这一重大事件发生之前，叶戈尔和库兹马以“波谢夫”（取自著名的异议人士杂志）之名为人所知，这是一个纯粹的录音室项目，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在哥哥——著名爵士音乐家谢尔盖·列托夫的指导下，叶戈尔很小就参与了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乐队的首演。然而，他并不喜欢首都的生活，于是回到家乡鄂木斯克，开始追求自己的创作梦想。

我们跋涉了很远的路, 穿过崎岖的地形, 来到我们最喜欢的白桦林中的莱托沃空地, 收集柴火, 生火, 把烤肉串在烤肉签上。埃戈尔说话有点口齿不清: “对我来说, 摇滚乐是一场运动, 它代表着性、毒品、庆祝、快乐, 它是一场摇滚革命。我们以前没有这些。我尝试过, 而且是独自一人做的。结果, 我发起了一场属于我自己的自主革命。这并非全球现象; 在这里, 我坚持着与70年代在旧金山和纽约前线的兄弟们相同的价值观。他们孤军奋战, 而我在这里代表着整个摇滚战线上的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我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 而不是周围这些小人物中的一员。这一点非常重要, 但显然没有人理解。我和库兹马共同创造的东西, 类似于MC5、地下丝绒、大门乐队、纽约娃娃等等乐队所做的。结果, 这里没人关心。没人理解, 也没人听。我们这个圈子的问题就在于, 我们的人不理解。”他们什么都不读, 什么都不了解, 什么都不听, 什么都不看。而且他们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

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朋克摇滚和车库迷幻音乐的启发, 列托夫和里亚比诺夫于1984年至1985年间, 用苏联时代的设备创作并录制了几张专辑以及大量其他作品。这种滑稽的尝试必然会引起当局的注意, 包括克格勃、内务部, 甚至还有精神病学同行和征兵人员。库兹马尽管身体状况不佳, 还是穿上军靴, 被派往著名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守卫了两年。列托夫则离开了鄂木斯克, 从而避免了服兵役和被送进精神病院。1987年, 他在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上惊艳亮相, 与来自鄂木斯克的同志们一起举办了一场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演唱会。在那里, 他结识了西伯利亚地下摇滚圈里或多或少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正是在同一时期, 他遇到了扬卡·迪亚吉列娃, 她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 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他并肩作战。扬卡帮助他逃离了西伯利亚。他们在每个主要城市都留下了专辑和录音, 这些唱片立刻被大量抢购一空。不久, 消息传来, 他们可以返回西伯利亚, 而不用担心被监禁或送进精神病院。1988年春天, 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再次回到新西伯利亚, 进行了电声演出。每到一个城市, 乐队都受到了爆满的狂热歌迷和无助(却又暗自愤怒)的共青团员及便衣警察的热烈欢迎。

大约在同一时期, 即20世纪80年代末, 名为“共产主义”的录音室项目录制了15张专辑。这些专辑收录了复员民歌、街头歌曲、列宁的演讲、关于革命的广播剧, 以及列托夫、扬卡、库兹马等众多音乐家的原创作品。该项目的宗旨是: “打开它, 看看——里面蕴含着概念主义!”

我们在森林里找到一棵巨大的倒树, 坐了下来。莱托夫解释了他为什么拒绝在城里拍照: “在城里, 我觉得自己像个动物, 像个装在轮子上的棺材, 但在森林里, 我才像家一样。”他有时会离家出走, 在森林里住上几个星期。我问他是否考虑过离开城市, 搬到乡下。“我想过, 但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可行。”他的妻子娜塔莉亚催促我们回到篝火旁——烤肉串已经烤好了。莱托夫继续讲述他对森林的喜爱, 尤其是对这片空地的喜爱: “从学生时代起, 这里就是我最喜欢的地方。16岁那年, 我在这里经历了一次神秘的顿悟。一道闪光过后, 我感觉有人打了我一巴掌, 一个声音告诉我: ‘他们打了你的左边——向右转。’”我躺在地上很久, 完全懵了。从那以后, 我改变了很多。

1990年4月, 正值“卫士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 人气巅峰之际, 叶戈尔宣布乐队解散。随后, 他立即返回鄂木斯克, 几乎独自一人为他的新项目“叶戈尔和童子军”(Yegor i pizdenevshie) 录制了专辑《童谣》(Pryg-Skok)。显然, 1990年这个项目的名字完全行不通——无论是媒体、公开发行还是大规模发行。唱片制作人甚至拒绝以这个名字压制专辑。但列托夫并未气馁, 他想出了一个绕过工厂管理层的办法。他订购了印有“童谣”(Pryg-Skok) 字样的黑胶唱片封套, 并单独印制了印有乐队名称的贴纸。这导致了西伯利亚发生的一件趣事: 一些唱片运到时竟然没有贴上贴纸。《新西伯利亚真理报》刊登了一位愤怒读者的来信, 内容大致如下: “我在一家唱片店里为侄子挑选生日礼物。我看到并买了一张名为《童谣》的唱片。回家后,

我放给孩子听，结果听到一个醉汉嘶哑地唱着下流的歌。我试图退货，但商店不肯收。我呼吁大家——不要重蹈我的覆辙！”这段时间，列托夫几乎足不出户，和为数不多的朋友谈论着文明的终结，谈论着这个“不配被拯救”的世界。“是时候结束了，”他说，“反正也没人需要这一切了。既然已经做了，我们就应该像战败的士兵一样，体面地离开战场。”1991年春天，他得知扬卡失踪了。寻找她的过程漫长而艰辛。直到《共青团真理报》记者尤里·谢科奇欣（现已去世）致电新西伯利亚州内务部部长后，警方才开始介入。5月17日，当地渔民在鄂毕河支流伊纳河中发现了扬卡的尸体。

这些以及随后的事件——1991年8月的莫斯科事件、12月苏联解体等等——促使列托夫组建了一支乐队，取名为“叶戈尔和那些混蛋”（*Egor and the Fucked Ups*），并在1991年至1992年间录制了专辑《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谈到这张专辑，列托夫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写作：“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一个全新的存在，整个世界。我对现在的自己并不感兴趣。我非常了解自己，彻底地了解自己：我有多糟糕，多天才，多伟大，又有多卑鄙无耻。当我成为某种媒介，某种渠道时，我才变得有趣。当然，主要是在写作的时候。因为演唱会也是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的演唱会非常疯狂，连*The Stooges*乐队都做梦都想不到。”虽然我一直很尊重伊基·波普。他总体来说演奏得很好，尤其是在他晚年和最新专辑里，他简直太棒了……早期“*Oborona*”演唱会的审美在一首歌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可惜不是我的歌，而是伊基的《我需要更多》（*I Need More*）。我永远都觉得不够。我总是需要更多。但我发现，人们并不喜欢那种演唱会。他们希望一切都演奏得完美，演唱得精彩。好吧，我们演奏、演唱，做任何事都充满激情。但我也会举办一些完全没有音乐的演唱会，一切都会与众不同。但人们不理解这种东西。”我记得莱托夫曾经说过，他很少被人真正理解。“确实如此。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有十五到二十个答案。而且通常，有些答案是相互矛盾的。与此同时，我内心的一切却和谐共存。对于每一个问题，我都能立刻看到一道彩虹般的答案。我不是非黑即白的人。我是五彩斑斓的。”“我是蓝色的，棕色的，红色的，粉色的，浅蓝色的。”“但我或许不该说‘蓝色’？他们可能会误会，”我提醒莱托夫，成千上万的粉丝可能会觉得“蓝色莱托夫”这个说法很奇怪，说得委婉点。“让他们想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这种多样性源于经验。我可以是任何东西——美味的，甜美的，等等。只是我体内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我’，它们彼此契合得很好，但对周围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悖论。今天我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实际上，我说的始终是同一件事——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你不觉得自己老了吗？你不介意自己变老吗？”“不，恰恰相反——介意的是我没变，而他们却变老了。我身边的人变老了，我和他们沟通变得越来越困难。”

1993年10月事件后，列托夫投身政治。他与秋明“生存指南”组织的罗曼·纽莫耶夫共同创立了“俄罗斯突破”运动。随后，刚刚创立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爱德华·利莫诺夫和亚历山大·杜金也加入了他们。1993年12月，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行的首次抗议活动名为“行动指南”，最终演变成一场大规模街头斗殴。事实上，就在“民防”组织宣布重组并进行演出前不久，狡猾的组织者在未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广告宣传活动，包括电视广告，并售出了近万张可容纳800人的演出门票。随后，在白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们成功地洗劫了售票处，卷走了所有钱款。随着演唱会临近预定开始时间，成千上万愤怒的歌迷，渴望见到他们的偶像，开始冲击文化宫。窗户破碎，脱轨的电车撞向墙壁，很快，英勇的防暴警察赶到增援。枪声和混乱爆发；如果当时有坦克，这里简直就是迷你版的苏维埃大厦。音乐家和支持者在警卫的护送下，分区域撤离了建筑物。

下一次丑闻发生在1994年5月。叶戈尔·列托夫在“A”节目中发表政治声明，实际上是在号召武装起义。据悉，节目播出期间，电视台接到总统办公厅的数个电话，要求停止演出。但当时的权力结

构与现在截然不同,“民防”音乐会一直持续到最后。此外,在最后一首歌——翻唱的《列宁还年轻》——演奏期间,摄像师举起镜头,向全国展示了一面巨大的白俄罗斯国旗在舞台上空飘扬。音乐会组织者后来回忆说,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询问何时可以领取武器。列托夫政治活动的最后几个片段之一是他1997年访问明斯克。在那里,他身着全套制服,受到一群白俄罗斯民族联盟青年和一位身着白俄罗斯民族服装的女孩的迎接,女孩手里拿着面包和盐。会面几分钟后,一辆警用UAZ越野车停在了列托夫和这些年轻人面前。一名白俄罗斯警察少校走近旗手(旗帜上自然印有俄罗斯民族联盟的标志),厉声喝道:“你拿旗拿得怎么样? !别歪了!拿直了!”说完,少校上了车,消失得无影无踪。同年,列托夫决定与他之前合作过的政治势力划清界限。1997年春,他的新专辑《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发行。

莱托夫回忆起那段时期,心情并不愉快:“1997年的专辑之后,我感觉自己完全陷入了创作的瓶颈,创作自然而然地停滞不前,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后来我把弟弟谢尔盖拉进乐队,我们改变了形象和音乐风格,录制了一张非常棒的专辑《星落》(Starfall)。”这张专辑由莱托夫与前卫爵士音乐家谢尔盖·莱托夫合作完成,全部收录了莱托夫最喜欢的苏联时期歌曲:维索茨基、奥库扎瓦、安恰罗夫的作品,苏联战争电影的歌曲,甚至还有电影《不来梅城的音乐家》中的《太阳会升起》。至于普京、垂直权力结构、“寡头之间的等距关系”等等,莱托夫避而不谈:“政治对我来说几乎没什么吸引力。至少不像以前那样了。”

我们吃烤肉串,喝啤酒。正如列托夫所说,“我们只喝啤酒。”不久前,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实行了禁酒令。巡演期间,他们甚至不喝啤酒,只喝水和茶。不过,那段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他们什么都喝。我一边喝着另一瓶啤酒,一边想起切尔尼·卢基奇的瓦迪姆·库兹明最近跟我讲的一个故事:鲍里斯·莫伊谢耶夫带着一个17岁的男孩去看了乐队的演唱会。演出结束后,莫伊谢耶夫走到库兹明面前,和他握手,说:“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你们的音乐!”叶戈尔哈哈大笑了半分钟。“没错!我们也听流行音乐。我们收藏了ABBA和柳贝的歌。”“如果VIA Gra或者莫伊谢耶夫来看你们的演唱会呢?”我问道。“让他们来吧。流行乐坛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感到非常有趣。我最近看了伊万努什基的演唱会,我开怀大笑——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但摇滚乐坛却令人沮丧。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任何有趣的东西。这让我感到难过和沮丧。我又一次不得不独自承担重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行动指南。应该会有追随者,但却一个也没有。我指的不是那些重复我做过的事情的人,而是那些以此为基础,带来新东西的人。即使是用电脑技术制作的,我也会欢迎。我不是个守旧派。”对俄罗斯当代音乐的现状感到失望的列托夫,转而投身于他真正感兴趣的事物——足球。“我彻底放弃了足球;我的整个童年都泡汤了。我以前的生活就是踢足球。我以前是中场和组织核心,进过很多球。当然,我现在不踢了;我有其他事情要做。对我来说,足球不是一项运动,它是摇滚乐、朋克摇滚、极端艺术、哲学和政治。它是某些国家、群体和人类共同领域中两种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一场小型战争。职业足球迷中有一个词叫“库兹米奇”(Kuzmich),指的是那些支持赏心悦目足球的人,无论他们支持哪支球队。我甚至不支持任何球队,我支持的是足球本身。”

我们继续深入森林,莱托夫的话题也从足球这项运动转向了足球的哲学:“我想成为一名中场球员,像斯梅尔廷那样在球场中央驰骋。我宁愿做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或创造者。但我这辈子不得不与众不同。我必须站在进攻的最前沿,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因为没人愿意做任何事。不幸的是,我们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我们的人民懒惰无能,毫无价值,一旦出现一些聪明的小人物,他们立刻就会被当作富农和吸血鬼对待。他们当场被杀,然后被哀悼、忏悔,被殴打。这一切永无止境。”

如今，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或许拥有了他们最强大、最专业、最团结的阵容。至少，列托夫本人是这么认为的。最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正是由这套阵容录制完成的。“我们实际上录制了两张专辑，”列托夫说道，显然很享受谈论他的最新作品。“《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和《复活》。这两张专辑实际上是一部迷你歌剧的两个部分，共28首曲目，每张唱片14首。但它们彼此不同，就像左右声道，或者大脑的左右半球一样。它们甚至在精神层面上也应该有所区别。但作为一个整体，它是一部完整的作品，展现了一种极端的状态。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创作了这些素材。介于地狱与天堂之间，介于天堂与可怕的污秽之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激情状态，一种感官的、能量的、精神的、心理的、生理的、心理的噩梦。28种视角下的同一事物，同一个人28种不同的心境。”在创作某些作品时，我必须达到极致的精神境界，甚至体验到濒死和死后的状态。歌曲《复活》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创作的，当时我又一次在那里。他们把自杀者抬进来，把尸体抬出去，有人临死前说了些什么，然后你一看——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被裹在床单里，放在入口处，你走到走廊，他们就那样堆在那里，躺着。有个士兵临死前说了类似的话，舒克申只是安息了——那是多么伟大的诗篇，我从未听过如此动人的话语。我坐下来，尽可能地把所有感受都记录下来。突然，我想起了什帕利科夫有一部电影叫《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但这首歌的创作缘由却截然不同，也是在经历了一次“复活”之后。当时的情况是，继续喝酒、吸毒等等都变得不可能了，因为那只会让我、我的朋友和我的亲人走向死亡。我设想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会怎样。于是我写了一首极其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歌：“漫长而幸福的人生/没有假期/每天都是假期/那将是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真是太可怕了。

GrOb-Chronicles | Hammer - 致命结局

致命后果



真正的朋克几乎绝迹了——他们要么死了，要么转型流行乐，其实两者几乎没什么区别。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虽然每天都酗酒，但依然活跃在乐坛。他接受了Molotok（Molotok）的采访，回答了一些曾经向The Clash和Sex Pistols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个比较不同朋克乐队，看看他们的想法是否都一样的机会。

——你的歌曲可以被字面理解。你觉得你肩负着这样的责任吗？

“我负责创作作品，并将它们送到世人面前。我创作它们时，会根据我的感受和感知——或者说，我的无知——做到精准完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只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这让我既着迷又觉得好笑。你可以用铲子挖出什么东西，或者反过来，把它埋起来，或者你可以把亲人砍成碎片。那么，沃纳·赫尔佐格是否应该为伊恩·柯蒂斯（Joy Division乐队的主唱，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看完他的电影后上吊自杀这件事负责呢？

— 你的歌曲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评论，还是你想改变某些事情？

“任何行为本身——创造，尤其是传播——都会不可逆转地改变整个世界，无论你是否愿意。你只能在内心深处，以一种沉默的方式，仿佛‘自言自语’，对某些事物发表评论。”

——莫霍克发型是真正朋克的必备标志吗？

“对我来说，朋克形象和莫霍克发型就像独自一人漫步在乌留平斯克，而不是在莫斯科市中心或派对上。这就像在德克萨斯州的偏僻小镇里不戴帽子闲逛，或者在某个穆斯林国家，一个女人不穿罩袍去看足球比赛一样。”

— 你如何看待“商业音乐”？

所有音乐都是商业性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你会从中获得回报——例如，自信、活力、理解等等。而“非商业主义”的极致表现就是呆坐在黑暗的深渊里，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展现，尤其是在无事可做的时候。只是这个世界上有美的也有丑的，有用和无用的。所有美好而精

巧的事物往往都受人喜爱。人们会听好的音乐，无论它多么复杂或原始。但糟糕的音乐——就没那么受欢迎了。比如，我会听好的音乐，我不在乎是谁创作的，出于什么目的，也不在乎它是否是为了赚钱。

莱托夫在听什么？

最早让我印象深刻的唱片是The Who的《My Generation》和滚石乐队的《Satisfaction》。之后我听过很多垃圾和半垃圾的歌，比如性手枪乐队和雷蒙斯乐队，但我至今还没遇到过像Seeds乐队或Stooges乐队那样原始、愤怒的摇滚乐。我能说出很多现代摇滚的名字，但我依然来自那个狂野、原始的六十年代。

同伴 #11 (509) — 地下二十年，还是“漫长而幸福的一生”？

《民防》：

地下20年，还是“漫长而幸福的一生”？

俄罗斯朋克运动的先驱、邪典乐队“民防”的领军人物叶戈尔·列托夫打破了他的“沉默誓言”，在乐队成立 20 周年暨新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发行前夕，接受了《罗维斯尼克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能否重点介绍一下GO乐队二十年历史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很难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直都在发行专辑。事实上，乐队本身就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除了GO乐队之外，我还参与过一些其他项目和制作工作。

“你为什么需要那个？”

”“我相信真正的摇滚乐是一种全球性的革命，它必然会伴随着一场普遍的运动。既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运动，我就决定自己创造一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文化现状并不需要它。意识到这一点后，我退后一步，专注于自己的创作。因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以及像我一样的人。”

——你觉得GO乐队的生涯算幸福吗？

——嗯，是的。我们的命运当然坎坷，但这是我们为取得的成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我们亲力亲为的。我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原则：任何真正的创造力，无论是原始主义、未来主义等等的艺术，都必须亲力亲为。独立艺术和朋克的主要准则就是“自己动手”。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没有人理解或接受这一点，但在我工作的这些年里，我身边有很多才华横溢的人，他们除了等待制作人、设备或独立厂牌的出现之外，什么也没做……结果，乐队解散了，人们要么染上毒瘾，要么自杀。我和我的同事 Kostya Ryabinov（艺名 Kuzma）一起，利用手头的一切资源——一台 Olimp 录音机、一些自制设备……进行创作、录音、巡演，现在我们代表着全国唯一的独立音乐团体 GrOb Records。

——当时体制对我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吗？

——1985年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不仅仅是迫害，而是实实在在的镇压。克格勃开始在大街上殴打民众，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等等。但在那个危急时刻，我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有某种坚不可摧的东西。你可以死去，但一切都不会改变；你的内心会变得像石头一样，永恒不灭。从那时起，我平静下来，继续创作。到了1986年，库兹马被送去服兵役，前往一片令人胆寒的草原——拜科努尔，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都签署了一份保证书，承诺在受到刑事起诉的威胁下，不会与我有任何瓜葛。但这也有好处。因为在短短六个月内，我学会了除了键盘以外的所有乐器，并且连续创作并录制了五张专辑。

“你从小就性格坚强吗？”

”“是的，大概吧。我一直想弄明白周围的一切是如何运作的，文明是什么等等，为此，我愿意付出一切：孤独，各种各样的日常损失。我对所有与非理性、反常的意识状态相关的事物都感兴趣。《GO》所做的，正是一场非理性的反叛！”

“GO”演唱会的气氛各不相同。有时平静祥和，有时却会爆发丑闻，甚至引发歌迷之间的冲突。你心目中完美的“GO”演唱会是什么样的？

“就像MC5、The Stooges、New York Dolls、Velvet Underground那样。”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发现摇滚乐的吗？

——记得。我大概八岁的时候。我哥哥（萨克斯风手谢尔盖·列托夫——编者注）从新西伯利亚来，带了几张唱片。他自己并不听摇滚乐，纯粹是出于商业目的——他把披头士、谁人乐队和Shocking Blue的唱片录下来，每张三卢布——这是学生的副业。后来我偶然听到了谁人乐队1966年的专辑《A Quick One》，它彻底改变了我。我意识到这就是我的摇滚乐，这才是真正的摇滚。直到今天，谁人乐队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

——众所周知，你年轻时听过各种各样的音乐，从The Doors到Sex Pistols。现在呢？

——我仍然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但我最喜欢的是60年代的车库迷幻摇滚。我是这方面的专家。事实上，我们演奏的就是这种音乐——车库迷幻朋克。

在你看来，音乐界有没有特别重要的人物或权威？

其实没有权威，因为做任何事都必须做到最好，否则就毫无意义。我组建乐队的时候就定下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成为最棒的乐队，无人能及。要想独树一帜，就必须时刻关注音乐动态。我们听成千上万张唱片（从民族音乐到前卫音乐），读大量的书籍，看无数的电影……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文学作家？

——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托诺夫、亨利·米勒、巴别尔、安部公房。太多了。

——一个人经历会影响我的工作吗？

——我从未感受到任何外界影响。我有很多亲密的好朋友。我和扬卡合作了很长时间……但坦白说，我不太想谈论我的私生活。就让它成为传说，一个秘密吧——这样更好。

——你是否认为摇滚乐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失去了本质？

——不。现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有很多很棒的乐队在演奏噪音和噪音朋克。只是我们这里的人还不知道而已。

“你为什么和俄罗斯摇滚明星保持距离？

”“根本没有俄罗斯摇滚！我们国家没有毒品，没有性，也没有政治自由，根本不可能出现那种音乐。对我来说，Aquarium、Dune、Kino、Korni、Chaif和Doctor Watson都一样。俄罗斯摇滚的水平和俄罗斯足球差不多……”

——你通常如何创作歌词？

——这就像寻找一种意识状态的转变。当“寻找”成功时，你会进入一种恍惚状态，仿佛成为某种媒介，然后一股巨大的音乐洪流会涌入你的体内。你甚至没有时间把它写下来。然后，歌词的创作才真正开始。

——新专辑《漫长幸福的人生》里有没有你最喜欢的歌？

——很难说。不过在我最近制作的所有专辑里，这张是最好的。它是一张概念专辑，就像平克·弗洛伊德的《迷墙》一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漫长幸福的人生》，第二部分是《重生》。这两部分加起来，从28个不同的视角探讨了人类意识的同一状态。这是我做过的最全面、最完整的专辑。

— **GO**在没有媒体支持的情况下获得如此高的人气，这真是令人震惊。对此您有何感想？

— 真正的文化总是潜藏在地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终都会被世人所知。而我们没有被公开报道或播出，这其实是件好事。因为我绝对不想参与到这种流行文化中去！

——这种名气会不会影响到你？

——确实会影响我的工作。我不在书桌前写作，我都是边走边写。为了集中注意力，我会去散步。但如果有人在散步的时候认出你，然后缠着你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或者要签名，那就很让人沮丧。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住在森林里。也许，在我生命的尽头，我会搬到加拿大或者其他什么人烟稀少的地方。

——回到**20**周年纪念的话题，不知道乐队会不会庆祝？

——最近我决定不再庆祝节日了；我甚至为此写了一首歌，叫《Kill》。我不喜欢被强加日期。节日应该随心所欲。为什么新年不能在7月8日庆祝？为什么我非得在3月8日而不是5月15日送我妻子鲜花？不过，如果大家想庆祝我们的**20**周年纪念，那就随你们便吧。或许我们可以组织一场演唱会，邀请**GO**乐队历届阵容中所有健在的成员参加。

——你会对那些忠实聆听“**GO**”的人说些什么？

——尝试创造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东西，与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同，而且——除了你自己之外，不要服从任何权威。

采访者：V. SHMERLING

棺材编年史 | 摇滚目标 #2 - 叶戈尔·列托夫: “我们国家什么都不会改变, 也永远不会改变.....”

埃戈尔·莱托夫: “我们国家什么都不会改变, 也永远不会改变.....”

一个半月前, 媒体试图编造一个关于虚构的光头党在杜布纳-莫斯科通勤列车上袭击一支可疑朋克乐队的虚构故事。

警方成功地避免了抓捕任何人: 莫斯科朋克乐队“Tushka”和“Teni Svobody”于4月3日星期日深夜从杜布纳返回。火车上除了两位乐手外空无一人。在其中一个车站, 两名男子上了车。

“我当时就觉得他们看起来真像侦探!” 鼓手丹尼斯·鲁巴诺夫说道。“他们四处走动, 明目张胆地偷听我们说话。然后他们走到车厢前厅, 叫人过来。到了特鲁多瓦亚车站, 他们迅速消失了, 大约二十个裹着围巾的光头党混蛋冲进了车厢。没人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纳粹分子拿着铁棍、撬棍和钢筋, 扑向人群, 开始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他们。”

“我们的贝斯手弗拉德·塔拉索夫当时正在睡觉, 那群混蛋就冲进了车里,” 丹尼斯回忆道。“他还没来得及醒来! 其中一个暴徒用一根钢筋砸中了他的头部, 冲击力把半辆车都弄得血肉模糊。弗拉德昏倒在地。那些纳粹分子又扑了上来。他们只打他的头。”

警方直到两个警局之后才抵达洛布尼亚。被打的音乐家们被送往当地的重症监护室。他们大多手臂骨折, 头部受伤。“图什卡”和“什柳兹”乐队的贝斯手弗拉德·塔拉索夫伤势最为严重。他因头部开放性伤口被送入医院时处于昏迷状态。目前尚不清楚受害者是根据哪些标准或特征将袭击者认定为光头党而非流氓。例如, 莫斯科正在发生数百起斗殴事件, 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的几位议员也被剃光了头发。与此同时, 这场抗议活动似乎与苏联摇滚老偶像与总统办公厅的会面以及由M·科济列夫及其电台领导的反法西斯运动的成立不谋而合。纳什电台就今年4月3日发生在杜布纳-莫斯科通勤列车上的事件, 特别是据称由“纳粹暴徒”实施的莫斯科朋克摇滚乐手遭到残酷屠杀和殴打一事, 采访了摇滚乐手们。叶戈尔·列托夫没有出现在电台节目中, 但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叶戈尔·列托夫谈到杜布纳-莫斯科通勤列车上的事件时说:

“我们在 1986 年创作了一首很棒的歌来描述这件事, 歌名叫《爱国主义浪潮》。我活得越久, 就越确信我们国家的一切都没有改变, 也永远不会改变。在我记忆中, 总有所谓的“爱国”运动, 把一群乌合之众聚集起来。以前是共青团、柳伯尔人, 后来是各种各样的民众爱国运动, 比如“记忆”社。现在是光头党, 各种各样的“携手同行”组织.....对我们国家的其他人来说, 唯一的生存状态就是一个行囊。你无法在这里生活。你只能战斗、生病、苟活, 在战斗和失败中挣扎求生。这里没有明天。你随时可能被殴打、抢劫, 甚至被扔出火车窗外.....一条新法律可能突然颁布, 你的一切就可能被剥夺。你随时可能被监禁, 甚至未经审判就被处死。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宇宙重组计划, 以及荒谬的宗派主义.....人们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自杀之类的念头。所有人的思绪都不再是平静有序地生活, 而是想方设法逃离这里, 要么出国, 要么去针叶林, 要么隐居山林, 要么去另一个世界, 甚至去另一个维度。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残酷无情的试验场。一旦你来到这里, 就必须接受游戏规则.....如果你不屈服, 你就是永远的英雄; 如果你屈服了, 那么你就消失了, 仿佛从未存在过。

最后，我想指出，网上有很多报道声称“一些酷似光头党的人受雇于对这起事件最为愤怒的人，目的是为推动一场新的青年运动（N.....）创造有利环境”。最先上当受骗的是受害者本人，以及其他一些朋克摇滚乐队。这些乐队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声援在4月3日杜布纳-莫斯科通勤列车袭击事件中受伤的音乐家。音乐会的演出乐队包

括“TARAKANY!”、“TSUNAMI”、“PRAZNIK”、“SHLYUZ”、“DERGAT”、“FIGI”、“VSE STROLY”、“UL'I”、“NOGI VINNIE-PUKHA”、“TENI SVOBODY”和“IN REFLECTION”。他们整晚都在狂饮啤酒，高声谴责那些可恶的光头党。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从中获利，又是谁的利益所在？有人巧妙地利用这场混乱，成功地进行了公关宣传。在国家杜马自助餐上，只要买一瓶啤酒，你就能轻易查到是谁袭击了唐吉诃德·利莫诺夫的总部，以及袭击的时间——是谁下令的，谁付的钱，付了多少钱，以及哪个暴徒参与其中。

Rock-Pricela 的编辑人员至今仍未弄明白这三重诡计的公关手段。



你可以尊重围棋界所做的一切.....尽情享受列托夫的活力吧.....你可以尽情批评他——但没有任何观点是正确的.....他太有个性了.....列托夫要么被人憎恨，要么被人爱戴.....他总是充满活力，永不停歇.....就像列宁一样.....幸好他还没变成普加乔娃.....

为庆祝乐队成立20周年，Mystery of Sound唱片公司发行了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备受期待的专辑《Dolgaya schastlivaya zhizn》（漫长而幸福的人生）。该专辑有两个版本：豪华版收录了两支在乐队于戈尔布什卡举行的春季演唱会上拍摄的完整版MV。

Chronicles | 反应 #13 – 坠入莱托夫

我们流入莱托夫

（2005年5月25日采访完整版，包含未公开的回答）

愿演艺事业与我们同在。

圣彼得堡一家气氛暧昧的夜店里，GrOb乐队正在演出。一位身手敏捷的武术爱好者突然跃上舞台，一记直勾拳将叶戈尔·列托夫击倒在地。所有人都惊恐地愣住了。随后，不知何故，这位运动员迅速跳入观众席，粉丝们开始疯狂地“围殴”他，下手之狠，以至于不得不叫救护车。

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的新专辑《Reanimation》的发布会以这位神秘的空手道选手被送进重症监护室而告终——真是妙语连珠，无力回天。



两年来，关于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所谓失去边缘地位以及与“一切按计划进行”的体制彻底疏离的讨论甚嚣尘上。乐队受邀参加摇滚音乐节、电台节目、电视节目和时尚杂志的拍摄。但莱托夫（Letov）依然“反对”这一切；他就像一个“魔钩”，让人无法捉摸，尽管在他的一首新歌中，他承认自己已经“上钩”了。当公众欢庆放松时，莱托夫提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案：“消灭，消灭所有这些节日——那些官方宣布的、规定的、受人追捧的、大众普遍庆祝的姜饼节！”

在你们最近的专辑中，你们开始非常注重音效，尽管你们之前说过乐队的重点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传达某种信息。你们的演变可以与**The Stranglers**乐队的演变相提并论吗？

——声音始终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早期的录音中。声音和所谓的编曲。最近，这一切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无需任何其他手段就能奏效。我们从未刻意传递任何“信息”；我们根本不在乎这些。此外，我们是一支非常注重音乐性的乐队，只是风格迥异，无法用俄罗斯的现实来理解和衡量。我们过去、现在、将来都与The Stranglers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话说回来，为什么是The Stranglers？为什么不是Throbbing Gristle？或者滚石乐队？The Stranglers在《No More Heroes》之后就被人们遗忘了。

你的一些录音作品已经在西方发行了。你知道有哪些人会在听不懂歌词的情况下听你的歌吗？

“它们被出版了，很多时候我都不知情。各种世界朋克音乐合辑至今仍在发行，其中就收录了我们的作品。我通常不太关心我们录制完成后作品的去向：谁会听，他们从中发现了什么。概念主义者称之为空洞的行为。归根结底，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自己。也就是说，为了尽可能多的像我一样的人。我之所以发行它们，是因为我遵循着‘索取-回馈’的原则。也就是说，出于对无数其他创作者给予我的感激之情。”

— 请谈谈您对美国和以色列之旅的印象——它们是什么样的文明？您在哪里感觉最有家的感觉？

“这说来话长，现在很难描述。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在那里感觉比在家里舒服快乐得多。”

许多著名音乐家抱怨在家无法放松，在国外更容易做到。你有多恋家？

“嗯，确实如此。问题是，我天性并不好战。我更喜欢创造，更喜欢行动，而不是攻击或反击。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现实是，在这里你必须生存下去，并承担生存的一切后果。这与名气大小无关（通常来说，出名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仅仅在于与众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家乡，我感觉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森林、山脉、田野等等——最自在。”

我曾偶然旁听过一场关于奥菲莉娅是否与尤里·奥列沙的小说《嫉妒》有任何关联的讨论。请自行判断。

“不，并没有。奥列沙的书很好，但我读这本书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什么都不记得了。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影响，那就是我在写一篇完全不同的文章——关于列宁格勒围城战——时，突然想起了约翰·埃弗里特·米莱的画作《奥菲莉娅》。”

— 当今世界的年轻人如何才能识别出用来吸引人们上钩的“神奇鱼钩”的诱饵呢？

“我无法评价任何年轻人，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发言。”

如何调和熵整体的理解与对“新太阳”的期盼？是什么赋予人力量？

“1989年，在‘共产主义’时期和‘俄罗斯实验场’研讨会期间，我对熵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此后我再也没有重新思考过这个问题。“什么赋予你力量？”是一个非常个人化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乐队官网显示你们拒绝参加大型摇滚音乐节。这是出于原则问题，还是主办方提出了无法接受的条件？

“我通常很不喜欢在音乐节上表演，尤其是大型音乐节。哪个音乐节都一样。最令人沮丧的是，你不可避免地需要和任何人互动。而且通常情况就是这样，因为任何音乐节都是一场大型聚会，而

这正是音乐节的意义所在。”

——告诉我，在你看来，生活中哪些节日才是真正的节日，而不是像《杀戮》中提到的那些姜饼节之类的节日？

- 自发的。

——音乐会曾经是一种具有特殊魔力的仪式活动。艺术如今是否仍然保留着这些特性？

- 是的。

与以往一样，GO乐队的潜在听众对乐队现状及其新专辑《Reanimation》的看法褒贬不一。以下是一些最具代表性和最引人入胜的观点。

来自听众叶夫

根尼·瓦辛（**Evgeny Vasin**），莫斯科国立大学研究生，24岁：

对于“民防”乐队来说，这是一张技术性极强的专辑：音质出色，噪音极低，没有嘶吼，乐队成员配合完美，歌曲标题也选得恰到好处，歌词和过渡部分也颇有可取之处。但我在这里想谈谈别的。我喜欢列托夫（Letov）的愤怒，他灵魂深处的狂怒，以及他那些不规则、沉重、令人疯狂却又优美的歌曲——这些歌曲由马尔多罗尔（Maldoror）创作，一个半世纪后才被谱成曲子。而这些在这张专辑中完全缺失。我不会再听第二遍《复活》（Reanimation），而且很快就会忘记第一次听过它。

来自同事

伊戈尔·克尼亚泽夫（**Igor Knyazev**），“奥沃什奇”（**Ovoshch**），“格里比”（**Gribby**）乐队主唱

：我不太可能听莱托夫的歌，因为我跟他那种后苏联时代的“政治诚实”美学格格不入，而莱托夫先生却以一种近乎粗俗的方式大肆宣扬这种美学。至少在1990年的时候是这样——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我一点也不觉得好笑。我已经知道“我周围的一切都很糟糕”——我只需要抽几口大麻或者宿醉醒来就明白了。

来自闲散观察者：

莫斯科回声电台的亚历山大·普柳舍夫，

《民防》节目的主持人？他们从来没真正让我兴奋过——好吧，我又能怎么办呢？我也不会邀请他们上我在莫斯科回声电台主持的音乐节目《Serebro》。我们尽量选择能引起我和我的搭档德米特里·鲍里索夫共鸣的音乐人。也许他们甚至会让我们感到恼火，但至少他们能带来一些情感，足以引发讨论。此外，我一直认为地下音乐就应该保持地下状态，广播应该面向主流。现在他们被大力宣传，这无疑会摧毁他们作为地下音乐领军人物的地位。

伟大的记者伊戈尔·弗拉基米爾斯基

说：正如今人难忘的法伊娜·格奥尔基耶夫娜·拉涅夫斯卡娅常说的那样，人生是一场从阴道到坟墓的漫长跳跃。民防组织所做的一切，本质上都与此有关。与生与死有关。从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垂死的呻吟。叶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在“永恒之春”的单独监禁中，与奥普……希赫们一起嘶哑地死去。他抽搐了一下，然后就安静了。虽然……也许我把死亡和性高潮混淆了。因为那时，就像离别时那支甜美的香烟，一颗刺骨的星辰坠落，直到喉咙哽咽。

漫长而幸福的一生，最终却不再是生命，而是一具尸体，在解剖室里慢慢冷却。尸体又有什么用

呢？或许宿醉时，可以把额头贴在冰凉的东西上。但当腐朽开始，就别再执着于它了。你必须逃离。

复苏？不.....更像是开棺验尸。

来自《RE:AKTSIYA》报的

艾拉特·达什科夫写道：

鄂木斯克最著名的乐队——他们奉行不在鄂木斯克演出的政策——每次发行新专辑，都会引发千篇一律的评价：“一如既往的精彩”、“唉，他们已经变味了”、“还不错，但他们以前更酷”。这些评价仅仅反映了作者对《民防》一书无可辩驳的真相的理解程度：列托夫全部作品的核心信息无法用俄罗斯摇滚或朋克文化的语境来理解，因为它超越了这些文化的范畴，更接近形而上学，而非左右翼激进意识形态。那些把列托夫的诗歌当作德语动词变位教科书翻译的人无可救药；形而上学不适合大多数人的理解，所以大多数人诉诸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试图贬低一切难以理解且“不够人性化”的事物。

突击队员A. Andryushkin被民防部门开除。

“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发表官方声明，宣布鼓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退出乐队。从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民防”乐队经历了多次人员变动，但唯一不变的是个性鲜明的安德留什金，他为这支来自鄂木斯克的乐队的音乐和形象增添了许多独特的元素。

2005年7月4日，“民防”官方网站gr-oborona.ru刊登了以下声明：“公民A. A. Andryushkin出于某种原因，认为‘民防’成员禁止接受电视媒体采访的规定不适用于他，并固执地坚持其有损团体形象的妄想，因此被开除出团体。我们要求不要将他那些所谓解释我们工作和立场的无稽之谈与‘民防’的活动联系起来，因为Andryushkin先生本人现在是一名乐手。仅此而已。叶戈尔·列托夫。”

在这种情况下，亚历山大·安德留什金并非完全失业。6月11日，这位音乐家将在莫斯科的Zapasnik俱乐部推出他的个人项目“飞鱼水下音乐乐团”，该乐团将由GO乐队主音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和著名吟游摇滚艺术家切尔尼·卢基奇共同组成。音乐会上，“飞鱼”乐团将演奏电影《那个蒙乔森》、《你从未梦到过》、《布拉提诺历险记》、《小红帽》、《钢琴上的狗》、《金银岛》、《胡子保姆》、《隔离区》以及摇滚歌剧《华金·穆列塔之星与死亡》和《朱诺与阿沃斯》中的歌曲。除了安德留什金的项目外，在知识分子地下音乐圈中已颇具声望的乐队“BCK”也将在音乐会上演出。

朋友互助 #39 (573) — 与民防队共度的一天

与民防部门共度的一天

一周前，叶戈尔·列托夫在库尔斯克举办的演唱会只是他巡回演出的一部分。下一站是沃罗涅日，两地之间间隔几天。于是，9月20日星期二，这两位“俄罗斯摇滚传奇”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一位DDD通讯员担任了他们的导游。

列托夫的妻子穿着拖鞋在库尔斯克四处走动。

叶戈尔·列托夫本人与歌迷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形象截然不同。他身穿深色夹克，头戴棒球帽，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看起来甚至更矮了。我想即使是最铁杆的歌迷也未必能在人群中认出他。我当时正在十月酒店的大堂里等乐队成员，如果不是他们的经纪人谢尔盖·波普科夫迅速地介绍我们：“这位是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和娜塔莉娅。这位是伊琳娜，我们今天的‘导游’。”我可能也认不出他。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就是叶戈尔·列托夫。娜塔莉娅是他的妻子，也是乐队的贝斯手。娜塔莉娅或许看到了我惊讶的表情，笑着说：“我的鞋子拿去修了，所以现在只能穿拖鞋。真是太不舒服了。不过没关系，他们答应一个小时就能修好。我们会回来取的，对吧？他们离这里不远。”我们承诺一定会再来，然后上了小巴。



原来这些音乐家不止一次来过镇上。“但我们还是没真正见过他们，”娜塔莉娅抱怨道，“只是从车窗里看过，所以我们仍然很好奇。”

“几年前我们来看过你们，”叶戈尔·列托夫回忆道，“但后来鲁茨科伊州长禁止了这场音乐会。我们上了台，欣赏了空荡荡的大厅，然后就回去了。我们对那次旅行的唯一记忆就是有人告诉我们马戏团被烧毁了。”

— 你现在和当局的关系如何？演唱会还在被取消吗？

“最近，一场演出在一个城市被禁演，这与当地的选举有关。还有一次，场地租赁方与主办方发生纠纷，导致音乐会被取消。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同样重要。”

“我们听说你们城市里有一座纪念碑，上面写着鲁茨科伊是建筑师。这是真的吗？”叶戈尔反问

道。

这是剧院广场上的普希金纪念碑。现在我们要去凯旋门纪念碑，库尔斯克所有居民都称之为“萨沙之门”。亚历山大·鲁茨科伊是该项目的总建筑师。

凯旋门令宾客们惊叹不已。“在莫斯科，它比这小得多，”娜塔莉娅一边说着，一边掏出相机。令人惊讶的是，原来名人也喜欢拍“我在背景里……”的照片。叶戈尔站在凯旋门前（娜塔莉娅拍照），娜塔莎站在凯旋门前（叶戈尔拿着相机），叶戈尔和娜塔莎一起站在凯旋门前（导演拍照）。导演本人则更有创意，只在一门高射炮前拍了张照片。“我们之后可能会把它发布到官网上，”娜塔莉娅承诺道。

民防人员被教导要洗手。

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古董店。原来，这个旅行团的负责人谢尔盖·波普科夫收藏古钟。娜塔莉娅受过语言学训练，对古籍很感兴趣。但我们这次决定什么也不买。“太贵了，”谢尔盖抱怨道，“而且这些钟都是焊接的。唯一的好处是，他们还没找到伪造的方法。瞧瞧这枚据说是公元三世纪的罗马硬币。我简直不敢相信它居然值六百卢布！”

之后，他们去了圣谢尔盖-喀山大教堂。列托夫没有在圣像前划十字，但他摘下了帽子。尤其因为娜塔莉娅觉得帽子很实用。“真棒！”这群昔日的朋克们离开教堂时赞叹道。

我们回去取了娜塔莉娅的靴子，然后去酒店接上了乐队的吉他手——嗓门大、妙语连珠的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之后去了茹拉夫利诺吃午饭。路上，司机们跟我们讲了沃尔科夫泉的疗愈泉水，乐手们后悔没带空瓶子去装这神奇的泉水带走。

但吃饭前，他们先参观了动物园。相机再次从相机包里取出，拍了一系列照片：“熊”、“我们大战熊”、“大家与彩虹合影”等等。娜塔莉娅一边给所有能看到的动物拍照，一边抱怨浣熊赖在“家”不肯出来，这时叶戈尔·列托夫注意到了几只当地的猫。原来他家养了三只毛茸茸的小可爱，这个“小混混”对它们简直爱不释手。

午餐他们点了烤肉串、卢拉烤肉、土豆和蔬菜沙拉。酒水方面，叶戈尔点了淡啤酒，娜塔莉娅点了红酒。只有吉他手坚持他的朋克形象，喝了伏特加。他们要了薄饼，但女服务员斩钉截铁地说：“薄饼在薄饼吧吃。”谢尔盖和安德烈抱怨说饺子吧不吃饺子，烤肉串吧不吃烤肉串，然后就去拿薄饼了。回来后，他们笑着解释说他们要的是叉子。服务员回答说：“其实，我们吃饭前会洗手，然后用纸巾擦干。”“没错，不然你们还能在哪儿学洗手呢？”列托夫总结道。

— 你不厌倦巡演吗？

——更确切地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虽然在鄂木斯克，我们尽量把所有时间都待在家里，创作新音乐。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忙于巡演，好几年都没发行专辑。现在我们努力平衡一切。

——听说你的上一张专辑是在医院里创作的，这是真的吗？

——没错。在重症监护室，我偶尔得拔掉输液管，走到走廊里，那里躺着裹着床单的尸体。他们会被用担架推走，然后新的尸体又会被送进来。那里躺着一个士兵，在他临终前，他说了些类似伟大诗篇的话：关于受伤的狗，关于指挥官，关于飘着绒毛飞向地平线的闪耀白杨，关于马……我

坐下来，尽可能地把他的话记下来。感觉自己身处某个地方.....我甚至不知道那是哪里。就这样，这张专辑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两首歌，恰好是同名主打歌：《重症监护》和《漫长而幸福的人生》。

沃罗涅日之后去哪儿？

— 首先，我们将结束俄罗斯之行，然后直接飞往美国。

我们在酒店台阶上道别。音乐家们说他们对这次“乡村之旅”非常满意：“我们得以放松身心，这在巡演中并不常见。”但这座城市本身却给他们留下了未竟之业的印象：“我会这样记住它：到处都是围栏和起重机。这感觉很奇怪——在鄂木斯克，市中心已经很久没有新建任何东西了。”

伊琳娜·特列季亚科娃

棺材编年史 | 我的！——叶戈尔·莱托夫是法克尔的粉丝。

埃戈尔·列托夫是法克尔的粉丝

在“民防”乐队沃罗涅日巡演期间，《Yo!》杂志的记者们发现了一些关于俄罗斯朋克摇滚传奇的新故事。

在民防音乐会名单上，沃罗涅日排在库尔斯克之后、坦波夫之前。9月21日，音乐家们乘坐小巴第六次跨过这座城市。

“我们的祖父列宁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

格拉日丹卡乐队与我们这座城市有着许多共同的回忆。1989年，乐队在布兰体育场首次演出时，正值暴雨倾盆，吉他手们不幸触电。1994年，格拉日丹卡的歌迷在波尔蒂尼基体育场引发了一场可怕的骚乱。1996年，在劳动体育场冰上舞台的一场演唱会后，莱托夫因肺炎倒下。“我记得琴弦都冻在我的手指上了！”叶戈尔后来回忆道。

但音乐家们非常喜欢目前的音乐会场地——共产国际文化宫：“哇，外墙上的苏联国徽！还有街对面的列宁像！”他们说道。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经过一夜的驱车，莱托夫心情不佳，先是要求去吃晚饭，然后回酒店休息。在音乐家们下榻的Sto Ruchyov酒吧吃午饭时，莱托夫提到他想开一家咖啡馆，风格效仿他最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营造轻松的氛围，播放迷幻音乐。他还计划发行一些专注于迷幻音乐的年轻乐队的唱片。但这些都还是未来计划，而重新发行26张GO乐队的专辑则是近在眼前的事。甚至可以说，这已经是现在的事了，因为其中五张专辑已经发行。GrOb乐队参与了广为人知的Sektor Gaza致敬演出（翻唱歌曲），但这并非事先计划好的。

“我最先是从报纸上听说这件事的，”莱托夫闷闷不乐地说。“他们会报道这件事的！”

法克尔是冠军！

然而，午餐时分，叶戈尔·列托夫的另一项爱好——或许仅次于音乐——浮现了出来。当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位足球运动员。列托夫和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乐队贝斯手的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不约而同地抬头看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来，这对夫妇因为对足球的共同热爱而结缘。叶戈尔坦言，这是他第一次遇到一位和他一样热爱足球的女性。

当话题转向足球时，这位音乐家语出惊人，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沃罗涅日的法克尔队。格拉日丹卡乐队的主唱最初注意到这支球队是因为它的队名——与数不胜数的迪纳摩和火车头队相比，这个名字显得很特别。之后，他开始越来越关注法克尔队在联赛中的不断攀升——从顶级联赛到次级联赛，再回到顶级联赛。列托夫承认，他们所在的鄂木斯克当地的足球队远没有那么精彩。

巡演乐队提前一小时抵达演出场地。原来，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口味近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以前他们会在休息室里点当地酿造的啤酒，而现在他们的演出要求里却包括了昂贵的杰

克丹尼威士忌，演出前他们会喝上一杯。不过，除了杰克丹尼威士忌之外，乐队成员当天没有喝任何其他酒，只有叶戈尔·列托夫例外，他给自己喝了两杯昂贵的啤酒。乐队还订了四条毛巾，每位成员一条：因为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都感觉筋疲力尽。

民防课程

“今天这里谁在表演？”老人怯生生地问站在共产国际文化宫入口前的市政警察部队的壮汉们。

“棺材。”对方回答道。

“谁？！”老人惊呼一声，向后退了一步。

“嗯，是‘民防’，”他们向他解释道。

“啊，民防课！”爷爷笑着说。

一阵爽朗的笑声响起，不过不得不说，老人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在列托夫的演唱会上，考虑到部分歌迷的狂野脾气，安保措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密：每位观众都要接受四次面部检查，外加一次毫不留情的搜身，任何哪怕只有一丝威胁的物品都会被没收，从易拉罐到带金属铆钉的皮带，无一例外。这些预防措施显然是明智之举：格罗布乐队的歌迷们确实非常疯狂。或许是他们狂热的情热最终感染了列托夫，或许是他想再唱几首——总之，在这场演唱会上，格罗布乐队历史上首次返场演出，而且持续了整整二十分钟。

安娜·亚西列瓦

摄影：Vladimir LAVROV

Chronicles | 俄罗斯生活 #1 — 某种生态恐怖分子

像生态恐怖分子那样的人

叶戈尔·列托夫谈内心世界、摇滚乐的停滞以及人类的未来

西伯利亚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发行了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Why Do We Dream?）。这张专辑时长70分钟，讲述了一个令人惊艳的迷幻故事。对于这支曾经以噪音和狂暴著称的乐队来说，这可以说是他们迄今为止最平静、最安宁的作品。

《GO》显然是朝着非线性方向发展的。每张新专辑的演变并非遵循“更好-更差”或“更硬-更软”的模式——而是视野本身变得更加开阔。从这个意义上讲，《Dreams》感觉就像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全景式专辑。对你而言，系统化你所获得的知识的过程有多重要？

这张专辑，我们种下了一棵树（别跟《Starfall》封面上那棵充满想象力、天真的树混淆了）。它所有的枝桠、嫩芽和花朵都纯净、晶莹剔透、阳光灿烂，代表着人类所需的极致意识状态。否则，就不会有宗教的摇摆不定，就不会有对新型致幻剂的探索，也不会有精神修行——而这些都是富有远见的艺术家们一直以来所从事的。或许，它根本就不是一棵树，而更像是一朵巨大而闪闪发光的蒲公英。

你会如何评价GO乐队的发展历程？不妨将他们现在的状况与十年前进行比较——如今，他们有了电台播放、采访、网站互动、不错的唱片发行渠道，演唱会也从电影院转移到了正规的俱乐部等等。关于这支乐队的信息似乎非常丰富。但与此同时，感觉上，人们对他们的了解反而比1997年时更少了。信息越多，乐队想要传达的信息就越显得神秘莫测。

我或许依然是个朋克、无政府主义者等等（而且我仍然与那个世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我变得更加开阔了。这就是挑战——在我们有生之年尽可能地拓展视野。为此，有一些合适的实践方法和工具，而最重要的是，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过去十年，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超个人体验），这些经验颠覆了我许多愚蠢的想法，也塑造了现在的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曾经是一个具有地方政治倾向（略带存在主义色彩）的朋克无政府主义者，那么现在我变成了一个生态无政府主义者，或者说是“精神”无政府主义者，我关注的是普世议题。

至于笼罩着我们的神秘感或模糊感，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实践萨满教所说的“抹去个人历史”。这让我感到更自由、更轻松。

——这些迷幻探索者是谁？如果说名字的话，这张专辑是献给谁的？

“这张专辑献给亚瑟·李和西德·巴雷特，他们对我影响深远。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的老师。精神探索者通常被定义为意识的追寻者，他们拓展着内在空间的边界和领域。这其中当然包括阿尔伯特·霍夫曼、蒂莫西·利里、特伦斯·麦肯纳、舒尔金兄弟等等。”

——标题中的问号——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起初我并没有注意到。所以，原来整张专辑都是一个问问题，而不是一个答案？

“这里面有些含义模糊，有些微妙之处。这样更好。它既是一个面向所有人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陈述，一个对他们而言的解释。”

人们的热情在多大程度上会阻碍他们？例如，作为某种音乐的收藏家和鉴赏家，你对这种音乐的了解是否会成为你的阻碍？你是否渴望改变吉他音乐以及你所珍视的这种艺术形式的固有模式？

“我就是喜欢这种音乐，这是我表达自我的自然方式。当然，这种风格会随着人生的起伏而逐渐改变，但如果没有它，我就不是我自己了，而是别人或别的东西。比如说，罗玛·朱科夫，或者伊恩·柯蒂斯。假设雷蒙斯乐队突然开始演奏爵士乐，并加入女声演唱，他们还能算是雷蒙斯乐队吗？我认为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世界上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满足每个人的口味。”

— 为什么古老的乐曲《超越所有维度》突然出现在专辑中（这有点像《百年孤独》中重新演奏《雪地足迹》的情况）？

“这张专辑的结构就像一个特定的建筑；每个环节都必须到位，否则就无法完整呈现。而且，这首歌简直就是为《Dreams》而生的。至于它最初出现的时间不对——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 你现在想在哪儿生活和工作？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首先，我想住在一个让我感到安心的地方（我指的是文明的变迁），最好是在森林或山区。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或加拿大都可以。我的工作大概是做生态恐怖分子之类的，或者类似的工作。至少在环保领域，做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有用就行。我甚至可以去清理垃圾。

“这张专辑或许可以被称作轻松，但我感觉它也带有一种奇特的意味。所以，如果说歌曲《Kill》是关于‘理解某种让你不想活下去的东西’，那么这张专辑则恰恰相反——‘理解某种让你想活下去的东西’。这不是关于希望的问题，而是关于好奇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吧？”

创作新作品的过程就像缓慢攀登一座山峰（当然，山顶之上目前还看不到任何风景）。它包括精心打磨素材、谱曲、录音、编曲、发行等等。这极其耗费精力。短暂的休息之后，便是漫长的下坡路。而这正是我目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面对的。与此同时，我可以巡演、整理旧录音、制作合辑和翻唱作品。

我们需要积累足够的能量、经验和灵感，因为下一次攀登会更高。

“你有没有想过乐队可能有着另一种发展轨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Oborona的受欢迎程度只有Kino能与之媲美。如果当时有像Aizenshpis和McLaren那样的人出现，把Oborona推向巡回演唱会的舞台呢？带他们去美国？伪装成俄罗斯的性手枪乐队？顺便一提，Oborona拥有绝大多数俄罗斯乐队所缺乏的东西——所谓的形象。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令人难忘的视觉形象。全国人民都记得那个形象：一个长发男子，戴着黑色圆框眼镜，站在铁丝网后面。”

“那时候我们多次被邀请参加大型演唱会之类的活动。这其中蕴含着某种体系：他们投资你，而你必须为之努力。我们是一支独立乐队，这是我们的根本区别。因为我不想在我想去树林里散步或读书的时候，还要接受采访或出现在视频里。我不需要巨额资金，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收入，而我并不缺钱。我不想为了那点微不足道的报酬而放弃重要的自由——即使是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 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情况；所有受欢迎的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其他人。

- 是的，这是我们国家特有的现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 为什么当代音乐如此沉寂？

“嗯，事实证明，摇滚乐并不是一个很宽泛或很深刻的概念。它在六十年代就已经被玩烂了，最终在新浪潮时期——后朋克、新放克、斯卡、Talking Heads乐队、科斯特洛……——彻底被玩烂了。”

——抛开音乐不谈，现在一切又将走向何方？

“如果我说一切都在走向毁灭，我觉得这并不算什么新鲜事。这种趋势已经弥漫开来，我想每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大自然几乎每天都在用它带来的种种意想不到的变故向我们展示这一点。在我看来，某个阶段，以及代表它的文明（以其怪诞的形式），最终都会在动荡和灾难中终结，然后一个新的阶段会开始。新的阶段，新的挑战。一些文明消逝，另一些文明就会到来。”

你知道，我很悲观——我不相信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全人类会突然变得更聪明，生活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唯一的希望是，至少有一些善良的人，一些活着的人，能够幸存下来。但我认为他们只会以进化新阶段的形式出现，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人类。生命依然会继续——没有死亡。

Chronicles | Billboard 排行榜第 2 名 (2) — 透过库兹亚的眼睛

透过库兹亚的视角

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是民防乐队（又名 Kuzya UO）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乐队的前贝斯手，他回忆起与叶戈尔·列托夫共度的时光。

1989年，我们参加了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第七届音乐节。当时的阵容是：列托夫、杰夫、阿尔卡季·克利姆金，还有一位我不记得是谁的贝斯手，好像是新西伯利亚来的。杰夫不知什么原因没来，所以我只好顶替他。那时我和列托夫已经录了不少“共产主义”之类的歌。我在工厂上班，下班回家后，吃完晚饭，就去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家，然后我们就录“共产主义”之类的歌.....1989年6月7日，我们参加了第七届音乐节。也是在那次音乐节上，我们正式加入了摇滚俱乐部。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俱乐部工作记录簿。我在那里做音乐人已经很久了。

所以摇滚俱乐部已经不存在了.....

是的！我有一张印章，上面写着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已重组为圣彼得堡摇滚俱乐部。

1989年，我们在塔林举办了第一场演唱会，结果因为被指控毁坏了一个非常昂贵的麦克风，我们每人只拿到了40卢布。阿尔卡季打鼓，杰夫弹吉他，我弹贝斯，莱托夫是主唱。差不多同一时间，我们在圣彼得堡的奥克茨昂录音棚录制了《欢乐与幸福之歌》.....

据菲尔索夫说，你那里也记录了一些空白.....

不，那些不是空白的，阿尔卡沙只是录制了鼓声。之后在莫斯科有几场音乐会，泽连斯基也参加了。我不太清楚事情的先后顺序。总的来说，所有事情发生得相当紧凑。

然后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说，就这样吧，不再续约了.....他不知怎么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了一番。显然，他至今仍记得这件事。我认为这与任何外部环境无关，而是他内心的一种想法。

疲劳？

也许吧。嗯，那家伙就是这么决定的。我就说：“好吧，行，那就继续吧。”我们做完了。我们得做点什么。好吧，就是这样。菲尔索夫要去巴黎了，邀请我去他那儿住，帮他录制一些面向大众的磁带。顺便一提，沃瓦·马图什金当时还在那里工作。他负责把磁带送到报刊亭。现在他在马克斯奈德艺术乐队弹吉他。但那时候，他的审美跟罗伯特·史密斯（治疗乐队）很像。我凌晨两点就起床，开始录制《柳贝》、《加兹马诺夫》、《南斯拉夫》、《楚多尤多》、《瓦赫坦·基卡比泽瀑布》，当然还有《民防》。然后罗伯特·史密斯就会来，把这一切都拿走。

那时，列托夫在鄂木斯克患了脑炎，正在创作《普里格-斯科克》。他大约在八月底或九月底抵达圣彼得堡，带来了已经完成的作品。嗯，确切地说，是已经完成的部分。他来这里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是菲拉列托夫家的最后一场家庭音乐会。之后，斯维塔·洛谢娃说道：“完了，这孩子穿不下短裤了！”因为门口的人都挤满了人头，就像叠罗汉一样。

1992年，我们在鄂木斯克录制了《百年孤独》。我非常喜欢那张专辑。我们当时有两台Olimp磁带录音机，还有几台卷盘式磁带录音机作为备用。我们最早的处理器之一PH-1000也已经到货了。都是些非常简单的设备。鼓是先录的.....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孤独牢房里的永恒春天》.....啊，但是那首歌里没有鼓.....《自由》.....那首歌里也没有鼓.....嗯，比如说《泥土会教你》。没错！列托夫先录了鼓，然后我们从头到尾同时录了贝斯和吉他（不可能重录），最后是人声、键盘，就这些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创作这些歌曲。有段时间，我们甚至没钱了。说实话，有时候我们连饭都吃不上。我第一次得了这种该死的肠胃病。我最终住进了医院。但那时，《百年孤独》的写作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

《俄罗斯实验场》这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对我来说，这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

好了，这就是你的诗.....

是的.....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显然征求过我的同意。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这样的：“咱们出本书吧。我、扬卡，还有你。”——“好的，没问题。”就这样。我们和校对人员开了两次会，书就出版了。那是1993年秋天。然后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事件。我们决定重操旧业——革命爆发了，我们不能待在家里！

你是如何创作《至日》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部作品的？

哦，这太复杂了，这项技术太复杂了.....这是录制八个人声的时候.....

还有十六把吉他.....

十六把吉他没问题，但人声部分我们基本上没遇到什么问题，而是主要工作方面出了点问题。

列托夫的八个声音？

八个还是六个，我不记得了，有时候是六个，有时候是八个.....罗米奇在1993年录制了一张专辑，当时的录音师是一位年轻女士.....

伊芙琳娜。

是的，是伊芙琳娜。他显然在一个音轨上唱了一段，在另一个音轨上唱了另一段，然后伊芙琳娜把这两个音轨合成了起来。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结果发现这个人是用两种声音在唱歌。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听到了，就想出了录制八个人声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以理解，你可以理解人格分裂，但是八次！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天都要从六个人声中提取两秒钟，然后把它们合成在一起。

你做过这件事吗？

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莱托夫用不同的嗓音唱了六遍同样的旋律，而我则忙着说：“或许我们应该删掉这个，加上那个？或许我们不应该用这个嗓音？你知道，我觉得这样更好。不是吗？嗯，是的，我觉得那样更好。”于是，我坐着听了莱托夫用六个不同的嗓音唱了八个小时的同一首歌。不，这很精彩，听起来棒极了，但这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说的甚至都不是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作品。

而且你全程都没用电脑？

那么，“Alesis”呢？

这是电脑吗？

真是糟透了，这多声道混响简直让人抓狂。我快疯了。我感觉自己像是坐上了开往地狱的电车。我说真的，那简直就是地狱！“如果是这样呢？或者像这样？或者这里有个沙哑的声音……”我什么都听不见了……白兰地也喝完了……我得再去弄点白兰地……半个房间都堆满了空酒瓶……一次两个，一秒一个，一秒半一个……当然，这其中肯定有原因……但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

吉他就简单多了。它们的频率都一样，而且当时的设备也不允许，所以根本没法把它们分开。它们就这么叠在一起，最后就变成了一把……吉他。吉他，吉他——“rrrrr”。你根本听不出里面有什么。要是能调节音量就好了……但那时候，根本没办法扩大音量。

请跟我们说说您在美国的巡演情况。

我们到了美国。几个好心人来接我们，开车送我们去了新泽西，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家酒店。结果发现，这家酒店竟然就是罗曼·维克秋克剧院所在的酒店。早上发现这件事的时候，我简直震惊了。那边的时差太大了，我只想睡觉。眼皮越来越沉，就这么睡着了。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安安静静地躺下，几乎一直睡到演出开始。我们在纽约市中心一家小俱乐部演出，大概坐满了一半。

很多人没来，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会来，甚至不相信这事儿能成。站在舞台上，你根本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莫斯科、纽约，还是新西伯利亚……演唱会就是演唱会。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大家都还在睡觉。只有马克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买到了解酒药，然后动身前往巴尔的摩。因为其他演出都取消了，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一周。

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陌生。我不会弹奏主歌和副歌的结构。我觉得很无聊……

2007年1月7日，圣彼得堡

Chronicles | Billboard 排行榜第 2 名 (2) — 传奇人物会告诉你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传说会告诉我们，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

我如何与同志们会见热尼亚·科列索夫和叶戈尔·莱托夫的传奇故事

1991年夏初，我的一个朋友来找我说：

- 听着，我需要把一些事情转告给一个非常好的人——叶戈尔·列托夫。

——我不知道他是谁！

— 你在说什么？！所有的围栏和入口都涂满了涂鸦：“Gr. Ob.”，“Egor”！

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篱笆上写了什么.....

——总之，我已经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们了，他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我保证你会和他们玩得很开心。

他与叶戈尔的相遇颇为有趣。他在季欣斯基市场遇到了叶戈尔，说道：“我认识你。你是列托夫，我是谢米列托夫！”

这听起来或许荒谬甚至难以置信，但在1991年，我对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一无所知，也从未听过他们的任何一首歌。虽然我喜欢性手枪乐队和AC/DC，但我却是圣彼得堡摇滚俱乐部的常客，而欢乐分队的两张专辑则占据了我个人最爱的榜单前列。

然后科列索夫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约在图尔斯卡娅地铁站见面。多年后，热尼亚在离那个车站不远的地方开了自己的俱乐部“生活角落”。

“我会穿脏兮兮的短裤，”他宣称。

——而且我穿着一件印有席德·维瑟斯头像的T恤。

那件T恤真是酷毙了，我得说，尤其是在当时。我不知怎么从某个丹麦或瑞典朋克乐队那里弄到了它，他们当时正带着“下一站苏联”巡演来演出。T恤上印着Vicious手持一把滴着血的刀，背景是黑色的，旁边还有一行字：“我这辈子最爱两样东西——啤酒和镜子里的自己。”

我到了图尔斯卡娅，发现一群穿着短裤的怪人。仔细打量他们，看他们脏不脏，感觉很尴尬。我该怎么办？我坐在长椅上，希望科列索夫同志能认出我，因为我穿的T恤很特别。长椅上已经有两个人在聊天，其中一个穿着脏兮兮的黄色短裤。他们的口音听起来很陌生。我们就坐在那里。他们不停地低声聊着自己的事，我不时地四处张望。最后，我鼓起勇气问他们：

— 各位，你们是不是在等我？

嗯，如果你是波琳娜，那你很可能会.....

- 这就是我。

——我是热尼亚·科列索夫，这是叶戈尔·莱托夫。

太好了！那我们去抽根烟吧？

我们从地牢里出来，舒舒服服地在离地牢大约一米远的草坪灌木丛里坐了下来。我们抽着烟，闲聊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的独角戏。叶戈尔几乎插不上话，这对他来说完全不寻常。通常情况下，他才是那个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人。我记得列托夫问我能不能弄点迷幻药。他说他想试试，问我那是什么玩意儿。

几天后，他们邀请我去参观基里尔·库维尔金位于列宁大街的著名公寓。据科斯佳·里亚比诺夫说，Gr.Ob.唱片公司的标志就是在那里诞生的。

“我们在了一本关于战争的书里找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祖母和几个女孩正走进毒气室。其中一个女孩与其他人稍稍分开站着。我建议把这个形象作为标志。然后叶戈尔拿到一张纸，他一遍又一遍地在上边写着‘Gr. Ob.-Records’。”

国防工业部门正在筹备《普里格-斯科克》的发布。他们给我看了计划用作封面设计的拼贴画和照片。那天晚上，叶戈尔凭借他雄辩的口才大放异彩。

后来，我跟朋友们说我遇到了一些西伯利亚音乐家。他们人很好，很有礼貌，而且博览群书。他们正准备发行一张唱片。但是他们的乐队名字很奇怪：叶戈尔和奥格涅夫什乐队。

——你居然跟民防队混在一起！“真棒，博览群书……”哈！他们都是些糟糕的朋克，演唱会上把场馆砸得稀巴烂。你听过他们的歌吗？

“不，”我老实承认道。

我听到的这支优秀乐队的的第一张专辑叫做《Pryg-Skok. Children's Songs》。“这算什么朋克？”我心想。“典型的车库摇滚。”第二张是《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黑胶唱片插页“JUMP-JUMP”的印刷故事

1992年，叶戈尔、库兹亚和纽里奇来莫斯科玩，经常去伊兹迈洛沃，在他们新西伯利亚的朋友热尼亚·格列霍夫租的公寓里消磨时光。我也很喜欢去那里。格列霍夫收藏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和珍稀录像带，而且经常举办有趣的聚会。此外，这片“草莓林”离我家只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热尼亚经营着一家名为“金谷”（Zolotaya Dolina）的公司，这家公司发行过“Pops”、“Vse dlya po planu”和“Pryg-Skok”等乐队的专辑。

格列霍夫曾告诉我：

——你是做印刷生意的，对吧？我们需要为乙烯基贴纸印刷一张插页。

-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吧！

我拿出我已经知道的版式，给同事们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行，没人会帮你打印这个！”

-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一点头绪都没有吗？

- 不。

那一刻，我看起来就像动画片里那只名叫加夫的小猫。记得吗？那只睿智的猫总是解释说，叫加夫这样的名字，只会给小猫带来麻烦。然后它问：“他们为什么等着它呢？”

当时，我们正与电影中心的印刷厂合作。我兴高采烈地走到导演面前，展开版面设计图，他快速扫了一眼，然后说：

不，我无法打印这个！

- 为什么？！

——嗯，至少在角落里还好，因为那里比较小；其他地方的字母有五厘米高，而且横跨整张海报。抱歉，我做不到！

我们的讨论持续了大约一个月，期间我给他带了各种装在礼盒里的酒水，并温柔地轻声说道：

- 好，那就打印出来吧！

你快把我逼疯了，但你要明白——我做不到！

我完全无法理解这件事。最后，我把“f***ed”这个词和一大笔钞票当掉了，然后问道：

“我们还能把它打印出来吗？”

“胡说，我们会打印出来的！”他妥协了，递给我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他从佐洛塔亚多利纳公司收到了几千卢布的包装、运输和运费（当时，所有东西都以千和百万为单位）。

— 千万不要拖延打印输出！

- 没问题！

我把收据拿给了格列霍夫。

这是什么？

- 收据。

——为了贿赂？

- 是的。

——那又怎样，它能被计入余额吗？

- 或许。

- 妈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劝我别做，因为这根本不可能。而当我最终拿到那

份注定失败的插页校样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即将在校样上签字，印刷工作明天就要开始了。

事实上，这张专辑让Zolotaya Dolina乐队彻底搞砸了，他们把负责压制黑胶唱片的Aprelevka-sound公司给坑惨了。原本应该印乐队名字的地方，却出现了一个黑圈。这些唱片就这样带着瑕疵从工厂发货了。乐队的名字——“Egor and the O***dnevshie”（叶戈尔和O***dnevshie乐队）——是单独印制的。之后，志愿者们花了几天时间才把这些贴纸贴到黑圈上。

当“四月”的人们看到成品——带有贴纸和插页——时，他们都惊呆了。

叶戈尔决定重返音乐会舞台的故事

在1993年10月那场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前夕，我们在加里宁大街上偶然遇到了叶戈尔和库兹亚·乌奥。他们当时正从白宫走出来。

库兹亚回忆道：“我们刚收到《俄罗斯实验场》这本书的稿费。稿费本身可能不多，但那可是我们当时仅有的钱……总之，钱很多，我们几乎是塞不进兜里的。我们去了白宫。基里尔·库维尔金也和我们一起，但他中途迷路了。我们走到白宫附近。有人正在为白宫的防御募捐。列托夫走过来，递给他们一大叠钞票，我也捐了些钱。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想去拿麦克风，但捷列霍夫不让他进去。当然，我们也不能让他进去——我们都喝得烂醉。但固执的列托夫硬挤到了安皮洛夫面前。安皮洛夫似乎认识他，就让他进去了。”于是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发表了讲话：“所有认识我们的人，所有听我们音乐的人，都来这里！捍卫我们的祖国！”大概就是这样。可能有人来了。甚至可能有人牺牲了。第二天，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本人就登上了飞往鄂木斯克的飞机。

于是，我见到了他们。叶戈尔兴奋极了：

他们根本不让我靠近麦克风！但我最终还是挤了过去，说了话！

“拜托，你说什么？反正我什么也没听清。”科斯蒂克插嘴道。

“我们刚出版了一本书，还有一张名为《流行乐》的唱片。欢迎来拜访我们，我们会带你参观。”

- 我们走吧！

我们到了格列霍夫家，路上顺便买了些白兰地。叶戈尔雷声大作，闪电划破夜空。他当时的状态用巴什拉切夫的诗句来形容最为贴切：“胸口像冒着火花，帽子掉在雪地里，乌鸦四处逃窜！”

——就是这样！该回去了。国内有好多事情发生！又会有演唱会了！我们不能错过！演唱会真是太特别了。它们就像毒品一样。一旦登上舞台，就很难放弃。

高尔基文化宫音乐会传奇

1993年12月19日，民防、生存指导和经理们参加了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化宫举办的“行动指南”活动，该活动是“俄罗斯突破”当代艺术节的一部分。音乐会最终未能举行。规模较小的文化宫无法容纳所有想参加的人（约三千人）。愤怒的粉丝砸碎了窗户和玻璃门，并向电车和过往车辆投掷石块。防暴警察（OMON）被召集来平息事态。

摘自当年的一篇文章

前一天，为了领取邀请函，我与本次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古萨罗夫见了面。

“那你们是如何保障安全的呢？”我随意地问道。

——安保没问题。会有一些警察在场.....

— 嗯，嗯.....

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我来到了高尔基文化宫。地铁里，甚至通往文化宫的路上，都还在播放着奥博罗诺夫的歌曲。一大群歌迷聚集在文化宫外。一个孤零零的警察警惕地打量着他们。我走上前去问他新闻发布会的路线。他确认我有邀请函后，便指引我去了服务入口。里面一切井然有序，气氛平和，墙上挂着一些带有雅利安风格图案的画作，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中。列托夫、罗米奇、经理和邦达连科坐在桌旁.....他们似乎还在享用点心和饮料。记者们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叶戈尔！他怎么会加入这个团体？”“这岂不是否定了他之前的所有作品！”由于我对叶戈尔之前的作品并不熟悉，但我听过列托夫许多激情澎湃的革命演讲，所以这些窃窃私语让我觉得很奇怪。但我对政治言论通常一窍不通。我匆匆瞥了一眼，便走进了大厅。台上，桑亚·安德留什金（他是罗米奇的乐队“生存指南”的鼓手）正在弹奏华尔兹和波兰舞曲.....我和一个名叫赖莎的德国熟人坐了下来；热尼亚·科列索夫把他的摄影器材放在一个箱子里，让我们保管。我们坐在那里，聊着各种各样的闲聊，比如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等等。音乐会迟迟没有开始，观众也迟迟没有出现，尽管门厅里略有动静。突然，防暴警察出现在大厅里。而且他们看起来非常严肃——穿着防弹背心，扛着机枪，戴着只有狭窄缝隙的封闭式头盔。

— 好了，去他妈的！都给我站起来，滚出去！

当时，大厅里有记者和一群人。所有人都鸦雀无声地站起来，走向出口。这时，莱莎开始大喊：

——出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只有六个警察！

- 莱莎，你不在柏林，这些是我们的防暴警察，最好不要和他们争论。

我一手抓住反抗的德国女人，一手拿着无价的科洛索夫宝藏——然后我就走了。

大厅里聚集着大部分记者和其他受邀参加新闻发布会的人，一场激烈的冲突已经爆发——催泪瓦斯、警棍等等。就像我们平时那样。我径直冲进了更衣室。我神情坚定，守在入口的防暴警察放我和莱莎进去了，莱莎现在吓坏了。

过了一会儿，文化宫管理部门神色紧张的代表出现在更衣室里：

- 伊戈尔，他们发动了进攻，也许你可以到阳台上去告诉他们一些事情？

“别去，”格列霍夫（时任民防局局长）平静地说。

他全程都非常冷静。

“不，我要走了！”莱托夫消失在门后。

叶戈尔很快就回来了。

罪孽：

- 所以呢?

那里简直糟透了。他们一看到我,就更加用力地推搡我.....

埃戈尔详细而激动地描述了街上发生的事情。

“警方表示,这是自10月份白宫事件以来规模最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他总结道。

然后更衣室里大家都在唱歌——列托夫、罗米奇、经理。接着格列霍夫说他们开来了一辆巴士,还开辟了一条通道,把我们从文化中心疏散出来。我们安全抵达格列霍夫的公寓,在那里举办了一场疯狂的派对,最后邻居们叫来了市政警察。这次没有催泪瓦斯、警棍,也没有枪声。他们只是叫醒了正在熟睡的格列霍夫。他给了他们钱——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附注:顺便一提,古萨罗夫带着所有门票收入,在比赛开始前很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和库兹亚·乌奥在埃戈尔卡保护区迷路的故事

那是我第一次去鄂木斯克。我记得纽里奇取笑我的旅行装备——锉刀、剪刀、刷子、衬衫和裙子、面霜和洗发水、拖鞋和睡衣。所有这些东西在他们当时的生活条件下都显得格格不入——床垫随意地扔在角落的地板上,墙壁和天花板上贴满了拼贴画,到处堆满了书籍、唱片、吉他、电线、录音机——所有东西都散发着猫粪的味道。

1995年春末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叶戈尔、纽里奇、库兹亚·乌奥、杰夫和我——前往格鲁吉亚唱片公司附近一片幽静的小树林。当时,唱片公司正在如火如荼地录制《冬至》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于不太了解的人来说,叶戈尔住在鄂木斯克郊外,离他珍爱的森林地带只有咫尺之遥——那里是他灵感迸发的漫步之地,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曾提及。

于是我们出发去那里烤肉串,顺便探讨一些永恒而又普世的话题。我们找到一块合适的空地,纽里奇开始摆放她带来的食材,我们则分散开来寻找柴火。

科斯佳和我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20世纪初的俄罗斯诗歌。他给我读了几首亚历山大·弗韦登斯基的诗,我给他读了几首韦利米尔·赫列布尼科夫的诗。谈话间,我捡了一堆树枝,他则扛起一根相当大的圆木。我们转向那片空地。没走多远——圆木就不见了。我们并未气馁,继续着我们高谈阔论的话题,出发寻找它。我们大概走了两个小时,拨开倒下的树木,沿着林间小路漫步。我光着脚,科斯佳一直抓着圆木直到最后。但他最终还是没能坚持走完。

“那我们该如何.....那这是什么.....”他叹息道。

我试图安慰他:

“我们不在荒无人烟的泰加林里。城市就在附近。发电厂的烟囱冒着烟。如果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我们就往那里去。然后我们就能确定方向了。”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不会高兴的.....杰夫会怎么想?!”他坚持道。

我们在一条林间小路上搭了便车,这趟旅程将我们带到了离城市更近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悲伤的徘徊仍在继续。

“叶戈尔!”库兹马扯着嗓子喊道,他的口音带着些许乌克兰腔。“杰夫!”

然后我们看到叶戈尔和杰夫拿着斧头朝我们冲过来。我当时就忍不住大笑起来。

结果发现他们已经展开了全面的救援行动。必须承认，这片小树林是附近居民经常光顾的地方，所以几乎每一片空地上都有一群人闲逛。他们当中有些人胆子还挺大。叶戈尔和杰夫已经喝了不少酒，觉得我们可能遇到麻烦了。杰夫开始训斥我，叶戈尔则责怪库兹亚轻浮鲁莽，简直不可饶恕。这时，纽里奇插话了：

— 哎呀，别这样。烤肉串很快就要变成煤炭了！

然而，我们已经讨论过永恒和全球性的问题。

粉丝差点勒死叶戈尔·列托夫的故事

1998年，“霍尔”公司为国家乐团组织了一次巡回演出。由于我当时在为热尼亚·科列索夫工作，我便深度参与了这项令人愉快的活动。科列索夫为整个巡演订购了巨幅A1尺寸的红色海报，每张海报上都留有一块白色区域，用来标注具体音乐会的日期和地点。于是，我们位于艺术工作室里的办公室（大约70平方米）的地板上，到处都是戴着超大眼镜、笑容灿烂的红白相间的叶戈尔·列托夫的海报。我们——霍尔公司的员工，以及朋友和支持者们——像蚂蚁一样，在海报上爬来爬去，一丝不苟地把写着莫斯科音乐会日期和地点的纸条贴在海报上。我至今仍然后悔当时没能拍下那一幕！

然后我们把一些海报送到一家户外广告公司，剩下的则在演唱会前几天的晚上，我们自己贴在了城市各处。那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在满月之下，我们经验尚浅，却要贴出巨大的海报，它们在风中起皱飘动。

在克雷利亚·苏维埃体育宫的音乐会现场，我忙得不可开交：给娜塔莉娅·尤里耶夫娜准备指甲油，给舞台准备水，给化妆间准备饮料和小吃，给各种设备换电池，整理线路，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忙得像个疯子。音乐会接近尾声时，我爬进了放映室，它就在天花板下面。为了到达那里，我不得不爬过墙上一个颇具特色的洞，洞里垂挂着高压电线，同样颇具特色。幸运的是，我事先被告知在这段路上要格外小心谨慎。放映室里坐着一位来自基辅的帅哥，基里尔·佩列德里，他正在为这场音乐会录音。于是我拿着一瓶啤酒爬到他跟前，假装是该放松一下的时候了。国防部的人正在播放《俄罗斯实验场》，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聊着一些抽象的话题，录音电平指示灯闪烁着……基里尔瞥了一眼舞台，说道：

叶戈尔在哪里？

“他可能去了后台。演唱部分结束后，他就离开了。”

- 不，你看，他就在大厅里，看起来他们正在那里掐他的脖子！

真的吗？你觉得他们会掐死你，还是守卫会把你打跑？

- 让我们来看看...

乐手们演奏完毕，保安人员与观众为了争夺这位传奇人物的遗体而发生冲突。他们最终夺回了遗体，但却没能保住切·格瓦拉的T恤。

音乐会结束后，莱托夫在更衣室里说：

“一边是一群吵闹的家伙，不停地爬上舞台，扔东西；另一边是一群女孩，我就跳到她们身上。其中一个女孩用摔跤的姿势掐住我的脖子，其他人开始撕扯我的衬衫。我吓坏了，只好抓住它。她们把我暴露了！我感觉喘不过气来。我冲着保安大喊：‘杀了他们！’”

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列托夫发现自己正被几个女人搂在怀里，而保安人员又不忍心动手。他们费了好大劲才把这位偶像拖回舞台。但伤亡惨重。叶戈尔的胳膊和腰侧到处都是青紫色的淤青，女孩们的指甲印清晰可见。

列托夫并没有让我茅塞顿开，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的生活，他的作品对我来说也算不上什么启示；我一直觉得他的公司只是一个玩乐的好借口。事实证明，塞米列托夫是对的。

Chronicles | Billboard 排行榜第 2 名 (2) — 透过菲尔索夫之口

菲尔索夫之口

波琳娜·鲍里索娃试图让谢尔盖·菲尔索夫开口说话，谢尔盖·菲尔索夫对民防工作有很多记忆。

你还记得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吗？

1988年底，我和Oborona乐队的成员成了朋友。他们的演出太棒了！我想我之前见过列托夫本人。我想他以前来过圣彼得堡。我肯定已经有一些他的录音了。虽然不多，但确实存在。我开始积极邀请他们来这里，1989年1月底，他们来了。通过摇滚俱乐部，我们为当时正在拍摄一部关于苏联摇滚乐的纪录片的法国人，在弗雷米亚文化中心组织了一场大型音乐会。那是一场很棒的音乐会，场地很漂亮，音响效果也很好，一切都很完美。参演的乐队有VV、Ne Zhdali、AuktsBion、一支名为Situation的女子乐队、Yanka和Oborona。可惜的是，录音没能保存下来。法国人拍摄了这场音乐会，剪辑后带回了法国，结果一切都乱了套。这部电影的任何一个镜头都没人看过。

大约就在那时，在我的建议下，奥博罗纳乐队加入了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当时，他们还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没有正式的乐队身份。夏天初，他们参加了第七届摇滚俱乐部音乐节，杰夫没来，库兹马来了。大约一个月后，他们来我家录制专辑，搬进了我在老兵大街的住处。整个乐队——列托夫、扬卡、杰夫、库兹马、泽连斯基、阿尔卡沙，还有其他十来个人——都搬了过来。我父母搬到了乡下，把主房间封了起来。我们就住在厨房、走廊和我的房间里。我们挨着睡。那段日子很快乐。我们会去买三升装的波罗的海苹果酒，后来这些酒堆满了整个阳台。我们还在采石场游泳。我不确定列托夫有没有游过泳，但杰夫、阿尔卡沙和我肯定游过。我们几乎从不举办音乐会——我们只在家搞小型音乐会，在家的時候，我们总是抱着吉他互相唱歌。伦卡·费多罗夫也经常来这里玩；他住在附近的阿夫托沃。

除了费多罗夫之外，他们还与其他圣彼得堡的音乐家有过交流吗？

我把他们介绍给了所有人，但他们始终没能真正合得来。他们经常在堪察加半岛闲逛。他们在那里也有朋友，但大多不在音乐圈内。我试图打入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他们最终只能靠自己。不过，杰夫是大家最喜欢的人。就我个人而言，他绝对是世界上最有魅力、最可爱、最受人喜爱的人！

他们比圣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开放得多。同时，他们又如此固执，如此目标明确。他们看起来像一群懒散的家伙，但做事却一丝不苟。对他们来说，一切并非虚张声势——他们有其深层理念。一切都是认真的。而他们的主要理念就是摧毁一切，粉碎一切。最重要的是，推翻并消灭苏联政权。战斗到底。一场对抗既定世界秩序的战斗。内心深处的朋克精神。我们国家的人都喜欢炫耀，但对他们来说，外表并不重要。当然，列托夫也佩戴着各种各样的别针，穿着破烂的衬衫，但这并不是重点。他们是战士——这是事实。他们像真正的地下战士一样生活。对他们来说，生活和舞台没有区别。演出、录音——所有这些都是斗争的形式。

专辑录制过程进行得如何？

在 Lenka Fedorov 和 Mishka Rappoport 的帮助下，他们在 AuktsBion 录制了一场伪音乐会“欢乐与幸福之歌”，以及 Letov 后来在 1989 年秋冬季的家庭录音中使用的录音：“健康永恒”、“末日教皇”、“战争”、“俄罗斯实验场”——整个系列。

我原以为他们在圣彼得堡会过得更好，可以演出、录音。那时候人人都想来这里，但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们是西伯利亚人，靠演出赚不了钱，必须找工作。没有居留许可，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试着帮杰夫在堪察加找份工作：我们去了那里，谈了谈，但他们始终没录用他。他们在圣彼得堡也没什么进展，所以就离开了。

你好吗

那时候，“导演”这个概念非常抽象，就像玩过家家一样：你当女儿，我当妈妈。所以，你弹吉他，你打鼓，我当导演。这种关系很简单，很自然；谁也不欠谁什么。我喜欢这样——我就这么做了。1989年，我组织了一些音乐会，大多是家庭音乐会。尤其是在 Lenka Filaretova 家，我用 Yanka 和 Yegor 的木吉他演奏。Letov 总是独自演奏。我想他甚至都没和 Yanka 一起演奏过。比如，Alisa 有时会坐下来弹木吉他，但 Oborona 从来没这么做过。Yegor 的最后一场家庭音乐会也是在 Lenka 家，但那是后来的事了，大概是 1992 年左右，那时我们意识到一切都结束了——人们甚至都上不了楼梯。院子里挤满了人，楼梯上挤满了人，公寓里也挤满了人，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宣传.....

1989年4月，在辛菲罗波尔内务部社区中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我们预定了两场演出，但像往常一样，只演了一半。场地爆满；不到半小时，所有座位都挤满了人，演出也就结束了。他们肯定付了不少钱。实际上，我制定了一套规则：演出前必须付款，否则乐队就不上台。那时候，他们喜欢宰客。我会说：“票卖完了，场地满了——把钱给我。”他们把钱给我们，乐队上台，半小时后，警察冲了进来，演出就结束了，我们赶紧收拾乐器离开。

在辛菲罗波尔市中心，矗立着巨大的地区委员会大楼，大楼后面是一片土坯房。这些泥屋由一个个带独立入口的小房间组成。我们和别人合租，就住在那儿。我们在院子里生火，烤肉，当然也喝酒。后来，扬卡和阿尔卡沙之间发生了那场著名的争吵。阿尔卡沙半夜起来，喝得酩酊大醉，开始到处撒尿。扬卡跳起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拽着他的腿把他拖进院子，坐在他身上，狠狠地揍了他一顿。我和杰夫把她拉开。第二天早上，阿尔卡沙的脸是这样的！扬卡可不让任何人伤害她！

总的来说，小组气氛非常轻松愉快。莱托夫依然是个普通人，尽管即使在那时，他也经常被开玩笑地称为“元首”。气氛棒极了。每个人都以正式的称呼互相交流。

嗯，他们现在仍然这样做。他们有个习惯——人们总是正式地称呼他们的名字和父名。他们以前排练过吗？

我一次彩排都没参加。基本上，他们总是把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可能在鄂木斯克就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然后带着一个差不多成型的节目单来了。于是，我从辛菲罗波尔和他们一起坐火车去了西伯利亚。旅途非常漫长，大概花了三天。我们用最后的钱买了三瓶伏特加。每天晚上，我们五个人——扬卡、杰夫、我、泽列尼和阿尔卡沙——都会聚在车厢前厅，喝上一瓶。然后我们就睡一整天，晚上再睡。列托夫不和我们一起喝酒——他会躺在三楼的铺位上写诗。

你们也在塔林组织过音乐会吗？

他们在那里演出过几次，我作为他们的指挥也随行，但后来其他人取消了演出。演出没有费用，主办方只是租了一家酒店。那简直是一场噩梦：四个人登记入住，结果十五个人住进来。酒店管理人员很震惊，但他们没有赶走任何人。

1989-1990年间，我们在莫斯科待了很长时间。基里尔·库维尔金（Kirill Kuvyrdin）——他原本是奥克斯昂（Auktsūon）的朋友——负责我们的总部。那时候莫斯科的演出比现在多得多。我记得我们去看了“夜行大街”（Nochnoy Prospekt）、“我的呐喊”（Zvuki My）、“别日达利”（Ne Zhdali）、“维日利维·奥特卡兹”（Vezhlivy Otkaz）的演出，还经常去戈尔布什卡（Gorbushka）和摇滚实验室（Rock Laboratory）消磨时光。就在他们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叶戈尔突然宣布不再举办任何演出，永远地回到了鄂木斯克。就在那时，当所有人都涌向体育场，当他们不得不继续演出的时候，列托夫却泄了气。正因如此，他的整个乐队都黯然离场。他带领他们走向了未来，他们信任他这个人，信任他作为领导者的能力，为了他放弃了生活中的其他一切，最终却被无情地抛弃。“边境防御”（Grazhdanskaya Oborona）本可以成为全国十大乐队之一，如今也能与DDT、Aquarium等乐队比肩……

那么，你认为她现在是什么身份？

现在，她一文不值。从金钱角度来说。

你认为金钱是最重要的吗？

金钱并非万能，但它赋予你表达自我的自由，以及实现梦想的机会。例如，我认为舍夫丘克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人，因为他从不挥霍金钱——他录制专辑，帮助他人。库兹马的手术就是他捐的钱。没有钱，就无从施舍。钱就是钱，尤其当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挣到钱时更是如此。列托夫最终也进入了演艺圈。那时候，他们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我与众不同。当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每个人都在从事艺术时，他们却在从事摔跤。叶戈尔虽然有时会对自己的言辞、概念和言论感到困惑，但他是个斗士；他总是要与某种东西战斗。

没错，我就是觉得他很有意思。1999年，当我听到他说“作为一个守法公民……”时，我感到很震惊。

莱托夫一向擅长编故事。他会喝上一杯酒，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这、那、还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而那些家伙却信以为真，因为他们自己既不会像他那样圆滑世故，也不会那样圆滑处事。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究竟在为什么而战？他们究竟要往哪个方向前进？

我们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过渡到了《非存在的可承受之重》……

莱托夫原来是个吝啬鬼。一切都围绕着金钱、收集唱片和T恤衫展开。

2007年1月3日，圣彼得堡

Chronicles | 雅库斯特克晚报 #30 (671) — “民防”：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民防：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7月27日，雅库茨克迎来了传奇朋克乐队“民防”唯一一场万众期待的演唱会。之所以说万众期待，是因为没人相信他们真的会来。看着贴满全城的横幅和海报，当地的朋克乐迷（以及曾经的朋克）都摸不着头脑，纷纷打电话问朋友：“嘿，他们真的会来吗？还是又一个骗局？”如今的乐迷都很精明，所以他们没有提前买票：“先确认他们来了再买票。”原定于7月27日和28日举行两场演唱会，但第二场却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取消了：门票没卖完。

“我过去称我的理想为无政府主义，但现在我认为称之为共产主义更为贴切。”

——叶戈尔·列托夫



家，甜蜜的家

7月27日上午10点，这支朋克乐队抵达雅库特。乐队主唱列托夫、吉他手谢尔盖和贝斯手都从他们常住的鄂木斯克飞来。不过，他们的鼓手是莫斯科人，他乘火车去鄂木斯克排练。乐队成员拒绝搬到莫斯科。“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里——这里更熟悉、更舒适。鄂木斯克的食物也很好。”

男孩们被安排住在安大略乡村酒店。他们被驱车沿着故意绕远的路线行驶，那里树木繁茂，少了我们那些破旧的小木屋。男孩们原本就心存疑虑。糟糕的路况、奇特的建筑和杂乱无章的房屋都让他们大吃一惊。但也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发现：“哦，那是什么？真有意思的清真寺。”他们不得不向男孩们解释，那根本不是清真寺，而是阿尔查之家——一座雅库特人的神灵庙。

这是GrOb第一次来雅库特。他们来的时候已经略知一二，对雅库特有所了解，也读过一些相关资料。总的来说，他们知识渊博。简而言之，他们就是普通人，一点也不爱炫耀。

参考：

叶戈尔·列托夫 (**Egor (Igor Fedorovich) Letov**) ——作词、演唱、几乎所有乐器演奏、制作人、艺术家。1964年9月10日出生于鄂木斯克。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Natalia Chumakova) ——贝斯、键盘。1969年7月14日出生于吉尔吉斯斯

坦。大部分时间在大诺夫哥罗德和新西伯利亚度过。自1997年中期加入GO乐队。

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 (**Alexander Chesnakov**) —— 吉他。1965年2月13日出生于鄂木斯克。自2000年加入GO乐队。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 (**Pavel Peretolchin**) —— 鼓手。1968年1月27日出生于新西伯利亚。曾担任“毕加索之子” (Children of Picasso) 乐队的音响工程师。



雅库茨克有文化朋克

演唱会如期举行。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精彩纷呈，因为在演唱会开始前几个小时，就有许多朋克乐迷涌入了摇滚酒吧“车库”。同时，它也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莱托夫已经不再是当年在台上高喊“朋克万岁！”并拨弄吉他的年纪了。但他依然活力四射。这股能量不仅来自乐手们，也来自那些狂热的歌迷，他们欣喜若狂地跳上椅子，挥舞着T恤。有些地方，你甚至听不清歌词。不是因为音响效果不好，而是因为歌迷们无法控制的欢呼声，他们是为了见到自己的偶像而来。确切地说，是为了亲眼见到他。似乎很少有人是真正来听歌的。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是来看莱托夫本人的，为了确认他是否真的是莱托夫。莱托夫的观众着实令人惊讶：“平静、平和、有教养。”在其他城市，这里只有打架斗殴。但这里，一切都很文明。

一个半小时转瞬即逝。一大群没能到场的歌迷已经在入口处等候列托夫了。列托夫对观众的热情感到欣喜，尽管从他的外表上看不出来。他一向冷静，不苟言笑。在台上，他没有跟歌迷说一句话。他静静地走进来，演奏、歌唱，然后同样平静地离开，并在后台慷慨地为歌迷签名。

除了咒骂，没什么好说的了.....

雅库特的自然风光！列托夫带着特别的敬畏和由衷的赞叹谈起它：“空气真清新！就连鄂木斯克郊区都没这么干净。”“是啊.....简直无话可说，只能感叹.....”吉他手萨沙惊叹于眼前的景色。抵达熊岛的第二天，整个团队都沉浸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中。主办方把他们带到了这里。在轻松舒适的氛围中，这些80年代的偶像们分享了对演唱会的感想，讨论了俄罗斯流行音乐，也聊起了人生百态。其中，关于萨满的话题尤其引人入胜：他们真的存在吗？他们又拥有怎样的能力？

莱托夫很有幽默感，但只有黑色幽默。他回忆起在一家电动汽车工厂工作时说：“那时候，我把每天上班看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折磨.....”“可以说”其实是莱托夫最喜欢的短语，他经常重复这句话。



他们几乎不喝酒。列托夫和娜塔莎滴酒不沾，其他人也只是象征性地喝点酒（威士忌或伏特加）。

他们钓到的梭鱼引起了一阵欢呼。然而，尽管他们费尽心思捕鱼，却只钓到了一些小鱼。

莱托夫已经判若两人：“岁月不饶人。”他不再是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再是无法无天之徒。那些顽固的批评者对他的种种指责，全都是无稽之谈。他温和、沉稳、稳重、沉默寡言，而且毫不矫揉造作。他从不空口开口，总是带着明确的问题。他非常善于倾听，认真聆听每一个字，记住每一个细节，如果有什么特别吸引他的地方，他还会再次追问。当话题转向音乐喜好时，他顿时来了精神。他热爱20世纪60年代的加州迷幻摇滚，并收藏了不少。他是雅库特乐队Cholbon和Serge以及图瓦民族乐队Yatkha的乐迷。他断然拒绝俄罗斯摇滚：“我想生活在西方。那里竞争激烈，乐队才能发展壮大。正是因为竞争，乐队才会对自己的音乐风格、歌词质量和音乐本身负责。而这里呢？”“民防工作是独一无二的，就像DDT一样。西方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所以那里的情况更有意思。”

叶戈尔从16岁就开始作曲：“对我来说，一切都轻而易举。例如，我只用了大约十分钟就写出了《俄罗斯实验场》。”

“GO”带回家了雅库特毛皮玩具、猛犸象牙雕像、一大堆照片和满满的快乐。

天知道，我并不是莱托夫的粉丝。但他是俄罗斯朋克摇滚的传奇人物，独一无二，这一点毋庸置疑。即使是他最激烈的反对者，恐怕也很难否认莱托夫个性鲜明。他一直在探索，对事物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并将之融入到他的音乐中。但很可能，那些穿着无政府主义T恤的年轻人根本无法理解莱托夫真正想表达什么。而对于有创造力的人来说，这大概是最具冒犯性的了.....

GrOb乐队赴雅库茨克演出的谈判持续了两周。乐队负责人对这个提议持怀疑态度——他们最近在基辅被骗了。主办方安排了一场演唱会，然后就消失了。他们被迫在自己的网站上回应愤怒的歌迷，质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演出。因此，GrOb乐队负责人立即要求全额预付。此外，GrOb乐队当时正在休假，没有安排任何演出。雅库茨克之行是个例外。

在机场，组织者们发现鼓手不见了，差点吓得心脏病发作：“我们看到了四个人，但少了一个。原来他没注意到我们举着的迎接牌，径直走了过去。不过后来他回过神来，找到了我们。”

附言：我至今仍难以置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与其他一些酒吧不同，Garage摇滚酒吧信守承诺。为此，他们值得特别表扬。

妮卡·兰道

Хроники | Ровесник № 8 (542) — «ГрОб» для цивилизации

“Grob”代表文明

在 Grazhdanskaya Oborona 乐队发布新专辑《Why Do We Dream?》之后，《Rovesnik》的一名记者采访了这支标志性乐队的领军人物叶戈尔·列托夫，讨论了创造力、朋克摇滚以及文明的未来。

“民防乐队”发行了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并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精彩的演唱会。种种迹象表明，这支乐队目前正处于上升期。

——我们什么时候不是在不断进步呢？我们始终处于巅峰！

专辑已经录制完成了，接下来你打算做什么？

“我把创作专辑比作攀登一座山峰。攀登的过程中，你看不到前方的风景。你到达顶峰——然后还有下一座山峰等着你。这在日本是对精神追求的一种著名诠释。登顶之后便是下山：你需要休息，积累经验、能量和灵感。在这种状态下，我们通常会进行重制工作，重新审视一些档案资料，尤其因为我们还有大约十五张专辑需要重新发行：各种“共产主义”系列等等。前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休息时间呢？

“我们都是工作狂，总是忙个不停。而且，我们的新书也要出版了，这意味着我还要忙着做这件事。”

— 在录制《我们为何做梦？》时，是什么激发了你的灵感？

“灵感只来源于我的内心。外在的事物只会带来舒适感。为了获得舒适感，我可能会听音乐或看电影。”

— 然而，专辑上却有一段献词：“谨以此纪念亚瑟·李和西德·巴雷特。”

——他们是教师。教师是一回事，但激励者又是另一回事。

那么，在你看来，“教师”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

老师们都是我从中受益匪浅、积极向上的人，感谢他们改变了我。

你视为导师的许多人现在依然健在，并且仍在演出。例如，The Who 乐队或 The Stooges 乐队。你想去看他们的演唱会吗？

——我不知道他们身体状况如何！（笑）去演唱会真的太难了。你根本没法好好看也没法好好听：你得签名、回答问题。简直是折磨。我更喜欢看演唱会的DVD。买张DVD，舒舒服服地坐在

家里自己看。（笑）

——国外呢？

“但在国外，我们没有空闲时间。我们只能自己演出，所以没时间去看其他人的演唱会。”

几年前，你曾宣称俄罗斯摇滚乐并不存在，在你看来，Aquarium 和流行乐队 Dune 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你最近却对 Aquarium 的最新专辑《Carefree Russian Vagabond》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你对俄罗斯摇滚乐的看法改变了吗？

——俄罗斯摇滚是有的，但我并不认为我们是它的代表。我对它没什么特别的兴趣。我不能说我是它的对立面，只是我们走的是不同的路，有着不同的目标。俄罗斯摇滚太本土化了。至于 Aquarium 乐队嘛，他们的专辑挺有意思的……Aquarium 的最新专辑是俄罗斯摇滚的精髓吗？

（笑）完全不是。那张专辑充满了爱尔兰、苏格兰和凯尔特风情，还带着浓浓的啤酒味儿。而且，我也不认为 Aquarium 是俄罗斯摇滚。Aquarium 是一支很前卫的乐队，他们精通英美民谣摇滚。比如，我懂英语，所以当我第一次听到 Aquarium 的歌时，我立刻意识到他们把鲍勃·迪伦和 Fairport Convention 的风格全都抄袭了。而且，BG 也毫不掩饰他的借鉴；他甚至曾经愤世嫉俗地说，埃尔维斯·科斯特洛和其他一些人在我们国家不出名是件好事，因为我从他们那里偷了一首歌，从这里偷了那首歌。俄罗斯摇滚的概念非常奇怪。从鲍勃·迪伦到治疗乐队，一切都是从四面八方抄袭而来。

— 你认为 GrOb 是朋克乐队吗？

——没错。但如今朋克的观念太宽泛了。人们把 The Offspring 和 Green Day 都称为朋克。但对我来说，朋克指的是作曲家约翰·凯奇或约翰·科尔特兰。

——那么经典的朋克乐队呢？比如性手枪乐队、雷蒙斯乐队、冲突乐队？

“经典朋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无稽之谈。如果它是经典的，那就不是朋克。帕蒂·史密斯和电视乐队是朋克吗？在我看来，他们是超级朋克！而我觉得剥削乐队远不如帕蒂·史密斯或纽约娃娃乐队朋克。更别提 MC5、僧侣乐队、特罗格斯乐队、索尼克斯乐队和种子乐队了。朋克是 1963 年才出现的概念。国王乐队才是真正的朋克，他们的歌曲《路易路易》和《野东西》堪称摇滚经典！

你是否觉得对你的粉丝负有责任？

“不。我为什么要承担责任？他们又不能效仿我。我来自不同的时代，我的行事准则和他们不同——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的理念是我们应该以身作则。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行为正确，就不需要任何榜样。”

你对电影、音乐和文学都很有研究。你认为那些没读过卡夫卡或普拉托诺夫，也没听过洛夫或约翰·凯奇作品的年轻人，能完全理解你的作品吗？

当然！我创作的东西根本不是为了博取知识分子的眼球。我创作的作品应该能融入我们国家的文化或非文化空间。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我已经四十多岁了；理论上来说，我本可以死了。但我并没有虚度此生；我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这些事情震撼了人们的心灵，推翻了旧有的观念，并建立了新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挑衅者兼建设者。

——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是一部格局宏大、充满哲学意味的作品。感觉你已经超越了社会

议题.....

“我不知道。这张专辑的制作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现实的影响。没有涉及政治或其他任何类似的东西。我根本不在乎这里发生了什么。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创作，表达我所有的感受。所以我没有咒骂或攻击任何人。但在各种致幻手段的帮助下，我为自己制作了这张专辑，尽可能地做到准确和生动，我对它非常满意！”

——你所尊敬的蒂莫西·利里，晚年对计算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相信科学和文明的进步吗？

蒂莫西·利里是一位公众人物，必须谨慎看待。我提到他，是因为他象征着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我不会谈及他作为一个人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会讨论他在互联网领域的最新进展。至于文明，它没有进步，不仅在倒退，而且在垂死挣扎。我们正在目睹它的末日。它正在消亡，这是显而易见的！

这种自信从何而来？

看看新闻吧。难道你没看到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气候变化、飓风、自然灾害和灾难？地球正在抛弃各种各样的垃圾。以人类为代表的生物圈正在被摧毁。这没什么好悲惨的。作为文明的生命形式已经终结。这显而易见，任何人都能看出来。长期以来，我们的星球遭受了巨大的灾难——地球曾被烈火焚烧，被冰雪覆盖。然而，生命仍在延续——在温泉附近，在地下深处.....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我不认为会是人类；很可能会出现某种全新的生物物种，与人类截然不同，这让我感到欣慰！

维塔利·施默林采访

Chronicles | 滚石杂志第 7 期 (37) ——“防御”手段

防御手段

民防乐队录制了他们唱片目录中最精彩的专辑《我们为何做梦?》。RS杂志与乐队主唱叶戈拉·列托夫谈论了世界末日、新摇滚乐以及激发创造力的方法。

我昨天在演唱会上注意到，人们还在挥舞着印有你头像、背景是无政府主义标志的旗帜。现在看到这一切，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事实上，我一直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依然如此。只不过，我现在对当代无政府主义的生态层面更感兴趣；可以说，我已经转向了生态无政府主义。虽然这在过去与政治有些许关联，但我现在已经彻底放弃了政治，因为在我们的国家，政治是徒劳无功且愚蠢的。在这里，任何政治活动都被视为一种针对自身的挑衅——例如利莫诺夫的例子。

对了，你关注他的政治活动吗？

我一般都会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家到处都有电视，几乎24小时都开着。我们什么都看，包括新闻。

但他们那里什么也没显示。无论如何，局势非常一边倒。

还有互联网。尤其是在没什么大事发生的情况下。一旦发生真正有趣或刺激的事情——比如爆炸、沉没，或者奥斯坦金诺影院再次着火——就会被曝光。我甚至不关注政治局势——我感兴趣的是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灾难和全球变化：飓风、地震、全球变暖.....毕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正是世界末日，人类文明的终结，而我发现观察这一切非常引人入胜。我对演化过程本身很感兴趣，它是如何运作的，从地球的起源到它最终的归宿。

你对此事有什么预测吗？

当然会有。某些生命形式会灭绝，就像以前多次发生的那样——冰川时期，地球被焚毁殆尽，生命退缩到地下数十公里深处的地下水层中。然后它们又会再次出现，每一次都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从意识层面来看，这种变化总是起伏不定、不断进步且积极的。而现在，我们看到人类实际上正在自我毁灭。可悲的是，随着人类的消亡，所有美好的事物也随之消亡。因此，我认为下一个周期甚至不会出现新的人类，而可能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或许是某种动物。

但告诉我，利莫诺夫——当然，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他出门从来都带着保镖。而你，比如说，在街上如此随意地闲逛，反而显得很奇怪。

但我们没有上电视。

我也这么认为，除非你身陷囹圄。

是这样的。那些对我们感兴趣的人一眼就能认出我们。他们会走过来和我们握手，有时只是说声谢谢。我从来没有因为讨厌我的作品和想法而在街上被人攻击过。（笑）实际上，我一开始从事

创作就完全避免出现在电视上——我用脏话、激烈的政治言论和出格的行为来保护自己。后来政变发生后，我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以确保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赞扬。1989年“墓地狂热”爆发后，我立即解散了乐队。然后我把它改名为“Opis****shie”（一群混蛋）——尽可能地让媒体难以提及我们。我必须不断地周旋，想出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免受当前局势的影响。

所以，现在上电视就等同于危险了吗？

没错，这对我们来说很危险，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会被归类到其他人的行列里。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策略，需要凭直觉去执行，同时还要不断采取各种奇特的行动。比如，有一次，我特意招募了一位自由爵士萨克斯手，我的弟弟谢尔盖，他完全——恕我直言——是个新手。起初，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后来就习惯了一——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这里还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当初为什么会以“民防”这个名字起家呢？我不是天生的创作者或诗人，我也不喜欢做这些。我更像个消费者，一个懒人。我之所以开始做这个，是因为我在俄语音乐界听不到任何让我满意的作品，到处都是垃圾。我感觉，正如人们常说的，我的国家受到了侮辱。

你知道，关于这个问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我们的音乐家们在为一种理念而奋斗，并且大致上关心着世界的命运，但在西方，人们却并不为此担忧——如果你不把U2乐队算在内的话——这就是为什么那里的一切都蓬勃发展、生机勃勃的原因。

我觉得他们那里没什么真正蓬勃发展的东西。我越听这些现代乐队——比如*The Strokes*或者*Babysambles*——就越觉得他们简直就是垃圾。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人们对现代音乐的兴趣如此下降？”我的回答很简单：“因为什么都玩烂了。”摇滚乐最终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局限的现象。比如新民谣——但我认为这算不上什么新鲜玩意儿。就拿*Current 93*来说吧——他们毫不掩饰自己抄袭了*Changes*乐队。现在流行的音乐都是折衷主义。他们借鉴了Bryan Ferry、*The Kinks*这种怪异的乐队，还有像*Talking Heads*这种完全不可思议的乐队——然后又冒出来*Arctic Monkeys*和*Franz Ferdinand*这样的乐队。我听过了一——简直烂透了，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笑）所有这些白条纹乐队、好坏皇后乐队、*Yeah Yeah Yeahs*乐队——我努力买他们的唱片，想跟上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辉煌。真是令人唏嘘。酷玩乐队的歌简直没法听；跟他们比起来，U2简直就是神。

在采访之前，你提到了为你暖场的摩尔曼斯克乐队，他们向你道歉，比如“请原谅我们表现得这么糟糕”。你上一次向观众道歉是什么时候？

我们从未道歉，也永远不会道歉。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是1998年左右——会服用各种兴奋剂或者喝得酩酊大醉后演出。有一次，我几乎脱光了衣服，幸亏有人拦住了我。虽然最终没有酿成悲剧，但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健康，因为我开始在演唱会上失去意识。我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了。我不得不放弃生活中的许多乐趣。

那么，现在还没到十二点我们就已经开始喝酒了，这重要吗？

算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要是我当时像那样一口气喝下一杯伏特加，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很沮丧：我不得不放弃自己对音乐会的固有认知。我们以前总是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我记得有一次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一个音乐节上演出，我们当时就决定：不排练！我负责打节奏、大声喊叫，观众们都疯了：有人摔倒，有人打架，甚至有人流血。这才叫真正的音乐会。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改革开放之后，公众的喜好发生了变化。他们要求的是精湛的演奏和优美的歌声——这让我大吃一惊。我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我当时想，我必须放弃了。

这一切，你知道吗，让我想起了《请杀了我》这本书。

说实话，我读到那篇文章的时候差点哭了。这种苦涩的感觉至今仍萦绕着我：我真后悔自己生不逢时。我毕生的梦想就是能和一群才华横溢、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但在这里，比如说纽约，那里有伊基·波普、卢·里德、理查德·赫尔、帕蒂·史密斯，还有其他数不清的人物，我们这里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有。所以我们就像车库朋克版的感恩而死乐队。二十年前我们开辟了自己的天地，现在我们老了，但再也不会有人尝试填补这个空白了，因为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你的健康，以及其他一切。当我们开始演奏无调性摇滚、创作荒诞歌词时，我们差点因此入狱甚至丧命，我们被送进精神病院……我不得不离家出走，肩上挎着钱包，口袋里揣着三十卢布，在全国各地流浪。我和扬卡就是这样四处奔波，被人通缉。现在的年轻人不懂文字的价值，尽管所有真正的音乐都源于此：你不仅可能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甚至可能丧命——但你仍然要有所作为。只有这样，音乐才真正奏效，我才相信它的价值。如今，你写歌甚至不需要写普京，只需要写莫斯科某个车臣或达吉斯坦侨民的某个具体指挥官，或者，比如说，某个特定的帮派——就这么简单！（笑）

但现在你似乎并没有做类似的事情。

我们最近一直在探索人们吸毒的原因。专辑《Long Happy Life》和《Reanimation》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对“假期”的渴望。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假期”，非理性的，形而上的。如果我们得不到它，就会开始从外部寻求慰藉。这不仅仅关乎人类；动物也一样——它们会吃各种各样的迷幻植物根茎、蘑菇和水果。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意识状态的方法。因为现有的意识状态无法满足我们。就像伊基·波普（Iggy Pop）说的：“我还需要更多！”假期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假期，那么生命——就毫无价值。这就是自杀和死亡的根源，这就是雇佣兵、跳伞运动员、登山者和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根源——所有这些都是通往外部世界的道路，是令人恐惧的肾上腺素飙升。

你目前是否面临兴奋剂短缺的问题？

当然，我的确如此。年龄限制了我对这些东西的摄入。以前我酗酒，摄入大量“助兴品”，感觉棒极了，但现在我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令人难过又沮丧。我们仍然处于巅峰状态，但我感觉极限就在不远处。

听着，在这种情况下，音乐不就是一种升华吗？

在正常状态下，我从未真正创作过任何东西。（笑）我甚至无法想象在正常状态下，灵感会凭空出现……我不认为任何好的东西会那样诞生；你必须超越自我。我不能说我在创作——我更像一个管道。创作出来的东西无处不在。存在着一个领域，一个宇宙宝库，你只需要与之连接。你必须像猎人一样，长时间地狩猎，运用某些刺激方法，进行神奇的自我追踪。例如，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你一天中所有不想做的事情：想坐在椅子上——站起来，想睡觉——不睡，想打开电视——把它砸碎。在某个时刻，类似的事情就会开始发生。它就像一口井，一个漩涡，一条溪流在你体内奔涌。这可以通过各种灵修实践来实现。但如果有什么辅助手段可以帮助你，那就立刻使用它们。因为我不想等。

那么就不难理解格列宾希科夫为何如此热衷于信奉佛教了。

他的最新专辑其实挺不错的。我买到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它很有趣，而且真的很好听。比如说，我的最新专辑是在几次迷幻药实验之后创作的。在那之前，我大概有三年没碰过迷幻药了，之后

我经历了一次非常糟糕的迷幻体验，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然后，在下一次迷幻药体验中，我突然意识到——感觉就像我的内心深处被塞了个软木塞。这种情况通常是怎么发生的呢？当你厌倦了自己，你就会开始梦见自己。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无论你往哪里看，到处都是你自己，你开始感到窒息。我们以前有个导演经常说：“我真的厌倦了自己，我需要接受一些事情，我真的把自己搞砸了。”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那甚至算不上抑郁，而是一种彻底绝望的感觉，你被自己的想法、被自己根深蒂固的观点所窒息。当这一切崩塌时，就像软木塞被刺穿，就像我被从内部猛烈撞击，一股可怕的洪流喷涌而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录音：我会拿起一把十二弦吉他——正如尼尔·杨所说，你创作的歌曲取决于吉他，这话一点没错——然后坐下来作曲。现在我遇到了另一个问题。我最近的所有旅行——我从事旅行已经很久了，对我来说，这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体验，一种对自我和周围世界进行原型式理解的体验——都变得超越了个人层面。这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此也无法分享或传达。无论如何，我还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录完专辑后，我第一次再次踏上旅程，我看到了死亡的真谛。我突然明白了它是什么。我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人所代表的东西就像一个装着鱼的鱼缸，位于海洋之中。当它死去时，它就破碎了。它仍然存在于那里，但它不再有边界。在那之后——当你突然领悟了这些——你就变成了一个略有不同的人。也就是说，你不再是活着，也不是死了，而是以某种方式永恒存在。下一次，我甚至完全不再是人，而是某种宇宙。可惜的是，这种体验——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已经不再适用。我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它。它真的很难用语言表达。你可以去思考它……不，甚至不能去思考——你可以去感受它。

棺材纪事 | 文章：俄罗斯新闻社 - 爱德华·利莫诺夫称叶戈尔·列托夫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家

爱德华·利莫诺夫认为叶戈尔·列托夫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

[昨天在鄂木斯克去世的叶戈尔·列托夫](#)，这位邪典摇滚乐队“民防”的创始人和长期领导人，享年44岁。他的朋友、作家兼国家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爱德华·利莫诺夫说，列托夫是一位热情似火、意志坚定的革命者。

“叶戈尔是我们的战友，也是现已被取缔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之一。他是一位充满激情的革命者，持有绝对左翼的理想共产主义观点。他是一位热情洋溢、令人敬佩的同志，”利莫诺夫告诉俄罗斯新闻社。

据他所说，列托夫在很多演唱会上都挥舞着NBP的旗帜。他不喜欢被称作偶像，但利莫诺夫坚信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仍将是偶像。

“他是党内的音乐担当，人们不会忘记他，”该机构的消息人士确信道。

利莫诺维茨的领导人还指出，这位音乐家身体强壮，但不能说自己拥有“钢铁般的健康”。

“他不是个软弱的人。他意志坚定，辩才极佳，而且为人正直。他对我的道德标准要求非常严格。我们常常争论到深夜，”利莫诺夫说道，并补充道，“再见了，同志。”

莫斯科，2月20日——俄罗斯新闻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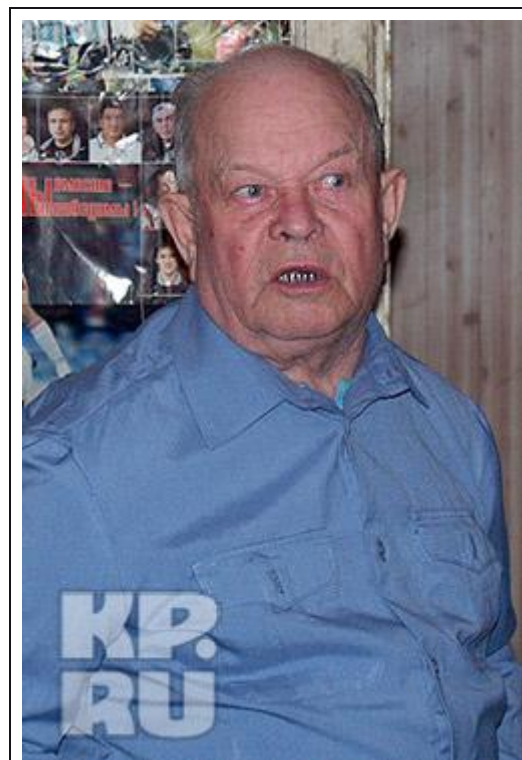
棺材纪事 | 文章：共青团真理报 - 列托夫的父亲：“我的儿子很有才华，但他酗酒太厉害了。”

列托夫的父亲说：“我儿子很有才华，但他酗酒太厉害了。”

鄂木斯克检察院已对这位音乐家的死因展开调查。

民防领导人叶戈尔的父亲费奥多尔·维克托罗维奇·列托夫曾是一名军人。他独自一人住在鄂木斯克一套三居室的公寓里（叶戈尔的妻子和母亲早已去世）。他儿子童年时的房间里，一切都还保持着多年前的原样。

墙上贴满了摇滚乐队——披头士乐队、齐柏林飞艇乐队——和足球队的海报。唱片和歌词随处可见。还有一把旧吉他。



费奥多尔·维克托罗维奇认为他的妻子娜塔莉娅没有看管叶戈尔。

2月19日晚，费奥多尔·维克托罗维奇从《共和军报》记者那里得知了他最小的儿子去世的消息。

“你这消息真是把我吓坏了，”他说，然后沉默了许久。“我上次见到伊戈尔大概是三周前。他来取回一些东西。我们握了手，拥抱了一下。他不常来，但有时会过来看看，有时是一个人，有时和他的音乐家朋友们一起。”

你听过你儿子的音乐吗？

“不，我和她并不亲近。但她很受年轻人欢迎，甚至包括我们楼里的年轻人。如果他能触动比他年轻几十岁的人的心灵，我认为他非常有才华。事实上，他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我们性格迥异。”

你给他妻子娜塔莉亚打过电话吗？

“不，我觉得那样的谈话毫无意义。我觉得她可能会因为他的死而自责.....”

- 为什么？

“他最近酗酒很厉害，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她无力阻止他酗酒，而且她自己也经常借酒浇愁。”

他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他的母亲生产时很艰难，他的生命也一度受到威胁。但他发育良好，两岁时就能流利地说话，很早就学会了阅读。六岁时，他已经熟知世界地图，并能背诵下来。他喜欢收集各种东西。有一天，他在邻居家的窗台上看到一盆仙人掌，立刻被这种花深深吸引，于是他阅读了大量关于仙人掌的书籍，很快，他的书桌上就摆满了36盆不同的仙人掌。



莱托夫最早的吉他之一。

伊戈尔在学校时成绩平平，他惯于对老师撒谎，甚至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后来他开始认真学习吉他，请了六年私人教师，十几岁时就开始和朋友们一起创作歌曲。那时，音乐是他的一切.....

“他从不抱怨，他很坚强”.....

鄂木斯克市乌切布纳亚大街上的一栋新楼房正逐渐被住户填满。叶戈尔·列托夫六个月前在这里买了一套公寓。

我们按响了这位音乐家的门铃。叶戈尔的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开了门。

- 抱歉，我现在没法跟你说话.....

乐队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走上台：

秋季游历乌克兰之后，叶戈尔决定在家乡定居。他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他有健康问题吗？

“任何人过了四十岁都可能遇到问题。但伊戈尔就是这样的人.....他从不抱怨，他很坚强。尽管他根本不运动。他只去看他自己的医生，他的私人医生.....”

顺便一提

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这位音乐家的死因进行调查。

当地时间下午4点57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点57分），鄂木斯克急救服务中心接到报警电话。赶到现场的医疗队确认该男子已死亡。

据我们的消息来源称，列托夫并非如先前报道的那样“安详地在睡梦中离世”。有迹象表明，这位音乐家的死因十分痛苦。预计鄂木斯克医生将于今日公布官方死因。

这起死亡事件显然并非如此简单明了。这或许正是鄂木斯克检察院对此事展开调查的原因。此外，调查人员已禁止列托夫的医生和亲属接受媒体采访。因此，目前仍不清楚是谁发现了这位音乐家的遗体。

这位音乐家的葬礼将于**2月21日**在鄂木斯克佩雷列塔街7号的殡仪馆举行，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葬礼将于下午**3点**在东部公墓举行。



在叶戈尔·列托夫父母公寓的房间里，一切都和多年前一样。



来自家庭相册的照片：妈妈、爸爸，叶戈尔坐在他哥哥谢尔盖的腿上——谢尔盖现在是一位著名的爵士音乐家。



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母亲。



叶戈尔·列托夫（右）与他的哥哥谢尔盖（左）一家。

叶戈尔（伊戈尔）·列托夫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没有理解或接受儿子的作品。

“他向我解释说，这是前卫音乐，不是用音符演奏，而是用灵魂演奏，表达情感。但我仍然无法接受，”他说。

“我们信仰不同。他对一些我从未感兴趣的事情感兴趣。我们的政治观点也不同。我们偶尔会争论，但很少。更多时候，我们干脆避免讨论某些话题，以免发生争吵。他是个浪子。我的意思是，他博览群书，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没有清晰的理论体系，而且他的想法经常变化。”

父子俩近来很少见面。一个退休了，另一个则一直忙于工作。

我们早上很早就起床了。我们吃了早餐。早餐时能聊些什么呢？什么也聊不上。有时他会说他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就把食物放在托盘上离开，以免打扰他。

父亲一直给予儿子完全的自由。

“我从未禁止过他任何事。伊戈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有时我很难和他交流，因为他在某些领域比我懂得多，而我却无话可说。”

父亲对儿子痴迷于古代传说、童话故事和神秘主义感到惊讶。

“他总是阅读新的传说故事，仿佛在寻找某个问题的答案。他的房间里仍然摆放着许多小雕像和圣像。他也喜欢毛绒玩具和鲜花，总是把它们带回家……”

据他父亲说，伊戈尔从未抱怨过自己的健康状况。

“有什么可抱怨的？不，我从没听他说过这样的话，”他说。

Chronicles | Rosbalt — 叶戈尔·列托夫：永远当玩家是不可能的

埃戈尔·莱托夫：不可能永远当一名球员。

“咱们现在就达成共识吧，”他在谈话开始时说道，“咱们立刻结束政治话题。我不会涉足政治，因为它没什么意思，而且我认为所有事情都应该交给专业人士来做。我更喜欢精神方面的活动；它们能温暖心灵。”

什么能让她感到温暖？

——想到世界上有那么多伟大的人——比如基拉·穆拉托娃，或者查尔斯·布考斯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书——我就觉得很美好。又比如，我家有三只猫在等着我。如果可以，我真想养更多，八九只：我从小就爱猫。第一只猫叫玛鲁西亚。每次谈到猫，我都会想起我的童年。或者想起共产主义。想想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生活！那时候简直太美好了，一点也不可怕。你只要喊一声“救命！”，他们就会来帮忙。那不是个制度，那是天堂。

我从小就爱读书。我母亲和祖母都非常和善。但我父亲和我却过着如同公租房般的生活。我们经常争吵，甚至打架。其实，我们家文化底蕴深厚，家教也不错。如果你查阅我们的族谱，你会发现它历史悠久。我们家族的祖先是商人和哥萨克人。我们家穷得连裤子都不穿，但家里总是堆满了书。我们订阅了“外国文学”杂志，还有大量的唱片收藏。精神层面也得到了培养。所以，我的成长环境并非与世隔绝。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童年的延续，就像一场游戏。

——所以所有根本性的变革都只是玩具的更换吗？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但这听起来很愤世嫉俗。而我从未对玩具抱有这种愤世嫉俗的态度。小时候，我玩过很多史诗级的游戏：它们构建了整个城市的宏大故事，但不知为何，这些故事总是以灾难告终。每当游戏角色死去，我都会非常难过，好几天都无法释怀。对我来说，这些玩具比真人更重要。

我小时候养成的另一个习惯是：我喜欢走路。这完全无法解释，但直到十岁左右，我根本不会开车。我的前庭系统有点问题：我总是晕船，而且会晕倒。所以我从来没去过什么地方。夏天，我也不去度假胜地或海滨度假胜地。直到1982年左右，我才第一次离开鄂木斯克，定居在莫斯科。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即使在当时，人们也会告诉游客，莫斯科不是用橡胶做的……”

“但我开始登记入学了。这就是我报读职业学校的原因。不过，这倒是个挺有启发性的故事。我去了瓦甘科夫公墓，那天可能是维索茨基的忌日，也可能是他的生日。人们聚集在诗人的墓前，互相握手，发表讲话。我也开口说话了。后来才知道，这些人当中有一个异见人士，一个很机敏、最热情的异见人士，他假装是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的粉丝，到处问别人要地址。于是，出于不谙世事，我也开口说话了，结果第二天就被驱逐出莫斯科。我不得不回到鄂木斯克。但这一切的发生都是最好的结果。”

——为什么民防部门的组成人员经常变动？

“我录制的大部分专辑里的所有乐器都是我一个人演奏的。我本来想找一支我自己也想听的乐队，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所以只好自己包揽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需要赞扬。当人们说‘哦，太棒了！’的时候，我知道它确实很棒。因为我做的东西，我自己都喜欢听。”

我喝得烂醉的时候，会放歌，然后哭。写诗也是一样。说不定我还会写本小说，我自己觉得挺有意思的。如果我要拍电影，我会第一个把科塔萨尔的《跳房子》拍成电影。我知道怎么做。黑白的那种。我还想和基拉·穆拉托娃合作。

尽管没有与“民防”组织的工作类似的组织，但莱托夫在“爱”组织的领导人亚瑟·李身上看到了相似之处，亚瑟·李目前因过失杀人罪入狱。

“他在某些方面让我想起了自己。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他坐在家里弹吉他作曲，突然一个邻居闯了进来，一切就此开始：叫喊、威胁、抱怨。李开枪打死了他。我和邻居的关系也和他很像。我已经收到过四张法院传票和八份驱逐通知了。”

谈话转向叶戈尔的熟人，他讲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关于他的同事伊万·莫格，一个俄罗斯朋克界的“老顽固”。伊万因为取笑妻子正在听她最喜欢的Yardbirds乐队专辑《Little Games》而被她杀害。这位女性的灵魂如此脆弱，以至于她为了艺术选择了牺牲自己的丈夫。

真是个精彩的故事！

“是啊，简直就像《赌城风情画》里的场景。”这句话可不能用来形容我。我有个非常好的妻子，我们生活得非常和谐。我和娜塔莎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我已经记不清了，是在扬卡的葬礼上。我们决定不哭不闹，而是像庆祝非洲节日一样庆祝这场葬礼。那天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撞到了吊灯，跳了各种各样的非洲舞，还播放了扬卡最喜欢的歌曲。

不久后，我们巡演到了新西伯利亚，被安排住在一个女孩家里。我当时都没认出她来。我们和她当时的丈夫（现在已是前夫）坐在厨房里喝酒，其他人则在屋外的长椅上抽烟。这时，我们乐队的一位乐手马赫诺走了进来，说：“来，你们一定要听听这个。”我们走了过去，她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评论员，正在侃侃而谈AC米兰和尤文图斯。作为一名资深足球迷，我便和她聊了起来，一切顿时豁然开朗。娜塔莎是一位职业马夫、骑师、记者、摄影师。而且她还曾加入过无数朋克乐队。

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很久。我纳闷叶戈尔为什么那么喜欢引用名言，又那么讨厌孩子。我们聊到了永恒，聊到了“民防”乐队那独树一帜的音乐理念，也聊到了死亡。我突然明白，叶戈尔已经死了十二次。但每次他都被从临床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第十三次，他们没能做到。他们没有时间了。

Larisa Alekseenko，记者和音乐学家

棺材纪事 | 文章: **gazeta.ru** - “叶戈尔是个好人，他离开 的时机恰到好处”

“叶戈尔是个好人，他离开的时机恰到好处。”

鄂木斯克居民是从新闻中得知叶戈尔·列托夫去世的消息的。他们承诺会低调安葬这位著名的本地人，不会举行新闻发布会，也不会有人群聚集。



鄂木斯克的人们直到2月20日才通过电视新闻和网络得知叶戈尔·列托夫的死讯。这位“格拉日丹卡”乐队的主唱经常回老家探亲，但总是十分低调。由于不习惯引人注目，这位音乐家对回家的行程秘而不宣；只有亲密的朋友、乐队成员和家人知晓。

近几个月来，持续不断的“时代更迭”已成为一个令人耿耿于怀的问题。与此同时，有些人和事所代表的并非某个时代或某个时期，而是这种现象本身。周二去世的那位正是如此.....

2月19日晚，叶戈尔·列托夫在鄂木斯克公寓内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的传闻开始在城内流传。然而，列托夫的熟人无一人能够对记者和粉丝提出的疑问给出确切答复。当晚晚些时候，媒体开始报道此事，其中卫军司令谢尔盖·波普科夫描述了事件经过，传闻才得以证实。

列托夫的邻居们说，那天早上看到有车停在叶戈尔家门口，显然是朋友。这位音乐家的公寓位于鄂木斯克郊区一栋老旧的五层楼房里。这栋楼和巴尔瑙尔或沃罗涅日典型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时代的建筑没什么两样。这是一栋典型的赫鲁晓夫时代破旧的公寓，位于佩特拉·奥斯米尼娜街上，列托夫家的公寓因为在一楼，所以窗户都装了铁栅栏。

甚至很少有邻居知道这里曾住过一位著名音乐家。

退休老人塔玛拉·阿克谢诺娃经常在院子里见到伊戈尔（叶戈尔·列托夫）。她说他是个很有礼貌的年轻人，总是会打招呼。“我没法说他什么坏话。我知道他搞音乐，但我不知道他这么有名。现在我知道了一—我的孙子是他的铁杆粉丝，他说伊戈尔的歌很独特，但我没听过，所以不太清楚。”

叶戈尔的院子里没有花圈，也没有成群的歌迷；这位音乐家的朋友们说，不会举行盛大的葬礼。“在鄂木斯克，这不是习俗；这里只是一个安静的省会城市。是的，我们的朋友去世了，但我们谁也不会大张旗鼓地宣扬，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也不会吸引人群。为什么？我们哀悼，但这就是生活，”叶戈尔·列托夫的朋友，音乐家亚历山大·切斯诺科夫说道。

当晚，一群以朋克为主的当地非正式团体聚集在市中心河港附近。大约五十名年轻人决定前来悼念格拉日丹卡乐队的主唱。有些人只是闲聊，而另一些人则秉承朋克文化的传统，喝着啤酒，高声唱着乐队的歌曲。一个年轻人独自站在人群之外，默默地哼唱着，也是列托夫的作品。当被问及这位音乐家的去世时，他出人意料地回答道：

“对我来说，这甚至是一种快乐。叶戈尔是个很棒的人；他按时离开了，正如他所愿。”

“凡事都要在合适的时机进行，死亡也不例外。我们许多伟大的音乐家都在合适的时机离世——崔、巴什拉切夫、尤里·克林斯基赫，还有叶戈尔。所以一切都恰到好处，就该如此。”

几名警员在远处观察着事态发展。他们解释说，对于这位音乐家的去世和葬礼，他们没有接到任何特别指示，因此不太可能增加巡逻。他们只需要控制住大量年轻人，其中许多人都喝了酒，而且没有人打算驱散人群。

在寒风中站了大约三十分钟后，鄂木斯克的朋克们分散开来，向他们逝去的偶像致敬，沿途互相询问葬礼将在何时何地举行。

预计**2月21日**的追悼会将大量民众参加。

届时到场的不仅有乐队的歌迷，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乃至独联体国家的音乐家和歌迷，他们将前来送别叶戈尔·列托夫。叶戈尔·列托夫的葬礼将于鄂木斯克时间下午**3点**后在老东方公墓举行。

棺材编年史 | 文章：莫斯科共青团员——九天的孤独

九天的独处

谢尔盖·列托夫：“叶戈尔继承了他曾祖父的性格，根据传说，他的曾祖父因为残暴而被哥萨克人勒死。”

“我不再年轻，也不再是朋克了。《民防》对我来说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种心理疗法。当我情绪低落时，我会打开它，起初感觉更糟，然后才会感到解脱。”

一位名叫tigman的读者在mk.ru网站上留下了这段话。说得太对了。叶戈尔·列托夫帮助人们活下去。他已经离开九天了。但他仍然会帮助更多的人。

他从鄂木斯克来到首都，用他那震耳欲聋的歌声震撼着听众，一股脑地把新歌倾泻而出。有时，他的歌声听起来像是未经雕琢的，仿佛他昨天才写完，今天就已经唱出来、嘶吼出来了。他因为高产而牺牲质量，因为过于阴郁和激进而饱受诟病。但任何愿意费心去理解他那略显粗糙的音质、粗俗的歌词和无韵诗的人都会明白——他是一位诗人。他拥有独一无二的嗓音，以及痛苦而又光芒四射的内心世界。你或许不喜欢这个世界，却又无法不去铭记它。列托夫，这位始终特立独行的音乐家，是俄罗斯摇滚乐的支柱之一。

2月19日，叶戈尔·列托夫去世。关于他去世的报道比关于他生平的报道还要多。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如何去世，而是他如何生活。葬礼后的第二天，最了解叶戈尔的人——他的兄弟，著名萨克斯管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回答了MK的提问。

——你去听过民防乐队的音乐会吗？

——考虑到我在乐队里待了五六年，我肯定去过……

——不，那作为观众呢？

——从来没有。音乐是我的职业。我从80年代初就没以观众的身份去看过摇滚音乐会了。

“你是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而GO乐队却因为歌曲中只有三个和弦而饱受诟病。你如何评价你弟弟的音乐？

”“我总体上对俄罗斯摇滚乐持批判态度。传统上，这里的一切都以歌词为中心。音乐被视为伴奏。可以说，我们所有的摇滚乐都是原曲的重金属版本。但我对伊戈尔的作品持非常积极的态度。”

——对你来说，他更像一位诗人而非音乐家吗？

——很难将二者分开。在我看来，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者。他集作曲家、诗人、表演者于一身，浑然一体。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他音乐中的音响效果比乐队的演奏更有意思。毕竟，叶戈尔以前并不识谱。至少在2003年之前是这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创作了许多原创作品。当我与莫斯科的一个乐队一起为民防致敬活动录制歌曲时，我意外地发现，如果不进行简化，就很难复制他的音乐。他的音乐中有很多出人意料的和弦，很多不拘泥于常规的元素。

——你演奏的是精英音乐。你羡慕过你哥哥的受欢迎程度吗？

——不。我很清楚我的音乐不可能流行起来。俄罗斯人不懂音乐。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歌曲

本身。而对我来说，歌曲并不算是真正的音乐。但我一直都为我哥哥感到骄傲，现在依然如此。我为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感到骄傲。我们为此争论过很多次。他会说：“你怎么能在只有45个座位的小剧院里演出？我绝对不会那样做。”叶戈尔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必然会流行起来，他对精英音乐持怀疑态度。我强烈反对他的观点，但你无法和他争辩。他的才华正是朝着那个方向发展的。

——你也和很多摇滚乐手合作过。——

对我来说，和摇滚乐队一起演奏是一种尝试，一次体验高能量的机会。但在高能量下，细腻的技巧是无法实现的。我加入GO乐队是为了帮助我哥哥。一段时间后，我就离开了。现在我经常演出。我们现在在鄂木斯克，后天我在伦敦有两场演唱会。

——你哥哥和你还有哪些不同之处？

——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我能轻松融入任何项目，但我不太愿意承担自己的项目，因为那样我就得从头到尾负责所有的事情。他恰恰相反。如果他参与过别人的项目，也只是在初期阶段。比如，他和扬卡一起演奏的时候。之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到实现自己的想法中，为此他会亲自挑选乐手。这就是我们不同的创作方式。

——那么生活呢？

——我喜欢很多事情：我讲课，写关于文化生活的文章，我对电影和诗歌很感兴趣。他则全身心投入到歌曲的创作和录制中。当然，叶戈尔是一位博学之士；他至今仍拥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他的音乐收藏更是浩瀚无垠：从黑胶唱片到CD，应有尽有。他聆听过所有这些音乐，分析过它们，对音乐有着深刻的理解。

——考虑到你们长期居住在不同的城市，你们的关系有多亲密？

——我们一直保持通信。有一段时间，他每周都会寄好几封信。

——纸质的？

——是的。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一封电子邮件。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排斥互联网，说电脑是魔鬼的产物。他也拒绝所有数字技术。有好几年，他把录音用卷盘式磁带寄给我，我在莫斯科把它们数字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3年。之后，我开始教他和娜塔莎（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叶戈尔·列托夫的妻子，民防组织成员）电脑技术。之后，他们开始使用现代音频处理系统录制专辑。乐队的技术水平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你大概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很内向，喜欢独处。他拥有一个非常广阔的内心世界。这几乎就像是诗歌《莫斯科-佩图什基》里的一句台词。”叶罗费耶夫在描述维尼奇卡时写道，他无限地拓展了亲密关系的范畴。叶戈尔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喜欢独自在森林里散步。他创作自由诗，出版地下书籍。然后他会来莫斯科，给我看他的作品。那时候音乐甚至还不存在。

——那它什么时候开始散发异味的？

——1982年，我们组建了“不安音乐乐团”；我哥哥打鼓，我吹铜管乐器。后来我从安德烈·特罗皮洛那里得知，里克尚在圣彼得堡以100卢布的价格出售他的贝斯。我告诉了叶戈尔，他去买。那是他第一次去圣彼得堡。当时叶戈尔已经在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乐队里弹贝斯了。我哥哥和我住在一起，在一所职业学校读书。但这所学校只是他去莫斯科的借口。不出所料，他很快就因为旷课被开除了。于是他就回家了。

——你对首都感到不满吗？

——倒也不是真的不满。只是那时候他似乎已经决定要演奏完全不同的音乐了。作为哥哥，我可能压制了他。他决定摆脱那种影响。从1984年到1998年，我们没有任何合作。1996年，库廖欣去世了，我很难过。大约就在那时，我和哥哥的关系又开始亲近起来。我想邀请他参与我的项目，朗诵诗歌。而他邀请我和他一起演奏。就这样，我加入了“民防”乐队。

——他本人像他的歌里唱的那样强悍吗？

——他性格多变，也确实很强悍，尤其对“外人”更是如此。在家里，我觉得他很温柔，对娜塔莎也很体贴。他天生就是个领导者，是众人瞩目的焦点。如果他觉得某人有趣，就会很乐意和对方交流，但交流中他不是伙伴，而是老板。如果他觉得某人没意思，他的强悍就会显露出来。我经常看到他生气。这是家族遗传。我母亲是马尔捷米亚诺夫哥萨克家族的人，叶戈尔显然也继承了家族血统。家族里有个传说，说我外公脾气暴躁，凶狠无比，以至于哥萨克人都勒死了他。

“叶戈尔为什么不去莫斯科，而是留在鄂木斯克？那里机会更多啊。

”“我费尽思想把他劝走，用了各种各样的理由。但对他来说，独处和亲近自然很重要。即使在鄂木斯克，他也过着近乎隐士般的生活。叶戈尔出生时，我们住在市中心，在一栋以前是高尔恰克马厩的军官营房里。一年后，我们搬到了鄂木斯克郊外的契卡洛夫斯基村。叶戈尔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一生……他和娜塔莎搬进新公寓时，距离新年只有三天。所以他其实从未真正在那里生活过……

他非常珍视他的回忆。他经常去母亲的墓地。而且总是独自一人。我们陪着父亲一起去，但他总是独自前往。这么多年来，我们只一起去过他母亲的墓地一次。契卡洛夫斯基村有一片白桦林，他以前经常去那里散步。”大城市和派对让他感到压力很大。

在鄂木斯克，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算是“民防乐队”的起源地？

“民防乐队”就是在我们公寓里起步的。大部分录音都是在那里完成的。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鼓，就用一个旧书包代替……邻居们都吓坏了，但叶戈尔慢慢地让大家都习惯了。他们不在鄂木斯克演出，主要在新西伯利亚和秋明表演……

“他是个有钱人吗？

”“他一辈子都住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建筑里，住在他父母的公寓里。他没有任何个人财产，连辆车都没有。他们甚至都没在鄂木斯克市中心买新公寓，而是用它和娜塔莎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公寓换了一套。”

——所以我才问。**GO**的唱片卖得那么好，在文明国家他可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但在这里，好像所有东西都是盗版的？……

——他对盗版很反感，但个人财富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我哥哥为人非常朴素。他总是穿着廉价的衣服——T恤、牛仔裤、运动鞋。他不喜欢新东西。公寓里所有的架子都是他用一些废木板亲手做的。但每块木板都经过他独特的改造，做工非常精美。他也是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看合同，如果演唱会取消，他可以争取到赔偿。在这方面我很羡慕他。我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至今都想不明白他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毕竟，我们的童年非常幸福；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或许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他们的鼎盛时期，**GO**乐队的演出也不多。”

“是的，巡演主要是为了赚钱录制新专辑。他们总会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旅费由他们承担。然后他们会去一些小城镇巡演。我认为乐队的指挥谢尔盖·波普科夫是个天才的组织者。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一手策划和安排的。回莫斯科的路上，他们会买一大包书、唱片和磁带。到了鄂木

“所以他也为你感到骄傲。

”“也许吧。我还没完全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救我父亲；他已经心脏病发作六次了。他是我们家唯一的亲人了。我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

d. 鄂木斯克

Chronicles | 彼得罗扎沃茨克第十大学 — 叶戈尔·列托夫: “我们必须正视现实.....”

埃戈尔·列托夫: “我们需要正视现实.....”

今年二月，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的去世震惊了许多人。他曾让全国人民传唱他的歌曲，是年轻人的偶像，也是普通民众的“精神支柱”，既是革命者，也是诗人.....“突然之间”，所有之前对叶戈尔不闻不问的电视台都开始争相报道他，在最后两周播出的节目比他二十年职业生涯的总和还要多。

但我这一代人，正值青春年少，与萧条的九十年代重合，对《Oborona》的感激之情却截然不同。聆听莱托夫的专辑——黑暗、激进、无情讽刺——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理疗法。仅仅是调高磁带的音量，就足以让我们充满狂热的能量，帮助我们争取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人认为莱托夫是极端分子，但他的作品却在扼杀我们内心深处的法西斯主义种子。或者，他是在替我们承担所有潜在的罪孽？这真是一个难以承受、危险的重担！

如今，这些歌曲，以及叶戈尔在不同年份的珍贵演唱会录音带中保存下来的“幕后”独白，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让我们聆听、阅读，或许最终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人！

摇滚乐就像一种自我毁灭的宗教。一个人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在一段时间内（好吧，也许是五年——这时间相当短！），他的情感体验就相当于六十年。每场演唱会都倾注了如此多的情感和能量，以至于生命会飞逝而过。

有人认为我们在1986年和1987年所做的事情是一种政治活动。但这并非政治；这是一种对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这种秩序一直存在，并且至今依然存在。讨论的重点并非我们的歌曲是否反苏；总的来说，这些歌曲是反社会的。

这首歌必须表达我此刻的心境，而且必须奏效。要奏效，它必须有一段明快动听的旋律。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个极端主义者。

“民防”事件其实跟音乐无关。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弹吉他。这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在我看来，摇滚和朋克是一种表演形式，对演奏者和观众来说都应该是极其欢乐的。

- 如果我去听我喜欢的乐队的演唱会，我会跟着跳起来尖叫，因为这个乐队能激发我内心的某种情感。如果我不喜欢，我会直接离开。傻傻地坐在那里听有什么意义呢？
- 基本上，我唱歌和作曲是为像我一样的人而做的。
- 民谣音乐才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就是朋克。

每个人都可以声称自己掌握真理。每个真正活着的人.....

由奥列格·加尔琴科撰写

Chronicles | Billboard 第 4 名 (12) — 叶戈尔·列托夫的遗言

叶戈尔的遗言

2007年10月，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

指挥谢尔盖·波普科夫突然打来电话，说叶戈尔·列托夫想接受《公告牌》杂志的采访。10月27日，我们在托奇卡俱乐部的更衣室见面，在演出前聊了将近一个小时。两天后，他突然来到我家，我们一起听了半天的音乐，翻阅唱片，叶戈尔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着。谁又能想到，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呢？

非俄罗斯迷幻药的根源

我从小听迷幻摇滚长大。我最喜欢的乐队之一是乡村乔与鱼乐队（Country Joe & the Fish）。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聊上几个小时，把每首歌都拆解开来，分析每一个乐句和独奏。毕竟，在我们国家，没人真正听过或理解这种音乐。这里每个人都听尤里亚·希尔（Uriah Heer），我们至今仍然用他来衡量摇滚乐。每年，我都发现自己越来越沉迷于六七十年代的音乐。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对我来说是个复杂的人物；有时候我不太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但尼克·德雷克（Nick Drake）的音乐包罗万象；我可以一直听他的歌；那完全是我的菜。还有菲尔·奥克斯（Phil Ochs）——你怎么可能错过那种音乐呢？

现在我终于做成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事，但之前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实现。我一直想让我的音乐听起来像六十年代加州迷幻摇滚。我以前写歌词政治性很强，会说脏话，试图制造轰动效应。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做是必要的，也帮助我实现了目标。在我们国家，情况就是这样。这就是游戏规则，而且至今未变。没人理解我们音乐的根源，这真是令人无比沮丧。我们不玩俄罗斯摇滚。我们的根源在The Who或者The Love之类的乐队，而不是俄罗斯摇滚。但这里没人听这种音乐，所以他们根据自己有限的认知给我们贴标签。最近有个记者问我什么是朋克摇滚。我开始聊Television乐队，他看了我很久，然后说：“那Green Day呢？”唉，还能说什么呢？

当我开始创作专辑时，脑海中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想法。我所有的音乐知识都退居幕后，更多地起到指引作用。我总是想要打破既定的规则，打破一切既定的规则，甚至是我自己制定的规则。如果某件事已经有人做过了，那么沿着同样的方向走又有什么意义呢？没必要重复乡村乔·麦克唐纳（Country Joe McDonald）做过的事情；你只要放他的唱片听听就行了。

音乐的秘密生活与对孤独的渴望

我现在很多专辑里的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一切都像是别人做的。而那个人现在的想法和我现在完全不同。如果换成现在的我，我会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去做。我录歌的时候，并不完全清楚别人会怎么看待它。我创作上一张专辑的时候，它还和我有一些联系。但唱片一发行，它就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就像一个快速成长的孩子，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其实并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一旦我开始明白自己想表达什么，它就变得索然无味，歌曲也变成了一堆口号。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创造力的原则很简单：索取——回馈。我索取了很多，但如果我不想成为寄生虫，就必须回馈我所得到的。我必须用一些世界尚不拥有的东西来回应，并让其他人从中受益。多年来我所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我的人生并非徒劳，而是成功的。尽管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已经是对主要成果的锦上添花。我已经把最重要的东西奉献出去了。

围绕我名字的种种喧嚣让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是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喜欢独处。就连乘坐普通的巴士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这种经历让我感到压力巨大。我不喜欢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他们总是盯着我看，走过来跟我搭讪，说些什么。我厌倦了这一切。幸福就是在山里或森林里；在那里我感到最自由、最放松。人们总是想方设法闯进我的化妆间，想方设法让我回家……我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我非常爱他，但即使他还活着，我也绝不会想到去他家递给他一张纸条，说：“请在这里写点东西作为纪念。”

打破规则与西伯利亚朋克的神话

我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一件事：在我们国家，乐队只有发行专辑才算存在。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就是这样发展到今天的。毕竟，我身边有很多乐队。但每个人都在坐等奇迹发生——一个有钱的制作人、一个很棒的录音棚、一份合约。我们只有一台“Nota”牌录音机——我们就用它录音。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歌词——所以你必须提供歌词。用指向性麦克风，尽量把每个字都录清楚，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打破常规！

我们是这个国家第一批演奏老派美式朋克摇滚的乐队，就像雷蒙斯乐队那样。在那之前，我们认为朋克就是像斯维尼亚那样的，但那算什么朋克摇滚呢？最令人沮丧的是，当时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而音乐人或乐队绝对需要竞争，否则你的创作就会停滞不前。你的领域里竞争对手越多，你就越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在80年代，我们曾与一些实力强劲的乐队竞争：BOMZH、Instructions for Survival、DK。后来他们都消失了，只剩下我们孤零零地待在地下音乐圈。人们开始向我们祈祷，开始诅咒我们，但没有人停下来思考：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孤单？

那时候，我在新西伯利亚搞了个虚构的朋克运动。我们一共五个人。我虚构了好几个乐队，然后我们写专辑，其实还是那五个人轮流担任主唱。最终，全国上下都觉得新西伯利亚是某个恐怖运动的发源地，那里乐队林立，还有自己的朋克学校等等。我的想法奏效了，直到今天，很多人还相信我们当时确实有个强大的朋克运动。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经常写歌，然后署上当时在场的人的名字，营造出一种大众化的假象。不过现在，我倒是要尝尝苦头了——我得先征得那些虚构作者的同意才能重新发行这些歌。

死亡、精神病院与苏联

我们的作品笼罩着一种奇怪的自杀氛围，仿佛我们一直在歌颂它，宣扬这些理念。然而，我们依

然活着。但你必须明白：我1984年入行，那时苏联正处于鼎盛时期，我确信情况会一直如此。像我这样的人都被别人记住了名字，他们监视着我们，有时还会让我们知道他们盯上了我们。比如，他们可能只是在街上随便打你一拳，就为了取乐。我当时是个艺术家，午休回来，站在公交车站等车。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男人走过来，一句话也没说，就打了我一拳。“你举止不当，”他事后说着，捡起我的眼镜，放进口袋，又补充道，“我要把它留作纪念。”这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们把我叫到当地的克格勃办公室，在那里威胁我。他们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诊断结果是“迟钝型精神分裂症”。我亲眼目睹一个男人被注射了大量的氟哌啶醇，结果真的疯了。然后，为了形成鲜明对比，他又注射了氯丙嗪，结果变成了一株植物。在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之前，他画了一些没有面孔的女人。他甚至还在鄂木斯克举办过一次画展，结果被当地媒体狠狠地抨击了一番。他创作了一幅三联画——两个没有面孔的女人和一个石膏盒子。当观众聚集在一起时，他用锤子敲击盒子，结果飞出了鸽子。之后，他立刻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们开始给我注射药物后，我摸索出了一套应对方法——我学会了与自己的身体保持距离，专注于精神层面，并且大量写作。经理经常来看我，我把所有的笔记都给了他。那时我写了大量的诗歌和故事，至今仍然保存着。但当身体上的疼痛变得难以忍受时，我去找了主治医生，说：“你想死吗？我现在就逃走，找到最近的高楼，然后跳下去。”医生仔细地看了看我，突然说道：“好吧，去你的。”然后他们彻底停止了给我注射药物，甚至连药都没给我吃。他们安排我在厨房工作，我在那里服完了刑期。1985年3月8日，他们让我出去散步。

那时，我清楚地明白，情况永远如此，无论你多么努力，他们都会找到你，把你关进监狱，杀了你。这种死亡近在咫尺的感觉反而是一种解脱，它培养了一种内心的喜悦。人面对死亡永远不会说谎。这很难向那些只道听途说了解苏联时期的年轻人解释。我们谁也不想死，只是那时我们体验到的现实就是——徘徊在死亡的边缘。

我经历过许多至亲离世的痛苦。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出现一个黑洞。你还活着，你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张由人、地点和事件编织而成的地毯。然后突然间——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洞，接着是另一个……这些洞永远无法填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治愈它们。所有这些人——他们也是你的一部分。母亲去世时，我写了一首歌《我的防御》。现在，我把每一位逝者都与一首歌联系起来，这些歌都是在他们离世后立即创作的。这些人通过特定的歌曲继续活在我的心中。

扬卡与“百年孤独”

扬卡于1991年去世。关于她的死因众说纷纭。我不知道她后来发生了什么。在她去世前的那一年，我们几乎没怎么见面。那时她有个男朋友，和他住在一起。分手并不愉快——两人的人生轨迹突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她明显倾向于商业主义，比如，一切都应该为了人民，人们需要接受教育，应该为他们带来福祉等等。

然后他们打电话告诉我，扬卡失踪了。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甚至去找了巫医和术士。这种情况持续了两周。突然，我意识到她已经死了。清晨五点，一只蝴蝶飞到我面前。那是一只凤蝶；我们这里根本不长这种蝴蝶。蝴蝶落在我的手上，紧紧地附着着。我试图把它赶走，但它却不肯离开。于是，我带着这只奇怪的蝴蝶穿过森林。我知道它是来向我告别的。我也向它道别。它听了我的告别，飞走了。

扬卡去世后，我们发行了《百年孤独》。这张专辑我们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创作，期间没有进行任何演出。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时光，如今我只能在梦中重温。我当时根本不想开演唱会。我一年只开一场，但我会把它办得像一场盛大的庆典。我想专注于录音室的工作。但经济上来说，

不开演唱会真的很难。以前要容易得多。我靠《Pryg Skok》这张专辑赚了25000美元。有了这么多钱，工作就轻松多了。金钱能给艺术家带来自由。那时候，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创作。我们不去参加那些糟糕的演唱会；我们从早到晚埋头创作。《百年孤独》是一张自由之作；它没有任何束缚。但发行这张专辑之后，我不得不休息一段时间。很多事情都堆积在心头——中年危机、挥之不去的衰老感、酗酒问题。我也经历过那段时期。

“长寿幸福”和“复苏护理”

北东音乐剧被劫持事件让我深受震撼。当时我住在莫斯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一口气写了五首歌，后来收录在专辑《漫长而幸福的人生》中。我回到家后，一切便一发不可收拾。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创作的似乎是一部关于毒品的歌剧。人们为什么需要毒品？整个人类历史、文化、艺术——一切都与某种他们必须依赖的拐杖息息相关。

我自己也住过重症监护室。我当时喝了很多酒。通常来说，清醒后的第二天，歌曲的创作灵感最为强烈。那时头脑清醒，精力充沛。有一次，我酗酒过度，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附近不断有人垂死挣扎，他们就那样把尸体堆在走廊里。突然，他们送进来一个士兵。他大概还有十五分钟的生命，但在那短短的时间里，他仿佛开启了某种心扉，诗意的话语如泉涌般倾泻而出！他滔滔不绝地讲着——关于白杨树，关于狗，关于一位受伤的指挥官.....我向医生要了一支铅笔，开始疯狂地把他说过的话全部记下来。这就是歌曲《重生》（Reanimation）的由来。这首歌完全由这位士兵临终前所说的话组成。音乐瞬间在我脑海中诞生，一切都水到渠成，剩下的就是把它写下来。

我现在很开心

我们的最新专辑或许五年后，甚至十年后才会被人欣赏。它会和《百年孤独》一样，姗姗来迟地获得认可。我创作《我们为何做梦》时完全没有考虑当下的现实。结果它成了最完美的Civil Defense专辑。很有可能，这张专辑之后，我就不会再创作任何作品了。我需要休息，不能无休止地写同样的东西。现在，我绝对没有心情发行任何新专辑。

我们的反叛并未结束，只是升级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仔细听听这张新专辑。只是大多数人还不理解。其实我很庆幸自己还活着，还能继续打破自己的陈规，继续创作，写出你们以后会明白其含义的新歌。我不知道这一切能持续多久，但至少现在我很开心。

莱托夫最喜欢的地方是靠窗的第一张桌子。

谁能想到，这位长期领导标志性“民防”组织的领袖，在学校里竟然是个全优生？至少从小学四年级到八年级都是如此。列托夫当时的班主任是俄语语言文学老师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萨列姆哈诺娃。她一直记得这位著名音乐家是个身材修长、眼神清澈的男孩，是全班同学的榜样。

“我简直无法想象伊戈尔会得C，”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说。“他从来没有带着没做完的作业回家过。”

“Gr.Ob.”的未来领导人不仅创作了优秀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爱书人。

列托夫唯一感到吃力的科目是体育。据老师们说，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但他积极参与学校的社交活动，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创作诗歌，并在课堂上和创意写作活动中朗诵。

列托夫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总是参加家长会。几乎没有老师见过他的母亲。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那天：9月1日，他们和爸爸一起散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真是令人赏心悦目，”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回忆道。“他们总是送我鲜花和小说。”

盖达尔的一本书至今仍保存在老师家中。叶戈尔还收集仙人掌。他家里至少有150棵。

1979年，柳德米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搬到了另一个区，叶戈尔的班级也换了老师。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列托夫开始对音乐产生了兴趣。三年后，他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乐队“波塞夫”，两年后，也就是1984年11月8日，他组建了传奇乐队“民防”。直到他去世后，老师才知道她挚爱的学生已经成为俄罗斯最有才华的诗人和音乐家之一。

“我的孙女儿们说，‘奶奶，那是叶戈尔·列托夫，全国人民都知道他！’”老师摇了摇头。

如今，在鄂木斯克第45中学，师生们开设了一座纪念这位著名校友的博物馆。顺便一提，据叶戈尔的哥哥说，他从未获得过高中毕业文凭；十年级毕业后，他只拿到了一份证明他完成了高中学业的证书。

Пик Омский, Клаксон Ушедший. Интервью с Манагером (публикуется впервые!!!)



登录



2008年12月27日 下午7:17

类别:

[社会](#)

[音乐](#)

[孩子们](#)

[取消](#)

鄂木斯克峰，警报声消失了。经理访谈（首次发布！！！）

LiveJournal社区对Oleg“经理”Sudakov关于Lishchenko兄弟（“Pik Klakson”、“Klakson Gam”）的采访👉 [pik klakson](#) 这部纪录片将讲述科学朋克摇滚乐队“阿道夫·希特勒”、一位立陶宛女性、嬉皮士、猫和友谊.....

奥尔加:

嗨。时间过得真快，你准备好跟我讲讲了吗？我能想象，有时候我都会哽咽.....

经纪人:

嗯，只要我记得的.....或者如果我能提起精神的话。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奥尔加:

“阿道夫·希特勒”乐队是怎么成立的？

经纪人:

就像所有孩子一样，都是从我父母那里来的（微笑）。珍尼亚曾经一晚上就写完了专辑里的所有歌曲，也就是说，他一口气全部创作出来了。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早上，当然，白天他已经开始把歌唱给奥列格听了，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他们就已经把整张专辑都演奏完了。那时候的速度真是惊人。那天晚上我们好像在排练，还有三四个人在场，但所有人都同时演奏，奇怪的是，录音就是这样保留下来的，还加上了Zhenya的介绍——“科学朋克摇滚乐队‘阿道夫·希特勒’”。我不知道

他当时为什么会以阿道夫为原型创作这首歌。Zhenya热爱历史，大学也拿到了历史学位。现在，有一个话题——否认大屠杀，以及以色列是如何呈现这段历史的。Graf、Zundel、Irving等人似乎都证明了，纽伦堡审判中有很多谎言，都是为了让胜利者获利而捏造的。所以，结果证明，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预言。O：他晚上写作只是巧合吗？还是尤金经常这样做？M：我想是经常。毕竟，他们经常熬夜，这在摇滚乐手中很常见。可以理解，大家都已经睡着了——父母也好，邻居也好——安静而超然地睡着了。你写作，就能真正写出来。白天可不是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感觉很费劲。虽然尤金似乎并不特别在意昼夜交替，但晚上写作还是更好。干扰更少，一切都更顺畅。我从亲身经历中知道——晚上写作效果更好，当然了。对了，巴布告诉我他们曾经在夜里环游世界。奥列格：怎么回事？米歇尔：那是冬天。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我和奥列格成了朋友，然后我才知道这件事。就说是某种游戏或者娱乐吧。那时候，这很正常——开玩笑或者……嗯，为了让事情更生动，或者只是那样看待它们。就去航行吧。格林并不是唯一一个读过《猩红之帆》的人。比如说，你从喀琅施塔得出发。天气凉爽，风也很大。他们打开窗户，抽根烟，然后——东北风吹来，呼啸着把所有的人都叫醒，升起前帆。如果是在赤道附近，那就把炉子开到最大火力。所有的煤气炉都点燃了，如果风平浪静，你才能把自己浇透，然后躺在躺椅上摇晃。往手指上吐口水，然后吐出去。哦，真可惜，没风（笑）。如果是在合恩角附近，那就把窗户大开，裹上防风外套，往脸上泼自来水：那里有冰，还能怎么办呢？这就是我们经常遇到的夜晚，所以“阿道夫”这个名字并非偶然。也许他想象出了整个画面，而珍妮娅读了很多书，有一天灵感迸发，然后——就把它写下来了。问：还记得第一届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吗？你们当时是以“阿道夫·希特勒”的名义演出的吗？他们怎么会让你用那个名字上台的？那可是1987年啊！M.：

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我想，这件事已经被讨论过很多次了。1987年初的冬天，在恩斯克，他们决定举办第一届摇滚音乐节——不是那种全市范围的，因为之前已经举办过了，而是跨城的。一个真正的音乐节。我们忙着四处奔走，急忙赶火车——列托夫兄弟、谢廖加·谢尔盖耶夫和我。碰巧我们得知“Zvuki Mu”和“Auktsyon”乐队没来；我想是共青团委员会禁止他们来了。必须有人顶替他们。摇滚俱乐部主席穆尔津听说过列托夫兄弟的事。他介绍了一支来自鄂木斯克的乐队“民防”，还给我们看了歌词。以前，写歌词然后提交给委员会审批，这叫“litovka”。我不记得他们写了什么。大概是一些中立的、看起来还算体面的歌词。所以他们批准了。他们一开场，气氛就紧张得令人窒息：观众屏息凝神，管理人员目瞪口呆，或许他们只是在偷懒。好吧，既然他们在演奏，观众也在呐喊，那就让他们尽情发挥吧。毕竟，兄弟俩演奏了六首歌，然后列托夫又演奏了四首自己的作品。但当他唱到《愚人之地》时，音响工程师基里洛夫对着舞台监听器脱口而出：“老兄，你是不是疯了？”这句话大家都在录音里听过无数遍了：“老兄，你是不是疯了？”显然，到了这个时候，整个音乐节的高层都被吓坏了，他们把替罪羊/音响工程师们耍得团团转。这事儿是有原因的——巴布梳着梳子，光着脚，列托夫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三个人在演奏，却感觉像六个人。当你被震撼到的时候，你会想象出一个完整的管弦乐队。想想看——第三帝国，《我的奋斗》。那简直是一场丑闻，令人震惊，彻底的灾难，视频里有三十段争吵。我的名字也跟着进去了，而且一直没能洗清。

O

:

你说的是“经理”那件事吗？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M

:

是的，我已经跟你说过一百遍了。演出结束后，他们三个去了地下室。那里有更衣室。我和谢廖加

跟着他们，在门口，一个共青团员不让我们进去——他们不允许我们进去，说有重要的谈话。我鼓起勇气说我是这个团的团长，是我带他们来的，我负责。“哦，”那家伙惊呼道，“进去吧，他们也会告诉你一些事的。”然后他就放我进去了。区委的教官斯卢亚诺夫也在。他训斥他们，斥责他们——你们太坏了，你们怎么敢，这是什么，法西斯主义吗？我们的人坐在那里窃笑，这让他更加生气了。我刚走进来——现在是改革时期，伙计们正在给年轻人带来，你可以说，改革，而你呢？你不明白吗？这些都是四月纲领。他几乎尖叫起来。好吧，他跟我说了些什么，我也跟他说了些什么，然后他就转身走了。列托夫说：“这是我们的导演，这是经理。”这个绰号就这么定了。我给自己取过“无政府主义者”和“多米尼克”的绰号，但都没流行起来。热尼亚甚至在他的诗里打趣道：“但是多米尼克同志，他努力走直线……”

O:

伊戈尔·福斯特说，尤金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创作出了绝妙的歌词；他声称尤金有诗歌天赋。你读过他的诗吗？

M:

是的，里面有故事、各种格言和散文。甚至还有一本笔记本。我想我们当时把整本都抄录下来，带到新西伯利亚去，现在可能在连卡（叶夫根尼的妻子）或婷卡（他的女儿）那里。我很快会去拜访奥尔加·维克托罗夫娜的母亲，问问她。可惜我记不起来了。卢基奇肯定能告诉你，他的记忆力很好。他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从他的歌里就能听出来——他是个天生的作家，天赋异禀。福斯特说得对，确实如此。热尼亚很有才华，但我当时并不真正了解他。他很谦逊，有点内向。当时我觉得他有点内向。不，他更忧郁一些。巴布则更活泼，更外向开朗。哦，对了，我还记得卢基奇说过的一句话，他特别喜欢逗我——就连我父亲也不放过，哪怕只是一句俏皮话。O

:

你生气了吗？

M:

没有，我是说，我没听懂。我想要的是更宏大、更优美的表达。我的自尊心啊，对自己说“别介意”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或不愉快。后来我明白了——他总是爱开玩笑，而我有时确实话太多了。不，我已经释怀了。毕竟，这只是朋友间的玩笑，没有侮辱，虽然带点挖苦。时光无法倒流，真是可惜。时不时地，你会想起那段往事……

O:

尤金是嬉皮士吗？

M:

我不这么认为。从外表上看，他可能像个嬉皮士——发型、疏离感，去过高加，去过辛菲罗波尔。不，至少在我看来不是。嬉皮士是一种体系，搭便车走公路，住在公寓里，躺在草地上，无所事事，沉思冥想，闲逛。他可能不知何故变成了那样，但——那是个意外，唐娜·安娜，一个意外。我们喜欢引用苏联电影里的台词，比如《唐璜》。这就是我想到的。当然，你也可以把嬉皮士归类为一种存在状态，光明、爱、启示。那么切·格瓦拉也是个嬉皮士。荒谬。更像是六十年代就在当下。自从六十年代的浪潮消退，所有人都被归为一类——那些把那个时代当作自己家园的人，以及那些因为时尚而涌入那个时代的人，来自非正式圈子……

问：

比如说，在《额外声音》里谁演奏大提琴？

答：

当然是贝布。我想是的。该死，贝布在音乐会上演奏，珍妮娅会吹长笛。我永远不会忘记在辛尼克社区中心看到他们的情景。我当时完全懵了，完全没想到，甚至还有点尴尬。虽然不是水族馆乐队，但那种民间音乐的风格足以让人叹为观止。不过话说回来，珍妮娅也能做到。他们俩都是多才多艺的乐器演奏家，只是一个擅长某一方面，另一个更擅长那方面。对了，你还记得大提琴琴颈上的铭文吗？（琴颈在他们公寓的一场火灾中烧毁了。）Guil-O-Tina。嗯，他们女儿的名字叫廷卡，这是个梗。而“断头台”这个词则代表了某种刻板印象。我一开始没明白，但最终自己也琢磨出来了。他们那里总是挂着一些东西。有一条链子，上面挂着眼镜。就那样挂着，没人注意到，然后奥列格问：“你觉得怎么样？”他咧嘴一笑。“哦，这些……是啊，”他说，“链子上挂着眼镜。”嗯，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把画框装上去。或者猫：画猫的画。各种各样的——从莱利克画的，到巴布自己画的，或者别人送给他的。整整一个画廊……

O.:

对，我记得，我甚至还养了一只他们的猫，一只黑猫。你喜欢哪些PC的歌？

M:

哈哈，你真厉害！现在一切都很好。你根本感觉不到什么区别，变化太大了。O

:

不，我是说以前，或者更确切地说？比如，我喜欢《We'll Do Each Other a Favor》……

M:

Beb的《Mice》、The Order、Sparrow，还有Zhenya的《Which Morgue Is Better》、Snowy Avenue、The Crazy Idiot，或者Hey, Brother Lyuber。不，反正现在你也感觉不到什么区别了。只是以前，他们不太注重偶像：好听的歌，独特，朗朗上口——这就足够了，你就能点餐吃点东西。好像每个人都这样，如果有人唱得更糟，他们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群忽略。我的意思是，一切都恰到好处，切中要点，或者说完美无缺。我感觉这股创作热潮不会停止，它会一直持续下去，还会创作出上百首歌曲。你可能不会立刻理解，但听过两三次之后就会被深深吸引。他们会聚在一起唱歌，你总能让他们再唱一遍。天哪，那首歌真是太棒了——《清扫街道的工人在清晨扫掉被打掉的牙齿！》可惜他们最终没能那么幸运。这并非因为名气，而是因为很多人本可以拥有更多，因为他们至今仍然不知道如何才能避免在民防或退伍军人个人保护方面过于引人注目。而且，这股西伯利亚浪潮也同样席卷而来。不是朋克，至少不是朋克。这并非因为他们的音乐更宽泛；这对兄弟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他们并不刻意强调社会政治或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精神更加前卫。听起来很老套——他们分道扬镳了，但泽尼亚在事业巅峰时期去世，巴布花了很长时间才恢复过来。他非常爱他的哥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思念着他……

奥列格：

啊，可是奥列格——宝贝，毕竟他更年轻。他喜欢聊些什么，唱些什么歌，笑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关于他哥哥的话，又恨些什么呢？你一下子说了好多……有些方面他和他哥哥不一样，有些方面又很像，但从外表上看，他不一样。不，你看到了——他们三个都很有魅力，而且彼此之间似乎有一种

和谐。很难说他有多讨人喜欢，他有一种直率而又极具感染力的特质。无论他做什么，他要么忧心忡忡，要么觉得好笑，但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不随波逐流。是啊，你可以那样做。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有些人似乎接受规则，不愿妥协，但他们不得不妥协。在办公室里，或者在不熟悉的场合，但巴布——不。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周围的空间会微微收缩（笑）.....他读什么书——这并不重要。比如说——《拉丁美洲民族神话》或者莱玛、谁人乐队、麦卡特尼，或者《屁眼冲浪者》。这不是重点，这无法描述，也说不出什么。他喜欢法国电影，那又怎样？谁不看他们呢？比如说我要去新西伯利亚。咱们来讨论、争论。他祝贺我：毕竟，这就是爱。然后我脑海里浮现出一本书——《基督的阴影》。后来我把一切都改了，但当我告诉他，他明白了之后，他说：“你真是个失败者！”我说：“怎么会？为什么？”他对我说：“我喜欢自己改变别人的想法，但你做得太大了。”我明白了。你看？很多人只是装腔作势，试图模仿他们，或者到处炫耀。他没有那样做，但他确实察觉到了虚伪，并且没有放任不管。不，他没有惹麻烦，也没有嘲笑他们，当然，这种情况也发生过，但从未超出他的承受范围。尽管如此，奥列格仍然尊重这个人，即使他做得太过分了。珍妮娅也是如此，只是方式略有不同，但这并不是重点。这就是为什么斯拉夫卡一直陪着他们，甚至保护他们。O

:

那他是谁？

M:

你应该记得——扎哈罗夫。又高又瘦，阿富汗人。他以前经常来看他们。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眼神里没有笑容的人。他会笑，但他的眼神锐利而冷漠。他是个伞兵。他回来后，这里的一切就不一样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打架，他喝酒，但他是个很酷的人。有一次我去看他们的演唱会，然后走过去和他们说话。他住在附近。我们聊了聊。想想看——他和他的兄弟们！他们就像两个星球。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从外表上看——制服，包裹——他逐渐适应了，甚至敞开了心扉。你知道，电影里喜欢那种“心地温暖”的感觉。他们基本上就是唱这个的，只有现实世界才能理解，只有从光明中，从侧面，才能真正理解。你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但他来自另一个圈子，所以对他来说这并不重要。斯拉夫卡就像他们的保镖。演唱会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嘿，兄弟，柳伯！我到底想说什么？如果剥去外衣，他们非常耀眼，而且总是很有趣。这非常引人注目，毕竟我亲眼所见。O

:

我对他的了解不多，但我看到一个男人散发着异乎寻常的光芒，他似乎无法呼吸.....他告诉我，他一动不动地坐在一个地方好几个小时，不知道该如何生活，他极度不想长大.....

M:

谁想变成一个脸皮厚的傻瓜？以后或许就无关紧要了，但你可能永远不会忘记，就像一个失去双臂的人会永远记得自己的手臂一样。还有你哥哥呢？真尼亚已经死了，但他的灵魂却永远都在，而他的灵魂却缺失了一半。这个空洞永远无法愈合.....我曾经问过他，他笑着说：“真尼亚本该从部队回来的。我一直在等他，琢磨着该怎么回事。我把所有情况都想好了。比如，我正从窗边抽烟，他正好走过来；或者我走过来，他已经从上面朝我挥手了。我想，要么是这样，要么那样。但结果我漏掉了一种可能——我睡过头了。我醒来，他就在那里，穿着军装，就在我对面。“嗨，”他说.....”或者伊尔卡。那么多事，丑闻和酒，如果她不在，他就等着。他很忠诚，但如果有人做了什么卑鄙的事，他绝不会原谅。他或许看到了，但他的灵魂深处却留有伤痕.....

O: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才能一针见血。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比几百句毫无意义的文字更能展现一个人的性格。M

:

说实话，这行不通。你见过他，所以对你来说比较容易，但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那不过是一堆杂乱的文字，或者像一篇墓志铭。人们问起扬卡多少次了？关于她的文字那么多，却又那么少。因为你想亲眼看看，却总是与你擦肩而过。难以捉摸的纯粹。你说，一个小细节，让我想想。对我来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比较容易。97年之后，他和谢廖加不知怎么就没能录到他们的歌。每个人都想要，他们关系很亲密，他们去了圣彼得堡，我想，但最终还是没能录到。然后我准备离开。我感觉自己像个孤儿。我能感觉到。我给他留了一张切·格瓦拉的拼贴画作为纪念。我们有时喜欢彻夜长谈。茶、贝洛莫尔，无所不谈。他有时会喝得酩酊大醉。我不会喝酒，对身体一窍不通。就是这样。所以我从他的话语中了解了很多事情。我们见过面——有时是和伦卡·普罗希娜或迈克·斯塔里在一起，但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我会等他，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回应。很多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会巨大的变化：宿醉难耐，而且通常根本没时间写诗。但巴布却从未改变。他几乎没怎么缓过来，然后就又恢复了原样。我很久没写歌了，但后来诗歌和故事却源源不断地涌现。我喜欢那些神秘的东西，或者不为人知的考古学，或者埃及的奥秘。他总是能吸引我；我会倾听，会争论，会交谈，然后接受他的观点。你总能感受到，当谈话时机恰当，内容也合拍时，那种感觉尤为强烈。从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大约持续了十五个小时。我自己也很感兴趣，因为能通宵达旦又如此有趣的谈话并不多见。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我每次去新西伯利亚，他们都会问：“巴布怎么样，又熬夜了？”很奇怪，但他们的到来并非偶然。O

:

那是你去埋葬扬卡的时候吗？你给我写过信。M

:

是否发表由你决定。我们三个去了——巴布、叶戈尔和我。我们在车厢里待了半夜，回忆往事。结果发现没人喝醉。到最后，我们变得如此亲密，以至于决定结为兄弟，这样死亡——不，是生命——才有可能存在。我们各自用刀在手上划了个十字，然后互相触摸对方的手，让鲜血混合。也许这只是一种炫耀式的纪念方式，但我已经不在乎这种狂热或虚荣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他们中的两个人已经不在，我想把他们带回来，去看望他们。没有人。这慢慢地触动了我的心，但每个人仍然活在我的记忆中。这将永远——谢利瓦诺夫和其他人。好了，就此打住吧，不然我会感觉有点太激动、太过了。O

:

好吧，但是告诉我，快五年过去了；2004年的悲剧难道就没有发生吗？

M:

我不知道。它总是那么契合，就像钥匙插进锁里一样。巴布常说，本质，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一场狂欢。为了所有人，没有任何复杂之处。这是他的原话。现在感觉像狂欢吗？尤其是在他们的音乐和目光的映衬下？仿佛一切都是刻意安排的——巡逻队、夜晚、密码，还有公园里那些为娜塔莎而来的怪人。我该向谁提问？是谁在上面策划这一切？在鄂木斯克，我们活着的时候很容易谈论死

亡。我们因此而与众不同，但许多人却害怕。内战。他们在《战车》里把那首歌献给了他。还有马赫诺？他们也抓住了他，明天就是他去世九周年了。太多东西需要用笔墨和色彩来描绘，才能让人突然感受到它。如果无法重现，又能如何呢？还记得怀尔德的《圣路易斯大桥》吗？你只能对人生无奈地举手，却无法阻止它。这就是命运。最重要的是不要试图理解——聆听歌曲，它们会告诉你一切，但言语永远不够.....

奥尔加·库拉耶娃于2008年12月26日至27日拍摄于萨拉托夫-鄂木斯克，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不支持表单

Google 翻译时请勿处理此类表单中的信息。

我知道了前往原始网址open_in_new



А кому охота в дурня толстокожего превратиться? Потом все равно, но можешь и не забыть и будешь, как безрукий руку вспоминать. А брат? Женька умер уже, а в душе был, и не хватало, то есть буквально половины не было. Дыра и не зарастает...Я его спросил, как-то, а он улыбнулся и говорит: «Женька из армии должен был прийти. Я его жду, прикидываю – как будет. Все перебрал. Например, курю в окно, а он идет или я иду, а он уже машет сверху. Думаю, либо так или так. А оказалось, один вариант не учёл – проспал. Просыпаюсь, а он напротив в форме. Привет, говорит...». Или Ирка. Сколько всего, и скандалы и дринк, а если нет ее – ждёт. Был преданным, но и не прощал, если какую подляну кто делал. Мог и видеть, но в душе шрам....О.: Не знаю, о чем спросить так чтобы попало прямо в точку. Иногда, какая-то мелочь характеризует человека лучше, чем сотни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чащих строк.М.: Если честно, то не получится. Ты его видела и тебе легче, а со стороны – набор слов или как эпитафия. Сколько раз про Янку спрашивают, а про нее, сколько написано, но мало. Потому что вживую хочется, а ускользает. Ускользающая простота. Мелочь, говоришь, сейчас подумаю. Мне проще – из своего. После 97-го, как-то у них с Серегой не получалось записаться. Всё хотели, были рядом, ездили в Питер, кажется, а мимо. Потом я собрался отъехать. Осиротело стало. Чувствовалось. Я ему коллаж с Че Геварой на память оставил. Мы ведь иной раз любили ночь напролёт болтать. Чай, Беломор и обо всём. Он иногда сильно в алко улетал. Я-то пить не умел, не то тело. Вот. Поэтому про многих с его слов знал. Виделись – с Ленкой Прошиной или Майком Старым, но это не то. Так вот, дождусь, позвоню и всегда он зазывал. Многие ведь когда в штопор, сильно меняются: отходняк и вообще – не до поэтики. А Бэб никогда, то есть не менялся. Чуть оклемается и такой же. Песни долго не писал, и все равно потом полилось и стихи, и рассказы. Так вот, я любил про эзотерическое или непризнанную археологию, или про тайны Египта. Так всегда его манило, слушал, спорил-говорил и принимал. Это же всегда чувствуешь, когда к месту и на двоих разговор. Так часов на пятнадцать – с вечера до утра. Мне самому интересно, ведь редко чтобы на всю ночь и в интерес. Наши-то знают и когда я в Нск приезжал, всегда спрашивали – Как Бэб, опять на всю ночь? Странно, но ведь забратались не случайно.О.: Это когда Янку хоронить ездили? Ты писал мне.М.:

Chronicles | 首页 报纸 第29期 (029) — 叶戈尔·列托夫热爱自然，并收集仙人掌

直接引语

DDT乐队主唱尤里·舍夫丘克说：“

列托夫是最不拘一格的诗人，他不受任何人或任何事的束缚。他的作品已成为一部杰出的经典，新一代不安分、不拘一格的人们将会发现它，并从中汲取灵感。他们将用这些歌曲点亮自己的生活，然后继续摇滚，继续生活。”

埃戈尔·列托夫热爱自然，喜欢收集仙人掌。

9月10日，著名摇滚乐队“民防”的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将迎来45岁冥诞。在这位摇滚巨星的忌日前夕，德国之声的一名记者采访了他83岁的父亲费奥多尔·列托夫。

伊戈尔还是伊戈尔？

叶戈尔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的公寓温馨而简朴。屋里有一台电视、一张桌子、几把旧扶手椅，还有一个书架，上面摆放着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就在这些共产主义象征的左侧，一件黑色T恤上印着民防队队长叶戈尔的肖像。不知怎的，这位深思熟虑的叛逆者列托夫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家们如今并肩而立，竟显得如此和谐。

提到列托夫的本名，总让人觉得别扭。毕竟，歌迷们习惯的只有一个人——叶戈尔。但伊戈尔却是另一个人，一个完全陌生的角色。“对家人来说，他一直都是伊戈尔。这个名字是他哥哥谢尔盖取的。叶戈尔是个民间名字，就像斯捷潘·拉辛一样。这是一个赋予他英雄形象的艺名。我不知道是谁给他取的这个名字。但当我这么叫他的时候，他非常生气，”他的父亲回忆道。

叶戈尔·列托夫演奏的是抗议之歌，是怀疑之歌。“我永远反对，”他唱道，而他也正是如此生活：怀疑、痛苦、抗议，在最严苛的自我审查下挣扎。他是一位“杀死了自己内心的国家”的诗人。正是这种意义深远的抗议，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厌恶和对世界的愤怒“崩溃”，使他能够引起广大听众的共鸣。

在家人眼中，他似乎疏远而孤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是他们挚爱的儿子，伊戈尔。

植物学家-收藏家

谢尔盖和伊戈尔出生时都受了产伤。“小儿子身体很差，”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他的婴儿时期几乎都在医院度过。不断地检查、会诊和开会。在他一岁半的时候，医生对伊戈尔的父母说：‘你们现在哭是因为孩子可能会夭折，但请记住，他长大后性格会很古怪。’但这样的孩子通常都很有天赋，很有才华。他可能会成为作家、艺术家或诗人。”这位睿智的医生的话后来被证明是预言。

列托夫兄弟俩从小就展现出过人的天赋。谢尔盖18个月大的时候就能像大人一样说话，他惊人的记忆力也让所有人叹为观止。伊戈尔很早就开始画画，而且速度很快，笔法也很灵活。“他不仅画

画，还画各种各样的题材。而且他写字也很好，”他的父亲回忆道。

叶戈尔·列托夫童年最喜欢的爱好是收集东西。“他收集了很多东西：徽章、邮票、标签、硬币。他非常喜欢植物，尤其是仙人掌。我们家有35种不同的仙人掌。我们出去散步时，他会看到别人家窗台上摆着仙人掌，然后说，‘我们家没有这样的！’于是你就得去问仙人掌的主人，”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回忆道。

伊戈尔也热爱动物，尤其是猫。“这爱好遗传自他母亲，她也是个爱猫人士。伊戈尔去世时，别人送给他三只猫作为礼物。它们现在都还活着。他的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为了纪念他，收养了其中两只。第三只送给了一位名叫安东的民防队员，他是个好人。我没时间照顾它们，所以就把它送人了。”这位退休老人坦言道。

评论

谢尔盖·列托夫谈及弟弟叶戈尔的去世：

“我为他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而感到骄傲。他拥有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性格多面。他外表坚强，但在家人面前却温柔体贴。死亡对他来说并不遥远或可怕。他童年时期经历过14次临床死亡。死亡对他来说是熟悉而亲近的，他曾多次体验过。他一直游走在生死边缘，走在人生的快车道上。虽然你从他的外表上根本看不出来——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

阴郁的想法

费奥多尔·列托夫对儿子的作品褒贬不一。“我不会把叶戈尔的作品称为歌曲。它们更像是思想，”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认为。

列托夫的思绪总是阴郁的，就像他本人一样。“他很少笑。他总是孤僻、内向。他不允许任何人敞开心扉地交谈。仿佛他过着与我截然不同的平行人生，”我父亲悲伤地回忆道。

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会时不时地听儿子的录音，试图找到自己心中疑问的答案：这悲伤究竟从何而来？但他始终找不到答案。“最终，我理解了他的作品：如果有人能理解它，那就说明有人需要它。”费奥多尔·列托夫坦言道。

他默默地擦去眼眶里涌出的泪水，凝视着伊戈尔-叶戈尔·列托夫若有所思的脸庞。“我好想他，好想他。”父亲真挚地说。对他而言，叶戈尔和伊戈尔是同一个人，是他挚爱的儿子，于2008年2月19日离世。对于整个俄罗斯来说，叶戈尔是一位永恒的英雄，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波琳娜·佐罗娃

棺材编年史 | 共青团真理报 — 叶戈尔·列托夫在一岁半时就被预言会成名。

叶戈尔·列托夫一岁半时就被预言会成名。

今天是邪教组织“民防”领导人逝世一周年纪念日。

俄罗斯朋克摇滚的创始人之一于2008年2月19日在鄂木斯克的公寓中去世，享年43岁。最初，列托夫的死因被认为是急性心力衰竭。但医生后来得出结论，乙醇（酒精）中毒也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之一。

整整一年过去了，青少年们依然穿着印有偶像头像的T恤，GO乐队的专辑在唱片店里依然热销，这位摇滚歌手的家人和朋友至今仍无法接受伊戈尔（列托夫的真名——作者）已经离世的事实。在他逝世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我们采访了与这位音乐家关系密切的人。

摇滚歌手的父亲，费奥多尔·列托夫：

“我一直都有种不祥的预感！”

“从我意识到儿子去世的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与他不够亲近，也不够坦诚，”叶戈尔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坦言。“我一直有一种预感，觉得他会遭遇不幸。在他去世前六个月，我的儿子就曾心脏骤停。医生们对他进行了抢救——他们进行了人工呼吸和按摩。”

伊戈尔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缺陷。全家人都为此感到悲痛欲绝，生活十分艰难。他们悉心照料伊戈尔，让他恢复健康；但他一直体弱多病，拒绝进食。他们不得不使出各种办法。

“我已故的祖母会用拨火棍抵着他的头，敲打他的头，或者做些其他事情来分散他的注意力，好让他吃饭，”父亲继续说道。“后来，在喂饭的时候，我开始给他读书。所以，在他学会说话之前，他几乎已经把书背下来了。如果我突然读错了单词或短语，他就会大喊：‘线，线！’”

“伊戈尔在各方面都很有天赋！”

伊戈尔18个月大的时候去做了体检。这时，他已经变得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爱玩爱闹了。

“你现在为他哭泣，害怕他会死，但你要记住，他长大后性格很古怪！”医生说道。“但同时，他也会很有创造力。他会成为一位著名的诗人、艺术家、音乐家或歌手。”

后来，她所有的预言都开始一一应验。伊戈尔从小就喜欢花，并开始画花。

“不像老谢尔盖那样只会画绳子，他能画人，能画战争中的士兵，还能画全景图，”他的父亲回忆道。“他总是手里拿着笔。他发育得很快，但我们并不急着送他去上学。他最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了。”

“我对伊戈尔印象很深，”鄂木斯克第45小学教师尼娜·菲利波娃说，“他是个知识渊博的孩子！通

常孩子们只对一两门学科感兴趣，但他对所有事情都感兴趣。他写的文章非常有趣。他只需写几句话，就能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后来，列托夫对收藏产生了兴趣。起初，他痴迷于仙人掌。在家里，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就摆放着38种仙人掌！之后，他又对邮票产生了兴趣，他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还让儿子加入了集邮俱乐部。后来，他又开始收集植物标本，收集昆虫和蝴蝶标本。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兴趣。

“我们家藏书很多，但伊戈尔想要属于自己的书，”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说。“于是他开始自己制作书——书很小，更像是笔记本。他把它们缝在一起，还画了图画。后来我们开始把它们一起拍照，重新打印整本，这样他就能拥有自己的那本了。这让我儿子非常自豪！”

“伊戈尔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他的班主任柳德米拉·萨列姆哈诺娃回忆说。“我以前读过他的诗，但都很幼稚——写的是动物、植物、昆虫。”

“我们花了两年时间才想出第一个乐队的名字！”

伊戈尔居住的契卡洛夫斯基村，跳蚤市场是当地年轻人的聚集地。那里出售西方乐队的唱片，这在当时相当罕见，从披头士到齐柏林飞艇，应有尽有，都是那些没能摆上唱片店货架的唱片。

“要不要我介绍你认识一下我那时髦的邻居？”一个朋友曾经问过我，”伊戈尔·列托夫的朋友瓦西里·科罗贝尼科夫回忆道。“我刚开始和列托夫一起玩的时候，就被他渊博的知识惊呆了。他只要听一遍歌就能准确地说出是谁弹的，甚至连录音师是谁都知道！大概在七年级或八年级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们想组建自己的乐队。我哥哥帮我们找到了所需的乐器。一开始，我们尝试挑选曲子——演奏我们最喜欢的歌曲。然后伊戈尔会拿着歌词来唱歌。不过，他那时候的嗓音还很稚嫩！”

这支男子乐队很快在学校里走红。他们尝试在学校演出，但这些演唱会并不总是受欢迎——老师们不喜欢西式音乐。

放学后，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们会聚集在公寓里排练，一直练到傍晚五点——直到邻居们下班回家。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男孩们仍然想不出乐队的名字。

“那时候，包括伊戈尔在内，每个人都痴迷于收集口香糖标签，”科罗贝尼科夫继续说道。“它们很稀有，这些色彩斑斓的纸片在我们看来无比珍贵。放学后，我和伊戈尔各奔东西。后来，我听说GO乐队已经很受欢迎了，也听到了列托夫的歌。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声音和上学时相比变化太大了。”

打电话给我哥哥

“他喜欢与所有人、所有事作对！”

摇滚歌手的哥哥谢尔盖·列托夫住在莫斯科，也从事音乐行业。他是一位萨克斯管演奏家，也是一位著名的爵士音乐家。

“现在我主要记得的是我们的童年，”谢廖加说。“上学前，我像个保姆一样照顾他，因为他父母总是上班。我给他穿衣服、喂饭、带他散步。伊戈尔有点自私，他喜欢我行我素，跟所有人、所有事都对着干！长辈们劝他不要那样做时，他总是说：‘那就让我更惨吧！’根本没法反驳！”

成年后，他来莫斯科看我，开始学习各种乐器。起初是鼓，后来他对贝斯产生了兴趣。巧合的是，我给他买了人生中的第一把贝斯。之后他便深深沉浸于音乐之中——他对各种音乐类型都感兴趣，唯独对摇滚不感兴趣。后来他回到鄂木斯克，我们的音乐之路也从此分道扬镳。

— 首都的哪些方面让他不满意？

“尽管我不断邀请他，但他始终不想住在莫斯科。伊戈尔总是拒绝：‘在鄂木斯克，没有什么能分散我的创作精力。’而且他从未渴望过财富。”

— 在那之后，你们还经常联系吗？

“我们每周都互相写信，然后打电话。有时一周甚至有好几封信。但信总是用纸写的；他从来没给我发过一封电子邮件。伊戈尔不接受电子设备。”

——仅仅通过听伊戈尔的歌就能了解他吗？

“他年纪越大，专辑风格就越偏离早期作品。最后三首歌都是关于漫长而幸福的人生。”

— 你和哥哥的朋友、同事保持联系吗？

“顺便一提，我目前正在和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Konstantin Ryabinov）合作一个项目，他以前是GO乐队的成员。大约十年前，我哥哥介绍我们认识。伊戈尔去世后，科斯佳打电话来提议合作。不久后圣彼得堡将举办西伯利亚运动节，我们将作为鄂木斯克代表一起演出，并将这场演出献给我的哥哥。”

你经常梦见伊戈尔吗？

——这件事确实发生过，但非常私人，我不想谈论它.....

Chronicles | Express Gazeta — 叶戈尔·列托夫因新公寓去世

叶戈尔·列托夫因新公寓去世。

2月19日是民防队长逝世两周年纪念日。

2008年2月，朋克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的灵魂人物、43岁的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在鄂木斯克意外去世。两年过去了，这位传奇音乐人的死因至今仍是谜。各种传言满天飞：有人说叶戈尔睡梦中被呕吐物呛死，也有人说他因酒精中毒导致心脏骤停。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就连他最亲近的家人也不知道真相（或许他们刻意隐瞒了什么？）。至少叶戈尔的哥哥，莫斯科爵士乐音乐家谢尔盖·列托夫（Sergei Letov），“在某些圈子里小有名气”，至今仍不明白弟弟究竟发生了什么。



列托夫兄弟（左边是谢尔盖）有时联系密切，有时几个月都不说话。

“我和伊戈尔（叶戈尔的真名是**T.K.-S.**）已经四年没说过话了，”谢尔盖说。“我们又吵架了。以前我们也吵过架，之后两三年都没说话。

”“那我们上次吵架是什么时候？”

”“那次吵架我没到场。我们之前约好我去鄂木斯克帮伊戈尔录新专辑。我最近给他买了一台专业的数码录音机，因为我哥哥的设备当时已经坏了。GrOb唱片公司只是个名义上的录音棚；实际上，那是我父亲在赫鲁晓夫时代那套三居室公寓里的小房间，以前是我们家的育儿室.....出发前不久，我遇到了经济困难。所以我给伊戈尔发邮件说，如果他愿意支付我的单程机票，我就去鄂木斯克。他似乎非常生气，连回复都没回。从那以后，我和我哥哥就几乎没联系了。”



叶戈尔和扬卡：当列托夫得知他的第一任同居妻子去世的消息时，他用刀割伤了自己的手。

每年我都会在母亲的墓前装饰一棵圣诞树。

“但作为哥哥，你大概知道叶戈尔的死因吧？”

”“对我来说也是个谜。我甚至比已公布的推测还有更多疑点。我和该组织的负责人谢尔盖·波普科夫谈过，他是我哥哥身边最信任的人。谢尔盖说，据救护人员说，死亡时间大约在中午（叶戈尔的家人大约在傍晚五点发现他已经去世——**T.K.-S.**）。”



朋克派对：左边角落里戴着眼镜的是伊戈尔，他用左手拥抱着扬卡。

“有些人觉得很奇怪，叶戈尔在新公寓住了不到三个月就去世了……

”“的确，2007年12月底，他和妻子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吉他手）搬进了鄂木斯克高档社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但他们没有带上82岁的父亲。也许这正是致命的原因。毕竟，父亲总是照看着伊戈尔，必要时还会叫救护车。”





——你是不是经常叫救护车？叶戈尔有没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

——我父亲告诉我，伊戈尔去世前六个月，他曾呼吸骤停。父亲立即叫了救护车，医生们用人工呼吸和心脏起搏救活了他哥哥。伊戈尔一生中总共经历了14到15次临床死亡。我和父亲不止一次用床单把他抬上救护车……问题是，我们母亲来自塞米巴拉金斯克。她曾接受过大量的辐射。因此，我和哥哥的整个童年都在医院里度过。伊戈尔体弱多病——他患有先天性胰腺功能不全。

“叶戈尔和他父亲真的像猫狗一样水火不容吗？他们说你哥哥差点就动手打他了？

”“我不想谈这个……但我认为他确实有可能。这很奇怪，因为他的父母非常疼爱他，几乎对他百依百顺。他们觉得伊戈尔不久于人世，所以他的每一个愿望都立刻得到满足。有一天，我哥哥看到窗台上摆着一盆仙人掌，说他也想要一盆。于是，我父亲就去了公寓，要了一盆仙人掌的‘小苗’！伊戈尔和他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复杂。相反，他和母亲的关系非常亲密。他母亲53岁就因癌症去世了，就像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一样。所以，每年12月31日，伊戈尔都会独自一人去母亲的墓前，装饰她的圣诞树！”

医生们禁止编码

“谢尔盖，有人说吸毒过量也是可能的死因之一。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叶戈尔在采访中多次提到他服用过LSD……

”“我从没见过他吸毒。他连烟都不抽！没错，我和女朋友闹矛盾的时候，他建议我服用LSD。但他自己只试过一两次毒品。他的问题是别的……”





——酒精？

——很遗憾，是的。我怀疑他开始喝酒是为了撑过两个小时的演唱会。他需要酒精来提神，激发灵感。顺便一提，我自己也只在演出前喝过几次酒——而且只在和“卫国联盟”（Grazhdanskaya Oborona）一起演出的时候喝。演出期间和中场休息时，每个人都会喝酒。不是为了喝醉，而是为了有精力完成演出。

我大约在1996年从他的经纪人热尼亚·格列霍夫（Zhenya Grekhov）那里第一次听说我哥哥的酗酒问题。两年后，他的出版商叶夫根尼·科列索夫（Evgeny Kolesov）也来找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只有你才能让伊戈尔（Igor）听你的。”于是我据理力争。我强迫他吃药。

——这有用吗？

——有时候有用。我分析了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起我们家有一位祖先是酒鬼。我们外祖父，一位名叫马尔捷米亚诺夫的哥萨克，在1937年被镇压，他写信给我外祖母说：“我父母家有五个人。”但他只列出了四个。我一直觉得这很奇怪。后来我才明白：我外祖父有个兄弟，名叫沃洛佳，是个酒鬼，我外祖父很羞于见他，给他买衣服、给他钱，只是为了让他不要露面。

“你试过劝叶戈尔接受治疗吗？”

”“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他没法治疗。他意志非常坚定，什么都不怕。对死亡的恐惧也阻止不了他。”



叶戈尔在鄂木斯克的墓地：两年过去了，纪念碑仍然没有竖立起来。

“他的父母为他哭泣。”

“谢尔盖，我听说你和伊戈尔的关系并不亲密。四年没联系，确实很长……

”“你误会了。没错，我们偶尔会吵架。有时候，我每周都能收到他从鄂木斯克寄来的五六页长的信！但后来我们的通信中断了——克格勃开始打压伊戈尔，他被迫接受精神治疗。我们甚至在电话里也说话很生硬——80年代末，我们的电话被窃听了。

但你不能说我们的关系很紧张。大概就是我开始给当时只有八岁的伊戈尔带唱片的时候，他决定成为一名音乐家。我小时候，父母送我去音乐学校，但我很快就厌倦了枯燥的学习，于是离开了父

母，去了新西伯利亚的一所物理数学寄宿学校。在那里.....我开始渴望音乐。几年后，我买了一把萨克斯管，搬到了莫斯科。过了一段时间，16岁的伊戈尔来找我.....”他宣布想学贝斯。我们通过圣彼得堡著名录音师安德烈·特罗皮洛（Andrey Tropillo）帮他找到了这把吉他，特罗皮洛曾为“水族馆”（Aquarium）和“电影院”（Kino）乐队录音。顺便一提，我弟弟以前对音乐一窍不通，从未接受过任何正规的音乐教育.....



伊戈尔在栋贝：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

“我不明白他父母怎么会让十几岁的儿子去莫斯科.....

”“伊戈尔很难管教。再加上青春期.....他父母为他哭泣，还给我写信说：‘谢尔盖，把他带回家。’他很容易发脾气。电视开着就能让他抓狂。他觉得苏联的宣传充满敌意。而且我们父亲是军队的政治官员，所以他们一辈子都在争吵。”

“我一直很好奇叶戈尔的这种反对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他一直都是这种态度：‘我反对！’”“在80年代，我怀有爱国主义信念，所以他经常骂我是法西斯分子、民族主义者。我们经常争吵，甚至长时间不说话.....与此同时，伊戈尔很容易受人影响。有人跟他说些惊人之语，他就会突然热情地捍卫一种新的观点。你看，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把所有专辑的名字都改了。《至日》变成了《月球革命》。他否认了很多事情。

90年代初，我们的反对派试图利用他的声望。我哥哥一开始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但后来他告诉我：‘我意识到，反对派和官方政府一样，都是政府的一部分。只不过有些人扮演的是红头发的小丑，有些人扮演的是白头发的小丑。一个是正义的调查员，一个是邪恶的调查员。’”总之，他得出结论：反对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负有与政府同等的责任。国家。



“民防”乐队的最终阵容：贝斯手兼键盘手娜塔莉亚（叶戈尔的第三任也是唯一正式妻子）；左边是鼓手帕维尔·佩列托尔钦；右边是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

——叶戈尔梦想成名吗？

——他一直渴望获得大众认可。而这正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所在。对我来说，为15到20个观众演出固然更好，但前提是这些人是你尊重的人。伊戈尔批评我精英主义。他会说：“我可是在体育场演出的。好的音乐应该能吸引所有人。”我立刻反驳道：“那岂不是说基尔科罗夫就是最好的音乐家？”尽管他渴望名气，却从未奢望过财富。他需要钱来从事创作，购买书籍和唱片。他身后留下了庞大的藏书和唱片收藏。总的来说，他比大多数摇滚乐手，更不用说朋克音乐人，都要成熟得多。他的生活方式与摇滚乐截然不同。毕竟，摇滚乐手该如何生活呢？他喝酒，泡妞，或者更确切地说，泡两个妞，在台上情绪低落，摔坏乐器……而伊戈尔回到莫斯科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书店买20到30公斤的书回鄂木斯克。然后，他便会连续几个月待在位于契卡洛夫斯基的赫鲁晓夫时代的公寓里，不与任何人交谈，读书，创作新音乐。

扬基死后，用刀割伤了自己的手。

“谢尔盖，说说叶戈尔生命中的那些女人吧。有人指责他害死了他的第一任同居妻子，歌手扬卡·迪亚吉列娃……”

”“胡说！伊戈尔对她很好。一开始不喜欢她的是我。我记得他们一起来莫斯科看我，我哥哥的品味真是让我大跌眼镜：扬卡相貌平平，身材丰腴，一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甚至还记得跟他说过这件事。她是在扬卡去世后才知道她写诗写歌的。我哥哥为此伤心欲绝，甚至用刀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两道深深的十字口子。想用肉体的痛苦麻痹精神上的伤痛。顺便说一句，关于扬卡的死有很多疑点。人们认为她是自杀，溺死在伊纳河里，但据说当她的遗体被打捞上来时，很明显她的头骨已经骨折了……”

“叶戈尔是个花花公子吗？”

”“绝对不是。可以肯定地说，他一生中只和三个女人保持过稳定的关系：扬卡、安雅·沃尔科娃，以

及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她是新西伯利亚一位教授的女儿。她是伊戈尔唯一正式结婚的女人。”

“你最喜欢你哥哥的哪个老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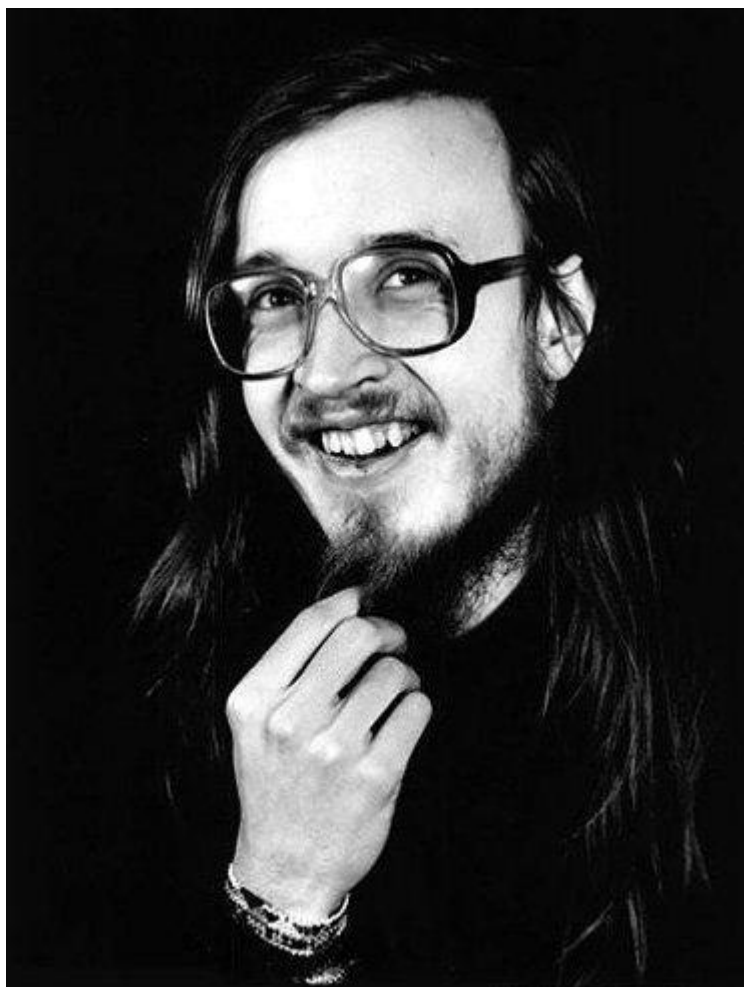
“老实说，是安雅·沃尔科娃。身材高挑，容貌美丽，样样精通……我觉得如果她和我哥哥没有分手，他现在还活着。她会焊电线，管束所有人，乐手状态不好的时候她还会帮他们扛吉他。而且她甚至还能扇那些太放松的人耳光，让他们清醒过来！”

“安雅和叶戈尔为什么分手了？”

”“因为在1998年初，我哥哥爱上了一个当时住在莫斯科的19岁已婚女子。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我知道，这就是导致他和安雅争吵并分手的原因。”



2008年2月8日，民防组织在乌法举行了倒数第二场音乐会。



年轻的叶戈尔：他是成千上万后苏联时代青少年的偶像。

Finam FM 广播电台 — 俄罗斯摇滚明星: Grazhdanskaya Oborona Group

俄罗斯摇滚明星: 民防集团

嘉宾: 谢尔盖·列托夫, 音乐家、萨克斯管演奏家、即兴演奏家、音乐刊物《五芒星》的创始人

利普尼茨基: 大家好。这里是节目“内容”。我是节目的作者兼主持人亚历山大·利普尼茨基, 今天我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一位特别嘉宾, 我来自爵士乐和摇滚乐界的老朋友谢尔盖·列托夫。

这不是爵士乐的话题, 而是他哥哥, 杰出的摇滚音乐家叶戈尔·列托夫, 在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一支乐队。乐队名叫“民防”。你好。

莱托夫: 你好。

利普尼茨基: 我以前和乐队巡演的时候, 每次到俄罗斯各个城市的站台, 总能看到涂鸦.....那时候涂鸦并不多见; 人们也不太会画。但或许最早的苏联涂鸦就是“GO”这两个字母, 代表“民防”。有时候, 在下面还会用不同的颜料写着: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所以, 今天我想先从这首对我来说最能代表我们乐队的歌开始: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民防》。

(歌曲《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响起)



利普尼茨基: 顺便问一下, 请您简单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您小时候在哪里长大?

列托夫: 实际上, 伊戈尔1964年出生在鄂木斯克。他出生的地方.....实际上, 我们住的地方是科尔恰克的马厩。那是鄂木斯克市中心的一个兵营。现在它已经不存在了; 取而代之的是高档住宅区, 旁边是一所精英高中。但当时, 就在鄂木斯克市中心内务部大楼的后面, 矗立着科尔恰克的石砌马厩。科尔恰克非常敬爱马匹, 所以他为马匹建造了精美的石砌马厩, 苏联时期, 这些马厩被改建成了军营。他就出生在那里。

利普尼茨基: 你父亲是军人吗?

列托夫：我父亲是名士兵，原籍乌拉尔。战争期间，他机缘巧合被派往前线。他当时正在教一些和他一样的年轻炮兵，有一天在喀山上课时，他的一名学生被他们扛着的一门40毫米小炮砸伤了腿。巧合的是，这名受伤的士兵原本也要被派往前线，于是我父亲顶替了他。

他欣然前往，因为他不想待在那个训练营里。他很高兴能亲自上前线。之后，他就留在了军队。他其实并不想当军官，不喜欢操练之类的，但结果他还是当上了军官，在军队服役了30年。

我的父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相遇。塞米巴拉金斯克是我母亲和她所有亲戚居住的城市，我父亲当时在那里当兵。塞米巴拉金斯克是个著名的核试验场。我父母居住的房子曾多次遭受核试验爆炸的冲击，窗户被震碎，有一次甚至把屋顶都炸飞了。这就是当时进行人体核试验的方式。

利普尼茨基：还有辐射呢？

莱托夫：嗯，每个人都接受了辐射。

利普尼茨基：你和你哥哥收到了吗？

列托夫：嗯，我哥哥出生在鄂木斯克，那时我父母已经离开了。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接触过辐射。也就是说，在我出生前一个月，大气层核试验和核爆炸禁令签署了。所以，每个人都受到了相当剂量的辐射。我的母亲和祖母当时都在癌症康复期。所以，这也有一定影响。当然，我和我哥哥都是变异人。我们的血液成分异常，整个童年都在医院里度过。

利普尼茨基：是的，你的过去解释了很多。还有鄂木斯克本身.....我记得我们乐队在鄂木斯克演出，80年代一家摇滚俱乐部的当地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们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的地方。当然，这也解释了我第二个演奏的那首歌，它出自叶戈尔80年代的那张重要专辑——《人如狼》。我认为这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留下的遗产。《人如狼》、《民防》。

（歌曲《人如狼》响起）

利普尼茨基：提醒一下，您正在收听的是“内容”节目。我的嘉宾是谢尔盖·列托夫，他正在谈论他的兄弟叶戈尔——伊戈尔·列托夫——以及“民防”组织。

不久前，我们聊起了另一支著名的朋克乐队“Automatic Satisfiers”。我回忆起和这支列宁格勒乐队主唱安德烈·帕诺夫的友谊，想起朋克们彼此之间那种竞争式的厌恶。列宁格勒的朋克们沉迷于恋尸癖和一些性手枪式的玩笑，而“Civil Defense”和其他西伯利亚朋克乐队则截然不同，他们标榜着公民意识。事实上，斯文和“Automatic Satisfiers”并没有这种倾向；他们刻意回避了这一点。

列托夫：我来说说斯文的事。我先告诉你，伊戈尔非常讨厌安德烈·帕诺夫，恨透了他。我可以解释为什么。因为伊戈尔爱猫。伊戈尔家里养了三只猫。当他得知斯文出于某种纯粹为了博取公众眼球的原因杀死了一只小猫时，伊戈尔说他永远不会和这个人握手。



利普尼茨基：我不认为这跟小猫有关。当然，斯文为了在舞台上喊一句口号，不仅对小猫毫不留情，甚至连自己的父亲也不放过，这倒也情有可原。在我看来，西伯利亚的生活截然不同，任何真正的朋克意识都只能在那里产生，因为无论是《生存指南》还是我们稍后会提到的扬卡·迪亚吉列娃，都只能出生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跟我们说说你的童年吧。

列托夫：嗯，童年.....伊戈尔一岁的时候，我父亲买了一套公寓，我们从鄂木斯克市中心搬到了契卡洛夫居民区，也就是契卡洛夫斯基波谢洛克。那是个住宅区.....嗯，不是莫斯科意义上的住宅区，而是最可怕的那种。整个街区都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五层楼房，科斯米切斯基大街贯穿其中——那是一条以前的军用机场跑道，周围建起了五层楼房，住的大多是形形色色的无产阶级。不光是无产阶级，还有一些刚出狱的人。他们需要个住处，对吧？隔壁楼里就住着一些刚出狱的人。到处都是可怕的刀战和污秽。

总的来说，契卡洛夫斯基这个居民区生活条件很差，而且一直如此。现在我去那里（我父亲住在那里），看到的沥青路面，我想应该是苏联时期最后一次铺设的，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景象，周围都是愤怒、好斗的人。那里就是这副模样。

利普尼茨基：事实证明，这里是培养朋克乐队主唱的理想之地。

莱托夫：嗯，很有可能。很难想象那里会有艺术摇滚乐。

利普尼茨基：那我建议你听听西伯利亚杰出的朋克乐队“民防”的最新单曲《系统》。我觉得这首歌正是关于这个的。

（歌曲《System》响起）

利普尼茨基：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Finam FM的“内容”节目。我的嘉宾，萨克斯管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和我正在讨论“民防”组织，该组织是由他的弟弟叶戈尔（又名伊戈尔·列托夫）创立的。

有时候，听你哥哥的歌，我甚至都不想活了。和这样一个拥有如此复杂、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音乐、诗歌和人生的人生生活在一起是什么感觉？难道不难吗？

列托夫：是的，当然不容易。首先，我得说我们是年龄不同的兄弟——我比他大八岁。伊戈尔小时候经常生病，我一直照顾他。他先是得了脑积水——他的头会肿得很大。小时候，医生给他喂过某种酸性物质来治疗脑积水。嗯，这很可能是辐射的后遗症。

他养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拒食。在他幼年的两个月里，我根本喂不下任何东西；他完全不肯吃，显然是因为药不好喝，总之……那段日子很艰难。所以我想尽一切办法逗他开心：唱歌给他听，跳舞给他看。他会惊讶地张开嘴，然后我就往他嘴里塞一勺营养液。可以说，他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

然后他事事都想模仿我。我在音乐学校学钢琴，练习，他就在一旁看。后来，我在新西伯利亚物理数学学校读书的时候，带回了一张唱片。我想那应该是《汤米》，第一部摇滚歌剧。

利普尼茨基：“谁人乐队”。



莱托夫：“是的，是The Who乐队的歌。他听了之后，后来告诉我那天晚上他都没睡着，太震惊了。他意识到那是我的歌。他小时候主要听法国香颂。我们家有录音机和软胶唱片。所以，他的音乐品味可以说是非常广泛……我给他买过齐柏林飞艇、披头士和Shocking Blue的专辑。总之，他听过各种各样的音乐。”

他小时候智力发育迟缓，说话也晚——三岁才开始说话。他学习成绩只能算中等，算不上特别优秀。我们生活中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小时候和父母关系不好，他们让我“带他去莫斯科”。于是他来到了莫斯科，在一所职业学校读书。那段时间，我开始学习萨克斯，我们萌生了组建一个家庭乐队的想法，我们俩一起演奏。于是他开始跟鼓手米哈伊尔·茹科夫学习。

利普尼茨基：他是“Zvuki Mu”乐队的鼓手，也是我的节奏组搭档。瞧，世界真小。我竟然不知道。

列托夫：他跟他学打鼓。然后他说：“不，我想要某种乐器。”不是敲打朱可夫给他做的那些小盒子，而是各种各样的打击乐器……我们甚至还在某个地方演出过，完全是地下演出。

还有来自圣彼得堡的音响工程师安德烈·特罗皮洛，我跟他说：“我弟弟想学乐器，您那里有吗？有人卖乐器吗？”他说：“有。有个作家……”嗯，那时候他不是作家，而是个音乐家。“……雷克尚，他卖贝斯音箱和贝斯，100卢布。保加利亚进口的——奥菲斯牌。你直接过去取就行了。”

我给了伊戈尔一些两戈比的硬币，雷克尚的电话号码，买了张车票，他生平第一次去了圣彼得堡，找到了雷克尚，给他打了电话，买了那把贝斯，亲自带了过来。我在车站接了他。就这样，他开始了自学音乐的旅程。他学过打鼓，但贝斯是自学的。

利普尼茨基：乐队领队理解节奏组的概念至关重要。谢廖沙，听我说，当我重新聆听“边境防

御”乐队的专辑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受到的影响远不止巴什拉切夫。许多人认为，叶戈尔在1988年乐队发行首张著名专辑《一切按计划进行》时，就继承了巴什拉切夫的衣钵。这张专辑录制于1988年冬天，就在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巴什拉切夫去世之后不久。

列托夫：嗯，如果说的是萨沙·巴什拉切夫，伊戈尔很可能是从我这里听说的。因为我是在八十年代中期认识萨沙的，当时他从切列波韦茨来到莫斯科。我还为他组织了一场家庭音乐会。那时候还没有正规的音乐会，只有家庭音乐会。我在特斯捷尔希基跟他说起这件事.....那里的人们每人凑了一卢布，一两卢布，然后就组织了一场音乐会。

我哥哥离开莫斯科回到鄂木斯克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组建了自己的摇滚乐队。他觉得我一直试图拉他入坑的自由爵士乐不适合他。而且，那种精英主义的音乐本来就不适合他。他在莫斯科感觉格格不入。他回到了鄂木斯克，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给我写信聊摇滚乐队，特别是他喜欢的“时间机器”（Mashina Vremeni）乐队。我告诉他我听到了一些非常棒的乐队，他肯定没听过——“水族馆”（Aquarium）。我可能也给伊戈尔写信聊过巴什拉切夫（Bashlachev）。我没法给他寄任何唱片，但我们一直通信，我主要跟他讲的是唱片。

事实上，巴什拉切夫出现在伊戈尔的一首歌里。当然，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他们彼此有多熟，但他们很可能认识，因为他们都是圣彼得堡摇滚俱乐部的成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伊戈尔是在1987年来到圣彼得堡并加入了圣彼得堡摇滚俱乐部的。

利普尼茨基：就在巴什拉切夫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音乐节的大舞台上首次亮相的时候。

列托夫：是的。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能谈恋爱。因为他们和菲尔索夫是朋友，所以他们就像在同一个社交圈里。菲尔索夫、Alisa乐队的乐手们，还有巴什拉切夫。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都穿着黑色人造革夹克，在翻领内侧别着一个电阻器，一个红色的电阻器，然后像佩戴徽章一样互相展示。那就是当时的时尚。

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伊戈尔经常被指责宣扬自杀。我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事实上，歌德创作《少年维特的烦恼》时，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爆发了自杀浪潮。而伊戈尔在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中出现的这些阴郁的自杀情绪，其根源却有所不同。

一般来说，心理学家将自杀念头定义为强迫性思维。这并非指想要自杀，而是指渴望另一种生活。可以说，伊戈尔当时的歌曲——《我们要求改变》——是一种拒绝。“我不想这样活着”——不仅仅意味着自杀，而是“我想过另一种生活，我想要另一种人生，我想改变社会”。我认为这才是歌曲的主要含义。



利普尼茨基：是的，顺便说一句，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难怪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的青少年至今仍对老牌乐队，甚至是苏联乐队，有着两阶段的迷恋——绝对是Kino乐队，也绝对是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列托夫：我还要补充一点。问题是，1986年，正值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1986年底，克格勃对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苏联现实的人进行了大规模逮捕。

1986年，我的第一任妻子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我去塞瓦斯托波尔精神病院把她接了出来。就在那时，我从父母那里得知伊戈尔也被送去接受强制治疗了。于是，父母回家后发现伊戈尔不见了。邻居说，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开过来把他带走了。他被诊断出有自杀倾向。

我当时做了哪些营救尝试？当时本可以做什么？事实上，我开始在我的摇滚乐朋友们中间散布消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摇滚圈里的线人，我说我想召集外国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揭露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改革，人们被抓起来送进精神病院。这听起来合情合理。

事情是这样的，我曾在一个叫“DK”的乐队里演奏。DK的主唱维克托·克莱梅绍夫和我曾在一家社区中心举办过一场半地下音乐会，演奏了献给马尔科姆·X的美国爵士乐曲《马尔科姆兄弟》。在那场音乐会上.....

利普尼茨基：致一位黑豹党活动人士。

列托夫：是的，是的。最后，在演奏那段即兴曲的时候，我们开始拍手唱歌：“马尔科姆兄弟，马尔科姆兄弟。”然后，我们唱的不是“马尔科姆兄弟”，而是“伊戈尔兄弟”。显然，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表明我即将采取行动。下一场音乐会就没必要了——伊戈尔在1987年3月就从精神病院出院了。而梅什科夫少校（他可能知道民防歌曲《少校脚下的冰》）因为滥用职权而被警队开除。

利普尼茨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我想起了一首叫《自由》的歌。

（正在播放歌曲《自由》）

利普尼茨基：是的，正是你一开始提到的那首歌，就是提到“SashBash”的那首。不过，我记得扬卡·迪亚吉列娃去世后，关于自杀和彼此影响的种种疑问又重新浮现出来。总的来说，很多人可能都想知道这两位杰出的西伯利亚诗人——扬卡和叶戈尔——是如何合作的。

列托夫：事情是这样的，在伊戈尔遭受了克格勃的种种迫害之后，他决定逃亡，加入嬉皮士的圈

子，租公寓搭便车四处流浪。于是扬卡和伊戈尔搭便车来到我家，在我家过夜。我不喜欢她。首先，我以为她会是漂亮姑娘。扬卡身材丰满，而且笨手笨脚.....

利普尼茨基：脸上长着雀斑。

莱托夫：她脸上长着雀斑，有点像.....素颜。她一点也不像那种妖艳的女人，不像是音乐家的女朋友，而是.....嗯，一个嬉皮士，一个嬉皮女孩。我之前完全不知道她会唱歌，很久都不知道。但同时，她又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善良、平静，就像所有胖子一样。我当时觉得她态度冷漠，但她其实是个很好的人。

我当时对她很冷淡，后来.....唉，现在想想，我真为自己当初那样冷漠傲慢地对待她感到羞愧。我知道伊戈尔为她做了很多；总之，他整理出版了她所有的作品。至少，他出版了六张唱片。他们的关系很复杂。有一次我在新西伯利亚演出时，扬卡的父亲走过来问我：“谢尔盖，告诉我，他们是认真的吗？”

扬卡去世时，伊戈尔已经很久没和她住在一起了。伊戈尔悲痛欲绝，抓起桌上的一把刀，在手上划了个十字。手上留下了一道又大又弯的疤痕，呈斜向的。他先是划破了手，然后又一刀，像这样划开了.....伤口没有缝合，留下了十字形的疤痕。

我认为歌曲《奥菲莉亚》是献给扬卡最好的安魂曲，虽然官方并未如此定义，但所有了解她的人都明白这首歌是写给她的。

利普尼茨基：《民防》，《奥菲莉亚》。

（正在播放歌曲《奥菲莉亚》）

利普尼茨基：提醒一下，您正在收听的是Finam FM电台的“内容”节目。我的嘉宾是谢尔盖·列托夫。我们正在缅怀他的兄弟叶戈尔以及他的“民防”事业。

谢廖沙，我觉得你哥哥的作品中死亡的主题比其他摇滚音乐家的作品更加突出。一般来说，人们天生就比较乐观开朗。毕竟，他们的职业就是在舞台上娱乐大众。因为他的职业生涯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方面是苏联解体，另一方面，他成长的那个世界也正经历着毁灭。

列托夫：音乐会经常以《死者》这首歌开场。它并非一首悼念亡灵的赞歌，而是一首童谣。如果你尝试用钢琴演奏伊戈尔的许多歌曲，你会发现它们只需要用到左手或右手的两三个手指。它们确实像童谣一样，旋律非常简单，但却蕴含着深刻的诗意。

严格来说，它是一种口头民间传说，一种史诗故事，其中音乐扮演着辅助性的、仪式性的角色。就像教堂音乐一样：重点在于文本内容、语言内容、逻各斯，以及歌手、说书人或牧师所传达的信息，而音乐只是起到塑造作用。我认为伊戈尔的故事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你试试那首歌，《死者》.....嗯，用钢琴弹奏那个主题——就两三个词。现在我们听到交响乐团演奏《一切按计划进行》时，感觉就像是对当下一切的一种夸张的嘲讽。那是因为关键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

利普尼茨基：诗歌与语调。

莱托夫：诗歌与语调。

利普尼茨基: 《民防》, 《死者》。

(歌曲《死者》响起)

利普尼茨基: 谢廖沙, 请问, 广播听众是否想知道和他一起演奏是什么感觉? 我记得你曾和“民防”乐队一起参加过音乐会。

列托夫: 是的, 我的确这么做了。但在此之前, 伊戈尔的创作生涯或许迎来了最非凡的开端。因为他第一次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 是在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俱乐部。那是地下音乐节“流行机械”第二期。

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 (MEPhI) 拥有活跃的地下音乐氛围。它位于莫斯科社区中心附近, 库廖欣的第一张专辑《流行机械第一号》就是在那里制作的。

利普尼茨基: 你和我曾经在那里一起踢球。

莱托夫: 没错, 没错。第二天, 《机械师》的演出就举行了, 我哥哥在剧中首次以贝斯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所以, 他一开始的乐队成员水平绝对不差。

后来有这么一段时期.....伊戈尔去了鄂木斯克, 组建了自己的“民防”乐队, 演出很多。到了90年代中期, 我们开始逐渐熟络起来。我们又开始聊天、写作, 积极地交流。我们当时都有一些相关的项目.....所以, 我当时在考虑重振谢尔盖·库廖欣的“流行机械”乐队, 一个多媒体乐团, 我想让伊戈尔参与其中, 不是让他当歌手, 而是让他以诗人的身份朗诵自己的诗歌。他会像在音乐会上那样, 充满激情地朗诵这些诗歌。

我之前有个项目, 但一直没能完成。它不知从何而来.....只是在库廖欣1997年去世后, 我一直在考虑以某种形式延续“流行机械”乐队的风格。伊戈尔和他的乐手们以前经常来看Tri O的演出。比如, 他们第一次来到马拉特·格尔曼画廊, 就在那里听了Tri O的表演。之后, 我们一起坐在某个建筑工地的长椅上, 喝着波特酒、Tri O的啤酒和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啤酒。

利普尼茨基: 那么, “三O”成员都有哪些人呢?

列托夫: “三O”乐队当时的成员包括萨沙·亚历山德罗夫 (巴松管) 和尤里·帕尔费诺夫。真是了不起的组合.....至于“民防”乐队, 我记得是马赫诺、库兹马和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

大约在1998年, 我尝试加入Oborona乐队。伊戈尔最初想让我演奏一些大家熟悉的乐段, 但我说我不会演奏任何熟悉的乐段, 我会即兴发挥。于是,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 我们一起在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演奏, 直到2004年左右。在此期间, 我一直在负责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唱片的母带制作; 也就是说, 从1994年到2003年, Oborona乐队的所有唱片都是我负责母带制作的。

利普尼茨基: 让我们来听听我们找到的唯一一首你们一起演奏的歌曲——著名的“Pryg-skok”。

(正在播放歌曲《Jump-Jump》)

莱托夫: 当然, 我们的重聚以及再次一起演出并非源于共同的音乐理念。相反, 我们走到一起是因为, 在1991年事件之后, 我们似乎都反对当时在“改革”口号下进行的改革进程。我们并非反对改革和变革本身, 只是这些变革并非我们所期望或想要的。

利普尼茨基：就像苏联的大多数人一样。

莱托夫：是的。我们当时感觉自己被彻底欺骗了。虽然我和我哥哥之前在许多政治问题上看法不一，但大约在92年或93年左右，我们的观点开始趋于一致。我们最终找到了共同点。

问题是，我们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共）的党员，也是1993年攻占白宫前最后一场保卫国家战线的参与者。而且，据我所知，伊戈尔也和整个“民防队”一起参加了保卫白宫的战斗。他差点就牺牲在那里了。他们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那些站在那里站着的共产主义老太太们开始咒骂他们：“我们这里不需要毛茸茸的家伙！滚出去！”她们被激怒了，离开了。之后，坦克来了，把那些老太太们碾死了。

这次偶然事件救了我哥哥的命。袭击发生时我打电话给鄂木斯克，结果发现他已经在家了。这救了他的命。但从那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一起演出。

利普尼茨基：嗯，民防乐队有几首歌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歌名叫《至日》。

（正在播放歌曲《夏至》）

利普尼茨基：我们和叶戈尔·列托夫的哥哥谢尔盖的谈话即将结束。谢廖沙，我认为“民防”乐队的作品中还有一条重要的线索我们尚未探讨。他们留下了不少谜团。对我来说，有些东西未曾言说、未曾表达，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哥哥去世快三年了。再次聆听他们的一些歌曲，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读它们。这些童话，这些谜语.....我会这样称呼它们，这些歌曲——童话，这些谜语。

列托夫：我和哥哥的童年非常快乐。我们有很多玩具。爸爸来自农村，家境很贫寒，他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给我们提供他自己没有的东西。所以，比如说，那些听到“塑料世界赢了”的人.....塑料世界就像一支塑料玩具大军。我们也有毛绒玩具和橡胶玩具。我们会把它们分类整理。

嗯，这就是所谓的“傻瓜漫步林中”.....问题是，这片丑陋不堪的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遍布赫鲁晓夫时代的五层楼房，四周都被森林，尤其是白桦林环绕。伊戈尔的创作灵感完全来源于漫步于这些白桦林中。那些手捧他出版的专辑的人，常常能从中感受到各种各样的自然之美。正是这片环境，尤其是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周围的环境，让他.....穿上毡靴——冬天他也穿毡靴——然后漫步于森林之中。

他会在森林里写歌，有时会去我们母亲的墓地看看。他写了很多歌.....比如，冬天的时候，他会装饰母亲的圣诞树——附近就有一棵冷杉树。有时候，在他的一些歌里，你能找到他生活的真实写照。这不是什么虚构的故事，而是他亲身经历的真实生活。《森林里的傻瓜》——他写的肯定是他自己的故事。

他那里还有一只小熊——一只从我这里继承来的泰迪熊。所以，我小时候没弄坏过任何玩具，我所有的玩具、一些衣服和书都留给了他。它们中的很多都以某种方式出现在他的歌里。

利普尼茨基：带着这份美好的回忆，我们将和民防部门说再见。

（正在播放歌曲《关于一个傻瓜》）

Chronicles | Seance 杂志第 45/46 期 — 所以，一场飓风 (摘自不同年份对叶戈尔·列托夫的采访)

所以，这是一场飓风。

摘自叶戈尔·列托夫多年前的一次采访。

资料来源: [Billboard](#)

[Rolling Stone](#)、[Afisha](#)、

Counterculture、[Hammer](#)、[Nash](#)、Rovesnik、[Tusovochka](#)、[I'm Young](#)、[民防官方网站](#)。

每次走在街上，我都觉得自己不像人类，而像个伪装成普通市民的火星星人。但这种伪装随时可能被揭穿，一切就都结束了！

你难道看不出发生了什么吗？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气候变化、飓风、自然灾害和灾难？地球正在抛弃各种各样的垃圾。以人类为代表的生物圈正在被摧毁。这没什么好悲惨的。作为文明的生命形式已经终结了。

有人说，这场战争在这个世界已经失败，但艺术家却依然不屈不挠。事实上，任何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人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正如基拉·穆拉托娃所说，生命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可怕的东西。

至于激进主义，我认为任何运动——无论是音乐的、政治的还是其他的——都有存在的权利，只有当它违反普遍接受的法律、界限和规范时，才具有意义。

任何艺术在其极端形式下，都是战争的体现，是对现有准则的违背。

.....一个人只有在面临自杀、死亡和抉择的终极境界时，才开始真正享受生活，活出精彩。正因如此，我们努力做到精力充沛、健康快乐地生活。那些不了解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现实生活中如此开朗、善于交际，都会感到非常惊讶，甚至震惊。我热爱生活。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生命信仰。

形势变了——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有首歌叫《我永远反对》，但我也可以唱《我永远支持》。形势变化，对傻瓜来说永远是陷阱，对聪明人来说却是通往更高层次的跳板。我们所有的音乐都围绕着这些展开——政治博弈、退出政治的途径、行动或象征性的不作为。有时候，不作为比行动更有力量。

.....我的人生经历每天都以最生动、最残酷的方式向我证明，如果你不“竭尽全力”抵抗生活的洪流、惯性的车轮、以及压在你身上的日复一日的生存惯例，如果你任由自己随波逐流，那么你所处境况中最悲惨、最可耻、最令人作呕、最可怕的结局必然随之而来。清晰的视角和严格的、持续的控制对于你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念头都至关重要，否则你最终必然会发现自己被卷入自身污秽不堪、处境最艰难的漩涡之中。所有的麻烦都源于懒惰、冷漠和漠不关心。

我负责制作物品并将它们送到世人面前。我制作它们时，会根据我的感受和感知——或者未感知

到的——做到精准完美。之后发生的一切都只是“猴子和眼镜”的问题。这让我无比着迷，也让我感到无比有趣。你可以用铲子挖出什么东西，或者反过来，把它埋起来，或者你也可以残忍地杀害你的亲人。沃纳·赫尔佐格的电影是否应该为伊恩·柯蒂斯（Joy Division 乐队的主唱，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看完后上吊自杀这件事负责呢？

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时刻：我不得不放弃自己对音乐会的固有认知。以前，我们总是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我记得我们在新西伯利亚的一个音乐节上演出，我们当时就决定：不排练！我负责打节奏、大声喊叫，观众席一片混乱：有人摔倒，有人打架，甚至有人流血。那才叫真正的音乐会。但后来我突然意识到，改革开放后，公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要的是演奏精良、歌声优美的音乐——这让我震惊不已。我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我甚至想过放弃。

我经历过许多至亲离世的痛苦。每一次，我的内心都会形成一个黑洞。你还活着，你的内心世界就像一张由人、地点和事件编织而成的地毯。然后突然间——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洞，接着是另一个……这些洞永远无法填补，没有任何事物能够治愈它们。所有这些人，他们也都是你的一部分。母亲去世时，我写了一首歌叫《我的防御》。现在，每当有人离世，我都会想起他们去世后我立刻创作的一首歌。

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解释我们那刺眼绝望的光芒——也就是邪恶的气泡和咖啡色的天空。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为我们那丑陋的、咧嘴的羞耻辩解——只有破旧的拐杖和咖啡色的天空。毕竟，没有人从那里回来抚慰我们根深蒂固的、充满疑问的恐惧——只有橡子和咖啡色的天空留存。这就是那首歌。我活得越久，环顾四周，就越明白人类的个性——我现在说的很平庸——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我认为它甚至不值得思考。某些进化过程正在发生。进化与人类无关。

人活着就永远活着，死了就无法复活。再说，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吧！现在没人做任何有价值的事，也没人创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已经休息过两三年了，结果呢？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切依然如故。一旦你沉默下来，沉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挥之不去。所以你只能躺下，抽根烟，然后“让自己重新笑一笑”。

我认为我们是全国最好的乐队，毋庸置疑。我们一直都是，而且永远都会是，因为没有其他乐队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也没有人可以和我们相提并论。

我很幸运，诊所主任对我很好，很多事情都没人注意到，但我还是目睹了就在我身边发生的一切。我亲眼看到一个男人被注射了大量的氟哌啶醇，以至于他精神失常。然后，作为对比，他又被注射了氨嗪，结果变成了一株植物。他其实是一位很有意思的艺术家，当地的超现实主义画家，是他父母把他送到这家诊所的。他一直在画没有面孔的女人。他甚至在鄂木斯克办过一次展览，结果被当地媒体狠狠地抨击了一番。他创作了一幅类似三联画的作品——两个没有面孔的女人和一个石膏盒子。当观众聚集在一起时，他用锤子敲击盒子，鸽子飞了出来。然后他立刻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诊所里还有一个非常滑稽的角色——一个普通的工人，下班后和其他人一起去看一部关于核爆炸威胁的教育宣传片。电影突然让他深受触动，看完电影后他立刻冲进防空洞把自己锁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天，他谁也不给开门，不停地说：“万一里面爆炸了怎么办？”等等。后来，当地的党组织者来了，他突然打开铁门，露出了自己的生殖器。就在那时，他被逮捕了。

专业人士的看法我一点也不在意，也从来都不在意。事实上，大多数人关心的事情都与 we 无关，也与现场创作本身毫无关系。录音棚、唱片、宣传——这些都只是商品与金钱的关系。严格来说，那不是艺术，也不是音乐——那只是流行音乐。

一方面，这当然很棒！但我真为希丁克感到难过。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令人沮丧的任务，而且很可能注定失败。和我们这帮混蛋在一起，我们不仅寸步难行，连去足球论坛都难，更别说不在全球范围内丢脸了。因为他们的心态完全无视纪律和训练，有着前所未有的自我膨胀和“天选之子”的优越感，而这似乎正是我们民族的某种特征。教练确实很优秀，但完全不适合我们。

在我看来，爱其实挺可怕的。通常意义上的可怕。所有真实的事物，对某些人来说，通常都挺可怕的。<...>

我现在完全清醒且真诚地说，我所有的歌，或者说几乎所有的歌，都是关于爱、光明和喜悦的。也就是说，是关于当爱不存在时是什么感觉！或者，是关于爱在你心中萌生时是什么感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爱消逝时是什么感觉。

这完全是盗版，尤其是在那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发行版本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歌曲《圣徒离世记》（On the Departure of the Saint），这首歌理论上应该戛然而止，这对于作者的构思至关重要，就像有人被蒙着眼睛领着走很久，突然抬起脚想迈一步，却发现前方是悬崖，蒙眼布也消失了。但在发行版本中，录音室的某些人觉得这样不对，未经我们同意或通知，就用淡出、圆润的方式结束了这首歌。这彻底破坏了整张专辑的概念。同样，在扬卡的原声专辑中，歌曲《百年之雨》（Centennial Rain）被强行加上了一段雨声，尽管这首歌与雨毫无关系.....不幸的是，在我们国家，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并不总是与创作者的初衷相符。总有一群人，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认定这样做会更好、更漂亮、更聪明等等。这些人未必是敌人，甚至可能是看似亲密的朋友。

只是有时候，群体内部缺乏凝聚力，或者说，群体内部缺乏凝聚力。每个人都各自为政。而矛盾往往从一件小事开始滋生。我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但哪怕是一些小事，比如说，有人没汇报自己去了.....餐馆，后果就开始了。当然，他们不必汇报，敬礼，但他们只需要说一句：“我去过那里，好吗？”所以，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想象一下这种情况：你身处战壕，正值战争时期。如果有人在炮火中逃跑，他们必须说明去哪儿了：是去拿弹药还是去投降？你明白吗？这非常重要。

现在舞台前有人在喊叫。我以前觉得他们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以为他们最看重的是一种根植于极限运动和抗议的形式。但后来我开始在网站论坛上和听众交流，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理解。他们或许理解的方式不同，或许只是片面的理解——但他们的确理解。我们的音乐就像一个千层蛋糕，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层。有些层面或许会互相矛盾，但这没关系：层面越多，对我们和听众就越好。我希望这些层面永无止境。

我必须继续演奏，只要活着我就会一直演奏下去。就像格列宾希科夫唱的那样：那些要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的年轻朋克在哪里？

根本没有这样的朋克。所以，会是我们——这些老朋克——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我完全理解舍夫丘克，他一直做得很好，不像某些人那样。我以前和舍夫丘克吵过架——我总是贬低他的歌，但现在我什么都说不出来。他是一个如此正常、如此健康的人，经历了很多痛苦、苦涩等等，但他仍然在做着什么，仍然在战斗，并且没有放弃的打算。

如果我拥有一个如此仁慈的政府，我会毫不犹豫地决任何表现出冷漠的人，无需审判或调查。而且，这完全是出于最人道的理由和考量。我们今天在各处所见所闻的一切耻辱和不光彩，都源于一个根源：冷漠，先由一人，继而由另一人，再由第三人——它如同血肉之躯，如同肿瘤，如同蠕虫般滋生蔓延。

那些“他们观察”的人最好完全避开，对他们一无所知。而那些“我见过”的人最好不要招惹。

有报纸报道说，有人看到一支民防队沿着街道行进，看到一个水坑，就俯身进去开始喝水。然后，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像一群真正的朋克，浑身沾满泥巴，继续往前走。

当人们说起“白人士兵”或类似的话时，他们说的不是“猜猜我是谁”之类的谜语，也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某种神秘力量，更不是木乃伊巨魔的胡言乱语；他们指的是真正的白人士兵。那些理解的人，即使在战争中也能理解并露出微笑。

由于展品过多，我的“愚人博物馆”永远关闭了。后来我才明白，整个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愚人博物馆，它不需要进一步扩建，只需要拼命地把自己与它隔离开来。

总的来说，过去存在和将来存在的一切都是知识。它无处不在。就在窗外的村庄里。就在睡在床垫上的我的猫身上。知识不属于任何人个人。就像我的歌，从最高意义上讲，也不属于我个人一样。或者反过来说：知识属于所有人。每当我遇到真实的事物时，我总觉得那就是我自己。第一次听到The Doors乐队.....或者Love乐队.....或者《Continuous Suicide》这首歌——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就是我在唱歌。”

他们永远不会承认，他们注定会自食其果，他们会找到任何借口，任何理由来为他们那令人满足、日复一日、却又可耻的自我延续辩护。他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正确、强大、善良的，而你却是低等生物，只配得到鄙视，或者充其量，得到一些怜悯。

塑料世界终将胜利。去他妈的！最重要的是跟上潮流。

他在这里，然后去世了——既不悲伤，也不滑稽。顺便说一句，我们有很多歌都是关于他的。“Pryg-skok”等等。人们总是误解我们：如果他们称赞我们，那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如果他们批评我们，那也是出于错误的理由。

马特罗索夫、马赫诺，他们同时在各个战线作战；维索茨基、舒克申、塔尔科夫斯基——每一个真正活着的人，每一个真诚、痛苦、欢欣的行动，似乎都在堵住某个形而上学的巨口，哪怕只是片刻。代价是什么，惩罚是什么，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枪林弹雨短暂地沉寂了几秒钟。重要的是，敌人的武器被暂时瘫痪了。这意味着我们的人民得到了喘息之机。至于是否有人知道，是否有人理解，都无关紧要.....即便你是这颗地球上唯一一个这样的人，你也必须把它炸掉，让它闭嘴。

由卡特琳娜·马尔索娃撰写

棺材编年史 | za-no-za.net — “我是镇上唯一的杰夫.....”

“杰夫，镇上只有我一个人.....”

这次采访是在2010年9月进行的。一位名叫塔季扬娜·阿努弗里耶娃的记者朋友向我介绍了杰夫，也就是叶夫根尼·菲拉托夫。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西伯利亚地下世界的书，所以如果能采访到菲拉托夫，为即将出版的文集增添一篇内容，那就太好了。起初，我那些神秘的熟人说菲拉托夫在鄂木斯克国立大学（米拉街55号1号楼）当保安，但后来发现他其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

我们在鄂木斯克国立大学物理实验室见面（采访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是单独谈话，第二次是茶道仪式，我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坐在我对面的是传奇人物杰夫，他曾与列托夫合作录制了《猪猡之前的玻璃珠游戏》，他向我讲述了西伯利亚地下音乐圈、鄂木斯克摇滚乐坛以及叶戈尔·列托夫的故事。

——那么，首先请您谈谈专辑《猪圈前的玻璃珠游戏》的录制过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专辑封套和录音带都显示您和列托夫是在理工大学录制的这张专辑。后来证实这是一个错误。您能解释一下具体情况吗？

列托夫向来以诚实著称。“玻璃珠游戏”录音带上写着专辑是在理工大学录制的，这完全是列托夫的失误。他可能记错了，也可能忘了。这很符合他的性格。还有一种可能：他是故意搞错的，因为当时局势动荡——我可能因为帮忙而被开除——毕竟设备是政府配发的。当时可能正在进行清洗：设备可能被没收，我也可能被学校开除。但是，因为我很了解列托奇卡，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可能真的记错了。他对于这种“精确”的细节——日期、地点.....总是很粗心。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这里，在这个实验室，在这些桌子上写下了这些。

菲拉托夫笑容满面，用一种坚定而富有叙述者风范的语调说道。的确，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连歌迷都好奇“民防”乐队是在哪里录制这张专辑的。最终揭晓的录音地点是鄂木斯克国立大学物理实验室，菲拉托夫当时在那里工作（现在也依然在那里工作）。录音用的录音机至今还留在那里。至于“列托奇卡”这个绰号.....菲拉托夫的反应并不带有冒犯之意。杰夫解释说，这是列托夫在亲近的人圈子里的昵称，和“死去的塔尼亚”以及“死去的叶戈尔”一样。“民防”乐队的主唱本人也在网站www.gr-oborona.ru上回复读者时对此事做出了回应：

“这说来话长。1984年底，我和库兹马（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作者注）组建了民防乐队，我们当时从头到脚都是彻头彻尾的朋克，从外表到行为举止，再到我们试图把名字改成那些明显愚蠢的名字。比如，库兹马想把他的姓从里亚比诺夫改成雷别诺克，但后来发现并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荒诞是我们存在的本质，是我们看待世界的原则，也是我们人际关系的本质，它以各种疯狂的形式展现出来。”例如，我们组里有个叫“妈妈9号”的人。我们遵循一条自己定下的规矩，给自己取一些故意滑稽、俗气的名字——我叫叶戈尔·多赫利，科斯佳叫库兹马·UO（熟悉的人都知道，UO是儿童读物里的一个角色，讲的是谢苗诺夫的故事，他是个复读生之类的，意思是“智力低下”）。久而久之，只剩下这两个名字——叶戈尔和库兹马。

杰夫继续谈论起昵称来：

“基本上，鄂木斯克有三个硬汉，都是些有绰号的摇滚乐手。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列托夫，真名是叶戈尔·多赫利。第二个是伊万·卡米卡泽，真名是安德烈·叶夫根尼耶维奇·马什科夫采夫，他是危机部门（又名克罗特）的负责人。最后一个是伊万·莫格，真名是亚历山大·克利波夫，又名下士（他当过兵，军衔是下士），他是热激光乐队和西部乐队的领队。”

然后菲拉托夫详细地谈到了专辑《猪之前玩玻璃珠游戏》的录制过程。

——之所以录制半小时专辑，是因为当时没有500米长的磁带。也就是说，以1/19的速度播放，一张标准专辑只有40-45分钟（最常见的专辑是525米磁带，时长40分钟）。500米长的磁带在这里并不总是能买到，所以我们只能用现有的磁带凑合。375米长的磁带的优点是：以1/19的速度播放，一面转一圈就是半小时。当然，也可能略有出入：32分钟，29分钟……早期的披头士乐队也发行过短唱片——半小时。为什么不——为什么不也创作半小时的专辑呢？莱托夫几乎是独自一人创作了《猪圈前的玻璃珠游戏》。我演奏了邦戈鼓，但在录音过程中你几乎听不到；也就是说，我们只进行了三四次叠录。我们尽力提升了录音质量。录音大约花了一周时间；我不记得确切的天数了。所有资料都说录制工作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1986年6月1日——这是不实的。这张专辑并非一天之内录制完成的。

首先，我们录制了节奏吉他和邦戈鼓。吉他和邦戈鼓是从迈克·切尔尼舍夫（Mike Chernyshev，80年代末鄂木斯克一位著名的摇滚乐手——作者注）那里借来的。然后我们播放了这段录音，换了一盘磁带，列托夫（Letov）在上面写了贝斯部分。接着我们把所有东西混在一起，打开麦克风，列托夫唱歌，时不时地用原声吉他弹奏一段独奏，我则吹奏了一把中国口琴。之后，我们把所有录好的东西重新混音，并加了混响。平均下来，我们重录了四遍。当然，音质有所下降。当时没有混音师。我们弄到了两台录音机、两个麦克风、克拉克斯乐队（奥列格·利申科和叶夫根尼·利申科兄弟，来自“巅峰克拉克斯”乐队——当时鄂木斯克一支著名的摇滚乐队——作者注）的一把贝斯、迈克·切尔尼舍夫的节奏吉他，还有克拉克斯乐队的另一把木吉他——一个塑料桶，但音色还不错——以及一把中国口琴。那口琴也挺好用的。就这些。我的任务主要是技术方面的。我刻意避开了这方面。

我一直都对自己的名气感到厌倦，对列托夫的名气也毫不在意。再说，我自己也有很多相当不错的歌。如果我真想跟他套近乎，新西伯利亚摇滚音乐节之后我可能就会跟他一起去俄罗斯各地巡演了。他主动提出要跟我一起去，但我这人比较宅，不喜欢旅行。而且，他那些滑稽的举动……年轻的时候可以胡闹，但那不是认真的。你只需要会弹吉他就行了。列托夫当时其实并不会弹吉他。好吧，也许他后来学会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我喜欢的音乐类型完全不同，但话说回来——他当时确实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为什么不帮帮他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跟现在不一样，列托夫也跟现在不一样。时间过去了很久，人也变了很多。体制，国家……我觉得没有国家，你根本逃不掉。问题在于，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国家？是愚昧无知的、卑鄙无耻的，还是某种程度上组织起来的？列托夫始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俄罗斯版的伊凡·愚人，他总是想呐喊，不是唱歌，而是尖叫。我还能补充什么呢？

我不喜欢那种学了三个和弦就开始扯着嗓子嘶吼的人。而且嘶吼的内容还那么私密，那么深刻。他把嘶吼出来的每一个逗号、每一个省略号都记了下来。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写了100首歌，扔掉99首，只留下一首，所以它就是一首歌，所以它就是一首歌。你需要对自己更严格一些。他把所有东西都写了下来：写在纸上，他没时间把所有东西都录到唱片或磁带上，但至少他把所有东西都写在了纸上。在他看来，创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必须保留下来，一切都那么珍贵……顺便说一句，关于自嘲，他有点儿不擅长。自嘲，以及自尊，对他来说都非常困难。有些东西就像被某种

泵驱动着一样，从他身上自然流淌出来。他没有花太多时间去处理和润色他的作品。他自己认为我们合作的录音质量非常高。在资源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事情竟然也运转起来了。如果我真的对他有好感，我早就跟他一起旅行了，因为他确实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提议：在从莫斯科到乌兰巴托的火车上，他提议说：“咱们到处旅行，开演唱会吧。”但我回答说我是个宅男，没兴趣。而且，我对那种音乐风格也并不感冒。尽管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我能理解他的观点。那是一个糟糕的时期。每个人都对共产党感到厌倦。他们厌倦了黑市商人和旧货贩子，因为物资匮乏，所有东西都被倒卖。商店空空如也，有创造力的人什么也得不到。整个国家一片混乱。

菲拉托夫或许有意不认为自己是“民防队”成员。他的价值观确实与列托夫及其同志们有所不同。谈话随后转向了列托夫职业生涯中一个令人不快的方面：许多歌曲的作者身份至今悬而未决。例如，奥列格·利先科和叶夫根尼·利先科兄弟对列托夫（“皮克·克拉克松”）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

据我所知，这些歌是他们在1987年4月10日至13日新西伯利亚音乐节上表演的（作者注）。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到了音乐节现场，因为一些来自圣彼得堡的乐队（比如“Strange Games”）没来，所以出现了一个空缺，他们不得不赶紧填补这个空缺，收拾残局。叶夫根尼·利申科（Zhenya，真名叶夫根尼·利申科）在火车上写下的歌，连夜拼凑起来，他们就以“Grazhdanskaya Oborona”（意为“守卫者”）的名义发行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列托夫后来没有否认：这些歌是Klaxon乐队的，他们互相帮助演奏，互相配合——当误会出现时，他们就对他很生气。毕竟，这是抄袭——他把歌据为己有，连名字都没改。他们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音乐节上唱了大约20分钟——我听了一段音乐节的录音。然后声音突然没了，主持人拿起麦克风，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他妈的在乎我们的音乐节吗？”他要么是超时了，要么是唱了什么违法的歌。总之，主办方很不高兴。他们去闹了一场。

——克拉克森人之后还剩下什么？他们的所有录音都去了哪里？谁得到了它们？

——他们的公寓着火了，很多唱片都被烧毁了。贝比克（最小的弟弟，奥列格·利申科——作者注）几年前上吊自杀了。他酗酒，还吸毒。也许他欠了一屁股债。也许有人帮他上吊了——这里面有很多扑朔迷离的故事。再加上抑郁症：他的女友在那之前去世了。他送她到小巴站，之后就没再联系她。后来人们发现了她：她已经奄奄一息。这其中有些蹊跷。他去太平间辨认遗体。他很沮丧。他患有抑郁症。他的母亲在鄂木斯克国立大学三号楼担任管理员。他和母亲聊了一会儿，母亲出去散步了，他隔着窗户向她挥手。他回来后——他上吊了。他脱了衣服，叠好了。这一切都发生在他女友去世一周后。真相扑朔迷离。警察也可能是她被吊死的。谁知道真相究竟是什么。他的创造力似乎并不奏效。他觉得没有Zhenya（Evgeny Lishchenko），他就什么都不是。

Babyk 是利先科兄弟中弟弟奥列格的昵称；哥哥叶夫根尼的昵称是尤金（他比弟弟早逝很多，于1990年去世；奥列格于2004年去世）。

——请问，你上次见到莱托夫本人是什么时候？

“我最后一次亲眼见到列托夫是在他们埋葬梅森·科利亚·杰尼索夫——鄂木斯克摇滚俱乐部的首任主席——的时候。列托夫来参加了遗体的移送，那是1993年12月。当时聚集了一些人。我问他：你要去墓地吗？他回答说害怕什么，害怕被‘黑暗能量’之类的东西包围。我想他也害怕克格勃，因为他当时深度参与政治活动，和利莫诺夫、日里诺夫斯基、白宫等等都混在一起，就在那时，就在之后。原则上，他的害怕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在某个入口处杀了他。那时候，一个少校不会和你坐上12个小时，给你饼干和茶——那种事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你是个好人的”，“你

为什么需要这个？”“别看这个，别听那个”——他们不再试图说服你了。他们会抓到一些罪犯，例如，他们会说：“杀了这个，你就没时间了”，然后他们会在门口杀了你。在我们国家，这个问题解决得非常简单。

— 专辑销售的版税以及专辑录制方面的帮助——这对你产生了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吗？

— 这里甚至根本没有提到钱的问题；这正是所谓的“团结互助体系”。

— 鄂木斯克国立大学的这个实验室是否曾用于录制音乐？

我们在《The Glass Bead Game Before Swine》录制了这首歌，这也标志着我们与Letov录音室合作的结束。Kamikaze也曾在那里录音，但那是和“Crisis Department”乐队一起。Kamikaze当时正在录制他自己的专辑，Boss担任吉他手——我对此记忆犹新（*Andrey Babenko*，又名Boss，是“*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的创始成员之一——作者注）。

从列托夫的谈话中，我们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对那个时代鄂木斯克摇滚乐的讨论。我问起了迈克·切尔尼舍夫，他的名字在我们的谈话中被多次提及。

“迈克·切尔尼绍夫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住在帕尔西耶兹达街20号。他是个诗人，写诗，还想当音乐家。除了对摇滚乐的热爱，他还是个瘾君子，而且他还让很多人染上了毒瘾，包括克拉克斯乐队的成员。他自己没什么毛病——胃溃疡穿孔——但似乎什么都影响不了他。后来，他搬去了圣彼得堡。我曾经在购物中心见过他的遗孀。“他活着吗？”“嗯，”她说，“我觉得他死了。”说到毒品：毒品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这对他来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他好几次都想跳楼自杀。基本上，他就是个本地的毒瘤。警察追捕过他，但最终还是没能抓到他。”

— 你现在和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有联系吗？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大概跟音乐有关——他只会这个。他可能搬走了。我帮列托夫录专辑的时候，他还在军队里——所以我才帮他。有些人当兵，有些人害怕。老板在乌克兰，他偶尔会来这里。他跟神风乐队录过歌。然后他就永远地回乌克兰了。没有回复，也没有打招呼。”

你认识谢尔盖·谢尔盖耶夫吗？

我认识谢尔盖耶夫（一位鄂木斯克吟游诗人——作者注）很久了，是通过“星”社区中心认识的。八十年代中期，他们经常在“星”社区中心举办迪斯科舞会。我们当时正计划开一家正规的迪斯科舞厅——不是那种朋克舞厅，而是想办个像样的活动。爱乐乐团的成员会在那里聚会，交换唱片。谢尔盖耶夫——他是个老唱片爱好者——也会在那里交换和出售唱片。当时经常去那里的主要是理工大学的学生；基本上，他们引领了那里的风气。理工大学在科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理工大学的学生也总是喜欢去那里。他们有调音台、录音机、装饰精美的礼堂，所有设备在当时来说都很先进。当然，这只是在那个年代的水平。谢尔盖耶夫经常带着他的唱片去那里，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后来他跟我提到了列托夫——他把我介绍给了列托夫。我们在涅夫提亚尼基的跳蚤市场交换唱片。我正是在跳蚤市场交换唱片时认识了列托奇卡；是谢尔盖耶夫介绍我们认识的。谢尔盖耶夫以前从来不会唱歌；他会写诗，但不会演奏也不会唱歌。这家伙人缘极好，很会赚钱，现在他做起了生意。

现在我们来听听专辑《猪猡之前的玻璃珠游戏》中的几首歌。这是《伊万·戈夫诺夫，割草者》——列托夫创作这首歌的目的是什么？顺便一提，专辑封套上写着这首歌（也是13首歌中唯一——

首)的作者不仅有列托夫,也有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除草剂伊万·戈夫诺夫”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意象,莱托夫和他的乐队克拉克斯人玩得不亦乐乎。莱托夫的乐队是如何将一切融合在一起的呢?他们会聚在一起,玩得很开心,喝茶——其实酒量不大——而且也不碰毒品。一些抽象的、荒诞的、意象会逐渐浮现,然后它们会融合在一起,最终成型——莱托夫正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拥护者。当大家都散去之后,他别无选择,只能独自创作。我只是在技术上帮他,坦白说,我对此并不感兴趣。所以我开始尝试原声乐器:我创作出一些东西,然后演奏出来。莱托夫录制了那张专辑,之后他意识到这种原声方式并非他“的想法”,也并非他“的方法”。这不是他“应该走的路”:用这种方式录制专辑。所以,他对这种创作体验并不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与团队合作,共同创作。《猪圈前的玻璃珠游戏》算是一首比较理性的作品。至于《伊万·戈夫诺夫》这首歌……没错,我们俩是共同创作的;某种程度上,这首歌也属于我。我和列托夫当时正乘电车去环岛,去丽莎·柴金娜家。列托夫换乘电车,穿过高架桥到了契卡洛夫斯基。我们一起下了车:有个家伙正在割草。他晒得黝黑,穿着一件巨大的T恤。就在那时,伊万·戈夫诺夫——除草人——诞生了。草象征着生长,象征着新生。事实上,列托夫给这个角色取了这个名字,这是他自己的形象。

——歌曲《KBG摇滚》——列托夫在这首歌里融入了什么元素?格列宾希科夫又与这首歌有什么关系?

当时我和谢尔盖·谢尔盖耶夫正在听格列布尼亚的歌,我们都很喜欢他。列托夫对此非常恼火,甚至还拿这件事开玩笑,尤其是在这首歌里。所以,据我所知,他决定就这件事来刁难我和谢尔盖耶夫。

——歌曲《我们追随太阳》真的是你的作品吗?莱托夫在民防官方网站的一次线下采访中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追随太阳》——没错,那首歌是我的,但我并不喜欢,所以就把它扔掉了。至于莱托夫在某个地方唱过这首歌——我不在乎。我扔掉了那首歌,并不在意他把它据为己有。就这样,去往另一个世界吧。

— 你上次见到列托夫的遗孀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是什么时候?

——是的,她昨天刚到。那天晚上她联系了我,从七点到七点四十五分,我们一起回忆往事。她非常紧张:“我今天就要走了,不能再拖延了。”她正在拍摄一部关于列托夫的电影。那部电影讲的是什么?我甚至不知道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她采访了所有人——谢尔盖耶夫和经理。凡是还活着的人,她都去采访了。她用佳能相机拍了很多照片。丘马科娃一直在鄂木斯克和莫斯科之间奔波,所以你根本找不到她,也找不到她的公寓。丘马科娃飞来还有另一个原因——她要为列托夫的墓碑竖立纪念碑——9月10日是他的生日,那天正好是他们在這裡纪念他的日子……所以她忙着这件事。她做事总是匆匆忙忙——你能感受到莫斯科的快节奏,一切都在加速——到处奔波……她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语言文学系——至少她是这么说的。这部电影将在莫斯科进行剪辑。

《猪圈之前的玻璃珠游戏》磁带版的插页上印着一张20世纪80年代中期五位鄂木斯克摇滚乐手的照片:从左至右依次是叶戈尔·列托夫、叶夫根尼·菲拉托夫、叶夫根尼·利申科、迈克·切尔尼舍夫和尤里·波利特科。这张照片拍摄于切尔尼舍夫的公寓,时间是他们去斯普特尼克电影院的前一天。

你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另一个杰夫，他是“民防”和“生存指南”组织的成员，来自秋明的伊戈尔·热夫顿。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是镇上唯一的杰夫。我从1979年就叫杰夫了，比莱托夫这个名字早得多。”

本文及访谈问题的作者是雅罗斯拉夫·加夫纳。

Chronicles | 通灵杂志 #45/46 — 光芒终将陨落

光芒将会消散

埃琳娜·科斯泰娃 (Elena Kostyleva) 与娜塔莉亚·楚马科娃 (Natalia Chumakova) 交谈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是我的第一次采访。不仅是过去三年半以来的第一次，而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我之前只为一家网站写过一篇文章，回答一些问题，一些人们应该知道的事情，那几乎是在我去世后不久。”

“我不是故意要让你在这里伤透我的心。我只是想让你把我所有关于叶戈尔的事情都告诉我。”

“你看……他从不让任何人了解他的私生活。他觉得没必要。而且他非常清楚自己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

—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他认为自己是诗人吗？

——而且，他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是音乐家。我保存着他1982年的档案，里面有他收集的诗歌笔记本，每本都有目录、页码，还贴着各种各样的“物件”：车票、征兵通知等等。放学后他去莫斯科探望哥哥，在那里结识了一些诗人，特别是列宁格勒的诗人，并从概念诗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我知道他听过“穆霍莫里”乐队的音乐，并且非常敬重莫纳斯特尔斯基。到了1983年，他已经离开了莫斯科。他可能在那里住了一年。他曾经在“流行机械”乐队为库廖欣担任贝斯手，还跟米沙·茹科夫学习过鼓。我想他参加过一些抗议活动，也录制过一些半地下的前卫音乐会。这些都是我从他当时写的信里了解到的。

他有写信的习惯吗？

“是的，他那时写信。毕竟打电话很贵，所以他们经常写信，一个月一次，有时甚至一周一次。我保存着他的信，写得非常好。”

— 你打算出版它们吗？

——我也这么认为。但评论部分需要大量润色，因为有些内容脱离语境发表风险很大。如果给一些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看，他们会疯掉的，什么都看不懂。

你害怕这个吗？

“倒不是我害怕；我只是不喜欢人们用片面的眼光看待他。这些人通常是思想激进的年轻人；他们固守着自己认定的形象，看不到，也不想看到任何不符合他们既定框架的东西。他们恨不得打破这个框架。举个简单的例子：很多人把叶戈尔当成‘俄罗斯人’来听。很多人不仅承认，甚至还以此为荣，因为他们根本不听西方音乐。说得委婉点，叶戈尔不理解这些人。他从小就听西方音乐，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音乐，对西方音乐无比推崇。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伯利亚朋克’兴起的时候，就涌现出了一大批这样的人。”



我们能说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们吗？

“当然。他总是说自己是向导。至于具体做什么——嗯，有很多种描述方式。”

——但绝对不是西伯利亚朋克。是别的什么。

——当然。《闪灵陨落》。这显而易见。他究竟有什么目的？一种使命，虽然我不喜欢这个词。这一切并非毫无意义。为了传达它，为了传播它，为了讲述它，为了展现它——否则，为什么要出版它，记录它？

他大概没说过：“我肩负使命。”

“当然不是，但这很明显。他从小就有自发的顿悟，超越自我，感觉自己同时就是一切，仿佛‘它’通过他说话。”

— 无论你怎么否认自己吸毒，人们还是不相信你。

“问题是，他总是很着急。他尝试过很多不同的方法——魔法的、非魔法的、不睡觉、沉默、屏住呼吸，各种各样的练习，数不胜数。或者，比如说，他最喜欢的——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做所有事。也就是说，做与自己真正想做的完全相反的事。我见到他时最震惊的是，所有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竟然都是真的——我以前觉得它们都是夸张的。为了某种目的，他可以对自己做任何事。有时，如果别人也必须对他做同样的事情，他也会对别人做任何事。当他说‘我不创作艺术，我甚至不做任何创造性的工作’时，他的意思是艺术回归到一种技艺的本质，通过这种技艺……传递最重要的东西。嗯，为了生命，为了让钟摆朝着正确的方向摆动。但与此同时，他是一个非常细致、勤奋的人。他非常努力地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他真的在努力、努力、再努力，他像研究文字一样研究文字。”他是猎人。他经常进森林；他的主要方法就是：进森林。

他睡眠时间极少，可能只有五个小时。他讨厌浪费时间。除了作曲和录音，他还读书、看无数电影、听音乐，同时还能抽出时间举办音乐会和参加社交活动。



叶戈尔喜欢哪些诗人？

——对他来说，弗维登斯基大概是最棒的诗人。不是哈姆斯，而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弗维登斯基。在西方诗歌中，他推崇休斯和德国表现主义。可以说，他对传统诗歌持一种轻松的态度。他还把普希金抛诸脑后……我父亲是个普希金研究专家，这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父亲非常欣赏普希金的诗歌。他也欣赏叶戈尔·丘特切夫，父亲非常喜欢丘特切夫。他们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至于普希金，我怀疑他除了在学校里可能读过一些之外，从未真正读过普希金的作品。我无法证实这一点，但这完全有可能。至于诗歌和音乐，他很快就明白了自己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他不会去读或听任何他知道自己不需要的东西。他利用一切来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他创作过未来主义诗歌和具体诗，但那些都只是昙花一现的作品。

《叶戈尔·列托夫诗集》收录了他早期的几首诗。我们现在重新出版这本书，但这次会按年份出版，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随意。我们会加入一些早期的作品，以及所有后期的作品。早在2007年，也就是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筹备这次的再版。这些早期诗作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还处于早期阶段。这就好比发行他早期的录音，里面他用一种尖细、刺耳、非常滑稽的声音唱歌。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嗓音是后来才出现的，而且是他自己塑造的。他对着枕头尖叫，故意把枕头撕下来——那些沙哑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对着枕头？因为他怎么可能在屋子里到处尖叫呢？他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唱歌；他当时在寻找歌手。

一 不想独自录音？

——有时候我就是那样录的。后来，他发现自己没有吉他手之类的乐手。于是他就给自己虚构一些伙伴：“某某打鼓。”因为他认为创作不应该是个人行为，而应该是集体努力。所以，他一直很需要伙伴。后来，不知怎么的，他就不再寻找伙伴了。他反而更多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西德·巴雷特，或者比如说，亚瑟·李身上找到了伙伴。对他来说，伙伴是否就在他身边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某个地方，在某个时间——他们曾经是，或者将会是。

他写过很多文章吗？

他一直都在写诗。但有时他却完全写不出歌。关于这背后的原因，众说纷纭。我们正是在1997年夏天，他经历的这段时期。他以前也写过诗，但越写越少，最后——就彻底放弃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总之，他也说不出别的了。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包括那些政治事件。他从未否认过，也从未承认过自己的错误。他曾参与过新波多黎各人民党（NBP）的活动，后来共产党试图拉拢他。很明显，他们是在利用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但这根本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有一段时间写不出歌，在那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毫无意义。

——然后他们说“民防”是红棕色的？

“叶戈尔在‘A节目’上向全国直播说了这番话。”乐队的名声就是如此。演唱会不断被禁。丑闻、水炮、防暴警察。你在台上表演，时不时会滑倒在血泊中。有人会被从观众席上抓走，拖到后台挨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停止演出？情况可能更糟。人群很疯狂，那些疯狂的防暴警察或警察，还有一些光头党——不，不是光头党，他们叫什么来着？摩托车党。尽管摩托车党实际上是最好的保安。演唱会真的很难熬。很明显，人们不是来听歌的，而是来打架的。那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这就是当时的人群，这就是当时的演唱会。当然，其他人只是害怕去。这种情况直到2005年才有所改变，当时正规的俱乐部开业，正规的人群蜂拥而至。所谓正规，是指我们理解的那种正规人群，他们来的目的都一样。确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会把我们的演唱会称为一种仪式，因为它们绝不仅仅是娱乐。我说“仪式”这个词，其实并不想显得太矫揉造作。一方面，这个比喻虽然用滥了，但确实贴切：“在舞台上施展萨满教”。那几乎就像一场“苦行僧之舞”，伴随着各种奇特的肢体动作……他任由自己的身体自由舞动。奥博罗诺夫斯基的贝斯手，在乐队早期只和他们合作了三个月，他告诉我：“他告诉我们，在舞台上要以最不寻常的方式表演，也就是说，以一种非常错误、不合逻辑的方式。”就像“硬币侧翻了”，而这非常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就是进入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现实，彻底打破所有常规的认知。



我还想问问，比如说，关于体制和嬉皮士，他似乎.....

完全不是。他很有个性。鄂木斯克的音乐圈更偏朋克，甚至可以说是后朋克，他们对这种音乐，特别是新浪潮音乐，非常痴迷。他们认识了一群人：库兹亚·切尔尼·卢基奇、扬卡——他们大概有点嬉皮士的风格。友谊、令人瞠目结舌的饰品，诸如此类的胡闹。和平、爱，等等。叶戈尔——他可不是个爱好和平的人，他一直都很激进——支持与一切邪恶作斗争，反对恶魔主义，反对所有渗入人心、驱使人作恶的污秽之物，尤其是在某些理念的掩护下。是的，简而言之，就是这样。比如说“记忆”社团——披着捍卫东正教和民族主义外衣的真正邪灵。这首歌正是关于这个的。

他一心想主动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垂头丧气。他绝对不能袖手旁观，无所事事。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冲突，但他们和这群人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扬卡带他上高速公路时，遇到了很多克格勃

的案子，他显然更直接地接触到了体制；他参加了一些聚会。但是.....我和这些老嬉皮士聊过——他们都偶尔见过他。头发和手镯并不是明确的识别标志，人们经常互相赠送；很多人只是喜欢把头发编成辫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几乎成了某种“非正式”的通用标志。我也戴着一个；比如，我有一个很粗的黑色手镯，上面刻着“终结”。这真的是嬉皮士的标志吗？人们的脑子里一片混乱，困惑不已。所以，叶戈尔和嬉皮士其实没什么关系。这首歌《体制》充满了讽刺意味，是从局外人的视角出发的。

——那么东正教呢？它又如何呢？

——信奉东正教.....信奉东正教。当然，他并非完全反教权，只是不常去教堂。他对微妙的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哪些事物是好的，哪些不是；哪些事物是神圣的，哪些不是；哪些事物是空洞的，毫无价值。他与基督有着非常私人的关系。他视基督为人，相信基督“行事”，并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境界。对叶戈尔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一如果你努力，即使看似毫无进展，也终会有所收获。你真的可以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打破任何障碍。你知道，我不想深入探讨宗教问题。但无论如何，这大概已经很清楚了。

但他确实很想受洗。我们抵达以色列后（这已是众所周知的故事），我们一心想在那里受洗。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任何已受洗的人都可以主持洗礼仪式，所以我们特地前往，他在约旦河接受了洗礼。但他并没有成为经常去教堂的人。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会如何去告解，因为他不善于与人相处，而且他在教堂之外寻求个人的救赎。他的葬礼并非按照东正教的仪式举行，但我知道在其他地方有很多神父为他主持了葬礼。

他自认为信奉东正教，理由很简单：我生于此地，长于此教的种种象征之中。但他对待纽莫耶夫（他已完全皈依东正教）以及其他同志，总是十分和蔼可亲。这其中也存在诸多矛盾：卢基奇一度竟然是天主教徒。他也给同伴们带来了许多欢笑。正如诗中所写：“西伯利亚曾掀起一股天主教热潮。”

— 我感觉现在每个人都想把叶戈尔据为己有。

“是的，所有人。东正教徒、红军，等等。但只要有人想把他关起来，他总是逃走。他似乎会任由别人把他带到某个地方，但随后他就会离开——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出于本能。就像斯科沃罗达说的：‘世界试图抓住我，但没能抓住。’一旦那种潜藏在任何一个成熟人物心中的死寂感袭来，他就会不择手段地离开，突然使出某种诡计，诸如此类。”

当然，人生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必须突然做出选择。然后他会说：比如说，我是这样的人。“是的，我是个法西斯分子。”突然，砰！但这被断章取义了，因为事实是——因为我不想和那些拿了黑帮的钱就到处寻欢作乐的“民主党人”为伍。

- 听着，既然你提到了，我就问你：为什么坟墓上会有十字架？

“自从我们第一次去耶路撒冷以来，我们就一直佩戴这样的十字架。在演唱会照片和专辑封面上，他也佩戴着这个耶路撒冷十字架。他将其视为普世十字架，将所有基督教教会联合在一起。正如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基督徒一样。”



— 你认为“文化”本身并不把自己视为摇滚音乐会的观众，而是文化本身，为什么它还没有意识到和理解莱托夫是什么？

我觉得是因为他深深扎根于摇滚圈。他热情地与所有愿意来的人交流，从不筛选听众。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听到他的音乐。而且他运用了一些能吸引更广泛受众的元素。如果有人能创作出热门歌曲，创造出能抓住人们眼球的作品，那他们为什么不刻意去创作呢？那些所谓的“有文化”的人群往往思想狭隘——如果很多人穿着印有某种图案的T恤，那就意味着这是某种垃圾，不值得与之沾边。这些人非常害怕别人怎么看他们：如果某个朋克在院子里唱起了《一切按计划进行》

（Everything'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那就完了，我再也听不下去了，太丢人了。

成为摇滚偶像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发声，而且你的声音会被听到。但在其他方面，这都是巨大的劣

势。不过，如果你很受欢迎，你的录音作品在某个地方播放，某个完全陌生的人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到了，并从中得到了帮助，那当然是件好事。

“除了文本本身，还有‘诗人形象’，这是文化界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在寻找却始终未能找到的东西。然而，在我看来，如果说有一位诗人的作品能够引起这个国家的共鸣，那就是列托夫。如果说有一位诗人的作品能够表达时代，那就是列托夫。”

“叶戈尔有意识地放弃了‘简单’的诗歌。他本可以来莫斯科，融入那里的人群，写诗，而且他肯定会成功。但他不想那样——我想他觉得那里很无聊，社交圈子太缺乏活力了。赫列布尼科夫和马雅可夫斯基就像我们今天的一些摇滚乐手一样。他们只是被置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而摇滚乐手则不然。”

埃戈尔渴望对世界和生活产生真正的影响，而街头艺术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由于他对街头艺术驾轻就熟，便将诗歌与这种技艺结合起来。尽管他确实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

你想改变哪种现实？又该如何改变？

——这环境，一点也不适合他。他想改变它，让它变得更好。让这里不再有沉闷、忧郁和冷漠。让它充满活力。这一切都契合其中，所谓的共产主义以及其他一切。他们告诉他：“你支持革命，你支持共产主义，但你有没有意识到，如果这真的是你所坚持的，而它开始取得胜利，你将是第一个被践踏的人？”他说：“是的，我知道，那就这样吧。”他并不真正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有必要，他随时准备为这个理念牺牲。

——至于“这个”——具体指的是哪一个？

“嗯，我该怎么念这些词呢？普世幸福的理念。‘闪耀的礼物’的理念，这或许就是上帝在人间的国度。他当时做了他认为正确的事情，也就是说，凭直觉，他觉得‘现在就应该这样做’。当他觉得应该站出来反对那些完全越界的人时，他就加入了。”

那是1993年，白宫。他当时并没有想，“啊哈，我要支持这些人。”他亲眼目睹白宫遭到枪击，里面一片混乱，然后像疯了一样逃走了。

你知道，或许说“地上的神国”最贴切才是正确的。不像那些认为只要安分守己、不犯罪，总有一天就能得到应得之物的人——他完全不理解这种想法。他是个行动派；看到不公和卑劣，他无法坐视不理。所以，他奋起反抗，他总是自称“我是一名战士”，而且，他对待真正的战士也十分热情。总的来说，对他而言，一个人拥有超越安逸和生命的价值，拥有某种更高的目标，这一点至关重要。所有这些扭曲的观念——其实并不重要。

——您说的扭曲是指NBP吗？

——嗯，尤其如此。顺便说一句，利莫诺夫在他的《亡灵书2》里完全胡编乱造了关于列托夫的事。他对列托夫没什么兴趣。利莫诺夫刚从法国来，他们就告诉他：我们这儿有个列托夫，什么都干，他还拥有体育场。利莫诺夫说：“啊哈，那就这么定了。”他们邀请的可不止他一个，还有很多其他音乐家。列托夫拿到了四号票。然后利莫诺夫突然抱怨道：“我把鄂木斯克的牢房交给列托夫看管，结果他把整个利莫诺夫都扔到床底下了。”总之，列托夫是个不称职的党工。利莫诺夫在那本书里全是编造的。“列托夫住在鄂木斯克一间铺着毡布的公寓里。”显然，利莫诺夫之所以

觉得他家有录音室，是因为那是毡布的印象。只不过我们家根本没有隔音。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和剪报，公寓的风格完全是迷幻风格，但总的来说，很漂亮。当然，没有毡布。不过话说回来，他总是会编造关于每个人的故事。



——至于叶戈尔究竟有哪些想法，我不知道，也许是神学方面的想法……

他非常喜爱诺斯替教，诺斯替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精通诺斯替福音，也对东方神秘哲学颇有研究。他博览群书，对一切都充满兴趣。他读书时，几乎会阅读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而且记忆力极佳。因此，他设法自学成才，涉猎广泛。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们竟然会讨论叶戈尔是否受过教育。”

有些人认为摇滚乐是给外行听的，只有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它的运作方式。

— 这对某些人来说没有帮助。

“对了，如果你问他喜欢什么，他喜欢德国表现主义，喜欢画家，尤其是版画家。我们一半的画册都是迪克斯的插图。另一半则以各种原始主义风格为主。他也喜欢新艺术运动；他收藏了很多画册。我最近一次如此震撼的经历是在维也纳看到席勒的作品。我和所有游客一样，是去看克里姆特的，然后我走进了席勒的展厅——我简直惊呆了。还有那幅克里姆特……其实，我现在最遗憾的就是无法和他分享这一切。我本该让他看看席勒的作品……”

我现在就可以哭了。

“这甚至还不错。恰恰相反。换作是我，我太习惯于自律了，所以看到别人能够放松，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反而感到很开心。我做不到。如果我一直歇斯底里，那就太不对劲了。但是，当然，我无法和他分享这一切——就在此时此地，在这个现实世界里——这简直难以忍受。我们几乎从未分开过。有时我会去新西伯利亚，而他——极少数情况下——会独自去听原声音乐会，但通常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这变得很重要——持续不断的交流，交谈，交谈，交谈……”

你们是不是一天24小时都待在一起？

——巡演的时候，他总是陪着我，在家的時候也是。他会独自去森林里作曲。当然，也会去商店之类的——只要有时间就去。那些特别忙的人，自然哪儿也不去。比如，如果他在创作人声，那他肯定哪儿也不去；但如果我在做什么，他就会到处跑，什么都做，毫不犹豫，做饭，做饭，甚至会把做好的东西直接送到我眼前，比如，如果我在做一些复杂的录音修复工作。我们最近一直在修复这些老磁带。我修复了《扬卡》。《扬卡》真是太棒了，波兰的一个乐队最近用波兰语翻唱了它。有个美国人用口音唱过……《扬卡》永远不会被遗忘。至于莱托夫，我该怎么说呢，他把她捧得很高，女人都是容易融化的，但他把她吓得不轻。他把她吓得那么厉害，她最终逃走了。在那之后，他们差不多两年都没怎么说话。所以，关于他开车送她去某个地方的故事……当时和她在一起的完全是其他人。不过，总的来说，我没必要对他百般美化；他有时脾气确实很暴躁。嗯，这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很正常。

— 你要拍一部关于叶戈尔的怎样的电影？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一开始，我并不想拍。我觉得那是懂行的人的事，但不知为何，他们就是没去做。但我的朋友安雅，也就是和我一起拍这部片子的人，一直唠叨着说：‘你自己来拍吧。’”于是我们去找了瓦尼亚·列别捷夫，瓦尼亚·列别捷夫找到了萨沙·西蒙诺夫，萨沙·西蒙诺夫又找到了博里亚·赫列布尼科夫，就这样，一条接一条的链条开始了，一群人开始帮助我们，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当然，他们通常会先写个剧本，但我当时只是到处拍摄，甚至包括80年代路过的任何人。最近，萨沙让我看了班克斯的《画廊外的天赋》。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一生中积累了一整套磁带的故事。小时候，他错过了母亲的去世——她去世了，但因为他年纪小，所以他们没有告诉他，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没有记录下这一切。于是他开始拍摄一切，以免错过任何细节。而我的经历也是如此。去年秋天，叶戈尔的第一支乐队Posev的贝斯手去世了。他叫长约翰。他一直都在鄂木斯克。他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我当时根本不在乎他。他真是个好……我当时真的很担心那些做了这一切的人要离开了。我必须抓紧时间。

我刚才就在想——叶戈尔会就这类事情向谁寻求指导吗？比如说，他挚爱的赫尔佐格？我怀疑不

会。我们目前正在搜寻历史记录，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我自己也收集了不少资料，而且很多人都给了我很多。特别感谢那些提供资料并说“如果您觉得这些有用，我们会很高兴”的人。

请您详细介绍一下这片森林。它离房子近吗？

“不远。这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他一两岁的时候，他们搬到了契卡洛夫斯基这个定居点——在鄂木斯克郊外，靠近一个军用机场。那里被茂密的森林环绕。叶戈尔直到十一岁都体弱多病；他母亲生他时很艰难，所以基本上，他总是徘徊在生死边缘。而且他受不了交通工具；即使他进了医院，也会被抱回家，他父亲会把他背在背上。叶戈尔只熟悉步行可达的城市范围，而且他仍然需要散步。即使在其他城市巡演时，我们也尽量找地方散步。他尤其喜欢墓地，那种绿树成荫的漂亮墓地。”

他会去树林里作曲……或者我们会去树林里散步：我们会聊天，生火——这对他说很重要，他和火有着特殊的联系。我们会边走边聊——沿着铁轨，穿过管道，穿过避暑小屋……我们会大笑，在寒冷的森林里燃放烟花。我们就这样快乐地漫步。然后我们总会吵架，或者发生一些糟糕的事情——总有些事会让他爆发，就像被人狠狠踢了一脚，然后我们就会坐在那里，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只要不无聊，他总是喜欢被人折腾。总之，我们玩得很开心。

现在一切都像这样，平静。糟糕透了。有首歌就是唱这个的，一首糟透了的歌。唱的是灵感的匮乏和假期的消逝。尝试也无济于事。反正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日子了。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意义段落 — 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访谈 (2012)

是什么促使你成为一名作家？

“我想，回首我的人生（现在正好是我的纪念日）……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内心、与人的交谈以及接受采访中，答案也或多或少地形成了，并得到了无数经历的验证，因为真理的概念本身就具有模糊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真理就在那里——你总是试图美化自己，或者带点讽刺意味。我学会了冷静地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自己创作的诗歌。这些诗歌的诞生，是因为任何一位作家，在一段时间后，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发现自己作品/创作的另一个层面，因为它本质上是对作品的描述。但当你写歌的时候，你并没有完全体验到你所写的内容，然后它又会涌上心头。这是一种发生在人们身上的奇妙悖论。”



于是，大概在1983年，我写下了我的第一批诗（当时我21岁，是学院的学生）。这些诗作具有典型的古典风格：押韵，带有相当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对逝去爱情的青春期忧伤（当然，这种忧伤一直都在，后来就消散了）。诗中描绘了一个与生活有些疏离的男人形象，这赋予了诗歌一种淡淡的忧伤，甚至可以说是悲剧色彩。事实上，我写的第一首诗名为《致赫鲁多夫》，灵感来源于电影《逃亡》。德沃热茨基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我现在才明白，我当时是多么的震撼。

后来我们遇到了叶戈尔。有一天，他问我要了一些诗。他自然而然地融入了自己的理解。他博学多才，博览群书，热爱奇特怪诞的事物。他自然也喜欢一些佳作，一些最优秀的诗，但都带有他自己的风格……当然，还有未来主义诗人，比如扎博洛茨基、马雅可夫斯基、克鲁切尼赫、弗韦坚斯基、奥列尼科夫。于是，他给了我一些建议，分享了这些诗，这些诗在当时并不常见（人们家里的书架上通常只有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我们对现实的批判性评价非常接近，我们都与现实保持着一种疏离感，都认同那种潜藏在许多人心中的极权主义式的、剥落的本质（那种陈腐的思维，那种潜藏在苏联人潜意识里的思想）。有一天，这一切似乎都凝聚在了一起，1985年，我写下了诗

歌《美万岁！》。我把它拿给列托夫看。我说：“你看！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也就是说，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被打开了。我尝试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他读了这首诗，拍手称赞。他说：“看！这太棒了！这很特别！”这首诗正是献给那些用外表令男性惊艳的女性的讽刺性看法。就是这样。这比我的第一首歌早了两年。

然后.....恕我自夸一下，第一首歌的创作时间比《瘫痪》稍早一些。那是在莫斯科。我写了《共产主义》这首歌。它几乎是用诗歌的形式写成的，但我当时正在想象它如何融入音乐之中。

抵达鄂木斯克后，我们去看望了我第一任同居妻子的祖母，她瘫痪了。伊拉非常爱她，所有拥有幸福童年的孙辈都能理解这种感情。这个人已经躺在那里将近两年了：身上长满了褥疮，舌头几乎麻木，但他的眼神依然明亮，反应也依然爽朗，充满灵魂。我心想.....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世上会有如此疯狂的事情，让一个人动弹不得？他是如此真实！他是如此充满活力！如果他能.....哪怕只是一动不动，然后死去。为什么他会处于这种中间状态？我完全懵了。我只是坐着，看着。我的内心仿佛有什么东西沉入了谷底。某种魔神正在行走，斩断一切联系。我想到了我自己，我的家人，以及所有人。回到家后（那时我正在学吉他，手指勉强能动，就能弹奏和弦），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写下了这些文字，尽管我当时并不理解自己写的是什麼。我当时完全沉浸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中，歌词就这么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之后我唱给朋友们听，他们都非常支持我。不管我问多少遍，他们总是说：“你在开玩笑吧？！这首歌真的太棒了！”人们经常在演唱会上请我唱这首歌，它以各种方式流行起来，我的名字也和它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我明白了这种略显怪异的诗歌风格源于此：略显复杂，略带沉重，或许信息过载。七十年代有个名叫克拉纳的奥地利滑雪运动员，他常说一句名言：“从米中挤出公里”。我热爱运动。所以我的诗歌也带有这种特质——我从行中挤出段落般的意义。那时，我觉得我越是用文字表达出这块意识的砖瓦，它就越有力量。至少，对我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切都由此开始。我找到了我的诗行，开辟了道路，然后我便沿着这条方向前行。

虽然也有许多歌曲过于简化，例如《盛宴》或《和平或战争》，其中一切都以相反的视角来构思，一个短语就包含了整个“故事”。这是一种实验，但它取得了成功，这些歌曲也相当流行。

— 正如许多人所说，莱托夫在创作中究竟有多大的独裁倾向？

众所周知，当叶戈尔开始录制专辑并结识了许多人之后，他对音乐的渴望变得异常强烈，以至于他想要记录下一切。当然，这种冲动源于1987年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举办的那场著名的“民防”乐队首场演唱会。当时，利申科兄弟和叶戈尔以“民防”的名义，在一场演出中演唱了两套曲目。在那场音乐节上，我们结识了很多：迪马·卢基奇、扬卡、来自“皮赫协会”的迪门齐。我们也认识了列维亚金和谢利瓦诺夫。换句话说，诺沃西比尔斯克当时就像圣彼得堡、莫斯科和叶卡捷琳堡一样，是摇滚乐的圣地，基辅和哈尔科夫也算得上是摇滚乐的圣地。

其他城市似乎都向这些城市靠拢，尽管很明显里加、秋明和下诺夫哥罗德（当时的戈尔基）也都有音乐表演。

列托夫对西伯利亚音乐家们在演奏方式、独特性和截然不同的视角上的多样性感到无比欣喜。正如维索茨基在他那首关于“窠臼”的歌中所唱的，它的意思是“别像我一样，找到你自己的路”。而这正是

卢基奇、扬卡，甚至罗米奇的“窠臼”。他被这一切深深吸引。通过这些联系，他萌生了记录这一切的渴望。他是一位录音爱好者。他搭建了一个小型录音棚，并不断进行升级改造。即使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它也相当不错。奥林普录音机本身就是一流的设备；用它录音的效果比用马雅克或电子阅读器录音都要好。当然，它肯定比不上阿凯录音机。

为什么录制了这么多唱片？卢基奇在那里录过音，扬卡也录过，约翰·迪夫也录过，还有我。

由于资源匮乏，他的音乐风格走的是朋克极简主义路线。在家架设架子鼓是不可能的，在社区中心录音也困难重重，叶戈尔决定克服这些困难，所有工作都在家完成。于是他演奏了八到十种不同的节奏，但音乐的节奏变化并不大——每分钟120/130/140拍。毕竟，歌曲是唱出来的，因为人类心理的节奏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他只用了一套录制好的鼓声，其他所有乐器都叠加在上面。这样并不会显得过于突兀。而且，在80年代，歌词和旋律比那些编排精美、华丽繁复、带有特殊鼓点、前奏、转折或结尾的歌曲更能打动听众。

那时，我们已经写了一些歌，叶戈尔觉得我们（卢基奇、我和扬卡）可以把这些都浪费掉，留到以后再说。我们年轻，精力充沛，创作速度飞快.....在80年代末，我们处于一种难以置信的高强度和加速状态；有时每天都有新歌诞生，新的想法不断涌现，每天都有争论、对话和交流。这并非出于无聊的闲聊；而是源于对自身、对人性的全面探索。我们渴望信息，渴望新的视野。这就是为什么莱托夫总是忙个不停：录他自己，录我、扬卡、卢基奇。

我们经常去拜访。去新西伯利亚看望音乐家们是我们的传统。这很正常，因为我们很快就变得非常亲密，每个人都成了我们中的一员。

所以，他也给了我同样的提议。但对我来说，这或许是最不容易的选择。

我们一共录制了三张专辑。也就是说，除了《Paralysis》之外，Anarchy还录制了第三张专辑的空白版本。娜塔莎至今还留着那些空白版本。她讽刺地告诉我，我们可以给她加录人声，那将会是另一张珍品。好吧，也许有一天，在我创作生涯的尾声，我会唱歌，到时候我们可以和她一起加录。莱托夫和库兹马有时会稍微改动歌曲的调性和节奏。我最终抗议说这样做不对，歌曲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又一次激烈争吵，那张专辑就此搁置。但最终还是录制了两张专辑。

我不认为列托夫是独裁者。所有关于他独裁的说法都源于新闻原则或报道者的个人不满。他非常强硬，精力充沛，想法很多，而且对录音速度要求很高。表面上看，他似乎在发号施令：

“快点，快点！继续！你们在干什么？！太棒了！现在录这首歌。

”“是啊，我累了.....也许我们今天不录了？

”“不！你们在干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录五首歌！”

这种严苛在梁赞诺夫的《办公室恋情》中被讽刺地描述为：“冷酷——真挚，干涩——湿润”：同样的状态，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叶戈尔要求很高，决心要达到他脑海中的形象。叶戈尔是哥萨克人，必须承认，这种哥萨克人的固执和坚定是他性格的一部分。这确实是一种人格特质。我有几个哥萨克朋友，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有这种特质。或许正是这种固执和坚韧的不同气质造就了这种融合。那些碰巧在录音现场的人可能觉得他像个压制者，一个独裁者。有时列托夫觉得自己比作曲家本人更了解某首歌，所以他会坚持不懈，有时甚至不经询问，就引导作曲家走向某种特定的形式。比如，“我们就这么录吧。肯定很棒。”或许作曲家最终并不完全满意，但他为确

保这些歌曲被听到、传播，以及他本人被大众所熟知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事实上，许多录制的歌曲都带有鲜明的原创性和趣味性，延续了早期GO乐队的精神（用现代术语来说，埃戈尔是一位制作人，他们的音乐风格不可避免地带有他作品的影子）。因此，两张专辑分阶段录制完成：一部分在1988年，另一部分在1988年底，其余部分在1989年完成。这正是因为乐队开始了巡回演出和巡演。民防乐队的生活也正是围绕着这一点展开的：巡演-录音-巡演-录音-休息-录音-巡演.....

就我个人而言，列托夫意志坚定、思路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当然不是独裁者。但任何一个思路清晰、意志坚定、精力充沛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被视为一个压力点，一种压力源。你跟任何一位哲学家、任何一位演说家、任何一位魅力非凡的人交谈，都会感到压力。如果你认识这个人，并且你们一起工作，这种压力会成倍增加，因为它指向你，从而产生一种独裁效应。

至于扬卡.....首先，众所周知，男女之间，无论关系如何，都是坚韧与流动两种特质相互碰撞的结果。因此，女性更灵活，而男性则更坚定、更热情。没有人会说扬卡软弱，或者容易受到他人强势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本身就像一块磐石。我认为，将他们的关系及其后果（如果我们指的是扬卡的死）解读为某种独裁统治，完全是错误的认知。这不过是人性弱点的一种虚假体现。总的来说，关于列托夫独裁统治的这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弱者对强者形象的一种反应。也就是说，这种说法之所以成立，仅仅是因为有人做不到列托夫所做的事，而其中或许还夹杂着嫉妒和恼怒（主要是对自己，但也通过叶戈尔表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这是一种谎言。

当然，一切都很激烈。争吵、丑闻，以及那种压力，在我们公司都是常态。我们都很强硬，每个人都嗓门大、很强悍、咄咄逼人，而且个个能说会道。就像三个火枪手的战斗一样，经常持续几个小时，但没人觉得这是负担；相反，这成了我们公司的标志。因此，扬卡的生活中并没有出现类似的后果。那里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不知道谈论这些是否合乎道德。我经常和她聊天.....总的来说，一个女人身处如此艰难的环境绝非易事，因为环境对她来说更脆弱，也更难适应。此外，生活条件本身也相当简陋，就像一次公路旅行。如果这样比，一切都像是一次短暂的登山。她不得不在路上洗衣服，几乎没有什么舒适的时刻，甚至连一张铺着床罩和床单的床都没有。有时她只能睡在毯子上。众所周知，莱托夫经常招待客人；四五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好几天。这有时会给扬卡带来压力。每个人都需要独处的时间，但她却花了很多时间和人在一起，这也让她有些心烦意乱，因为她无法完成工作。而且，还有那么多男人大声喧哗、给她施加压力。如果我们谈论某些黑暗的时刻，这确实令人不安。归根结底.....众所周知，摇滚乐会激发人们内心最耀眼也最脆弱的一面，因为它赤裸裸地存在着，很容易被这种无形的共存所伤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里有那么多人死于过度劳累——有些人自杀，有些人吸毒，有些人则纯粹是死于疾病，都是这种过度劳累给身体带来的压力所致。例如，Zhenya Lishchenko 的病情，他们一年都无法确诊，最终他双肺患上肺水肿，在圣彼得堡去世。

——如果我们回到1988年：那里举办了几场历史性的音乐会（“新西伯利亚无政府状态”、“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无政府状态”），而且“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句历史性的口号第一次从舞台上喊出，当时却无人注意.....

——这一点很重要。正如麦克拉伦也说过的那样（而且他们比我们更早开始演奏这种被称为“朋克”的激进节奏布鲁斯），如果一场摇滚音乐会彻底疯狂，让人不知所措，那才是真正的摇滚乐。也就是说，真正的摇滚乐是无法被驯服的，它总是会带来震撼。这样的音乐会对音乐来说是划时代的，意

义非凡，因为正是通过这样的音乐会，音乐才能实现飞跃，因为观众席里有音乐家，因为现场有交流。GO系列音乐会几乎都是如此。1987年的那场音乐会简直太棒了！也许最酷的音乐会恰恰是第一场，就震撼程度而言。因为舞台上发生的一切.....那个光着脚、拿着一把巨大梳子、剃着鬓角的男人——奥列格·利申科；站在鼓后面，头上顶着一个爆炸头——叶戈尔·列托夫；长发贝斯手珍妮亚·利申科演奏了“阿道夫·希特勒”计划中的歌曲，这本身就令人难以置信地震惊。感觉就像在1943年的柏林参加一场共产主义音乐会。一切都游走在认知的边缘。这究竟是嘲讽，还是真挚的民族主义，抑或完全是其他的东西？它引发了观众与另一种现实的碰撞。当时我和谢尔盖·谢尔盖耶夫也在场（我们五个人一起来的）。

当然，这是第二场演唱会（1988年）。分别在NSU和奇卡洛夫社区中心举行。顺便一提，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89年还有一场里程碑式的演唱会.....“下一站摇滚乐”。我当时不在现场，但你可以想象，他们瞬间成名，现场气氛狂热到仿佛要爆炸.....

[— 从录音来看，他们弄坏了那里一半的椅子。

“是的，但后来在GO的演唱会上，这种情况很常见。甚至在90年代末叶戈尔的独奏演出中，谢尔盖·乌达尔佐夫也这么做了，他在海报上把叶戈尔介绍成‘吟游诗人叶戈尔·列托夫’。（笑）

十年后，无论是在乌兰巴托还是其他地方，都有一批椅子被砸坏了。

.....我想应该是在塔林的“Syrok”音乐厅那场演唱会.....虽然场次不多，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在蓬勃发展。这股热潮持续了三年，从1987年到1990年。到了1990年，列托夫拒绝再演出。我记得，这场演出的象征意义和划时代意义让他几乎疯了。一切都演变成了狂热（现在称之为疯狂的流行），值得称赞的是，叶戈尔凭借他的理智和常识，干脆拒绝演出，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摇滚乐了，它超越了摇滚乐的范畴，超越了摇滚乐的范畴，那里既没有我，也没有其他人，人们只是吞噬着能量，却无法理解他们所吞噬的是什么。那些演唱会上发生的事情（我至今都不敢说出他告诉我的一些事）简直难以想象。这些不再是打架斗殴（打架斗殴也发生过），也不再是砸椅子（砸椅子也发生过），这些只是他从台上看到的令人发指的行为。

他干脆拒绝上场。

91年和92年的时候，确实有人邀请他去体育场演出，报酬相当可观。要知道，如果现在有哪个地下音乐人被邀请去开演唱会，酬劳是15万到20万美元，谁会觉得20万美元不值呢？但他们当时都拒绝了，因为这根本不划算。也正因如此，才有了那两张专辑的诞生——《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和《跳跃》（Jump-Jump）。这两张专辑意义非凡，被一些人奉为经典，堪称摇滚乐的巅峰之作。但对他而言，是因为观众不再把演唱会当作自我提升的跳板，而是变成了一种音乐瘾。

当然，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共产主义”团体诞生于1988年初.....

“不，我谈莱托夫乐队一点也不害羞（乐队阵容庞大，我也是其中一员，参加了两场音乐会），尤其是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我甚至还有一句口头禅：‘我们都来自民防部的单身汉俱乐部。’”

——我的意思是.....这些现实碎片一直都在我们身边，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非要转过头去才能用它们

拼贴出这样的画面？



首先必须说明，《共产主义》的诞生，无论如何，都源于这些不同寻常且划时代的音乐会，因为我们当时正乘着灵感的浪潮而来。通常来说，音乐家、作家或艺术家的任何灵感迸发（恕我直言）都与极高的能量、强大的动力和愉悦感息息相关。当你被某种力量裹挟，沉浸其中，站在灵感的巅峰，如此多的事物向你展现.....但只有那时才会如此。任何曾坠入爱河、做出无数不同寻常、出乎意料、令人叹为观止之事、完成不可思议之事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成功了。这是因为你超越了自我，超越了自我。因为你无法长时间停留在那种状态。从新西伯利亚回来后，我感觉头脑清醒，直觉上感觉到了某种脉搏，但很快就意识到了。后来，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因为关键在于原则，在于理解特定音乐实践背后的理念。当这种感觉最初在《库库鲁扎》（Kukuruza）中出现时（总的来说，《库库鲁扎》既是一首热门歌曲，也是《共产主义》的源头和开端），我们都感觉到一片广阔的领域正在展开。当然，它的全部边界是无法完全把握的。我认为它最终在1989年春天展开，当时列托夫录制了许多这样的专辑。他就像一头扎进了大海，无法自拔，沉浸在眼前展现的广阔天地中。那时，虽然整个原则在录制《苏联速度》（At Soviet Speed）时就已经确立，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它还比较狭窄；它只是需要进一步发展。这张专辑给我们和听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后你说那句“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地球上的共产主义者太少了！”被低估了。现在看来，这句口号或许朗朗上口，甚至有些惊世骇俗，但在当时，我们的想法却截然不同。例如，读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正午：21世纪》[或](#)《遥远的彩虹》，或者讨论普拉托诺夫的《切文古尔》，我们便认定真正的共产主义（即一种近乎疯狂的持续庆祝和奉献状态）是当时苏联理所当然、独一无二且正确的状态。当然，这种心态的根源恰恰在于“共产主义”——1916-20年代一些布尔什维克的这种心态，那时他们似乎看到了曙光。尤恩甚至有一幅画作《新时代的曙光》，[画中](#)人们奔跑在地球上，绚丽的烟火绽放——他们仿佛飞向了光明。正因如此，我们才真心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整个拥有1500万党员的党员都不过是些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官僚。这就是人们如此说的原因。

【当时发生了一些奇怪的路边故事和谈话（列托夫从未否认过），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党似乎在进行某种策略。他做了很多工作，让一些年轻人投票反对民主。但这又是另一个关于“俄国突破”的故事了。】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想正确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从改革开放到民主的过渡如此迅速。某种程度上，共产党人自身也受到了亵渎，他们失去了信誉。而“共产主义”这个乐队名——它当然带有某种讽刺意味，但西伯利亚浪潮摇滚乐的双重歌词风格始终贯穿其中。我相信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是苏联第一位摇滚乐手。如果你听听他的采访，你会发现他几乎也说过同样的话。顺便一提，叶戈尔比我更早地赞扬过他。当我讽刺地说：“嗯，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嗯，他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叶戈尔跺了跺脚说：“你一点都不明白吗？这可是个突破！他简直就是个诗人！”这我们的情况一样，只是他起步更早，身处不同的环境，而且外表也和我们不一样。听着听着，我渐渐理解并欣赏了这一点。

因此，“共产主义”一词只有两个音节。一方面，它象征着“光辉和光明”；另一方面，它又讽刺地指出了“突破”的另一面：对人、对境况、对环境、对一个曾低估（未能洞察）自身文明演变过程的反思。它如同对人类灵魂的一次巨大探寻，审视着人类的丑陋、弱点，以及在“光明”的指引下，人类甘愿犯下的疯狂。

其中似乎带有某种宗教色彩。

我创作了这么多以宗教为主题的歌曲（例如《另一个世界》、《客人之歌》、《那些渴望基督教的人》）并非偶然。再比如，GO乐队的最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在我看来，它几乎完全是基督教风格。它包含了所有我们可以从福音书中汲取的主题：关于来世的生活（《闪灵》），关于宽恕（《无人失落》、《酷刑轮》……），以及关于爱（娜塔莎朗诵了一首优美的诗）。总的来说，第一首歌《荣耀归于精神探索者》是一次对另一个现实的突破。这个另一个现实只有通过我们所知的对存在的理解方式才能实现，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世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宗教色彩”。

这就是为什么规模如此庞大。但鉴于我们坚韧、乐观、略带讽刺的性格——大胆、近乎流氓、不拘一格——这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窥探并理解一个人的行为。而其他的一切则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也就是说，问题在于如何将所有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创作出一部不同类型和风格的音乐拼贴画，从工业音乐到几乎是苏联歌曲的合集……

[叶戈尔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我们相识了四分之一世纪，我们是朋友，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疤痕……我们情同手足。我有两个结拜兄弟：奥列格·利申科和叶戈尔。在去参加扬卡葬礼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或许可以公开），我们因此结下了血缘关系。也许当时情绪激动，但无论如何，我们确实结了婚。]

我们也十分喜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们珍视他作为作家的身份，他是一位最能清晰捕捉我们内心世界的俄罗斯作家。但那是19世纪，而“共产主义”诞生于20世纪。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过一句话（我想是在他创作《双重人格》时说的）：“我不是在写文本；我的笔是由灵感的泉水引导的。”这句话听起来或许有些老套，或者相反，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过于优美，但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音乐家作

为一个人，总是以两种身份存在：一个是普通人（一个平凡的人），另一个是创作者。在能量迸发的那一刻，你便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从一个人转变为一个创作者。你真正超越了自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即便你并不完全理解自己在做什么，你也能创造并释放出某些东西——一件作品、一张专辑、一首歌——有些人会认为这是超凡脱俗的。但它的确是超凡脱俗的。你超越了自我，超越了你的认知。而你如何将这一切融会贯通……事实上，这个过程的机制几乎是和谐的。数字序列的构建存在着某种模式，如果你理解了这种现实，就会发现一个数字会接着另一个。如果你将这种模式融入自身，就像直觉中的一种自动反应，那么你的内在自我就会指引你。也就是说，灵感的源泉会指引你。因此，许多事物几乎是信手拈来，即刻成形。当有人说出一句话时，另一个人会立刻想到完整的延续和表达（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创作《苏莱曼·斯塔尔斯基》或《士兵之梦》的时候）。关键不在于简单地重复类似的事情。关键在于超越自我，然后每个人都会发现，正如他们所说，某种超验的东西。这或许就是“共产主义”的意义所在，从我们这些创造者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大多数评论家对它作为摇滚乐（苏联/俄罗斯摇滚乐）历史上最杰出现象之一的评价。可以说，它至今仍是摇滚乐的巅峰之作。

【当我们决定举办一系列“共产主义”音乐会时（可惜没有列托夫），我们想看看这种传奇的特质、这种前卫的精神、这种至臻完美的音乐创造力，在今天是否依然存在，还是已经成为一种稀有之物，某种古老的东西，被我们的同胞所难以理解。结果证明，一切都还在，而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他们在80年代末只有五六岁）则以无比的喜悦和专注的目光沉浸在这些歌曲中。】

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以如此多样化的形式出现和存在的原因。两年内发行了十三四张专辑。它们风格迥异，非同寻常，尤其以20世纪80年代末的标准来看，它们几乎开辟了一片音乐未知领域。

— 在《GrOb编年史》中描述的专辑《士兵之梦》录制完成后发生的分歧是什么？分歧的内容是什么？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秘密。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个项目价值的态度，现在听起来或许很奇怪。也许也有些误解（作为一个年纪大的人，我可以体谅自己年轻时的热情）。但在我们其中一次谈话中，我觉得当时的情感（就像我在这里的回答一样）和现在差不多，而叶戈尔对它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评估却低得多。谈话随后转向了这样一个事实：毕竟，这是‘DK’运动的一个衍生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不如我们个人的作品重要。它更像是一个优秀、独特、丰富多彩、互补的项目。我当时非常生气。我说，归根结底，那就是：‘说你又瞎又蠢都算是轻描淡写了。你什么都不懂。根本不存在什么‘DK’的衍生项目。’”存在一条运动路线，其中衍生出许多平行路线。“从‘DK’出现得更早这一事实来看……嗯，在‘DK’之前有马雅可夫斯基，在马雅可夫斯基之前有普希金，以此类推”（你可以追溯到荷马和石器时代的第一批诗人，然后一切皆有可能）。

我承认这个项目是原创的、自给自足的、完全前卫的，而且与众不同。我跺了跺脚说：“我不想认识你，也不认为和你还有任何进一步的合作，因为我对‘共产主义’的价值有着更高的理解。”

仅仅两个月后，莱托夫就改变了主意（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说得委婉点），并承认……

我再说一遍……列托夫就像个哥萨克，当他内心与对立的观点发生冲突时，如果他不同意，他几乎从不立即接受。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恢复理智，仔细评估，反复思考，冷静下来，最终做出肯定的判断。

.....当时的形势已经不同了。但我生性骄傲，既然已经摔门而去，我就不想再参与其中，于是说道：“抱歉，我不是那种会回来的人。”当然，这一切听起来有点年轻气盛，但我相信，即便我犯了这样的错误，或许是出于恼怒，但最终对“共产主义”这个群体还是有利的。因为无论如何，叶戈尔和科斯佳都以各种形式留了下来，而“共产主义”也迎来了新成员，并发展出了许多新的面貌。例如，如果我们看看像《列宁主义》（Leniniana）、《让它继续》（Let it bi）或《编年史》

（Chronicle...）这样的组织，那么我相信我的离开反而帮助“共产主义”实现了更广阔的愿景。这是我自己的判断。

— 下一阶段是“来自伊里奇的吉普赛人和我”？

是的，我们找到了一个折衷方案。过了一段时间，我向他们提出了这个方案。我告诉他们：“继续努力。”但实际上，他们的想法已经定型了：“不想玩就别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听取了我的意见并进行了评估。而我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不能就此止步。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被提出，算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分支——一个与“共产主义”平行的项目。同样，正是与“共产主义”的决裂，才催生了另一种现象，虽然在专辑方面远不如“共产主义”那样硕果累累，但同样独具匠心。于是，“Tsiganyata i ya s Ilyicha”（来自伊利查的吉普赛人和我）乐队应运而生，采用了一种略有不同的原则。我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实验.....其理念是，尽可能地用一种最少受意识干扰的形式来表达事物，仿佛百分之百地信任直觉。我把这个原则称为“旋律思维”。这个名称本身就带有讽刺意味。当思考完全不需要意识参与时，聆听就足够了。而旋律始终存在，它是内在内容的和谐。

起初我们有些困惑。“这是什么？它最终会是什么样子？”叶戈尔和库兹马问道。我根据一些音乐概念提出了几句歌词，他们立刻表示赞同，一切似乎都豁然开朗。就这么定了！这张专辑比《共产主义》更加独特和原创，因为这里的歌词是原创的，而且你自身成为了我们在《共产主义》中探讨的陌生人主题的切入点。在这里，我基本上是提出用我自身的经历作为反射镜。这当然打动了所有人，于是我们开始录音。我们录制了一张专辑，不久之后，又推出了《阿朱那大道》。

— 在我看来，这个词似乎具有语音特征而不是语义特征？

“没错，就是这样。‘旋律思维’是旋律与思想的碰撞。它有一种效应.....当说话者充满洞察力和兴趣时，你会不由自主地被他们吸引。当他们说的内容不再重要时，你会注意到某些语调。无论他们谈论的是自动控制理论、19世纪美国的经济问题，还是音乐理论，只要他们充满兴趣、热情、态度和情感地表达，你就会开始融入他们声音的节奏；在词句的组合中，会展现出不同的层面。嗯，是的，这个词是语音学的。它是一种试图窥探潜意识的尝试.....”

这本身就是萨满教。

嗯，基本上是这样——这是萨满教的一种形式。萨满教的原理众所周知：以鼓点为节奏，萨满逐渐从现实世界中超脱出来，进入更高的世界。这是一种“人人皆可体验的萨满教”的尝试。人们从这些文本中获得了内在的启示。有人听完后会说：“我现在也能做到了。”突然间，某种东西在他们内心诞生，他们也因此学到了一些东西。这才是艺术中最重要的。让人们发现新的事物，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东西.....无论是某种感觉，一种自我启示，还是音乐家表达的某种新想法。我认为这是最高的奖赏：当你的音乐会结束后，人们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说：“哈！我现在明白了，我懂了！”或者坐下来写歌，或者真的尝试翱翔。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了。《来自伊里奇的吉普赛孩子和我》是这一领

域的第二项成就。它更加独特，更加出乎意料.....

《从未发生的对话》是我最新的专辑，它非常奇特。这是伊戈尔·列托夫（Igor Letov）对奥列格·苏达科夫（Oleg Sudakov，即叶戈尔与经纪人）的一次采访。我不知道该如何归类它（共产主义还是吉普赛人乐队）。在我看来，如果两个创作同一项目的艺术家将自己作为一面镜子，也就是一件艺术品，从中剥离出疯狂的、难以理解的、怪异的、不值得的、令人作呕的东西，同时，他们的动机也会显露出来（“为什么一切都变得如此糟糕？”“为什么没有幸福？”“为什么地球上没有幸福？”），那么这张专辑既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乐队的第十四张专辑，也可以被视为吉普赛人乐队的第三张专辑。因为这已经是一种终极的音乐，你将自己具象化为一件艺术品。我的意思是，接下来会是什么呢？唯一更进一步的方法就是彻底放弃意识，也就是陷入疯狂，永远不再回到人间。所有这些主题都出现在《吉普赛人》中。我甚至问过，它与《共产主义》或《吉普赛人》相比价值几何。有人已经听过这张专辑，他说它极其珍贵，因为它包含了《吉普赛人》或《共产主义》所没有展现的另一个层面（尽管他可能另有所指）。它并非关于经理和莱托夫（作为个体），而是关于如何通过经理和莱托夫揭示存在的另一种本质。

.....这就是“Tsiganyata”计划的由来。由于“Communism”和“Tsiganyata”在1989年同时进行，它们也同时结束。某种自然的.....甚至算不上危机，但.....任何音乐家迟早都会遇到某种瓶颈，1987-1990年间（四年不间断、强劲有力、充满活力、紧张刺激且硕果累累的创作活动）的动力注定会以某种方式崩溃。然后，灾难性的冲击接踵而至：改革演变成一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解体并分崩离析，俄罗斯时代由此开启。这自然导致了巨大的精神动荡。对叶戈尔而言，这与围绕民防的狂热情绪也息息相关，这种狂热不仅阻碍了他实现目标的进程，也进一步掩盖了他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潜力。因此，在他寻求观众和听众的过程中，他发现他们只是巨大的反射器，巨大的能量吸收器，而不是真正的人。或许他在这点上错了。人人都知道：狂热并非简单的现象。这迫使他回到了1984年的境地，那时无人知晓他。但他当时已经具备了创作能力，而且他确实创作了两张杰出的专辑。

但我还有另一条平行线。我对国家大事和个人生活都过于投入。

我当时已婚，正经历一系列个人问题。这也让我与《共产主义》和《吉普赛人》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我觉得我已经尽可能地彻底地完成了创作。尽管他们计划创作第三部《吉普赛人》，甚至还有一个暂定名（也是我当时想的）——《沙皇之歌》。素材还在。但它被搁置了，之后发生了一些混乱，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也随之到来。

1993年到来了——“俄罗斯突破”时期——说来也怪，这又是摇滚乐传奇、独特、巅峰时期的又一波浪潮，我们都参与其中。这与“俄罗斯突破”运动、一系列演唱会以及通过各种或多或少可以理解的方式施加在广大民众身上的内部压力息息相关。但那是一个不同的时代。“共产主义”-“吉普赛女孩”阵容也随之解散。《Blagodat》发行了，我们反复讨论过重组的可能性，但由于“GO”演唱会的日程安排和生活的种种困难，最终未能实现。我想，它本来可以发行的——只是我们当时的心境不对。总之，如果有什么阻碍，那就是阻碍，它不让我们，不允许我们，所以我们没有全身心投入。

——90年代初期你举办了一系列不插电音乐会。除此之外，你还做了哪些其他相关的事情？

对我来说，那段时间真是混乱不堪。是的，我在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办过几场不插电演出。我写了一些歌，还计划组建一支乐队。我们当时玩得很开心——收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乐队名字，然后把

它们创造出来。比如说,“Skoby Kamakhai”、“Snezhnye Barsy”、“Opizdotiy Kolobok”(笑).....我特别喜欢“Bear's Hair”这个名字.....

[— 莱托夫还写过关于“经理和一群混蛋”这个项目的文章.....

最后,我们看到了《叶戈尔和那群混蛋》。

.....这些项目确实存在过。我尝试寻找与我风格相近的乐手,原则上,“熊毛乐队”可能以某种形式存在过,尽管非常短暂,只存在了一个月。我从查普雷金(绰号“恰帕”,是“卡利诺夫桥”乐队的鼓手)那里买了鼓,然后运到了秋明。我父亲帮我把鼓送到火车站,我们在那里碰面。尤拉·沙波瓦洛夫,秋明本地人,绰号“沙帕”,是“生存指南”乐队最早的鼓手之一,他参加了在秋明的第一次排练,用公文包打鼓(不幸的是,他恰巧也在5月9日去世了)。等我组建“熊毛乐队”的时候,我邀请沙帕和我一起排练。鼓架设在车库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排练。我们架设了一台小型鼓机,沙帕打节奏,我打节奏并唱歌。所以,“熊毛乐队”的确以那种形式存在过。但最终,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能继续合作,乐队也因此解散了。我们再也没能以同样的阵容重组。虽然还有其他人,但他们坚持不下去.....我也找不到合适的演出安排。就这样,在这种半孤独的生活中,我熬到了1993年。

所以,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罕见的现场原声录音,尝试创作歌曲,并和叶戈尔就此进行了交流。1993年,我们去高尔基文化宫参加“俄罗斯突破”音乐节时,萌生了和秋明乐队一起排练歌曲的想法。碰巧我们和秋明乐队关系非常密切,但高尔基乐队的新西伯利亚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再也没有回来。可以说,列托夫孤身一人。于是,秋明乐队的所有成员加上库兹马加入了高尔基乐队,他们开始演出。“祖国”乐队就此诞生。事实上,“祖国”乐队的生日是1994年2月12日。这是在前往“俄罗斯突破”音乐节之前在秋明举办的“意外音乐会”。这是“祖国”乐队的首场演出。直到2014年,乐队才庆祝了成立二十周年。

“俄罗斯突破”计划的实施效果如何?



这个问题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简而言之,“俄罗斯突破”的实现程度,与俄罗斯历史上出现的任何社会政治潮流的实现程度一样低。也就是说,正如我们所知,当时存在着党的原则和社会

原则。但几乎所有这些原则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即使以1998年弹劾叶利钦为例，我们也知道，弹劾并未发生，叶利钦仍然担任俄罗斯总统。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俄罗斯突破”。当然，它最初充满了豪情壮志和热情。我们认为，年轻人的思想和群众所承受的压力显而易见，事实也的确如此。我们将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努力将俄罗斯联邦从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腐败、疯狂、不人道的政权中清除出去。1994年全年的确如此。音乐会平均吸引了上千人，这意味着场馆里人山人海。比如说，以诺里尔斯克这样的城市为例（当时人口约27万，加上两个卫星城则有35万），连续举办了两场音乐会，一场售出950张票，另一场售出910张。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似乎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所有音乐会——在卢甘斯克、沃罗涅日、罗斯托夫、莫斯科——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现场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感、激情、理解、认同和热情。但是.....最终，与罗米奇的内部冲突出现了。

《指示》这首歌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尽管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演唱了罗米奇剩余的歌词。1994年底，我们内部出现了一点小裂痕。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治问题，但宣传活动仍然停滞不前。之后，在诺沃西比尔斯克又举办了两场冬季音乐会。我记得在契卡洛夫文化宫的那场音乐会非常艰难.....要把信息传递给观众简直难上加难——现场气氛死气沉沉、冷漠压抑，甚至有些冷漠。而在阿卡杰姆戈罗多克的皮亚特尔卡音乐会上，观众少得多（这是唯一一场小型音乐会，只有150到200人），但音响效果非常好，气氛却异常悲伤，仿佛一切都结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仿佛有什么东西消逝了。“俄罗斯突破”乐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每个人都记得1994年俄罗斯发生的事情。民众的音乐没有响彻街头。没有动乱、起义、抵抗，也没有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恰恰相反.....民众情绪低落，沮丧情绪高涨，对政权更加顺从（这意味着地方上的不满和怨恨依然存在，但俄罗斯的整体面貌不会改变）。我相信这对叶戈尔也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在1996年大选前，我们也参与了“俄罗斯突破”项目的演出。那是一系列小型音乐会。迪马·卢基奇甚至也加入了“俄罗斯突破”的演出阵容。我和珍妮娅·马赫诺之前已经表演过了。后来，这个项目内部出现了一些令人不齿的敛财骗局，我们演出结束后，和组织者谈了谈，说：“我们不再参与这个项目，也和它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它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场骗局。”我们拒绝了。然后我们离开了莫斯科。有些人去了萨拉托夫，继续演出，“俄罗斯突破”项目就此结束。】

然而，它仍然是摇滚乐的典范，当时广大民众对国家复兴的渴望汇聚于一场音乐盛事之中。这既非凡又大胆。多年以后，许多人仍然记得这些音乐会的精彩绝伦。音乐家和观众的共鸣近乎无拘无束的喜悦。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直到 2003 年的下一次中断？

我们和Rodina乐队最后几场演出的时候，我们和Zhenya Makhno一起，还有一位来自莫斯科的贝斯手和Ozhog乐队的鼓手Kostya Mishin助阵。演出结束后，我们回到了家乡。Zhenya Makhno加入了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开始频繁演出和巡演。而我，当时有点沮丧（而且经济状况也相当拮据），在一家公司找了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1996年底到1997年，更糟糕的是，我在那里受了重伤，不得不接受治疗。雪上加霜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情况。很久以前，我遇到了现在的妻子，我们迅速坠入爱河，我开始考虑搬到新西伯利亚。1998年，我搬到了新西伯利亚。如果有人还记得的话，那段日子相当艰难。我重新开始工作，生活规律起来，直到21世纪初，我没有再进行任何演奏或创作，只是继续做着打工和生存者的工作。我当时也在写一本书.....

我有一个类似的创意项目。这个想法萌生于1998年，2000年代初我写了一本书，暂定名为《幻象的视野》。

.....但我们都知悉，所有时期都会结束。生活变得轻松起来。摇滚乐的舞台在召唤着我。有一天，我决定不顾一切地录制罗迪娜的第二张专辑。

【1995年，在“俄罗斯突破”之后，我们都聚集在杰克逊的IZBA唱片公司。那里已经搭建了一个录音棚。那是一个私人住宅里的长房间，里面配备了录音设备，我们在那里录制了Rodina的《Be Alive》、Chernozem的《Gift for the Weakest》和Dima Lukich的《Ice Heels》。】

我向秋明乐队的老成员（库兹涅佐夫、安德留什金和科科林）提议录制一张专辑。他们很喜欢这个想法；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我休假回来，录制了一个粗略的版本。然后在秋天进行了混音。最终，我们发行了专辑《那个世界》。从那时起，乐队重组，并举办了一系列音乐会。具体来说，2004年，我们去了下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和莫斯科参加音乐节。之后，我们每年都会定期（有时甚至一年两次）以电声阵容在俄罗斯巡演。乐队的人气依然不减。人们还记得我们。后来，我们发行了下一张专辑《星辰战车》和另一张专辑《自愿的伊甸园》。我们的阵容略有变化，我们加入了一位来自莫斯科的新贝斯手，萨沙·波利亚科夫（绰号“什塔克特”）。这段时期一直持续到2008年左右，之后又发生了一场内心的风暴，同样与一系列个人和社会事件有关。每个人都变得相当成熟，有些人被迫工作，有些人则面临家庭问题（可能与抑郁症以及酗酒有关）。从2008年底开始，我决定举办不插电音乐会。如今，我已经坚持了三年多。

最终，这段时期过去了，2010年出现了一个想法——“共产主义复兴”，我去找了科斯佳·里亚比诺夫，向他提出了这个想法（这个想法总体上源于与叶戈尔的一次谈话）。

【2月14日，我们通了电话。我提出现场表演《吉普赛人》。他同意了。五天后，他就消失了。】

于是，人生翻开了新的一页，音乐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诞生了，因为这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一支录音室乐队，从未举办过一场演唱会，而且自解散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自然，这个案例既独特又不同寻常。此外，它的独特性还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乐队的语言和音乐素材本身大量借鉴了苏联时代的审美和分类体系，而这些早已被彻底摧毁、遗忘，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遭到贬低和妖魔化，从而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不确定这个新时代是否会引起共鸣，乐队是否还有价值，人们会如何看待它，以及它的需求量会有多大。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决定举办一系列演唱会.....而且我们做到了。我们进行了三次完整的巡演。我们走访了摇滚乐闻名遐迩、备受推崇且拥有众多乐迷的城市（唯一没有到访的是伏尔加河地区和俄罗斯南部）。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演出非常受欢迎，令人难忘.....此外，在第二次巡演期间，我们（乐手们）感觉Kommunizm乐队已经成为一支传奇乐队，因为每一首歌都不仅仅是引起轰动；它们被听众们熟知、铭记，并与他们内心深处的各种情感、状态和理解联系起来。而且，通过与听众的交流，我们意识到Kommunizm乐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理念在2000年代基本保持不变。他们的影响力、动力和受人尊敬的程度依然如故。或许这些演唱会的规模不如“俄罗斯突破”时期那么大（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以外的地方，平均观众人数约为100人），但他们仍然成功举办了巡演，甚至还专门前往乌克兰演出。

（这里无法忽视社会政治因素，因为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都是斯拉夫人的后裔——历史学家称他们为“小俄罗斯人”或“大俄罗斯人”——我们说话、思考和感知的方式都相同。我本人也经常乌克兰演

出。我在辛菲罗波尔举办了一场特别精彩的音乐会，所以“克里米亚将永远是俄罗斯的.....”——这句出自那首名曲的歌词——也发挥了作用。这里确实是乌克兰为数不多的几个仍然使用俄语标识的地方之一。这让我非常欣慰，因为我仍然相信俄语是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一种纽带，尤其对于斯拉夫人的后裔而言更是如此。）

甚至还有两张演唱会的盗版唱片发行。新西伯利亚有一家名为“Shishka-s-Pertsem”（辣椒锥）的地下唱片公司，他们发行了一张双碟专辑，收录了这场演唱会和一部关于“共产主义”的电影。

所以，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我们正在准备Rodina的第五张专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正在进行录音工作。我们计划再发行两到三到四张专辑。我们已经有了素材。可惜的是，我们发行专辑的速度并不快——由于年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我决定尽我所能加快这个过程。这与我们乐队成员分布的地域范围有关；Rodina目前有两个阵容。一个在莫斯科，另一个在秋明。有时我们会和秋明的阵容一起演出；我们是一个庞大的乐队，乐队内部也充满了各种故事。所有以前在乐队演奏过的乐手都还在Rodina，甚至包括那些已经去世的.....比如Zhenya Makhno。他的吉他手位置当然会继续留在Rodina。

我还想准备一本诗集，收录格言、拼贴画、文章、访谈和歌词，计划今年夏天出版。这是第一卷。第二卷——正如我之前所说——暂定名为《幻象的视野》。这是一篇关于人类及其层层错觉的社会形而上学论文。也就是说，活了五十年，我可能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件看似绝对确定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后，真相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在其表象之下，其他层面、更深层的意义浮现出来，迫使你改变态度.....即使你并不情愿，但出于接受世界本来面目的需要，你不得不改变。自然而然地，你会努力放下你的幻想。

——那么重印版呢？

嗯，重版发行是同时进行的。卡卢加有人提议出版《巴维丹塔》。这张专辑已经过全面的音质修复；发行方信誉良好，而且对此事非常负责。封面也已经准备好了.....

[到了克拉斯诺达尔之后，他们想出版四张原声档案录音，包括《Bhavedanta》、两场莫斯科音乐会，以及一场特别搞笑的音乐会——就我的演奏水平而言，那是我表现最差的一场（当时我既兴奋又沮丧，情绪十分复杂）。但尽管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封面设计，这个想法最终还是在克拉斯诺达尔搁浅了。]

实际上，我和Zhenya Gerasimov（我的朋友，也是网站管理员，同时也是创意团体“Vzaimny Herbarium”的成员之一）通常一起设计专辑封面。除了《Razgovor kotoroy neve》这张专辑，那是我和Vlad一起做的。我总是参与专辑封面的设计，因为我还是不太信任他们，尽管如果有人尝试不同的设计，我会很高兴。也许是因为我管得太多了。不过，最终我只给Vlad提了些建议，参与了封面设计。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最初的版本完全不同，在我看来很阴郁，没有抓住歌曲的精髓。因此，我想等《Bhavedanta》发行后，他们至少会推出一些原声版本。嗯，原声版本在图拉录制得很好。我在那里有很棒的朋友——Grenade Surround录音室。录音效果不错，只是录音本身的问题。音响效果各不相同，很难说哪种效果好（我没太注意这一点）。

目前（直到第五张“Rodina”专辑发行之前），不会再有其他出版项目。我应该补充一下，我目前正

在前往莫斯科的路上，那里有一份协议，将发行“Tsiganyata”乐队的黑胶唱片，以及他们当年与Letov合作的作品.....为了给这段档案整理期画上句号，今年夏天计划发行四张黑胶唱片。我想，即使是这样的计划，对一个音乐人来说也已经相当多了。五六个方向已经是我能负担得起的极限了。即便如此，我通常还是左右为难。

至于其他的.....仅限2013年。我努力促成我们再次聚首，并在我们从未去过的城市举办一系列音乐会。无论如何，我想我们都能去罗斯托夫、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喀山/伊热夫斯克，甚至可能去乌拉尔地区。这些是“共产主义”乐队尚未涉足的最后地方。也许我过于谦虚了，但既然“共产主义”乐队名声显赫，我希望能在俄罗斯联邦的大部分地区举办音乐会。以某种方式建立起实体存在，然后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将真正成为一个档案项目，逐渐隐入历史的深处（我不敢妄加揣测）。尽管我在音乐会上感受到的满足和喜悦——即使在“祖国”乐队演出时，我可能也没有在“共产主义”乐队演出时感受到的那么多情感。至于精力消耗，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可能与我当年和“民防”乐队一起演出时所付出的努力相当。但即便如此，我们当时的音乐会也不超过一个小时，而《共产主义》这张专辑，我们却要演奏一个半小时以上。我必须通过肢体语言（我运用了造型和动作）来诠释歌曲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说，像这样的项目里三个静止不动的乐手对我来说太多了；总得有人做点什么，动起来，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但这在2013年还遥遥无期。

严格来说，除了健康、睿智、快乐地生活之外，别无他法。根据东正教教义，沮丧是一种罪过，而且在我们公司，正如我们之前多次讨论过的.....一旦你垂头丧气，就会开始沉沦。但我心态年轻，我不想沉沦。

嗯，这就是我未来六个月的大致范围和可能性。

— 你认为现在的音乐界正在发生什么？

我有一批非常喜欢的音乐家，他们人数众多。例如，甚至还有不同程度上继承了“齐加尼亚塔”衣钵的后继者。

我相信音乐是流动的，是激荡的。我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俄罗斯建国三十年来，整整一代人在这里成长，当音乐家们将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园时，这个国家就会涌现出新的、有才华的音乐，而不仅仅是流行音乐。西伯利亚浪潮兴起时，它代表的是苏联时代的摇滚乐；毕竟，我们都是苏联人。我们以自己的方式评价现实的点点滴滴，或肯定或否定，但我们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会失去力量。”当俄罗斯转型为新俄罗斯时，大批音乐家自然而然地迁徙而来，他们以某种方式适应了新环境，并一直存在至今（例如舍甫丘克），但要涌现出更多的音乐家，世界需要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新传统。它或许并不完美，或许不够耀眼，或许在美学或正义方面有所保留，但这都无关紧要，因为只有在这样的世界里，才能涌现出能够反映生活、能够汲取力量的人。我相信，在未来五到十年内，那些现在或许十三四岁，或者十八岁的年轻人将会逐渐成长起来，因为他们的人生记忆中只会剩下俄罗斯。无论如何，苏联最终会成为遥远时代的遗迹，一个回响。在苏联，人们几乎不记得沙皇俄国曾经发生过什么；那已是历史，是另一个世界，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早已将其抛弃。

如今，每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都有200支乐队，那么在千万人口的城市，乐队数量将达到2000支，而在俄罗斯其他地区，至少还会新增5000支。也就是说，在俄罗斯7000到10000支乐队中，不可能不

涌现出一些才华横溢、令人瞩目的乐队。

顺便一提，我们依然对音乐充满热情，也希望看到更多像我们一样的音乐家涌现。而且这样的人还真不少。所以，我对音乐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萨拉托夫，2012年5月。

△据了解，谢利瓦诺夫在 1987 年 4 月之前曾多次访问鄂木斯克，并且认识叶戈尔和利先科兄弟。

△斯特鲁加茨基兄弟的小说的正确标题是《正午。22世纪》。

△ K. Yuon 的画作的正确标题是“新星球”。

棺材编年史 | GQ 第4期 (129) ——公民诗人：叶戈尔·列托夫的遗言

公民诗人

叶戈尔·列托夫的遗言

2007年10月30日，叶戈尔·列托夫接受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采访。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次采访——也没有人预料到，四年多后，这位“民防”乐队的领军人物会成为继崔氏之后俄罗斯摇滚乐坛最重要的传奇人物之一。否则，这次采访或许会更加深入。又或许，采访内容会保持不变：列托夫并不特别喜欢适应环境。他也不喜欢接受媒体采访，声称自己不确定别人能否正确解读他的话：“对我个人以及我们正在推行的理念而言，愚蠢的意见越少越好。”尽管如此，采访者瓦列里·波斯特纳克在列托夫身上发现的，不仅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主人，更是一位愿意冷静地总结自己坎坷人生的伟人。

EL：我不明白现在这世界到底怎么了。难道真的糟到这种地步，像Radiohead这种在我看来毫无才华的乐队，居然成了热门话题……简直胡扯！我知道我的话可能会被人当成老一辈人坐在那儿对年轻人指手画脚。接受新浪潮音乐对我来说很痛苦。但当时确实存在一些不错的音乐，所以一切才有了转机。1978年，我彻底打破了所有刻板印象，因为那些颠覆我世界观的乐队出现了——Adam and the Ants、The Undertones、Elvis Costello。但如今的音乐圈，像Beck他们那帮人——简直糟透了！跟Patti Smith比起来，简直就是毫无才华的垃圾……

GQ：但这些乐队正在改变唱片公司与艺人之间的关系。你不担心这种关系会崩溃吗？Radiohead把他们的新专辑发给了唱片公司，然后把专辑放在一个网站上：下载，然后尽可能多地付费。

现在什么都不怕了，我们从来没有过什么正规的发行体系，整个出版业都是盗版。唱片在我们国家发行，是为了让人们能去看演唱会。我们的互联网发展还不够完善，无法从中赚钱。而且，无论泽姆菲拉现在做什么，她都不太可能改变什么。他们说阿布拉莫维奇在帮她，但我不会插手这些事，对此一无所知。在西方，这套体系已经存在很久了，这意味着你可以建立一个反体系，通过同样的互联网进行发行。我们生活在一个蛮荒之地；所有那些欧洲的规则在这里都不适用。你怎么能把我们和麦卡特尼发行新专辑的方式相提并论呢？我们的音乐人靠演唱会赚钱。而且我认为，巡演通常对健康有害。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你周围的人最终都会喝得烂醉。我根本不会开演唱会。或者一年只开一场。那是一种庆祝，某种活动。我更愿意专注于录音室工作。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机会。我靠专辑《Pryg-skok》赚了两万五千美元。

1990年，那是一大笔钱！

数额巨大！我把钱分给了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没有参与创作的人。当时在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分到了全部。我的原则是，乐队成员就应该得到报酬。如果我离开，那就没钱了。结果证明，钱根本不是问题。我们随心所欲地生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我们创作音乐也完全自由。那是一种只有艺术家才能拥有的自由，他们脑子里除了音乐什么都不想。从早到晚，我们都在创作，听着Sonic Youth的歌，研究他们的吉他是怎么录的，以及我们该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你是自己购买音乐还是免费下载？

我买唱片。我为此奋斗了一辈子。我总是跟别人说我是个劳动者。还在上学的时候，我暑假就打工，比如当清洁工或者在工厂干活——那里的工资高一些。我当过油漆工，在莫斯科的时候还在建筑工地干过。这一切都是为了买唱片。我自己也卖唱片，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留住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从十五岁就开始做专业的唱片经销商了。（笑）

你的最新专辑明显受到了 60 年代加州迷幻音乐的影响，这是有意为之吗？

事实上，他们对我们都是这样。

但现在的声音已经很难混淆了。

我已经抛开一切杂事，只做我一直想做的事。以前，我不得不随波逐流，写些政治歌词，说些脏话，偶尔还得做些出格的事。在我们国家就是这样，这就是游戏规则。但我决定制作新专辑时摒弃所有这些。尤其是最新专辑（《我们为何做梦？》——编者注），它是 Civil Defense 乐队最不受欢迎的专辑。也许之后我就不会再做其他事了，我是这么想的。Arthur Lee 录制了几张个人专辑，之后直到去世，他都没有发行过任何新作品，只演奏老歌。

它会奏效吗？

有些乐队会做出一些有趣的东西，找到自己的标志性风格，然后终其一生都在利用它。我害怕那种情况发生。在《百年孤独》之后，我有一段休息期，也许正是因为我意识到：好吧，我老了，我需要再次做出改变。我本来可以再写几十首像《恋尸癖》那样的歌，但何必呢？那是 Status Quo 乐队存在的意义。那段时间也恰逢我的中年危机。我也开始出现严重的酗酒问题。我必须克服它。我以前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时我解散了“民防”乐队，改名为“Op...zdenevshie”，这样就完全没有固定的模式了。1989 年，一切都失控了：体育场、成群的歌迷、某种狂热，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被砸碎的椅子和窗户，与警察发生可怕的冲突，歌迷在街上点燃篝火，偷电车。这简直愚蠢至极。人们不再关心我们演奏什么；他们根本不在乎；他们最关心的是再次引发骚乱，再次陷入恐慌。我们和“温柔的五月”乐队没什么两样了。

听着，你不担心观众席上的人们虽然对你又喊又叫，崇拜你，但实际上他们连你想告诉他们的内容的百分之十都听不懂吗？

我以前觉得根本没人懂我的音乐。但现在我在网上和他们交流，他们会问我问题。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人真的懂！当然，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有些人理解我们音乐里的车库摇滚元素，有些人理解朋克元素，还有些人认同我们的反全球化理念……

你曾被人称为法西斯、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你曾因不断反抗某些事物、并将反抗行为本身置于目标之上而饱受批评。然而，这一切突然间都消失了。叶戈尔·列托夫如今受知识分子和富裕中产阶级的尊敬，过着安稳的生活。一个中年男人坐进豪车，播放的不是普通的流行音乐，而是《民防》。这种从叛逆者到时尚达人的转变，难道不让你感到不安吗？

我不认为我们的反抗已经结束。恰恰相反，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最新专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场反抗陈词滥调的反抗。我们已经向前迈进。这很好。我还没死，我们仍在继续，我们仍在努力，我们仍然活着。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持续多久；也许过一段时间后一切都会结束，但是……每一次反抗都需要一个理由。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他们聚集了科学家和各种各样的聪明

人，以为自己正在创造某种知识分子的天堂，但事与愿违。当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事件时，大学城里突然爆发了抗议活动，写着“自由”字样的棺材被抬过街道。他们被驱散了，但他们把自己封锁在宿舍里……

这是学生安排的吗？

是的，但几乎所有老师都积极支持他们。那里真是形形色色的人，简直难以置信。我听说有个老师长得跟卡尔·马克思一模一样！他会穿着领带、马甲和一套不错的西装走进教室，但光着脚。这就是艾比路。（笑）70年代初，他们在宿舍里搞迪斯科舞会，叫“黑种族”。一开始放些简单的音乐，比如斯莱德乐队，然后曲目逐渐变重，接着大家开始跟着深红国王乐队的歌摇摆，最后以弗兰克·扎帕的狂热音乐结束。当局一直试图制止这类活动，但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学生们被调到其他学校。但许多人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开始娶当地姑娘，留在新西伯利亚。

你曾在新西伯利亚演出过很多次吗？

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声称我们是新西伯利亚乐队，而不是鄂木斯克乐队。我住在那儿，乐队成员也都是当地人。只要我们没钱了，就能很轻松地在那儿办演唱会。那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比如，我在那里找到了很多关于萨满教的书。你还能在哪儿找到这些？还有西方乐队的歌词……

参加音乐比赛是必要的吗？

这简直是必须的，否则你的创作生涯就会退化！80年代，有一些乐队可以和我们竞争——Bomzh、Instruktsiya po Vyzhivaniyu、DK。但后来他们都消失了，我们孤军奋战，这可不妙。有段时间，我们甚至不用费力就能散播关于我们音乐大众化的谣言。我们大概只有五个人。Noya开始虚构各种乐队，用不同的名字，制作唱片，唱片里每个人都会互换乐器，每个乐队都换一个主唱。我们创造了西伯利亚朋克运动的神话，很多人至今仍然相信事实就是如此——一群乐队，一场音乐浪潮。但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五个人。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西伯利亚摇滚或朋克运动；只有我们几个在那里混。但谣言开始对我们有利。“西伯利亚来了一个乐队——他们是谁？谁需要这些毡靴？”现在这股风潮势不可挡，我们要横扫一切！（笑）

你相信真的有可能改变现状吗？

1984年我们刚起步的时候，我坚信苏联政权会永远存在下去。丝毫没有改变的迹象。那时候，你甚至不用唱反苏歌词；只要你的音乐不落俗套就足够了。唱些荒诞的歌词就足以让你被列入禁播名单。这简直荒谬至极！Kiss乐队被指控宣扬法西斯主义，就连成吉思汗也被指控过。我知道我要么像利莫诺夫那样逃往西方，但这根本不可能，要么就只能进精神病院。

你哪一年去的？

1984年末，1985年初。我刚好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之际离开。全体会议结束后，3月8日，他们立刻告诉我：“出去走走吧，你已经痊愈了。”虽然部门主管对我很好，但他们并没有给我打任何特殊的针剂。而就在我眼前，人们真的都快疯了。我忍不住要跟你讲个故事。一个普通的工人，一个无产阶级，在一家工厂工作。一天下班后，他们被迫观看一部关于核威胁的纪录片：该做什么，该往哪里跑，如何自救。然后，这个人开始想：“如果原子弹真的落下来怎么办？”恐惧攫住了他——就像……它会落在这里，该怎么办？他冲进防空洞，把自己锁在里面。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他一直待在那里，没有出来。幸运的是，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些藏起来的罐头食

品。他们敲他的门，但他没开。然后，一个他极其厌恶的女人——也是工厂的派对组织者——来把他赶出去。她对他说：“张开，就一厘米，开个小口。”他居然真的张开了，还把阴茎伸向她！就在那时，他们抓住了他。他以前是个很有趣的人，很有幽默感，我们经常聊天。但不到一个月，他也变得像野兽一样了。

为什么他们没给你注射？

起初，他们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给我打针。那时，我正在练习瑜伽。打完针后，我会冥想。我的身体疼痛难忍，感觉很糟糕，但这已经不是我的身体了，我不再是那个被注射了什么东西的人。为了分散注意力，我开始大量写作——诗歌、故事。医生们很长时间都搞不清楚状况；他们似乎像对待其他人一样给我打针，但这个人行为正常，没有攻击任何人。但我已经感觉非常糟糕，我的体力正在耗尽。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轻易逃到自由之地。然后，当我意识到情况真的非常糟糕时，我去找了主治医生，没敲门就闯进了他的办公室，问道：“你想让我死在医院里吗？我可以轻易地离开这里，你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怎么做的，我会跑到最近的高楼，从顶楼跳下去。我再也受不了了。”他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突然说：“好吧，我们不这么做了。”他取消了所有的注射和药片。我被安排到厨房工作，在那里服完了刑期。

你理解你所说的术语吗？

不，他们说你会一直坐在那里，直到他们告诉你。很明显，应该由谁来告诉你。所以这就是我告诉你这一切的原因吗？那种感觉——仿佛这是永恒的，永远都会如此——从未离开过我。如果你做了任何不同的选择，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甚至杀了你。另一方面，死亡近在咫尺的感觉却出乎意料地让你感到解脱，让你产生一种庆祝的喜悦。毕竟，人们常说，人无法在死亡面前说谎。这就是为什么死亡的主题经常出现在我们早期的作品中。这完全源于我个人的经历。而现在他们却告诉我们，这一切关于死亡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可他们自己还活着呢？不，没有人想要死。它就这么发生了。

没有人会计划死亡。那些摇滚乐坛的著名逝者，他们真的想死吗？

不，当然不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仅此而已。

评论

2012.03.30特别是关于叶戈尔·列托夫的采访

，亚历山德拉·布茨和其他一些不知何故站在他们一边的人感到非常兴奋。

我，瓦列里·波斯特纳克，是这篇访谈的作者。我与叶戈尔交谈时，是《公告牌》杂志的主编。他几乎整天都待在我家，和我谈天说地，而我的录音机里至今还保留着几乎完整的谈话内容。直到最近，这段录音（近三个小时）才被完整地转录出来。而且，它从未以原始形式发表过。

在2008年4月《公告牌》杂志上，叶戈尔去世后，我因失去一位我无比敬重的人而悲痛欲绝，匆忙删减了这段访谈中的一些语句，最终写成了这篇篇幅很长的讣告，完全由列托夫的文字构成。这并非一次真正的访谈。除了他那些经过大量删改的语句之外，它与录音中的对话没有任何关系。

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提醒亚历山德拉，当我宣布我们要在已经发行的杂志中插入两页文字时，她说过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把这个食尸鬼的照片放在跨页上？他已经死

了，他活该待在那里。”

大约一个半月前，这段音频文件首次被完整地转录成文字，保留了其原始形式。结果发现这是一篇篇幅很长，甚至可以说是极其庞大的采访，我没有添加任何内容，也没有捏造任何事实。部分内容已刊登在最新一期的《GQ》杂志上。除了少数词句和语义上的重叠（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主题相同）之外，几乎没有重复《公告牌》的内容。但在《GQ》杂志上，这些内容完全忠实于原文，而且我再次强调，从未以原始形式发表过。

我明白，乍一看，很多人可能会误以为两份材料中的照片是同一张。的确，这些叶戈尔·列托夫的照片，是在谈话期间以及在我家拍摄的（甚至还有我的猫，它现在活蹦乱跳，随时可以证实一切），已经发表在《公告牌》杂志上，而我之前已经就此事提醒过《GQ》杂志的主编。此外，那次拍摄的所有胶片（大约20张）都已提供给出版，但最终选用的还是同一张照片。

但这篇文章的内容与2008年发表的版本几乎毫无关联，也不可能关联——当时完整的采访稿根本没有纸质版。这是叶戈尔·列托夫的首次采访，我们对此非常感谢《GQ》杂志，尽管他们目前正因一些陌生人的奇谈怪论而饱受争议。

萨沙，你是《公告牌》杂志的经理，但这和2008年的《公告牌》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你肯定也和这篇文章没有任何关系。你当时没看过这篇文章（是的，我记得你当时说过这话，但我不会重复），而且我不确定这些年来你是否真的看过。现在我不得不这样回应你，主要是为了避免让《GQ》和米哈伊尔·伊多夫难堪。我问心无愧——作为这两篇文章的作者，我清楚地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我写了些什么。

叶戈尔·列托夫乐队解散四年 | 民防与叶戈尔·列托夫乐队 - 乐队官方网站

Василий Макогон и Дмитрий Синдицкий

作者：谢尔盖·乌达尔佐夫

来源：Echo.msk.ru



2月19日是叶戈尔·列托夫逝世四周年纪念日，在我看来，他是我们反主流文化最杰出的代表。2008年2月，总统竞选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梅德韦杰夫最终当选。与今年2月不同的是，那次选举毫无希望，民众普遍冷漠。在那段“该死的日子”里，我几乎被软禁在家，写下了一首名为《叶戈尔和那些留在这里的人》的歌词。我将略作删减后，在此刊登。感谢叶戈尔，这四年来你的歌声一直支持着我。新的一天终将到来！

我在警察局得知了列托夫的死讯，当时我刚从另一场抗议活动中被不守规矩的警察带走。整夜，我试图在拘留中心冰冷的地板上入睡（这个警察局的名字蠢得像个“济布利科沃”，不知为何拘留室里竟然没有长椅），一个愤世嫉俗的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叶戈尔逃得正是时候。他躲过了捕鼠器。”或许这的确如此。普京停滞不前的压抑氛围，对于这位极端反叛的歌者、对于这位在内心扼杀了国家的人、对于这位胸口仿佛藏着一群麻雀的、精神崩溃的叶戈尔来说，显然是难以忍受的。这样的人在剧烈变革和革命的时代蓬勃发展，而在虚幻的“稳定”的萧条时期则逐渐凋零。

叶戈尔很幸运——他生逢其时，像金鱼一样跃入了席卷垂死苏联帝国的革命浪潮。不知为何，早期的列托夫通常被认为是反苏的。这一切当然源于他早期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些原始引语——“我讨厌红色”、“列宁墓里臭气熏天”、“斯大林屠杀了数百万人”等等。事实上，我毫不怀疑，叶戈尔

始终是一位真正的左翼分子，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为了佐证我的观点，以下是奥列格·“经理”·苏达科夫的回忆，他是列托夫在动荡的20世纪80年代的同事：“我们相信，我们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者，直觉型的共产主义者.....我们认识到，苏联存在的‘共产主义’政治体制，从表面上看，倾向于党政，而能够存在并源于内心的体制——那才是最深刻的人类世界观——才是真正深刻的，我们认为自己是这种世界观的一部分。”的确如此！我承认，我常常问自己，如果我生活在苏联后期，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每次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普通人的理解，我也会“反对”，也会成为“反苏分子”。所以，我完全理解列托夫：他以疯狂的创造力，义无反顾地摧毁了勃列日涅夫虚假的“共产主义”，为他所理解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扫清了道路。

但事情的发展却截然不同，完全不同。真正的共产主义并未到来，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坠入了令人作呕的财富积累和暴富的深渊。列托夫早在1990年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解散了正值鼎盛时期的“民防”党，隐居于山林之中，并经常谈到“我们在这里已经无事可做了”。例如，以下摘自他1990年接受的一次自我采访：“总的来说，在我看来，一个明亮、苦涩、炽烈而又胜利的瞬间，比漫长、停滞、沉闷、乏味而又麻木的人生更好（也更美好）.....别尔嘉耶夫曾有过一个非凡的想法：.....为了自由，人们可以也必须牺牲生命，但绝不能为了生命而牺牲自由。一个人不能珍视一个不配为人的生命。”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关于叶戈尔·列托夫去世的传言甚嚣尘上.....

然而，他并没有死，尽管他似乎离死神很近。他仍然活着，只是暂时隐退了一段时间——毕竟，他感觉到变革的时代尚未结束。

列托夫对苏联解体感到难以接受。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场音乐会之后（应该是2003年），我和妻子与“国防军”乐团的乐手们坐在酒店房间里，我问叶戈尔在1990-91年间的 worldview。他回答说，他迷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打桌上冰球和整天在树林里闲逛之外，什么也做不了。正如他说，“感觉每个人都被残酷地欺骗了。”当时，他试图通过各种形而上学的追求来逃避这种失落感——吸毒、冥想、魔法等等。正是在这段时期，列托夫创作出了他最怪诞却又最美妙的专辑《Pryg-skok》和《Sto let loninochestva》。聆听之后，你便会明白——这真是一次超越地平线的飞跃，进入了一个弥漫着石油气息的永恒世界。

然而，列托夫的预感是正确的——革命尚未结束，社会依然动荡不安。历史的钟摆仍有机会向正确的方向摆动。1993年10月，列托夫从意识的沉睡中醒来。以下是他在其“创作政治传记”中对那段时光的回忆：“.....1993年10月的事件让我认清了自己的位置，让我为自己的个性主义感到羞耻。当我们抵达莫斯科，目睹白宫附近发生的一切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归宿在这里，在人民之中。.....我需要花几年时间追寻个人救赎之路，并在很多方面完成它，最终明白这并非我的道路。我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选择了第二条路，集体救赎之路，因为它是唯一普世真理。个人救赎之路不仅通向死胡同，而且通向更加可怕的境地。我对此深有体会，因为我曾亲身经历过。那是一条孤独之路。”

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却十分自然），列托夫发现自己身处红棕色反对派阵营——安皮洛夫、利莫诺夫、杜金、普罗哈诺夫、巴尔卡绍夫。有些人或许会觉得这样的组合有些不合时宜，但当时的时代背景就是如此。所有人——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民族主义者——都奋起反抗“流氓资本主义”这头怪兽。列托夫在他们之中就像马雅可夫斯基，是当代革命的吟游诗人。坦白说，共产党人、民族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反对派人士现在应该不遗余力地筹款，为列托夫建造一座纯金纪念碑。他对俄罗斯左翼的贡献是无价的。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所有在1993年后投身政坛的年轻左翼活动家都深受列托夫的作品，尤其是《俄罗斯的突破》、《冬至》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影响——这些歌颂革命、战争和在看似必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的颂歌。

我大概在1991年或1992年开始听《Oborona》，那时我十四五岁。那时候，像“Kh** Zabey”、“Hairy Glass”和“Sektor Gaza”这样的乐队在嬉皮士圈子里很火——在我的同龄人看来，他们最大的优势就是歌词里充斥着大量的脏话。我认识的一个人还提到了“Civil Defense”——估计也是个很酷的乐队。不久之后，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了Letov的《About a Fool》（当时俄罗斯广播电台有个叫“Quiet Parade”的深夜节目），我立刻意识到Sektor Gaza根本没法比。Letov的嗓音自然而然地吸引了我；它仿佛来自内心深处，来自某个地下世界。毫不夸张地说，那声音令人着迷。这样的嗓音在摇滚乐界极为罕见（莱托夫后期的专辑正是我所怀念的那种嗓音，可惜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嗓音难免消逝）。自然而然，在如此强烈的印象之后，我开始寻找莱托夫的录音。那时家里没有录音机，所以我在一位同学家听到了我的第一盘莱托夫磁带。那是一盘名为《Pryg-skok》（跳跃）的磁带，外加一些1988-89年的专辑。我承认，它彻底震撼了我。音质很差，歌词也难以理解，而且有时甚至完全听不懂——但那种狂野的能量却令人难以承受。这就是我的音乐，从此以后，它就像一块电池，定期为我提供能量。坦白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喜欢听欢快、真诚、积极的音乐。如果我感到快乐，那么我内心那首永无止境的快乐之歌就会在我心中响起。如果我心情糟糕，科布宗和马卡列维奇的音乐也帮不了我。我们需要的是莱托夫那种狂暴、超凡脱俗、近乎狂热的能量，就像“以暴制暴”一样，能让你重获新生。我必须说，在之后的这些年里，直到现在，我都没找到比这更好的“抗抑郁药”，尽管我听过各种各样的音乐。我想莱托夫对很多人来说也意味着同样的感受，但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不会说我完全是受列托夫的影响才转向左翼的。我的观点早在之前就已形成，主要是受到1991-93年那场灾难的影响。但当我得知叶戈尔曾在五一集会上发表讲话（那是在1994年），后来又读到 he 关于“俄罗斯突破”的采访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对我来说，这本就理所当然，因为我在叶戈尔身上感受到了一种惺惺相惜的共鸣。我只是暗自庆幸，既然列托夫与我们同在，一切就都对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以下摘录自列托夫当时的著作。我完全赞同他说的每一个字：“不要失去希望和良知，不要屈服于绝望的罪恶，不要放下武器，不要放弃。别再在舒适的陷阱里苟延残喘了。离开你那尘封已久、霉味扑鼻的角落——走到无神论者的光明中，深呼吸。”祖国在等待着你——年轻气盛、充满希望、桀骜不驯。去追求并实现不可能！战胜你的忧郁、冷漠和懒惰。谴责你的恐惧。行动起来，让死亡都为之胆寒。世界——至少现在！——寄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鲜活而不可战胜。尽管我们人数不多——我们一直如此——但正是我们推动着历史，并将继续推动历史，引领它沿着闪耀的螺旋向前发展。通往时间从未到达、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到达的地方。通往永恒。所以，不要让自己和未来蒙羞。奋起吧！

1999年，我加入了“俄罗斯劳动者”组织，决定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组织一场叶戈尔的音乐会。那是一场在列宁格勒电影院举行的原声演出。我告诉电影院经理，列托夫是像奥列格·米佳耶夫一样的吟游诗人，以极低的价格（我记得大概是500卢布）租下了放映厅，印制了一张很糟糕的演唱会广告（后来我和AKM的同志们一起，英勇地把它贴满了莫斯科），还委托一位当地艺术家设计了一张大型的苏联风格电影海报（上面清楚地写着“吟游诗人叶戈尔·列托夫”）。当时我几乎没有组织这类活动的经验，所以一切都充满了各种麻烦。放映厅里的座位还没清空（嗯，既然有个“吟游诗人”要表演，为什么要清空呢？），结果当然是被糟蹋了——我记得有52个座位被砸坏了，这让我损失惨重（电影院经理最终免除了我的债务，临走时还说：“我自己的儿子也一样没用”）。我差点就损失了门票收入，因为负责在电影院售票处的科索夫同志在音乐会当天喝了烈酒，放了一些小混混进了售票处，然后就睡着了。不过，尽管发生了这么多波折，音乐会还是顺利举行了。我记得我跳上舞台，兴高采烈地喊着口号，然后宣布叶戈尔的演出。我告诉你，那种感觉真是难以言喻。后来，我们在不同的电影院，以及戈尔布诺夫社区中心，又组织了许多场“防御”音乐会，但第一场音乐会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与列托夫的私人交往恰逢他退出政坛之时。时代变迁，体制趋于稳定，祖国却仍未从困境中恢复过来。而反对派政客们也并不令人鼓舞。叶戈尔再次踏上了“个人救赎”之路，远离了政治的喧嚣。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与世界的疏离感愈发强烈。那时，我有时觉得他就像是某个深渊里被人挖出来，带到一场音乐会上，虽然他出于无奈才勉强表演，却时刻想着如何尽快回到那个深渊。臭名昭著的演艺圈正慢慢地将列托夫卷入其中。我并不认同“叶戈尔已经背叛了原则”这种流行的观点。只是在我看来，他似乎已经无力真正抵抗，开始逐渐顺应潮流。叶戈尔

似乎早已在潜意识里为自己的离开做准备。或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幻想，但事实摆在那里。他几乎重新发行了自己所有的专辑（甚至重新混音了扬卡的专辑并交给了唱片公司），仿佛是在自嘲；他还重新命名了自己最经典的专辑（《至日》现在叫《月球革命》，《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叫《虚无的可承受之重》），并录制了一张本质上是他为梦想而作的安魂曲——《我们为何做梦？》。

无论我播种什么，无论我歌唱什么，
无论我信仰什么，无论我渴望什么，
无论我跌倒在哪里，无论我与谁战斗——
没有人失败。

列托夫的死对我来说既出乎意料——不知为何，“棍子弯了——我会活很久”的想法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又在意料之中——我无法相信叶戈尔会在没有假期和动荡的情况下开始一段“漫长而幸福的人生”。现在我逐渐明白，列托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为我们所有人留下了一件杰出的创作——他的死亡。他死得安详，而且充满才华。他并非死于剧痛，并非死于无助的衰老，也并非死于致命的疾病——而是在睡梦中离世。厌倦了“反抗”，厌倦了与一切对抗——他死了。他没有背叛自己。

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呢？其实也没那么悲伤。我们仍然拥有他的声音，他的歌，他的话语——我们仍然拥有抵御世俗污秽的屏障。我们仍然拥有一个永恒的榜样。所以，让我们继续竭尽全力地在床底下玩“飞机”游戏。让我们继续在灰烬和墓地上空化作彩虹。让我们继续在孤独的牢笼中，活在永无止境的四月里。当我们精疲力竭时，我们不会自取灭亡，我们不会衰老。我们会说：“去你的！”然后迈出第八步，超越地平线。在遥远的轨道上，我们一定会与叶戈尔相遇。

作者：谢尔盖·乌达尔佐夫

来源：<http://echo.msk.ru/blog/udaltsov/860138-echo/>

棺材编年史 | 海报 — “叶戈尔死了，但混蛋们还在” 谨以此纪念叶戈尔·列托夫

“叶戈尔死了，但那些混蛋还留了下来” 谨以此纪念叶戈尔·列托夫

五年前，叶戈尔·列托夫在鄂木斯克去世。Afisha采访了过去十年中直接参与列托夫音乐创作和传播的人们，了解了“民防”歌曲的起源、生活和发展。

“这些歌曲中没有一丝巧合，一切都是纯粹的现实写照。”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Natalia Chumakova) ,

“民防”贝斯手 (1998-2008) , 叶戈尔·列托夫 (Yegor Letov) 的遗孀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听到Oborona乐队的演出。那是1989年，在圣彼得堡摇滚音乐节上。当时我在莫斯科读书，但经常去圣彼得堡。我和我的朋友——塔尼亚·阿列什切娃和奥莉娅·马什尼娜（当时她甚至还不叫马什尼娜）——一起去了音乐节。我之前就听说过这支神秘莫测的乐队，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多：比如，一个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17岁男孩……总之，音乐节上可能还有其他乐队演出，但我记不清了。Oborona是三人乐队——库兹马和杰夫都不在，所以叶戈尔弹吉他，他不怎么蹦蹦跳跳，一切都显得很沉稳。但现场的能量太强烈了，我们都被彻底震撼了。我记得演出结束后，我们都走了出去，沿着鲁宾斯坦大街默默地走着，突然塔尼亚停在一个水坑中央，坐了下来。”我什么也说不出。脑海中所有的坐标瞬间改变。我的人生也随之改变。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回到了新西伯利亚，因为那里的一切都那么真实，于是我离开了。

其实我发现摇滚乐很晚，大概一年前吧。在那之前，我问学校的男同学能不能帮我录点摇滚乐。他们录了一些，我听了之后一点也不喜欢。结果发现居然是彩虹乐队！（笑）后来我在莫斯科读书，意识到摇滚乐完全是另一回事，就开始到处看各种摇滚乐。一开始是俄罗斯乐队。后来世界统治企业乐队来莫斯科演出，我看了他们的演唱会，才发现俄罗斯摇滚跟他们比起来简直是垃圾，太离谱了。我当时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根本做不到。但是看了俄罗斯国防军乐队的演出之后，我发现他们也能做到，而且有些乐队甚至更厉害。之后我又开始听欢乐分队、朋克、后朋克、西方音乐，也从中学学习演奏。

我和叶戈尔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在扬卡的葬礼上，他们碰巧路过，但我当时觉得很尴尬，几乎没怎么搭讪。我记得是泽连斯基（扬卡乐队“大十月”的成员，也曾与“卫国卫士”乐队合作过——编者注）按响了门铃，我之前就认识他。我给他开了门。他问：“你确定家里没人吗？”我说没有。然后他隔着门命令道：“把他们带进来！”好像是杰夫（伊戈尔·热夫顿，“卫国卫士”乐队的吉他手——编者注）和克利姆金（乐队的鼓手——编者注）扶着叶戈尔的胳膊和腿，把他放在大房间的沙发上，还放了一个盆，以防万一。第二天早上，我需要用到那个房间里的东西。我走进去，那家伙躺在那儿，看到我，就站起来问：“不好意思，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我冒犯到谁了吗？”我当时真

是惊呆了。这算不算朋克摇滚？“我冒犯到谁了吗？”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当一切都达到极限时，一切都会变得异常强烈。这并非歇斯底里，更像是一种极端的崩溃。”

当时他们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人们正经历着一场悲剧，却还坐在厨房里喝酒、说笑、开玩笑。我能感觉到这就是他们的人生态度：当一切都到了极限，一切都变得异常强烈。与其说是歇斯底里，不如说是一种极度崩溃，快乐和悲伤同时交织在一起。他们播放着扬卡喜欢的各种音乐，随着音乐起舞、蹦蹦跳跳，甚至砸碎了父母家的吊灯……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六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

但事情完全是另一回事。当时，我对“防御”这个组织有点怀疑：我对共产党、政治等等一无所知……然后他们来了，我完全被他真实的为人所震撼。他没有丝毫谎言，没有丝毫伪装，什么都没有。他完全真诚。这太不可思议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以为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肯定有——但事实并非如此。事情就是这样。当他邀请我一起打球时……嗯，我当然有点害怕去。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你不会两次被邀请去斯巴达克。

当然，演唱会上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独裁。毕竟，乐队已经成立很久了。我之前只上台演奏过两次，又能有什么发言权呢？当然，你得听他的。叶戈尔的要求都很合理，也很恰当。而且，他总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贡献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在录音方面。要创作、谱曲、再创作。他其实并不想写个人专辑。当然，库兹马离开之后，那些专辑在某种程度上都算是个人专辑了。最重要的是让乐手理解演奏的原理，技术上的完美反而是次要的。

这种音效，以及其中大量的叠录，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来解释。数码录音的声音听起来很平淡，叠录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才用三把吉他齐奏，录制了好几段人声。这纯粹是技术问题。最初，我们的设备非常简陋；直到录制《Why Do We Dream?》时，才出现了一支不错的麦克风，可以同时录制两个人声——仅此而已。效果器也很重要。吉他也是如此。即使是扫弦，我们也用两把吉他录制：切斯纳科夫（乐队最后阵容的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编者注）用一把十二弦吉他弹奏，汗流浹背，手指不停地搓着……到了后期，我们换成了一把Rickenbacker十二弦吉他，一切都彻底改变了；它立刻为整首歌增添了色彩。如果没有这把吉他，《Why Do We Dream?》肯定录不出来，这是肯定的。当一种新的乐器出现时，音乐乃至风格都会随之改变。这并非小事，叶戈尔对此非常重视。

在家录音至关重要。伊戈尔之前在其他录音棚录过两次，但都非常不满意。在那里你根本无法达到想要的效果，因为录音师会突然闯进来，设备也不是你的，而且还有时间限制。但在这里，你可以随时起身，去另一个房间，按照自己的需要录音，没有任何干扰或打断。对他来说，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环境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适应电脑录音：每当电脑卡顿或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我得边做边学——他就会非常生气。他会大喊：“我真希望当初用的是奥林巴斯录音机，这玩意儿迟早会烧坏的，你这么干，我都要把电脑扔出窗外了……”但最终，一切都顺利解决了，当然。

我有时还会看到有人写道：他们不会演奏，对音乐一窍不通。真是太搞笑了。这家伙从六岁起就什么都听，对音乐了如指掌。每天晚上，他都会翻阅厚厚的百科全书，查找最新的迷幻乐队，仔细研究每个乐队的演奏。而且他全都记得清清楚楚。早期摇滚、新浪潮、七十年代、前卫摇滚、先锋音乐——他全都了如指掌。他唯一不懂的就是一些当时很流行的青年乐队，还有一些可怜的流行乐。

但即便他没有仔细聆听，他也对音乐了如指掌。我们在鄂木斯克有朋友卖唱片，我们经常从他们那里订购——每两周就会有上百张唱片寄到。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当年从百科全书中整理出来的订购清单。那时候我们的网络也很差，所以我会带着我的硬盘，和“洞穴践踏者”（The Cavestompers）乐队的瓦尼亚一起去莫斯科。他会把车库里藏的唱片之类的东西寄给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听。即使是MP3格式的——也依然很有意思。叶戈尔其实喜欢放CD，所以我学会了怎么解压文件，把它们刻录到CD上，还在网上找封面打印出来。当然，这方法不太成功，但拥有一张CD和封面很重要，这样我才能把它们拿在手里。

这场演唱会的风格一目了然：观众的反应立竿见影。当然，一切都取决于观众。有时候——嗯，毕竟是个小镇，没什么特别的，你看到有人穿着深紫乐队的T恤，才意识到他们是把唯一一件摇滚T恤从衣柜里翻出来就来了——但观众都很棒，演出结束后，你心情愉快地离开舞台。但比如在圣彼得堡，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到处都是数量惊人的、极其残暴的人。他们会在大厅里喷洒催泪瓦斯，或者破门而入……有个故事挺搞笑的。我们当时坐在更衣室里，旁边有一扇直通街道的门。那些人显然意识到他们可以撬开门闯进来。他们抓起一根木头，开始踹门。保安们交换了一下眼神，站在门口，一根木头撞穿了门，朝我们飞了过来。他们抓住木头猛地一拽——木头进了屋，外面的人都摔倒了。这确实是个不错的亮点。表演确实充满活力，但并不算特别出色。就这一点而言，莫斯科的演出要好得多。

疯狂的人群确实令人倍感压力。电影院，还有那家著名的Mars酒吧；骚乱爆发，文化中心遭到冲击，水炮齐鸣，人群咆哮着，什么都不听，只是为了闹事而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你看着某些人的脸，心里想着：“我宁愿盯着天花板。”幸运的是，大约在200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面孔，这些人或许之前就想来，但却不敢——因为当时一片混乱，每个人都在和防暴警察打架，而且一片寂静。当然，这一切最终都变得索然无味。演奏《Po Planu》也变得索然无味。但另一方面，正如叶戈尔在一次线下采访中所说：我们只来过这座城市一次——我们怎么能不为这些人演奏这首歌呢？他们或许一生都在梦想着听到这首歌。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的第一场演唱会：那简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因为演一开始就直接进入了体育宫——那是“苏维埃之心”乐队的演出。1998年，现场人山人海，气氛疯狂至极，利莫诺夫在演唱会开始前高喊口号，简直是一片混乱。我记得有一首歌我竟然完全忘了怎么弹贝斯。我只好把贝斯交给马赫诺（乐队的吉他手，1999年去世——编者注）。还有，在那场演唱会上，叶戈尔竟然跳进了观众席——而且他跳得非常巧妙：他没有跳到男观众那边，而是跳到了女观众那边。结果女观众们一把抓住了他！最后，他好不容易才脱身——浑身是伤，光着膀子，保安们不得不拽着他的腿把他拖出来。他之后再也没这么做过。看到这一幕，我吓得完全停止了演奏——我以为他们会把我撕成碎片。说真的，我一直都很害羞。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这确实挺难的。有时候你出门，跑到公交车站，他们就会追着你，就像电影《等着瞧》里演的那样。有时候也挺吓人的。

有时候巡演玩得太开心，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把自己隔离起来。因为有时候你到了之后，他们会说：“你们是为了这个理念而演出，对吧？干嘛要住酒店？来我们这儿住吧，你老婆做了汤。”我还记得有一次到了库尔干，他们把食物送到公寓，餐桌都摆好了：切片香肠、面包，还有一大堆私酿酒。我们会说：“演出前我们不喝酒。”“你们不喝酒？好吧。”然后他们就拿出了一箱波特酒，而不是私酿酒。所以，人们常常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份严肃而辛苦的工作。演出结束，聚会也结束了，然后你就得挤进闷热的火车，周围都是尖叫的孩子，或者坐小巴在夜色中颠簸，一路颠簸。这

真的非常辛苦。

叶戈尔喜欢足球，因为它很真实。当然，足球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一切都那么真实，仿佛就在你手中。要么踢，要么不踢。一切都很明了。它就像一个非常美好的生活模型。叶戈尔一直以来都很欣赏足球精神，他的支持对象就像手套一样，来来去去。有时候挺搞笑的。我记得他最近好像打算支持克雷利亚苏维埃队，因为斯卢茨基在那里。而我从小就是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球迷。没办法，我们总是为此争论不休。不过他也说过，录制《Znachit, Urkan》的时候，他想到的是罗曼采夫。我们关注所有球队。英超联赛也是如此。我支持曼联，他却转而支持切尔西。而且就在阿布拉莫维奇入主切尔西之后，这在我看来当然是不可原谅的（笑）。但支持对手也更有意思——可以互相竞争。顺便一提，我们第二次见面也是这样——他们开始聊足球，我心想：“啊哈，终于找到人聊天了。”我们聊了一整晚，音乐却始终没被提及。直到几天后，有人无意中跟他提起我会弹贝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突然，一个人半夜起床，去了另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出来，发现那里已经有一些素描，而这些素描可能源于昨天发生的完全平凡的事情。”

只有当我真正融入其中，我才真正理解了许多歌曲。很多意象对我来说似乎很抽象；我从未意识到它们并非偶然，而是完全具象化的。后来，当歌曲开始在我面前创作时，我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必须说，这并非一蹴而就——大约在2002年左右。在那之前，他没有创作任何歌曲，那段日子很艰难。他非常焦虑，真的非常焦虑。他曾一度陷入极度的绝望。“就这样吧，我无话可说了，一切都结束了。”但后来，当歌曲开始涌现时，他感到无比喜悦——而且这种喜悦从未停止。当然，当你真正理解这一切时，一切都会改变。当我们重新混音早期专辑时，我了解了很多关于它们的内容。这几乎有点滑稽。他说：“你听出来了吗？那段独奏是从——比如说——The Clash乐队那里偷来的？”我说：“我没听出来。”他给我放了The Clash的歌，我意识到，没错，可能确实有些相似之处，但那种相似之处你绝对猜不到。当然，他每次写歌的方式都绝对令人惊叹。比如，一个人半夜起床，走进另一个房间。第二天早上出来，你会发现一些灵感已经涌现，而这些灵感可能就源于昨天发生的那些平凡琐事。比如说，我们这里发生了洪水，然后就有了《不眠之日》：“突然，一块破布卡在了我的手里，就像你脑袋里的喉咙。”或者：“窗帘掉落，杯子和茶壶乱飞”——我们经历了某种神秘事件，停电了。也就是说，一些平凡的小事竟然在诗歌和歌曲中衍生出了完全惊人的分支。太酷了。至于旅行，我就不提了——那些旅行里一切都很清楚。

关于《我们为何做梦？》，我可以这样说：在这张专辑之前，埃戈尔的创作生涯几乎完全建立在可怕的负面情绪和仇恨能量之上。我非常了解他的这些时刻：当他被某些事情激怒时，一种彻底疯狂的氛围便会随之而来——而这种疯狂很可能会倾泻在诗歌或歌曲中。此外，任何事件——无论是日常琐事还是政治事件：比如伊拉克战争或电视上播放的烂片——都可能引发他内心深处的仇恨，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憎恨一切不好的事物”。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他早已习以为常。而《我们为何做梦？》却是一个完全突然且非常奇特的转折点。整张专辑都是在光明的能量下录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嗯，他经常说：也许这张专辑是最后一张，下一张也是最后一张。但这张显然是最后一张。几天前我又听了一遍——当然，它令人难以置信。我想它只是还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而已。

“我们一进入特兰西瓦尼亚，销售人员就立刻开始忙碌起来：‘莱托夫来了！’”





谢尔盖·波普科夫，
民防主任（1998-2008）

“我和叶戈尔是在所谓的‘云’上相遇的——那是鄂木斯克的一个服装市场，每周日，唱片爱好者们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聚集在那里。我和叶戈尔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在那里，我们因为共同的音乐爱好而结缘。当时和现在，大多数人喜欢的都是像深紫乐队（Deep Purple）这样的乐队。朋克和新浪潮被认为是不入流的——大概只有傻瓜才会听。当然，这些傻瓜会聚在一起。后来，我在鄂木斯克成了一位颇受欢迎的DJ——我得知叶戈尔正在创作他的《红色专辑》（Red Album）。”很快我就亲耳听到了。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之前就听过一些音乐，所以我的大脑和耳朵已经对这类歌曲做好了相当的准备——而且它们的歌词也朗朗上口，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还是那些老歌，比如《Zoo》、《Detsky Mir》、《Skvoz Holu V Moe Golovu》等等。现在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当时——嗯，想想吧。一些种子在我准备好的田地里播下了。

尽管鄂木斯克乃至整个国家都有其特殊之处，但仍然有一些地方可以买到音乐。黑胶唱片从列宁格勒的唱片厂批量运来；有时也会运往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那里的唱片市场自然要好得多。在西伯利亚，这类音乐的唯一据点是新西伯利亚，我们也经常去那里——要么买，要么用它们换取我们心仪的深紫乐队（Deep Purple）的唱片。还有水手们。当然，我们这里的水手比圣彼得堡或弗拉季克少得多，但仍然有一些唱片能送到我们这里。不过，水手们挑选唱片的方式很奇怪。而且，所有这些东西都只在极少数人手中流通，完全没有商业价值。我记得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一些全新的、未拆封的美国版Curved Air、鲍勃·迪伦、弗兰克·扎帕、以及新出的Roxy Music乐队的唱片……我简直舍不得卖掉它们！他们劝我卖掉，但最终我还是把它们留下了。“迪伦？那是谁？弹着吉他唱歌什么的？”与此同时，一本苏联大使馆记者写的关于摇滚乐的书出版了。书中提到了鲍勃·迪伦，对他的评价是：“民谣歌手”。就这样，这成了我永远背负的十字架。但无论如何，一切都过去了，当我听到《Oborona》时，我已经准备好了。

1975年，我第一次听到唱片，就被震撼了。自然而然地，我立刻组建了自己的乐队，自学了打鼓，然后乐队就火了起来。我们最初的乐队叫“Truvera”，后来我们的艺术总监差点被关进监狱，我们只好靠自己，于是把乐队改名为“The Crossroads”。说来好笑，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当时玩的其实是某种车库朋克。虽然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车库朋克是什么。举个例子，我们放了一张经典摇滚合辑，还有Slade、Uriah Heep和Harry Glitter的歌。我们甚至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后来我意识到，作为一名鼓手，我的技术发展空间有限，所以我转行做了DJ。之后，我又意识到，做经纪人会更成功。

我现在明白，八十年代是六十年代的重演，一个完全自由却又政府管控不受约束的时期。因为他们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这真是个悖论——在鄂木斯克最高建筑里的地区共青团委员会会议室里，一群衣衫褴褛、毛发旺盛、桀骜不驯的人，和几个共青团书记坐在一起，平静地讨论着如何帮助苏联摇滚乐运动。显然，他们是奉命行事，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尽力帮忙。不过，叶戈尔是个特例。他和其他人如此不同，以至于他们显然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游戏。所以，对于其他人，他们是这样看待他的：嗯，音乐家们就是有点怪，什么月亮、爱情、青春期之类的。但对于“GO”乐队，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体制并非麻木不仁，它只是假装麻木——而且它对每个人的身份都了如指

掌。那里确实有些人具有强烈的自保、迫害和毁灭本能。只不过，真正构成威胁的人屈指可数。

后来我才知道，叶戈尔其实早就开始关注我了。无论是我们一起在鄂木斯克摇滚俱乐部举办音乐节，还是他为皮克·克拉克森乐队、伊万·莫格乐队和其他乐队组织演出，他都一直在关注我。叶戈尔后来告诉我，他是在热尼亚·利申科（皮克·克拉克森乐队的创始人之一，也曾与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合作过——编者注）的葬礼上，当我不得不把宾客的遗体抬上出租车时，才最终决定与我合作的。所以，叶戈尔一直在暗中观察这一切，观察他的管理人员——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1998年6月，我成为了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的负责人。

我从未将奥博罗纳的音乐划分成不同的时期。对我而言，第一时期和第二时期，也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几乎是一体的。人会成长，这可以理解，但我自己也经历过好几段人生，这些人彼此之间截然不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名字、父母、背景和护照信息。我承认，其他人也是如此。我真正的新发现始于与GO合作之后。在那之前，我从未看过他们的现场演出。他们故意不在鄂木斯克演出，他们在其他城市的演出安排也总是断断续续。然后我看了他们的演出，然后.....几乎每次都有一些东西深深地打动了。他们对待演唱会极其认真的态度，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投入。尽管叶戈尔一开始并不喜欢演唱会，但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演唱会是必需的，是理所当然的。

我认为Oborona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棒的现场乐队之一。**Egor**的嗓音极具爆发力，他能完美地驾驭每一个泛音和音符。与此同时，他们身上散发着一股狂野的能量，仿佛无人试图控制或驾驭。一切都瞬间被释放——每次演出结束后，你都感觉自己像被榨干的柠檬。为什么他们的演出有时会持续一个小时十分钟？这纯粹是体力消耗。伙计们，扛着电吉他站在那里一个半小时，还要演奏音乐、表演、跳跃、奔跑，那会怎样？这简直是对能量的恐怖消耗——无论是体力还是精神上的。

关于那场令人难忘的**16 Tons**演唱会（列托夫在**Tons**的这场不插电演唱会于**2001**年秋季举行，因列托夫一首歌都没唱完而闻名——编者注），我们现在可以说这是叶戈尔的有意之举。他问道：“嗯，这是什么类型的俱乐部？”“嗯，一个资产阶级俱乐部，专为富人而设。”啊，资产阶级.....所以，我想我应该在资产阶级俱乐部演出。

演唱会的人群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肉食者”，穿着条纹衬衫，留着莫霍克发型的狂野人群；另一类是知识分子，他们通常站在后排。很多时候，一切都是为了后者，因为前排的人早已欢呼雀跃。而且，人群形形色色。我记得有一次带着音响设备来到以色列，正在办事，突然看到一个九岁的小男孩站在入口处，嚎啕大哭。他穿着皮夹克，浑身上下都带着，连馅饼都带上了。“你在哭什么？”我问。他说保安没收了他的手环。好吧，我安排他们在演唱会结束后归还给他。另一方面，在Mars酒吧，一场狂野的演唱会上，窗户被砸碎，消防水带喷涌而出，一位穿着蓝色长袍的老妇人，当地的清洁工，却从头到尾都在疯狂地跳舞。然后她甚至拿着一张海报冲进更衣室，请粉丝签名：“伙计们，这太棒了！继续加油！”

乐队的收入勉强够维持生计，升级录音室，当然，还有收藏。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旧金山的Amoeba Music唱片店时——所有的钱都留在了那里。我们拉了一整车唱片，然后把它们全部运回了俄罗斯。当我们走进莫斯科的Transylvania唱片店时，售货员们立刻开始窃窃私语：“列托夫来了，列托夫来了。”这意味着肯定会有不错的销量——而且打折的都是别人买不到的。

叶戈尔对音乐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能轻松回忆起乐队阵容、乐队名称和年份——至少在他熟悉的音乐类型中是如此。然而，他并非盲目听歌，而是懂得分辨音乐的优劣。他认为，如果流行音乐制

作精良且富有创新性，就值得关注，至少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正因如此，他尤其喜爱ABBA和Diskoteka Avaria。我记得他非常喜欢梅拉泽的歌曲《花与刀》，认为这是流行文化的一项成就。当然，还有苏联的VIA乐队——Pesnyary和Singing Guitars——他们的音乐风格极具冲浪摇滚的韵味。

叶戈尔首先把自己视为诗人与艺术家，其次才是音乐家与歌手。只是碰巧他性格中的这些方面更受人需要，因此，它们能够传达他内心所想。因为真正重要的是那条通道；那流经他、流向世界的东西。而这条通道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会开启，这些条件并非总是通过愉悦的方式获得的。在某种临界状态下，感官——听觉、视觉——一切都被放大。与此同时，工作从未间断，即使在旅途中也是如此。叶戈尔会突然坐下来，开始写些什么，或者对着手机喃喃自语。他也喜欢在树林里漫步——在那里，他可以达到某种特殊的状态，一种不同的境界。

1998年我们停止创作歌曲的时候，真是个危机。那段日子非常艰难。抑郁，感觉一切都停滞了。然后——砰！——这些后来的专辑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如此特别。当然，之前的专辑也来之不易，但这些.....它们就像在冰山环绕的迷雾中航行许久后，终于发现了一片新大陆。你再也找不到咸牛肉了，牙齿都快掉了，看不到太阳，指南针也坏了——然后，你看到了陆地。

埃戈尔也是个天生的制作人。他懂得如何清晰地定义任务，激励人心，指导方向，示范示范；必要时，还会施加压力。因为，你试试跟一个乐手解释，他需要录制二十个吉他声部，一个接一个地叠加，每个声部都各不相同，而且每个声部本身都足以构成一首相当不错的歌曲。之后你会看到一些年轻的乐手，他们创作出一段旋律，然后像对待珍宝一样精心打磨.....结果却把这二十段旋律用在了了一首歌里。而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却很一般。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这简直是浪费素材——但潜意识里，你会听到这二十段旋律，而且它们都恰到好处。

叶戈尔说歌曲就像孩子，这绝非偶然。它们转瞬即逝，谁也不知道它们接下来会怎样。有的成了传教士和精神导师，有的成了瘾君子，还有的则完全变成了别的什么人。但最初，它们都是天真烂漫的小天使，是你孕育了它们。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他坚持不生育的原则。也就是说，孩子必须拥有自由，而如果你放手让他们自由，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多数人都能接受这种两难境地，但叶戈尔对这种“或许”却并不满意。

许多人将“我永远反对”这句话解读为青少年无意识的攻击性言论。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完全自觉的策略，与纯粹的无政府主义理念直接相关。这里没有人真正理解这一点——没有人读过克鲁泡特金，也没有人理解他的追随者。叶戈尔如此热爱和尊敬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是因为他创造了真正民主最鲜明的典范。无政府主义并非真正的无政府主义；它是没有牧羊人的民主。“我永远反对”意味着反对我们周围生活的荒谬，反对这种卡夫卡式的现实。

关于宗教信仰，这是人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我可以这样说：每次演唱会前，叶戈尔都会去教堂；或者至少，我们会开车路过教堂。这很重要。在以色列，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牧师说：“我们时间紧迫，200美元，我们会尽快解决一切。”这让叶戈尔勃然大怒。我们坐下来思考，想起旧礼仪派有一条规定，允许信徒自行受洗——当没有牧师在场或他们不信任牧师时。我们就决定这么做。我的意思是，他的信仰不过是人类的又一种发明，而叶戈尔的信仰则完全是他自己的。

“埃戈尔真的很想录制一张完整的专辑。我认为他成功了。”





帕维尔·佩列托尔钦，
民防乐队鼓手（2005-2008）

“我刚从部队回来——我对新西伯利亚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所以就去看了第一场演唱会，碰巧当时正在听‘伟大的十月’和‘民防’乐队的歌。说实话，我当时什么都听不懂。甚至觉得有点烦躁——但我仍然被他们的能量所震撼。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一直伴随着我。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关注着‘民防’乐队。九十年代中期我错过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但总的来说，我对他们的喜爱从未消退。除了作为一名录音师，我对他们最新专辑的音质有些不满之外，他们的所有录音都没有让我感到任何反感：我仍然更喜欢早期专辑那种粗犷、原始的声音。”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组建了第一支乐队“**Party Chiefs**”，演奏的风格与Dead Kennedys非常相似，只不过是用俄语演唱。那时我和Egor并不联系，只和Yanka有联系——他和Egor有时会搭便车去新西伯利亚，借宿在我一个朋友家。直到2000年代，我才真正认识Egor，当时我受邀加入乐队担任鼓手。他们是通过Natalia邀请我的——她曾经在“Party Chiefs”担任贝斯手，那是她的第一支乐队。所以，当Andryushkin（Alexander Andryushkin，1997年至2005年间担任“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鼓手——编者注）的合作告吹后，我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的选择：是否加入。起初我很犹豫，因为我已经十多年没打过鼓了。但后来我想，这或许是最好的机会。现在我意识到，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提议，我可能根本不会坐下来安装它。

与伊戈尔合作轻松愉快——原始主义和极简主义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而我也一直对随意演奏鼓点不感兴趣。伊戈尔真心想录制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完美专辑——从音色、主题、演绎、歌词，到其他所有方面。一张每个人都会聆听并被其触动的专辑。他认为《我们为何做梦》已经非常接近这种完美——他努力打造一张平易近人、亲切动人、充满光彩的唱片。我认为他做到了。

我从未见过他生气，他不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恰恰相反，一切都非常和谐：就连专辑的录制过程也十分轻松。我们每天大约十一点在埃戈尔家起床，趁着邻居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直录到下午两点。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那间公寓就像一个巨大的音乐档案馆——在那两周里，我听了无数我闻所未闻的唱片。埃戈尔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唱片上——我们在旧金山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了唱片店里。尽管他博学多才，却一点也不势利眼；从毕加索之子乐队到歌手娜塔莉，他都能欣赏。

每个人都记得90年代“民防”演唱会期间发生的事。叶戈尔后来对那种生活感到厌倦，想要乐队纪律严明、专注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或许那种肆无忌惮的作风已经不复存在：演唱会虽然依然狂野，但气氛温暖，更衣室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戒备森严。当然，他们只象征性地喝点酒，安保措施到位，而且他们还在几家高档俱乐部演出。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认可——每年在“Nashe Radio”电台播放一首歌，接受几次采访——就足够了吗？这一切都如此短暂，根本不值一提。我不认为“民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流行，而且很遗憾，我们恐怕永远也无法为叶戈尔树立纪念碑。或许要等到很多很多年以后吧。毕竟，他们为维索茨基建了一座纪念碑。

我们的谈话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同样突然。我们原本计划聚在一起，去大自然中走走，进行一些创作。我们打算用一套新的音响系统重新录制一些从未公开演出过的老歌，以及一些我们曲目中非常喜爱的作品。

这仅仅是个开始。

“叶戈尔能制作这三张专辑，真是莫大的荣幸。”



Ales Valedinsky,

Vyrgorod唱片公司总监，该公司发行了专辑《Why Do We Dream》、再版专辑《Lunar Revolution》和《The Bearable Weight of Nothingness》、现场专辑和DVD，以及其他Civil Defense唱片。

大约在**1993**年，一位朋友给我放了《Pryg-Skok》，但我当时已经抱有偏见，心存戒备。朋克、碎酒瓶、一些激进、淫秽的东西——我根本没听说过“民防”乐队有什么深刻的内涵。当我听到《Pryg-Skok》时，我不得不承认它才华横溢，非常棒，但或许有点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尽管我真的很喜欢《About the Teddy Bear》、《About the Fool》以及《Pryg-Skok》这首歌）。那时，我还在推广巴什拉切夫，为朋友们录制尤里·璘莫夫的长篇严肃民谣。我对扬卡·巴什拉切夫的音乐有些接受，但她对我的影响太强烈了——我曾经连续听了她一个星期，然后花了很长时间才从那种恍惚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当时的叶戈尔……总之，巴什拉切夫对我来说就是一切，甚至更多。那时候，我对摇滚乐总体上是持谨慎态度的。毕竟，巴什拉切夫是一位古典诗人，更容易欣赏。我对俄罗斯古典诗歌颇有研究，但对先锋派一无所知。所以，当时我很难欣赏叶戈尔的作品。我的意思是，我不理解诗歌，对我来说，诗歌不是音乐。在我看来，音乐就是莫扎特、贝多芬、巴赫等等。

1999年夏天，我来到**Khor**唱片公司工作（这家唱片公司是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的负责人叶夫根尼·科列索夫创立的，专门发行乐队的音乐——编者注）。我慢慢地站稳了脚跟；叶夫根尼·科列索夫教我如何使用电脑等等。Khor唱片公司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发行Grazhdanskaya Oborona的音乐。到了**1999**年秋天，乐队又举办了一场演唱会，他们住在叶夫根尼的住处。他们也把我拉了进去。我一开始很抗拒，说：“列托夫为什么要来这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但他们还是把我拉了进去——我立刻就被眼前的一切和我脑海中想象的完全不同的景象震惊了。我看到的是一位坐在厨房里的睿智男士，他认真倾听，与人交谈，而不是高谈阔论——这与我印象中“摇滚明星”的形象以及我读过的叶戈尔的采访完全不符。他是一位聪明、和蔼、博学的人。这一点着实让我印象深刻。

然后我开始校对《叶戈尔·列托夫诗集》。我校对了很久，自然而然地一路向叶戈尔请教。大多数时候，叶戈尔会把一些内容删掉，觉得印在纸上不好看（比如《11月37日》）。总之，在校对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一位诗人，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没想到会这样，因为——嗯，就像那个笑话：“是的，我听过你的夏里亚宾，邻居唱的。”街角那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确实让我吃了亏。90年代的诗歌和文章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因为毕竟，没有了关键人物、没有了奥伯留茨、没有了弗韦登斯基的80年代作品很难被理解为诗歌，而且我接触弗韦登斯基的时间也太晚了。总而言之，那时我真心渴望聆听、理解并喜爱叶戈尔的作品。

我从未跟叶戈尔提起过我这段艰难的历程。他显然不会乐意听到。对他来说，完全的接纳至关重要。他渴望有人能理解，有人能领会。我记得大约在**2006**年，我曾为一位记者辩护：好吧，就算他没听懂我后来的专辑，那又怎样？“没听懂？那你还写什么！”他看待自己是一个整体；我怀疑如果

有人告诉他，“我喜欢你这一点，但不喜欢那一点”，他是否能理解。

我最初几场演唱会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因为——嗯，电影院，震耳欲聋的音响，破损的座椅，还有谁知道是谁以什么形式出现。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发生了。我不能说这是一次极致的体验，但我当时觉得它一点也不好，更谈不上精彩。而且——当一切都处于这种音响效果下时，歌曲需要在你的内心深处萦绕，否则它就无法引起共鸣。但渐渐地，我找到了这种频率，它们开始引起共鸣，不仅是歌词，还有声音。然后，大约在2005年，我痛苦地意识到这种现象的全部意义。所有其他我喜欢的……嗯，我不想说它们不如我。但Egor是完全无法与任何事物相提并论的。

加入Khor唱片公司后，我亲眼见识了整个运作流程，意识到发行磁带其实非常简单，而且通常成本不高——你只需要掌握方法。过了一段时间，我创办了Vyrgorod唱片公司，专门发行一些Zhenya Kolesov不喜欢的音乐，比如Ermen、Cherny Lukich等等。总之，大概在2003年，Lukich建议我发行他的新专辑《Maria》。因为这是张新专辑，我想把它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些朋友帮了我，借给我一千美元的无息贷款——这在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Egor非常喜欢这张专辑本身以及它的发行方式，大约在2005年，他说：“也许我也可以帮你发行一些作品。”

当然，如果我要接手“民防”项目，我希望发行一些真正意义非凡的作品。“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刚刚发行，我对此感到无比兴奋，所以我很想发行“重生”。但后来伊戈尔提出了发行合辑的想法。对他来说，发行“共产主义”至关重要，因为这张专辑可能会引发版权问题。还有其他所有作品——某种形式的过渡总结，尤其是在他和娜塔莎学会了如何制作声音之后。于是乐队想出了这个主意：我们将发行“重生”以及他们过往作品中的四十张专辑。当然，我无法与之竞争。我的制作能力根本无法在一年内发行四十张专辑，而这正是他们的目标。后来，“声音的奥秘”成功地挫败了他们的计划，这又是另一回事了。以至于他们最终从未发行过他们凭借“重生”项目获得奖项的那些作品——也就是“共产主义”和“星陨”。简而言之，在筹备这张合辑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至日》（Solstice）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需要进行极其细致的重新制作，以至于它们会成为完全不同的专辑。因此，他将它们交给了“Vyrgorod”厂牌。

我记得《Pryg-Skok》再版发行时，我非常喜欢叶戈尔的评论。我请他为《Lunar Revolution》和《The Bearable Weight of Nothingness》也做同样的评论。但叶戈尔的回复有两点。首先，这些都是新专辑，不是老专辑——评论的时机大概还要十年后才会到来。其次，他不得不谈到NBP（新黑手党）这个话题，而他不想谈这个。他觉得谈论这个话题让他感到不自在。

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是2007年5月26日奥博罗纳在B1的演唱会。我不敢说它是最好的——它只是与其他的演唱会截然不同。我记忆中从未有过类似的演出。叶戈尔非常出色，沉稳冷静，仿佛散发着一股平和的气息——此前或此后，我从未感受到过如此强烈的感染力。就在第二天，我在多莫杰多沃送别了他们，也是在那时，我请求他们重新发行《扬卡》——最终以四卷本的形式面世。

2007年秋天，叶戈尔完成了《扬卡》的制作，并把它交给了我。他甚至告诉我他是如何准备的——毕竟所有东西都刻录在卷盘磁带上，所以他需要重新数字化。为了保持磁带以正确的速度运转，不跳针，他必须在数字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我的手会麻木；如果手一抖，我就得重新数字化所有内容。总之，那简直是一场噩梦。但不幸的是，那年秋天我的状态非常糟糕——我陷入了人生中最严重的抑郁，整个人都像个机械人一样。在那种状态下，我根本无法听《扬卡》。到了1月底，我总算振作起来，写下了一长串关于《扬卡》的问题——我不明白为什么专辑里会有那么多附加内容。

我写了很多问题，也希望能和他聊聊“共产主义”；我们原定于2月24日在圣彼得堡的一场不插电演出上见面。

传记写完后，人们总是很容易妄下结论。尤其是叶戈尔本人曾说过《我们为何做梦？》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但随后我想起了这个故事。有一次我和朋友去谢尔盖耶夫镇旅行，当时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他说：“看看这张专辑的结尾，之后还能写出什么新歌吗？”我勉强地反驳了一下，尽管叶戈尔当时确实没有在创作——而且也不确定他是否还会有新作。就《我们为何做梦？》这张专辑而言，这一切都可以轻易地被推翻。但实际上……他当时正计划用1989年的录音制作一张全新的专辑。我认为，正是这次准备工作，或许成为了他创作全新作品的契机。我不知道。无论如何，2月19日发生的一切没有发生在90年代末或2000年代初，这真是难以言喻、难以想象的美好。叶戈尔创作、制作并完成了这三张专辑——这一切的发生和最终的成果——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防御”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个概念，类似于相关的实验。



Maxim Semelyak

是一位记者，在2000年代上半叶担任 Afisha 的音乐专栏作家，是 Yegor Letov 的朋友，撰写了许多关于民防的文章，并为许多再版唱片撰写了注释。

我接触莱托夫的音乐比较晚——大概是1989年或1990年，我即将毕业那几年。我偶然发现了一盘磁带，里面有三首奥博罗纳乐队的歌：《乐观主义》、《老爹》和《我想英年早逝》。这些歌并不算特别深刻，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黑暗的王国，被光明照亮。当时，我并没有刻意追求毁灭或漂泊。这音乐也没有给我带来压抑或压抑的感觉——恰恰相反，它散发着一股永不消逝的活力。它就像是刚割过的朋克，在我看来，其中更多的是接纳而非排斥。《作家日记》里有一句歌词——我是一个快乐的人，但对某些事情并不满意。我第一次听到莱托夫的音乐时，就是这种感觉，而这种感觉至今依然存在。在我看来，我小时候常看的《水族馆》更像是一部人文题材的作品，而《防御》则恰恰相反，它更像是一部自然科学作品。一切都非常自然，画面感很强，就像在做实验一样。它融合了生物学、物理学和某种化学反应的元素。

应该说，这盘磁带是在马雅可夫斯基大街上一所时髦中学的英语预科班上得到的。第二天，我开始在附近寻找乐队的其他录音，发现奥列霍沃-鲍里索沃并没有多少狂热的追随者。在学校里，只有两三个人听GO的歌，而且他们似乎不太情愿。所以，即使在当时，GO也笼罩着一层被排斥的氛围，个中缘由至今不明。多年后，来自拉博塔·霍乐队的谢尔盖·波波维奇来纽约听了一场演唱会。我们站在那里听着，他评论说一切都很棒，但GO的问题在于他们无法驾驭演唱会上中频——高音和低音都还不错，但中频实在令人失望。由于缺乏相应的教育，我无法深入探讨频率问题，但我当时觉得这很好地隐喻了《GO》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它总是被视为要么过于暴露，要么同样夸张地残酷。1993年的事件之后，这种分歧自然而然地更加肆无忌惮地分裂开来。

我第一次去看列托夫的演唱会也比较晚——那是1994年，在特克斯蒂尔斯基的一个文化中心。事实上，那些年“防御者”乐队只在定居区外演出，地点都是即将拆除的电影院。演唱会气氛热烈——人山

人海，虽然很少发生流血事件，但现场的家具被砸坏了，临时保安人员排成一排站在舞台前，就在乐手面前，还有催泪瓦斯。我记得有一场在白俄罗斯大街体育宫的演唱会，结束后有人就那样躺在舞台前，鲜血直流。还有一场在索科尔的演唱会，演出前，贝尔特·塔拉索夫直接叫来了骑警驱散人群，好让我们进去。那段时间我最喜欢的演唱会大概是在先锋电影院——也许是因为那是我小时候常去的电影院，就在学校对面。当时马赫诺还在乐队里，他们刚刚试演完电影《星陨》里的《红军战士之歌》。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2000年**——一切都始于我对他进行的一次略显荒唐的采访，之后我们开始一起听唱片聊天，不知不觉中，我们聊了起来。埃戈尔一向擅长营造一种不太讨喜的形象，但我认为这对他来说主要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避免与他人接触。他坦言，他之所以不去参加摇滚音乐节，并非因为与音乐节的氛围有什么冲突，而是因为他害怕在音乐节上与同类型乐队的音乐人进行那种如同帐篷般尴尬的互动。当他卸下这副面具时，他变成了一个很棒的人，一个很棒的讲故事的人。与此同时，他所有的故事，通常都完美地契合了他为“GO”乐队所构建的神话；他是一位杰出的神话创造者——这意味着与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我的个人世界观，但或许并没有加深我对“GO”乐队本质的理解。他本人和录音带里的声音一模一样，也完全符合他应有的样子。对我而言，或许唯一对“GO”的真实故事起到关键补充作用的，是他早年为《Oborona》专辑选择艺名时，“Egor”并非唯一选项。STEPAN也曾被考虑过。如果乐队真的选择了这个名字，公众的反应以及乐队的命运将会如何，着实令人好奇。

“列托夫在《奥博罗纳》开篇选择笔名时，‘叶戈尔’并不是唯一的选择。‘斯捷潘’也曾被考虑过。”

我没去看他们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场演唱会——“**Tochka**的电音”——而是去了罗马。叶戈尔突然显得很沮丧：“怎么会这样？”我咕哝了几句，大概是：“真的吗？这真的是最后一场演唱会吗？”他跟我说：“你真是个傻瓜，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演唱会了。”的确，之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演唱会了。一次也没有。

我必须说，我完全理解那些对《**Oborona**》抱有复杂情感的人（包括曾经抱有这种情感的人）的感受，从憎恨（奇怪的是，这种憎恨的人仍然不少）到嘲笑。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尽管《GO》的知名度毋庸置疑，墙上的涂鸦、演唱会上的人群以及其他各种传闻都印证了这一点，但它仍然是孤独者的燃料。这种孤独并非指社交意义上的孤独，而是指聆听这种音乐所带来的意识上的局限。想想看，自从我二十多年前听了那盘磁带之后，我几乎没遇到过几个莱托夫的乐迷。简而言之，寥寥无几。即便《GO》早已被官方认可，即便这里没有人再会被这样的词语、这样的声音、这样的俄罗斯突破、这样的美国迷幻运动吓到，但《GO》中似乎仍然存在着一道重要的屏障，阻碍着人们接触到中频和平静的感知。但幸运的是，我知道有些人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那里。叶戈尔死了，而那些混蛋还在。

GrOb-Chronicles | 《滚石》杂志第11期 (122) ——叶戈尔的镜子

伊戈尔的镜子

在以民防乐队为主题的电影首映前夕（该片上映时间恰逢乐队成立30周年），《滚石》杂志采访了叶戈尔·列托夫的亲朋好友。他们不仅了解他作为音乐家和音乐爱好者的身份，也了解他作为一位拥有强大影响力和既定地位的演说家的卓越才能。

“伊戈尔和我某种程度上都是变异人，”他的兄弟，俄罗斯自由爵士乐英雄谢尔盖·列托夫在电话里谈到“民防”乐队主唱伊戈尔时说道。谢尔盖目前因肺炎住院。“我们的父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辐射。我的母亲和祖母死于癌症，而我出生在大气层核试验被禁止一个月后。或许正是辐射变异导致我和伊戈尔生来如此与众不同？”

谢尔盖·列托夫出版了一本关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苏联非官方艺术的书，名为《佛陀候选人》。其中有一整章专门讲述叶戈尔·列托夫，谢尔盖特意称他为伊戈尔。“我最初并没有打算写这一章，”谢尔盖坦言，“但我哥哥去世已经六年了，现在这个话题不再那么令人痛苦了。我着重描写了他初到莫斯科的经历——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俩都渴望表演。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哥哥也高中毕业了。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进入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甚至在那里上了几个月学，直到因为旷课而被开除。当时他和我住在一起，在马拉霍夫卡和克拉斯科沃之间的一栋木屋里。在那里，我们开始了最初的音乐实验——他打鼓，我吹萨克斯，这让当地人非常不满。”

老列托夫认为他的音乐经历启发了叶戈尔。“那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乐器，”他说，“所以伊戈尔演奏的都是我鼓手朋友、来自兹武基·穆乐队的米哈伊尔·茹科夫——他的第一位老师——制作的各種工业盒子和硬件。”然而，谢尔盖·列托夫和兹武基·穆乐队感兴趣的前卫音乐与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历史只有间接联系。小列托夫只与他们分享了创作方法和解构主义的理念。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成立的主要灵感来源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车库迷幻音乐。列托夫和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于1984-85年使用苏联家用设备录制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尽管该企业规模不大，但音乐家们还是引起了克格勃和兵役登记处的注意：库兹马被派往拜科努尔服役，列托夫则离开了家乡鄂木斯克前往莫斯科。

两年后，列托夫重返西伯利亚，举办了一场名为“阿道夫·希特勒”的音乐会。新西伯利亚音乐节的丑闻之后，叶戈尔很快便与当地所有地下音乐人熟识起来。正是在那时，列托夫找到了他的“战友”扬卡·迪亚吉列娃。在20世纪90年代末，他这样描述两人的关系：“有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就像夫妻一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当然，这和利莫诺夫和梅德韦杰娃相比——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过着非常自由的生活。”录音室专辑《共产主义》、另类的唱片发行方式（唱片在人与人之间传递）、狂热的粉丝以及革命青年——这些几乎就是奥利弗·斯通电影的现成素材。

这部关于列托夫的新纪录片名为《健康永存》（*Healthy and Forever*），由他的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执导，片名与列托夫的同名歌曲以及“卫士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1989年的同名专辑相同。在这张专辑中，乐队火力全开，收录了热门歌曲《我的防御》（*My Defense*），以及一种

罕见的、和谐的斯拉夫风格后朋克与噪音摇滚的融合，这在俄罗斯音乐中实属罕见。丘马科娃认为，她的作品并非一部纪录片式的传记片，而是一部关于一个时代的电影，“关于那个国家，关于共产主义，以及关于与列托夫相关的一切。”

“民防”乐队成立于三十年前，自那时起，俄罗斯摇滚乐坛再也没有出现过比他们更具凝聚力的乐队。叶戈尔·列托夫的乐队的魅力在于营造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统一氛围，如果说有什么能称得上“俄罗斯摇滚”，那非“民防”莫属——车库朋克配上圣愚式的歌词。叶戈尔的这种创作方式，自然也给周围的人带来了不少麻烦。

据列托夫回忆，奥博罗纳乐队在“16吨”这家“资产阶级”俱乐部的首秀引发了一场奇特的闹剧。“叶戈尔来到莫斯科，邀请我去一家书店，他经常在那里进一些‘高雅’的书籍，”独立厂牌Solnze Records的前负责人奥列格·塔拉索夫回忆道，“我们去得比较晚，叶戈尔提议：‘要不我们去买瓶伏特加？’叶戈尔的妻子娜塔莉娅看到酒瓶后，立刻尖叫道：‘完了，明天的演唱会取消了！’结果，演唱会真的取消了。不过，我们还是设法用摄像机记录下了整个过程。这是一场没有演唱任何歌曲的演唱会。‘我才不会在资产阶级面前唱歌！’叶戈尔在台上大喊。”

塔拉索夫说他不会把这段录音给任何人——“反正我这辈子也没剩下多少东西了。”

网上有一段对这场令人难忘的音乐会的描述：“列托夫坐在舞台中央的凳子上，含糊不清地嘟囔着什么，观众们看着他，就像看着动物园里一只珍稀的猴子。大约半小时后，当所有人都入场后，叶戈尔被护送下了舞台。事情大概就是这样。伯特·塔拉索夫记录下了整个过程，并解说道：‘那真是美好的日子……’”

上世纪80年代末，莫斯科正值改革时期，而民防组织诞生地鄂木斯克的人们依然沿袭着旧有的生活方式：告密和追踪不可信的地下组织仍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我认识一位克格勃官员，我们开始谈论列托夫，”莫斯科民防组织DK的创始人谢尔盖·扎里科夫回忆道，“当时我们认识GO，但只是间接认识，我告诉他列托夫是个正常人。他是DK的粉丝，我给他发过一些视频。后来有一天，有人写信举报叶戈尔，说他从事反苏活动。我们及时发现了这件事，派人去鄂木斯克把他带回了莫斯科。我们和谢尔盖·列托夫是朋友，他说：‘我们得救他，否则他随时都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爸爸更喜欢伊戈尔的音乐，而不是我的，”谢尔盖·列托夫回忆道。“他现在八十八岁了。我给他买了伊戈尔所有的唱片，还给他买了一台唱片机，可是爸爸一首歌都听不完——他会哭。所以我只好把唱片都收起来了。”谢尔盖说，小列托夫直到去世都像个“大男孩”，他鄙视剧院，认为那是资产阶级的消遣，还责怪哥哥的音乐太精英化。“你怎么能在只有四十五个人的剧院里演奏呢？我绝对不会那样做，”叶戈尔说道。与此同时，这位“国防军”领导人在日常生活中孩子气的一面，与他在职业事务上的坚定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谢尔盖·列托夫认为，在这方面，他的弟弟叶戈尔已经超越了他。列托夫的公关才能有目共睹，许多人都看得出来，包括一些年轻的左翼政治家，他们经常在自己的竞选活动中借鉴这位音乐家的技巧，有时甚至在叶戈尔遇到困难时也会出手相助。政治家谢尔盖·乌达尔佐夫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采访时说：“1999年，加入俄罗斯劳动党后，我决定实现一个长久以来的梦想，组织一场叶戈尔的演唱会。”乌达尔佐夫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听列托夫的歌，在又一次抗议活动后，他被带到警察局，在那里得知了列托夫的死讯。“列宁格勒电影院的音响效果很好。我骗当局说列托夫像奥列格·米佳耶夫

一样是个吟游诗人，花了大约五百卢布租下了场地，海报上写的是：‘吟游诗人叶戈尔·列托夫’。”

“我刚开始从事创作时，为了避免出现在电视上，我完全用脏话、激烈的政治言论和出格的行为来保护自己，”莱托夫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道。“后来政变发生后，我自称是共产主义者——为了避免任何赞誉。1989年‘墓地狂热’兴起时，我立即解散了乐队（《滚石》杂志注），然后改名，让媒体难以提及我们。你必须尽可能地保护自己，免受投机取巧的影响。”

谢尔盖·扎里科夫回忆说，列托夫刚搬到莫斯科后，他就带他去了《摇滚报》。报社副主编弗拉基米尔·邦达连科立即组织了一场关于俄罗斯摇滚乐和政治的圆桌讨论。“叶利钦当然被抨击了，”扎里科夫继续说道，“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如何试图把他拉进公众视野的，真是滑稽。自由派有自己的格列宾希科夫，而爱国派却没有自己的音乐家。所以我决定把列托夫带到《摇滚报》。我记得编辑部的人说，‘我们不能接受他顶着这样的发型来报社。’他们看到他的发型时都惊呆了。”

扎里科夫声称，叶戈尔初次见面时情绪低落——试图将列托夫打入爱国组织只是为了让他摆脱这种状态。然而，这位“国防军”领导人的危机并非仅仅体现在创作方面。“后来，叶戈尔的父亲让我想办法劝他儿子戒酒，”扎里科夫说，“但你怎么能禁止别人喝酒呢？他天生不是朋克，而是个嬉皮士，他的人生态度也差不多。一点朋克味儿都没有。而且他总是需要和人交流。”

“1999年和2000年，去看‘民防’演唱会的观众简直疯了，”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回忆道，“他们说只有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才会去看‘GO’的演唱会。我们当时在破烂的电影院演出，演唱会期间，电影院简直被撕成了碎片。”在一次采访中，列托夫总结了他当时对理想演出的理解：“我打着节拍，大声呐喊，观众席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人们躺在地上，互相打架，到处都是血。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完美演唱会。”

丘马科娃认为列托夫运用了一种特殊的策略，像间谍一样观察观众情绪的变化。“他把音乐会看作一场战争，”丘马科娃说，“必须牢牢抓住观众的心，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能量交换。”这位民防领导人是在他举办的“俄罗斯突破”系列政治音乐会中掌握了这项技能。当时列托夫意识到，与俄罗斯观众沟通的最佳方式是成为一位领导者和一位极具统治力的演说家。

当面对挤满形形色色人群的大厅时，奥博罗纳的魔力便消退了。2000年代中期，叶戈尔·列托夫的乐队再次走红，奥博罗纳的演出不仅吸引了狂热的底层民众，也吸引了穿着鲜艳T恤、身材肥胖、留着胡子的男人们，他们毫不羞涩地在舞台前拍照——列托夫再也无法以强势的姿态与这些人对话。本质上，列托夫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音乐爱好者、体育迷、艺术家——与这些与他相似的人们展开咄咄逼人的军事对话变得异常艰难。

“伊戈尔刚来莫斯科的时候，我们都留着长发和胡子，”谢尔盖·列托夫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初时说道，“当地的无产阶级非常讨厌我们。有一天，伊戈尔在弗雷泽站下车，几个家伙走过来，骂他是四眼仔，还打碎了他的眼镜。他拒绝买新的，决定就这么顶着右眼里那块三角形的碎片到处走。”谢尔盖回忆说，他哥哥很喜欢讲潘基站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那里有一个标志牌，上面画着旋转的唱片，还有“朋克无处不在”的标语。《伟大而永恒》这部电影正是讲述了那些狂野的岁月。“我们和安娜·齐尔利娜一起拍摄了这部电影，”娜塔莉娅·丘马科娃解释道。“我必须亲自走遍俄罗斯各地，用摄像机采访不同的人。我不敢让别人代劳。有时候，我得拍二三十遍。资金用完后，我们通过众筹筹集资金，所以拍摄那段时期的纪录片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我希望以后能拍续集。”

我们在米拉大街上的Madame Galife咖啡馆见到了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这家咖啡馆是娜塔莉亚自己看完评论后选的。丘马科娃是一位活泼、身材娇小的棕发女郎，一头柔顺的直发，身穿深色毛衣和运动鞋。我们交谈时，她喝了半升绿茶，又点了一份南瓜汤。“我宁愿坐在角落里弹吉他，”娜塔莎回忆起自己走上纪录片创作之路的缘由时说道，“在叶戈尔手下，我从未想过要出人头地。他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和公关高手：早期，他甚至会给记者发稿，印制类似名片的东西。他热爱印刷和摄影，所以这些名片设计得非常巧妙——它们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根本不需要任何公关宣传。近年来，他甚至不再接受采访，只在他的网站上回答粉丝的问题。”

丘马科娃后来被证实是列托夫的最后一任女友。据目击者称，他对待女友更像是朋友，不带任何不必要的感伤。“在我们这群人里，叶戈尔被认为有点性冷淡，”奥列格·塔拉索夫回忆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列托夫时说道，“他总是说，‘没时间！什么性？我们现在在干这个！你居然还想跟我上床。’总之，他有一大堆其他有趣的事情要做。”

“我曾受邀为‘民防乐队’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演唱会预订演出，”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回忆起她与列托夫的初次见面时说道，“但在此之前，1991年，我们在扬卡·迪亚吉列娃的葬礼上相遇。我记得我们当时聊得很投机，谈的不是音乐，而是彼此的生活。他们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们聊的是足球，我当时想，‘啊哈，这些来找我的人真不错；我终于可以和他们聊足球了。’”

与足球迷丘马科娃的相遇，给列托夫的生活带来了一丝和谐。丘马科娃后来成为了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贝斯手（“他曾试图教扬卡和安雅·沃尔科娃弹贝斯，但她们对此并不热衷”），尽管生活中的冲突有所减少，但如何实现自我价值的问题却随之而来，因为叶戈爾的创作方式依然如故。

“对他来说，让伴侣参与他所有的音乐活动至关重要，”丘马科娃肯定地说。“我认为这是与他建立关系的唯一途径。如果我和他没有共同的兴趣，他也会把兴趣分享给别人。但从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能一起演奏。”据丘马科娃说，他对其他亲近的人也有类似的要求。尽管莱托夫天性开朗，但他很少向人敞开心扉。“他其实没什么朋友，”娜塔莎说。“即使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库兹马，也很难称得上是朋友。他更像是‘最好的搭档’。但和莱托夫在一起，永远不会感到无聊。”

谢尔盖·列托夫告诉我，叶戈尔和娜塔莉亚在所有事情上都完全一致。我提起这件事时，丘马科娃笑了。“但我们也吵过架，”她说，“比如足球。我从小就是莫斯科斯巴达克队的球迷，但我和叶戈尔初次见面时，他其实没有支持哪支球队，只是对足球很感兴趣。为了气我，他开始支持莫斯科中央陆军队，说他爸爸是军人，所以他们应该支持军队俱乐部。我们一起看联赛的时候，也各自支持不同的球队，为此激烈争论，甚至摔门。”丘马科娃认为，对列托夫来说，关键在于用言语压倒对方，他总是把对方视为竞争对手。“他的口才磨练得炉火纯青，以至于有时我根本无言以对，”丘马科娃说，“我真想朝他扔东西。”娜塔莎笑着说：“他几乎总是赢。”

如今，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很少演戏：她没有演戏的欲望，也不想让《民防》这部电影破坏她以往的表演记忆。“娜塔莎深深地爱着伊戈尔，”谢尔盖·列托夫说，“我看过她这部电影的初稿，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是个顾家的男人，总是渴望舒适和隐私，而娜塔莎给了他这一切。”列托夫的兄弟解释了叶戈尔不断变换身份（从嬉皮士到革命者，从朋克领袖到喜欢啤酒和足球的安静居家男人）的秘密，那就是他极易受暗示且性格反复无常。“有人会给他讲故事，”谢尔盖说。“过了一段时间，他就会用

第一人称复述这些故事。这从他童年时期就开始了。而且他复述得比原著生动得多。故事也变得更加详尽、更加令人信服。这就是为什么无法通过采访来了解他——他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可能就喜欢完全不同的东西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列托夫的性格和他舞台上的形象截然不同，”他的出版商兼演唱会组织者奥列格·塔拉索夫回忆道，“私底下，他安静沉稳，只有在演唱会上才会展现出他狂暴的力量和能量。他博览群书。即使搬到德国后，我仍然会买和叶戈尔一样的书——Big Black乐队、史蒂夫·阿尔比尼、60年代的车库朋克。他会订购像《Maximum Rock 'n' Roll》这样的西方摇滚杂志，总是能第一时间了解所有最新的发行信息。”塔拉索夫还回忆说，在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演唱会上，会悬挂着一幅印有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和“红色青年先锋队”缩写的横幅，谢尔盖·乌达尔佐夫会在台上宣布开场嘉宾。“但在21世纪初，这支乐队开始走出地下，”塔拉索夫继续说道。“叶戈尔的采访出现在《花花公子》等时尚杂志上——列托夫最初对后者的提议嗤之以鼻，但后来却与撰稿人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成了朋友。但与此同时，‘卫士’乐队严格禁止与电视记者接触。鼓手安德留什金在2004年开始在卢日尼基体育场后台接受采访后被解雇。所有内容在剪辑中都被歪曲了，列托夫因此解雇了他。他是一位非常严厉的领导者，这也导致了乐队阵容的变动。”

谢尔盖·列托夫说，叶戈尔的政治观点也经常变化，这主要是因为他一直渴望站在对立面。“直到1991年，我本人也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这位音乐家说道，“但后来我在西方工作了很长时间，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的想法是错误的。我的弟弟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变——1993年，他参加了保卫白宫的行动，我非常担心他。90年代中期，他加入了激进运动，结识了巴尔卡绍夫和利莫诺夫。但我始终支持他，从未试图劝阻他。到了21世纪初，政治开始让伊戈尔感到厌倦。他拒绝了巴尔卡绍夫和俄罗斯民族团结党的支持，这些人当时正利用这个团体进行宣传。我的弟弟对那些想利用他的人很敏感，他一眼就识破了。他也同样突然地拒绝了我带他接触的前卫艺术圈。”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目前正在整理列托夫的档案资料，准备出版，她几乎投入了全部精力。“当然，对我来说，拍摄一部关于他早年生活的纪录片要容易得多，”她说，“我亲身经历了他后期的种种，回忆起来很痛苦。他一旦陷入危机，就会持续很长时间。”娜塔莉娅回忆说，1997年他们初次见面时，叶戈尔就已经很少写作了，之后直到2002年，他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娜塔莉娅说，“‘俄罗斯突破’运动（旨在创建一个反叶利钦的摇滚运动，最终包括GO、Rodina和其他几支乐队——编者注）以及一些个人问题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一切都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觉得叶戈尔甚至可能会自杀。

“现在的年轻人不懂文字的价值，”列托夫在接受《滚石》杂志采访时说道，他以此调侃酷玩乐队和白色条纹乐队。“尽管所有真正的音乐都源于此：你不仅可能被人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可能丧命，但你仍然可以有所作为。现在你需要写一首歌，歌名不必是普京，而是车臣或达吉斯坦流亡者中的某个具体指挥官。或者，比如说，某个特定的犯罪集团。那样的话，才算写得好！”

叶戈尔·列托夫下葬时身穿一件印有耶路撒冷十字架的T恤，那是他去以色列旅行时买的——他和娜塔莉娅每年都会住在“国家计划”（Gosplan）乐队主唱阿道夫·拉维奇的家中。“2000年代初，以色列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党支部，”阿道夫回忆道，“那时亚历克斯·穆赫第一次把列托夫带到以色列，并组织了一场非法演唱会。叶戈尔特意挑选我们乐队作为开场嘉宾，说我们让他想起了‘国家计划’。演出前，我坐在一家摇滚俱乐部里调吉他。我转过身，列托夫就站在我面前。”

拉维奇回忆说，列托夫初到以色列两周时，他那充满智慧的游吟诗人气质立刻与当地风土人情完美融合。“他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兴趣，”阿道夫说，“他看到什么就能把它变成讨论的话题。一切都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在他去世前一周，我和他聊过，列托夫当时心情极好：‘我雇了个新鼓手，我有很多计划！’”拉维奇认为，关于列托夫酗酒的传闻被大大夸大了（在他面前，叶戈尔只喝啤酒），他一生中唯一接触过的毒品是迷幻药，正是在迷幻药的作用下，他录制了俄罗斯音乐的里程碑式专辑《百年孤独》。

“我五彩斑斓，”莱托夫带着难以掩饰的自信说道，谈及自己的冲动，“我是蓝色的、棕色的、红色的、粉色的、浅蓝色的。今天我说一套，明天又说一套。实际上，我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红队在的时候，我就变成白色；白队在的时候，我就变成红色。”

图片





Chronicles | Novaya Gazeta 第39期 — 解放思想的实验

据这部关于民防的电影的导演称，解放他思想的实验是由叶戈尔·列托夫进行的。

电影《民防：开端》讲述了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团队的故事，拍摄工作已接近尾声。

《新报》记者采访了导演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列托夫的遗孀），谈到了改革时期的共青团员、桀骜不驯的朋克以及解放思想的实验。

这部电影包含大量档案影像和对音乐家的采访。但是，您是否采访过上世纪80年代中期骚扰列托夫的共青团员？毕竟，是他们决定强迫他接受精神治疗，并剥夺他正常演出和录音的机会。

我们尝试联系他们，但他们自然不会理睬我们。他们是傻子吗？竟然暴露身份？他们中许多人现在身居要职，包括商业领域的领导职位。总的来说，那几年的情况很奇怪。改革似乎已经开始，一切都在逐步开放，然后进步派的克格勃和共青团员出现了，他们想要控制整个进程，将其征服。新西伯利亚举办了两届摇滚音乐节。在第一届“奥博罗纳”音乐节上，我们好不容易才上台唱了几首歌，之后音响就被切断了，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迫害开始了，看起来一切都完了，他们要封杀我们，关闭我们的演出场所，切断我们的广播。但到了下一届音乐节，他们却被邀请作为压轴嘉宾。就这样，不到一年，一切都彻底改变了。曾经压迫他们的人，后来却邀请了他们。真是惊人的适应能力。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抓住这股浪潮，这才是未来——也意味着金钱和成功。基本上，他们的想法是对的。还有一点，叶戈尔没有像许多音乐家那样投身其中；摇滚俱乐部、录音室和各种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奥博罗纳”乐队却格格不入，也永远无法融入……但列托夫从一开始就是个孤僻的人。事情就是这样发展下去的。1984-1985年间，他所有认识的人都被传唤到当局，并被明确告知如果继续与他来往将会有麻烦。有些人被征召入伍，有些人则面临大学学业上的困境。所有人都抛弃了他，只剩下他孤身一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的专辑中，叶戈尔几乎包揽了所有乐器的演奏。他一直在逃亡。他会偷偷溜回家，在四天内录完所有歌曲。因为那样一来，他们就会来逮捕他，没收他的录音。

“列托夫和他的乐队出现在乐坛就像一场野蛮入侵。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写道：一群狂野的西伯利亚朋克出现了（与圣彼得堡那些有教养的朋克截然不同）。他们完全无法控制。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需要就朋克的定义达成共识。埃戈尔的音乐鉴赏力极佳，而奥博罗纳乐队演奏的那种粗粝朋克之声并非源于技艺不精，而是一种纯粹的理念。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演奏得干净利落、技艺精湛。只是他们的目标不同——要让听众感到不适，让他们难以接受，甚至感到不安。而他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人们感到恐惧、震惊，一听到第一个音符就想逃离房间。这一切都是为了克服感知惯性。但埃戈尔并非一开始就领悟到这种音乐的真谛。甚至在他早期的录音中，他的嗓音也比后来更加高亢清亮。之后，他通过长期不懈的练习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嗓音。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一种非常陌生和不愉快的处境。创作危险的音乐，游走在边缘状态——这正是吸引他的地方。”

“声音很刺耳，但仔细听，你会发现歌曲很复杂。歌词非常独特，暗指存在主义和奥伯留斯，结构

复杂，概念精雕细琢。而且有很多前卫元素，很多实验性的东西。”

“我想这源于我的哥哥。叶戈尔的哥哥谢尔盖是一位著名的爵士萨克斯管演奏家，比他年长许多。他曾在新西伯利亚的阿卡杰姆戈罗多克物理数学学校就读，这所学校吸引了来自该地区各地的优秀学生。那里弥漫着一种异议的氛围：地下出版物、禁忌音乐。他的哥哥启蒙了他。哥哥把他介绍给一些思想前卫的朋友，送给他合适的书籍和唱片。但叶戈尔始终对知识有着强烈的渴望，甚至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他努力探究万物的起源，追溯源头，探寻根源。正是这种精神塑造了他。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比如，他会阅读罗扎诺夫的作品，看到优美的词句、意象，便将其融入歌曲创作，一切都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转起来。与许多同行不同，列托夫从不直接照搬任何东西。即使他真的很想这样做。我记得他给我弹奏了一首歌，然后说：‘可以。’你听说我抄袭了——比如说——卢·里德的这段独奏？我们拿出原曲对比。我听了一下，发现两者根本没有相似之处。所以，他把一切都在脑海里反复推敲，最终变成了全新的音乐。他自己的音乐。”

“但由于他的音乐和歌词如此怪异，他并不受唯美主义者的欢迎。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公寓楼门口高唱《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音乐厅里挤满了来自工人阶级社区的年轻人。这些尖锐、令人不安、复杂的歌曲引起了最普通听众的共鸣。”

——首先，尽管这些歌听起来很刺耳，但它们的旋律却非常优美。总会有一段副歌、一段过渡，或者某种能让人瞬间沉醉其中的旋律。其次，没错，他们可能听不懂歌词，但很多人潜意识里都能感受到，即使听不出歌词的细微差别。他们只是觉得歌曲背后蕴含着某种非常严肃的东西。我们在挪威演出的时候发生过一个很棒的故事。很多当地人都来了，其中一个正在学俄语的学生举着一块牌子，上面用蹩脚的翻译写着“带我们离开动物园”。这就是《我们将离开动物园》这首歌引起他们共鸣的原因。在舞台附近，一个挪威黑人小伙子正跟着音乐疯狂地扭动着身体，扯着嗓子唱着歌。起初，我们以为他在嘲笑我们。后来才明白，他只是在尽力地用俄语发音。这些歌即使对那些一个字都听不懂的人也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只有到那时，人们才会开始理解。

“然而，它们却非常阴郁。我不知道莱托夫有一首欢快、振奋人心的歌。每一首歌背后都隐藏着痛苦。难道他真的没有感到快乐、感到幸福的时刻吗？”

“哦，当然有。我向你保证，他是个非常开朗的人，我们经常一起玩得很开心。一些最简单的事情：足球、动物、林间漫步、电影。他能完全凭着仇恨的能量创作歌曲，以此回应他周围的不公和暴行。他很容易被某个电视节目激起情绪。他会看完节目——然后立刻写一首歌，整夜都在疯狂创作。歌曲《狗》（“不败的祖国在我窗外翱翔……”）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那是在伊拉克战争轰炸之后。”

“但结果却发现它具有普世意义，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有人在 YouTube 上为这首歌制作了一个视频：他们加入了 1991 年政变、红场阅兵式以及其他一些画面……结果发现它并非关于伊拉克，而是关于我们自己。”

“你可以用任何东西，什么都行。在粉丝自制的视频里，我最喜欢《自由》——他们用马文·希迈耶的一部纪录片做背景。这部纪录片讲的是一个美国焊工被大公司压迫的故事。他开着推土机开始砸毁周围的一切。他毁了很多东西，然后当然就死了。这种事一直激励着叶戈尔，因为这是个人反抗体制、反抗缺乏自由的表现。顺便说一句，他真的很喜欢美国的这一点：人们如此自由，以至于可以做这样的事。”

莱托夫喜欢反复强调，他创作的并非艺术，而是在进行一项实验，旨在将人们的思想从束缚和恐

惧中解放出来。人们也正是这样理解他的歌曲：它们并非音乐，而是行动指南。

“但他从未假装自己是领袖或精神领袖。除了他短暂加入新巴勒斯坦党的那段时间。在我看来，那并非他一贯的作风。他总是被问到：‘叶戈尔，我们该去哪儿？我们该做什么？’我能看出他很不自在。他们总是想把他拉进他们的阵营，拉拢他。后来，一位记者问列托夫：‘你会给一个想从政的年轻人什么建议？’列托夫说：‘或许可以让他养只猫。’这真是个典型的回答。顺便一提，我们家养了三只猫，都没阉割。它们给我们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它们什么都干。”

是的，我知道他的话被当真了，这才是最糟糕的地方。在以色列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全场观众都要求我们唱一首关于“记忆”协会的歌。叶戈尔使劲往后一仰，说道：“我连歌词都记不住了，这首歌很蠢，没什么特别的。”“不，我们要.....”于是他开始弹奏，全场观众都跟着唱了起来。这可是在以色列啊！

尤其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有些人听了《民防》之后自杀了；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但远不止这些。在演唱会上，总会有人走过来跟我讲述音乐如何拯救了他们。比如，音乐帮助他们熬过了军队生活。还有一些更神奇的例子：有人病入膏肓，奄奄一息，有人给他带了一盘磁带，听了莱托夫的歌之后，他竟然活了过来。没错。因为音乐其实并不阴郁。它蕴含着强大的能量；它能鼓舞人心，激励人们奋起反抗。它不是说一切都很糟糕，所以就躺下等死。恰恰相反。当然，一切都很糟糕，但要站起来反抗，坚持下去。最重要的是不要害怕。

扬·申克曼

Chronicles | Siburbia — “这纯粹是形而上学”

“这纯粹是形而上学问题。”

讲述民防组织早期历史的电影《健康永生》（Zdorovo i Vneshne）于11月底大规模上映，两周内便跻身票房榜首，与《星际穿越》、《饥饿游戏》和《高尔基2》等热门影片并驾齐驱。该片由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和安娜·齐尔利娜执导，鲍里斯·赫列布尼科夫担任制片人。发行工作最初可能被视为一场赌博，但最终由Beat电影节的创办者负责。Beat电影节此前曾发行过讲述奥克特森乐队的影片《更多》（Eshchy），并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

我们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民防乐队为何在俄罗斯文化中至今仍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至于一部关于它的纪录片在全国各地影院都场场爆满。但我们决定聚焦于另一个故事。叶戈尔·列托夫的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拍摄了一部关于她加入乐队之前、当时并不认识叶戈尔的影片。为了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德米特里·谢韦罗夫联系了娜塔莉娅，并就她的生活、音乐、那个时代以及列托夫本人提出了一些问题。

电影《健康永驻》讲述了你加入“民防”乐队之前的那段时期。你能否跟我们详细说说在加入“民防”之前，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苏联女学生，父母都是语言学家，怎么会突然开始听摇滚乐、弹贝斯呢？

我1986年高中毕业，那时候我根本不听摇滚乐。也许是因为高中时，我让几个时髦的同学帮我录点摇滚乐，结果弄到了一盘彩虹乐队的磁带。听完之后，我觉得摇滚乐简直就是垃圾，从此就失去了兴趣。

我当时只有一个爱好——马。我像个疯子一样拼命考进了季米里亚泽夫农业学院，那里的马术专业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去了新西伯利亚州的一个养马场实习，这让我的父母吓坏了。

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个马迷，在这个村子里住了整整两年——正是在那里，在村里的俱乐部里，周末那里主要放映印度电影，我看到了电影《窃贼》。这就是电影的力量！我现在甚至记不清剧情了，但加尔库沙和金切夫参演了其中的一些角色。就在那一刻，所谓的苏联摇滚乐如潮水般涌来，将我彻底淹没。之后的一切都发生得很快。1988年，我已经在莫斯科读书了，但我不认识任何圈内人士，所以很遗憾错过了《Syrok》。到了1989年，我已经转向了西方音乐。我认识了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菲尔索夫，他当时会给我发来所有独家消息。我从未想过我的生活会与马匹之外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大一结束时，我拿着证件回到了新西伯利亚。我感觉到那里正在发生一些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事情，一些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尚未被发掘的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我开始接触一些听Throbbing Gristle、My Bloody Valentine或者Sonic Youth的朋友，对他们来说，乐队里有个女生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了。我们在乐队里完全平等。所以，上台表演对我来说相当轻松。

——这是否对你而言是一种个人挑战——对体制、对社会的挑战？你认同朋克运动还是其他什么？

从小我就被迫与体制格格不入：我的父母在当时被视为异见人士，家里总是藏着禁书，晚上我们听西方广播。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孤独，不喜欢任何形式的交往，无论是官方的还是地下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自己是朋克，尽管我一直喜欢激烈的音乐，但我更喜欢怪异、黑暗、非传统的

音乐。那时候加入某个团体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想要找到一些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记得我们团体里有人与权威对抗——我们与他们格格不入更多是因为我们整个生活方式，在那种生活方式里，没有人遵守规则：既不遵守社会规则，也不遵守当时圈子里的规则。我们甚至没有任何明确的偶像或权威。

——电影《健康永驻》告诉我们，列托夫不止一次遭到殴打。在苏联那种对任何不符合“普通人”世界观的事物都零容忍的氛围下，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当然，没人会在街上打我——毕竟我是个女孩。而且，虽然当时所谓的‘非正式人士’看起来和其他人不太一样，但我并没有穿得过于花哨，也没有主动惹是生非——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确实感到很自由；我的世界容不下外人；当时唯一束缚我的就是融入群体和学习的需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假装——在诺沃西比尔斯克，这种压力要小得多。此外，我从未和任何无法理解我的人分享过我的生活。比如我的父母，虽然他们并非事事都理解，但他们能感受到这对我有多重要，比如，他们就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把贝斯。”

你第一次接触到叶戈尔·列托夫的乐队是什么时候？我记得好像是1989年？当时，从美学和意识形态上来说，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Oborona是在一场纪念谢利瓦诺夫的音乐会上，但那时我对本土音乐还很陌生，不认识这个乐队，而且音响效果极其糟糕，根本听不清歌词、旋律，也听不出任何和声。我当时坐的位置也很糟糕，除了人们在座位上晃动的屁股什么都看不见。但在1989年的圣彼得堡摇滚音乐节上，我几乎已经得出结论：这里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你只能听西方的音乐——然后就发生了那场音乐会。三个人在演奏，几乎纹丝不动（不知为何我的记忆就是这样），但那种能量却如此震撼人心，我当时就吓得魂飞魄散。说实话，我之前之后都没见过这样的演出——直到现在也没见过。我立刻意识到，这是世间最真挚的事情——一个活生生的奇迹。”这无关美学或意识形态，完全无关；那纯粹是形而上学。在读莱托夫在《反主流文化》杂志上的访谈之后……我感觉自己好像掌握了某种特殊的、秘密的知识。这种感觉持续了很久。

——1994年11月25日，在诺里尔斯克的一次采访中，列托夫说他的妻子与他政治观点和音乐品味完全一致。然而，你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一直意见一致吗？

“如果是1994年，那我们说的就是纽里奇和安娜·沃尔科娃。我们在音乐上有很多共同点，但并非完全一致；至于政治观点，1997年的时候，我们完全不同。我已经说过，我不可能加入任何政党；我一眼就能看出任何结盟背后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政治是个非常棘手的领域；你不太可能了解全部真相，而且我觉得那些处处步调一致的人很可疑。起初，我们为此争论不休。但后来叶戈尔对政治渐渐冷淡下来，当被问及他的政治倾向时，他会半开玩笑地回答说：‘我属于俄罗斯迷幻党。’”

——你的父母是学术界人士，他们是如何看待叶戈尔的？他们如何看待他的人生观、诗歌和歌曲？

“我的父母是普希金研究学者，精通古典俄罗斯文化和其他文化，而且在这方面非常开明，他们当然立刻就认识到叶戈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并且非常了解我。

——语言学家加入《民防》剧组是否对该剧组产生了任何影响？总的来说，你认为你个人的影响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出身和教育根本无关紧要。但我的外貌.....当叶戈尔邀请我加入G.O.乐队时，乐队已经陷入困境——成员之间缺乏团结和情谊。你能感觉到乐队成员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对未来感到茫然。当时我并不知道阵容变动已不可避免，但或许我的加入加速了这种疏离感，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一起。但总的来说，不仅是后期，早期也是如此（从其他人的描述来看），除了叶戈尔之外，只有库兹马对乐队有影响力，而且即便如此，也主要体现在录音方面。”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乐队的每个成员都会贡献自己的力量，略微改变乐队的风格——例如，萨沙·切斯纳科夫在热尼亚·马赫诺去世后加入“防御”乐队，或者帕沙·佩列托尔钦在某个时期取代了萨沙·安德留什金。

— 在胜利电影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继续进行独立创作时，您说您已经有了想法。您未来的创作计划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仍然想做一些能延续叶戈尔遗志的事情，我正在尽我所能去实现它。这件事仍然困扰着我，我至今仍无法摆脱它。而且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摆脱它。自从叶戈尔去世以来，除了在Oborona乐队的工作之外，我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其他项目中担任音响工程师。”

当人们谈论你时（无论是记者还是普通民众），他们常常会加上“叶戈尔·列托夫的遗孀”这几个字，然后才明白他们说的是谁。恕我直言，你难道不觉得厌烦吗？

“是的，我似乎永远也无法摆脱这个标签。很少有人会用‘妻子’这个词来称呼我，而不是用那种刻意悲伤而正式的‘寡妇’。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词并不适用于我。它们只是标签而已。”

在电影《健康永驻》的开头几分钟，片中人物将西伯利亚称为“偏僻落后的地方”、“残酷的地方”。当你回到新西伯利亚时，你会想到什么？

——我在新西伯利亚感觉像在家一样。这不是一种感伤的感觉，既非好也非坏——而是一种不同的感觉，一种我记忆中心转移的感受。最近，我来这里的次数减少了，这种感觉不会在看到“家乡的灯光”时立刻涌现，而是会在之后慢慢浮现：首先，我会突然想起小时候第一次来这里的情景——一个完全陌生、可怕、遥远的地方。就像电影开头那样：地图上的一个点，位于冰天雪地的沙漠中央。当时我就是这么觉得的。现在对我来说完全不同了——更像是夏天，炎热、尘土飞扬，却又充满原生态气息。或者春天，神秘、尘土飞扬.....我们刻意强化了这里终年暴雪、毫无生机的刻板印象。但事实是，这里的人不一样——这一点毋庸置疑。我无法解释清楚，但他们和西伯利亚欧洲部分的人不一样，也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的人不一样。它有点像是乌拉尔山脉以东的“莫斯科”，类似那样。

甚至在遇到“国防军”之前，在诺沃西比尔斯克，你和安娜·齐尔琳娜就注意到周围的人演奏水平都很差，很无聊。于是你们开始组建一支朋克乐队。现在——又是和安娜·齐尔琳娜——你们拍了一部关于叶戈尔·列托夫的电影。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导演（编剧、记者？）能拍出一部像样的关于民防的电影？

“我们加入之前，乐队的名字就叫“Party Chiefs”，当时已经叫这个名字了。帕沙·佩列托尔钦也在那里，他是世界上最棒的人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教我弹贝斯。多年后，他又和我们一起在‘Oborona’乐队演出；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叶戈尔去世后，我在音乐界有很多朋友和熟人，但在电影界却不多见。安娜当时已经在电影行业工作，她让我相信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拍出一部好电影——尤其是我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影像资料、文件和照片。事实证明，很多人都关心这个题材；大家开始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奇迹般地，对叶戈尔和《G.O.》的热爱将许多人团结

起来，最终促成了这部电影的诞生和上映。我非常感谢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也敬佩他们。我现在就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了——几乎每个人的名字都出现在了片尾字幕里。”

——宣传您的电影时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您观察到观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如何？

“其实，除了某些素材的使用问题之外，并没有遇到什么特别的困难。首先，预算有限，我们无法使用所有想用的音乐——例如，我们负担不起版权费用的西方音乐。其次，突然通过的禁言法让我们陷入了困境：早期的《辩护》几乎没有非脏话歌曲，而脏话词汇在列托夫的诗歌创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

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各不相同，例如，他们会受到与故事人物的个人联系或对当时事件的认知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大多数人都觉得这部电影有趣且必要。我知道很多人甚至不止一次地观看过。”

— 在新闻发布会上，您提到计划用已拍摄的素材和档案影像剪辑另一部影片，继续讲述叶戈尔·列托夫及其团队的故事。但这样一来，您就必须讲述您参与其中的经历。您目前对如何呈现这段经历有什么想法吗？

“目前我只知道，这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讲述。很难具体说明会如何变化。当然，我有一些想法，但现在分享还为时过早。我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一切都会更加困难，尤其因为这一次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我希望我们能找到出路，不要半途而废。”

Chronicles | 采访 — Natalia Chumakova: 这是关于一场蔓延全球的音乐战争的音乐。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是那些关于战争的音乐走向了世界。

11月19日，讲述“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故事的电影《健康永存》（Healthy and Forever）将首映。该片由叶戈尔·列托夫的遗孀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和安娜·齐尔利娜联合执导，鲍里斯·赫列布尼科夫担任制片人。我们邀请丘马科娃谈谈这部电影的真正内涵、当时的社会环境、列托夫的音乐作品以及他的歌曲背后的真正含义。

问题：鲍里斯·赫列布尼科夫

我看了你拍这部电影的过程。你做了很多采访。我感觉你好像在试图向自己解释些什么。

没错。虽然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想明白。也许这样最好——比如说，如果拍了续集，就能拍更多的人了。我拍了40个人，可能更多，最后只有10个左右。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会失望，但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拍进去——我只能精简到最关键的部分。

我真的很想捕捉那些身处其中的人们。这部电影的重点不在于叙述具体事件，而在于捕捉当时的氛围。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有着非常深刻的感受——既令人恐惧又令人美好。专家或许并不合适，因为他们会把那种感受转化为文字和描述，但我想要捕捉的是那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影片拍摄了那么多素材，努力重现那个时代。

我非常喜欢它。令人欣慰的是，见证者们并没有试图去描述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反而自然而然地表达了出来。这是一段生活片段，奇迹在此发生。如果是在智者和乐评家面前，我可能不会感兴趣，因为他们会试图为它寻找某种美学基础。但这里最美妙的地方恰恰在于它的无言。

这真是妙极了，因为当有人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姿态开始反思时，他们简直是在撒谎。你该如何描述当时如潮水般涌来的情感呢？尤其如果你是一位音乐家，一位对文字毫无兴趣的人？音乐家会立刻察觉到其中的虚假，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

这部电影有两个阶段：A 阶段，即你构思这部电影的时候；B 阶段，即电影拍摄完成的时候。你最初计划拍一部怎样的电影，最终它又拍成了什么样子？

我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完全一头雾水。没有起点，只有一堆杂乱无章的想法和念头。感觉好像会围绕着这个那个展开。我需要从中梳理出一个连贯的故事。我想开始和人们交流，倾听他们的想法。在此之前，我所拥有的只有自己对时间的理解，以及叶戈尔告诉我的那些。他去世后，我需要找到前进的方向——我不想强迫任何人接受我的观点；我想让他们自己告诉我。因此，安娜（齐尔琳娜）对那个地方和那个时代有着她自己截然不同的理解，尽管我们都来自新西伯利亚。基本上，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请详细说说。

我们原本以为影片中不会出现政治或时代印记，但结果却发现，没有这些元素根本无法营造出影片的氛围。影片将苏联时代与某种即将到来的、无人理解的事物并置，这种并置显得十分突兀，但我不会说它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也曾设想影片会更多地聚焦于扬卡以及她的遭遇。直到影片结尾，这个主题都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但它最终呈现出的格局过于宏大——实际上，它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独立的电影。有些内容显得格格不入，有些则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我不想让影片过长；与其冗长乏味，不如留下一些未完成的遗憾。最终，影片的时长完全符合我们的预期——一个小时二十分钟。

那么，社会变革的故事又该如何讲述呢？苏联曾经存在，后来苏联解体了，共产党人不再是共产党人，苏联的政治也不再是苏联的政治了。列托夫的歌里充斥着这些词汇，但我一直觉得他的歌并非意在表达这些。

是也不是。他后期的作品，尤其是在最后一张专辑里，也同样是关于战争和斗争的——但如今的视角已扩展到全球层面，不再局限于任何特定主题。它既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同时又本质上关乎更为宏大的主题。总的来说，“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都只是标签和暂时的断章取义。它们固然重要，但却无法完全定义任何事物。

在我看来，就连标志性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或“少校脚下有冰”似乎都与此有关，但实际上它们是描述魔幻现实主义的素材。

他创作的歌曲总是源于当下触动他的事情，但又总是超越具体细节。《少校脚下的冰》讲述的是当局对他们施压和迫害的故事。但最终，一切都被提升到了另一个层面。讽刺意味十足的《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立场的转变，才开始被人们直接理解。这些略带推测性的作品将他所做的一切都简化为琐碎的、转瞬即逝的故事，但这并非全部。这股勇气，这声呐喊。我亲眼见证了他如何创作诗歌——一个词句或一个情境吸引了我的注意，然后从中涌现出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概括。

有人看到一篇报纸文章，报道一名警察刺死了一名婴儿。舍夫丘克会就此写出一篇直白、描述性的文章。而叶戈尔·列托夫、列斯科夫或马尔克斯则会从中看到启迪或幸福的画面。为什么呢？

你还必须处于某种特定的状态。一种非常特殊的创作状态。叶戈尔称之为“狩猎”。他狩猎世间万物的印象。他望向窗外——人们来来往往，其中一个人的举止怪异，或者穿着奇特，比如，他手里拿着一把机关枪或一个造型奇特的小手提箱。一幅画面就此诞生。或者，它源于一句凭空出现的短语——比如“天空像咖啡”。起初，如何将其转化成文字并不清楚。他记住这些片段，然后漫步于森林之中，在脑海中反复琢磨，将一幅幅画面串联起来，最终创作出一段文字。

我去了佩特拉·奥斯米尼纳街，漫步穿过一个庭院，庭院两旁是几栋五层小楼。我站在入口处，看着墙上画着小熊维尼的锅炉房——一个非常普通的镶板房间。你说的“森林”，难道不是指林带吗？我没找到。

并非如此，那是一片广袤的森林。叶戈尔一两岁时，他们就开始住在那里。契卡洛夫斯基居民点位于鄂木斯克郊外，森林就在第一批房屋的后面。起初，房屋寥寥无几，但随着社区的发展，森林被推到了铁路的另一边。在早期的《民防》照片中可以看到它。那里有工厂，工厂林立，还有通往工厂的道路。有一段时间，森林离家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但不得不承认，这仍然不算远。叶

戈尔几乎每天都可以去那里。他在那里长大。小时候，他会独自一人，或者和父母、兄弟一起去那里；长大后，他会去得越来越远。他认识那里的每一棵树。那里有一些地方与神秘的经历联系在一起。神奇的经历。幸运的是，这些经历真的无法再找到了。这片森林最终几乎成了他继续创作的唯一场所。然而，有时他也会在旅途中写作——画草图，记下别人的句子，然后回家整理。我觉得他需要这片森林。如果他离开了鄂木斯克——许多人认为他应该离开——他或许就彻底停止写作了。

可能甚至不是来自鄂木斯克，而是来自契卡洛夫斯基定居点。

我们基本上搬出了那里。这其中或许有些神秘色彩，因为他一个半月后就去世了。但说实话，新房子就在附近。我们本来可以继续去树林里散步。但搬家期间，根本没时间。再说，叶戈尔真的相信这是他的最后一张专辑。他当时没心情再写任何东西了。自从搬进去之后，我们就一直在买仙人掌；他从小就梦想着能养仙人掌。新公寓终于给了他这个机会——它有一个很大的窗台。

整个扭曲的俄罗斯世界秩序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上：如果你想做任何事，就必须搬到莫斯科。很多不愿搬去的人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许多人害怕得到不好的东西，或者失去某些东西。这种想法是否曾被明确表达过呢？

当然，但更多的是从更实际的层面来说。我们在鄂木斯克从不举办音乐会，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没人打扰你。本质上，他想待在原地，并非特指鄂木斯克——他并不特别喜欢那里，事实上，他对其他城市也没什么好感。他想待的地方，是西伯利亚，是与城市无关的某些东西。叶戈尔很喜欢旧金山；他说那是他唯一能居住的城市。另一方面，如果他真的住在那里，也许他也会说他不想要住在那里。他梦想着住在森林里的房子里，但很明显，那只是个乌托邦。至少在我们国家，这很难实现。至于莫斯科，我理解那些离开的人。我自己也差不多六年前离开了这里。我在这里生活的时间和我拍电影的时间一样长。在鄂木斯克，做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作家、诗人或艺术家可以居住在我们国家的任何地方，这不会对他们的创作造成任何阻碍。一旦他们与产业界建立联系，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可惜的是，远离中心地带的地方，在技术方面远远落后。

我不想拿任何人跟任何人比较。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歌手”概念。维索茨基似乎令人畏惧，而我认为完全无害的舍夫丘克却被视为叛逆者。所有摇滚乐对我来说都无害，但“民防乐队”却始终是一支危险的乐队，而且是那种最纯粹意义上的危险乐队。这怎么可能呢？

真正的诗歌不仅以宣言式的方式传达这种“危险”，更将其融入自身的本质之中。我认为，维索茨基至今仍然具有危险性，但不知何故，他们却设法抹杀了他。他的反叛精神被过度渲染，最终被大大轻视了。

《民防》与其他所有影片都有着本质的不同。为什么呢？

诗歌、音乐和人声的结合，蕴含着某种无法用理性或语言解释的东西。它们触及人们内心深处极其敏感的角落，那些人们或许恐惧、或许不愿承认的角落。人们要么立刻变得咄咄逼人，不愿承认这一点；要么恰恰相反，立刻领悟。喜爱“GO”的人大多是孤独者，他们感受到剧烈的痛苦和某种疏离感。即便看似富裕的人也可能受到伤害。这非常奇特。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敏感度和对未知的开放程度。

对叶戈尔而言，最重要的是与超越尘世、与应许之地的联结。鲜有人敢于踏入其中探索，但每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很难用语言描述。一旦你把它写下来，它就失去了意义。它存在于意义的交汇点。你看着一幅画，会哑口无言；要么你看到了，要么你没看到。叶戈尔的文字也是如此。而且，总的来说，他的文字不需要复杂的解读。一切无需解释，便已清晰明了。

没错，但你总是想表达出来。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我38岁才第一次听到《民防》（Civil Defense）。我甚至都不知道《一切按计划进行》（Everything Goes According to Plan），但我很庆幸自己遇到了这首歌。我不确定如果我年轻时就听到它，是否会有那样的理解。现在我清楚地感受到，即使是最恐怖的歌，比如《普里格斯科克》（Pryg-skok），也是关于快乐的。他们所有的歌都是关于快乐的。这就是你说的。当你不再害怕，勇敢地踏入危险，你就会感到快乐。你会感受到一种无意识的欣快感。

年轻时的叶戈尔常常无需任何拐杖或兴奋剂就能体验到某种特定的状态。他会漫步在契卡洛夫斯基村，一股幸福和爱的洪流便会涌遍全身。他会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走在街上，一个小男孩对他的母亲说：“看，多么英俊的男人啊！”他身上散发着这种气息——显然并非源于外在的俊美。这一点在器乐作品中尤为明显，例如《蕤之歌》或《圣徒离开人世荣光，遁入沙漠》。

我说他直接与整个超验世界对话，这并非夸张或比喻——这是事实。我们彼此了解之后，我惊讶地发现，他在现实生活中与他的歌曲如此相似。我一直以为歌曲都是夸张的表达。当他在采访中说你需要超越自我，你读到这些话时，可能会觉得那只是华丽的辞藻。他鞭策着别人，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可能沉溺于其他事物。然后你会发现，他本人正是如此，而且总的来说，他也要求别人做到这一点。他的一生都在追寻那种感觉，并试图将其表达出来。他说他本来可以成为诗人或音乐家以外的任何职业，但他选择了这条路。他认为这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所以他为此潜心钻研了很久。起初，他的诗歌并不完美，但他坚持不懈地创作。他试图捕捉的情感与他表达方式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最令人惊奇的是，他总能在前一天平凡的对话或事件之后，于清晨迸发出一首新歌——仿佛发生了什么事，不可思议的事物瞬间绽放，如同烟火、流星、彩虹。突然间，万物都开始运转。而这些顿悟，正是所有真正诗歌赖以建立的基石。

你的意思是说，与某种神秘能量连接并非比喻，而是一种世俗的体验。我明白神秘的事物无法描述，但世俗的事物又该如何描述呢？

他是如何做到的？这始终是一种强烈的体验，与许多不同的事物息息相关。很长一段时间里，埃戈尔早期的所有诗歌，甚至可能直到他的最后一张专辑，都是在极度愤怒的状态下创作的。某种东西让他近乎疯狂：某种境况、某个故事、他自身世界或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某种东西彻底让他抓狂，而他正是在这种绝望中写下这些文字。最后一张专辑则完全不同。他终于达到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在追寻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创作这张专辑的两年里，他变成了圣人——他只是捕捉到了一种此前一直与他擦肩而过的感受，并将其表达了出来。

究竟是什么促成了某首作品的创作，其实并不重要。例如，他是在观看了一部关于惩戒营的电影后创作了《227号命令》。正因如此，这首作品才如此具体。这些因素构成了框架，如同阶梯一般，引领我们走向彼岸。你必须探索你所窥视的现实，才能尽可能地深入，并在自己的意识中回归。显然，我们会完全进入某个自由自在的维度，并且永不返回。深入洞察的能力是一种需要逐步培养的技能。

在某些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他是个非常努力的人，包括他自己的作品。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乐队都挺模仿的，跟一些现有的同类乐队非常相似。我理解崔和格列宾希科夫的创作理念，我能听出

来；有时候他们的歌甚至都是翻唱。我在英语或美国音乐中都找不到类似列托夫的风格。但奇怪的是，我却能在苏联流行音乐中找到一些类似的元素。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他不模仿任何人；他只是听了很多。如果他注意到某个主题，就会把它发挥到极致，以至于面目全非。如果他喜欢某种声音，他总是想方设法引用它。他会记下所有听到的东西并加以诠释，但他更像是一个思想的收集者，而不是特定声音的收藏家。此外，你必须明白：在那个年代，录音设备非常糟糕，根本不可能达到理想的音效。我们那些想模仿西方乐队的乐队需要特定的吉他、特定的效果器、特定的录音棚。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失败了；他们无法复制那种效果。但有些人成功地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叶戈尔非常热爱苏联流行音乐。例如，佩斯尼亚里乐队。《星辰》这张专辑就是献给所有这些的，而《共产主义》的专辑中也有很多引用和致敬。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歌曲和乐队。

我非常喜欢这种既排斥苏联的一切，又对它抱有某种喜爱之情的矛盾态度。这让我想起了老赫尔曼，他出身于一个非常成功的苏联家庭。他对苏联的描述充满了憎恨，但却又极具魅力。这个世界既令人恐惧，又充满魅力，而且无比真实。

人们在苏联快乐地长大，因为他们年纪小，对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充满热情。然后，他们把这些美好的事物带入自己的世界。叶戈尔从未否定过这一点；他反对所谓的社会主义，因为那完全是虚假和虚伪的。

我觉得这只是童年经历的影响，也跟周围的环境有关。那些声音无论如何都会以某种方式传进来。

他热爱古典音乐，也懂爵士乐，但他的世界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种天真的认知之上——他非常喜欢那些稚嫩的艺术家和美国车库摇滚乐队。顺便一提，我们苏联的许多乐队也与之类似。叶戈尔能够以既饶有趣味又充满爱意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当他把这些元素融入《共产主义》这张专辑时，他并没有嘲讽它们。有些歌曲就像拼贴画的一部分，将一些非常亲近和珍贵的事物与丑陋和愚蠢的事物碰撞在一起。毕竟，这就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生活。我们对现实的感知非常局限；一方面是官方，他们只会喊口号；另一方面是生活，它超越了官方，与官方毫不相干——而生活本身充满了美好。好的电影和书籍是稀罕物；人们有时会远赴异国他乡去寻找它们，而当它们落入手中时，那真是一种莫大的喜悦和幸运。这就是他世界的一部分。透过别人的窗户听到一些能引起共鸣的东西，或者弄到一本之前连地下出版物都找不到的《弗维登斯基》初版，这些从一开始就没什么革命性可言，也没人反对政权。起初，这仅仅是对某种东西的探索——他们觉得它就在那里，从西方窥视着。人们在黑市上寻找音乐——他们去“巴尔基”（balki），也就是唱片交换市场。摇滚乐和前卫音乐仍然设法突破了重重阻碍。有趣的是，那些克格勃特工自己也听这些音乐。列托夫被捕后，他的收藏被没收，但再也没有归还。我想那些甚至都不是唱片，而是磁带。他们以检查反苏元素为幌子，没收了一大堆新浪潮、朋克、后朋克——他当时正在听的所有音乐。显然，他们自己也需要这些。

有些人完全否定苏联时期的一切，包括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我曾经也有过这种想法，但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转变观念。

我不知道还能问什么。或许你还有什么想告诉我但我没问到的？

我想表达我的感受，但用语言表达太难了，尤其是在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今天阳光明媚。我

记得很多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一起去森林，漫步在莫斯科或巴尔的摩的街头。那里也有美丽的森林。用语言表达又有什么意义呢？但那种爱的感觉，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在那里。他自己也是如此——他要么带来彻底的幸福，要么带来地狱般的黑暗，那种即将迸发出诗意却尚未爆发的状态。那时他诅咒世间万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每个人都躲在角落里避开他。他浑身颤抖，恨意涌上心头。我一直知道他即将写出什么，我只能等待。

但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记得在开始拍摄这部电影时，我努力让自己沉浸在当时的时空感中。我想起了西伯利亚的春天，积雪厚重融化，上面覆盖着从树上掉落的树枝。你走过那里，会留下湿漉漉的脚印。空气寒冷，但已然有了春天的气息。这就是我对那个季节的印象。

棺材编年史 | Afisha — “这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电影”：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谈《健康永生》和叶戈尔·列托夫

“这是一部反映时代精神的电影”：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谈《健康与永恒》和叶戈尔·列托夫

下周，讲述叶戈尔·列托夫和民防运动早期故事的影片《健康永存》将在全国上映。奥列格·科罗尼采访了该片导演和列托夫的遗孀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谈到了这部电影、大卫·杜楚尼以及足球。

这部电影是如何一步一步制作完成的？

2009年秋天，负责组织“2morrow”电影节的阿列克谢·梅德韦杰夫问我：“有没有关于列托夫的影片可以在电影节上放映？”当时并没有，所以他让我收集一些素材。我当时有一台小型摄像机，花了很多时间拍摄列托夫的各种巡演、他的音响效果等等。于是，我和塞梅利亚克想出了一个主意：把我用摄像机拍摄的素材片段，以及其他一些与列托夫相关的档案资料剪辑在一起。我们制作了一个40分钟的短片，并在电影节上放映。这就是“叶戈尔·列托夫：电影项目”的由来。与此同时，我们也萌生了用这些素材拍摄一部纪录片的想法。我们一直在等待感兴趣的人，但一直无人接手。虽然有一些邀约，但要么不切实际，要么与我们的想法不符，所以我和安娜·齐尔利娜决定自己来制作这部电影。我们开始进行采访，同时收集与《国防》一书以及那个时代相关的各种照片和视频资料。这部电影耗时五年才制作完成。

— 你是在镜头后面进行采访的吗？

- 是的。

——所以，你和安娜·齐尔利娜一起完成了所有工作？包括剪辑？

“绝对没有。弗拉基米尔·扬多夫卡，一位资深的电影导演，亲自剪辑了这部电影：最终版本是他自己制作的。他和安娜找到并插入了大量与剧组无关的素材，这些素材超越了对白，创造出滑稽、惊悚又极富诗意的画面。我很少干预这个过程。”

这部电影完全是用众筹筹集的资金制作的吗？

“不，一开始我们都是自己拍摄的：我们辗转于各个城市，所有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的。后期制作时，我们才意识到需要好的音效和特殊的胶片拷贝才能在影院上映，于是开始筹集资金。这些都很贵，所以我们才寻求外部帮助。当然，我们真的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但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钱。”

— 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这部电影最终的成本是多少？

“很难说。我们通过众筹筹集了大约一百万卢布，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没有计算过花了多少钱。”

——这部电影的参与人员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比如政界人士，或者像列夫·列先科这样的人？

— 一些名人也进行了投资，其中包括一位知名的政治人物，但我无权透露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是匿名投资的。

— 你认为这部电影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

“我并不认为需要这样划分。当然，我们最初的想法是一回事，但最终呈现出来的东西却完全不同。结果当然是出乎意料的。素材最终引领我们走向了它自己的方向。它变得更加含糊，更具隐喻性；叶戈罗夫的风格决定了叙事走向；一些主题在创作过程中浮现出来，而另一些主题则恰恰被搁置了。”

— 作为纪录片的创作者，你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创作一部纪录片吗？

“不！任何对文献感兴趣的人都可以在谷歌或各种网络文章中找到相关信息，但这部电影更侧重于展现时代精神。你看，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概念，但我仍然想传达一种能够引起鄂博罗诺夫党人时代感以及其他角色共鸣的情感。”

——有拍摄续集的计划吗？这部电影讲述了乐队的早期岁月。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打算只拍早期的故事。后来我们意识到，即使是早期的故事，也无法涵盖所有内容。很多情节都必须删减。素材实在太多了——实际上，它完全可以拍成一部八小时甚至二十小时的电影。我们很快意识到，我们需要把重点放在GO早期阵容解散的那段时期，然后再考虑拍摄续集。”

— 你认为这部电影的目标受众是谁？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观众，还是任何人都可以观看？

“可以是任何人。甚至可能是对乐队历史完全一无所知的人，因为在我看来，Oborona 本身的作用超越了所有理性，超越了任何逻辑，直接作用于潜意识。”

了解艺术家的生平对于欣赏其作品有多重要？

“了解人物传记几乎总是会彻底改变人们对作品的理解，有时会增添色彩和深度，有时则恰恰相反。通过了解人物传记，人们可以以截然不同的方式体验同样的事物，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是如此，它或许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强调某些方面。”

— 你是否同意，Oborona 的粉丝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地下通道里唱“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的人，另一类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我不知道。我觉得Oborona的歌迷很难归类。他们当中有观点、教育背景和职业各不相同的人。这完全是个人化的体验。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歌曲中听到一些非常熟悉、非常私人、非常私密的东西。而且他们听到的东西往往与其他人听到的截然不同——这或许是因为叶戈尔毫不留情地深入探索了人类意识和本能中那些人们自己都未曾意识到存在的迷宫。”

— 你认为那些喜欢和“GO”乐队成员互动的观众会去看这部电影吗？

“每个人对乐队的态度都是非常个人化的，即使是对那些看似随波逐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有些人根本察觉不到这一点，只觉得乐队很有意思，很酷！也许他们不会去看，因为他们并不关心是谁做的，也不关心这一切的意义。”

— 这部电影实际上讲述的是早期的故事，那才是最精彩的。

那又怎样？比如说，我知道当 Oborona 从电影院转到票价更高的俱乐部演出时，确实有些人退出了，因为他们不在乎是去看演唱会还是只是和朋友出去玩.....但这并非普遍现象——这些人只是和 Oborona 没什么特别的联系，他们只是喜欢那种朋克氛围。对他们来说，Oborona 和其他朋克乐队没什么区别（尽管 GO 乐队总体上根本就不是朋克）。

正如你之前提到的，这支乐队吸引了广泛的粉丝群体。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对《GO》这张专辑持续保持兴趣？

因为她是最好的，仅此而已。

——这可以理解，但这种兴趣背后是否还有其他外部原因？也许是因为时代背景？这部电影本身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今社会产生共鸣？或者你一直想尽可能地与这一切保持距离？

“也许我的确这么做了。但这仍然会引起共鸣。事实上，GO 乐队并非专门针对这个时代或当下发生的事情，而是针对一直以来都在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影响着个人和世界，因此它会影响每一个听众。尽管现在或许正是关注这些事情的更恰当时机。”

——所以，这部电影确实包含了苏联后期和当今时代的横截面？

——极少。恰恰是因为我们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不断地相互重叠。

— 之前有过关于和戴维·杜楚尼合作拍摄广告的讨论。他们有没有要求在广告里加入“GO”这个词？

“是的，确实有过这样一段情况。倒不是说他们要求太多，但他们确实提出了这样的条件。我们拒绝了。”

- 为什么？

因为它既愚蠢又粗俗。

— 你认为这会损害乐队的声誉吗？

“不，没有什么能再损害乐队的声誉了，因为无论你怎么看，GO 乐队就是叶戈尔·列托夫，这一点显而易见，没有什么能让他名誉扫地。但那样利用他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让列托夫出现在广告里简直荒谬。”

——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您能告诉我电影《Srok》发生了什么事吗？影片结尾，记者奥列格·卡申演唱了歌曲《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结果这部电影就因此从 YouTube 上被删除了。

“这其实是个挺无聊的故事。这部电影被下架是因为创作者违背了版权继承人的意愿，在电影里加入了那首歌。简单来说，谢尔盖·列托夫坚决反对。他公开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而且他有权这样做——无论我们对法律和版权本身的看法如何。”

“叶戈尔·列托夫亲笔签名”系列新书正在出版。这本书的目标读者是谁？出版的必要性何在？

“这是写给那些对歌曲和诗歌创作过程感兴趣的人的。叶戈尔非常喜欢研究别人的草稿，因为他自

已在歌词创作上也一丝不苟；他对创作过程充满热情。如果有人想了解叶戈罗夫的歌曲是如何诞生的，可以通过出版物找到答案。列托夫奉行一个原则：索取与给予。分享一些技术细节也很重要。此外，他的手稿本身就非常精美；其中包含绘画和珍贵的照片。还有大量未发表的草稿也值得出版。这大致相当于出版著名画家的素描作品。这对于艺术家在世间的生存而言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如果作品不被发表，不被讨论，那么它们就仿佛不存在。你可以把作品藏在抽屉里，把一切都藏起来，然后束之高阁，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谁会看到、会听到它们呢？毕竟，人们写作就是为了这个。即使他们的作品可能要等到死后才会被人听到。”

— 让我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足球吗？

- 是的，非常喜欢。

你支持谁？

——为了斯巴达克。唉，现在谈起这件事真让人痛苦。我又能怎么办呢？

— 在GO论坛上，列托夫表示他支持莫斯科中央陆军。你们在这方面有过任何分歧吗？

“当然，这才是关键所在——不仅仅是旁观和加油，而是要不断地拌嘴、互相戏弄、争论、打架。否则，就没意思了！”

Chronicles | 您的新闻 — 专访“民防”组织的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对民防部门的娜塔莉亚·丘马科娃的采访

三十年前，民防乐队在鄂木斯克成立，成为苏联最著名的摇滚乐队之一。



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曾两次在诺夫哥罗德演出：一次是2001年秋季在安东诺夫举办的个人演唱会，另一次是2007年11月，也就是他去世前两个半月。周三，诺夫哥罗德电影院[放映了纪录片《健康永存》](#)，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这支民防乐队的故事。影片由乐队指挥、摄影师、贝斯手，同时也是叶戈尔·列托夫的妻子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介绍。她告诉《瓦希新闻报》，诺夫哥罗德放映会的组织者，也就是第53旅游探险局的局长，用自己和她一样都是斯巴达克球迷的事实“贿赂”了她。

——叶戈尔·列托夫支持哪一方？

— 他曾是莫斯科中央陆军的球迷，但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他转而支持那些踢球风格更加“狂野”的球队。

— 他是叶戈尔还是伊戈尔？

“这要看我们指的是谁。我们彼此之间有昵称，但我不会说出来。对歌迷来说，当然是叶戈尔。但在乐队里，每个人都直呼其名。这一切都是第二位创始人库兹马开创的——‘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康斯坦丁·瓦伦蒂诺维奇’。”

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在一次采访中说，他小时候有过几次濒死体验。他有没有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

“他似乎出生时受过伤。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他受不了公共交通，甚至连从家附近坐公交车到市中心都做不到。然后这一切突然就消失了。显然，他的身体经历了成长过程中那种重塑的过程。”

—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民防”乐队从未在其家乡鄂木斯克举办过演唱会？

“从一开始，他们就不被那里接纳。他们遭受迫害等等。后来，叶戈尔说：‘我们是新西伯利亚的乐队。’恰恰相反，他们在新西伯利亚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叶戈尔在阿卡杰姆戈罗多克住了几个月。在20世纪80年代初，像鄂木斯克这样的城市，竟然有人开始创作这种音乐，这让我觉得很奇怪。不仅

是叶戈尔，还有伊万·莫格和皮克·克拉克松乐队。”

——您在诺夫哥罗德生活了好几年。请跟我们说说那几年的经历。



我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后来父母来到诺夫哥罗德的师范学院教书。我们住在四层楼的宿舍楼里，苹果园一直延伸到师范学院大楼，不过我想那栋楼现在已经不在了。后来我们在科切托夫街租了一套公寓。从二年级到五年级，我好像是在26号小学上学。但说实话，我不喜欢回忆那所学校，不管它编号是多少。那所学校非常保守。上课前半小时我们会集合参加某种集会，大家站起来听国歌，总有人会因此受到训斥……总之，当我们搬到新西伯利亚，我在那里上学时，我震惊地发现学校竟然可以如此不同。

你对摇滚乐的热爱是如何开始的？

——我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过这件事……为了考入莫斯科的季米里亚泽夫音乐学院（我最终去了斯克里亚宾音乐学院），我在新西伯利亚地区的一个马场实习。他们主要在偏远地区放映印度电影。有一天，他们放映了金切夫和加尔库沙主演的《窃贼》。我意识到，原来还有一个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听了很多音乐，很快就对俄罗斯乐队感到失望，然后突然听到了“民防”乐队。我甚至感到有些自豪，这样的乐队竟然出现在西伯利亚。还有“卡利诺夫桥”和“博姆日”乐队。

在加入 GO 乐队之前，你曾在“党魁”乐队演奏过。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乐队？

——一支来自新西伯利亚的乐队，可惜从未真正成名。我们录制了一张专辑，但因为主唱喝得酩酊大醉，把录音棚砸了个稀巴烂，导致我们被赶了出来，所以没能录到人声。

你现在在哪儿玩游戏？

“我真的很想演奏。但我不知道在 Oborona 之后还能和谁一起演奏……我现在在做录音工程和母带重制工作——还是 Oborona 的录音。”

——Civil Defense 乐队还会发行新专辑吗？有没有你还没听过的歌？

“当然会有新作品发行——档案库还没完全整理好。不过发行起来并不容易——我们有个很友好的公司，叫 Vyrgorod，但实际上只有他一个人——Ales Valedinsky。可能不会有新歌。只有一小段录音草稿……”

— GO 乐队上一任成员现在都在哪里？



鼓手帕沙·佩列托尔钦是莫斯科的一名音响工程师。我们一起参与了《党魁》的录制，他还教我弹贝斯。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纳科夫留在鄂木斯克。我现在在莫斯科。我在鄂木斯克无事可做。很显然，这部电影只能在莫斯科拍摄。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最近在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在他去世后，有没有出现一些你认为他会喜欢的乐队？

“他总是听美国迷幻摇滚和车库摇滚乐队。他也听一些新乐队，但不太喜欢。很遗憾他没能听到Auktsion乐队的Lenya Fedorov和Vladimir Volkov的最新作品。”

— 2001年，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在我们城市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曾想过与费多罗维奇和“我们没想到”乐队的列昂尼德·索伊贝尔曼一起录制专辑《俄罗斯未来主义》。

“是的，很遗憾，那个项目最终未能实现。但列尼亚·费奥多罗娃实际上通过录制以赫列布尼科夫和亚历山大·弗韦登斯基（叶戈尔最喜欢的诗人）的诗歌为主题的专辑，使之成为现实。”

— 上世纪90年代，“GO”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近年来，该党领导人是否表达过任何政治倾向？

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他唯一会加入的政党是“俄罗斯迷幻党”。但根本没有这个政党。

— 一位同事，他是诺夫哥罗德乐队的吉他手（我不记得乐队的名字了），时不时会因为“GO”的演奏和录音质量而发笑。

“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得委婉点，你同事的说法是错的。没错，你们可以比比谁的吉他弹得更好，比如在《野蜂飞舞》这首歌里——但这算摇滚乐吗？摇滚乐需要真正的激情，而这种激情要体现在音乐和歌词里。在我看来，任何以录音效果来评判音乐的人都是错的。很多乐队就是因为这个而失败的——他们试图提高录音质量，但最终得到的却只有空洞无物。”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1990年在《反文化》杂志上接受采访的文章在粉丝中广为流传，署名是“Seryoga Domoy”，但众所周知，这些文章实际上是列托

夫本人所写。真有此人吗？

“是的，他是叶戈尔的同学。这个绰号源于一个故事。但很遗憾，我们没能找到这个故事，所以没能把它录进电影里。”

— 你曾说过，列托夫故意失声，以达到他演唱歌曲时所用的那种嗓音。

“在他早期乐队 Posev 的录音中，你可以听到一个非常普通、音调很高的声音。然后，突然间，他现出这种独特的嗓音出现了。他曾经告诉我，为了获得那种嗓音，他故意对着枕头尖叫。”

所有“边境防御”乐队的专辑都是在鄂木斯克的一间公寓里录制的。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说他收到过驱逐通知。与邻居的矛盾是否一直持续到乐队解散？

“从八十年代初我们开始在他公寓录音起，他就成了整栋楼的恶人。后来，歌迷们出现了，他们要么坐在门口，要么坐在窗户底下。叶戈尔不遗余力地散布谣言，说他已经搬走了。直到我们最后几张专辑开始使用电子鼓，和邻居的矛盾才得以解决。当时，一位邻居刚生了孩子，我们问他：‘我们是不是打扰到她了？’他笑着说：‘哦，没有，她很喜欢你们打鼓。’”

著名电影导演鲍里斯·赫列布尼科夫直到38岁才第一次听到“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的歌曲。正是这次聆听，让他结识了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并成为电影《健康永恒》（Zdorovo i vечно）的制片人。影片的剪辑和发行资金是通过kroogi.com平台筹集的，该平台注册于旧金山——叶戈尔·列托夫最爱的城市，他只在2000年代去过一次。原本预计三个月才能筹集到的资金，最终在“民防乐队”的粉丝们三周内就全部到位。

三十年前，民防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可能让楼里的邻居，甚至旧金山的任何地方的人听到。

Chronicles | 悲伤浪潮 — 谢尔盖·列托夫：“我能再次战胜自己吗？我能。”

谢尔盖·列托夫：“我能再次战胜自己吗？是的，我能。”

爵士音乐家兼前卫艺术家谢尔盖·列托夫最近出版了他的自传《佛陀候选人》。Sadwave 与这位传奇萨克斯管演奏家就地下音乐、库廖欣、DK、流行音乐以及 [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 等话题进行了对话。

采访者：亚历山大·贝斯米斯伦尼

你为什么把书名定为《佛陀候选人》？当然，书中对此有所解释——你写道，这是你捏造的新闻故事，讲述的是你小时候被佛教徒绑架，目的是让你成为喇嘛。但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书名来写你自己呢？你认为自己是佛陀吗？

首先，这个书名当然是新闻标题，也就是说，它旨在吸引普通读者。是我的出版商瓦迪姆·纳扎罗夫（Vadim Nazarov）最终选定的，他想增添一些远东风情。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或图书编辑选择了一张我演奏中国南方民间乐器的照片作为封面。其次，我从小就对佛教，尤其是道教，颇感兴趣。更准确地说，这篇带有挑衅意味的新闻标题的作者彼得·卡普金（Pyotr Kapkin）应该称我为“菩萨候选人”。但是，一本名为《菩萨候选人》的书，对于我们的普通读者来说，已经显得过于深奥了。事实上，封面上的书名字体很难辨认；“buddha”这个词既有大写也有小写。我更喜欢小写。

请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虽然这本书的文本无法在网上免费获取，但你可以在一些网站上找到2000年代初期的文本，这些文本的标题与《佛陀候选人》中的某些章节相同。

事实上，书中收录了我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此前已在网上发表。这些文章的创作始于艺术团体“集体行动”。上世纪80年代，我结识了该团体的领导人安德烈·莫纳斯特尔斯基，并开始参与他们的表演活动。这些行动通常需要大量的记录。首先，要对行动本身进行描述：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它取得了什么成果。表演结束后，一些参与者会被要求撰写他们自己关于行动的故事、回忆或评论。顺便一提，其中几篇文章也被收录在了这本书中。

很久以后，到了2000年代，以色列文化活动家丹尼斯·约夫再次激发了我写作的灵感。他邀请我为他现已关闭的在线项目“美索不达米亚拓扑学”撰写一篇关于谢尔盖·库廖欣的文章。在完成这些“纪念笔记”之后，他又建议我为网站Topos.ru撰写关于莫斯科文化生活的文章。我犹豫了很久，觉得自己文笔不好。但最终，经济需求成了决定性因素：稿酬不高，所以我接受了这份工作。

随后出现了一家“竞争对手”——网站“Special Radio”，由谢尔盖·扎里科夫运营，他也是“DK”乐队的领队，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加入过这个乐队。他们也邀请我为他们撰稿。2004年，我还为polit.ru网站写过一篇文章。这段写作活跃期不久后便结束了。

一天，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尔卡季·德拉戈莫申科的信。他是圣彼得堡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谢尔

盖·库廖欣的挚友。他建议我将这些网络文章整理成书出版，因为在他看来，我的文章恰如其分地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列宁格勒的文化生活。为什么是列宁格勒？在20世纪80年代，莫斯科是一个“模范共产主义城市”。在那里，人们只被允许进行厨房里的谈话，或者在莫斯科附近偏远森林里进行秘密的艺术活动（“集体行动”）。而列宁格勒则拥有充满活力的文化生活，展览、音乐会和诗歌朗诵会层出不穷。克格勃在那里进行着一项自由化实验：公开性、改革等等。因此，列宁格勒有很多开放的空间：佩特拉·拉夫罗娃大街、车尔尼雪夫斯基大街、鲁宾斯坦大街13号的摇滚俱乐部等等。我经常去圣彼得堡，和库廖欣一起参与各种演出项目。

于是，德拉戈莫申科建议将这些文章收集起来出版，并写道他“将成为这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然而，这个想法并没有促使我采取行动。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的是，水族馆乐队长笛手杜沙·罗曼诺夫的遗孀安娜·切尔尼戈夫斯卡娅向安芙拉出版社提议，请她为这本书撰写稿件。

起初，我尝试构建一个连贯的叙事结构。但很快我就厌倦了，于是决定直接将我多年来写的各种文章收集起来。有些文章我几乎保留了原貌，而另一些则进行了大幅扩充甚至重写。但总的来说，这些散文构成了本书的核心。

你认为“地下”这个词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对我而言，这主要是一个反对派群体，即便不是反对政府（就像我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也是反对官方文化。我国政府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已经更迭，但官方文化的地位却几乎没有改变。事实证明，俄罗斯的这种体制势力相当强大。

事实上，我的这本书是我一项更大、在我看来更重要的计划的成果。书名是几年前谢尔盖·扎里科夫（Sergei Zharikov）建议我的，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了中国古代的“名称修正”概念。在中国中世纪，有一个唯名论哲学家学派，他们特别注重事物的正确命名。简而言之，他们认为“船叫什么名字，它就能浮起来”。

扎里科夫的理念恰恰在于修正历史，修正官方文化强加于我们的对过去的认知。例如，由于某些莫斯科的自由派娱乐评论家的缘故，DK乐队、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乃至整个西伯利亚后朋克音乐，都被排除在俄罗斯摇滚史之外，只留下标志性的鲍勃、崔和迈克。那些不符合当今官方叙事框架的关键文化现象正被掩盖。

我的书就是朝着“澄清事实”迈出的一步。另一个迈出的步伐是我同意在新闻与文学创意学院（IZhLT）为新闻系学生讲授音乐史，这项决定是我在2004年做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澄清事实”的行为——我正在改变未来记者的音乐世界观。

你上世纪80年代参与过许多朋克项目，例如DK和KHLAM。你认为自己总体上属于朋克吗？朋克精神在你的创作历程中有多重要？

事实上，我第一次接触朋克并非在“DK”音乐节上，而是在结识了杰出的列宁格勒鼓手亚历山大·孔德拉什金之后。他的人生观与我非常契合。尽管他参与了鲍里斯·格列宾希科夫的Aquarium乐队专辑《Electricity》的录制，但他仍然是朋克文化的代表人物。

光看他的饮食习惯就能看出他是个朋克：洋葱、植物油、黑面包。他是个放映员，有一次我住在他位于皮斯卡列夫卡附近的住处，睡在房间中央的行军床上，房间的墙壁上全是某种蛋垫——用来隔音的。有一次演出，他穿着令人瞠目结舌的蓝色芬兰内裤上台表演。他对现实的态度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朋克色彩。但谢尔盖·扎里科夫和DK乐队本身并不是朋克。他们只是对朋克的一种反

思, 一种集体农庄式的朋克, 更加夸张, 略有不同。扎里科夫最初是一位概念艺术家, 所以他只是运用了朋克的审美。

但我从康德拉什金和其他“扎根”列宁格勒朋克身上感受到的却是不同的。它甚至在某些方面呼应了西伯利亚后朋克的世界观。我不能说我完全接受了那种美学, 但我理解它。然而, 所谓圣彼得堡时尚摇滚——鲍里斯·格列宾希科夫、维佳·崔——的美学则有所不同。

必须承认, 如今Aquarium、Zoopark和Kino的名气掩盖了上世纪80年代列宁格勒一支重要的另类乐队。当时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坛分为两极: 一边是Aquarium及其姊妹乐队, 另一边是Strange Games。Strange Games如今已不再是耀眼的明珠, 但它当年却是“时尚摇滚”之外的热门选择。我当时对Strange Games非常感兴趣, Alexander Kondrashkin就是乐队成员之一。他还曾是Manufactura和Jungle乐队的成员, 这两支乐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赢得了列宁格勒多个摇滚俱乐部音乐节的奖项。

我当时演奏的自由爵士乐很容易就能适应摇滚乐的需求。我更想和一些更偏向硬朋克的乐队合作, 比如Strange Games。但不知为何, 他们不太接纳我。我们是朋友, 但他们不让我进入他们的音乐世界。

人们总是会拿你和你的哥哥叶戈尔·列托夫(伊戈尔)作比较。尽管你对苏联和俄罗斯地下运动的贡献丝毫不逊于叶戈尔, 但如今在公众意识中, 他却被视为地下运动的偶像。而你, 即便在公众意识中有所体现, 也更多地与先锋派联系在一起, 而非地下运动, 后者被认为更加精英化, 甚至有些颓废。这是为什么呢?

我和哥哥最大的区别在于, 我从不追求广泛的知名度。演唱会的观众人数和粉丝数量对我来说从来都无关紧要。对我而言, 正确的道路是忠于自己的信念和兴趣。我和伊戈尔经常为此争论。他很反感我的, 嗯, 可以说是精英主义——也就是我只关注少数人。这让他非常恼火。他觉得这不断地侵犯了他内心的真理。

伊戈尔年轻的时候, 我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的很多朋友也因此批评我, 说得没错。他们说, 我给他施加了太多压力, 试图把我的生活理念强加给他, 而他明明自己的人生道路, 而且是他认为正确的道路。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他在20世纪80年代离开莫斯科去了鄂木斯克, 也结束了我们一起的音乐学习。或许, 他是在和我进行一场无声的内心对话。

总的来说, 是的, 我们走了不同的路。我的音乐是为少数人创作的, 但都是我真心尊重的人。我的榜样是那些“集体行动”的表演。他们的活动人数从未超过25人, 而且大多是同行——概念艺术家、诗人、作家。有些活动是为单一观众而设。有时甚至无人参与——比如那些抽象的“吟唱”表演。而我通常为熟人演奏——广义上的熟人。为那些与我有着相似生活和艺术态度的人。

对我哥哥来说, 衡量成功的标准是广泛的知名度。认可, 成功。至于认可来自何方, 他并不在意。而且, 他始终与观众保持着距离。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未在鄂木斯克演出。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向歌迷敞开大门。窗户上都装着铁栅栏。

事实上, 说他激进并不准确。伊戈尔的特点是精心维护粉丝群体, 或者说, 他很擅长“营销”(如果可以用这个词的话)。他的兄弟制定了清晰的策略, 并且在这方面执行得非常严格。他深思熟虑, 行动也堪称完美。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成功的基石。当然, 除了他卓越的诗歌才华、无与伦比的个人能量和个人魅力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

顺便一提，我们之间的这些差异，实际上在我们一起学习音乐的第一年就显现出来了。自1983年以来，我们反复讨论过这些问题。例如，我哥哥对我在莫斯科“人”剧团的演出非常不屑。那里只上演荒诞派戏剧。他说：“我绝不会在只有45个座位的小剧场演出。”

说到影响，过去十年里，我感受到了我哥哥的影响，这种影响并非体现在我的音乐上，而是体现在我对待听众的方式上。我开始演奏一些不那么激进的音乐，融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并努力拓展受众群体。我也开始参与一些不像实验音乐或自由爵士那样激进的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这算是对我哥哥观点的一种妥协。

那么，为什么谢尔盖·库廖欣和他那支你也曾参与演奏的极权主义乐队“流行机械”（Pop Mekhanika）如今几乎被公众遗忘了呢？毕竟，据许多同时代的人说，库廖欣也是地下音乐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对大众的喜爱和人气丝毫不亚于叶戈尔·列托夫？

是的，库廖欣非常注重时尚，并努力让流行机械乐队（Pop-Mekhanika）面向更广泛的观众群体演出。顺便一提，他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确实做到了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在体育音乐中心（SKK）的演唱会连续三晚分别吸引了1万、9千和8千名观众。我不记得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Grazhdanskaya Oborona）的观众人数达到过1万人。事实上，他们的观众人数通常在3000到4000人之间。在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曾有传言说DK、DDT和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将举办一场联合演唱会，而我当时也参与了这三场演唱会的演出。我们甚至和尤拉·舍夫丘克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最终还是归结于这样一个事实：DDT需要一个至少能容纳7000人的大厅，而DK即使容纳1000人也不会来，而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大约可以容纳4000人。

至于库廖欣，他在美学上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音乐性的社会艺术。库廖欣最重要的创作项目，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是对失败美学、对全球性失败的美学诉求。这大致就是伊戈尔歌中所唱的：“它知晓我的失败，它知晓我的胜利。”

我现在才想起来，库廖欣从一开始就对失败的美学化很感兴趣。我第二次和他一起公开演出是在列宁格勒一个非常豪华的艺术中心。当晚的演出嘉宾包括列宁格勒的著名诗人：德拉戈莫申科、克里武林。我拿着一支中音萨克斯跑上舞台，结果脚下一滑，差点摔倒。这让库廖欣非常高兴。如果我真的摔倒了，他会更开心。他建议乐手们要穿得朴素一些。如果我戴帽子，那一定是某种针织帽，就像残疾人戴的那种。如果我留长发，那头发会歪歪扭扭地扎起来。披着一件滑稽的斗篷。换句话说，就是一些元素，即便不是丑陋，也是愚蠢。

伊戈尔从未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两种方法本质上截然不同：一种是制定成功的策略，另一种是制定失败的策略。例如，《流行机械418号》——杜金用法语朗诵诗歌，利莫诺夫朗读一些文本——只在极少数观众面前演出。这场演出是为了支持一位最终垫底的候选人。一场疯狂的《流行机械》，塞尔维亚演员在舞台上表演着某种业余的战斗。因此，库廖欣首先是一位激进的先锋派艺术家，他试图将不相容的事物融合在一起。这是一场盛大的苏联式葬礼。

伊戈尔从未有过这样的目标。

他吸引的是那些思想准备并不充分的人。他住在鄂木斯克的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这是一个无产阶级社区，也为刑满释放人员提供公寓。陌生人不敢搬进来，因为那里很危险。社区里到处都是破败不堪的赫鲁晓夫时代建筑，人行道也破损不堪。整个地区连一家书店都没有。这里是罪犯和酒鬼的聚集地，一个被上帝遗弃的街区。他几乎一生都住在那里，从1965年到2007年。去世前几个月，他才搬到鄂木斯克一个高档社区。他的一生都住在赫鲁晓夫时代的公寓里。伊戈尔一生主要面向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的居民。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式。

那么，为什么库廖欣更受欢迎呢？

时代不同了。库廖欣的声望完全建立在迎合苏联人民的基础上。他利用了苏联时代的文化符号。这就像列宁笑话，只有苏联人民才能理解。外国人觉得这些笑话一点也不好笑：为什么这部肥皂剧要“追随列宁的足迹”？他难道不是人吗？但苏联人民心知肚明：不，他不是人。他是神。他的遗体安葬在陵墓里，但他从天上统治着俄罗斯。

当时，库廖欣那种概念性戏剧颇受欢迎。“流行机械”剧团只在列宁格勒风靡一时，几乎只在其他城市演出。莫斯科也曾举办过“流行机械”第二场演出，但并未座无虚席。他们还在爱沙尼亚演出过，在一个能容纳100到200人的剧场。在苏联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公开性”时期——他们的海外演出取得了成功。但随着苏联国内最初热度的消退，“流行机械”剧团在海外仍然不被理解，基本上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在丹麦，他们的演出彻底失败了。与此同时，《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却吸引了更广泛的观众——这群观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于俄罗斯。

这里有很多像契卡洛夫斯基这样的村庄，而且永远都会有。俄罗斯相当一部分人口出生、成长并生活这样的村庄里。叶戈尔是他们的灵魂歌者。然而，库廖欣却不是。他的“流行机械”是一种怪异而可怕的现象，它激怒了厌倦了苏联社会刻板生活的苏联公民。

在最近上映的关于叶戈尔·列托夫的纪录片《健康永驻》中，他曾说过他的音乐以及他的作品总体上并不属于知识分子范畴。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属于知识分子范畴吗？

我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伊戈尔一生只有一个目标，他始终如一地坚持不懈地推进着这个目标。打个比方，对伊戈尔来说，这就像一个人朝着某个方向前进。而对我来说，更适合像游泳的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能够保持漂浮的人。无论是在河流还是沼泽——都无关紧要。对我而言，与环境保持平衡至关重要；这其中蕴含着一些佛教或道家的理念。我并非刻意地、以目标为导向地行动，而是顺应自然，回应我所接收到的需求。

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提议我们合作举办一场音乐会——我答应了。何乐而不为呢？我对那种氛围很感兴趣。我受邀参加了名为“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的演出——没错，我躺在一个浅浅的坟墓里三个小时。我聆听着，试图做出回应。法国大使馆邀请我与当时还默默无闻的米歇尔·韦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合作演出——何乐而不为呢？我为他的诗歌创作了配乐。

这种积极回应让我结识了许多形形色色、有趣且性格迥异的人。这其中自有策略。但我本人并不想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我参与过大约一百次录音，但我一生中从未发行过一张可以让我在上面用大字写上“谢尔盖·列托夫”的唱片。我完全没有这种想法。

很多人嗤之以鼻，说：“他到处跟人合作，但他自己又取得了什么成就呢？”我原则上同意这些批评，但我不想站在最前线。我想参与其中，了解情况。我不想制定什么宏伟的计划。我更感兴趣的是根据形势做出反应，出现在形势需要我的地方。这是一种即兴发挥，一次考验。我还能再次超越自我吗？我可以。

那么，你们的哪些项目最不涉及智力？

我最不费脑筋的项目当然是我的电子伴奏独奏项目。它非常简单，唯一的“智力”在于向大众证明，一位以先锋艺术家著称的音乐家，即使在相当普通的原声环境中也能游刃有余。这是我最受欢迎的项目，我靠它赚钱。

所以越笨的人越受欢迎?

总的来说,我想是的。我刚开始吹萨克斯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要在观众面前表演。我当时只是单纯地想吹萨克斯而已。我并不想甩头发,也不想摆出什么英雄气概或痛苦的姿势。而是形势迫使我这么做:既然要演奏,那就去音乐会上演奏吧。

您如何看待政治渗透艺术?伊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库廖欣都曾深度参与政治活动。对此甚至有一个精辟的解释:每个音乐家和艺术家都会在某个阶段感受到自己艺术的“天花板”,并渴望突破这些限制。而政治恰恰是下一步。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毕竟是一种游戏。然而,政治斗争却严肃而重要。如果你观察一些当代公众人物,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充斥着大量的姿态。他们依然是艺术家,但他们却不断地试图将笔与刺刀结合起来。这其中带有一种戏谑的意味,而他们的同志们却被迫对一切都照单全收。

对我而言,艺术的首要目标是人类解放。但我指的并非改变眼前的政治局势。我追求的正是从虚假的、强加的选择中解放出来,拓展意识,而这正是我通过出版书籍、教授未来的记者,或在锐舞派对上即兴演奏萨克斯风自由爵士乐所要实现的。

我有自己的政治倾向,但这丝毫不会影响我的音乐会和音乐实践。谈论政治倾向是私事,而艺术家并非私人。艺术家应该比当下的政治环境更加自由。我可以为那些与我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人演出,也可以为那些在几乎所有方面都与我政治立场相左的艺术家的项目提供组织支持。但我并不认为这是自相矛盾或背叛,而是我解放自我的使命。

您如何看待当代的地下音乐?它与20世纪80年代的地下音乐有何不同?

我必须承认,我的容忍度正在逐渐下降。我们地下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它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而我在上世纪80年代对它并不太在意。如今,我几乎不再去看展览了,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我尽可能多地去看。现在我肯定不能算是个派对动物了。我觉得近年来发生的那些文化事件并没有得到人们通常赋予的那种重视。

我对我们的知识精英和各种形式的当代艺术深感失望。对艺术时效性的过分强调,简直就像给尸体通电一样。在我看来,艺术家和音乐家应该做的只是做好当下,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成功。他们应该凭直觉行事,回应时代带来的挑战,更加开放地与公众交流(这一点,我哥哥的影响再次显现)。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活力更强,人们的思想也更加成熟。对更多人来说,艺术是理解周遭世界的一种途径。艺术家是思想的引领者。然而,过去30年间,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社会对艺术的态度变得更加消费主义。人们只想放松娱乐,对“探索世界”毫无兴趣。他们常说:“花点小钱,给我们创作点美好的事物。不然我们就去别的地方。”观众用脚投票,艺术家被迫做出改变。也正因如此,如今,成功而非内在的正义感,成了现代音乐家或艺术家的主要动机。

对当今的年轻人来说,质疑成功、牺牲成功,简直是无稽之谈。说到我们曾经的地下文化,我甚至怀疑它是否还存在。官方灌输的成功观念已经深入社会,以至于就连朋克和自由爵士乐手也不再尝试创造新事物,而是照搬那些曾经引领他们走向成功的模式。那么,如何才能成功呢?不接受采访,或者故意做出反社会行为。如今,最难的是如何摆脱失败痛苦。

上世纪90年代，曾有一个名为ZAIBI——“为了匿名和自由的艺术”（For Anonymous and Free Art）的运动，由弗拉基米尔·戈夫诺（Vladimir Govno）发起。如今，这个口号对俄罗斯地下文化而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贴切。它与时代格格不入，但这恰恰是它真正的本质——一个真正的地下文化。

按照你的逻辑，现代地下音乐唯一的出路就是那些靠其他工作赚钱，并且不考虑以艺术家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业余爱好者。

未必如此。顺便一提，大约十年前，曾有人谈论过超前卫艺术。尽管那最终也沦为了一种商业潮流。总的来说，我比较赞同德勒兹和加塔利，以及他们的著作《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该书认为，资本有效地征服了所有针对它的进程。它唯一无法消化的只有疯狂和自我毁灭。如今，地下文化还有其他发展方向吗？或许它也可以模仿流行文化，利用其属性和元素为己所用？顺便一提，我哥哥在《民防》中的作品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他运用了适合大众的简单音乐形式，却赋予其与流行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正是这种简单的音乐形式与精妙的诗意内容之间的反差，在当时催生了地下文化的势头，并对官方文化构成了挑战。

棺材编年史 | 没有我们的俄罗斯 — 费奥多尔·列托夫

费奥多尔·列托夫：

论儿子、民防和不满的邻居



童年

伊戈尔不像他哥哥谢尔盖那样强壮，发育也比较慢。他只有英语和唱歌两门课得了A。他是个安静的孩子，不爱打架，但我们并没有教他这些。相反，我们告诉他“不要欺负人”。我只记得二年级的时候发生过一件事，伊戈尔用书包打了一个同学的头。他们推了他一把。学校里起了争执，我解释说我们教他不要屈服——要反击。伊戈尔很友善，他会和邻居打招呼，但他并不外向。伊戈尔的成绩可能也跟我有关。学校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一个活跃的人，一个军人。





他对音乐的热爱几乎从未显露出来。他经常听音乐，嗓音不错，也知道许多歌曲和诗歌。我们曾经给哥哥买了一架钢琴，还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但他最终还是拒绝弹奏。我们问了弟弟伊戈尔，他也说：“不，我不会。”两个男孩都拒绝学习音乐，却都成了音乐家——这真是个莫大的悖论。于是，已经身在莫斯科的哥哥问我：“我们家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铁杆音乐家？”在我出生前六周，我的叔叔去世了。他十八岁，是一位狂热的手风琴演奏家。他如此热爱音乐，以至于村里每场婚礼都会拉着他去。谢尔盖平静下来，意识到这份遗产已经传承了下来——传给了他们俩。



青年

他那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跟谁混，跟谁是朋友，他们遇到什么问题——这些都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从不告诉伊戈尔该跟谁做朋友，不该跟谁做朋友。因为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什么不该做，他肯定会反其道而行之。我记得披头士乐队风靡一时的时候，他迷上了他们，翻唱他们的歌以及其他类似摇滚乐队的歌。他买了把吉他，经常有人过来一起唱歌。我们从不干涉，因为那样会破坏气氛。后来，他竟然受邀去新西伯利亚参加“奥运会”，还要带一首歌去。

鄂木斯克当时正在举办一个音乐节，其他城市的乐队都会来。于是我和他们聊了起来，我说我对伊戈尔乐队的名字不太满意。原因如下：我曾在民防部门工作，担任工业培训主管。我以为伊戈尔是从我这里学来的。但他们向我解释说，这个名字的含义完全不同。民防是指保护民众免受核武器和其他灾难的侵害，但在乐队的语境下，它指的是对公民的社会保护。他们还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话：“你或许不是诗人，但你必须是公民。”这句话让我既感到心碎，又觉得很有道理。然后我开始听他们的歌词，但我根本听不懂，因为他们唱得特别大声：音乐震耳欲聋，墙壁都在震动，邻居们都兴奋起来，要求他们把音量调小。最后，在十一点之后，他们终于让伊戈尔把音量调小了。



房子

伊戈尔对动物非常友善，包括狗和猫。我们家没养狗，但他养了三只猫：蒂莎和斯蒂奥帕体型很大，他给最后一只黑白相间的小猫取名叫佩特里克。

他喜欢独自进森林。我退伍后，曾三次去森林滑雪，经常在雪道上碰到伊戈尔。他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小瓶水，另一个口袋里装着笔记本和笔。他博览群书，作为一名士兵，我总是能带回一些珍稀书籍。我们家收藏了一大批“世界百科全书”（Vsemirka），数量惊人。并非人人都能负担得起。后来，伊戈尔每次从外地回来都会自己买书，而且总是带回来。他还喜欢画画；那张红色的“民防”海报就是他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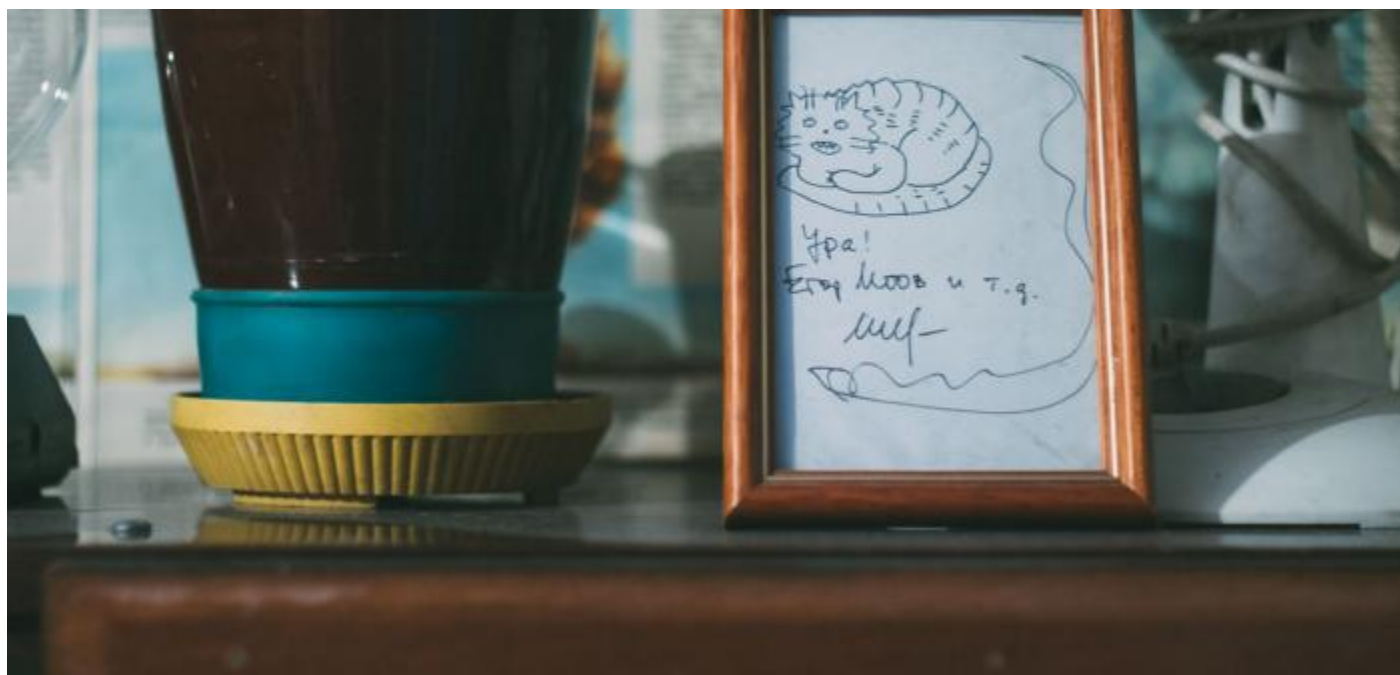
他的房间里挂着很多粉丝的画作，比如《我来自胜利》等等。这幅画画的是叶戈尔本人，他头上停着一只蝴蝶。我一开始并不喜欢这幅画——活人身上不太可能停蝴蝶，蝴蝶不会落在活人身上，但死人身上就很有可能了。顺便一提，他本人很喜欢画蝴蝶。



服务

我曾在无线电技术团服役，我的职务是政治宣传员。顾名思义，我的工作内容就是政治宣传。我不仅负责政治课，还进行心理训练，讲解敌军的情况、武器装备、战术以及训练方法。甚至在我们那个年代，俄国政变期间，我还去部队问：“现在这个职位叫什么？”他们告诉我：“部队心理学家。”说实话，我当时有点后悔——如果那时这个职业就叫这个名字就好了；那样我就能更成熟一些，也能更自信一些。





Chronicles | 东西伯利亚真相 — 谢尔盖·列托夫：“库列欣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

谢尔盖·列托夫：“库列欣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

一个你愿意倾听的人。无论他演奏音乐还是只是说话，都如此。萨克斯管演奏家兼即兴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就是这样一位让你忘记自己是在采访的人。你会想坐在他旁边，静静地聆听。他讲故事的天赋无疑不亚于他的音乐天赋。作为一名音乐家，他深受俄罗斯语言文化的影响。他的兄弟叶戈尔·列托夫以及他长期的音乐实验伙伴谢尔盖·库廖欣也是如此。对他们来说，用语言进行自由即兴创作并不陌生。上周，谢尔盖·列托夫来到了伊尔库茨克。

谢尔盖·列托夫是铜管乐团“TRIO”的创始人，也是当代俄罗斯最著名的自由爵士（自由即兴爵士）音乐家之一。他于1982年首次与马克·佩卡尔斯基的打击乐团合作演出，在过去的30年里，参与了俄罗斯国内外数十个不同的音乐项目。对于一位爵士音乐家来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常态。但他同时也参与莫斯科概念艺术家的演出和活动，与诗人、作家、爵士音乐家和摇滚音乐家合作，为戏剧创作音乐并参与演出，参演电影，并在莫斯科新闻与文学创作学院讲授当代音乐。谢尔盖似乎也继承了他哥哥叶戈尔·列托夫那股炽热而敏锐的能量。但这种能量体现在另一种东西上——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着鲜活而永不熄灭的兴趣。存在，参与，创造，体验音乐。通过音乐理解生活。

他至少会演奏十几种木管乐器，主要包括萨克斯管、长笛、低音单簧管和电子管乐器。他的个人网站letov.ru上写道：“.....以及他自己发明的乐器。”列托夫本人并不认为这些是“发明”。他说：“大约30年前，我根据一位同样神秘的人物——维克托·卢金——的神秘乐器制作了一支管子。他有点像个朋克，一位爵士萨克斯管演奏家，一位激进的前卫艺术家。他80年代就移民了，但我见过他制作的乐器。他用各种管子——管子、塑料管、金属管、竹子——制作乐器。他把它们连接到萨克斯管或单簧管的吹嘴上，就成了自制乐器。”“我尝试用手工材料制作类似的乐器。我在儿童世界商店买了一根铝管，锯掉我需要的长度，在上面戳了几个孔，现在我还在用它演奏。”

我们将用E小调来练习五声音阶。

在伊尔库茨克，谢尔盖·列托夫在电影院为弗拉基米尔·科兹洛夫2014年的电影《雪地足迹》的放映进行了表演。这部电影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西伯利亚朋克文化的现象。列托夫本人也是这部电影的参与者之一，因为这个主题对他来说意义非凡。西伯利亚最著名的朋克乐队是“民防乐队”，该乐队由叶戈尔·列托夫的哥哥领导。

你和你哥哥的性格截然不同。你们一起长大吗？

事实上，我们只一起长大了一部分。我弟弟从出生到八岁，一直都在我的悉心指导下度过。1972年，伊戈尔八岁的时候，我去了新西伯利亚物理数学寄宿学校。我在那里住了两年，然后去了莫斯科的理工学院学习。毕业后，他搬到莫斯科州和我一起生活。当然，我们有一些共同点，我也对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非完全如此。青春期的都想向所有人证明自己会走自己的路。无论我多么努力地引导他接触传统音乐、自由爵士乐和先锋音乐，效果都非常有限。他被莫斯科的建

筑职业学校开除了，他的父母要求他别再胡闹，回到鄂木斯克。在那里，他和朋友们组建了民防队。从那时起，我们当然一直保持联系，但非常有限。伊戈尔他给我寄过他的录音，我也偶尔寄给他我的，但直到1998年我们才第一次同台演出。不过，在很久以前那次莫斯科之行中，伊戈尔尝试过即兴音乐和自由爵士乐，甚至还和谢尔盖·库廖欣一起参加过一场音乐会。他住在鄂木斯克的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那是一个极其贫困的无产阶级社区。他一生都住在那里，自由爵士乐在那里显然不会被理解，就像在鄂木斯克一样，他一生中从未在那里举办过一场音乐会。

— 在电影《雪地足迹》中，你说西伯利亚朋克是知识分子朋克。这是什么意思？

首先，它不像俄罗斯欧洲区的朋克那样是模仿之作。我们大部分的摇滚乐，说得委婉点，毫无原创性。它不是什么艺术现象，而只是年轻人试图拿起吉他，梳理发型，穿得像外国杂志上那样。而俄罗斯的大部分朋克音乐都是彻头彻尾的模仿，毫无原创性，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它只不过是一种音乐游戏和文化现象。我们拿起吉他，拨动琴弦，在E小调五声音阶中摇摆。再看看西伯利亚后朋克：没有莫霍克发型，也没有模仿西方服饰。它更像是，比如说，像“大门乐队”（The Doors）那样的乐队，而且最初追求的是其他激进的目标——解放意识。如果你看看我们传统的俄罗斯朋克乐队，他们甚至都无法把“解放”和“意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他们的歌通常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喝醉了，玩得很开心，出去泡妞。还夹杂着几句脏话。“DK”乐队的主唱谢尔盖·扎里科夫称之为“集体农场朋克”。半个国家都是朋克：穿着绗缝夹克，手里拿着葵花籽站在市场上——这就是朋克的真谛。

“民防”有所不同吗？

西伯利亚朋克，就像GO乐队一样，本质上是诗歌，音乐只是辅助手段。而这个思想世界很大程度上围绕着伊戈尔形成。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视角。对于大多数俄罗斯摇滚乐队的成员来说，他们的视角就是喝得烂醉，然后假装自己是Korn乐队。但伊戈尔不同——他了解莫斯科的概念艺术家，他看过他们的演出，他认识约翰·凯奇，他了解当代绘画，他读书，这在俄罗斯摇滚音乐人中极为罕见。这是一种独特而独立的现象，完全无法模仿。西伯利亚朋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来自贫困社区的青少年的世界观。他歌中唱到的这些“肮脏的年轻人”在当时构成了我们国家的大多数。然而，却没有人真正关注他们。这些年轻人从GO乐队或扬卡·迪亚吉列娃的歌词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这些歌词中的人物并不属于任何流行乐队。时间流逝，所有肤浅的、模仿的东西都被遗忘了，但“民防”却留了下来。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经历了改革开放时期。在那之后，还能出现什么样的抗议活动呢？

“我国的压迫形式只是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向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人民依然被奴役，甚至更加奴役。伊戈尔是新波多黎各人民党（NBP）的创始人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他非常活跃于政坛。1993年，在著名的白宫保卫战中，他参与了保卫战。我当时非常担心他会死在那里，但他侥幸活了下来……伊戈尔只是和几个老共产主义妇女发生了冲突。她们嘲笑那些朋克：‘体面的人站在这里，你们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滚出去！’最终，‘GO’（指“GO”的缩写，意为“好人”）离开了那里。这救了伊戈尔一命——几个小时之内，整个保卫战营地就被摧毁了。据我所知，近年来，他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并退出了所有政治活动。他还重新发行了他所有革命专辑的名称。例如，《冬至》（Solstice）变成了《月球革命》（Lunar Revolution），封面上印着耶稣基督的画像。”封面上的飞机。他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他的人生态度。

“那简直是愚蠢至极。”

谢尔盖·列托夫参与的数十个音乐项目无疑都充满活力且引人入胜。但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与谢尔盖·库廖欣在大小规模的“流行机械”（Pop Mechanics）乐队中的合作。或许很少有人像列托夫那样与“船长”库廖欣如此熟稔。从1982年到1993年，列托夫一直参与库廖欣的乐队项目，亲眼见证了“流行机械”这一俄罗斯音乐文化中独树一帜的现象的演变。它既非爵士乐，也非摇滚乐，更非戏剧演出或表演——它完全是另一种存在。即使漫步在圣彼得堡谢尔盖·库廖欣当代艺术中心空旷静谧的大厅里，你依然能感受到那些年里迸发的活力与激情，甚至会感到脊背发凉。

— 你是怎么认识库廖欣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件事发生在1982年。当时我去列宁格勒出差。我在一家研究所工作，业余时间会吹萨克斯。我认识乐评家阿尔捷米·特罗伊茨基；他知道我要去列宁格勒，就给库廖欣打了电话，让他来找我见面。就这样，我们见面了。我们是在艺术广场俄罗斯博物馆对面的一家咖啡馆见面的，而不是在摇滚乐手们常去的西贡酒吧。那家咖啡馆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们用两百克重的刻面玻璃杯喝咖啡，没有椅子，就像苏联时期人们常说的“站着喝”的那种咖啡馆。和谢尔盖在一起的是他的朋友谢尔盖·布加耶夫（艺名“非洲”），他当时正在逃避兵役，穿着医院的睡衣就从医院跑了过来……库廖欣胡子拉碴，穿着一件在我看来大了两号的外套。显然，他喜欢这样。他邀请我第二天或后天和他一起演出。除了演出阵容，我对那场音乐会的一切都毫无印象。第二场演出在博尔沙亚·莫尔斯卡亚街的建筑师之家举行。除了阿弗里卡之外，库廖欣还邀请了另外两位吉他手同台演出。一位弹的是电吉他，另一位弹的是没有麦克风的木吉他。没有麦克风的吉他手非常谦逊——维克托·崔——而弹电吉他的吉他手——身穿阿帕奇衬衫，脸上涂着白漆——则是英俊潇洒、骄傲自大的鲍里斯·格列宾希科夫。我们的合作就此开始。我前往圣彼得堡，为库廖欣在流行机械公司举办的各种项目演出，我们合作演奏了很多二重奏。我的人生与库廖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事实上，我的一些名气，或者说我的成就，都来自于与他的合作。

为什么“流行机械”现象会在列宁格勒兴起？谢尔盖·列托夫认为，这源于一种特殊的“受控自由”。他说：“在莫斯科，一切都是封闭的，一切都被禁止——那是一座典型的共产主义城市。但在列宁格勒，当地的克格勃进行了一项实验，创建了一个摇滚俱乐部。后来席卷全国的‘开放’和‘改革’，最初是在一个特定的城市进行的试验。除了摇滚俱乐部，克格勃还为诗人提供了聚会和朗诵诗歌的场所。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大街7号还有一个剧院，专门为‘内部人士’演出先锋戏剧。当然，一切都受到监控。然后改革来了，一切都蓬勃发展起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顺便一提，当年领导克格勃的那些人，来自圣彼得堡，现在统治着整个国家。我们的国家实际上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的延续。”谢尔盖·库廖欣最初以自由爵士乐起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位颇具原创性、独立个性的音乐家。他最初的音乐理解，除了与爵士萨克斯管演奏家阿纳托利·瓦皮罗夫的合作之外，很可能还受到了叶菲姆·谢苗诺维奇·巴尔班（新爵士杂志《Kvadrat》的创办人）和亚历山大·坎（列宁格勒文化宫当代音乐俱乐部的负责人）的影响。谢尔盖·列托夫说，在当时，演奏实验爵士乐，而不是像苏联传统爵士乐那样大量模仿美国音乐，确实是一项“壮举”。1981年，列昂尼德·费金在Leo唱片公司发行了库廖欣的专辑《自由之路》。谢尔盖·列托夫说：“谢尔盖与摇滚乐的联系并不紧密，与爵士乐的联系就更少了。他是一位非常原创、独立个性的音乐家。”但这些伪装——苏联爵士乐或苏联摇滚——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表演。他还能是什么呢？当时，我们没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我；我们只能和清洁工、煤气厂工人打交道。我们得努力向他们解释如何弹奏从二手店买来的吉他。这就是“流行机械”乐队的由来。

“谢尔盖进化了，”谢尔盖·列托夫说。库廖欣逐渐远离了纯粹的自由爵士和自由即兴音乐，也远离

了约翰·凯奇的音乐脉络，转向了多元风格的创作方式。20世纪70年代，维亚切斯拉夫·加涅林的三重奏“GTC”（加涅林、塔拉索夫和切卡辛）在我国声名鹊起。他们开始在世界各地演出，巡演美国，并在英国发行了大量唱片。库廖欣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种多元风格的创作方式；他受到了萨克斯管演奏家弗拉基米尔·切卡辛的影响，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切卡辛频繁合作演出。到了80年代中期，库廖欣发展出了他独创的音乐拼贴概念，融合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这是一种音乐混合技巧，与约翰·凯奇的混合概念有几分相似。随后，《流行机械》以其独特的魅力横空出世。其中，各种形式的音乐交织融合。文化在此汇聚，却并未融合，而是在一场音乐会的框架内共存。这让人想起苏联时期为庆祝警察节而举办的盛大音乐会。在传统的音乐会上，节目的顺序遵循着特定的等级秩序。但在库廖欣的音乐会上，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会让“基诺”乐队与来自楚科奇的歌手科拉·贝尔迪同台演出，贝尔迪演唱的《我带你去苔原》由基诺乐队伴奏。与此同时，阿弗里卡和蒂穆尔·诺维科夫会牵着驴子上台，驴头上用蓝色电工胶带粘着鹿角。库廖欣的音乐会吸引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和非音乐团体，包括列宁格勒摇滚乐的巨匠们。而这一切，在一种滑稽，甚至似乎冒犯摇滚乐迷的氛围中，也显得格格不入。例如，五把主音吉他和六把贝斯同时演奏，音色和谐统一。舞台上还聚集着最受欢迎的摇滚乐队——水族馆乐队、奇异乐队等——的乐手。游戏、电影——它们都齐声播放着相当怪异的音乐。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肆无忌惮的愚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库廖欣的“流行机械”是对达达主义、俄罗斯未来主义传统的复兴，是一种完全基于苏联美学元素的荒诞剧。它是苏联晚期文化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这场运动在后苏联时代走向衰落的原因。

— 它变得无趣了吗？

首先，我们的音乐家开始在国外巡演，苏联引起了广泛关注。外国人觉得很多事情难以理解；他们的社会结构相当严谨，但依据的法律却截然不同。库廖欣违反了这些文化和国家的潜规则，这引起了不满。苏联解体后，库廖欣所坚持的“口袋里的无花果”不再必要，虽然并非立即消失，但过程逐渐平息。没有什么值得一笑了。苏联的审美被布拉特尼亚克（blatnyak，一种俄罗斯香颂）所取代。这种变化并没有带来任何快乐。库廖欣积极反对1991年发生的种种事件；他是NBP的真正创始人之一。他的党员证号码是418，这个号码源自阿莱斯特·克劳利，库廖欣非常崇拜克劳利的哲学思想。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性格封闭吗？

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哥哥。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非常相似。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不同之处。但随着他们相继离世，我越发觉得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库廖欣是个双重人格的人。他非常开朗、精力充沛、言辞犀利、充满活力，总是有很多想法和计划.....但前提是有人在场！至少要有两三个听众。如果没有听众，他就会变得非常阴郁、沮丧、悲伤和烦躁。或者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单独相处时，他经常这样。我知道彼佳·马莫诺夫的行为也类似。他会根据谈话对象而变化，表现得非常活跃。伊戈尔则不然；他没有这些特质。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对他们来说，某些道德标准和伦理规范并非与生俱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超人”，独立于周围的人之外。

— 与这样的人相处是不是很难？

——确实如此。至于我弟弟，他的情况非常棘手。我父亲告诉我，伊戈尔14岁那年，一位医生——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专科的——给他做了检查。伊戈尔当时病得很重。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的父母在1956年于塞米巴拉金斯克接受了大剂量辐射（我们1959年搬到了鄂木斯克）。医生告诉他的父

母，这孩子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位杰出的音乐家或诗人——总之，他很有潜力成为一名著名的艺术家。但他的父母和家人将来会很难照顾他。我父亲是在伊戈尔去世后才告诉我这件事的。这番话如此具有预见性，以至于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的乐谱是由各种人物形象构成的。”

— 现在是否有可能继续推出“流行机械”系列作品？例如，阿列克谢·艾吉的“库列欣NEXT”项目？

“我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阿列克谢·艾吉的项目，而且我也参与其中。但这完全不是流行机械乐队（Pop Mechanics）。这是库廖欣音乐的演绎，但更确切地说，是一场纯粹的音乐演出。库廖欣本身就是一场表演，音乐只是其中的一个元素。库廖欣本人并没有写下乐谱；阿列克谢·艾吉完全凭耳朵创作——他负责编曲和配器。而且他的作品如此精妙，以至于有时乐团甚至无需排练就能演奏。这就是艾吉作为指挥家和编曲家的才华所在。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他分发乐谱，指挥，然后大家就直接演奏了。”

——去年在圣彼得堡爵士庄园发生的事情也是这样吗？

“关键在于，独奏者们都知道该在什么位置演奏。艾吉邀请了库廖欣最喜欢的尤里·卡斯帕良（Kino乐队的吉他手）、我、萨沙·亚历山德罗夫、在“流行机械”乐队成立前就与库廖欣合作多年的法戈特、维亚切斯拉夫·盖沃龙斯基和沃洛佳·沃尔科夫。基本上，独奏者都是与库廖欣合作过的乐手。乐团的大部分成员以及艾吉的4'33乐团都精通乐谱演奏。有时，如果有机会进行两三次排练，而且乐手来自莫斯科大剧院，那么演出效果绝对精彩绝伦，令人叹为观止。但是，我再说一遍，这完全不是‘流行机械’乐队；它缺乏那种轻松愉悦的氛围。‘流行机械’乐队就像一场嘉年华，一场盛宴。关键在于，库廖欣没有吉他、小提琴、萨克斯管或鼓——他拥有的是活生生的人。”他的乐谱是由人物而非乐器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例如，在《流行机械》这首歌里，我原本应该只发出诡异的摩擦声和哨声，吓唬所有人。但库廖欣什么都没写——他会走到我面前，哼唱或演奏他应该演奏的部分，然后乐手就照着演奏。如果他弹不出来，库廖欣就会说：“好吧，那就别弹了。”

— 他有没有不喜欢的人？

——或许有吧。通常，都是他之前就很喜欢的人。1987-1988年，他邀请我去听“水族馆”乐队的演出。我们在列宁格勒青年之家，库廖欣在第一场演出中对每个人都非常挑剔。结果，他建议我离开，因为他受不了吉他和长笛之间那些四分之一音的差别。直到1986年，库廖欣都没缓和气氛，还经常训斥我。而且每次演出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因为我没按他的要求来。但他无法直接跟我表达出来。我们被认为是自由即兴演奏家。但我必须自己去体会。1986年，我们去了叶卡捷琳堡，在那里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我明白了自己该做什么。虽然这很隐晦，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他应该做园丁，我应该做花朵。他应该负责结构，负责整体规划，而我应该演奏独奏。从那时起，我们之间就一直和睦相处，从1986年到他去世，我们再也没有吵过架。

— 你曾说过，如今人们对知识性的音乐并不感兴趣，《流行机械》也不会成为如今这样盛大的庆典。

——很有可能。如今，人们大多把音乐当作娱乐。我常说，音乐就像是上班族一天辛勤工作后收到的一颗甜糖。在麻木之后，音乐能给他们注入一剂正能量。当然，在这种状态下，人没有时间去探索世界或解决重要问题。社会不希望人们自己去解决重要问题；它希望人们仅仅履行自己的

职责——成为办公室职员、保安或市场摊贩。资本的世界别无所求，这正是这类音乐被创作和推崇的原因。这种音乐不召唤任何人去往任何地方，也不追求任何目标。当然，这与谢尔盖·库廖欣和叶戈尔·列托夫等人的理念截然相反。

苏联时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人吗？

不仅如此，还有很多其他方面。我认为苏联时期的整体文化水平远高于现在。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媒体。苏联广播电台几乎不间断地播放古典音乐，而且演奏得非常出色。事实上，人类听觉的特性决定了这种现象是后天习得的。每个人的脑海中都有一个类似词典的东西，用来存储所有听过的音乐。这会影响他们的感知能力。如果一个人从未听过某种音乐，就很难从审美角度去欣赏它。他们必须把它归档到脑海中的某个抽屉里，并赋予它某种价值。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如果他们总是只听斯塔斯·米哈伊洛夫或鲍里斯·莫伊谢耶夫的音乐，那么任何更复杂的音乐都会被视为噪音，被视为一种亵渎。不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糟糕音乐的世界，而这些糟糕音乐却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任何偏离这种标准的东西都被视为错误，被视为异类。听众群体正在萎缩。还有一个因素：在苏联时期，很多东西都被禁了。但也正因如此，才涌现出一种突破的活力。人们听新维也纳乐团、勋伯格和韦伯的音乐，并非因为喜欢十二音体系，而是因为作曲家协会谴责这种体系。但现在，许多限制已被解除；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鲍里斯·莫伊谢耶夫和斯塔斯·米哈伊洛夫都是你的选择。

——所有东西都在网上。人们不再亲自购买。

互联网不是演唱会。互联网也无法提供一切；它只是一种幻象。注册需要大量资金，而那些无法在大型场馆举办爆满演唱会的人根本负担不起。这就是恶性循环。你需要知道在网上寻找什么。但是，如果一个来自外省、小镇的人没有特定的社交圈，他们又怎么知道该寻找什么呢？现代社会提供的选择是一种更为隐蔽的胁迫形式。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特征。鲍德里亚曾写道：资本能够吸收所有与之对抗的力量，除了疯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化？我们或许不应该就此裹尸布，苟延残喘……我如何看待进步？如果说以前所有有趣的文化作品都集中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那么现在它们遍布各地。我即将从奥伦堡巡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本身就很不了不起，因为在苏联时期，根本没有这样的巡演。到处都有爱好者试图为小团体组织一些活动。有时，这种组织活动会演变成真正的狂欢。苏联时期，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了新爵士乐的中心，而斯摩棱斯克则兴起了一整个自由即兴演奏流派。这股潮流正在兴起。

Chronicles | Bobsoccer — 莱托夫家族与莫斯科中央陆军

莱托夫斯和莫斯科中央陆军

美好家庭的生活

他们将俄罗斯农民（鞑靼人、巴什基尔人、卡尔梅克人、乌德穆尔特人、马里人、楚瓦什人、莫尔多瓦人，以及后来加入他们的哈萨克人）的怒火推向了沸点。他决定亲自出马.....他夺取了所有他拥有的东西。他去与农奴制的无法无天作证作斗争。那时，卡捷琳娜已经受够了所有人，把他们都彻底榨干了。就连哥萨克也未能幸免。一股由农民和哥萨克组成的强大浪潮涌起，而这股浪潮的顶峰正是叶梅利扬·伊万诺维奇·普加乔夫。一个顿河哥萨克。他们就是这样的人，顿河哥萨克。他们时不时会掀起轩然大波。这股浪潮一直席卷到了西伯利亚。不，我不会做任何类比，我只想提醒你们，这位领袖从顿河开始，越过乌拉尔山脉，最终在基督时代抵达莫斯科。雄鹰饮鲜血，A.S.普希金曾写过这方面的内容。

与此同时，1774年初，在距离比比科夫军队集结地数十甚至数百英里的地区，起义军取得了重大胜利。1774年1月，他们攻占了彼尔姆省的多个村庄、要塞和工厂，并围攻了昆古尔城。在昆古尔城郊，他们与城内守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地农民早已沦为矿工，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彼尔姆人民奋起反抗，加入了萨拉瓦特·尤拉耶夫及其同伴的阵营。尤拉耶夫这个名字不仅为俄罗斯历史爱好者所熟知，也为众多体育爱好者所熟知。至于他是强盗还是独立斗士，则见仁见智。当然，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起义军。看看他们是如何守卫昆古尔的吧。他们没有放弃。但周边村庄的居民，包括戈卢希诺村的村民，也加入了起义军的行列。那里的一切都混杂在一起：人、马、轭.....

天知道戈卢希诺究竟在哪儿，但它从17世纪中叶就存在了。而且它生机勃勃。起义之后，农民们没有被屠杀，到了20世纪初，这个村落已经有了自己的教堂和学校、各种农场、麻田，不久之后又成立了村委会、急救站，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拥有了第一台拖拉机。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只是，没有拐杖就坐不下来。狼.....

伟大的卫国战争没有放过这个彼尔姆村庄的居民，他们竭尽所能地将所有人送上前线。他们勉强凑够钱参加了内战，如今又要投身这场史上最血腥的战争。对于来自戈卢希诺的年幼的费奥多尔·列托夫来说，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一个简单的行囊，送他踏上漫长的征程，或许只是吻别，这位朴实的农家少年便以志愿者的身份踏上了保卫家园的征程。

尽管前线传来的噩耗让他疲惫不堪，但这位年轻人依然睁大了眼睛，审视着他的新生活。他知道许多城里人所不知晓的事情，但更多的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发现是喀山。而这里，永远都是喀山。条条大路通喀山。从彼尔姆，从莫斯科。他立刻就投入了“战争女神”——炮兵——的怀抱。当时他还在接受训练。战争期间，这些机构的训练并没有中断，指挥部派这位新晋炮兵去增援列宁格勒民兵。他的部队浴血奋战，从博洛戈沃一路挺进波罗的海。费奥多尔天生身材并不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能力不足。他必须装填大炮、建立通信，甚至还要执行侦察任务。但侦察任务并不顺利。这一切都源于他强烈的愿望，想要找到替罪羊或狙击手。他像往常一样迅速爬上树，但他对德国佬的搜寻如此执着，以至于他的望远镜暴露了对方的位置。幸运的是，德国狙击手也失败了。

所以，到处都是炮火、炮火，还是炮火。不过，他们也得押送德国战俘。一个矮个子士兵会跟在旁边，下一个守卫则在五十米开外。这有点吓人，但德国佬纪律严明，没有试图逃跑。后来，战争结束了，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中士决定将余生奉献给军队。但他属于那种“不以当将军为梦想”的士兵。这种事时有发生。我们的军队并不后悔拥有这样一位优秀的专家。而且，没有他，我们也有不少优秀的指挥官。

除了服兵役之外，费多尔还培养了对体育运动的浓厚兴趣。他成为了一名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并在地区比赛中屡获佳绩。他赢得了各种锦标赛和冠军。他还爱上了足球，而这份热爱也伴随了他一生。他最爱的球队始终是“中尉队”。此外，他还效力于CDKA、CDSA、CSK MO和CSKA等球队。他曾因公出差前往苏联各地，尽可能地观看军队球队的比赛。有时，他过于热情地为球队加油助威，与当地球迷发生一些小冲突。但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绝非胆小之辈。你不可能徒手制服他。他甚至还举重和抓举，尽管他一度甚至不知道举重是什么。“重量”这个词不在他的字典里。但他凭借着追求人生目标的那份坚韧，最终掌握了这项运动。然后，爱情不期而至。或许可以说是“无意间”降临。塔玛拉·格奥尔基耶夫娜从事着世上最仁慈的职业之一——医生。更何况，她就出生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这样医疗资源匮乏的城市，而我们故事的下一位主人公，著名兄弟中的老大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也正是在这里出生的。

1959年，列托夫一家搬到了鄂木斯克，并在那里生活了很多年，这里成了他们真正的家。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正是在这座城市获得了教师资格，他的小儿子叶戈尔（伊戈尔）也出生在这里。对运动，尤其是足球的热爱，从父亲传给了儿子。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他们最初住在曾经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恰克骑兵马廐的军营里。这座简陋的营房位于鄂木斯克郊外的契卡洛夫斯基村。村里自然也有一个军官俱乐部，经常举办音乐会。在西伯利亚音乐的圣地，参加音乐会对于兄弟俩的人生选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们对中央陆军足球俱乐部和音乐的热爱。

但谢尔盖·库马尔的足球根基非常稳固，始终是军队出身，而叶戈尔·库马尔则由于其略带叛逆的性格，倾向于探索新的足球理念。这体现在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阿拉尼亚·弗拉季卡夫卡兹及其国际化的言论上。这是一种独辟蹊径的做法。不过，叶戈尔始终不忘自己的军队背景和家庭，称他的家人都是莫斯科中央陆军的忠实拥趸。

1964年，列托夫一家终于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屏幕虽小，镜头却很大。对于这位年轻的球迷来说，此前在鄂木斯克鲜少转播的顶级足球赛事，如今终于有了鲜活的画面和色彩。虽然是黑白的，但电视画面中的球员个个都是名家，他们的名字响彻全国。而且，他们也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然而，当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与他挚爱的足球之间最主要的联系仍然是收音机。在塔什干的第二场比赛，也是我们球队的“金牌之战”，在鄂木斯克的电视上却没有播出。全家人屏息凝神地收听着广播报道。对于父亲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来说，这是他苦苦期盼了19年的胜利。而对于孩子们来说，这证明了他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尽管在这个美好的家庭里，似乎也别无他路。当然，这位年轻球迷的偶像也由此诞生。阿尔伯特·阿列克谢耶维奇·谢斯特涅夫、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费多托夫、尤里·帕夫洛维奇·普谢尼奇尼科夫和其他黄金一代的军人将永远留在谢尔盖心中。

叶戈尔也热爱足球，只要有机会就去看比赛。他对这项我们最爱的运动的方方面面都非常了解。如果有人最初对这位桀骜不驯的音乐家抱有怀疑，那么这种怀疑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因为叶戈尔对后苏联时代国内足球面临的诸多问题都采取了非常明智的态度。当然，还有国际足球。这位“国防”领导人对国际足球也颇有研究。几乎整个格罗布（GrOb）都贴满了各大俱乐部球员的海报。当然，还有莫斯科中央陆军（CSKA）的海报。令人惋惜的是，这位著名且深受爱戴的音乐家没能

活到今天。他一生都生活在鄂木斯克；他出生在那里，也长眠于此。愿这位音乐家和战士安息。

列托夫兄弟中的老大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在国家艺术中心咖啡馆里，用雪白的茶杯啜饮着绿茶。他的声音轻柔、沉稳而清晰。他是一位萨克斯管演奏家、即兴演奏家和作曲家。他讲课、教书。他是一位伟人，也是一个伟大的家庭。谢尔盖正准备去参加他朋友的新书发布会，临别之际，他表达了想来我们新球场参观的愿望。我答应帮他安排，也一直乐意陪伴他。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感叹，音乐家的平日就像普通人的周末一样忙碌，几乎没有机会去看他最喜欢的球队的比赛。但是，亲爱的读者和中央陆军的球迷们，请让我们向这位著名的音乐家保证，我们永远都欢迎他来佩斯昌卡球场。当然，也让我们祝愿他创作成功，生活幸福。而他的幸福就是他的家人。我的小女儿才一岁的时候就开始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电视里的小家伙们在绿茵场上追逐着那熟悉的足球。这精彩的比赛带来了美味的食物，也因此改善了全家人的心情。

不久之后，我们的军队将在俄罗斯许多城市的广场上举行胜利阅兵式。伟大的卫国战争老兵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将在鄂木斯克亲眼见证这一盛况。鄂木斯克是他的故乡，他一生中大部分艰苦而英勇的岁月都在这里度过。近日，他的家人为这位杰出的老兵庆祝了90岁生日。我们衷心祝贺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胜利日快乐！祝愿这位英勇的战士身体健康、幸福安康！非常感谢！

莱托夫家族档案馆照片由谢尔盖·莱托夫提供

Chronicles | 开放图书馆 — Egor Letov。离线

叶戈尔·列托夫。离线

N.索洛德尼科夫：我们正在继续一月份的对话。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前来参加。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讨论我们面临的问题.....今天到场的人数比集会时还要多。这或许既不算好事也不算坏事。公平地说，我们应该说，我们比任何人都更早地提到了这个日期，或者说，提到这一天，对吧？我们经常被指责分散了人们对更重要事情的注意力，尽管我们真心认为我们的工作同样重要，而且我们在共同的目标和任务上并没有太多共同之处。所以，非常感谢各位选择来参加对话，即使你们觉得这是不得不来的。

下一场对话将于2月24日星期六举行。我答应过大家，我们会尽快告诉大家对话地点。嗯，基本上，我们现在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对话就在这里举行。掌声。谢谢大家。这，这.....这是献给你们的。

这里真是太舒适、太漂亮了。格里博耶多夫运河123号，高等经济学院，非常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们将于2月24日星期六在此聚会。届时将与大家欢聚一堂，一如既往。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两场对话。大约一小时后，列夫·马尔科维奇·什洛斯伯格和加里·雅科夫列维奇·巴尔金将就《斯大林的葬礼》展开对话。卡捷琳娜·戈尔杰耶娃将担任主持人。对话将自由展开，顺其自然。

现在，我很高兴向大家介绍两位嘉宾，我们将与他们探讨最近出版的《叶戈尔·列托夫：线下生活》一书。他们分别是音乐家和导演，叶戈尔·列托夫的遗孀娜塔莉亚·丘马科娃，以及记者尤里·萨普雷金。掌声响起。非常感谢。请进，请坐。

好的。这是你们的麦克风；我给自己拿了个超棒的，就是带这个功能的那个。可惜，我们没带那本书。你们有吗？我这就给你们看看。这本书不在这里卖，但你们还是可以买到的。不过，我知道它的印刷量几乎.....

N. Chumakova：在“人人自由”的商店里。

N. Solodnikov：我昨天在“订阅版书店”看到了这本书。我不知道“词序”（Poryadok slov）有没有卖。这本书叫《叶戈尔·列托夫：线下》（Yegor Letov. Offline），印量很小，第一本快卖完了。但我知道很快就会再版，封面可能也会换。

N. Chumakova：编号

N. Solodnikov：不是吗？封面一样。

N. Chumakova：我觉得这个封面相当.....

N. Solodnikov：这本书收录了听众、观众和粉丝通过“卫国战争”网站向叶戈尔·列托夫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简而言之，它也是一本内容丰富的访谈录。

娜塔莉亚，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的构思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又是如何最终汇集成书的？

N·丘马科娃：你知道，我想从更早的时候说起。事情是这样的，这里面有我的故事，也有我采访过的那些人的故事.....嗯，基本上，就是我在拍摄一部关于叶戈尔·列托夫早年生活的纪录片时采访的那些人。结果发现，对他影响巨大的不仅仅是他的音乐和诗歌（这可以理解），还有他的访谈。特别是他在《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杂志上的那篇访谈，如果有人知道这本杂志的话。那篇访谈的标题是《两百年的孤独》，是一篇很有纲领性的访谈。我知道它被反复转载、改写，人们四处散发、传阅，甚至大声朗读。总之，这篇访谈对人们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它非常特别。

事实上，这是一次自问自答，尽管他在文中写道是朋友在问他问题。他一贯的做法是自问自答，也就是亲自回答那些最重要、也最具全局性的问题。

在2000年代的某个时期，他接受了很多非常糟糕的采访，这些采访不知何故都被审查和剪辑掉了。他对此非常生气，决定不再接受任何采访，除非是像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这样的特殊人物，他的朋友，而且只有在他确信一切都会妥善处理的情况下才会接受采访。

但我们找到了解决办法——接受采访，也就是在网站上回答听众和粉丝的提问。当然，有些问题被拒绝了，而另一些.....叶戈罗夫通常的做法是回答这类问题.....引导他们谈论自己想谈的话题。结果，这成了一个非凡的故事。事实上，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他通过这些采访，向人们讲述了他近期的生活。

因为你必须明白，这些早期的访谈——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相当激进，涵盖了80年代和90年代。所以，他在这里以某种方式展现了他不仅仅是.....他甚至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攀登到了他最终的创作巅峰。我毫不避讳地说。N. Solodnikov：尤尔，书中提到你参与了这本书的创作，或者至少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首先，请告诉我们你是如何参与这本书的创作的？你最终喜欢这本书吗？

尤·萨普雷金：我非常感谢娜塔莎。但我对这本书的贡献微乎其微。

N. Chumakova：我不会这么说。

尤·萨普雷金：我会把它描述为一种小而实用的帮助。你知道，其实我在这本书出版很久之前就读过了，可以说，即使不是完全背下来，我也几乎把它背下来了。当然，这些答案都来自网站上。感觉好像是最近才发生的。但那时候，没有Facebook，没有VKontakte，什么都没有。我清楚地记得那段经历，每隔几天或者每周都会访问民防网站，等着看他们有没有发布下一批答案。对我来说，这成了家常便饭。每次他们发布新答案，我都兴奋不已。

N. Chumakova：真是意想不到。我不知道。谢谢。

尤·萨普雷金：情况确实如此。

我必须说，娜塔莎说得完全正确。无论是《200 Years of Solitude》的访谈，还是那个时代另一篇重要的访谈《Bon Appetit》，这些文章不仅阐释了“民防”乐队的音乐，或者说，他们作品的意义、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而且还构建了一套非常强大的生活准则，或许是一套在特定情况下如何行动、思考或表现的准则，这可能对我们这一代人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记得在2000年代，也就是Afisha时期，马克西姆·塞梅利亚克第一次去采访叶戈尔，他问我：“我应该问你些什么呢？”我便自然而然地开始问他对13年前的某个采访有何看法：“哦，还记得叶戈尔说过什么吗？请问问他，那个观点现在是否仍然成立？”

这些文字的出现，对我来说，简直是.....嗯，对我来说，这绝对是一份不可思议的礼物，一个让我看到某些东西——它们根植于创造力、人格以及人生规划之中，在这个.....天哪，我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它——是如何在改变的同时又保持不变的。在这个.....在这个支撑着“民防”的概念、意象和思想体系中，而我们（我指的是我自己以及我身边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N. Solodnikov: 这本书涵盖的内容确实非常广泛。我们这次谈话的时间有限，无法讨论书中涉及的所有方面。因此，我强烈建议您首先拿起这本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但我会尽量回答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作为“Civil Defense”乐队的忠实粉丝，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我，我也试图在书中找到答案。

对我来说，确信叶戈尔·列托夫是一位真正的欧洲人至关重要。尽管多年来，他们想方设法将他拉入某个阵营——政治的、社会的或其他的——但他首先是一位具有欧洲文化底蕴的人。娜塔莎，是这样吗？

N. 丘马科娃: 你知道，我觉得他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世界文化人士。因为他最喜欢的作家包括日本作家，而且，很自然地，他也读过很多关于佛教的书籍。当然.....你知道，很明显，比如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们被大量以前从未在这里出版过的书籍所淹没，他当然都读了，而且这些都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俄罗斯毕竟是一个欧洲文化国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呢？

N. Solodnikov: 不，嗯，正如他们所说，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问题.....

N. Chumakova: 我不知道。

N. 索洛德尼科夫: 那么，俄罗斯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这仍然是许多人心中的疑问。

N. 丘马科娃: 对我来说.....我学的是语言学，对我而言，俄罗斯首先是一个语言国家，包括古俄语、古教会斯拉夫语，当然还有所有印欧语系语言——我们都来自那里。所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但在我看来，语言仍然是定义我们最重要的东西。好吧，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但绝对是最重要的东西之一。而且，既然他也是一位诗人，而且现在看来确实是一位诗人.....我的意思是，我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诗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我曾在某处读到，叶戈尔·列托夫是当代青年诗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当然非常令人惊讶，但却是事实。也就是说，从普通诗人到说唱歌手.....

Yu. Saprykin: 列托夫斯基研讨会已经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语言学系连续举办了好几年了。

N. Chumakova: 是的，而且很快就会.....

N. Solodnikov: 那么谁在领导它呢？

N. Chumakova: 一位名叫阿纳托利·科尔钦斯基的人。他是一位老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尤·萨普雷金：在谷歌上很容易找到；对于那些理解的人来说，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演讲。例

如，“歌曲《又黑了》歌词两个版本的特点”。

N. Chumakova：嗯，差不多是这样。

萨普雷金：是的，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语言学研究。

N. Chumakova：此外，还将很快出版一本论文集，并在三月份举行一次会议。

N. Solodnikov：它会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发布吗？

N. Chumakova：是的，在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

N. Solodnikov：太棒了。

N. Chumakova：所以，我邀请大家来听听，如果有人能来莫斯科的话。

N·索洛德尼科夫：嗯，我一直有个问题。尤拉，你和我，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开过一次会吗？当时米沙·科济列夫也在场。

尤·萨普雷金：是的，情况就是这样。

N·索洛德尼科夫：我们试着谈论叶戈尔·列托夫。人们似乎或多或少都有些开明，阅读、聆听等等，开明程度也更高一些。但究竟为什么，那么多人错过了歌词的弦外之音，错过了叶戈尔赋予歌词的语境呢？对于科济列夫，对于我们的同志，对于米沙来说，我们反复提及的那首《社会记忆》竟然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为什么，尽管他们了解世界音乐，聆听世界音乐，阅读文学作品，最终却仍然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感知到.....

尤·萨普雷金：嗯，因为人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往往会先剥离一些表面的表象，留下一些最直接的印象。这不仅适用于《民防》。很多人觉得拉斯·冯·提尔的作品是某种色情片，关乎某种性变态，或者，我不知道，塔可夫斯基的作品关乎精神层面，关乎某种神秘的宗教体验。

两者都有一定道理，但仅占这些作品所传达内容的一小部分。尤其就列托夫而言，以及人们对列托夫的普遍反应，情况相当.....该怎么说呢？一方面，这很自然，但另一方面，却非常不公平，近乎悲剧。这就好比说哈尔姆斯写的是人们偶然发现果戈理的作品。嗯，字面意义上的描述，对吧？其中没有讽刺，没有距离感，没有荒诞，也没有戏谑，他只是在字面意义上描述果戈理偶然发现普希金的作品。

莱托夫的认知——很遗憾，通常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也就是说，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他的许多歌曲都是以某个特定人物的视角创作的.....的确，很多歌曲都是如此。不知为何，当我在1988年，15岁时听到《我们沿着燃烧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这首歌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首讽刺歌曲，它并非支持尼娜·安德烈耶娃或叶戈尔·利加乔夫之类的人物，对吧？这是一首讽刺歌曲，一首嘲弄歌曲，是以某个虚构的、顽固的共产主义者的视角创作的。

这种情况确实很多。但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距离.....你甚至不能称之为双层底——它就那样暴露在水面上。不知为何，这一切都被人忽略了。

最外层的伪装被剥去，你必须立即做出某种判断：“这是个激进分子，这是个极端分子，这是个朋克，这是个爱国者，因此，这是个反共分子，这是，他.....”这正是我们在开始之前提出的问

题：“那么，莱托夫现在会是谁呢？”

N. Solodnikov: 注意，我没说过那样的话。

尤里·萨普雷金：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你抓到一个人后，需要立即把他归入某个阵营——他可能支持顿巴斯，可能支持反顿巴斯，可能支持迈丹，也可能不支持迈丹。所以，你需要马上确定他的立场。

莱托夫的生活，就像所有人一样，并非充满了……嗯，很多……他的思想历程相当复杂。人并非生来就拥有固定的信念。但这本书也反复强调，任何真正的创造力，任何真正的艺术，都始终是多维的。它就像一块石头投入水中，激起的涟漪完全无法预测。它就像一块水晶，拥有各种切面，你可能会天真地认为，这些用如此粗犷的嗓音演唱的、略显刺耳的歌曲，仅仅是一种攻击性的表现，或者某种明确的宣言。绝对不是。这是严肃的艺术，它很大程度上是概念艺术，就应该用这种态度来欣赏它。

当然，任何直接的体验，比如一个人在舞台前的观众席上跳起来，或者像现在这样，打开DVD看电影时起鸡皮疙瘩，也都是正确的。嗯，只不过这并非唯一的方式。

N·索洛德尼科夫: 是的，这本书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的。还有你2011年接受《肖恩斯》杂志采访时谈到的叶戈尔的内心目标是与人交谈，向他们解释他的各种立场。

N. Chumakova: 这绝不是弥赛亚主义。

N·索洛德尼科夫: 不是弥赛亚主义。好吧，我就直说了。最近，不管我们聊什么，他们都想方设法把我们拉进政治的漩涡里，这真是令人恼火。然而，在叶戈尔生命的最后几年……政治，或者说政治本身，在他的思想和谈话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你们在家谈论过吗？他自己是怎么看待政治的？他思考过政治吗？

N·丘马科娃: 就像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他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你怎么可能不去想这件事呢？但是如果……哦，你读过那本书。里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他今天会加入哪个政党？答案是：“俄罗斯迷幻党”。嗯，你明白我的意思。

说真的，他这些年真的已经完全释怀了。当然，很明显他以前不喜欢那样，我简直无法想象他现在会说什么，因为有很多事情都会让他生气。

另一方面，这个问题我已经回答过无数次了：你永远无法替一个死去的人说话，正如人们常说的，他无法为自己辩护。事情可能千奇百怪。我不知道他会说什么，因为正如同一本书里所说，“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想法，到了晚上就完全相反了，这就是我的歌，我形形色色的想法，无论何时何地，都始终如一。”这才是更有意思的地方。

因为，说真的，他是个思维方式极其矛盾的人。坦白讲，连我都无法想象他……这就是和他一起生活最大的乐趣。因为，没错，他……他总是滔滔不绝，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如此。首先，他是个拥有非凡幽默感的人，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他那些看似阴郁严肃的歌曲，其实总是蕴含着这种幽默。

你看，这就是尤拉刚才说的关于表层含义的意思。很遗憾，确实如此。我不会说这是某种庸俗的理解，但说真的，一个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的人，能够从自己的作品中，包括他自己的作品中，

洞察到比这多得多的层次。因为他本人就博览群书。而且他的诗歌也写得很好。其中蕴含着如此丰富的意义，以至于有时我都要过很多年才能领悟。

尤·萨普雷金：嗯，我的思绪已经飘远了。

N. Solodnikov：那我就问吧。

尤·萨普雷金：请便。哦，对不起！她跑回来了。

N. Solodnikov：请继续。

萨普雷金：是的，这正是我要说的。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你试图更接近于定义列托夫所作所为的意义（至少对我而言），那么，它甚至算不上解释，而是一种视觉演示，以最直接、最感官的方式，展现了你日常的意识，那些寻常的思维模式，那些日常的忙碌，以及你头脑和思维所遵循的那些普遍接受的路径，这些都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个很小、很可怜、很不幸的一部分，而这仅仅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那无比伟大、美好、奇妙的体验的一部分。在很多方面，这种声音，这种冲击力——它就像一把激光剑，击中你的头部，向你揭示那些由于你自身的局限和盲点而无法看到的东西。

我为什么要说这些？

N. Solodnikov：为了尝试适应.....

尤·萨普雷金：啊！又回到政治话题了。嗯，当你.....我现在正努力权衡我会支持谁这个问题。我们来想象一下，叶戈尔会支持谁，索布恰克还是格鲁季宁？你是不是立刻就明白了这个问题有多么重要，以及是否值得浪费时间，仅仅是比较这两者？抱歉。

N. 索洛德尼科夫：没关系。大家都想听到这个。顺便说一句，关于“记忆社团”，我想澄清一下。在这本书里，叶戈尔对那些抱持“爱国主义万岁”想法的人，以及那些组建团体试图领导所有人的的人，做出了相当直率的回应。他毫不留情地谴责这些人，认为他们对此总是极其反感，从来不会与他们站在一起，更不会与他们一起游行。

我想进一步询问.....首先，大家都见证了“民防乐队”（Civil Defense）的这种转变或演变，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或许是一场革命吧。这与专辑《星陨》（Starfall）和后来的《漫长而幸福的人生》（A Long and Happy Life）的发行密切相关。乐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音乐风格变了，一切都变了。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有哪些先决条件？他看过什帕利科夫（Shpalikov）执导的电影《漫长而幸福的人生》吗？他对这部电影有什么看法？

N. Chumakova：你知道，是的，这很有意思。事实上，当他给专辑命名并创作这首歌时，他完全没有想到这部电影，尽管他看过。但显然，他确实想到了.....

N. 索洛德尼科夫：他没考虑过这部电影吗？

N. Chumakova：不，绝对不是。

尤·萨普雷金：在谢梅利亚克的采访中，马克西姆问他：“那么，这样会怎么样呢？”

N. 索洛德尼科夫：嗯，书里没有提到这一点。我很久以前重读过谢梅利亚克的采访。

尤·萨普雷金：是的，指的是什帕利科夫。哪个什帕利科夫？出自哪里？

N. Chumakova：是的，当然非常搞笑。

N. 索洛德尼科夫：不可能吧。哇。

N. Chumakova：没错，没错，没错。确实如此。

你知道，答案是这样的。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首先，1997年，就在我们真正相遇、开始一起生活、一起演奏的时候，他遭遇了一场严重的创作危机。他真的觉得自己已经写不出任何东西了，一切都结束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看起来完全能够自给自足。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表达一些东西，把一些东西带给人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很滑稽，但他并没有真正尊重他们。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五年。那是一段非常非常艰难的时期。我甚至不知道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因为坦白说，他当时几乎濒临死亡，因为对他来说，诗歌是最重要的，是他存在的意义，是他活着的意义。

然后，在某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不太愿意公开谈论这件事。但当时他取得了突破，这其中确实有一段故事。我不会评论具体发生了什么，虽然书中对此有详细描述，如果有人想知道，书中很清楚地写在那里。

他真的突破了。正如他所说，就像喷泉被抽了出来一样。他一直以来所害怕的一切，他所经历的一切，都随着这张专辑——他的第二张专辑《重生》（Reanimation）——倾泻而出，而这张专辑实际上是在同一时期录制的。

至于最后一个，如果非要说的话，他完全不一样了。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他预感到自己是最后一个。他真的不一样了。在此之前，他写的、创作的，基本上都是在仇恨的驱使下写成的，不管是不幸还是幸运（反正都发生了，所以也算是幸运吧）.....也就是说，每当他看到一些让他恨得咬牙切齿、怒火中烧的事情，一些可怕的事件，他总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创作。

《我们为何做梦？》——恰恰相反，整张专辑的创作主题并非接纳，而是一种无尽的幸福、感恩，或许还有爱。这是一张截然不同的专辑。而我们最终能够录制完成.....我想，这大概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N. Solodnikov：尤拉，你呢？对我来说，民防乐队和《Dolgoya i schastlivoy zhizn'》（《漫长而幸福的生活》）以及《Zvezdopad》（《星落》）之前的民防乐队，以及之后的民防乐队，这两个时期是否截然不同？还是你认为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或许你更喜欢你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或者说是已经取得的成就？

尤·萨普雷金：不，对我来说它们根本没有区别。

N. Solodnikov：给我们讲讲吧。

尤·萨普雷金：嗯，其实没什么不同。我的意思是，这跟乐队的《捕鼠器》（Mousetrap）时期和《百年孤独》（100 Years of Solitude）时期没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在这个.....该怎么说呢？比如，像Aquarium这样的乐队，他们的专辑和风格也各不相同。总的来说，很多乐队和导演都会在创作生涯中不断变换风格：毕加索的蓝色时期、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这些风格看似毫无共同之处。

而《防御》这首歌，出乎意料地，总是变化多端，而且总有变化，甚至不是在很深的层面上。它始终是同一件事：某种艺术化的具象思维，某种语言，以及某种蕴含其中的信息——始终如一。对我而言，它们就像同一本书的不同章节，而不是某种难以理解的变形。至少，我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

N. Chumakova: 我完全同意。事实上，那些说“他以前是这样，后来完全变了”的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实际上，他的本质始终如一，如果你真的忽略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表面现象，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

尤·萨普雷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揭示。一切都始于歌曲《克格勃摇滚》，然后是《俄罗斯实验场》时期，接着是《普里格-斯科克》和《百年孤独》（懂的人自然懂）。每个新阶段并非否定前一阶段，而是揭示了之前阶段中蕴含的某些东西，只是你当时没有听到或理解。

N. 索洛德尼科夫: 嗯，我只是好奇。他在书中好像也谈到了这一点……我就问问音乐方面的问题——不是歌词，而是音乐本身。显然，这和专辑《至日》（Solstice）以及《难以承受的生命之重》（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Being）有关。它们被重新混音过，对吧？重新录制过。

N. Chumakova: 是的。轻松。

N. Solodnikov: 哦，抱歉，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N. Chumakova: 那么“可承受的重量”就是一种反转。

N. Solodnikov: 是的。据我了解，高品质设备的引入催生了新的音乐风格，这种风格始于专辑《Starfall》，对吗？而不是《A Long and Happy Life》？

N. Chumakova: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确切地说，《Starfall》也是用很烂的设备录制的。但后来我们居然成功地把那些专辑重新混音，而且音质还不错。因为，说真的，当时那些家伙……那是我加入之前的事了，所以我只能告诉你我从Egor那里了解到的情况。他们刚弄到一些很弱的数字设备，根本驾驭不了。而且，说真的，声音简直一团糟。

后来我们在2005年重新混音时，发现里面蕴藏着如此丰富的素材，如此多的声音，如此多的美感。我们把这些都挖掘了出来。也正因如此，这些专辑才被重新命名，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它们与叶戈尔……时期的作品产生关联。

他当然觉得直接否认，说那些利莫诺夫和其他人都是无赖，很尴尬。当然不是。然而，当时他们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而且他自己认为那是一场诗歌革命，因为他非常欣赏利莫诺夫的诗歌才华。

但他绝对不想让这件事与那些把他与真正的法西斯思想之类的东西联系起来。

N. Solodnikov: 有没有计划重新录制其他专辑？

N. Chumakova: 是的。叶戈尔当时很想重录1989年的专辑，那时候录音机很烂，录音质量也很差。所以他想让我们用新的阵容重新录制一遍。但是，很遗憾，没能成功。

另一方面，我并不后悔；即使是现在的状态，它们也绝对很棒。所以……嗯，你说得对，我确实有

些想法，但是.....

N. Solodnikov: 尤拉，我想问问你对专辑《Starfall》的看法，以及你对专辑整体的态度.....

尤·萨普雷金：太棒了，科尔。我还能说什么呢？

N. 索洛德尼科夫: 嗯，是的。我只想谈谈叶戈尔与苏联音乐文化、歌曲文化的关系。因为这绝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以前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坦白说，我想以后也不会有人能做到。他对苏联歌曲文化、音乐文化的理解，并没有将其局限于某种新的框架，而是为这些歌曲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对吧？你同意吗？

尤·萨普雷金：我认为故事已经很清楚了，这种方法可能不仅适用于苏联歌曲文化，也适用于任何音乐文化。而且这张专辑原本计划做成双碟装，第二张碟应该收录英文歌曲。

N. 索洛德尼科夫: 但有些苏联电影也没有被收录，对吧？还有《鹿王》。

N. Chumakova: 我们只是在过程中把它排除掉了，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N. Solodnikov: 它们最终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还是被记录下来了？

N. Chumakova: 不，那些歌没录下来。你看，事情是这样的，他们之前已经和库兹马一起构思了一些歌曲。库兹马也想唱其中的一些，但最终我们只和叶戈尔一起录了，因为当时科斯佳·里亚比诺夫（库兹马）已经离开了我们。所以，剩下的都是叶戈尔特别想唱的歌。我们也稍微改动了一下。特别是维索茨基的那首《岁月、世纪、纪元》（All the Years and Centuries and Epochs in a Row）——那是我最喜欢的维索茨基的歌。我苦苦哀求他，因为他想唱《我们转动地球》（We Rotate the Earth）。

N. Solodnikov: 我刚刚想起叶戈尔演唱这首歌的情景，背景里.....现在正好是这些纪念日，你总能在广播里或其他地方（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听到这些翻唱版本。就叶戈尔而言，这.....我的意思是，这甚至有点不搭调，只是.....它肯定会出现在那里。尤拉，对不起。

尤·萨普雷金：那么，关于《星陨》这首歌。这也不算意外，因为苏联歌曲之前就出现在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专辑里，比如《俯冲轰炸机编年史》等等。而且，总的来说，很明显《我们来自童年》这首歌也在某种程度上.....

N. 索洛德尼科夫: 对了，要是他唱过这首歌就好了.....

N. Chumakova: 我可以打断一下吗？

N. Solodnikov: 抱歉。

N. Chumakova: 抱歉。只是因为《某处有座城市》这首歌是关于鄂木斯克的。真的。“瞧，胸口都陷在黏糊糊的尘土里。”

尤·萨普雷金：这不仅仅是一系列怀旧的记忆，更是对前辈们的追忆，那些在音乐上，或者，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在实质内容、能量层面上，与我朝着同一方向思考的人。而这一系列，或许正是任何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会为自己构建的东西。在《星陨》中，莱托夫只是以最直接、最有

效、最有力的方式呈现出来。

浏览网站上发布的内容，包括所有初步的曲目列表以及最终被淘汰的歌曲，确实很有意思。我尤其惊讶的是，《如果你没有阿姨》这首歌竟然曾经被列入计划。那首歌应该是和库兹马合作的吧？

N.丘马科娃：当然，库兹马。当然。

Y. Saprykin：是的。

N. Solodnikov：我生动地想象出了它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N. Chumakova：那该多好啊！可惜他没能和我们在一起。

Y. Saprykin：但总的来说，即便抛开那些不谈，它最终也成为了一个非常连贯的表达。同意吧？而且，对我来说，它与所有那些老歌，比如《Ogonyok》、没完没了的翻唱等等，都截然相反，因为它并没有试图……这才是关键！即使这张专辑收录了看似最著名的歌曲（比如《我会在遥远的车站下车》），它也没有试图唤起你某种怀旧的柔情，或者让你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比如“童年清澈的眼神，2点20分的香肠”。这就是这首充满怀旧气息、如同电视节目般的歌曲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它听起来像是今天创作的歌曲。正如他所说，他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作品。

N. Chumakova：那里也有一些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例如，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首是塔里维尔季耶夫的《我做出了决定》，因为它……

尤·萨普雷金：是的。《我做出了决定》和《同志》这两部剧在那里都不算家喻户晓。

N. Solodnikov：那么《战争即将降临柏林》这首歌呢？嗯，在我的朋友中，在列托夫之前没有人听过或知道这首歌。

N. Chumakova：你在说什么？怎么说？

N. Solodnikov：是的，我是认真的，绝对的。也就是说，它绝对进不了前二十，甚至连该国最重要的战争歌曲都进不了（“战争正向柏林进发，士兵正向柏林进发”）。

尤·萨普雷金：我还应该说，列托夫是那种艺术家、那种音乐家，他就像一扇门，为听众打开了一扇通往浩瀚文化现象的大门，否则这些现象将难以触及。我认为，很多人是通过列托夫，通过这些访谈和他在这里提到的专辑名称，才了解到“LAV”乐队以及整个黄金时代的迷幻摇滚。这一切都非常重要，因为它就像一座灯塔，一种理念……

N. Solodnikov：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他和布罗茨基非常相似。

萨普雷金：顺便说一句，我想说的是，布罗茨基在采访中的表现也完全一样。卡瓦菲、特朗斯特罗姆，所有这些名字……

N. 索洛德尼科夫：我们也是经由他才了解到他们的。

尤·萨普雷金：是的，是的，是的。多亏了他，这些作品才得以进入俄罗斯的某些阅读圈子和文化语境中。

奇怪的是，列托夫不仅向听众介绍了作家诺萨克或“明天”乐队，还介绍了帕赫穆托娃，对吧？或者一些苏联经典歌曲——并不常见，也不广为人知，但真的非常非常棒。

N. Chumakova: 是的，一切都正确。

N. Solodnikov: 当这些歌曲的作者们听到叶戈尔的所作所为时，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N. Chumakova: 我只知道，嗯，很久以前（这与《星落》无关），帕赫穆托娃非常喜欢歌曲《列宁如此年轻》。

N. 索洛德尼科夫: 她听到了吗？

N. Chumakova: 是的。因为他们问她会不会唱歌。

关于《星陨》的作者，我不太清楚。我只知道维索茨基的儿子尼基塔免费赠送了这本书。至于其他作者，我就不多说了——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

实际上，很遗憾，这就是我们没能制作第二部分英文内容的原因，因为那时版权就生效了，结果发现会花费我们一大笔钱.....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可以之后把它放到网上，而且不用花钱。当然，我们最终还是得把所有东西都做出来。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N. Solodnikov: 我可以问一下叶卡捷琳堡吗？

N. Chumakova: 是的，谢谢。恰恰相反，很好。

N. Solodnikov: 因为对我来说.....尤拉昨天告诉我，娜塔莎今天也和我聊了聊，所有“民防”乐队的歌迷即将迎来一件大事——一部演唱会电影即将上映，这是“民防”乐队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一场演唱会。请简要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内容是什么，何时拍摄的，以及在哪里可以观看？

N. Chumakova: 是的。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甚至可以说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我现在才知道，我们唯一真正被拍摄得如此精彩的演唱会，都是在莫斯科举办的。而且那还是特邀主办方安排的；他们想方设法做到了。其中几场演唱会已经发行了DVD。

除了莫斯科以外，即使在圣彼得堡，我们也从未被专业摄影师拍摄过。倒是有一些私人拍摄，也有一些盗版视频。

后来才知道，那自然是我们最后一场演唱会。那是一次短暂的巡演，在乌法和叶卡捷琳堡，2月8日和9日，正如你所知，那是我去世前10天。

那是一家位于叶卡捷琳堡的大型俱乐部，名叫“Teleclub”，当时正准备关门。有人说：“既然我们要关门了，我们想制作一张我们最精彩演出的DVD，我们可以拍摄你们的演唱会吗？”当然可以，为什么不呢？

我们最后这场演唱会被拍摄和录音，真是太棒了。我们也录下了声音.....我希望两天后尤拉能亲自听到，因为我想把它放映出来。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毫不羞愧地说，在制作过程中，我的心怦怦直跳，热泪盈眶。它的力量无比强大。然而，这并非像我们通常在莫斯科拍摄的那种盛大的周年纪念演唱会；它只是一场普通的演唱会。只不过，它的结构恰好如此安排.....首先，真正让大家感到惊喜的是，它以歌曲

《Without Me》开场。其中还隐藏着许多秘密，我不会透露，因为还是让观众自己去体验更有意义。

N·索洛德尼科夫：既然你已经告诉我它从哪里开始，那就告诉我它到哪里结束。这很有意思。

N·丘马科娃：不，我不会告诉你。咱们保密吧，因为这确实是个很震撼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最后，演出结束后，他们放了一首歌.....你知道，为了让大家离开。我不会说是哪首歌——就当是个惊喜吧。

N. Solodnikov：一首来自《民防》的歌曲？

N. Chumakova：不，不。

N. Solodnikov：哦，甚至没有？

N. Chumakova：不。而且，在我看来.....

N. Solodnikov：两天后只有尤里·萨普雷金会看这部电影。

N. Chumakova：是的。但我希望，如果我们能顺利拿到发行许可证（这是我们目前的首要任务），2月19日那天，我们就能在全国多家影院上映。我想莫斯科会有几家，这里也会有几家，其他一些大城市也会。就在19号那天。所以.....

N. Solodnikov：19号。敬请关注后续新闻。

N. Chumakova：是的，可以说是在海报背后。我希望一切顺利。“极光”，大概是这样吧。

N. Solodnikov：电影院，Rodina，大概是这个名字。

N·丘马科娃：我不知道。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

N·索洛德尼科夫：总的来说，是的，最重要的是它有可能在以后发布。对吗？

N. Chumakova：是的，是的，当然。

N. Solodnikov：我们这些19号不在城里的人，将会看到这一切。

非常感谢。时间过得真快。我强烈建议大家今天或明天就去圣彼得堡的书店买这本书，趁现在还有货，因为之后我们就得等再版了。

N. Chumakova：是的，顺便说一句，你会发现它读起来非常流畅。

N. Solodnikov：这本书太棒了，一定要去看2月19日的这场电影音乐会。尤里·萨普雷金、娜塔莉亚·丘马科娃，非常感谢你们。谢谢。

尤·萨普雷金：谢谢。

N. Solodnikov：休息10分钟，最后一段对话。谢谢。

N. Chumakova：非常感谢。

共读系列 #3 (140) —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叶戈尔能够为自己挺身而出”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叶戈尔能够保护自己”

★ ★ ★

离线 / Egor Letov

М.: Vyrgorod, 2018. — 256 页



2月19日是俄罗斯最受欢迎、最具独立精神的摇滚艺术家叶戈尔·列托夫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这位诗人兼音乐家的歌迷不仅珍视他的作品，也珍视他对诸多紧迫问题的看法。去年12月初，国际非虚构类图书博览会举办了一场座无虚席的《离线/叶戈尔·列托夫》新书发布会。这本书收录了叶戈尔在民防乐队网站上对一些问题的回答，由他的遗孀、纪录片《健康与永恒》的导演娜塔莉亚·丘马科娃整理整理。ChV的一位记者就此采访了娜塔莉亚，了解了本书的创作理念和创作过程。

你为什么选择这种不寻常的书籍形式？比如说，写一本传统的自传岂不是更有趣吗？你的名字印在封面上，肯定能保证这本书大获成功。

“传记肯定会出版，我们只是需要找到时间。我们一直很想出版这些短篇访谈集，因为这种形式非常成功。访谈是线下进行的，也就是说，叶戈尔回答了他想回答的问题，其中很多问题都出乎我们的意料。”

——有没有哪些问题激发了大家的热情？

“是的。有些问题激起了我的愤怒，也让我非常恼火。有时，叶戈尔读完这些问题后会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心想：‘这些人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当然，他完全有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反驳对方，而且他也能轻松地摆脱那些令人不快的对话者。”

“叶戈尔的回答表明他性格坚定，毫不妥协。他经常否认这个问题。他真的如此不妥协吗？还是他有时也会做出让步，允许自己稍微偏离一下原则？”

“或许他确实如此，但不会对陌生人如此。是的，他绝对不妥协，非常强硬。但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在日常生活中，他当然可以很随和。尽管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叶戈尔有时也很固执。有时他觉得自己的立场有些动摇，应该让步，但他却顽固地拒绝让步。”

“在这本书里，他声称如果一个人真心想做某件事，就一定能做到。但是有成千上万个团体——和

民防组织一样成立——几十年来一事无成，而且永远也不会有。叶戈尔的话里是不是有很多误解？”

“是的，成功或许带有一定的运气成分。但叶戈尔凭借着前所未有的毅力，真正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的一切成就都源于他惊人的勤奋。对他而言，诗歌、音乐和精神生活至关重要。因此，他将所有空闲时间都投入到创作中。我认为，叶戈尔的成功正是他毅力和才华的完美结合。”

他的歌曲和专辑都以著名文学作品命名，例如《恶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百年孤独》、《红色的笑声》和《猪圈里的玻璃珠游戏》。这表明叶戈尔博览群书。书籍对他来说究竟有何意义？

书籍、音乐、电影和绘画在他的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叶戈尔喜欢绘画，而且阅读量惊人。但当我们相遇时，感觉他似乎已经读完了所有需要读的书，所以他可以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这种情况大多发生在火车上。

— 记者们是否真的经常歪曲叶戈尔的话，以至于他不再接受采访，转而采用“流行”的在线问答形式？

“是的，他们歪曲事实，简直骇人听闻。他们断章取义，胡乱拼凑，结果令人难以置信。这些所谓的‘记者’在我们看来，有时要么愚蠢至极，要么简直是醉醺醺的。我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因为结果就是，在一些采访中，他完全变了个人，不像他自己。”

叶戈尔·列托夫是否曾想过写一本书——小说或非虚构作品？比如关于音乐的。在我看来，他完全可以像一位真正的乐评家那样，对音乐进行深入而引人入胜的探讨。

“没错。我觉得我们本来可以做到的。我们最初的计划是让他回忆往事，我来记录。我也很想这么做——那样一本书会包含他对音乐、生活和书籍的思考。可惜没能实现。我们一直拖延，似乎并不着急。”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一部关于叶戈尔的新电影？

“我们现在正在飞速收尾……各种消息已经开始陆续发布，门票也快卖光了。我非常紧张。我们正在制作一部名为《我们最后一场演出》的演唱会电影。这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我毫不掩饰。当然，它也带有一丝神秘色彩。这部电影的拍摄竟然是在叶戈尔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上，这简直是个奇迹。要知道，在那些地方，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被专业地拍摄过。有时候他们会用业余摄像机，但后来我们发现了这段令人惊艳的影像。而这竟然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所有看过这部演唱会电影的人都印象深刻。它真的非常特别。”

弗拉基米尔·古加采访

С начала лета – Летов

初夏时节，一位杰出的人物——爵士音乐家、萨克斯风演奏家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向DNA谱系学院提交了DNA样本进行检测。他是一位传奇人物！他曾与谢尔盖·库廖欣合作，三十年前就与DDT和Aquarium乐队录制过专辑（我当时就是这些乐队的歌迷），还曾作为作曲家参与了塔甘卡剧院导演兼院长尤里·柳比莫夫执导的《马拉与萨德侯爵》的制作，与十几个乐队合作，并参与过无数其他项目。他还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摇滚歌手、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哥哥。作为我们“**杰出人物DNA**”项目的一部分，我们获得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的Y染色体（父系）和线粒体DNA（母系）数据。同样的结果本应出现在他的弟弟叶戈尔·列托夫身上，可惜他英年早逝。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购买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著作《佛陀候选人》。读了几页之后，我意识到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正是我们想要的那种人：他以家谱信息作为叙述的开篇：“从何说起呢？作为一个出生在东方的人，我觉得应该先说说我的父母和祖先。”之后，我浏览了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在VKontakte上的相册，找到了几十张老照片。照片上是谢尔盖·列托夫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佛陀候选人》一书中也收录了这些人的老照片。我们每个人都受到自身根源的影响，这显而易见，但很少有人会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人甚至会刻意否认自己的祖先和过去。



莱托夫·费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 (Letov Fedor Dmitrievich)、谢尔盖·乔治耶芙娜 (Sergei Georgievna) 和塔玛拉·乔治耶芙娜 (Tamara Georgievna) (娘家姓 Martemyanova) ,
塞米巴拉金斯克, 1958 年 6 月

从书中我们得知, 列托夫兄弟的父亲一方是奥尔金斯卡亚乡的农民后裔, 该乡曾经是彼尔姆省孔古尔斯基区的一部分, 后来又成为彼尔姆省奥辛斯基区的一部分。以下是谢尔盖·费多罗维奇的描述: “我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列托夫于1926年3月31日出生于彼尔姆边疆区奥尔金斯基区戈卢乌希诺村.....从父亲的讲述中, 我知道他的母亲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夫娜·列托娃出身贫寒。她的祖父(我的曾曾祖父)名叫斯捷潘·伊格纳申。斯捷潘·伊格纳申的女儿安娜因为家境贫寒, 16岁就嫁给了伊万·伊万诺维奇·列托夫。婚后, 他们被安排住在一间木屋里, 用作澡堂, 屋里有两扇窗户面向街道, 还有一扇小窗户通向院子。房子里设施简陋, 屋顶上经常掉落杂物。他们睡在简易的平台上, 有一天, 有什么东西进了这对夫妇的女儿叶夫菲米娅·伊万诺夫娜的眼睛, 导致眼睛发炎流脓。对于一个独眼女孩来说.....”她家境贫寒, 在村里结婚是不可能的。她与虔诚的富裕农民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科别列夫未婚生子。

系谱学家阿列克谢·尼洛戈夫与列托夫兄弟有大约十代的血缘关系, 他在题为《民防领袖叶戈尔·列托夫的家谱》的文章中写道: “我们的列托夫直系祖先可能在17世纪末定居在昆古尔斯基区的戈卢希诺村, 尽管这个姓氏最早出现在1703年的人口普查中。”阿列克谢·尼洛戈夫还记载: “1758年, 尤戈夫斯克的炼铜厂被授予切尔尼舍夫伯爵。”因此, 戈卢希诺的居民以及周边村庄的村民都被分配到这些工厂工作。1762年, 戈卢希诺的居民积极参与农民起义, 抗议工厂中非人道的剥削, 最初.....先是旷工, 然后是公开旷工。

但谢尔盖和伊戈尔·列托夫的直系父系血脉, 也就是Y染色体的传承来源, 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戈卢希诺·科别列夫家族及其祖先。多亏了阿列克谢·尼洛戈夫, 我们才知道在1772年至1774年间, 戈卢希诺村45户人家中有6户属于科别列夫家族。

《1679年孔古尔区俄罗斯人口普查》一书中记载了居住在孔古尔东郊的科别列夫家族的信息：“切列姆霍沃伊·洛格村.....拉尔卡·克列缅季耶夫，科别列夫之子。”他有四个孩子：格里什卡、雅库什科、菲尔卡和十岁的阿尼奇卡。格里什卡还有一个三岁的儿子瓦斯卡。在戈卢希诺以西80公里的奥辛斯基区村庄里，也发现了科别列夫家族的踪迹。1621年的巡逻簿中提到了斯捷潘科·科别尔，他可能是所有奥辛斯基科别列夫家族的祖先，也可能是所有彼尔姆科别列夫家族（包括孔古尔家族）的祖先。然而，1623年至1626年乌斯秋格区（大乌斯秋格市）的地籍簿显示.....在特罗茨科耶湖畔的切列姆涅沃村，奥丰卡和格里什卡·科别列夫.....

事实上，我们对来自大乌斯秋格的信息很感兴趣，原因如下：我们在研究员L. Yu. Eltysheva一篇题为《[波莫瑞的农民——未来昆古尔区的定居之源](#)》的精彩文章中，找到了关于彼尔姆地区第一批俄罗斯定居者的信息。根据Eltysheva的说法，俄罗斯人是从北方的波莫瑞来到彼尔姆地区的：

“根据土地登记册，1613年，后来建立昆古尔城的土地属于伊伦鞑靼人.....直到1618年，那里还没有一个俄罗斯人定居点。根据1623-1624年的人口普查，在西尔瓦河和伊伦河沿岸登记了86名男性（俄罗斯人）。”该地区的有组织定居始于17世纪中叶。在此期间，波莫瑞北部地区的农民向乌拉尔山脉迁移的趋势日益加剧，这与农民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农奴制在这些地区的蔓延密切相关。因此，1647年，“波莫瑞城镇.....贸易站.....商人们带着妻儿，为了摆脱粮食歉收和贫困，离开了他们沉重的生活，前往西伯利亚。”1648年，根据沙皇的法令，在昆古尔卡河畔建立了一座设防定居点——昆古尔，它成为从中部通往西伯利亚的重要通道之一。

昆古尔卡河畔的昆古尔要塞距离后来的戈卢希诺村遗址非常近。除了有组织的定居者外，彼尔姆地区还聚集了大量逃亡农民和流放者。在俄罗斯人定居新土地的最初几年里，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粮食歉收和饥荒。他们还与当地居民，特别是巴什基尔人，发生过武装冲突。这些人的生活十分艰难。Y

染色体研究的结果仍在处理中。我们在列托夫家族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DNA谱系，但这在我们研究中并不罕见。一切完成后，我们将在“杰出人物的DNA”网站（<http://topdnk.ru/>）上另行发布文章通知您。请耐心等待！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这样描述他的母系血统：“我的祖母年轻时姓埃里卡洛娃.....她的父亲是一位二等商人，于1918年去世，未能摆脱生意破产的打击；她的丈夫于1937年被枪决，罪名是人民公敌.....我的祖父（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马尔捷米亚诺夫）是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的一名哥萨克的儿子，曾是舒琴斯卡娅村的一名军士长。”





照片中：从左至右，坐着的是亚历山德拉·季莫费耶夫娜·埃里卡洛娃（S.F.列托夫的曾祖母）；
中间是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马尔捷米亚诺夫（祖父）和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的母亲，
另一位曾祖母叶莲娜·阿列克谢耶夫娜·马尔捷米亚诺娃；

右边站着的是祖母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马尔捷米亚诺娃（娘家姓埃里卡洛娃）。

以下是关于耶里卡洛夫家族的一些信息：“我祖母的家族是传统的俄罗斯商人家庭。她的父母，亚历山大·伊里奇·耶里卡洛夫和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育有12个孩子，其中9个长大成人。他们的教育是典型的商人阶层教育——文法学校、德语和法语，以及家庭教师。”亚历山大·伊里奇·耶里卡洛夫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季莫费耶夫娜是目前已知最远的线粒体DNA携带者，该DNA由谢尔盖和伊戈尔·列托夫兄弟继承。

因此，我们已知有四代线粒体DNA携带者：谢尔盖和伊戈尔·列托夫——他们的母亲塔玛拉·格奥尔基耶夫娜·列托娃（娘家姓马尔捷米亚诺娃）——他们的祖母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马尔捷米亚诺娃（娘家姓耶里卡洛夫）——他们的曾祖母亚历山德拉·季莫费耶夫娜·耶里卡洛夫（娘家姓津科娃）。然后，一直延伸到无穷无尽，是一串女性——母亲们，我们不知道她们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们的容貌，我们只能想象她们的面容。



亚历山德拉·蒂莫费耶夫娜·埃里卡洛娃（娘家姓津科娃）和她的丈夫亚历山大·伊里奇·埃里卡洛夫

但谢尔盖·列托夫与成千上万位母亲和祖先之间，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纽带。这听起来老生常谈，但这条无形的纽带确实存在，而且是真实存在的。我总是带着敬畏之心思考它。我想抓住这条纽带，这条延伸至无穷无尽的脐带，去感受另一端的牵引力。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与他的母亲长得很像，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也是如此。他们也与他们的祖母亚历山德拉·马尔捷米扬诺娃有些相似。列托夫兄弟似乎与他们的曾祖母亚历山德拉·季莫费耶夫娜·津科娃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重要的是结果，包括对科学而言。研究人员从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的样本中获得了线粒体DNA分析数据。他们与DNA谱系学领域的专家、历史学副博士V.I.合作完成了这项工作。梅尔库洛夫。

线粒体DNA由母亲遗传给子女。由于只有女性才能将线粒体DNA传递给后代，因此这项检测可以提供关于母亲、外祖母以及母系直系祖先的信息。虽然线粒体DNA不像Y染色体那样含有串联重复序列，但它确实存在突变。有时，读取酶会发生错误，插入不同的核苷酸，甚至插入额外的核苷酸。然而，线粒体DNA环状区域的突变不会影响身体的任何重要功能。它们仅仅是“历史档案”中的一个条目——一个重构母系谱系历史的机会。



两个高变区——HVR1和HVR2——用于确定线粒体DNA中的突变模式。高变区是指核DNA或线粒体DNA中的D环区域，其中核苷酸碱基对重复（核DNA）或替换（线粒体DNA）。这些片段中积累的突变在严格限定的位置重复出现，从而决定了线粒体DNA单倍群。

我们掌握了线粒体DNA谱系分析的原始数据。这将如何帮助我们重构谢尔盖和伊戈尔·列托夫母系血统的历史？历史又将呈现出怎样的全新色彩？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列托夫家族也有他们自己的“夏娃”，即他们母系血统的始祖。她大约出生于两万年前。所有携带线粒体单倍群T的人都源自这位石器时代的古老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单倍群分裂成两个主要分支——T1a和T2b。人们认为，携带T1a单倍群的人群随着新石器时代的农民来到了今天的欧洲。

欧洲最古老的T1a遗骸是在多瑙河地区的斯塔切沃-克里什卡新石器时代墓葬群的研究中发现的。这些早期农民是来自小亚细亚的殖民者的后裔，他们不仅职业不同，外貌也与当时的“欧洲原住民”——当地的克罗马农人——截然不同。正是从这里，从南欧和巴尔干半岛，T1a血统的女性逐渐繁衍，并融入了不同的民族。理论上，这种融合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发生——婚姻、奴役、绑架.....历史上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很可能成为了古代印欧人的伴侣，与丈夫一起积极参与了迁徙浪潮，融入了古代的民族形成过程，并跨越了漫长的迁徙路线。

因此，古遗传学家在欧洲各种考古文化和大草原地区发现女性单倍群T1a也就不足为奇了。女性T1a谱系在印欧人迁徙期间广泛传播，并融入了众多不同的民族。这一亚支系曾在特里波列人、斯基泰人、一些埃及木乃伊、斯拉夫人和中世纪维京人中被发现。换句话说，T1a的代表在历史上数量众多，且各具特色。例如，在古代雅利安人的辛塔什塔文化中就存在T1a，著名的阿尔卡伊姆人就属于这一文化。辛塔什塔文化距离哈萨克斯坦也不远，莱托夫人就生活在那里。



如今，T1a单倍群已衍生出数十个谱系，宛如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每个谱系往往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民族构成。在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线粒体DNA中发现的16186T突变明确地标记了单倍群T1a。然而，这是一个独特的谱系，相当罕见且孤立。它以独特的突变模式以及线粒体DNA第二高变区（HVR1和HVR2）中的152C突变为特征。因此，该单倍群被命名为T1a-152。

在分析线粒体DNA数据库时，我立即注意到四位参与者，他们在HVR1和HVR2片段上都与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线粒体DNA类型完全匹配。据此计算，所有参与者的共同母系祖先生活在大约700年前。有趣的是，其中两位匹配者显然来自英国的凯尔特地区，一位表示其祖先来自美国（这也不排除爱尔兰血统），还有一位没有提供更多信息。

Номер	Данные	Субклад	Мутации митохондриальной ДНК
AC20060701	Летов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B29340	Anne Jones, 1815, Carmarthenshire, Wales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355921	Неизвестно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217367	Julia Moriarty b. abt 1845 and d. 1914 Ireland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362272	Jannet Logan b c.1722 in N.J. United States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前面提到的朱莉娅·莫里亚蒂（顺便一提，这是一个传统的爱尔兰姓氏）让人联想到柯南·道尔系列小

说中的反派教授。世界真小，这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英国人中，谢尔盖·费多罗维奇也有两个匹配项。然而，这种匹配仅限于第一个片段的突变，因为英国人第二个片段中存在143A突变，而莱托夫的线粒体中没有这种突变。这表明他们的共同母系祖先可以追溯到1300年前。

Номер	Данные	Субклад	Мутации митохондриальной ДНК
AC20060701	Летов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N185201	Carrie Rushton, b. circa 1800 England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43A, 152C, 263G, 309.1C, 315.1C
N28494	Martha [Elkin] bc1836 Lancaster England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43A, 152C, 263G, 309.1C, 315.1C

在斯堪的纳维亚匹配者群体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HVR1片段的突变完全匹配，而HVR2片段（已突出显示）中存在一个突变差异。

Номер	Данные	Субклад	Мутации митохондриальной ДНК
AC20060701	Летов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537813	Estonia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317300	Martina Elizabeth Swanson, b. 1882 and d. 1958 Sweden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250116	Kai Pajumägi, b. 1843, Kolga-Jaani, Estonia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420277	Sweden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464226	Boel Hansdotter f. 1734 Hyby (M) Sweden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693436	Anna Ersdotter född 1662 Söderbärke Sweden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373388	Berte G. Knutsd Ravneberg 1807-77 Lindås, Norway	T1a-152	HVR1: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HVR2: 73G, 152C, 263G, 315.1C

总的来说，在S.F.莱托夫的样本中发现的HVR1片段的突变模式非常具有T1a1亚分支的特征。因此，我们也重点关注了这个亚分支，其中包含两个属于T1a1b谱系的完全匹配项。严格来说，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是否也属于T1a1b亚分支。该亚分支由10143A和14281T突变定义，这两个突变位于HVR1和HVR2高变区之外。要确定这两个突变，需要进行完整的线粒体DNA测序。

Номер	Данные	Субклад	Мутации митохондриальной ДНК
AC20060701	Летов Сергей Фёдорович	T1a-152	<i>HVR1</i> :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i>HVR2</i> :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759404	Varvara Kraeva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T1a1b	<i>HVR1</i> :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i>HVR2</i> :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809409	Charlotte Geisler, b.1834 Prussia Germany	T1a1b	<i>HVR1</i> : 16126C, 16163G, 16186T, 16189C, 16294T, 16519C <i>HVR2</i> : 73G, 152C, 263G, 309.1C, 315.1C

结果表明，两个高变区段的突变完全匹配，使得来自俄罗斯的S.F. Letov、Varvara Kraeva和来自普鲁士（德国）的Charlotte Geisler与共同的母系祖先的距离约为700年。然而，如果能够获得并比较所有参与者的其他突变信息，这个距离可能会缩短。如果我们假设凯尔特人的匹配结果可能是由于DNA检测普及率远高于俄罗斯的国家所造成的偏倚，那么很多事情就都能解释得通了。西欧人口数量远超俄罗斯人，因此，在没有其他突变的情况下，这些匹配结果很可能只是统计上的随机现象。

还应该注意的是，突变是随机事件，因此它们在DNA中的积累遵循着与彩票或轮盘赌中奖号码积累相同的规律。如果HVR2区段平均每700年发生一次突变，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会像钟表一样每700年准时发生一次。因此，我们只能讨论家族谱系分化的时间间隔，而无法确定具体的日期。我们

在DNA谱系学院的MTA 2.0数据库中找到了几个高度匹配的样本，但它们都存在HVR2片段上的195C突变，而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线粒体DNA中并不存在这种突变。总而言之，我们的同胞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包括在线粒体DNA谱系研究中。

让我们回到列托夫兄弟女性祖先已知的姓氏和氏族。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在他的书中承认，耶里卡洛夫这个姓氏和氏族可能源于突厥语。据列托夫所述，亚历山大·伊里奇·耶里卡洛夫曾积极与哈萨克人进行贸易，并以其所属部落的名义开展活动，而且他留着稀疏的胡须，这在突厥民族中很常见。在互联网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居住在17至19世纪的耶里卡洛夫家族成员，包括农民、商人、哥萨克、俄罗斯人和小俄罗斯人，他们分布在如今乌克兰的草原、西伯利亚的伏尔加河和额尔齐斯河沿岸以及东西伯利亚地区。这个姓氏听起来确实像突厥语，但俄罗斯人使用这个姓氏已有数百年历史。我不会对其起源妄加猜测。顺便一提，对耶里卡洛夫家族进行Y染色体检测或许能解答该家族的民族起源问题。

网上可以找到许多生活在17至19世纪的马尔捷米亚诺夫家族成员的信息，包括来自舒钦斯卡娅村的马尔捷米亚诺夫家族。本文不提供族谱数据；我只想强调舒钦斯卡娅村建于19世纪中期。最早的定居者是哥萨克和农民——包括俄罗斯人、莫尔多瓦人和其他民族——他们因19世纪中期的农民改革和农奴制的废除而被迫迁徙。据记载，许多来自哈尔科夫省（斯塔罗别尔斯卡娅村）的小俄罗斯农民也来到了这里。以上是一些当地历史信息。有证据表明，舒钦·马尔捷米亚诺夫家族主要起源于莫尔多瓦人。

关于S.F.关于列托夫的《佛陀候选人》，我还想补充几点。这本书包含了两个DNA谱系标记。以下是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对东德人的描述：“总的来说，我想指出的是，东德在德意志民族内部形成了

一种独特的群体，与我們有着某种难以捉摸的亲近感，几乎就像是我们的本土居民。至于女孩，她们在东德肯定比在西德更有魅力。或许是因为东德曾经是斯拉夫人的聚居地.....而当地居民身上仍然流淌着斯拉夫的血液.....”这段话与阿纳托利·阿列克谢耶维奇·克列索夫的著作《雅利安人和厄尔宾人的历史》的主要论点不谋而合。

在列托夫这本书的结尾，我发现了一些关于单恋的非常个人化、充满诗意且感人至深的感悟：当我们被拒绝爱时，在某种深层的原型层面上，这是一种无意识地承认自身无力，是对未来权利的否定，是对整个家族谱系、所有祖先的个体性的否定，也是对任何曾经可能存在的后代的死刑判决。这等于承认我们的基因型乏味无趣、毫无吸引力、毫无价值，并且不会延续下去。本质上，这是对生命权利的否定，甚至是对延续此生生物学可行性的否定。我强调，谢尔盖·列托夫用这句话表明，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庞大家族谱系的一部分。这一点值得注意。

叶戈尔·列托夫的作品也体现了类似的理念。专辑《Pryg-skok》早已浸润着这种家族哲学。但叶戈尔·列托夫的专辑《百年孤独》却是一张百分之百的DNA谱系专辑，收录了诸如《泥土会教你》、《永恒之春》等DNA谱系歌曲。在叶戈尔·列托夫看来，我们是盛满意识的陶罐。陶器胜过有知觉的芦苇。它们可以被装饰上华丽的图案。而且，陶土还可以用来制作共鸣的哨子。“泥土会帮助，泥土会展现，泥土会教你。”当然，我们说的不是氧化铝和水。那是什么呢？我想，是关于构成人类身体和灵魂的物质。这种物质对于曾祖父和曾孙来说是一样的。“过去如此.....将来亦如此，即便经历所有死亡。”

歌曲《永恒之春》中有这样令人震撼的歌词：“一群漆黑、尖锐、充满掠夺性、绝望的麻雀在我体内哀鸣。”这些一定是成千上万先民的声音——他们的祖先。他们教导、守护、指引、哀叹、抱怨、呻吟、欢笑、歌唱、弹奏古斯里琴、吟诵咒语、传授知识、提供帮助。这首特殊的家族歌曲（《永恒的春天》）带有强烈的反教权主义色彩并非偶然——并非亵渎神明，而是明确的反教权主义。或许这与列托夫兄弟的异教根源有关。毕竟，列托夫家族的族谱上，几代之前就是刚刚受洗的马尔捷米娅诺夫家族。而这些先民，他们的语言方式与[帕维尔·弗洛伦斯基等人的祖先](#)截然不同。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叶戈尔·列托夫的访谈中，我们反复看到他提及自己对自然的崇拜，以及只有在森林中他才能感到真正的快乐。

歌曲《关于泰迪熊》中有这样的歌词：“一只泰迪熊笔直地爬上松树，直达天空.....化作一个点.....这意味着那里有人知道.....这意味着那里有人爱着.....”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对帕维尔·弗洛伦斯基来说意义深远，但对反教权主义者叶戈尔·列托夫而言，这样的松树却是一座祭坛。在叶戈尔·列托夫看来，“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当然，歌曲《关于傻瓜》并非关于二战——战争无处不在）。列托夫也有基督，但那是一个值得怜悯的基督，一个被我们亲手扼杀的基督——一个非正统的基督。我并非要摧毁东正教的圣地。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某些人的内心深处，那些驼背弯腰的人在呐喊哀嚎，那些乞丐在垃圾如雨般落下时发出哀嚎，那些参与过农民战争的人在呐喊，那些以自己方式理解信仰的人在呐喊，那些因信仰而遭受压迫、被棍棒殴打、忍受流放的人在呐喊，那些自愿自焚或准备自焚的人在呐喊，因为在他们看来，真理挑战了谬误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有些先辈不会否定其他先辈，他们彼此互补。我们无需追逐过去那从未存在过的辉煌。我们只需要努力了解过去的真相，仅此而已。这包括学会了解我们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将渺小的自我融入无限的伟大之中，感受我们伟大自我的力量和支持，不再活在一个虚构的、短暂的世界里，不再拥有虚构的、短暂的价值观。

然而，我们也面临着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守护这无比伟大的事物，即守护我们的血脉，使其延续。守护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存，更是精神上的传承，以及对先祖智慧的传承。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倾听先祖的声音。先祖会给予我们帮助。这里没有煽情，没有超自然，也没有神秘主义。

*“两个主题：死亡与祖国，对来世奥秘的迷恋，以及与本民族文化、精神、苦难和成就的联结——所有这些都交织在叶戈尔身上。”*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曾这样评价叶戈尔·列托夫：“生者唯有依靠逝者的支持才能生存。背离民族精神者，即便活着也会消亡。忠于民族精神者，即便在死后也能屹立不倒。”简洁而精准的概括。

千万别以为DNA谱系学是在构建一种新的宗教神秘主义神智学，或者某种带有特定祖先崇拜的新异教。DNA谱系学旨在寻找家族联系，并计算特定亲属群体共同祖先的寿命。根据A.A. Klesov的说法，DNA谱系学的功能类似于鸟类学中的鸟类环志，追踪个体鸟类和鸟群的活动轨迹。仅此而已。DNA谱系学本身并不神秘。但是，研究跨越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家族联系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复活”早已逝去的人。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认为，我们都拥有一个集体无意识，其中包含着共同思想和情感，这些思想和情感源于我们从共同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情感过往。正如荣格本人所说：“集体无意识包含了人类进化的全部精神遗产，并在每个人的大脑结构中重生。”顺便一提，博学家叶戈尔·列托夫在一些访谈中提到了荣格及其理论。叶戈尔对荣格的发现非常熟悉。这绝非巧合。显然，叶戈尔也在寻找自己问题的答案。

一只出生仅四周的小猫，在出生三十天后，奇迹般地就知道自己必须用爪子洗脸、拱起背，并追逐飞过的蝴蝶。我们人类也是如此：我们几乎从出生起就了解一切，无论简单还是复杂。我们对前人的经验了如指掌。这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科学家们也这么说。这其中并无神秘之处。任何有意识地切断与祖先联系的人，都注定会变成行尸走肉。最后，

让我们以一首叶戈尔·列托夫演唱的歌曲作结，这首歌与我们的思考惊人地契合……每个人都应该听听。“已无言语可言，我们已不复存在。这世上只剩下一件事——胜利。我们的胜利……”

伊利亚·雷尔希科夫，
DNA家谱学院

[前往作者专栏](#)

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
DNA家谱学院

[前往作者专栏](#)

阅读Pereformat上的其他文章：

棺材纪事 | 教师报 第36期 — 谢尔盖·列托夫：我认为叶戈尔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谢尔盖·列托夫：我认为叶戈尔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

9月10日，叶戈尔·列托夫（真名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1964-2008），传奇乐队“民防”的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本应迎来57岁生日（虽然人们常说，但很难想象他真的已经57岁了）。我们这位英雄的哥哥，著名音乐家兼多乐器演奏家谢尔盖·列托夫，被誉为俄罗斯爵士前卫音乐之父，向UG的读者讲述了叶戈尔的故事以及更多内容。

在一次采访中，埃戈尔说他十几岁时听摇滚和朋克，你当时对他的兴趣非常不屑，更喜欢复杂的音乐。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摇滚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吗？你对弟弟音乐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吗？

— 看起来我经常和各种摇滚乐队一起演出，有时是一些相当有名、颇具影响力的乐队，但我自己的文化兴趣总体上与摇滚乐，更广泛地说，与摇滚亚文化都相去甚远。

情况确实复杂且矛盾.....这源于我们国内价值体系的特殊性，近年来器乐远未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更遑论引起大众的注意。嗯，这么说吧，在我年轻的时候，大众的意见和品味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根本不在意。俄罗斯文化是语言中心主义的。音乐仅仅被视为文字的载体，而非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但作为一名萨克斯演奏家，我渴望找到一种运用我的演奏和乐器的方式。就像谢尔盖·库廖欣或洛尔·考克斯希尔一样，我既不是摇滚乐手也不是朋克，尽管摇滚乐手和朋克都乐于邀请我演出和录音。而像库廖欣和考克斯希尔一样，我并不拒绝，而是努力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音乐或戏剧共存之道，希望能让更多人听到我的作品，而不仅仅是自由爵士或自由即兴演奏。

现在我年纪大了（也算是个专业人士了，不管这意味着什么），我越来越认同音乐最终是为了听众而创作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摇滚音乐会上演奏，和摇滚歌手、说唱歌手一起录音，为戏剧和默片配乐，在文学之夜支持诗人，而不仅仅是在DOM或声音博物馆演出。

— 埃戈尔对你的音乐的态度是否也随之改变了？

我们开始一起创作音乐，这算是一个双人组合，由茹科夫兄弟（打击乐手和萨克斯管演奏家）和列托夫兄弟（我演奏萨克斯管，我弟弟演奏各种自发声的打击乐器）组成。很久以后，在1985年，我创立了“Tri O”乐团，成员包括法国号演奏家阿尔卡季·希尔克洛珀、大号演奏家阿尔卡季·基里琴科、巴松管演奏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和小号演奏家尤里·帕尔费诺夫。顺便一提，这个乐团至今仍然存在。我想我弟弟知道“Tri O”乐团，因为他曾经去过马拉特·格尔曼的画廊，当时我们正在那里参加一个展览并进行演奏。当然，他也从我这里知道“DK”乐团。我从1984年就开始和那个乐队一起录音。1983年，我和Aquarium乐队一起参加了第一届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音乐节，1985年，我和DDT乐队一起录制了专辑《Time》。我觉得他觉得和摇滚乐手合作更容易理解，也更有意思。在GroB唱片公司，也就是录制Grazhdanskaya Oborona专辑的公寓里，他贴了几张我拿着萨克斯管和其他铜管乐器的照片。我不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我的音乐事业。1997-1998年，在Kuryokhin去世后，我尝试组建一些乐队，像Pop Mechanics那样，汇集了各种风格的音乐家——德米特里·波克罗夫斯基乐团的歌手、DJ、瓦伦蒂娜·波诺马列娃和舞者——并运用了电脑图形和视

频投影。我想邀请我的哥哥参加这个“俄罗斯新选择”活动，朗诵他自己的诗歌，但他先邀请我加入他的“民防”乐队，该乐队从 1998 年秋季一直持续到 2004 年初。

有一种观点认为，亚历山大·巴什拉切夫、叶戈尔·列托夫和扬卡·迪亚吉列娃是俄罗斯摇滚乐坛最有影响力的诗人。你如何看待你哥哥的诗歌作品？

“我认为叶戈尔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不是‘俄罗斯摇滚诗人’，而是我们语言、我们文化的伟大诗人。”

叶戈尔本人在采访中承认，他性格相当复杂，而且爱争吵。你们一生中的关系如何？你们之间是否曾因彼此的创作而产生过竞争或嫉妒？

“我觉得他生命中的某些阶段都在努力向我证明些什么，想在我眼里树立自己的地位。毕竟，我是他唯一的哥哥。我学习成绩优异，拿过物理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奖，上过天才儿童物理数学寄宿学校，去过莫斯科，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等等。所以，很显然，我的父母和祖母都把我当作他的榜样；我算是他遥不可及的偶像。但他没能完成学业（他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只拿到了高中课程结业证书），而且他没有上大学，而是去了职业学校等等。也许是我压制了他，阻止他展现自己的领导才能，所以他被莫斯科的建筑职业学校开除后，才会欣然返回鄂木斯克。无论我怎么邀请他来莫斯科，他都不答应，宁愿待在鄂木斯克偏远的契卡洛夫斯基村，那里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很少露面。”

尽管如此，我们之间也曾有过每周通信好几封信的时期。我给他寄过卷轴式录音带，跟他讲过莫斯科概念艺术家的演出等等。后来，我在哥哥发表的第一人称访谈录中发现了许多自己的言论和思考。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分歧：我主要面向的是事先准备好的观众，而他则面向的是所有人。也就是说，他断然拒绝任何精英主义。哥哥看过我在塔甘卡剧院演出的《莫斯科小丑》和《马拉与萨德侯爵》，但他并不满意——他说，戏剧并不适合所有人。这些年来，我逐渐理解了他的立场。有趣的是，他的同事们似乎并没有像孩子和青少年那样，急于向他们的“老大哥”证明什么，反而对我的表演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民防》杂志和西伯利亚后朋克音乐的出版商叶夫根尼·科列索夫开始发行自由爵士乐 CD，而“GO”乐队的联合创始人库兹马·里亚比诺夫早在 2008 年就建议我们尝试一起演奏自由即兴曲（加拿大已经发行过此类录音）。

——我很好奇为什么如此不同却又如此有才华的人会出生在同一个家庭。你的祖先中有音乐家吗？或者更广泛地说，有从事创意艺术的人吗？

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童年。我们拥有一个孩子所能渴望的一切（除了健康，这是因为我和我的父母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场接受核辐射所致）。

我对母系祖先相当了解——他们是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亚历山大·叶里卡洛夫的家族，曾是西伯利亚哥萨克，1851 年以前是伏尔加河沿岸的农民。我的父系祖先是乌拉尔地区的农民。我认为他们家族以及他们的后代中都没有音乐家。我的表兄是一位艺术家，住在乌拉尔地区。我父亲的名字叫费奥多尔，是为了纪念戈卢乌希诺村一位很受欢迎的年轻手风琴演奏家，他去世时我父亲还没出生。

——最后一个问题：除了他们无可否认的才华之外，你认为叶戈尔和民防乐队广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

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受欢迎程度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像巴什拉切夫一样，民防乐队

代表了俄罗斯各省的声音。此外，伊戈尔拥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包括国内和国际文化。除了谢尔盖·库廖欣之外，我从未在摇滚乐界见过像他这样博览群书、博览群书的人。我认为最深刻的解释，出自DK乐队主唱谢尔盖·扎里科夫之口，他认为叶戈尔·列托夫直到去世都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他的巨大影响力源于他的作品，他以某种方式触及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存在的那种少年情怀——那种青春期特有的极致、偏执、极端和理想主义。

即使是那些被家庭、房贷和其他日常琐事压得喘不过气的人，听着叶戈尔的歌，也会突然发现自己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这就像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入口，一台时光机！

我个人认为，叶戈尔·列托夫的作品远不止摇滚乐。它是深刻而严肃的诗歌，回溯到古代的融合主义，回溯到抒情主义和歌唱主义的时代。那时诗歌伴着里拉琴的演奏吟唱（抒情主义），那时诗歌在音乐的伴奏下表演，面向的是听众，而非读者。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叶戈尔）·列托夫在鄂木斯克被当作普通市民对待；人们甚至可能在街上认不出他，”鄂木斯克导游鲁斯兰·S说道。“每年9月10日，也就是这位音乐家的生日，以及2月19日，也就是他的忌日，都会举行纪念活动。有时人们会从很远的地方赶来，甚至远东地区。叶戈尔的父亲费奥多尔·列托夫是一位参加过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曾是一名军事通信专家，也是民防部队的成员，其中包括来自紧急情况部的专家等。”

— 这就是该团体名称的由来吗？

“算是，也不算。你得去问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本人，”鲁斯兰神秘兮兮地回答道。“或者，最好别问。如果你还记得我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的话，你就能明白以下这个道理。”

“当伊戈尔他们说他们自称‘民防队’时，我问：‘你们是在嘲笑我吗？’”费奥多尔·列托夫回忆道。“他们向我保证：‘我们是在为某些社会群体提供社会保障。’但很明显，我的猜测并非毫无道理。”

列托夫的墓碑虽小但维护得很好，上面刻着他作品中的语录。鲁斯兰说，他们有时需要移除一些无关的符号，比如新纳粹的标志。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的祖母出身贵族。他的母亲是一名医生。他的父亲，和80%的地下抵抗组织成员一样，是一名军人。

“列托夫的音乐拯救了很多，我也是其中之一，”鲁斯兰说道。

伊戈尔·费多罗维奇的创作遗产被保存在鄂木斯克摇滚档案馆。据首席“档案管理员”谢尔盖·西尼岑介绍，他和叶戈尔彼此相识，甚至还是朋友。叶戈尔对数字“9”情有独钟；这个数字在他的父母、朋友以及女友兼同事扬卡·迪亚吉列娃的生活中都曾出现过。他本人于2月19日去世。

叶戈尔·列托夫居住的鄂木斯克区契卡洛夫斯克是个有趣的地方。村里的主要街道是宇宙大街。1956年，波列特工厂开始生产第一架喷气式飞机——图-104。当时需要一条跑道进行测试。后来，环城公路外新建了北方机场，原工厂的机场用地便空置下来，改建成了住宅区。旧跑道最终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公路，20世纪60年代初，沿线开始兴建住宅楼、学校和商店。

民防组织领导人的公寓目前已被锁上。他的兄弟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把钥匙交给了公寓管理员，管理员随后开始放人进来偷窃家中贵重物品，因此决定禁止外人进入。曾几何时，苏联摇滚歌手、朋克摇滚乐队“民防”和“大十月”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末西伯利亚地下音乐的代表人物亚娜·

斯坦尼斯拉沃夫娜（扬卡）·迪亚吉列娃与列托夫同住。俄罗斯著名音乐家、诗人兼作曲家德米特里·列维金形容她“是个古怪的女孩，内向，但极富创造力。她散发着宇宙般的能量。”这种能量也传递给了叶戈尔·列托夫。他的创作通常被划分为三个时期：青年叛逆时期、激进时期（政治时期——与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合作）以及成熟哲学时期。

在日常生活中，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毫不起眼。他对电脑的态度很随意。他会说：“我一碰鼠标，电脑就卡住。”他从不拒绝邻居的签名。他对食物也不挑剔。朋友们都叫他“列图什卡”，他喜欢吃白面包夹香肠，再配上邓卡牌的“欢乐”饼干喝茶。叶戈尔·列托夫在离家不远的45号中学上学，198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由于心脏不好，他免修了体育课。“他的大多数同学和老师都搬走了或者去世了，所以你很少听到关于他学生时代的故事，”鲁斯兰说。

完成学业后，他搬到莫斯科州哥哥家，并在那里进入一所建筑职业学校学习，但一年后因成绩不佳而被开除。回到鄂木斯克后，列托夫继续从事他于1982年创立的名为“播种”（Posev）的项目，并改变了发型和名字。起初，这位艺术家自嘲地称自己为“叶戈尔·多赫利”（Yegor Dokhly），但绰号的后半部分并没有流行起来。那些年里，叶戈尔·列托夫在鄂木斯克的轮胎厂和发动机厂工作。作为一名艺术家，他绘制了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肖像，并为共产主义集会和会议创作宣传海报，后来还兼职做过清洁工和粉刷工。

积极寻找自我

人们有时会从圣彼得堡、白俄罗斯，甚至远至挪威前来拜访列托夫。契卡洛夫斯基森林尤其受游客欢迎。这位音乐家生前喜爱在那里漫步：他会放松身心，沉思冥想，并创作歌曲。

“这片森林令人着迷；形形色色的人有时会聚集于此，从普通的度假者到宗教信徒，再到举行祭祀仪式的人。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并非宗教信徒，但他出于宗教原因四处游历，寻找自我。他练习冥想、呼吸法、超验修法，并对宗教习俗很感兴趣。在他晚年成熟时期，他皈依了基督教：他佩戴胸前十字架，并在约旦河中接受了自我洗礼。墓穴时期早期基督徒的普世十字架纪念碑便是最好的证明，”鲁斯兰解释道。

他怎么会住进精神病院呢？

“有两种说法：一是其中一位音乐家的母亲举报了他，二是当局不喜欢他的歌曲《愚人之国》。”据该楼幸存的邻居说，他的父亲安排叶戈尔每周回家一次，帮忙做家务。

但如果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没有利用这段可怕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说，让自己“精神力量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增长”，并将其视为创造力的刺激，那他就不是他了。

“在某个时刻，我意识到为了保持理智，我必须创作。我整天都在写作；我写故事，写诗。每天，‘经理’奥列格·苏达科夫都会来找我，我会把所有写好的东西隔着牢房递给他。当我最终意识到死亡临近时，这给了我坚持下去的力量。那一刻，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深刻的体验。之后，我开始创作新歌。出院后，我开始工作，为我未来的所有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少校脚下的冰》、《极权主义》和《恋尸癖》这一系列作品应运而生，”这位音乐家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

越糟糕越好？

“我们第一次见到列托夫是在1985年，”前朋克摇滚乐队“血腥早晨”（Krovaviy Matinee）的主唱兼作词人、现任乐队“污水处理厂”（Ochistnye Sooruzheniye）成员亚历山大·别洛温回忆道，“已故的尼古拉·杰尼索夫，人称‘泥瓦匠’，是鄂木斯克第一家摇滚俱乐部的负责人，他跟我提起过列托夫。他给了我列托夫的电话号码，我们打了电话，然后去了他家。他完全符合人们对摇滚乐手的刻板印象。他家的墙上挂满了黑白照片。我们坐在一起，互相朗诵诗歌。列托夫收藏了大量的唱片——九十张或一百张，全是品牌唱片。仅从这简单的描述，你就能感受到他对音乐的热情，以及他对外表的漠不关心：一张唱片就要80卢布起。叶戈尔听的音乐类型很广泛，比如“大门乐队”（The Doors）。”还有一盒吉米·亨德里克斯的歌曲，售价300卢布——相当于两个月的平均工资。

20世纪80年代，莱托夫和他的同事们主要在家中和星辰文化中心的“创意共同体工作室”进行录音。

“列托夫不喜欢鄂木斯克，他很快就搬到了莫斯科，在那里我和利申科兄弟组成的二人乐队‘尖啸警报’待的时间更长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列托夫是在1993年，当时摇滚俱乐部主席杰尼索夫去世了，”贝洛莫因总结道。

列托夫喜欢孩子吗？他有学生吗？

“当时没有学生。而且我哪有时间生孩子……就算没有巡演，摇滚音乐家的生活方式本身也不允许我生孩子。”

— 你在80年代听过哪些外国摇滚乐队，包括GrOb，并把他们视为榜样？

“我们以前如饥似渴地听桑塔纳、创世纪、齐柏林飞艇和深红之王的歌，他们是我们最喜欢的乐队。然而，当我现在和年轻人交谈时，他们都知道莱托夫，但很多人却从未听说过奥兹·奥斯本。”

—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兴趣？

“我不能肯定，但我猜他们是被粗俗的语言所吸引。我认为脏话应该适度使用，只在歌曲中作为最极致的表达。在我看来，这种音乐不会成为经典，但列托夫恰好出现在了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当时人们还在唱着关于贝加尔-阿穆尔铁路干线、共青团建设项目的歌，突然间，一种截然不同的另类音乐出现了。“越糟糕越好”——这是他自己说的。他的勤奋和决心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在俄罗斯，到处都是天才！但光写歌是不够的；你必须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你必须努力：去圣彼得堡、莫斯科，去国外，忍受艰辛，衣衫褴褛。很少有有才华的人能做好这样的准备。”

鄂木斯克矛盾修辞法

莱托夫在西伯利亚某个地区中心受到的关注，与其说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不如说是一种悖论。正如鄂木斯克诗人、音乐家兼公关詹姆斯·亚历山大·达克福斯所指出的那样：“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叶戈尔·列托夫从未在鄂木斯克演出过。他的巡回演唱会都刻意避开了这座地区中心城市。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非常复杂（对列托夫来说，这座城市在很多方面都是他的生活空间；许多人认为，如果换个城市，他根本无法创作歌曲）。列托夫的确住在鄂木斯克。但他一直试图将自己的生活与歌迷分开。直到2008年他的葬礼上，这种界限才被打破。即使在采访中，也经常暗示列托夫不习惯在人群中表演。叶戈尔屡次做出与乐队人气明显背道而驰的举动。例如，1990

年“民防”乐队解散后，他坚决拒绝巡演，并一度回避采访，直到1993年才重返舞台，组建了“俄罗斯突破”乐队。”莱托夫在1999年突然与乐队分道扬镳，拒绝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或运动。在1998年至1999年间的一次采访中（具体来说是与奥尔加·阿克休蒂娜的访谈），他表示，在邀请新成员加入乐队时，他会了解新成员尊重和不尊重谁，并补充道：“乐队里剩下的人都是不尊重任何人的。”在同一次采访中，他明确表示自己对任何形式的“抄袭”都极其反感；对他而言，任何项目最重要的都是原创性，而不是模仿任何人。很难相信这样的人会乐意被塑造成任何事物的偶像，尤其是在他曾经避之不及的城市里，到处都是纪念牌匾和其他纪念标志。

但鄂木斯克人民对这位桀骜不驯的音乐家无比敬重。2018年是他逝世十周年，在叶戈尔出生、生活和创作专辑的鄂木斯克，艺术家们决定为他打造一个纪念空间。于是，“鄂木斯克叶戈尔·列托夫墙”项目应运而生。

“我当时正和莉娜（斯维什尼科娃，后来成为该项目的策展人——编者注）通信，回忆起列托夫在尤比列伊内桥桥墩上创作的第一面墙，那面墙是为了庆祝鄂木斯克建城300周年而建，但很快就被涂掉了（鄂木斯克市政府认为它是未经授权的）。我还找到一张莫斯科墙的照片，那面墙无人触碰。但不知为何，在这里，这却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莉娜说，‘好吧，我们可以达成共识。’于是，我们的通信就促成了鄂木斯克这面墙的诞生，”艺术家雷姆·里申科分享道。

我们来到乔汗·瓦利哈诺夫大街——鄂木斯克的百老汇大街。一群身穿黑色皮夹克的年轻人漫步而过。他们没有像现在流行的那样播放哈士奇、巴斯塔和摩根斯坦的歌曲，而是戴着耳机弹着吉他——《民防》。这究竟是教育者的误判，还是对公众抗议的回应，亦或是某个传奇的复兴，又或是鄂木斯克当局精心策划的公关噱头，还是地下宣传的成果？各种猜测和理论层出不穷。我想伊戈尔·费多罗维奇肯定会反对这种做法。亲爱的读者们，你们怎么看？

阿廖娜·尤尔琴科，鄂木斯克州

Chronicles | GrOb-Chronicles — 挪威的“民防”。这位西伯利亚朋克传奇人物的最新国际巡演是如何组织的？

挪威的“民防”组织。

这位西伯利亚朋克传奇人物的最新国际巡演是如何组织的？

作者对文章的解读



2007年9月下旬，乐队“民防”（Civil Defense）进行了他们的最后一次国际巡演。他们的首次国际巡演（不包括在后苏联国家的演唱会）于1999年春季在美国举行，当时正值贝尔格莱德爆炸事件之后。

“美国已经露出了真面目。我已经准备好战斗，武器在手。美国人都是懦夫；他们根本不会打仗。别让他们以为可以随意践踏我们。当然，我们是一个有耐心的民族，至少暂时如此。但当他们亲眼见到我们，真正体会到俄罗斯铁蹄的威力时，他们就会尝到希特勒的滋味.....那将是当头一棒，毫不留情。这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我想这将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唱会，因为他们会立刻把我们赶出去。”[叶戈尔·列托夫](#)向担任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新闻官的记者阿列克谢·科布洛夫发

表了这番公开声明。

事实上，一切都如莱托夫预料的那样发生了。由于他的严厉批评，巡演在5月22日于纽约Tramps摇滚俱乐部演出一场后便被取消了。

“他在第一场演唱会上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具体是什么了。一个看起来很严肃的男人走到我们的巡演组织者面前，跟他说了些什么，之后我们可怜的小马里克脸色瞬间苍白，脸色变得更小，然后就消失了。剩下的演唱会都没能举行，我们被困在新泽西州的一家汽车旅馆里，没有组织者在身边，直到朋友们来接我们，”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的贝斯手、列托夫的遗孀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回忆起那次旅行时说道](#)。

然而，之后他们多次前往以色列和德国。2005年，他们也去了美国，进行了一次常规的城市巡演。但当乐队准备在2007年前往挪威时，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将在哪个活动中演出。

“我们的导演谢尔盖·波普科夫负责这一切。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只是去听一场音乐会。能在挪威待五天真是太好了；我们玩得很开心，”丘马科娃告诉IMI Journal。

我愿意学习俄语，就因为列托夫会说俄语！

那么，叶戈尔·列托夫和他的伙伴们是如何来到这片峡湾纵横、自然风光旖旎的北方王国的呢？这一切都源于人为的失误。说到底，这要归功于两位挪威斯拉夫音乐家对西伯利亚朋克音乐的热爱，当然，还有民防组织。

他们的名字是英格瓦·B·斯坦霍尔特和埃尔兰·哈根。套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话来说，正是因为他们，人们才会说：“我愿意学习俄语，就因为列托夫会说俄语！”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有机会在学校学习俄语。我当时很好奇——苏联正在进行改革，所有报纸都在报道这个神秘的俄罗斯。那时，我经常听波兰-挪威乐队[De Press](#)的歌，比如他们就唱过一首关于[集体农庄](#)的歌。主唱安杰伊·久别克（Andrzej Dziubek）是位移民，他有时会用俄语演唱，而且专辑封面总是用西里尔字母，我想读懂上面的文字，弄明白它们到底在讲什么，”英格瓦尔说道。

于是，多亏了摇滚乐，这位年轻人考入了大学，毕业后开始系统地学习俄语。1996年，当他需要撰写毕业论文时，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选择，英格瓦尔最终决定以康斯坦丁·金切夫的歌曲为基础，撰写一篇关于摇滚歌词的论文。

（现在，回想起自己选择了“爱丽丝”这个小组进行研究，英格瓦尔开怀大笑，显然意识到这种选择的荒谬之处——作者注）。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开始研究后得出结论：歌词与音乐、语调以及（通常是）讽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讽刺在纸面上是看不到的。

2004年，他[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研究方向是苏联改革时期摇滚乐的歌词。为此，他获得了一笔研究经费，并在圣彼得堡待了几个月。为了完成这项研究，这位挪威学者不得不对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圈的标志性人物进行一系列采访。例如，他打了20个电话后，终于安排了与“电视乐队”（Television）的米哈伊尔·博尔济金（Mikhail Borzykin）的会面。他还与“NOM乐队”的尼古拉·科佩金（Nikolai Kopeikin）、传奇音响工程师安德烈·特罗皮洛（Andrei Tropillo）、“Kino乐队”主唱的遗孀玛丽亚娜·崔（Maryana Tsoi）、“Akvarium乐队”的前贝斯手米哈伊尔·瓦西里耶夫

(Mikhail Vasiliev) 以及地下杂志《Roxy》的编辑亚历山大·斯塔尔斯采夫 (Alexander Startsev) 进行了交谈。

正如斯坦霍尔特所指出的，在此之前，所有西方学者都认为俄罗斯摇滚乐首先是一种政治运动。他最终得出结论，事实上，政治在俄罗斯音乐中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至于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它始终特立独行，与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格格不入（尽管乐队成员康斯坦丁·“库兹亚·UO”·热夫顿、伊戈尔·“杰夫”·热夫顿以及叶戈尔·列托夫本人都是俱乐部成员并持有俱乐部证件），英格瓦尔大约在1991年从莫斯科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了他们的音乐。

“那时候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可能根本不了解GroB是什么。我第一次买他们的唱片是在1994年莫斯科的Gorbushka唱片店——是《Pops》（BSA发行的半盗版唱片，现在被认为是稀有珍品，深受乐迷喜爱——作者注）。几年后，在圣彼得堡，我买了Letov的声学作品、唱片《[Russian Field of Experimentation](#)》以及一大堆磁带。”

渐渐地，英格瓦尔深深地爱上了莱托夫的作品，并开始积极推广。例如，2000年，他受一家法国杂志委托，撰写了一篇关于俄罗斯朋克，特别是关于“民防”乐队的文章。大约在同一时期，当时已是特罗姆瑟大学教授的斯坦霍尔特告诉一位名叫埃尔兰·哈根的同学，哈根当时正计划去圣彼得堡旅行，如果G.O.乐队那时在圣彼得堡演出，他绝对不能错过。

“我们一起从奥斯陆乘飞机，在飞机上坐在相邻的座位上，英格瓦说，‘你一定要去格罗布，’”埃伦德回忆道。

因此，在一位对俄罗斯摇滚乐界更有经验的朋友的建议下，这位挪威人和他的朋友们于[2000年3月18日](#)去听了一场音乐会。莱托夫本人在舞台上演奏完最后一首作品《俄罗斯实验场》后，对着麦克风宣布这是“[近10年来最好的音乐会](#)”。

然而，埃尔兰本人并没有听到催泪瓦斯，因为他没能坚持到演唱会结束。演出进行到一半时，观众席中有人喷洒了催泪瓦斯，迫使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暂停演出，直到新鲜空气流通。这位略感震惊的挪威人，此前从未听说过这种事，也从未见过这种表达公众喜爱的方式，以为演出已经结束了。但他并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开始更加积极地购买乐队的CD和周边产品。

2002年3月，埃伦德前往摩尔曼斯克州的基洛夫斯克，为一家挪威大型滑雪公司组织巡回演出。科拉半岛之行结束后，他立即飞往圣彼得堡，因为他知道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将在那里演出。此前，他已通过电子邮件与“G.O.”俱乐部的负责人谢尔盖·波普科夫协商，后者同意这位来自北方王国的音乐家在演出结束后到“Polygon”俱乐部的更衣室拜访。





据埃兰德回忆，他曾热情地向叶戈尔称赞自己的城市，并提及摩托头乐队之前在特罗姆瑟的演出。他声称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绝对应该去看他们的演出。列托夫对此并不反对。事实上，正是在那里，双方开始初步讨论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在挪威演出的事宜，而这场演出直到五年后才得以实现。

Tolstaya 无法做到，BG 没有被邀请，民防部门找上了门。

梦想固然美好，但现实是，邀请一支乐队来北方王国演出可不是件便宜事。这需要支付乐队五位成员（主唱 Egor Letov、吉他手 Alexander Chesnakov、贝斯手 Natalia Chumakova、鼓手 Pavel Peretolchin 和乐队总监 Sergey Popkov）三次往返于鄂木斯克和莫斯科之间，再从莫斯科飞往奥斯陆，最后从奥斯陆飞往特罗姆瑟的费用。此外，还要承担酒店住宿、餐饮以及演出费。这显然超出了普通乐迷的承受范围。因此，邀请这支西伯利亚朋克传奇乐队的演出得以实现，要归功于自2000年代初以来每年在特罗姆瑟举办的国际文学节“Ordkalotten”。

“Ord”意为“词语”，“nord”意为“北方”，“kalot”意为“半球”。这个节日的名称是双关语，指的是北极圈及其与北极的紧密联系。

按照惯例，“Ordkalotten”节的组织者会选择特定的主题或国家作为主题。例如，2006年的主题是日本，2007年则是俄罗斯。正如当时介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俄语网站Norse.ru所写，挪威人对俄罗斯文化的接纳并非偶然。该节日恰逢两件大事：俄罗斯的“俄语年”以及挪威在2006年至2008年担任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

“我们对俄罗斯，特别是挪威北部——紧邻贵国边境的地区——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许多人说他们的曾祖父母来自俄罗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两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项目负责人希尔德·卡特琳·埃里克森说道。

据她所说，挪威人精通并热爱俄罗斯古典文学。然而，2007年，该文学节的组织者却将重点放在了当代俄罗斯作家身上，而非19世纪和20世纪的著名作品。当时宣布的特邀嘉宾包括作家、文学评论家、NTV电视台节目《丑闻学校》的主持人之一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然而，尽管她的名字出现在所有文学节的节目单和海报上，这位著名作家的行程却在最后一刻被取消了。来自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科米共和国的地区作家代表巴伦支地区出席了此次文学节，此外还有乌克兰著名科幻作家安德烈·库爾科夫以及许多其他鲜为人知的作家。

“民防”乐队原本旨在代表俄罗斯的文化景象。这要归功于英格瓦德·斯坦霍尔特，他无意中将这支来自鄂木斯克的传奇乐队介绍给了音乐节主办方，并坚持认为他们是当时最独特、最重要的俄罗斯乐

队。

“2006年Ordkalotten音乐节的主题是日本，我们邀请了一支来自日本的乐队演出。2007年，我们不得不邀请一支俄罗斯乐队。我们考虑过邀请Boris Grebenshchikov乐队，但最终，我大学时就认识的组织者建议我和Erland邀请颇具争议的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我们给他们买了从鄂木斯克经圣彼得堡到特罗姆瑟的机票，但后来发现西伯利亚人需要去莫斯科大使馆办理挪威签证，而不是圣彼得堡大使馆。所以我们不得不给他们买了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往返火车票，以便他们去办理签证，还帮他们在俄罗斯首都预订了一晚的酒店，”Steinholt告诉IMI Journal。



经过一些小波折，《民防》最终抵达特罗姆瑟，原计划在那里停留五天。电影节的计划是让嘉宾参加全体会议、讨论会和圆桌会议，并与媒体互动。然而，这对《G.O.》来说却并非如此。

“叶戈尔最终到达时，他只是告诉我，如果他接受哪怕一次采访，而且采访内容被媒体刊登出来，音乐会就根本无法举行，肯定会被取消。他不相信挪威人的诚实，而且可能已经习惯了报纸上刊登的任何内容都是不好的事情这种观念，”大学教授英格瓦德解释莱托夫的行为时说道。

当然，说到“G.O.”首次访美之行，无风不起浪。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的遗孀证实，尽管列托夫的评判和言论相当严厉，但实际上，他只是不想与外界接触。

“我们当时完全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切都由我们的导演安排。我们正要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就出现了，”娜塔莉娅·尤里耶夫娜回忆道。



事实上，乐队在演出前的几天里心情十分轻松：漫步城市，游览著名的峡湾，或只是探索自然风光，并拍下了无数照片。在奥尔德卡洛滕音乐节的官方活动中，他们只参加了萨米乐队 [Adjágas](#) 的演出。不得不说，他们非常享受北方原住民的传统 [约伊克歌谣](#)。此外，来自西伯利亚的客人到访的旅程仍在继续，9月28日，萨米音乐家们也前往利勒斯森音乐厅欣赏了G.O.乐队的演出。



“我们的演出合同里有威士忌。碰巧的是，Adjágas乐队的一位成员喝了这瓶威士忌，它是特地从瑞典带给我们的。演出结束后，他来到我们的化妆间，开始唱一首狼歌，因为他曾经听过维索茨基的《猎狼》。他宣称自己唱得比维索茨基好，然后就开始嚎叫！他嚎叫得那么响亮，我们都毛骨悚然。之后他喝得酩酊大醉，倒在了那里，我甚至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丘马科娃回忆道。

G.O.乐队的演唱会非常成功。娜塔莉娅·尤里耶夫娜回忆起一个有趣的插曲：观众们（其中显然有三分之一是俄语学生）自制了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带我们离开动物园”。



“还有，该怎么形容呢？嗯，基本上，有个黑人观众大声地跟着唱《Pryg-Skok》这首歌。这真的很有趣，因为他用自己的方式，而且声音很大，每个人都听到了。这真的很可爱，”G.O.乐队的贝斯手笑着说。

“我们当时预算是4万克朗，足够请到BG乐队了，但我们当然想要G.O.乐队。我们又筹了一些钱，最终请到格拉日丹卡乐队花了大约8.5万克朗。演唱会门票收入大约1.6万克朗。我们亏了将近7万克朗。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关系，但那是文学节的最后一场音乐会；他们之后再也没组织过乐队演出，”英格瓦尔笑着说。



乐队从特罗姆瑟经挪威首都奥斯陆返回，并在奥斯陆短暂停留。然而，这场于2007年9月29日在奥斯陆市中心Prosjektskolen艺术学校音乐厅举行的音乐会组织得十分业余。来自摩尔曼斯克的艺术家兼移民伊万·加卢津（Ivan Galuzin）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担任组织者。他没有获得资助邀请这些来自鄂木斯克的传奇人物，所以叶戈尔·列托夫（Yegor Letov）和娜塔莉亚·丘马科娃（Natalia Chumakova）当晚就住在他母亲的公寓里。乐队指挥波普科夫（Popkov）对此非常生气，这位倒霉的组织者至今仍记得他当时是如何抱怨没有酒店住处的。不过，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表示音乐会进行得很顺利，她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抱怨。但他仍然清晰地记得美妙的维格兰雕塑公园——这是自学成才的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兰的宏伟杰作，给[整个团体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英格瓦·B·斯坦霍尔特和埃尔兰·哈根之后再也没有把俄罗斯音乐家带到特罗姆瑟演出过。但他们对这种音乐的热爱却从未消退。2013年，英格瓦写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朋克摇滚的书；2014年，他又研究了迈丹革命后俄乌流行音乐的关系。埃尔兰现在养育着三个孩子，并在大学图书馆工作，但他从未忘记G.O.乐队。例如，在他的建议下，图书馆收藏了一套独一无二的三卷本《叶戈尔·列托夫手稿》。这套书收录了G.O.乐队主唱歌曲的草稿和最终稿，以及照片和绘画作品。如今，在与我交谈后，他了解到还有其他关于伊戈尔·费多罗维奇·列托夫的文献出版，并计划为他的图书馆订购更多相关出版物。

亚历山大·“鲍勃”·鲍里索夫。

Chronicles | 教师报 第40期 — 跳舞的毛衣和解密元素

跳舞的毛衣和下流元素

西伯利亚朋克摇滚在时代之交

在 2022 年 9 月 6 日出版的 UG 第 36 期中，我读到了一篇关于叶戈尔·列托夫的文章 [《始终反对的人》](#)，我想就这位音乐家和民防组织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将从远处说起。1991年，我在秋明遇到了叶夫根尼·科科林，当时他还是西伯利亚朋克摇滚这股风潮中的一员。这股风潮主要包括“民防”（GO）、“大十月”（VO，扬卡·迪亚吉列娃曾是其中一员）和“生存指南”（IPV）这几支乐队。这些乐队当时并没有演出，被视为地下传奇。他们的作品没有发表，电台也不播放，关于他们的报道只存在于地下刊物中。例如，我对科科林的了解仅限于《UrLight》杂志上关于扬卡·迪亚吉列娃在秋明的神秘鼓手的一段话。

“一天晚上，莱托夫突然闯进我家，说：‘咱们去即兴演奏吧！’好啊，当然要即兴演奏啦。我怎么会知道这会成为一张专辑呢？”珍妮娅后来告诉我。

1993年10月的事件给这场运动的参与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20世纪80年代典型的反苏摇滚乐手，但到了1993年，他们对叶利钦掌权的厌恶之情与日俱增。列托夫曾以无比的热情将莫斯科反抗“民主派”的起义浪漫化。这次，他们决定同时以三个乐队——GO、IPV和Rodina——重振音乐会活动。热尼亚作为IPV乐队的成员抵达。我们互相通了电话，然后一起在城里散步。他立刻把我介绍给了另一位秋明音乐家，贝斯手阿尔卡季·库兹涅佐夫，他因除了列托夫之外，是唯一一位在扬卡的歌曲《解密元素》中演唱男声部分的人而闻名。我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记不太清了，但我们玩得很开心，和出租车司机吵了一架，然后在我家过夜。第二天，我们去了社区中心调音，在那里我见到了列托夫本人、伊戈尔·热夫顿（在我看来是世界上最好的吉他手）、IPV乐队的领队罗曼·纽莫耶夫，以及Rodina乐队的主唱奥列格·苏达科夫。我之前就认识GO乐队的吉他手兼联合创始人科斯佳·里亚比诺夫；他之前来拜访过我，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这场演唱会远超预期——来到高尔基文化宫的歌迷人数是实际人数的五倍。随后爆发了骚乱——人群砸毁一切，朋克们劫持了一辆电车，防暴警察鸣枪示警。我们像被围困在白宫里的议员一样，坐在更衣室里。我抓住这个机会，建议纽莫耶夫在莫斯科奥斯特任卡街的一间录音棚录制专辑。这间录音棚是我帮忙在一间几乎空置的旧公屋里改造的。录音棚的老板叶韦利娜·什梅列娃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空荡荡的房间甚至还为乐手们提供了住宿，无需任何额外费用；他们只需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即可。

然而，那场被取消的莫斯科音乐会却是我们想要重现的。于是，我们在1994年2月于秋明组织了一场演出。“俄罗斯突破”运动由此诞生。我和伊芙琳娜作为正式成员抵达，目标是用一台专业的录音棚录音机——一台相当笨重的设备——录制演出。那时还是模拟时代。在涅夫特亚尼克社区中心，气氛要平静得多——列托夫的秋明歌迷们穿着毛衣，留着短发，自由地爬上舞台，在乐手周围跳着舞。“毛衣们在跳舞，”伊戈尔·费多罗维奇本人后来这样描述这一景象。

白天，大家都会聚集在伊戈尔·热夫顿的公寓里。我们会一起翻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珍贵老照片，而列托夫则会和纽莫耶夫、苏达科夫、里亚比诺夫以及其他一些秋明市的官员坐在厨房里，不停地讨论着国家和世界的命运。叶戈尔是个不知疲倦的讲故事高手和发明家，博学多识，脑子里总是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歌词、音乐、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恕我直言，还有演出。比如奥列格·苏达科夫——一个身材魁梧、留着浓密胡须的西伯利亚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兼音乐家。列托夫突发奇想，想把奥列格的胡子改成鬓角，好在下次音乐会上用。叶戈尔兴奋地捶着膝盖，想象着那会是什么样子。但苏达科夫只是从口袋里掏出零钱扔给他。列托夫却不肯罢休。奥列格随后提出一个条件：“如果你能用手走到门口，我就给你留鬓角。”苏达科夫自己就能做到，但列托夫做不到，他为此非常沮丧，因为鬓角的计划落空了。不用说，这些人之间的整个谈话就像一场持续不断的、热核爆般的欢乐盛宴，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都一样！甚至有人责备列托夫，说他一边谈论悲剧，一边又在开玩笑。“正好相反！”列托夫喊道，“这些人为了自由献出了生命，我们却还沉浸在绝望中，这简直是罪过！这样下去我们赢不了！”

有一天，这些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当然，大家不可能都待在热夫顿家直到天亮。纽莫耶夫自告奋勇地帮埃维琳娜、列托夫和我预订房间。再说，列托夫从上世纪80年代就知道罗曼住哪儿，所以他应该会给我们带路。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那一幕：90年代的秋明，夜晚空旷漆黑，我和列托夫、埃维琳娜走在街上。人行道上结满了冰，我们几个都滑倒了（《少校脚下的冰》）。我摔得尤其惨——正好摔在了那台录音机上。埃维琳娜开始严厉地责骂我，因为专业设备非常昂贵。为了气她，我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列托夫意识到我对这座城市并不熟悉——当时已是夜晚，四周寒风凛冽，那是秋明，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便试图阻止我：“你在说什么？你会迷路的，会被冻死的，他们会杀了你的。”但我没听他的。不过，我的结局还算不错；我回到了热夫通，甚至还弄到了些伏特加（用我的苏联护照作抵押）。

后来，我经常在音乐会的更衣室里遇到叶戈尔，但我并没有主动和他攀谈——他身边总是围着一群人，他们要么上前和他攀谈，要么上前采访。不过，我必须说，伊戈尔·费多罗维奇丝毫没有明星架子、傲慢自大或健忘的迹象。他总是抽出时间和我分享我们共同认识的人的近况、笑话以及一些时事话题。比如，我会把我的朋友介绍给他，然后我们会在戈尔布诺夫文化中心的后台愉快地聊上几句，直到叶戈尔再次被其他事情吸引为止。

尽管如此，在音乐会之外，我们还是有一些非正式的接触。2000年代初，我曾在KHOR唱片公司当司机——当时他们发行了Oborona的所有专辑。KHOR的总监是鼎鼎大名的叶夫根尼·科列索夫，列托夫本人曾两次撰文赞扬他（《热尼亚·科列索夫搬到莫斯科》和《热卡已经在汉堡了》），其他员工基本上都是来自同一圈子的朋友。如果你碰巧翻到那个时期的出版物，肯定会看到“感谢所有KHOR成员”的附言。这就是我们的故事。KHOR的办公室就在埃洛奇卡·柳多耶德卡家的地下室里——地址是瓦尔索诺费夫斯基大街6号。列托夫每次来莫斯科都会过来。我们会喝茶（没错！），聊各种各样的话题。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列托夫在说。他谈到了他收藏的珍稀唱片，谈到了专辑和音乐会的计划。我记得他从圣彼得堡来，热情地报告说他见到了里亚比诺夫，他们同意再次一起演奏（“热夫顿也会和我们一起！”）。

大概是2002年2月的一个周末，阳光明媚，寒风凛冽。科列索夫打电话给我，让我开车过去。当时我开的是一辆伏尔加旅行车，有第三排座椅。当时“民防”乐队的所有成员刚好能坐下。让列托夫和他的妻子，贝斯手娜塔莎，决定坐在后排最小最不舒服的折叠座椅上，这让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去了麻雀山，为专辑《星陨》拍摄封面照片。我们在那里爬坡。前一天下了很大的雪，树枝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建议乐队成员站在一棵树下；我摇晃树枝，科列索夫拍摄雪花飘落在他们身上的画面。列托夫很喜欢这个主意，当我们回到家，在科列索夫的厨房里喝茶时，他甚至答应

把这个主意的出处写在我身上。这张照片最终出现在了《星陨》第一版的小册子中间插页上。不过他们忘了提到我，但我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

鲍里斯·格里申，秋明州

棺材编年史 | 明日——叶戈尔·列托夫的天才

叶戈尔·列托夫的天才

哥哥谈“民防”领导人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列托夫是一位爵士音乐家、前卫音乐家，也是俄罗斯最著名的即兴爵士乐和新爵士乐演奏家之一。他自学成才，最初学习萨克斯管、长笛和低音单簧管。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与谢尔盖·库廖欣组成二重奏组合“流行机械”（Pop Mechanics，包括小号和大号），并创立了“Tri O”乐团，由此享誉国际。“Tri O”乐团曾参加苏联所有爵士音乐节的演出，并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广泛的巡演。谢尔盖·列托夫曾与多个音乐团体合作，包括“流行机械”、“民防”、“DK”、“拉达与捷尔诺夫尼克”、“DDT”、“艾丽莎”等等。自1986年以来，他一直与歌手瓦伦蒂娜·波诺马列娃保持合作关系。

谢尔盖·费多罗维奇曾多次荣获俄罗斯和国际音乐及戏剧比赛奖项。他积极参与电影和戏剧作曲项目，并经常受邀参加广播和电视节目。

作为一名俄罗斯爱国者，他经常在克里米亚、顿巴斯和俄罗斯新地区举办音乐会。

“明天。”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叶戈尔·列托夫和库兹马·里亚比诺夫如果活到2024年，就将年满60岁。您如何评价他们40年前创立的“民防”组织取得的巨大成功？它对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几代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谢尔盖·列托夫。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的诗歌才华是该团体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曾以叶戈尔·列托夫或叶戈尔·多赫利的笔名在地下出版物中发表作品。我的兄弟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的作品更多地体现在“民防”运动创作的歌曲中，而非印刷文字中。

乐队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其不墨守成规的风格。与大多数俄罗斯摇滚乐队不同，我哥哥的作品并非以西方为导向。它并非是对西方音乐或歌词的简单复制或改编。他正在创造一种独特的西伯利亚音乐运动——一种不墨守成规、充满革命精神的音乐诗篇。我哥哥对许多乐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参与了他们的工作，为他们提供协助，甚至亲自担任制作人，还在家里与他们一起录制唱片。

摇滚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或音乐现象，也不仅仅是娱乐，正如我们大多数电视和娱乐节目所描绘的那样。它首先是年轻一代渴望找到人生方向并在某种程度上反抗既定社会习俗的表达。它是反叛的音乐。我哥哥的口号“我永远反对！”在“民防”组织和西伯利亚运动相关团体的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明天。”关于叶戈尔·列托夫有很多神话和传说。所以，从身边亲近的人那里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会很有意思——你的家族来自哪里？你的祖先是谁？伊戈尔的童年是怎样的？

谢尔盖·列托夫。关于他父亲的家谱，人们知之甚少。他来自乌拉尔山脉，来自莫洛托夫州（今彼尔姆州）偏远的戈卢乌希诺山村。他的母亲是伏尔加哥萨克马尔捷米亚诺夫家族的成员，该家族于1851年从伏尔加地区，更确切地说是从莫尔多瓦河（埃尔齐亚河）的尼基蒂诺村迁徙到所谓的

吉尔吉斯草原，也就是哈萨克斯坦。

马尔捷米亚诺夫家族的血脉可以追溯到17世纪。他们居住在舒钦斯卡娅村。我们的曾祖父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是舒钦斯卡娅村的一名警察和村长。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祖父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在一战期间曾担任驻扎在扎伊桑市的西伯利亚第三哥萨克团的副官、财务官和军需官。米哈伊尔·叶菲莫维奇后来在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担任伐木工程师和林务员。他于1935年首次被捕。1937年，他遭到镇压，他的家人被贴上了“人民公敌”的标签。

我外祖母的家族可以追溯到叶里卡洛夫家族，这是一个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颇为富裕的商人家族。这个大家族几乎所有人都支持革命。我的曾祖父亚历山大·叶里卡洛夫是哈萨克民族解放党“阿拉什”的支持者，他的儿子尼古拉则支持红军。但奇迹般地，镇压并没有波及到亚历山大·伊里奇的家族。他们都过着精彩而充实的生活。

伊戈尔和我的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都是军人。十七岁时，他奔赴前线，在波罗的海地区作战，隶属于一个由列宁格勒民兵组成的师。我的母亲塔玛拉·格奥尔基耶夫娜是一位神经科医生。1959年，她、我的父亲、我的祖母亚历山德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马尔捷米亚诺娃（娘家姓叶里卡洛娃）和我搬到了鄂木斯克，五年后伊戈尔在那里出生。我们一家住在要塞里，一个世纪前，被流放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被关押在这里。我们住在陶贝街的一栋石头营房里。一个小房间，一条走廊，走廊里有煤油炉，穿着长袍的妇女们正在炉子上做饭。水泵和厕所都在外面……

“明天。”考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叶戈尔·列托夫最喜欢的作家，这种相似之处很有意思。在鄂木斯克，还有哪些地方与你和你哥哥的童年有关？

谢尔盖·列托夫。我的童年记忆与陶贝街、军官俱乐部紧密相连，我在那里学会了弹钢琴。那里是鄂木斯克的中心。在执委会大楼对面，矗立着一座纪念碑。列宁坐在基座上宽大的椅子上，向站在他身旁的斯大林伸出手。后来，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被移走了，只剩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站在基座上，他抬头望向一旁，带着一种惊奇的神情。过了一段时间，他也离开了，只留下一个空荡荡的讲台，再也没有“神灵”占据过。

不久，1965年，我们搬到了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的一套三居室公寓，离我们之前的家很远。那里建起了赫鲁晓夫时代第一批预制公寓楼，原址是一个军用机场。从老城区搬到封闭式社区，我内心十分感慨，而我的哥哥却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居民区的一侧是一片墓地，伊戈尔经常在歌里提到它。附近还有一片白桦林，他喜欢去那里，也喜欢在那里作曲。居民区的另一侧是几家大型工厂，其中不乏军工厂：自动机械厂、巴拉诺夫斯基发动机厂、鄂木斯克航空厂……

“ZAVTRA。”您在契卡洛夫斯基的公寓里有个录音棚，乐队“民防”的所有主要专辑都是在那里录制的。那里还计划建一座叶戈尔·列托夫博物馆。最近有关于博物馆开幕的消息吗？

谢尔盖·列托夫。父亲费奥多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晚年时常问我，他去世后这套公寓会怎么样。我答应他，要在这里建一座叶戈尔·列托夫博物馆。我选择了父亲和伊戈尔童年时的房间作为展览场地，后来我哥哥把它改造成了格罗布唱片工作室，他在那里工作，其他音乐家也经常来这里。房间里摆放着一套架子鼓和大型的数字及模拟录音机，用来录制音乐。我努力将房间里的一切保留到伊戈尔生前的原貌：他亲手绘制的天花板，以及用无数照片拼贴而成的精美墙壁。

遗憾的是，博物馆的开幕目前已被推迟。伊戈尔的遗孀娜塔莉娅·丘马科娃拥有部分公寓产权，但

她尚未最终同意。不过，她曾承诺签署一份许可，将公寓产权转让给叶戈尔·列托夫的“Siyanie”基金会，该基金会原本计划负责筹建博物馆。此前，我们已获得鄂木斯克市长的支持，并征得了大楼居民的同意，将公寓的用途从住宅改为展览用途。

“明天。”哥哥通常是弟弟的权威人物和榜样。你的音乐爱好对伊戈尔的影响肯定很大，这一点显而易见。你推荐他听什么音乐？得知他选择了朋克摇滚，你感到惊讶吗？

谢尔盖·列托夫：当然，我是弟弟的权威人物，我的父母也一直把我当作榜样。奇卡洛夫斯基村住着附近工厂的工人，那里可不是什么平静的地方。所以有个哥哥让伊戈尔的生活轻松多了。如果他被欺负，他总可以说：“我有个哥哥！”

伊戈尔很小的时候，父亲给我买了一台里贡达牌收音机。我们听的第一批唱片是《克鲁戈佐尔》杂志上的录音。像亨利·德斯和亨利·塔尚这样的法国香颂歌手给伊戈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哥哥经常哼唱这些旋律，也很喜欢苏联歌曲。父母的双声部唱得很好，我记得他们唱过古里廖夫的浪漫曲。我更喜欢听古典音乐，会弹一点钢琴，还把摇滚乐介绍给了哥哥。我在物理数学学校读书的时候，就买了Ze Who、齐柏林飞艇和披头士的唱片回家。这些乐队对哥哥影响很大。他开始弹原声吉他；拾音器是我父亲亲自安装的。

伊戈尔中学毕业后，考入了莫斯科的一所建筑职业学校。当时我住在莫斯科附近的克拉斯科沃，他住在我家。那段时间，我自学了萨克斯管和其他一些乐器，当然只是业余爱好。我和一个朋友买了一架二手古董钢琴，我很喜欢在上面即兴演奏。

“明天。”所以，伊戈尔在莫斯科重返乐坛了？

谢尔盖·列托夫：是的。我开始带他参加各种活动，他在活动中担任鼓手，我还帮他买了他的第一把贝斯吉他，一把“奥菲斯”牌贝斯，他一直用着这把吉他和他的音箱，直到去世。

大约在1984年，我开始在DK乐队演奏。我把我们的录音寄给了我哥哥，这些录音对他后来的作品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认为正是谢尔盖·扎里科夫乐队那种真诚、非商业化、略带“粗糙”的音乐风格——各种破碎的节奏、不拘一格的音乐以及略显粗糙、录音质量欠佳的人声——才是当时主流的音乐风格。

“ZAVTRA。”20世纪90年代初是叶戈尔·列托夫和谢尔盖·库廖欣政治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他们似乎完全投身于当时在俄罗斯已被取缔的民族布尔什维克党的活动，他们的工作也演变成一场反资本主义的抗议。叶戈尔的整个圈子是如何与他拥有如此一致的意识形态的呢？

谢尔盖·列托夫。到了1993年，我和父亲伊戈尔的世界观已经非常一致。那是一段精神上高度统一的时期。1993年8月，父亲参加了在苏维埃大厦举行的民族救国阵线最后一次会议。伊戈尔和其他民防音乐家们保卫了白宫，并最终幸存下来，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开始对他们大喊大叫、辱骂他们的共产主义老奶奶们：“滚出去，你们这些毛茸茸的家伙！我们这里最不需要的就是毛茸茸的家伙！”我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受冒犯，就离开了。

白宫枪击案后，伊戈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此前就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像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看待艺术：生活是一场斗争，创作也是一场斗争。他与俄罗斯劳动党关系密切，与安皮洛夫是朋友，后来又结识了利莫诺夫和杜金。尽管伊戈尔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政客们利用他作为艺术家的声望达到政治目的，但他对自己的左翼世界观绝对真诚，并经常说：“我是一个苏联民族主义者。”这种态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末。

“ZAVTRA。”从1998年到2004年，你参与了许多“民防”音乐会以及专辑《Starfall》的录制。那段经历是怎样的？

谢尔盖·列托夫：我来告诉你我是如何加入“卫国卫队”的。九十年代中期，我作为音乐家的需求量不如以前，更多的是作为录音师或音乐技术人员。那时，“卫国卫队”的大部分作品都由叶夫根尼·科列索夫的KHOR唱片公司发行，我为他们做音频母带处理。因为伊戈尔是我的兄弟，所以我开始接触他的音乐。我们变得很亲近，经常聊天、通信，讨论各种事情。伊戈尔不太喜欢数字技术，经常提起那些更喜欢模拟技术的人。

1996年，我参加了“AES+F”展览，我的哥哥和库兹马·里亚比诺夫也参加了。他们带了一些波特酒，展览结束后，我们坐在附近建筑工地旁的长椅上聊天。那是我与激进艺术结缘的开始。

当时，库廖欣去世后，一位音乐家决定制作一个类似“流行机械”风格的音乐节目。他邀请我参与这个项目，尽管他可能更看重的是我哥哥而不是我——当时“民防”乐队和叶戈尔·列托夫本人都拥有巨大的人气，很多人都想借此机会出一份力。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哥哥。他说：“好，我可以去，但先让你为我演奏。”这是他第一次主动提出与我合作。就这样，我开始了与“民防”乐队的合作。

当时，我对乐队的歌曲并不太熟悉。叶夫根尼·科列索夫让我大开眼界；他给我带来了一大堆他与KHOR唱片公司合作发行的磁带。毕竟，我是一位自由爵士乐手和即兴演奏家，流行音乐的美学风格对我来说并不吸引人。我曾与众多摇滚乐队合作，例如Akvarium、DDT、Alisa、Rada i Ternovnik等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从未有人专门聘请我去做某件事。他们希望我能即兴演奏，创造出一些震撼人心、震耳欲聋的声音。之后，我们与Oborona乐队的合作开始了。我主要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演出。当时的Grazhdanskaya Oborona乐队预算相当有限，根本负担不起额外的人员费用。有时我们会去欧洲巡演：柏林、纽伦堡。我在秋明和新西伯利亚的音乐会上演出，乐队也曾尝试与我合作录制唱片。然而，叶戈尔的遗孀后来将我从录音中剪掉了，我的参与“消失了”。

“明天。”你仍然参与了《Starfall》专辑的制作，对吧？

谢尔盖·列托夫：在《星陨》这部影片中，我只出现在照片里，录音里听不到我的声音。他们删掉了我演奏的中音长笛音轨，还有我的一些独奏。布尔加科夫错了：手稿会被烧毁。过去是可以修改的。

“明天。”谈到他的专辑《百年孤独》的标题时，叶戈尔·列托夫说道：“是谁写的又有什么关系呢？一切事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知识。它就在我们周围。它就在我窗外的村庄里。它就在我睡在床垫上的猫身上。知识不属于任何人个人。就像我的歌，从最高意义上讲，也不属于我个人一样。或者反过来说，知识属于每个人。每当我遇到真正的东西，我总觉得那就是我自己。”你和伊戈尔讨论过版权问题吗？他当时对出售自己歌曲的想法有多大把握？

谢尔盖·列托夫：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从音乐人那里，特别是从我哥哥在“民防乐队”的同事那里了解到，并非所有人都对现行的版权制度感到满意。“民防乐队”成立之初，康斯坦丁·里亚比诺夫曾告诉我，“我们共享一切”，“我们共同完成了所有工作”。然而，到了2000年代，他创作的歌曲却不再属于他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们一起创作，录制专辑，即兴演奏，结果却发现只有一位作者，而我只是演奏者。例如，我有一张专辑，我的份额只有1/27000。通常，这并非音乐人的错；这一切都是他们身边的人造成的，这些人将自己的观点灌输给他们，并

挑拨他们与朋友和熟人的关系。结果，他们似乎背叛了自己年轻时的理想和过去的经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我非常欣赏伊戈尔的一点是，尽管经历了种种磨难，他始终保持着作品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也就是说，在演唱会上，他既演唱反苏时期创作的歌曲，也演唱1993年之后的作品。一方面，他唱着“在钢铁之城，混凝土般的自由统治着一切”，另一方面，他又唱着“我看到我的祖国从跪倒的土地上站了起来”。他认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人生只有一次，命运也只有一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令人惊讶的是，如今的年轻人听着《Oborona》这首歌，却能将所有这些看似矛盾的元素联系起来，就像他哥哥当年那样。他只是从艺术的角度将它们融合在一起，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它们往往难以调和。

“ZAVTRA。”在叶卡捷琳堡音乐会之后，叶戈尔·列托夫发表了他最后的政治声明，称“民防”是一个爱国者团体，并表示它与激进的光头党没有任何关系。“民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普拉托诺夫、弗韦登斯基和马姆列耶夫的作品。您如何评价列托夫的爱国主义？

谢尔盖·列托夫：伊戈尔是那种你可以绝对肯定地说的人：他出生在哪里，就在哪里发挥过作用。他是故乡的天才。这在名人中实属罕见。他曾多次被劝说搬到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我曾亲自邀请他去首都，告诉他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不适合他，那里没有他需要的文化生活等等。他没有反驳我，但也没有同意。我哥哥去了莫斯科，买了书、CD和黑胶唱片，但他从未想过离开鄂木斯克，尽管他从未在那里演出过。但他住在那里，他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刚离开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的公寓几周后就去世了。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与故土、与根紧密相连的人的绝佳例子。

“扎夫特拉”。叶戈尔·列托夫一直与《扎夫特拉》报保持着密切联系。1993年《日报》（Den）停刊时，他创作了歌曲《新的一天》（Novy Den），献给11月份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员工。但据副总编辑安德烈·费费洛夫称，自2000年代初以来，伊戈尔的最后一任妻子娜塔莉亚·丘马科娃就阻止了他与任何爱国出版物联系。2004年之后，你和你哥哥的私人关系是否出现过一段冷淡期？毕竟，就连《卫报》（Grazhdanskaya Oborona）的编曲也随着娜塔莉亚的到来而发生了变化。

谢尔盖·列托夫。乐队最大的变故发生在1998年，娜塔莉亚·丘马科娃的加入。最初，我哥哥的想法是组建一支“家庭乐队”，他和妻子一起合作。但渐渐地，许多成员离开了乐队。我们最后一次一起演出是在2004年。之后，我和伊戈尔几乎没再联系。是的，他陷入了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然而，即使在叶戈尔去世后，乐队成员仍然保持着积极的联系。我与“民防”乐队的乐手们见面，并与所有以前不认识的人重聚。因为西伯利亚运动的社群依然存在。我们，各个年龄段的“民防”乐队乐手们，经常聚会。我们之间有着美好的关系；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是朋友，我们交流，我们像挚友一样互相支持。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代表着他们心中我哥哥的某种记忆，他们仍然记得他，爱着他。

Chronicles | Sport24 — 传奇人物叶戈尔·列托夫认为俄罗斯摇滚乐“可耻”：以下是这位“民防”乐队创始人鄙视它的原因

俄罗斯摇滚乐的标志性人物叶戈尔·列托夫认为俄罗斯摇滚乐“可耻”：以下是“民防”乐队创始人鄙视他的原因

叶戈尔·列托夫作为俄罗斯非正式音乐的创始人之一，名垂青史。他的乐队“民防”曾风靡一时，即使在他去世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广受欢迎。在某种程度上，列托夫堪称俄罗斯朋克摇滚的真正奠基人。而且，如果真要用“杰出人物”来形容列托夫的话，他或许也是这一音乐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表演者和作曲家。

正如常言所说，莱托夫本人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我们之前报道过他与“加沙地带”（Sektor Gaza）乐队主唱尤里·克林斯基赫的会面。据该乐队的第一任吉他手伊戈尔·库什奇透露，这位传奇吉他手对这次会面的结果并不完全满意：

霍伊出现了。“尤拉，你跟叶戈尔说话了吗？”谢苗问道。尤列茨沉默不语。“那你为什么不说话？他跟你说了什么？”谢苗又问。尤拉恼火地说：“他让我失望了。我告诉他我喜欢他的歌，但他一声不吭。我又告诉他我也写歌，他根本不在乎。去他的。”总之，叶戈尔惹恼了尤列茨。然后他们的最后一首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响起，过了一会儿，他们宣布我们出场。尤拉再也没见过叶戈尔。

莱托夫毫不掩饰他对业内同行的古怪态度。他还对国内摇滚乐坛表达了相当批判的看法：

“我根本不听苏联摇滚，因为根本没什么值得一听的——简直丢人。尤其是莫斯科摇滚，事实证明它糟透了。那些苏卡乔夫乐队的人也只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如果列宁格勒摇滚也能算摇滚的话，那是因为它们翻唱得实在太烂了……不过原唱倒是相当不错。”

他们听外国唱片，然后把歌词扒下来。歌词也扒下来了，因为他们的英语说得特别好。因为我英语也不错，所以一听到他们的歌词，我就脊背发凉。我心想：“这怎么可能？”那里有一些非常酷的镜头。

在莫斯科，他们试图做自己的事情，这与列宁格勒不同。但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称Zvuki Mu是“他们自己的”。有人说马莫诺夫的舞台表现力与美国实验音乐家Captain Beefheart（**Sport24**）如出一辙。马莫诺夫曾亲口告诉我，[Beefheart的演出]是他最喜欢的录像带，”列托夫在199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

莱托夫还批评了其他一些团体。例如，他是这样评价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我们对这个团体抱有令人作呕的态度。如果说我最想用机关枪干掉的人是谁，那就是这个团体的粉丝，以及他们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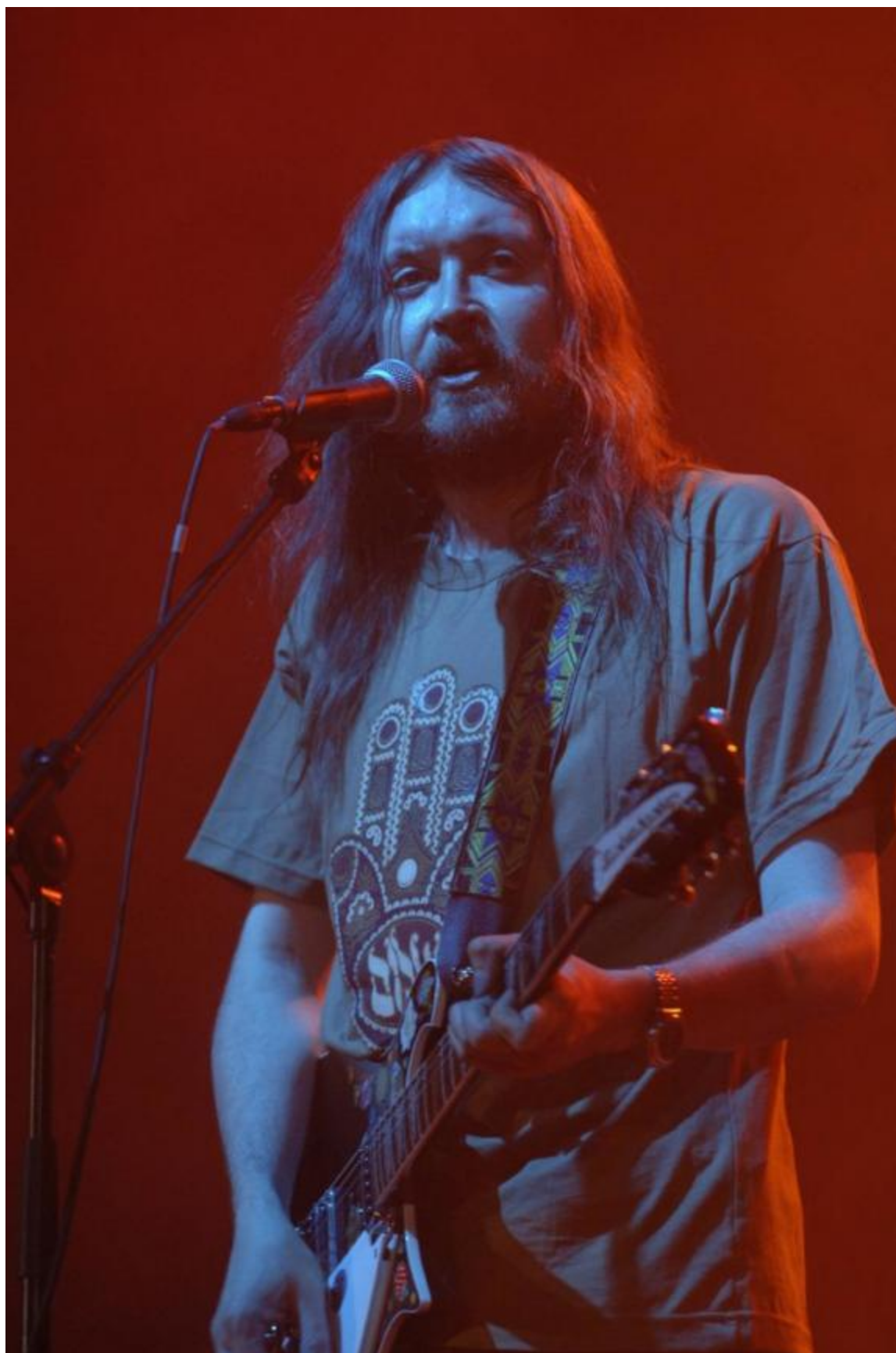
《卫报》创始人认为DDT和Alisa只是流行音乐：“我认为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俄罗斯摇滚乐。改革时期表明，我们根本没有摇滚乐运动。我们只有流行音乐——DDT、Alisa。她们都很快就商业化

了。”

在发表如此斩钉截铁的言论之后，许多人开始指责列托夫傲慢自大。然而，他终其一生都未曾改变过自己的立场。至少，这位标志性的音乐家从未公开谈论过此事。

“让我更惨吧！”真正的叶戈尔·列托夫是怎样一个人？

在叶戈尔·列托夫 60 岁生日之际，《Snob》杂志记者阿列克谢·切尔尼科夫采访了这位音乐家的弟弟谢尔盖·列托夫，谈到了叶戈爾的成长环境、他如何延续古老的传统、他为什么对性不感兴趣、他是否是法西斯主义者、他是否想“摧毁”音乐、为什么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他成为俄罗斯文化中最具争议的人物，以及为什么现代地下音乐圈子越来越小。



“民防”

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演唱会上图片来源：PhotoXPRESS

叶戈尔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他与同龄人有什么不同吗？

他是个特别的孩子，但并非是那种让人感到欣慰的特别。他从小体弱多病，出生时就被诊断出患有脑积水，并被喂食某种谷氨酸类药物……正因如此，他拒绝进食。为了让他吃哪怕一勺，我不得不在他婴儿车前表演一番。因此，他从小就没受过惩罚，也从不做任何家务——他没有任何责任！他不用出门买面包，也不用拖地……他的母亲认为他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小伊戈尔每天都过得像最后一天，像过节一样。这样的成长环境最终酿成了悲剧。你这辈子见过多少没有毕业证的人？

我本人没有高中毕业文凭。我被学校开除了，也没有参加考试。

真的吗？伊戈尔也没参加考试。他拿到了一张高中毕业证书。之后，他只能去职业学校读书。我弟弟决定跟我去莫斯科读书时，我爸妈跟我说：“我们受够他了，只有你能管得了他。”他从小就特别喜欢足球，把房间的整面墙都贴满了海报，但这其实是一种补偿：他不用上体育课，也不能参加体育运动……当然，他也没上幼儿园。

他青少年时期听什么音乐？他第一次接触摇滚乐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的？

我们从《Krugozor》杂志上剪下一些蓝色小唱片，听着听，但大多都是些不知所云的歌。令全家人惊讶的是，小伊戈尔，当时还是个婴儿，却异常喜爱法国香颂歌手的录音。当然，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他对这些录音一无所知。但不知为何，他却对这些录音欣喜若狂，一遍又一遍地要求播放。那是 1965 年。他还坐在婴儿车里，就深深地爱上了男人弹着吉他唱歌的声音。

他第一次接触摇滚乐要感谢我。他八岁那年，我在新西伯利亚的一所物理数学寄宿学校读书。1973 年假期，我去鄂木斯克，带了一张 The Who 乐队的摇滚歌剧《汤米》的黑胶唱片。伊戈尔听了这些歌，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后来，假期里，我从鄂木斯克一位共青团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那里买了一些唱片，但我把所有的黑胶唱片都留在了新西伯利亚的宿舍里。我在鄂木斯克的时候，伊戈尔也听了一些音乐，我还用卷盘式磁带给他录了一些……我们通信很频繁；他通常寄很长的信。这些信里四分之三都是他很喜欢乐队的歌词，比如“Voskresenie”、“Mashina Vremeni”……他非常喜欢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苏联摇滚乐。当然，后来伊戈尔否认了这一切。



谢尔盖·列托夫在音乐会上照片：米哈伊尔·格鲁辛/PhotoXPRESS

你们之间有过分歧吗？

我从来都不感兴趣我哥哥喜欢的那种音乐。我们兴趣不合。我更喜欢爵士乐和古典音乐……当然，他的品味后来也变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喜欢匈牙利摇滚乐队 Omega、捷克乐队 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等等。我哥哥把父母给他的所有零花钱都花在了摇滚唱片上。

是否存在竞争感，或者说是一种竞赛？

当然。他小时候很崇拜我。我父母显然把我当成榜样：我学习成绩优异，在物理、化学和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都拿过奖……我成绩好，而伊戈尔成绩很差。他总是被拿来和我们比较，这让他很恼火。但后来发生了一件很棒的事，之后我弟弟对我非常尊敬，我父母也不再把我当成榜样了。

我因为宣扬耶稣基督而被十年级开除——当时我们读的是《莫斯科》杂志上刊登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一个版本。我们学校有个美术社，社长是尼古拉·卢卡涅夫，一位二战老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布尔加科夫的妹妹曾经住在新西伯利亚。她把哥哥的所有手稿都借给了尼古拉·菲利波维奇阅读……于是，我们一起读了《大师与玛格丽特》，我因此第一次受到了训斥。后来，他们又在我身上搜出了一堆资产阶级音乐唱片——也就是在那时，我被开除了。那是 1974 年 3 月。因为这件事，我没能参加全苏化学奥林匹克竞

赛，尽管回到鄂木斯克后，我尝试转学到其他学校。他们还想把我开除出共青团，但我抢先一步，自己退会了。这些事发生之后，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叛逆者，也成了我哥哥眼中的榜样。

他为何在 1985 年成为惩罚性精神病治疗的受害者？他又是如何从这段经历中幸存下来的？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但和我哥哥讲述的略有不同。他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生活神话化。我哥哥和我一起在莫斯科生活了大约一年，但对于一个来自西伯利亚的人来说，首都的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轻松。他很快就融入了上流社会，我把他介绍给了概念艺术家，他开始参加各种活动和私人聚会……但他在那里并没有像在鄂木斯克的同龄人中那样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八个月后，他因为旷课被莫斯科的一所建筑职业学校开除，于是回到了鄂木斯克，在那里开始创作音乐。“民防”乐队就是这样诞生的。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但在 1986 年初，他的来信就断了。

我从父母那里得知，一个名叫梅什科夫的少校开着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把伊戈尔直接送进了精神病院。妈妈利用自己的人脉，很快就打听到了他被关在哪家精神病院。她设法和院长谈判，让伊戈尔除了维生素之外，不用服用任何药物。也就是说，他没有被迫服用任何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被注射任何氟哌啶醇。他后来形容说，他并没有经历过任何“真正的体验”。此外，妈妈还安排，如果他哥哥愿意帮忙，比如说，在病房里拖地，就可以秘密地把他送回家。爸爸会打车去精神病院接他，然后伊戈尔就可以回家听唱片、弹吉他、看书……



“民防”

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演唱会上照片：亚历山大·乌特金/PhotoXPRESS

众所周知，你曾帮助他脱离险境.....

不久之后，我抵达了鄂木斯克。我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计划，终于可以把他从医院里救出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朋友，音乐学家塔季扬娜·迪坚科说，概念艺术家中没有一个告密者，但俄罗斯摇滚乐手里却有很多。克格勃通过某些人了解毒品，通过另一些人了解同性恋.....所以我决定在摇滚圈里散布谣言，说我想召集外国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因为苏联根本没有改革，西伯利亚的精神病院有人被勒死。当然，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但我的计划奏效了：一个告密者向克格勃举报了我的虚张声势，他们放了伊戈尔。

但我们并没有和梅什科夫少校道别。他后来又出现在我哥哥的生活中。多年以后，伊戈尔随“民防”剧团（我记得是在远东）巡演，但巡演组织者骗了他们。他既没给他们版税，也没给他们机票。后来才知道，梅什科夫少校已经是远东一家航空公司的重要高管了。他得知此事后，立刻出手相助，说道：“叶戈尔卡，你都多少岁了！你们会没事的，我们会送你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

叶戈尔住院时被诊断出患有什么疾病？

“自杀综合症”。坦白说，伊戈尔当时的表现确实可能让我们对他产生这样的怀疑。从孩提时代起，我哥哥就有一句奇怪的口头禅，让我们全家都摸不着头脑。每当我们告诉他：“伊戈尔，别碰热的东西，你会烫伤的！”他总是回答：“那又怎样？让我更惨吧！”之后，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了。他总是用这句话打击我们。我不知道他这想法是从哪儿来的。

他真的对性或建立人际关系完全不感兴趣吗？

没错。苏联时期相当保守，我们的父母都是苏联人：我父亲在苏联军队服役，我母亲是位医生，出身于一个“人民公敌”家庭。她的父亲被处决了，我们的祖母按照所有共产主义教条抚养我们。父母没有教过我和伊戈尔如何追求女性，如何给予关注.....结果我们在这方面过于谦虚。女人、足球和政治，只占我哥哥思想的 1%；他剩下的 99% 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创作中。



“民防”乐队成员：吉他手亚历山大·切斯诺科夫（前景）和主唱叶戈尔·列托夫（背景）在演唱会上
图片：格里戈里·西索耶夫/塔斯社

在政治方面，他究竟持何种观点？或者说，他的抗议和政治倾向始终纯粹是形而上学的、反社会的？

伊戈尔的信仰和观点经常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乎无所不包。他是个极其热情的人，只要有人跟他讲些有趣的事，他就能接受任何人的观点。我经常读我哥哥的访谈，有时会发现里面几乎一字不差地复述了我当年的一些想法。上世纪 80 年代，伊戈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苏联政权的反抗者——就是那个把他送进精神病院的政权。那时，他呼吁人们逃离体制，成为嬉皮士，拥抱无政府主义……然后，苏联的一切突然崩溃了，大约在 1991-1992 年，伊戈尔的立场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成了一名共产主义者。想想看：他甚至被久加诺夫授予了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只颁发给那些在法西斯独裁政权（例如巴拉圭）服役至少 25 年的资深共产主义者。久加诺夫向他颁发了这枚奖章，“以表彰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教义”！

那么法西斯主义呢？

但我哥哥从来都不是法西斯分子。他常说：“凡是自称法西斯的人——滚开，带着你们那股法西斯臭味！”再说，你知道他唱片公司 GrOb Records 的标志是什么意思吗？那是一个风格化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祖母拖着孙女穿过奥斯维辛集中营走向毒气室。我哥哥还有

一首歌，歌词是“我是犹太人，杀了我吧，我是帕米亚特协会的成员”。虽然他是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但他从来都不是民族主义者。

叶戈尔·列托夫的名字曾经是“朋克”的代名词。如今，他似乎已成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中最具争议的人物，而且再也没有比他更广为人知的人物了。列托夫如今已成为官方国家准则的一部分，难道他就不再是朋克了吗？

“朋克”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他本人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朋克运动的美学——无论是在他的音乐还是外表上。他并不认同朋克的许多意识形态原则。至于他如今的成就——这并非他的过错。这种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去世了：资本非常乐于为了自身利益而剥削一切与之对抗的事物。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其经典著作《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中对此有非常精彩的阐述。

如今人们对它的理解有多准确？总的来说，人们如何理解它的主要信息——包括创作方面的和公民方面的？

正如“DK”乐队创始人谢尔盖·扎里科夫（该乐队对他的弟弟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说，伊戈尔的作品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青春期。真正保留着青春期的入才能正确理解叶戈尔·列托夫。当然，我的回答还可以进一步展开，但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切都由此展开。



“民防”乐

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演唱会上照片：亚历山大·乌特金/PhotoXPRESS

我们是否应该在叶戈尔的艺术姿态中探寻意义？对他而言，究竟是表达某种意义的渴望更为强大，还是纯粹的能量和表达更为强大？

我相信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他过去常跟我谈起他的音乐：“它们不过是儿歌。”他对器乐演奏不太上心，觉得没什么意义。另一方面，他是一位技艺精湛的演奏家，精力充沛。但他并没有把诗歌和音乐割裂开来。伊戈尔继承了非常古老的诗歌传统，非常古老。

在诗歌的发源地希腊，诗人并非只是对着纸写字、朗诵的人。最初，诗歌仅以艺术歌曲的形式存在，并由弦乐器伴奏。例如，公元前 7 世纪的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就创作了这种歌曲。萨福（Sappho）和阿尔凯乌斯（Alcaeus）也是如此……这种歌曲被称为“melika”和“lyrica”，即以里拉琴伴奏的歌曲。希腊悲剧也是如此：剧作家也为他们的戏剧谱曲。只是这种音乐未能流传至今，是因为西方文明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自人文主义时代（甚至更早）以来，一切都发生了扭曲。西欧传统认为诗歌是文学、文本、文字。而古代传统则认为诗歌应该歌唱，它与音乐密不可分。这场冲突最终的解决方式，并非采纳了古代传统。是的，中世纪也有吟游诗人和游吟歌手。但是，为他们演唱诗歌而创作的旋律并没有流传下来。

在我看来，民防组织所做的与其说是音乐，不如说是蓄意摧毁音乐的传统形式。叶戈尔是否也想用马列维奇摧毁绘画概念的方式来摧毁音乐呢？

我不同意；根本没有破坏。伊戈尔早期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了 DK 乐队的谢尔盖·扎里科夫的理念——他们刻意营造一种“脏”的音效，歌词也录得含糊不清……他们的想法是：我们生活在污秽之中，一切都不尽如人意——这就是我们对现实的回应。但到了晚年，我哥哥不再那样创作音乐；他开始接受更复杂的音乐形式。从上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我负责他的录音后期制作，而我哥哥则使用模拟和数字设备进行创作。



“民防”乐队主唱叶戈尔·列托夫在演唱会上图片：格里戈里·西索耶夫/塔斯社

莱托夫之后，任何形式的地下音乐似乎都难以为继；现代地下音乐已经大幅萎缩……这是为什么呢？

他的地位下降了——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因为如今就连地下音乐人也想“出人头地”，成名，并从中获利。但我哥哥从不接受电视或记者的采访；他避免任何可能扭曲他的言论和形象的事情。伊戈尔是个真正的反叛斗士。如今的艺术家渴望的是奢华的生活和名利；为了物质利益，人们什么卑鄙的手段都愿意做。年轻的非主流音乐家几乎从不问我他们应该创作什么样的音乐，该如何演奏……但他们都会问我如何才能获得推广。我立刻明白：他们注定要失败。除非现代艺术家明白艺术不是成名的手段，而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否则艺术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伊戈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他的艺术生涯时，没人考虑过走红——那意味着不可避免的惩罚、酷刑和镇压……人们只是在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他们想要创造新颖有趣的东西，而不是模仿。现代社会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它被资产阶级媒体和娱乐产业塑造，其压制性机构的运作方式也更加温和。一个连续几周埋头苦干的工人，想要一份甜点和休息。那又怎样？我们应该顺着他吗？不，我们需要想办法改变他们对艺术的态度。

* 国家布尔什维克党被认定为极端主义组织，并在俄罗斯联邦被取缔。

超越所有维度：叶戈尔·列托夫的真实面目

18 年前他飞到那里。这位音乐家的遗孀娜塔莉娅·丘马科娃与《势利眼》杂志作者玛丽亚·尼佐娃谈到了这位民防领袖如何看待自己的传奇，他为什么无法忍受闲散，为什么无中生有地制造丑闻，以及他为什么如此热爱新年。



叶戈尔·莱托夫 (Egor Letov)，在他的别墅，2004 年 6 月照片：娜塔莉娅·丘马科娃

莱托夫是革命者、萨满、先知——各种各样的身份。他对这些标签有何感想？

“萨满”这个标签有点烦人，因为它挥之不去。只要一时兴起提到萨满教，这个标签就一直跟着他。叶戈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确实对魔法着迷，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以各自的方式解读他的舞台动作、歌唱风格和其他方面。一方面，他本人对此持幽默态度，因为他很自省——他不认为自己需要被崇拜。另一方面，他认真对待任何魔法现实，因为精神生活对他来说无比重要。他常常感觉“某种东西”在通过他说话：所以他必须继续写作，也就是表达这种声音。他与空间、与现实展开对话——从更高、更重要、更广阔的存在层面出发。

我听他的节目好几年了，还是不明白他那股强烈的积极乐观、自嘲精神（以及各种讽刺意味）怎么会和……某种严重的抑郁症结合在一起？虽然用“抑郁症”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

我听他的歌已经三十年了，即使在整理档案资料的时候，我也依然在听。他的音乐从未让我感到沮丧。我总是觉得，即使在那些看似最绝望、最黑暗的作品中，他引导的也并非绝望，而是恰恰相反——通往出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充满力量的故事。在扬卡的歌里，我也看不到彻底的绝望，尽管我比大多数人都更了解那种绝望的滋味。至于叶戈尔，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可怕的抑郁时期，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什么也没写。而这些抑郁发作本身，恰恰与他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密切相关，这对叶戈尔来说才是最可怕的。但当灵感迸发之时，总会涌现出真挚的喜悦。永远如此。



娜塔莉亚·丘马科娃照片：来自娜塔莉亚·丘马科娃的个人档案

列托夫的职业生涯轨迹可以划分成几个小阶段吗？

确实很粗暴。早期的叶戈尔是个激进分子；他深受自身经历、银幕所见以及外界传闻的影响。这自然包括克格勃、精神病院、各种迫害以及其他冒险经历——他对此感触颇深。人们常说有些人“没有皮肤”——而他正是如此。叶戈尔对一切都如此敏感，对一切都反应如此激烈，这自然直接影响了他的创作。与此同时，他的大量歌词又源于纯粹的荒诞和玩世不恭。难怪他如此热爱奥伯留斯乐队。

不知为何，人们总是喜欢把这些特质归功于库兹马及其影响，但叶戈尔本人也具备很多这样的特质。这一点甚至在他和库兹马还不认识的《波塞夫》录音中就显而易见。也就是说，这些特质一直存在于叶戈尔的性格之中；只不过，在最初，库兹马被塑造成一个能发

明创造各种有趣事物的幽默人物，而叶戈尔则像是他的对手。但这只是角色而已。库兹马其实是一个非常深沉、严肃、细腻且脆弱的人，而叶戈尔本人则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他经常开怀大笑，对生活充满热情，和他在一起总是充满乐趣.....

叶戈尔“平均水平”——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利莫诺夫等等吗？

20 世纪 90 年代的政治是另一回事，它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突然爆发，而是源于人们对当时局势的深刻失望。这说来话长，我现在不想赘述。最后一个时期的界限也很难界定——大概是从 21 世纪初一直到末期。很多人无法真正理解或领会这个时期，因为之前的时期比较简单：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红色只是锦上添花。后来出现的五彩斑斓的局面，并非人人都能理解。



2003 年 9 月，在别墅照片：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在一次采访中，你说过叶戈尔无聊时会勃然大怒，因此引发过很多可怕的争吵。

他无法忍受任何形式的例行公事或乏味无趣。他总是需要荡秋千：要么是充满乐趣，让他笑得在地上打滚；要么是发生一些可怕的、悲剧性的事情。他无法忍受昏昏沉沉的状态。

你在《这意味着一场飓风》一书中引用了一句话：“即使一个人离家出走，他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例如，什么事？

有些丑闻，我觉得简直匪夷所思。显然，他需要一个发泄负能量的出口，因为他能把任何琐事都揪得死死的。我记得一开始，事情发展到我收拾东西离开的地步，因为“纽里奇总是帮我熨牛仔裤”（这是指安娜·沃尔科娃，我的前妻；我后来问过她——当然，她从来没做过这种事）。

列托夫的自我中心程度如何？

他极其自我中心：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如何把事情做好。说实话，他的确如此。不幸的是，没有他，他的任何合作伙伴都做得一塌糊涂。他有一种特殊的直觉，知道如何把事情做好。叶戈尔是个优秀的制片人。他的自我中心对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不过，也有个缺点：他对身边的人非常苛刻，而且常常以非常冒犯的方式对待他们。他自认为是个十足的混蛋，而且他常常也确实如此。

有段时间，“民防队”巡演很随意：他们烤只鸡就直接去其他城市了。后来有更认真的准备吗？

是的，后来我们开始准备得更充分：我们会带上熏鸡、黄瓜和西红柿。我们坐火车，从鄂木斯克到莫斯科要两天时间。现在人们会嘲笑我们，但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走的，或者坐小巴——那可真够呛。不过说真的，我们还是会排练的。我们会把曲目过一遍，学习新东西——尤其是有新乐手加入乐队的时候。我们会在家和吉他手排练，和鼓手排练——实际上是在演出前，因为他们是从外地来的。而且，我们从来没有感到厌倦。我想我们从来没有连续演出超过五场——最多六场，每场间隔两三周。我们尽量不离家太久。

我们喜欢出去玩，然后爬回我们的洞里。



2003 年 10 月巡演照片：谢尔盖·波普科夫

马车里的人是不是高兴地扑向你？

绝不可能。我们又不是流行歌手，连电视都没上过。乘客们对我们毫无反应，只有几个抱着吉他的人。还好。在莫斯科地铁或其他任何地方，人们认出我们的次数屈指可数。如果某个城市的人知道“Oborona”乐队要来，那他们或许会来火车站或酒店，但也仅此而已。



照片：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埃戈尔更喜欢待在家里吗？

是的。去旅行真的很有意思，买些新唱片、书，一些迷幻的东西，见见家人或结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新朋友，游览其他城市，让自己焕然一新。然后迅速回来，消化这一切，将其转化为某种创作过程和作品。研究我带回来的所有东西，并将它们重新加工成诗歌、音乐和拼贴画。

叶戈尔是否乐意与朋友分享他收藏的黑胶唱片和书籍？

一直如此。此外，我认为分享一切新鲜有趣的事物是每个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越多越好。

你们难道不厌倦彼此日复一日的相处吗？

嗯，就是这样。坦白说，叶戈尔是个很健谈的人。他喜欢和理解他的人聊天，尽管我们偶尔会有分歧，但我们通常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共同的看法。对叶戈尔来说，把所有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的感受立刻用语言表达出来非常重要。而且，他会立刻让听者理解他的意思。你明白吗？

即使是简单的对话也能变成一场创作。对他来说，就连平凡琐事也能成为诗歌的素材。任何事件，任何外出，都可能被赋予全球意义。它可能随时发生，当然，对他来说，分享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喜欢情景式的文字游戏，日常琐事也变得异常奇特。所以，日常生活不会成为沉重的负担，依然充满乐趣。叶戈尔总是会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合适的音乐。他会做 DJ。



2004 年 6 月在家中照片：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叶戈尔在家里是什么样的人？

他基本上是个很普通、很居家的人。他喜欢泡在浴缸里，让水流着，一泡就是几个小时，一边泡一边看书。他总是听着、看着、读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各种娱乐节目。如果我坐火车旅行，他就会读侦探小说。我们有个传统，比如买一份“SPID-Info”之类的报纸带去旅途。那真是一份奇葩的报纸。简直不可思议（笑）。一份非常非常黄的报纸。这真是一个典型的公路旅行故事：旅行的时候，时间很多，你就把它打发掉——就像现在上网一样。我们家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傻瓜博物馆”的地方：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东西最终都会被放在那里。比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些据说是哑巴的人会在火车上闲逛，把小猫的照片、色情日历和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扔到车厢里——希望有人会因为无聊而买点东西。这些海报上印着愚蠢的生产说明或意识形态宣言，或者是一些苏联式的标语，比如“准备好吸到老”。叶戈尔收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愚蠢之举，这让他觉得非常有趣。

后来我们开始从中国进货，商品上贴着“围巾”、“狗毛”、“动物毛”之类的标签，乱七八糟的。基本上，那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有。我们很喜欢去我们的别墅——幸运的是，它就在街对面，走五分钟就到了。那是一栋小房子，却有一大片地，种满了鲜花、树木、覆盆子和丁香。叶戈尔喜欢坐在那里，喝着啤酒，剥着我们种的向日葵的种子。有时候我们会带猫去那里；我们给它们买了遛猫用的牵引绳。家里的电视总是开着，从来不关。但我们只看足球。

叶戈尔让你上瘾了吗？

你疯了吧（笑）。我从小就看足球，一直支持莫斯科斯巴达克队，对足球了如指掌。所以，当我和叶戈尔第二次见面时——那是 1997 年，奥博罗纳住在我家的时候——我们整晚都在聊足球。

莱托夫对新年的感受真令人好奇。我很容易想象他站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旁，周围环绕着闪闪发光的彩带，怀里抱着几只猫。

的确如此。对他来说，那是一个意义非凡的时刻。我们庆祝所有的节日，但新年大概是他最喜欢的。新年对叶戈尔来说，是与他快乐的童年（对他而言，那正是他真实的童年）直接相连的契机，是总结某些成就的时刻，也是充满魔力、仪式感和魅力的时刻。我们会挑选一棵圣诞树，并总是会买一些新的装饰品来装点它。叶戈尔总是在平安夜去树林里，他总会在墓地为母亲装饰一棵圣诞树。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总会在新年前后写出数量惊人的诗歌。这些诗歌与节日有着直接的联系，并且以某种方式与其他节日的诗歌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对他而言，每一年的结束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那总是一个温馨的假期：和猫咪们一起，好好喂养它们（也喂养我们自己）。我们放了带惊喜的鞭炮，可以猜猜会掉下来什么。我们还点燃了仙女棒。有一次，房子差点被烧毁——一个喷泉放在旁边，后来才知道它不是给房子用的，而是给街上用的。整个房间、整个

天花板、所有的食物都沾满了烟灰，我们花了整整一天才把猫咪们从浴缸底下哄出来！如果森林离家近一些，我们当然会在除夕夜去那里。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在寒冷的天气里，跋涉近一个小时穿过奇卡洛夫斯基村和工业区……而且那时我们已经喝了香槟。你可能不会再走回头路了。

你们互送礼物了吗？

任何节日，哪怕是最傻的节日，我们都会去莫斯科的儿童世界商店，挑一些滑稽的小动物。或者挑一些我们最喜欢的，比如野猪或獾之类的。又或者，比如，我们挑一只大老鼠，然后突然跑到商店的婴儿区给它买衣服，一件T恤和内裤。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完全陌生的动物。我们家有好几只这样的动物；叶戈尔管它们叫“小动物”。



2006 年新年照片：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如果叶戈尔有很多钱，他会做什么？

我想我们会买更好的设备：吉他，还有我们以前一直买不够的各种效果器。再添置几张唱片。我们会去看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的《基督升天》；叶戈尔一直很想看现场演出。

一年前，在一次粉丝见面会上，你说过你经常能在叶戈尔的作品中发现新的东西。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

我记得，不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找到一盘磁带，里面录着一些以前家庭聚会和节日的录音，其中有一盘里，伊戈尔正在唱《为了你，为了那个家伙》。那是哪一年？1974年，也可能是1972年；那时候他还很小。那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当然，大家都说我篡改了录音，邀请了别人家的孩子一起唱。真是太搞笑了。有个家伙说他正在听录音，他妻子——一位语言治疗师——走了进来，立刻问道：“那是你家小列托夫在唱歌吗？”

您提到您目前正在制作一部新电影并审阅采访稿。您计划拍摄《健康永驻》的续集吗？

没错，没错。但无论在理念还是技术上，它肯定不会相似。只是现在整个项目进度严重停滞，因为很多人离开了，制作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这并非资金问题，而是因为我们身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海岸。

但我认为我们还是会这么做。

玛丽亚·尼佐娃采访

[#文化、#音乐、#叶戈尔·莱托夫、#民防](#)

Chronicles | Sad Wave — Miracle Music: Natalia Chumakova 谈“Posev”、神话创造及其他奇迹

奇迹音乐：娜塔莉亚·丘马科娃谈《波塞夫》、神话创造及其他奇迹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发布关于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列托夫 (Igor Fyodorovich Letov) 的消息了。在此之前，我们甚至还拥有列托夫生前整个新闻团队。今天是叶戈尔 (Yegor) 的61岁冥诞。为了纪念他，我们刊登了对“民防” (Civil Defense) 乐队前贝斯手、列托夫遗孀娜塔莉亚·丘马科娃 (Natalia Chumakova) 的采访。我们讨论了列托夫的首个项目“波塞夫” (Posev) 于2024年发行的专辑。

采访者：亚历山大·托卡列夫

Posev 的最新录音作品已经发行。我刚查了一下 Discogs——两年内发行了八张专辑。这绝对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你们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些专辑的发行？

娜塔莉娅·丘马科娃：嗯，该怎么说呢？是的，确实花了很长时间。首先，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这些作品真的需要修复和出版。老实说，我并非对此有任何严重的怀疑，只是在叶戈尔在世的时候，我甚至都没听说过这些作品，因为我一直没时间去研究它们；我们只是简单地谈起过。

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一个人没有像对待其他许多东西那样销毁它们，而是让它们保持原样，保存下来（因为叶戈尔确实抹去了非常早期的几张器乐录音，我不知道他把它们怎么样了），如果它们真的存在的话，那么我认为就应该让大家听到它们，而且在我看来，这是正确的决定。

你曾写到专辑发行日期和曲目列表有时会出现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正是如此。因为这些磁带大多根本没有标签。一点都没有。关于它们的信息只能从叶戈尔零星的采访记录，或者他提及后来使用过的歌曲或对歌曲的其他评价中拼凑而来。基本上，你只能根据一些次要线索来猜测它们出自哪张专辑。

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可能找到这些信息的。而且给这些歌曲命名也很困难，因为很多歌曲根本没有歌名，因为没有曲目列表。

我还注意到，在电影《健康永驻》中，几乎没有提到“波塞夫”这个组织。扎里科夫只提过几次叶戈尔把第一个组织命名为“波塞夫”，仅此而已。这是怎么回事？或者说，根本没有人能讲述这个故事了？

没错，确实已经没有人能讲述这个故事了。唯一可能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是吉他手巴本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很久以前就搬去了文尼察。但是，所有寻找他的尝试都无功而返。

于是，我拿起波谢夫的CD《雷鬼、朋克和摇滚乐》。我看了看制作人员名单，特别是乐队成员。在和声部分，我看到一个叫谢廖加·多莫伊-沙什科夫的人。然后我们翻到第三张专辑《反主流文化》，其中收录了对《两百年孤独》的采访，而这次采访的又是谢廖加·“多莫伊”。你说这是自问

自答，但古里耶夫却说是他采访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个谢廖加·“多莫伊”究竟是谁？

他是叶戈尔的儿时好友，我想他们还是同班同学。他并没有为波谢夫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只是碰巧在那里而已。当然，古里耶夫并没有采访叶戈尔，那是一次自问自答。

不知道列托夫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他总得指定一个人作为对话者（笑）。而塞廖加“多莫伊”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是个神话人物。也就是说，他只是个配角，一个看似参与了某件事的人，但实际上他完全没用。也许以后我会更详细地谈谈他。

关于“Posev”乐队，我再补充一点。我注意到他们的专辑《DIY Yourself》，这张专辑的风格与其他专辑截然不同。《DIY Yourself》就像.....我一度想到了《Forever Changes》时期的《Love》。你知道为什么这张专辑在他们的所有作品中如此出众吗？

你知道，这张专辑是在波谢夫乐队解散、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乐队成立近一年后录制的。它基本上是和伊万诺夫斯基一起随意录制的。后来伊万诺夫斯基来到鄂木斯克，他和叶戈尔同意一起即兴演奏一些伊万诺夫斯基熟悉的波谢夫老歌。起初，这张专辑的标题是“亚历克斯和格拉日丹斯卡娅·奥博罗纳”。后来，叶戈尔决定把它作为波谢夫的最后一张专辑。

那时候，我觉得对叶戈尔来说，一年就像八年那么漫长。无论是创作的强度、学习演奏的方式，还是录音的技巧，都让他进步神速。从这些录音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这些录音几乎都来自1984年。这真是太有趣了。这清楚地表明，当时叶戈尔的一切都在飞速变化。就连GO乐队翻唱的《Poganyaya Molodezh》（《肮脏的青年》）两个版本，本质上也是两张截然不同的专辑。

现在官方数字平台已经拥有了整张《Communism》专辑，以及尽可能多的《GO》专辑，但是《Posesy》和专辑《At the Speed of Peace》会发行吗？

这家唱片公司不仅在资金上投入巨资，更倾注了心血（他们当中不乏Oborona和Egor的铁杆粉丝），他们希望唱片能做到尽善尽美，更加精彩纷呈，最终呈现出最完美的效果。当然，乐队成员们也希望这些专辑能卖出去一些。我觉得这很正常。

所以，我们暂时不会把它们发布到任何平台上。我觉得这样做很公平也很合理。

是的，但它们最终会被发布吗？

我对此深信不疑。但我本人并不从事这项工作。我的工作是整理档案、处理音频资料，以及处理与叶戈尔遗产中所有创作部分相关的事务。

这部电影会有第二部吗？

当然，我们正在着手制作。但问题是，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五年——才制作出第一部电影《健康永驻》。而且，我们团队最近人手也减少了一些。另外，每个人同时都在忙其他项目。不过，制作工作仍在进行中。只是这部新片会和第一部完全不同。这主要是因为我亲身经历了很多。

将你在契卡洛夫斯基居民区的旧公寓改造成列托夫博物馆的想法最终如何收场（或者说没有收场）？

你知道我一直反对这个故事，它既没必要，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我的意思是，你之后并没有继续关注那里发生的事情，对吗？

为什么？我仍然需要了解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正在发生什么。我当然会关注那里的情况。

这里现在的状况如何？

房子状况正常，就是一间普通的公寓。但我们的东西都不在里面；2007年我们搬到新家的时候把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今年叶戈尔本该60岁了（他已经61岁了——Sadwave注）。现在有很多关于他的书籍出版，包括研究论文和各种专著。周年纪念音乐会是由交响乐团演奏的。这让我想起了格里戈里·斯科沃罗达的那句名言：“世界试图抓住我，但它没有。”

没错，叶戈尔去世这么多年了，世人依然试图抓住他。但幸运的是，叶戈尔的所作所为几乎让这一切成为不可能；这简直荒谬可笑。然而，有些人却执着地尝试着，这种执着本应是更崇高的目标。许多人想要占有他。他们常常自以为是出于爱，比如，“只有我才能理解他，只有跟我说话，他才会从‘那个世界’说话”，等等。但实际上，这只是伪爱和自私。其中也夹杂着许多投机取巧之举。当然，这也可以理解，因为叶戈尔的地位如此显赫，想要把他拉拢到自己阵营里实在太诱人了。这样的人不胜枚举，但他们不太可能得逞，所以我并不太担心。

回到《两百年孤独》的访谈，开头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让叶戈尔为《反主流文化3》准备的访谈成为一份纲领性声明，我们在这里就聊聊吧。但与此同时，许多或多或少熟悉列托夫作品的人可能会把《两百年孤独》称为纲领性声明。或者，例如，列托夫最受欢迎的歌曲《一切按计划进行》最初的创作意图就是一首讽刺之作。我的意思是，在列托夫的作品中，好奇心、巧合、以及某种强大的力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最初的创作意图？

我认为任何真正的艺术家都会经历无数看似偶然的时刻。另一方面，这些偶然事件又有着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它们往往会带来一些并非最初预期的正确结果。这正是神秘、天才和暧昧之处所在。他所有的作品都展现出矛盾的层面。它们如此复杂，以至于人们无法立即预见它们最终会走向何方。它们确实遵循着一条从未规划过的道路，却最终成就了一些有趣的亮点。

再说说意外发现的《At the Speed of the World》录音吧。我之前一直以为它已经遗失了。这是即将发行的专辑《Long Happy Life》和《Reanimation》的试听带。Egor录制这首歌是为了我们的鼓手Andryushkin，让他能在抵达鄂木斯克之前构思并练习自己的部分。Egor对着鼓机演奏并演唱了这些歌曲。所有拷贝都遗失了，但突然间，我发现阁楼里藏着一盘。“床垫底下”——歌迷们用这个说法来形容意外发现某样东西的情况。

我们还有另一首即将推出的专辑《我们为何做梦？》的试听版。它并没有丢失，只是在等待时机。

真正令人震惊和匪夷所思的发现，是一段大约八岁的小伊戈尔演唱《为了他自己和那个家伙》的录音。得知父亲一生中曾用录音机录下过各种家庭琐事，着实让我大吃一惊。那盘磁带和其他一些半卷的磁带一起放在衣柜底下，大多是七八十年代西方乐队的录音。我和朋友们当时正在打扫卫生，就决定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它就在那里。

如果这不是什么秘密，您是否还有很多未发表的档案资料计划进行整理？

我总觉得，原则上几乎所有东西都已经发表过了，但实际上，谁知道呢？我想我得再把所有东西都翻一遍，重新审视一下，也许能找到些什么。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惊喜依然会发生。我不敢保证，但我希望如此。